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

新 编

上 卷

(1951 - 198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 / 费孝通著. -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10

ISBN 7-81108-288-8

I. 费... II. 费... III. ①民族学 - 中国 - 文集 ②少数民族 - 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4496 号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 (上卷)

-
- 作 者 费孝通
责任编辑 李苏幸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9.5
字 数 49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08-288-8/K · 122
定 价 96.00 元 (上下卷)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1. 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 (1951 年 4 月 8 日)	(1)
2. 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 (1951 年 4 月)	(14)
3. 兄弟民族在贵州 (1951 年 6 月 16 日)	(36)
4. 广西龙胜民族民主建政工作 (1951 年 11 月 12 日)	(86)
5. 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 (1951 年 12 月 12 日)	(90)
6. 西南兄弟民族的歌舞 (1952 年 1 月 1 日)	(103)
7. 学习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 (1952 年 10 月 1 日)	(108)
8. 关于黔西民族识别工作的参考意见 (1954 年)	(121)
9. 看了民族歌舞 (1954 年 6 月 16 日)	(129)
10. 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的大宪章 (1954 年 7 月 2 日) ...	(135)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保障了各民族发展自己的 语言文字的自由 (1954 年 8 月 21 日)	(138)
12. 对于宪法草案有关民族问题基本规定的一些体会 (1954 年 9 月 3 日)	(146)
13. 话说呼伦贝尔草原 (1954 年)	(165)
14. 关于民族识别问题的意见 (1954 年 11 月)	(198)
15.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和与少数民族历史有关的地区的 考古工作 (1956 年 2 月)	(203)
16. 关于建立中央民族博物馆的意见 (1956 年 2 月)	(215)
17.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工作 (1956 年 7 月)	(224)
18. 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 (1956 年 8 月)	(229)
19. 关于对待民族民间文艺遗产的一些意见 (1956 年 9 月 20 日)	(259)

20. 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 (1957 年 2 月 8 日)	(265)
21. 民族研究向前看 (1976 年 11 月)	(281)
22. 关于继续开展民族识别调查研究的建议 (1978 年)	(287)
23. 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1978 年 9 月)	(290)
24. 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一些体会 (1978 年 11 月)	(314)
25.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1979 年)	(332)
26. 《非洲的种族》译后记 (1979 年 8 月 20 日)	(347)
27. 中国的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的发展 (1979 年 10 月)	(351)
28. 四十三年后重访大瑶山 (1980 年 1 月)	(365)
29. 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1980 年 3 月)	(379)
30.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图册序 (1980 年)	(391)
31. 《中国少数民族诗歌选译》前言 (1980 年)	(394)
32. 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 (1980 年)	(397)
33. 关于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的一些意见 (1980 年 12 月)	(404)
34. 怎样开展民族研究工作 (1981 年 8 月 25 日)	(414)
35. 龙胜猕猴桃 (1981 年 9 月)	(425)
36. 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 (1981 年 12 月 7 日)	(432)
37. 为什么要开展民族学研究 (1982 年 3 月)	(447)
38. 谈民族调查工作的微型研究 (1982 年 4 月)	(451)
39. 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 (1982 年 4 月 29 日) ...	(453)
40. 切实提高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 (1982 年 5 月)	(460)
41. 深入进行民族调查 (1982 年 5 月 27 日)	(468)
42. 《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序言 (1982 年 6 月 20 日)	(477)
43. 关于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上的几个问题 (1982 年 7 月)	(482)

44. 确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1982 年 8 月)	(491)
45. 四上瑶山 (1982 年 9 月)	(494)
46.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民族问题 (1983 年 1 月)	(501)
47. 发挥智力优势, 为民族地区四化服务	
(1983 年 4 月)	(512)
48. 《盘村瑶族》序 (1983 年 6 月 30 日)	(514)
49. 《瑶族风情歌》序 (1983 年 7 月 3 日)	(528)
50. 民主党派智力支边 (1983 年 7 月 10 日)	(534)
51. 谈谈民俗学 (1983 年 8 月)	(540)
52. 抓紧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出版 (1984 年 3 月)	(547)
53. 开发边区及智力资源的使用和培养	
(1984 年 4 月 12 日)	(553)
54. 赤峰篇 (1984 年 9 月)	(578)
55. 定西地区区域发展刍议 (1984 年 10 月 4 日)	(607)

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

在访问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工作中，我们深切体会到文艺工作是宣传民族政策最有效的方法。少数民族和我们语言不同，很多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讲话和文字宣传都有困难，而文艺工作却可以从形象和感情上把我们的政策交代给少数民族的群众。而且少数民族大多是极爱好文艺活动的，尤其歌舞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通过他们熟悉的形式很容易接受我们的意思。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各地文艺工作者对于这项工作做得是不够的，为了民族工作必须很快地展开，所以我想向文艺工作者发出呼吁，并根据半年来在贵州少数民族中工作的体会，对于怎样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这个问题提出几点来讨论讨论，虽则我自己对于文艺工作是个外行。

如果我们承认各地文艺工作者对于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工作做得是不够的，我们首先得分析一下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何在。基本上说，这是因为我们各地文艺工作者面向人民大众，决心以文艺来为他们服务，大部还没有太长的历史。过去在顽固的封建势力之下，文艺工作者服务的对象并不是人民大众，而是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在那个时代自然谈不到为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去服务了。少数民族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即使有小量的地主，他们也养不起一辈汉族的文艺工作者去为他们服务。过去这种文艺工作者如果注意到少数民族，也只是想搜集一些怪癖的题材去满足封建地主和少数资产阶级的好奇心，或者甚至用作宣传大民族主义的材料，绝不是为少数民族服务的。这就说明了：只有把

立场问题搞清楚之后，文艺工作者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之后，才能谈得到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

但是当我们一般的文艺工作者已经接受了文艺是应当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之后，服务于少数民族的文艺工作是不是就会很顺利地发展起来呢？我觉得其间还有困难需要我们克服。有些文艺工作者可能认为我们不必特别提出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口号，只要我们的文艺的确是为人民服务，自然可以推行到少数民族中去的。为什么我认为这种思想是可能存在的呢？那是因为在其他民族工作上已经发现这种忽视民族区别的作风，而且这种作风也已经成了民族工作的障碍。在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时，因之也可能会碰着这种障碍的。具体地说：就是可能有人认为汉族人民所接受的文艺，加以必要的翻译，必然能为少数民族所接受，而且必然会发生同样的效果，因之，不必特别提出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把我们已有的文艺作品，推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就可以为少数民族服务了。

这种不承认民族区别的思想是不正确的。民族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但语言文字不相同，而且经济基础、社会形态以及民族感情都有区别。这些区别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所以主观上抹杀这种区别是不正确的。

客观存在着的民族区别为什么会有人不承认它呢？为什么我们主观上会不能反映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呢？歪曲和遮盖一个事实必然有其社会的原因。让我们在这方面分析一下。我们所谓不承认民族区别，并不是真的认为在人类中没有不同语言文字、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及民族感情所构成的不同集团，而是不肯承认其他民族的平等存在，不肯承认民族区别的合法性罢了。只承认自己的民族是唯一合法的，从而认为是高尚的、优秀的；凡是不同于自己的民族就成了非法的，下等的，不应当存在的了。这种思想就是大民族主义。

这种思想怎么会发生的呢？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者对于我们境内各少数民族一直是进行侵害的。过去的一部历史充满着大民族侵害小民族、小民族反抗大民族的记载。封建统治者侵害小民族是为了要扩大他们剥削的范围，使更多的劳动人民为他们所奴役。大民族主义是用来支持他们侵害小民族行为的思想，它的作用就在于离间各民族的劳动人民，使他们可以利用大民族的人民去为他们的目的服务。

蒋介石继承了历代封建帝王及军阀的反动统治，在他的《中国之命运》中就公开地宣传大民族主义，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这就是要剥夺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合法的存在和平等的权利，使他可以进行对少数民族残酷的剥削。

不承认民族区别的合法性，引起的不是民族的团结，不是加强各民族友爱合作，相反的，是引起民族之间的仇恨和隔阂。小民族受到了大民族的侵害和压迫必然要发生反抗，反抗遭到更大的压迫和屠杀，小民族虽则一时可以被屈服，但是仇恨是永久的。以贵州说，少数民族的反抗在历史上没有断过：“三十年一次小反，六十年一次大反。”在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遗留着无数英雄故事和反抗的故迹。同时，我们和少数民族同胞稍一接触，就可以明白，对汉族的隔阂是历史性的，对汉族的怀疑和不信任，至今还是存在着，于是在少数民族中发生了狭隘民族主义。这种狭隘民族主义是小民族反抗大民族主义的产物，所以基本上是由大民族主义所引起的。不承认民族区别的合法性，结果就是这部惨痛的民族冲突的历史。所以，这种思想不但不正确，而且是有害的。因之，我们要为少数民族服务，首先要承认民族区别，绝不当忽视民族特点。

我已经说过所谓不承认民族区别其实只是不承认民族区别的合法性罢了。歧视小民族，认为小民族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

这样自然不值得我们去向他们学习了。在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时，因之也可能碰着第二个困难，就是把少数民族看成是没有文艺的。我们要以文艺去服务于他们，只有把我们这一套搬去。因之发生了有如西洋传教士那一种作风。自己高高在上，用着教训的口吻、恩赐的态度来“服务”于少数民族。口口声声是教育他们，拯救他们；凡是遇到群众不接受“教育”或“拯救”时，就会发生“不识好人心”、“不受抬举”的心理。进而“为了他们好”强制要人接受，犯了我们切忌的命令主义。当然，在文艺工作中不致像在其他工作中一般产生严重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预料，就是这样做法，也永远不可能达到为少数民族服务的目的。

我们怎样以文艺工作去服务于少数民族呢？这就是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的内容和形式问题。让我们先谈一谈内容问题。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首先是通过文艺工作来宣传我们的民族政策。主要是团结各民族，尤其是消除少数民族在过去历史中所遗留下来的对汉族的仇恨。其次是要启发少数民族的觉悟，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的社会改革。

民族团结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向汉族群众进行反对大民族主义的宣传，另一方面是向少数民族宣传我们新民主主义各民族平等、友爱、互助的政策。这样也就会逐渐地消灭存在于少数民族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向大民族主义作斗争，也就是向狭隘民族主义作斗争，因为狭隘民族主义的根源就是大民族主义。

过去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文艺工作者曾经通过他们的文艺活动，把少数民族描写成不文明的野蛮人。现在我们必须消灭这种坏影响。把少数民族的许多美德，实事求是地介绍给各民族的群众。少数民族是具有许多美德的。比如苗族同胞的爱劳动和爱民族就给我极深的印象。除了极少数已经汉化了的地主外，苗族同

胞普遍地从事劳动，不脱离生产，都是做“活路”的。

有一天傍晚，我在黄平郊外眺望：对面山坡底下出现了一个妇女和一个孩子挑柴回家。远远望去，那矫健的阔步，轻捷的动作，好像毫不费劲地依着曲折的山径，那么快地越过了山顶。我好像听得她很骄傲地向我说：“在你是高山，在我是平地。”是的，我领会了，如果没有这爱劳动的美德，我们的苗胞哪里还会在这样长、这样重的压迫下屹立至今呢？他们民族小，抵抗不住残暴的侵略者，他们只有上山，就是这个妇女这个孩子所表现的阔步，保存了他们的民族。在山上，一片荒坡，他们又靠了一双手，把这贫瘠的石山开成良田。我们听到可泣可歌的故事太多了。有一个被汉人地主苛刻剥削的苗胞，偷偷地每天晚上，在黑暗里爬上山开荒。他沉痛地为我叙述了怎样因为过分的疲乏半夜里昏倒在田里；但是他很骄傲地说：最后还是开出了一片良田。后来地主又逼他“投庄”，他想走，可舍不得这块田。他哭了。这样能劳动、爱劳动的人民永远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他们热爱自己的民族。他们虽则弱小，但是永远不肯投降。在炉山县的凯里，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60多岁的苗胞，因为太激动了，站起来唱了一节《反歌》。这《反歌》是叙述咸丰、同治年间18年的反抗民族侵略战争的故事：苗族的领袖被清朝的军队捉住了，用酷刑逼他屈服，把头盖骨削去，加油点了灯。问他：“要不要反了？”他很从容地答复：“压迫我们一天，我们就反抗一天。”这《反歌》过去只在隆重的仪式里歌唱，是一种民族教育。那天晚上，在洋溢着民族团结的空气中，他引声高歌，表示民族压迫已经结束，从此是一家人了。他的歌声还没有完，在座的许多苗族老年人，低头哭了起来。全场肃静，我深刻体会到热爱民族的高贵感情。

发扬少数民族的美德，使我们能在感情上确立平等的观念。在这基础上才能更痛彻地觉悟到过去压迫弱小民族的大民族主义

的丑恶和罪过。大民族主义者的手段是先歪曲事实，把小民族说成了禽兽，使大民族里的人民丧失对其他民族中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感情。因之，我们也得从恢复对兄弟民族亲切的友爱，才能打破大民族主义的阴谋。

少数民族仇视和怀疑汉族有着极长的历史根源，绝不是一番话、一夕谈可以改变过来的。少数民族同胞告诉我们，他们从小父母就用“客家来了”来唬吓孩子。“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这种历史的教训在过去是有事实做基础的。我们做民族工作的人，必须深切地体会这种感情，而且应当同情他们。也就是因为有着这种感情上的隔阂，所以我们要在民族团结上做工作。破除民族间感情上的隔阂是一切民族工作的前提。在这个工作上，文艺工作者有很多服务的机会。通过文艺的活动，我们可以把新的亲切的感情传达给少数民族，其效果比讲话和说理可以更大。这是我们这次访问的经验。当我们访问团的同志化装成苗族妇女上台唱苗歌和跳苗舞时，苗族的观众立刻表示了无限的兴奋。在民族团结舞中，我们有各民族的舞蹈。有一次台下一位苗胞看见台上跳苗舞的同志没有戴项圈，她立刻摘下自己的银链，要我们送上台去加在那位同志的项上。她这样做，是因为她感觉到台上的同志代表着自己，一定要以自己最美的装束出现在民族的行列里。每次我们向苗族妇女借衣服来化装时，她们一定要亲自来替我们的同志装扮。还有一次，在湾水，苗胞送了一顶凤冠给我们，我们由一位穿了苗服的同志去接受，当众把凤冠戴在头上，台下的苗胞乐得直鼓掌。后来向我们表示，我们真是一家人，平等了。这许多事实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就是通过文艺来表示民族平等的感情，比我们在台上喊一千遍口号，效果大得多。这不但说明了文艺工作是宣传民族政策的有效工具，而且也说明了我们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必须要受政策的指导。

我们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不但要通过文艺工作去破除民

族仇恨和隔阂，促进团结，建立友爱合作的感情，而且还希望能启发少数民族的觉悟，使他们能自觉自愿地进行社会改革。但是要做这件工作时，必须有充分的理论武装，不然，就不但不能收效，而且可以引起相反的结果。

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这大家庭中的兄弟民族，由于过去历史上大民族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小民族的结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造下了极不平衡的情况。我们这个大家庭要好好的建设起来，要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要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绝不能坐视我们少数民族的兄弟们长期地滞留在半原始性的社会阶段上。局部的建设、局部的发展是不应当，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少数民族的社会必须在汉族人民的帮助下很快地发展起来。我们要帮助少数民族的，也就在帮他们创造使他们可以很快发展的条件。要社会发展必须进行适当的社会改革，这是肯定的。但是怎样去帮助他们，却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在访问工作中一路上遇到许多干部同志和少数民族中的积极分子问我们：为什么中央所颁布的许多有关社会改革法令，总是拖着一条“本法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规定。我们也遇到不少少数民族同胞要求我们请中央人民政府下令禁止这样，禁止那样。当我们说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制度及风俗习惯的事我们不能干涉时，也有质问我们这是不是要少数民族永远这样落后？我们怎样答复呢？谈到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这问题也存在的。既然负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其社会的任务，在文艺的内容里，对于社会改革应当取什么态度呢？

在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的工作上，我们很容易遇到两种不正确的思想：第一种是发生在汉族的干部里的包办代替的思想，第二种是发生在少数民族积极分子中的急于改革的思想。少数民族的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是事实。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

部，如果带着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残余，就很可能不考虑民族区别，把适合于汉族社会所进行的改革，不加区别地搬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去。“提他们一把”，“良药苦口”，“等他们觉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哩”——他们觉得只要自己的动机好，为少数民族人民大众谋利益，就可以了。于是想借政府的权力，包办代替地进行社会改革。少数民族中的积极分子看到自己民族的落后，心里很难过，也很焦急，“恨不得一天之内就追上汉人”。有一次我们向一位在政府里工作的少数民族同胞问他自己民族的情况，他半吞半吐地很不好意思启口，“太落后了。”接着，是要求政府帮助少数民族把那些难于出口的“坏风俗”下令禁止。他很不满意我们主张宗教信仰的自由，因为“一自由，少数民族的迷信就没法取消了。”

这两种思想是和我们的民族政策相抵触的。我们认为少数民族的社会改革一定要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由本民族自己来进行。所以，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了各少数民族均有“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为什么呢？是不是要少数民族停止在落后的水平上呢？当然不是的。相反的，这才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必要条件。首先我们要明白，少数民族并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各个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并不是一样的。因之，各民族在同一时间，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是不相同的。如果我们不从具体情况出发，一律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用政治权力推行一致的改革，就容易与少数民族的群众脱离，使群众和执行改革的政府对立起来，引起民族隔阂，反而阻碍了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所以，包办代替的命令主义在民族工作中引起的错误，可以比其他工作中更为严重。

但是，我们是不是袖手旁观，等待少数民族社会自己发展起来呢？又不然。我们是要加以帮助的，帮助他们觉悟起来。我们必须根据他们已有觉悟的程度，启发他们提高和巩固。比如，他

们的人民大众受着封建的压迫，我们就得善于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实行着早婚制度的地区，我们就要善于向他们传播生理发育的常识。通过文艺工作，我们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

在一定的少数民族中进行一定的启发工作，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出发，依该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阶段，并且在加强民族团结的总方针下进行。这并不是件简单的工作，因为，如果我们犯了教条主义，不顾情况，生硬地依我们主观的愿望强制少数民族“吃药”，必然会违反民族团结的总方针的。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尚是神权统治的少数民族中去，一开始就宣传无神论，那必然会犯错误的。当然，马列主义者是不承认有神的。无神论本身是科学的。我们也相信社会继续发展下去，有神论是会消灭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在那种少数民族中，以汉族的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去宣传无神论，所得到的结果，不是帮助他们社会的发展，而是引起民族纠纷，反而阻碍了他们社会的发展，也就是对该少数民族人民大众有损害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此是不是袖手旁观呢？不然，我们应当在他们自愿接受的条件下，输入科学，如医药卫生，帮助他们解决疾病的痛苦；输入生产技术，帮助他们发展经济；这样才能创造改革神权社会性质的条件。社会改革是性急不得的，但是又必须依具体情况加以启发和酝酿的。文艺工作的任务就在进行适合于一定社会条件的启发和酝酿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服务于少数民族。

因之，一个要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者，必须能掌握民族政策，熟悉所要服务的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进行工作，所以必须克服轻视政治学习的错误思想。

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形式必须是民族性的，就是必须通过少数民族自己所熟悉的形式去表现的。我们不当停留在“我们表演给你们看”的阶段上，而是要以“从少数民族中来回到少数民族中去”的原则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他们自己的文艺活

动。因之，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基本上，必须是少数民族形式的。我们汉族的文艺工作者要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这种文艺，首先必须向少数民族学习，这是“从少数民族中来”的一部分，然后经过加工和提高，重又“回到少数民族中去”。

一个民族的文艺形式，基本上决定于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因之，各个少数民族所有的文艺是不一定相同的。以贵州说，苗族和仲家（布依）族的文艺形式就有区别。在仲家族里我看到了玩龙灯、踩高跷、跳狮子、地戏等活动，他们的乐器和歌曲也有很多是吸收汉族的。但是在苗族里，主要的却不是这些。

苗族主要的文艺活动是人人皆唱、人人皆跳的歌和舞。他们的文艺活动也更密切地结合着他们的生活。一个不会唱歌、不会跳舞的人，在他们社会里有如我们不会说话的哑巴和不会走路的跛子，是不可能在社会里得到健全生活的。唱歌和跳舞是男女讲恋爱时必需的工具。他们的青年们以歌舞来认识异性，选择配偶，这种活动就叫“摇马郎”。所以如果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就不容易得到满意的爱人。他们在社交的场合中也不能没有歌舞。欢迎和欢送客人就得唱歌，喝酒又得唱歌。凡在节日的群众集会上，各村男女盛装歌舞，互相竞赛。在田间劳动，在路上挑担，到处有歌可唱。因之，很多人一提到苗族，就很容易联想起他们的歌舞来。

这种文艺是配合着他们爱好劳动的生活。人人劳动，人人歌舞。男女都劳动，男女也比较平等，保持着男女社交自由和婚姻自由，和我们封建性极强的旧社会刚好相对照。在我们的封建社会中，男女受着礼教的束缚，授受不亲，自然不可能发生以歌舞来接触异性的方式。在一部分封建势力比较强的仲家族中，一方面发生了媒妁之言的早婚制度，另一方面却还没有放弃一定限度内的自由社交，以歌唱来结识异性的“赶表”；结果引起了种种

纠纷、抢亲及械斗等破坏社会团结的行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社会形态和文艺形式是密切结合着的。

苗族那种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缺乏固定的形式。因为人人皆唱，人人皆舞，同一调子，各人可以各唱，形式上很难标准化。他们的歌唱又是富于语言性，要唱什么就可以唱什么。真是“即景生情，即情生词”，歌词大多是临时编的。比如，在一次招待会上，一位苗族妇女，举起酒且要我喝酒，毫不思索地唱：“团长你翻山越岭来此地，不为金来不为银，为的是我们苗家要翻身，山高来水长比不得你的恩。”（译意）我是不能喝酒的，只是端在嘴上“意思意思”，可是她却不放松，接着就唱：“满满斟了一杯酒，端给团长表心情，团长样样都很好，就是喝酒不像个团长。”（译意）她们就是这样可以一直依着情况的发展往下唱，唱起马郎歌来可以唱一天。调子是一个，内容却一直在发展。

从形式上去看苗族的歌舞是很简单的，因为它还保持着原始性，配合于用简单工具劳动的农业经济阶段。原始的形式虽则简单，但是因为密切地配合着生活，其内容是丰富和生动的，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使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苗族的文艺还接近于自然形态，只是粗糙加工的原始形态。他们还没有发生演员和观众的区别，大家是演员，大家是观众。在一个广场上，可以围上许多小圈子，跳舞的人停下来就站着看别人跳，看一忽，有兴致，加入队伍就可以跳。我们看见过他们的“跳场”，此起彼伏，一群群，一团团，无始无终，要停就停，要跳就跳。这和我们舞台上组织的表演完全不同。因之，要把苗族歌舞搬上舞台就很困难。他们的歌舞，一旦脱离了活生

生的现实生活，留下来的只剩了很简单的形式，观众也就难于体会到他们文艺的特点了。

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要通过这种简单的文艺形式去服务于少数民族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原有的形式过于简单，要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必须介绍比较复杂的形式。比如，在这种群众性的歌舞中，主要是抒情的，很少表现情节的能力，所以苗族至今还没有发生戏剧。他们没有文字，所以也没有小说。他们虽则有史诗，好像我上面提到的《反歌》，但是并不普遍。这样简单的形式是不容易表现比较复杂的生活内容的，所以必须把新形式介绍进去。这个意见是有理由的。但是要提高他们的文艺形式却并不是搬运我们这一套进去就可以为他们所接受的。现在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人民还是经营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但是剥削和压迫他们的反动统治一旦打倒，靠他们的劳动，生活必然会富足起来。生活随即复杂，那些原始性的文艺形式也就会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了。我们帮助他们在这方面发展起来是很应当的。但是新的形式却必须从他们原有的基础上提高起来，从他们原有基础中优良的一面发展起来。而不是放弃旧的，全盘接受新的。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原有基础中有着很可宝贵的成分。比如苗族文艺的普及及群众性，那正是我们自己文艺所缺乏的。苗族不必经过我们汉族过去所走的那一段弯路，就可以从原有基础上提高起来。从原有基础上去提高也许比我们自己文艺的改造更容易见效。这正和他们的经济发展一样。他们曾长期被汉族封建势力所统治，大部分人民成了汉族地主的佃户，但也因之本民族中封建势力不易壮大，在民族性格上保持了爱好劳动、合作互助、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美德。汉族封建势力打垮之后，他们这些美德也正是他们经济迅速向前发展的优良基础。

因之，我们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他们的文艺，必然先得向他们原有的文艺学习，也就是说，要“回到少数民族中去”，必先

“从少数民族中来”。

我们可以相信，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了，必然会不满足于他们原有文艺的形式，必然会要求提高的。我们必须根据他们自身的要求，把他们所需要的介绍给他们，以减少他们发展上的困难。这才是“帮助”而不是“给人药吃”。我们并不是要他们汉化了才算是“提高”。我们也可以相信，从他们原有基础上提高起来的文艺，绝不会完全相同于我们汉族的文艺。他们要在他们的文艺里表现他们的民族性格。我们应该欢迎每一个少数民族，蓬蓬勃勃地发展其民族文艺，这样才使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的文化内容更为丰富，更为结实。

1951年4月8日改写

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 1}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各民族社会经济地位不平衡的地区。以现有人口来说，汉族占多数，约占 60% ~ 70%；除汉族外其他少数民族种类还没有准确数目，据已经知道的，自认为独自构成民族单位的，有 27 种。其中以苗、仲（布依）、彝、回四族比较众多。这许多民族基本上是杂居的，它们共同居住在一个地区之内，政治及经济密切联系。少数民族聚居程度最高的县区，如台江、雷山，仍有 5% 以上的汉族居住在内。纯粹由单一民族聚居的情况要到乡村级区域才能看到。由于杂居的情况，各民族并不能构成独立的政治及经济单位，但在共同的政治及经济单位中，各民族一般说是处于不同的地位。基本上占统治地位的是汉族。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区所处政治及经济地位又不完全相同，因之形成了复杂的民族关系。这种复杂的和不平衡的情况有其历史的造因。

从全国范围看，贵州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接触的边缘。汉族在历史上从中原向边区扩张，少数民族依靠这多山的自然条件，奋斗反抗，部分地保存至今。但又因各民族反抗的强弱，各地区自然条件的不同，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影响亦发生不平衡的情况。有些民族在某些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尚保存其前封建主义的原始社会性质。但一般说，由于长期受汉族政治及经济上的影响，贵州少数民族的社会密切联系于汉族的社会，是整个贵州社会经济的一部分，因之，基本上也已进入半封建半

* 本文系作者任中央访问团副团长、贵州分团团长时所写的调查报告。

殖民地的阶段。但是少数民族社会由于长期的民族压迫，经济落后，还有其和汉族社会不相同的特点。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主义主要是以民族形式出现的：汉族封建地主压迫少数民族农民的生产关系。因之，阶级矛盾采取了民族矛盾的形式。统治阶级又利用民族矛盾造成民族仇恨和隔阂，破坏了民族间阶级团结，便于他们对少数民族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屠杀。民族和阶级间又引起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今天我们要在这复杂和不平衡的民族情况下进行革命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对于这种情况必须有充分的了解。因之，了解情况也是我们访问团的任务之一。但是，我们十分惭愧，这个任务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完成。我们能力的不足和时间的限制，不但所得到的材料是局部和片面的，而且一定有很多是不正确的；我们的分析又是肤浅的，而且一定有很多是错误的。所以以下所提供的材料只能作参考罢了。



从历史上去看贵州各少数民族发展的经过是了解现有社会经济不平衡的民族情况所必需的准备。但是由于大汉族主义有意识地抹杀和歪曲各民族历史事实，我们在短时间之内，甚至只想求得一个大体的轮廓也很困难。这里我们只能简单地一述，里面错误是免不了的。

贵州现有各民族中最早在这地区生活的可能是仡佬和木佬等。有人认为佬族就是古书上的僚族，在早期是西南的土著民族。但历经外来民族的压迫，现在所存已很少，零星分布各地，大都已汉化。

现在贵州的主要少数民族是苗、仲、彝、回四族。其历史来

源、语言、风俗、习惯上都有不同。苗族一般认为发源于中原，属苗瑶语族，受汉族压迫从东部入黔，最初居住于乌江及清水江流域。汉族又从北面侵入，苗族被迫后退，现仅保留了湘黔边区（松桃一带）及以台江、雷山为中心的苗岭山脉地区。在这个区域里苗族人口现还占 70% ~ 80%。由于汉族封建统治不断进攻，苗族首当其冲。在战争中，队伍的流动及人口的流徙，使他们零星地分散到各地，西至威宁，南到盘江（甚至到云南）都有少数苗族杂居在其他民族间，总人口约 180 万到 200 万。

仲家（亦称水户等）及侗家、水家、僮家等族均属侗台语族，可能是来源相同的，从湘桂边区进入黔境。侗、水、僮（壮）族居住于黔东南边区（侗族中心在黎平，水家中心在荔波），仲族移居盘江流域，以册亨、望谟一带为中心，总人数约有 160 万到 190 万。贵州彝族和大小凉山的彝族相同，属藏缅语族，居住于黔西北，现属毕节专区一带，总人数 10 万左右。回族入黔较晚，大多在清末从云南因杜文秀起义失败后而移入的，分散于黔西南及西北主要交通线的城镇及其附近，人口尚无确数。

汉族的封建统治者从蜀汉时起已经进入黔省，历代帝王都到这边区来用兵。早期进入的军队很多就驻扎在各军事据点，称作军屯，经长期的接触，有完全同化于当地少数民族的，亦有部分同化，形成许多零星分散的“汉裔民族”（如堡子、凤头鸡、南京人、穿青、里民子等）。汉族大规模移民从四川南下，占领黔北。乌江以北，鸭池河以东，现在已经很少有少数民族。汉族更不断地借政治和商业的优势，深入各少数民族区域，作点线的占领，凡是商业中心的“街头”，已差不多都有汉族居住。

这个历史造成了贵州这个多民族杂居地区。以县单位来说，现在已经没有单一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了，甚至一乡、一寨中都可以有好几个民族杂居在一起。这是贵州民族情况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

由于汉族深入各少数民族原住区域，在政治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除了极少数地区，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上已失去其独立性，成为整个贵州社会的一部分。基本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但是在这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却因为历史和地理条件的不同，各民族还是各有其特点。在社会发展上，各地区的各民族并不平衡。这是贵州民族情况的另一重要特点。兹就各民族主要特点分别简述如下：

一、苗族由于其所占地区的位置，首当汉族的压力，历代受到大规模的屠杀，清水江畔“三十年一次小反，六十年一次大反”，即使雷公山的腹地，亦有民族战争的遗迹。民族战争的结果，总的来说，是汉族在政治及经济上对苗族的深入控制，直接由汉人来统治，这和其他少数民族是不同的。这地区苗汉经济关系的历史是：汉族用武力占领了土地，大多用苗族来耕种，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苗族靠他们的劳动逐渐恢复他们的经济力量，汉族地主荒淫奢侈，逐渐出卖土地给苗族，苗族势力重又下山，于是和汉族在政治上发生冲突，引起民族战争，再度被迫上山，一上一下，形成周期性的反抗斗争，苗族势力，愈缩愈小。

在上述的情况下，苗族发生了如下的特点：（1）苗族一般地区的封建势力不易成长，地主少，土地分散，愈向边缘，汉族地主集中的土地愈多（黄平东坡苗汉杂居区，苗族现已占有全乡土地 63% 强。而苗族内部土地占有：地富 4%，中农 42%，贫农 26%）。在腹地聚居区，阶级分化较强（据未证实材料，丹寨苗族土地占有：地主 28%，富农 27%，中农 28%，贫农 15%）。（2）苗族受到强大的民族压力，内部团结强，互助多。

但是因失去政治权力，缺乏较大的领袖人物。（3）爱好劳动，即使是地富，一般也不脱离劳动，属半地主式富农。租佃关系，以亲友为多，剥削较汉族地主轻（一般平分）。生活俭朴，力求自给自足。很少经商，经济落后。（4）屡经残暴的打击，常有举家逃亡，到高坡去开垦，所以在其他民族居住区内，多零星租地生活的苗族佃户，分布地区很广，生活穷苦。他们不但受汉族压迫，同时也受当地其他少数民族压迫。（5）民族感情浓，民族性的风俗习惯，大部分保留。妇女穿着原有的服装，苗语普遍通行，强烈反对国民党剪发改装的同化政策。歌舞发达，男女比较平等，恋爱比较自由，封建势力小。

二、仲家居住于盘江流域，离汉族势力的中心区较远，北面又隔着苗族，所以和汉族的冲突，没有苗汉之间那样尖锐。汉族封建帝王，对仲族的统治，采取“以夷制夷”的手段，以仲族人为土司。他们的经济基础破坏得少，在长期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发展了封建主义，有了较大和较多的地主。在民族冲突中，这个阶级为了其本身利益，曾向汉民族投降和妥协，保持了肥沃水田的占有。他们更吸收了因战争和民族压迫而逃亡来的苗族，做他们的佃户，供其剥削。发生了“苗家占山头，仲家占水头”的俗语。在这种情况下，仲族有如下的特点：（1）经济比较发达，生活比较富裕。已有部分地区发展了家庭和作坊工业及小商业。本族有大地主，对本族农民的租佃剥削与汉人一样（一般是四六分，并有其他超经济剥削），阶级分化较强。（2）地主阶级向汉族统治者投降及妥协，形成了“封建买办”性的上层。他们依靠汉族统治者维持其阶级利益，对本族及他族农民进行剥削及敲诈。（3）这些“封建买办”权力的来源是汉族统治者。汉族统治阶级中的矛盾，也影响了仲族的上层，发生宗派。宗派斗争，成为仲族社会中突出的现象。民族内部缺乏团结，加上汉族统治者利用其内部矛盾，煽动挑拨，致仲家地区经常发生械斗

及仇杀。(4) 仲族本身封建主义比较发达，又因政治上附属于汉族统治者，所以文化上也倒向汉族。有些地区的仲族，已丧失其原有的语言，妇女也很多改了装，风俗习惯也受到很强的汉族影响，对国民党的同化政策，反抗不强。上层分子有否认自己是仲族的。(5) 汉族封建性的风俗习惯被吸收到仲族里，和原有的民族传统发生矛盾，如父母代订婚姻和自由恋爱（赶表）的矛盾，增加了社会纠纷。(6) 压迫及歧视苗族及其他较小民族，仲家和苗族及其他小民族之间存在着阶级性的民族隔阂。

三、贵州西北部原是以大小凉山为中心的彝族区域的一部分。但是因为和汉族接境，所以很早就遭到吞并，在元明时代，当地的统治阶级受汉族统治者加封为土司，但其对内的政治及经济的统治依旧保存，可能还保留着原来的奴隶制度（土地由土司所独占，农奴无人身自由）。汉族的封建势力，逐步侵入，尤其是改土归流以后，原来的奴隶制度已经变质（部分土地流入市场，剥削关系以租佃名义出现），逐步让位给封建主义（新兴地主阶级的发生）。但是这地区所兴起的封建主义，也受着奴隶制度的影响，还带着初期封建形态（如大量无偿劳动的剥削及佃户部分缺乏人身自由）。从地域上看：毕节以东，原属水西土司区，封建主义已经确立，与汉族地区相似，地主也大部分是汉人；但毕节以西，原属乌撒土司区，则尚属初期封建及带有奴隶制度的残余，新兴地主以黑彝为多。所以这个区域的社会性质，是很不平衡的，正处在变迁的过程中。其特点如下：(1) 彝族的统治阶级（即奴隶主）是黑彝，从其他民族掠来的人民成为奴隶，统称白彝。土司制度时代，黑彝中有势力的被加封为土司，土司之下有管事的土目，主要的是黑彝，亦有极少数汉人，统称为“官家”。这区域中又有其他民族陆续移入，没有沦为奴隶，仍保存其民族作为官家的佃户，如苗、仲、汉裔及汉族农民。所以这地区握有政治及经济实权的，曾是少数民族（官

家)。汉族统治者，名义上虽则很早就统治了这区域，但是实际统治权的转移，是经过很长时期逐渐进行的，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水西区域，才把最后的土目势力兼并。到解放时，我们才把乌撒区土目势力击溃，政权才归于各族人民。(2)在土司及后来土目统治时代，在汉族统治者的放任及煽动之下，兼并甚烈，新兴地主出现后，土目和地主之间，地主与地主之间(又有黑彝与汉族地主之别)，都发生过长久的武装斗争，有类于大小凉山“打冤家”，所以仇杀事件是不断的。(3)这区域的农民，包括着若干民族，受到的压迫和剥削，较贵州其他区域更重，而且带着“半奴隶制度”的性质，官家可以“加押”为名，随意搜刮农民的财富，甚至早年有用“人租”的名义剥削农民的人身自由。在“土皇帝”式的统治下，农民的生活和农奴相差不多。在封建地主手下当佃户，除了地租的剥削外，还受到大量的无偿劳动的剥削，这是受了奴隶制度影响的结果。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虽则这样重，但是因为“官家”统治的悠久，镇压力大，统治者对农民的分化，加大了民族间的分裂(同是被压迫阶级的白彝和苗族不团结)，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并没有发生。

四、回族在贵州大多分散在黔西南及西北主要交通线上的城镇里，也有一部分散居在农村，回族社会经济的特点是：(1)基本上以小商业经济为主，部分小手工和小农经济。住在城市里的回族，多数从事小商业经营，如安顺贵阳的回族，少数经济力薄弱的做小贩和出卖劳动力为生。部分在农村中的回族，如威宁平坝等地，则多数为农民，尤以中贫农较多。由于受汉族影响深，内部阶级分化深，在个别地方如贞丰、兴仁有大封建地主兼官僚资本家的，而一般群众的职业的多样性，又非其他民族所能比。(2)回族基本上已接受汉族文化，住在城镇里的回族，文化程度较其他民族高，如以知识分子在其本民族人口数中所占比

例来看，比汉族还高，一般都用汉语汉文，伊斯兰经文仅用于宗教仪式。（3）一般的宗教信仰的联系与遵从较其他民族为强，通常都自称“回教”，主持宗教仪式的阿訇（教主），在回族群众当中，有相当的影响。

五、其他较小的少数民族，我们接触得不多。“汉裔民族”基本上是说汉语的，服装也是汉族的古装，但部分地受到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同化，大多住在原来军事据点、堡或屯，经济上亦与汉族同。仡佬人有认为是苗族，尚有氏族组织的残余，除聚居区有少数小地主外，多属佃户，在多种民族压迫下，生活甚苦。仡佬系土著民族，大多汉化，经济地位极低，文化亦落后。木佬、土佬只有零星杂居于其他民族中，此种土著民族，已濒于消亡。

三

汉族的封建统治者向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渗透有很长的历史，蜀汉南征已是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民族战争在这块土地上一直到解放才告结束。近代最大的战争是清代雍正、乾隆、嘉庆时三大战役及咸丰、同治的 18 年战争。国民党统治时期在黔东南苗族区还进行过大屠杀，血迹斑斑，至今还残留着劫后的创痕。千百年来民族战争史主要是封建统治者用武力来掠夺少数民族土地，利用少数民族及汉族人民大众的劳动，进行剥削，又以残酷的政治压迫，维持其统治，他们的手段是这样：用武力征服了少数民族，占领其土地，分封或出卖给汉族（亦有少数民族中的败类）成为当地的地主。这些地主把土地出租给各民族的农民，进行剥削。他们更借政治势力，霸占少数民族的土地，逼其把新开辟的土地向他们“投庄”，又通过敲诈及高利贷迫使少数民族出卖土地、耕牛及其他财产。对少数民族的地主阶级，除了勾结

利用来作“封建买办”外，也进行兼并，最突出的是历代官僚敲诈土目，兼并土地的事实（黔西土目禄氏，被周西成、吴鼎昌搞得家破人亡，成为有名的“禄产事件”）。所以少数民族中的地主阶级必须依附汉族的当权派才能维持其地位。经过了这样长期的经济侵略，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汉族的社会经济是分不开的。他们是同处于一个经济制度下，分居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地位，构成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社会。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贵州少数民族也受到了影响。帝国主义直接的政治侵略还限于初期的教会活动，留在下节讨论。其经济侵略可从两方面来看：1. 扩大市场；2. 掠夺原料。少数民族在长期封建剥削之下，滞留在自给经济阶段。他们的日用品除了盐巴外几乎全赖自给，因为受到高度剥削，生活贫困，购买力极微。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但是少数民族并不因此而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绝缘。他们受到的剥削主要是土产品的掠夺，尤其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较为深重。帝国主义对贵州少数民族的经济侵略是通过官僚资本主义而进行的。贵州土产品，如烤烟、桐油、五倍子、木材是农村的产物，而少数民族在农业人口中占有多数，所以是土产品的主要供给者。贵州土产输出最高时产量总值几达贵州经济产物总值的一半。此外还有大量鸦片及每年 10 万头牛马的外销，这些产品都被官僚资本主义所垄断。垄断的手段一部分是封建性的，比如鸦片，强迫农民种植，作实物地租征收。也有一部分是通过高利贷的方式，借给资本，贱价收货，或是用一般的不等价交换的方式，进行剥削。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一般资本主义剥削不同，因为它是具有封建性的，所以现代工业原料的生产对于少数民族经济并没有发生提高的作用。比如 1940 年到 1948 年烤烟的生产增加到 35 万市担。农产商品化的趋势是很显著的，但是对于农村经济，尤其是少数民族经济，却并没有引起显著的影响，那是因为农民并没有因此

增加购买力，从农产商品化中得到的货币还抵不过在这时期国民党用征兵派款所加予农民，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敲诈勒索。国民党反动统治经济剥削和政治敲诈双管齐下，把农产商品化的经济利益全部掠夺过去。从少数民族本身的生活来看，还是维持着千百年来自给经济，自己消费的大部来源于自己生产的经济，而且由于剥削加重，已由“自给自足”而进入“自给不足”的境地。

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主义采取同化政策来达到扩大市场的目的，在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民族政策的范畴。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并没有太大效果，不但纸面上“一保一校”的计划没有实现，而且剪发改装也只成为另一项敲诈的借口，进一步增加了民族仇恨。

四

帝国主义不但通过反动统治对少数民族进行半殖民地性质的经济侵略，而且在四五十年前就以传教为名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以黔西北为主）。他们以少数民族为其传教的主要对象，前后在少数民族区建立教堂的有天主教（并掌土地权）、内地会、循道会及安息会，其中以内地及循道两会势力最大，曾拥有少数民族教徒万人以上。他们通过开学校、创造苗文、办医院等对于少数民族有实际利益的手段，传布麻痹阶级反抗的教义。痛苦无告的少数民族初次得到文教的帮助及“平等”、“博爱”等口惠，尤其是传教士对他们生活上所表现的体贴，使他们很容易接受宣传，受其麻醉，至今少数民族对教会还是有好感的。但是由于教会并不是真为少数民族服务，不可能满足少数民族政治经济的基本要求，又由于英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势力的削弱，教

会逐渐萎缩，少数民族对宗教信仰亦日渐冷淡。到解放前，教会势力在少数民族区域已经衰落。现在少数民族区的教会已经大体上走上了自治、自传、自养的步骤。

五

从过去的历史看，很清楚地说明了这是一部汉族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剥削和压迫的历史。又因为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用大民族主义来分裂汉族及少数民族的被压迫阶级，在汉族中，通过宣传和教育，培养了歧视少数民族的错误意识。在日常接触中，少数民族备受无理的侮辱，因之少数民族普遍地仇视汉族，认为“石头不可做枕头，汉人不可做朋友”，这样滋生了狭隘民族主义，民族间的隔阂是具有历史性的。

汉族反动统治阶级，从封建帝王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是各民族人民大众的共同敌人，也就是离间我们兄弟民族，使我们互相歧视、分裂的罪人。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不把反动统治阶级摧毁，贵州人民得不到解放，这种恶劣的民族关系也不会改变，少数民族受到的压迫也不会解除。

贵州省的解放是贵州各民族共同的解放，把压迫各民族人民大众的共同敌人打倒了。这样，民族关系才起了基本的变化，由民族侵略压迫变为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平等团结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18年前红军北上抗日经过贵州，已经在少数民族地区执行了这政策，提出了“少数民族要自由要平等”的口号，启发了贵州少数民族的觉悟，获得了他们热烈的拥护。红军虽则离开了这地区，但是红军留下的恩情却一直在少数民族中口口相传，即在反动统治压迫下，群众偷偷去祭奠红军墓和掩护留下的同志们。这段历史为后来解放少数民族地区开

辟了道路。少数民族在盼望红军再来的热情下，保证了解放过程中友爱互助的民族关系。进入贵州的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民族政策，绝对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不借粮，不住少数民族的房屋，帮助劳动，送针线，赠盐巴，处处和兄弟一般。少数民族欢欣鼓舞，爱戴支援我们的军队，其积极及亲切的感情甚至有超过汉族的。

我们人民政府于接管初期对少数民族的旧人员一律留用，此后对少数民族区域征收公粮及禁用银元等均予以适当照顾。少数民族同胞到政府里来的常常受到款待，各种群众集会上少数民族代表上台发言，做主席，挂红条（代表证）。少数民族欢欣鼓舞，“我们从此翻身了”。他们积极支援，带头交粮，对人民政府热诚拥护。一些知识分子也激发了他们的政治要求，积极支持人民政府的工作。但一部分上层分子因受国民党特务的宣传，还抱着观望等待的态度，徘徊歧途，对我们的民族政策不甚了解，对政府也不太信任。

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在撤退前即计划利用民族隔阂，盘踞边区，进行反抗，对少数民族散布谣言，并起用一小撮少数民族败类，提出“苗夷独立共和国”的欺骗口号。我们虽对少数民族的上层及知识分子加以争取，但可能落后了一步，以致在匪风高涨中，苗族少数地主和仲彝两族大部地主及个别知识分子叛变了人民，而且威胁少数民族农民从匪，给贵州清匪斗争中增加了一个民族因素。

匪乱是激烈的阶级斗争，是贵州封建势力反人民的最后武装挣扎。这个斗争卷入了少数民族。贵州这个民族杂居的地区，革命和反革命都不可能分别民族而进行。封建地主阶级较强的少数民族，经过了这次匪乱，基本上把这最顽恶的一层削去了（例如关岭仲族上层知识分子，有的曾坚决叛乱，赫章、威宁的土目亦几乎全部叛变，现在死的死，逃的逃，坐牢的坐牢）。所以少

数民族的社会性质在清匪中亦起了重大的变化，为社会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剿匪中，我们曾争取了一部分非当权派的力量回来，而且，由于仲彝社会本身的宗派斗争，有一部分被当权派压迫的少数土目及地主，在解放前夕就倒向我们，参加了游击及剿匪。对我们始终支持及坚持反匪的却是广大少数民族的农民，尤其是苗族，有许多英雄故事流传着他们可歌可泣的斗争。在剿匪中涌现出许多少数民族的积极分子，提高了阶级觉悟，为后来社会改革开辟了道路。

六

我们的干部在进军大西南之前经过学习，对民族政策是有认识的，为少数民族服务的观点是坚定的，对民族问题是小心翼翼的，因之，在我们入黔之后，民族关系能搞得很好，在民族工作上有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多数干部来自外省从没有接触过少数民族，加上我们对少数民族情况缺乏正确的了解，受过大汉族主义错误的宣传，我们干部中有的存在着好奇的心理。到达贵州遇到各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热情的欢迎，更发生好感，尤其在匪乱中，少数民族多方掩护我们干部，积极协助我们清剿，所以很多人反映：“少数民族比汉族好”，“到少数民族家里就放心”，“少数民族工作容易做”。这种思想情况极有利于我们建立友爱团结的民族关系。但也因之发生忽视民族特点和不注意民族关系的偏向。又因为感情上去接受少数民族，对复杂的民族情况容易忽视作深入的分析。比如仲彝两族因封建势力较强，当匪的多，秩序没有安定时，由于传统宗派斗争，农民有顾虑，部分的同胞对我们不像苗族那样热情，我们干部中有的发生了“这族好，

那族差”的歧视思想，而忽略了基本群众的一致性。

在反封建运动的初期，干部中忽视民族特点，认为少数民族和汉族并无区别的思想是相当普遍的。这是由于解放进军及剿匪工作中民族关系良好，没有发生问题，因而产生的麻痹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时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一般化的作风，由于民族工作经验的不足因而也产生搬用了汉人地区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当我们反封建运动逐渐展开，在清匪、组织农协会、评产量等具体工作上，民族关系复杂的地区，这种作风和工作方法或多或少地引起了民族纠纷。

漠视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及民族隔阂的历史性，当工作深入时是可能引起民族纠纷的。这里可以有两种偏向：一种是低估民族关系，一般化地推动工作；一种是高估民族关系，缩手缩脚，以致事态扩大。在贵州过去一年中曾发生了两个带有民族性的武装冲突事件，可以引为例子：一是兴仁专区安龙县的龙广事件，在清匪中忽视原来存在着汉仲间的仇恨，仲族民兵以清匪为掩护，对汉族农民进行报复，被损害的村寨有 13 个之多。一是毕节专区大定县的方家坪事件，仡佬族受巫师的欺骗，利用群众的政治要求，称帝骗财，政府没有及时开导和制止，以致又被匪特利用，演变成武装暴动。

以贵州过去一年的民族工作来说，由于领导上的小心谨慎，坚决执行缓进和稳步的方针，虽则部分干部思想上尚有上述的偏向，均能及时纠正，进行教育和提高，使民族关系日见团结，民族工作也是日有进步，基本上正确执行了民族政策，获得显著的成绩。

七

贵州民族工作，在过去半年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社会改革的问题。我们到各地去访问，少数民族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目前在少数民族中是否实行社会改革？是否与汉人中的社会改革应有不同？”在全省少数民族座谈会中讨论得最热烈的也是这个问题。

去年9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今后工作任务”中规定：“现在汉人地区实行的减租、退押、反霸等法令，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也就是说，“决定少数民族暂不实行社会改革。”“因为那时少数民族中社会改革的群众条件和干部条件一般尚未成熟，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情况尚十分生疏，本省少数民族繁多的地区当时尚为股匪所盘踞。在那样的情况下，决定暂不实行社会改革，是正确的”。

但是贵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而且在少数民族区域中有大量土地集中在汉人地主手上。因之，“少数民族地区”这个名词所指的内容是不够明确的，实际在杂居区成了“可以减汉族地主的租，而不能减少少数民族地主的租”。所以实际的界限不是地区，而是民族。少数民族可以向汉族地主进行反封建运动，这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所以我们也必须一起发动各民族群众，一起组织农会，一起宣传反封建的意义。结果，政治觉悟提高了的少数民族群众也就不容易接受“不减少少数民族地主的租”的决定了。他们说：“政府为什么照顾少数民族的地主，而不照顾农民呢？”“这不是不平等吗？”干部在思想上也有搞不通的。有些地区坚持了“少数民族暂不进行社会改革”的政策，引起了一部分少数民族的不满；有些地区松了袋口，一般化地搞起反封建运动来了。

事实上，像贵州大部分地区那样民族杂居的情况下，要以民族界限来分别进行和不进行社会改革是有困难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民族区别而一般化地进行相同的社会改革同样是会引起纠纷的。所以问题是在怎样能有区别（不是分别）有联系（不是一般化）的在这种杂居区进行社会改革。

贵州经过了这段经验，已充分体会到“不考虑少数民族的要求是不对的”。同时，由于剿匪的胜利，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汉人地区群众反封建斗争的展开，贵州省在过去四五个月内少数民族情况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考虑进行社会改革的条件业已部分成熟。所以经过了全省少数民族座谈会的讨论，闭会时提出了“关于贵州少数民族社会改革问题的初步意见”，又经贵州省人民政府第八次行政会议通过及西南军政委员会批准，成了决定。这个决定的主要精神就是承认民族区别，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进行部分的社会改革，方法上也不必相同于汉人地区，应当照顾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这是民族工作上的重大进步。

这个决定中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就是把自觉自愿的群众原则具体化了，规定了经过少数民族代表会议举手通过的程序，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少数民族中很可能有少数积极分子用个人的意见作为群众的意见；在语言隔阂之下，我们很难捉摸到真正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觉悟程度。包括各阶层的代表会议可以正确地反映群众意见，也是教育和发动群众的最好机构。

第二，是把干部条件也具体化了，规定了成立区域自治及联合政权的形式。过去我们一提到干部条件，少数民族就觉得我们有意为难的样子。“要有多少干部才算是足够这条件呢？”干部条件事实上是指社会改革的事宜应由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来领导，而不是由汉族干部包办命令。所以基本问题不是在干部的数量，而是在政权的性质。区域自治或联合政权就保证不致发生汉族干部包办命令的事了。

第三，贵州各个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不平衡的：有的区域，像黔东的苗族本族地主比较少，而且本族地主对佃户的剥削也比较轻，地主中也有很多是劳动的，所以对于减本族地主的租子，一般说不像其他地区积极要求。但是在黔西南的仲家区域，尤其是兴仁区，少数民族地主比较多，也比较大，而且很多土地是依靠汉族统治势力霸占来的，对本族佃户剥削也重。这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民不但迫切要求减租而且要求反霸。在这样社会经济不平衡的情况下，要各族一样实行相同的社会改革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之在实行当中应该允许例外。

第四，在少数民族中实行减租，方法上也应该和汉人区不同。少数民族的地主在过去必须依附汉族统治者才能得到权势。现在不但反动统治者已经打倒，汉族里的封建势力也已经削弱，所以少数民族里的地主已经失去了依傍，地位已经动摇。而且少数民族地主在过去也受到民族的压迫，就是汉族地主利用民族区别去兼并少数民族地主的土地，由于在民族关系中的特殊处境，少数民族中的地主阶级也是常带有民族感情的。因之，如果我们对他们能善于进行动员、劝说，动员他们开明和自觉自动地进行减租是有可能的。这个自上而下的方法结合了自下而上的方法可以增加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尤其是在有宗派斗争的民族中，这个方法也比较妥当，可以免去许多纠纷。

从上述各方面来看，贵州省对于少数民族社会改革问题所取的方针，不但符合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而且是切合于具体情况的，因之也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

在这个多民族杂居及不平衡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贵州省各级政府谨慎地执行了中央的民族政策，团结了少数民族和维护了少数民族利益，在过去一年中已有很大的成绩。少数民族同胞的政治觉悟已有显著的提高，他们对人民政府已产生了一种忠诚的拥护和爱戴心理。在民族工作的推动中，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亦

发生了相当的困难，这些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经领导上及时地注意及各级政府的努力，有的已经克服，有的也将要克服，贵州省的民族工作已经推进了一步。

八

我们在分析贵州少数民族社会性质时已经指出，各民族的情况虽则不平衡，但基本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及带有部分前封建的残余。因之，反封建的需要客观上是严重地存在着的。而且少数民族地区封建主义是具有民族形式的，就是主要的阶级矛盾发生在民族之间，大量土地由汉族占有、剥削少数民族的生产关系。因之，少数民族农民一般说容易觉悟，反封建的要求是可能很激烈的。这一事实在过去半年中已经获得证明。已经有了阶级觉悟的少数民族农民，不但要求减租、反霸，而且更普遍地要求土改。我们得到很多地区相同的反映：“租可以不减，地不可不分。”“今年要求减租是怕土改落后。”据说：“兴仁县一个自然村的苗民已经全部搬下山来居住，等着分配土地；威宁有几十年没有下过山的苗民，也到人民政府请求下山分田。”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受到压迫，退入了高山和坏地，尤其苗族是如此。他们怕土改落后了，就会分不到好地，所以基本上，要求土改就是要求下山。我们已听到“不清算历史，少数民族不能真正得到平等”的反映。讨论到土改时，曾有很多少数民族主张必须在较大区域的范围内打乱重分，也就是说，他们不愿再住在山头上，耕种坏地了。少数民族对土地的要求是带有民族翻身的要求，所以绝不当看成是一个普通的问题。

在原则上我们自应依据自觉自愿的群众条件及参加政权的干部条件来决定少数民族的土改问题。同时我们却必须预先看到：

土改的要求很可能比减租的要求更为迫切和普遍。如果在社会改革的条件，特别是成立区域自治或联合政府的条件没有成熟时，在杂居区域内，少数民族很可能会不同意汉人先土改，少数民族后土改的办法，因为事实上很难预先留下土地给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在土改上一旦落后就会分不到好地，那是他们最关心的。因之要防止这种情况只有加速创造条件，就是凡是决定要进行土改的民族杂居区域，先成立区域自治或联合政权，这样我们才不致被动和落在形势发展的后面。

在分配土地时，民族关系必须要事先予以适当的注意。在反封建运动初期，发动农民，组织农协，以及后来的评产量中，都已经发生了若干因为忽视民族关系而引起的纠纷。这段经验教训是应当接受的。因为在分配土地时，纠纷可能更大。如果我们对于现在还存在着的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不从速加以消除，在土改时都可能表现在具体的争执里，甚至引起民族间的纠纷。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主要场合是在各民族都有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以及更具体的在联合政权中。这也说明了，没有民族联合政权，各族不能进行充分协商，在民族杂居区中进行土改是会遇到困难的，而贵州基本上就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地区。所以最好先建立区域自治和联合政权，实行社会改革就能很好地进行土改。

民族工作发展到目前，主要的关键已集中到政权问题，就是成立区域自治或联合政权。因此，我们要“更认真地建立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民族联合形式的人民政府”。这不但是少数民族最普遍和最基本的要求，是我们共同纲领中所明白规定的政策，而且也是今后各项民族工作推进的环节。我们在三次训练班中都讲述民族平等的意义，但是一般的反应是：“毛主席给我们平等是十分感激的，但是这是不是长久的呢？”甚至有人说：“毛主席过去之后，我们还能平等么？”种种都表示他们认为：人民政府是好政府，但还不是自己的政府。我们在炉山凯里区协

助试办区域自治，当我们把这意图宣布后，苗族各阶层是一致欢迎，如说“真的民族平等了，毛主席怎样说就怎样做”。农民反映：“成立苗家政府，自己管自己事，真是苗家翻身了，民族平等了。”“成立区域自治可跟汉人一样减租土改了”。这与过去曾宣传减租条件有关，因之对建立区域自治将来可以一齐土改更鼓励了这一要求。他们认为区域自治政府成立了，“都懂得自己的话，事情好办”。“苗家自己的人懂得自己的事”。

在开始试办区域自治的时候，我们发现干部思想上是有困难的。主要的症结是在把区域自治和杂居区的反封建运动分裂开来看，认为这是民族工作，和当前反封建任务不是一回事。因之，有些觉得任务已经重，还要搞这个，多了一层负担。在民族杂居区，政权工作是社会改革的基础，组织了联合政权或建立了区域自治，对反封建工作是有便利的。两者必须结合起来，如果一旦分开，就会发生互相抵触的感觉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深切感觉到提高民族杂居区干部民族政策的思想是进一步深入开展民族工作的关键。我们得到汉族干部的反映中有：“区域自治不是闹分家么？”“独立思想要不得，会使少数民族跟不上时代”。基本上对少数民族自治的能力有怀疑，这是带着大民族主义的影响的。民族平等是少数民族应有的权利；所以参加政权，自己管理自己，并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权利问题。我们也得到反映，汉族干部对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或联合政权的意见，在原则上承认，但强调干部不够。当然，我们首先承认经受几千年的压迫，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权经验的少数民族同胞，在政治觉悟及文化水平上一般说是比较低落的。如果我们用了汉族干部的标准来衡量少数民族干部，就会觉得不够了，而且可以有很长的时期不会感觉到够的。这种看法本身是不正确的，我们所提出的干部条件并不是说要有和汉族干部一样的干部，而是指能为少数民族办事的人，得到少数民族拥护的人。如果这些

少数民族干部对政策不太了解，或文化程度较低，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而且我们必须相信，他们是有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和提高，也只有负了实际的责任，才能真的培养成有才有德的干部。

关于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贵州省领导上很早就重视了，9月省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即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内已培养了包括各阶层的少数民族干部700余人（指脱离生产的干部而言）。但是由于工作的开展，现有干部在量和质双方都已经感到不够。

培养干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开办训练班和民族学院，一种是在工作岗位上培养，尤其是在农协中提拔有成绩的干部参加政府。按贵州现有的计划，在省级训练的干部每年可以有1000人，暂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并在六个少数民族较多的专区训练干部，每年可有3000人。所以在1951年度可以增加少数民族干部十倍左右，农民积极分子的培养，由各地农会计划进行，充实各地基层干部。

在贵州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条件是不坏的。首先是贵州少数民族中通汉文上过小学及小学以上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较多，黄平一县据我们调查，这类知识分子就超过2000人。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说是较汉人差，但是个别的来比较却并不都比汉人差。贵州少数民族和汉人接触久，所以懂汉语汉文比较普遍，这使我们进行训练干部时比较方便。在我们所办三期训练班中，由于语文发生的阻碍不大。

但是这些过去受过较长学校教育的知识分子却大多是中农以上出身的。由于过去歧视少数民族，所以学校里出来之后常常不易得到就业机会，回乡经营农业。在重视劳动的苗族里，有很多知识分子现在还在种田，但也有的人在国民党时代当了反动统治者的爪牙，土匪扰乱时参加了反叛。这些知识分子或因阶级关系，或因当匪自新的关系，不能加入农协，心里很惶恐，情绪很不安

定。如果我们要从知识分子中去培养干部，还得注意做好工作。

农民干部的提拔在贵州比较方便，因为群众大部分已经发动，而且组织了起来。少数民族很多已当了农协主席和委员，表现极好，这是今后少数民族干部主要培养的来源。

培养干部的主要工作，我们想，是在工作岗位上进行教育。所以培养干部也应当包括使用和提高干部思想能力的问题，也就是汉族干部怎样帮助少数民族干部的问题。在联合政权中，各民族干部要日常相处，共同处理具体事务，而生活习惯不相同，革命经验又不相等，因之要能互相尊重，团结友爱地互求进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还必须要有耐心，能体会民族感情，不能有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这并不是简单的事，从现有的实际情况看来，我们这方面还得好好努一把力，我们的干部还需要有系统地进行民族政策的学习，这也是今后民族工作的关键之一。

最后我必须声明，以上所讲的只是根据我们三分团同志共同搜集的材料，各方面都是不够的，不但是局部的，而且有不正确的地方。所提出的问题，还没有经过本团充分研究，有错误的地方，当由我个人负责，请诸位同志多多指正。

1951年4月

兄弟民族在贵州

一、千山万水访兄弟

毛泽东的旗帜插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欢跃，就是幸福，就是光明。我们真是荣幸，有机会在这面旗帜的光辉下，爬过了山，涉过了水，握住了我们民族大家庭里千万个兄弟姊妹的手。从他们兴奋鼓舞的脸，感激动人的泪，欢欣忘情的跳跃，日以继夜的歌唱里，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尽管语言不同，服装有别，尽管相隔着千山万水，尽管几千年来受尽了敌人的挑拨离间，甚至曾经流血残杀，但是只要把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明白交代清楚，千万群众只有一个呼声：“毛主席万岁！”我们在响彻山谷、震荡回复的欢呼中，也总是好像听见了在天安门前毛主席的声音：“同志们万岁！”声声相应，心心相印，脉脉相通。那一种伟大的场合，消融了累积凝固已久的民族隔阂和仇恨，扭转了历史，展开了民族友爱合作的新的一页。

我们的祖国真是伟大，真是一个大家庭。虽则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一共有多少民族，总数可能在 100 以上，汉族之外各民族的人口可能要占总数的 1/10，所分布地域也可能到全国 2/3。这绝不是偶然的：我们是拥有最悠久历史的国家。东亚大陆上无数具有自己发展历史的民族，经过几千年来分合交流，汇成今天这一个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历史稀有的伟业！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个民族大家庭中却没

有过一天和睦的日子。现在拥有 9/10 人口的汉族很早就发展了封建主义。封建统治者不但对本族农民进行剥削和压迫，对于兄弟民族更是残暴：屠杀和奴役，写满全部历史。并且为了便于对兄弟民族的剥削和劫掠，他们更制造出各种光怪离奇的传说，把已经被迫退入边区山地的兄弟民族同胞们描写成低能和野蛮，非但宣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且用了各式各样带有侮辱性的称号，加上犬旁，在汉族的群众中培养歧视兄弟民族的感情，使汉族的群众不关心兄弟民族被压迫的痛苦。这个反动统治借此可以更肆无忌惮地对兄弟民族进行野蛮的、非人道的掠夺。

汉族的封建统治者对兄弟民族的压迫是利用了民族的名义来进行的，因之，被压迫的兄弟民族也常常受其愚弄，认为所有汉族都不是好人。“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这句话很普遍流行在云贵两省的兄弟民族中。“毛主席是苗家，红军是红苗。”我们初听到这种说法时，还不很明白他们的意思，经过说明，他们接下去是半信半疑的惊叹：“汉人中也会有爱护我们苗家的么？”这时我们才明白了过去这段历史所造下的民族隔阂实在是不小。

中国人民的解放在民族关系上起了根本的变化。汉族中的反动统治阶级被打倒了，这也就是说压在兄弟民族身上的石头被搬下来了。靠劳动生产来丰富自己生活的人民大众是不必也不会去剥削别人，因而也不会容许政治上对其他民族的劳动人民加以压迫的。民族间的友爱合作在社会本质上起了变化之后才有可能。中国人民的解放使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从此可以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了。

汉族反动统治者的被打倒主要是出于汉族人民的力量。虽则在革命事业中有着很多兄弟民族同胞的参加，但是广大的兄弟民族群众，由于长期地被压迫和处于偏僻的地区，并不能构成解放运动中的主力，革命的经验较少；而且又因为历史性民族隔阂的

存在，在短时期内不容易很快地认识到民族关系上已经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但是如果兄弟民族同胞在感情上不能深刻地反映出这个变化，如果民族隔阂依然存在，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民族工作在推行时也必然会碰到阻碍。因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急迫需要把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深入地宣传到兄弟民族的人民大众中去。中央访问团出发到各兄弟民族区域进行访问的基本任务就是这个。

去年7月我参加了中央访问团第三分团，派到贵州去进行工作，在贵州一共工作了六个半月。这六个半月在我个人来说实在是上了一堂内容十分丰富的民族课。我深切体会到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只是这一点也已经足够说“不虚此行”了。但是民族情况的复杂，加上了时间的短促，这次工作只能说是学习的开端，所得到的了解不但很浅，而且也必然是片面的。很多朋友要我写一些介绍贵州兄弟民族的情况，我一方面承认这是我的责任，我应当把我们已经知道的关于贵州兄弟民族的情况告诉许多没有机会直接去访问的朋友们，但另一方面我却很踌躇，生怕我认识不够，甚至有错误。最后我虽则勉强答应了，但是必须先声明这只是抛砖引玉的用意。

我们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由于民族隔阂所引起的民族隔膜。我自己对于贵州民族情况，在访问之前可说是一无所知。我在行前曾向到过贵州的朋友们请教过。有一位朋友听我要去贵州访问苗族同胞，很关心地叮嘱我：“千万不要吃苗家的东西，更要提防她们碰你的身体。”他说，“因为苗家是会放蛊的，受了毒就回不来。”这种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说会使我这位朋友这样认真地叮嘱我，只说明了一件事实：就是过去反动统治者生怕兄弟民族接近了，团结起来反抗他，不惜千方百计造出种种谣言来离间阻挠。也正因为受到了这类阻挠，以致过去我们对于兄弟民族

的情况实在太不了解了。

譬如说：“贵州有哪些民族”这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罢。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不能正确地答复。在访问前，我只知道贵州有苗族，后来才知道贵州苗族只占兄弟民族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我们到了贵阳和许多朋友谈话，普通总是说：贵州兄弟民族有苗、彝、回三种，后来才知道包括在“彝族”中的就有许多自认为自成民族的单位。到现在我们可以列举的民族名称已经在 30 个以上。当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个问题也更为复杂：自认是一个民族的人，在不同的地区可以有不同的名称，甲地通用的名称在乙地却可以认为是带有侮辱性的。这种现象必须从历史的背景去了解，而历史材料却又常常是很难得到的。

再以最基本的人口数量问题来说：我们最初去查伪内政部的统计，贵州兄弟民族仅 120 万人，占全人口的 11% 强。后来和若干兄弟民族的同胞讨论这问题，他们给我们的估计是占全省人口的 60% ~ 70%，在 600 万人以上。各族人数估计差额最大的相差有十倍。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对于各兄弟民族实际情况知道得太少，甚至可以说太不了解了。因之，我们还得“从头学起”。直接访问是“从头学起”最好的方法。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是打破民族隔阂的必要前提。这六个半月的访问工作只做到了“知所不知”，时间太短了是我们访问团同志们共同的感觉。所以这只能算是学习的开始。

基本上，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杂居地区。依我们的估计，汉族占多数，约占 60% ~ 70%。兄弟民族是少数，总数在 400 万人左右。民族种类还没有正确数目，据已经知道的名称在 30 种以上。其中以苗、仲（有的地区称土家、水户等，本族语称“布依”）、侗、水、彝和回人数较多。这许多民族基本上是杂居

的。他们共同居住在一个地区之内。以县单位来说，现在已经没有单一兄弟民族聚居的区域。聚居程度最高的县区，如台江、雷山，仍有5%左右的汉族居住在内。纯粹由单一兄弟民族聚居的情况要到乡村级区域里才能看到。这种情况和西南靠边疆的区域不同，那是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贵州是兄弟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接触的边缘地带。汉族在历史上从中原向边区扩张，兄弟民族逐步向边区移动，依靠贵州这多山的自然条件，才部分地站住了脚，保存到今天。但是汉族的势力不断伸张，深入内地，占领了点线，在这区域的政治及经济上握有统治的权力。这样，形成了贵州多民族杂居、汉族统治的基本情况。

贵州各民族虽则基本上是杂居的，但是那几个主要的民族在分布上还是各有其中心的地区。以全省范围来说：黔北，乌江以北已很少兄弟民族。黔东，清水江流域及苗岭山脉是以苗族为主，中心地区在台江、雷山一带，在这个中心地区，苗族人口现在还占80%左右。黔南，东部是侗家（以黎平为中心）、水家（以荔波为中心）的分布地区，靠近广西的地带还有僮（壮）家（中心在广西）；西部盘江流域主要是仲家的分布区，以册亨、望谟为中心。黔西，从毕节向西，原是彝族的地区，人口并不占多数，但是在过去是居统治地位的。贵州的回族大多是清末从云南因杜文秀起义失败后移入的，分散在黔西南主要交通线的城镇及其附近。

由于贵州是兄弟民族和汉族接触的内缘，所以在历史上民族战争特别频繁，其中尤其是苗族首当其冲。在战争中，队伍的流动和人口的流徙，使各民族在大部分地区相互混杂，甚至一村一寨之中可以有好几个民族。分散最广的是苗族，除了上述中心区外，不但零星地分散在贵州各地，而且深入云南和缅甸。

此外还有许多人口比较少的小民族。这些小民族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比上述各兄弟民族更早在贵州居住的民族，也可能

是西南的土著民族，如革佬^①、土佬、木佬等。他们经长期和多重的民族压迫，现在所存已经很少了，但分布地区却很广，也很零星。一类是早年入侵的汉族军队，很多就驻扎在各军事据点，称作军屯；他们回不了家乡，有许多娶了兄弟民族的妇女，就在这山国里成家立业，经长期同化，后来移入的汉族就不认他们作汉族了。因之，现在一般把他们列入了“少数民族”中。这些“民族”各地有不同的名称，如堡子、南京人、穿青、里民子等等。

贵州的兄弟民族既是这样多，分布又这样广，我们在六个半月的时间中，并不能遍访各地各族；只能有重点地进行工作，黔东一路以镇远为止，黔南一路以贞丰为止，黔西一路以威宁为止。每路都挑了一县由一部分同志作比较深入的访问，对苗、仲、彝三个主要兄弟民族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其他如侗家、水家、僮家等民族都没有机会去访问。因之，我们对于贵州兄弟民族的情况的了解是不够全面的。在以下几篇介绍贵州兄弟民族情况的短文中，只希望能引起读者们对于民族问题的关切和对民族工作的重视罢了。

二、血泪话当初

山愈上愈陡，路愈走愈滑，我下了马加入了步行的队伍。香炉山下，破庙栏边，喘着气，坐了下来。一位小同志却愈走愈有劲。看见我这情景，笑着说：

“我有了个体会了。”

“什么体会？”

^① 革佬系仡佬——编者

“兄弟民族就在爬山竞赛中获得生存的。汉族的反动统治就像你一样，爬到这里，气喘了，不再过去了。山里边也就成了兄弟民族的生存空间。你不相信，再往里爬，准是我们兄弟民族住的地方。”

“还有体会没有了？”

“有”小同志高兴地继续说：“我早发现了个规律：老是坐汽车，就不会停在兄弟民族的村寨里。向山里走，走到脚上起了泡，包你住到他们家里。”

“你喜欢爬山么？”

“爬爬也有趣，但是我愈走愈想起家乡，回去走在平原上一定会更觉得舒服。山，看看是美的，不平凡；整天要上上下下才不是好玩哩。”小同志在我旁边坐了下来，摸摸下面的石头，体会又来了：“你看，这里全是些石块块，包谷（玉蜀黍）长得这样瘦，真是亏他们的，石缝里还要下种。哪里能和我们家乡比。”

等了一忽，他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团长，他们说他们的祖先就住在我们家乡，我们还是他们的老乡哩。你说这是真的么？”

说来也真是惭愧，像我这样在大学里教书的人，对于刚才那位小同志所提出的问题，实在答不上来。我从小学到大学上过不少历史课，除了隐约还记得“三苗”、“三危”这几个字之外，关于西南许多兄弟民族的历史简直什么也说不出来。好像自从上古以后，这些民族就在“历史”上被取消了。谁还想得到在这“历史”之外，几千年来在这广阔地区上，几百几千万人，在用血和泪写下了一部那位小同志所说的“爬山竞赛”的惨痛历史呢？

快过年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在毕节工作，有位同志在书店里

买到了《学习》3卷1期。大家抢着要看范文澜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发展》。那位小同志也特别高兴，这里有着他的答案：“东夷族最先开发了沿海地区，苗族、瑶族最先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区。”“苗族曾在湖北、湖南、江西地区建立一个大国。彝族中哀牢族曾在云南建立南诏国。”

从现在贵州兄弟民族分布的情形看还可以见到一些符合这历史过程的线索来。苗族的中心区在清水江流域，但是在东北的松桃一带还有苗族区，而且和湘西的苗族区相连，过去很可能是和清水江流域连成一块，早年从湖南来的。贵州苗族区中心可能就在乌江流域。后来汉族的势力从四川南下，又从湖南西进，把他们冲成两段。乌江以北现在已很少兄弟民族，只在遵义山里还有苗族几千人。

贵州的苗族分布最广，黔东、黔西和黔南都可以见到他们。但是除黔东的苗族中心区，和在西南兴仁区一部分外，他们凡是和其他兄弟民族杂居的地方大多是住在“高坡”上，就是在很高的山上。俗话说：“苗家住山头，仲家住水头，客家（汉人）住街头”就是指这个情况。苗族零零星星的，几家，几十家，就这样散居在中心区以外各地，一直到云南和缅甸。这些大都是从原来的中心区流亡出来的。在解放前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下，为了逃避拉兵，这种向高山上的迁移运动，一直没有断过。苗族从中原到西南从平地到高山移动的历史趋向是比较清楚的。

有问题的是现在一般俗称“夷族”的仲家、水家、侗家、僳家。它们和历史记载上的“东夷族”有什么关系却不易肯定。名称上的相同并不是有力的证据。但是从他们语言系统上说，和苗族是不同的。苗族所说的话和瑶族相通，同属苗瑶语系；而“夷族”所说的，不论仲、水、侗、僳，均属侗台语系，也就是普通所谓“泰语系”。说泰语系话的，除了贵州的“夷族”外，

还有许多民族：广西的僮族，云南的泰族傣族（俗称摆夷）等，以及东南亚的泰族。从整个分布情况来看他们是亚洲东南沿海区的民族。因之使我们有这样一种猜测：这些民族有可能是从东亚大陆沿海受了汉族的压力而向南搬来的。如果我们进一步从他们风俗习惯及传说中去研究，还可能得到更多的启发。

彝族的历史比较“苗”、“夷”的传说更可靠些，因为彝族在过去有较完整的政治组织，有上层的统治人物，有些还有家谱。他们是开发西南的老民族。彝族现在的中心是在川、康、滇、黔接界处的大小凉山。贵州的西部（乌江上游的鸭池河以西毕节专区一带）只是彝族的边区。在元明时代，这地区的彝族被封建帝王并入了他的统治范围，当地的统治阶级被封为土司。汉族的封建势力逐步侵入，到了清朝中叶，改土归流。民国的军阀时代又进行兼并，国民党继承大汉族主义，再加压迫。以贵州来说，到现在只在赫章、威宁那个在地图上凸出的角上还有10万左右的彝人。

这样说来，贵州现在人数较多的“苗”和“夷”两个兄弟民族都是从外面迁移来的。汉族的入黔还在他们之后。在他们之前，这个地区除了西部的彝族可能是土著之外，是哪种人居住的呢？愈往远推，我们的知识也愈少。我们在贵州所接触到的民族中，有一些小民族，零星地散居在各地，有若干现象暗示他们可能是原来的西南土著民族。比如革（原用仡）佬就是一例。现在贵州大学所在地的“花溪”，在抗战前还称作“花革佬”，但是现在这地方一个革佬族的同胞都没有了，除了汉人外，只有仲家和苗家，原有的地名却还纪念着本地原有的居民。又如仲家聚居的扁担山（在镇宁、郎岱、关岭接界处）附近还有一个革佬的寨子。他们有一种称“吃新”的风俗，就是新谷成熟后，他们有权利可以在仲家所种的田里，沿田岸采谷一筐回家祭祖。这也可能是表示他们的祖先原是这地方主人的意思。革佬族散布很

广，在湖南和云南都有他们的人，但是很零星，已经濒于灭亡了。有人认为“佬”族就是古书上所记载西南民族的“僚族”。在贵州除了革佬外，还有土佬、木佬，但是他们是否和革佬相通，我们不敢肯定。

贵州是个多山地区，多山的自然条件使弱小民族得以保存。像水浪一样，一次又一次从多方面来的移民，积聚在这交通不便的山旮旯里。年代久了，同一民族的人，各自发展他们的方言、服装和风俗习惯，又形成各个分族，好像苗族中有青苗、红苗、白苗等等。泰语系的民族已经分化到各自成“家”，不再认为同族了。

我们说“苗”、“夷”都是外边来的，都是从肥沃的平原迁移到这山国里来的，而且有许多又从小盆地迁到了山顶上，统而言之是从好地方搬到坏地方的。如果不是出于不得已，他们怎会走上这条路？谈起这当初的事，兄弟民族的伤心话是说不完的。

在黄平县城附近有一个古迹，名称就叫“杀人洞”。这里有个传说：在咸丰年间，清王朝的皇帝派了兵到黄平，召集苗人来听圣旨。各处来的苗人都要上这一个山坡。清兵就埋伏在坡后，来一个杀一个。杀了就把尸首丢在一个山窝里。这个山窝底下有一个洞，流出一股水。人的血染红了这股水，慢慢地流到山坡外。后来的苗人看见了水里淌着血，知道不妙，回身就走，把村寨里留下的妇女孩子都集合了，逃到十几里之外一个绝壁上的山洞里，上下都得用绳子吊，这样才逃出虎口。后来的苗家都是这洞里的妇女传下来的——我们去看这个杀人洞。这个传说虽则不一定完全是事实，但是咸丰年间，清朝的封建帝王屠杀兄弟民族却是有记载的历史。

《贵州通志》上的记载摘要如下：咸丰四年（1854）官府勒

缴金银、粮米。苗族张秀眉等起义于清江、台拱（即现在的台江）、丹江、八寨（即现在的丹寨）等处，与太平军取得联系，石达开组织苗汉联军，统一指挥，兵力直达黔东、黔南。清廷利用田兴恕以苗制苗。同治时，苗族领袖严大五、巴大肚进兵各地，虽获局部胜利，但由于川楚清兵纷纷涌入，清兵大量诱降和收买苗族上层，同治十一年（1872）斗争失败，余众退入雷公山。咸丰战役中苗族死亡的数目没有估计。但是其他几次战役却还可以找到一些数字。雍正四年（1726）牛皮大箐（即雷公山）之役，被张广酒所屠杀的苗族：“斩首万余级，苗人饿死四十余万”。据《圣武记》此役“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两万五千有奇，获铳炮四万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弓弩标甲十四万八千有奇，宥其半俘，收其叛产，设九卫，屯田养兵戍之。”

其他兄弟民族的遭遇也是类似的。嘉庆二年（1797）的盘江暴动是当时被称为“濮民”主动（可能就是现在的仲家），志书载：“大军攻阿倭贼，千余匿八角洞，火熟之，悉毙。”“俘馘以万计。”“党洞西当文两贼巢，斩级千，俘两千六百，烧毙万余。”

对兄弟民族的屠杀是历代帝王一贯的压迫手段，在史书上记下来的只是其中比较规模大的战役，而且也是很简略的。兄弟民族自己却是铭心刻骨地记着这些仇恨。在炉山凯里的一个晚上，我们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会快结束时有一位 60 多岁的苗家老人站起来唱了一支歌。他的音调深沉激动，愈唱情绪也愈高，全场肃静，很多在座的苗家老人，跟着流眼泪。我座旁的苗胞告诉我：这是《反歌》。《反歌》的内容是叙述苗族领袖怎样起义，怎样鼓励群众，怎样进军，后来怎样失败。最后是他们的领袖被汉官捉住了，逼他投降，把他的头颅打开，灌了油，烧，问他苗族今后反不反了。他说：“汉人欺侮我们一天，我们就反一

天”——这《反歌》从来不唱给汉人听的，只是老年人在一定场合下用来教育青年的。这晚上，这位老者破了例，因为他说：从此苗汉是一家人了，汉人不会再欺侮苗家，苗家也不会再造反了。所以他可以把这《反歌》唱给毛主席派来的人听了。他最后还唱了一段歌颂毛主席的歌，可惜我不懂苗话，没法记下来。

这段血泪斑斑的历史，究竟谁应当负责呢？也就是说：谁压迫了兄弟民族？谁是兄弟民族的敌人？在座谈会上经过了大家的诉苦，这个问题总是要提出来的。很普遍的答复是汉族压迫了兄弟民族。但是有人就怀疑了：“毛主席也是汉人怎么不压迫我们，还要帮助我们呢？”这样，这问题就谈开了。于是有人往下想了：“为什么汉人要压迫我们少数民族呢？压迫了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有，把我们的田占了，牛也抢了，要我们的钱”——“谁占了我们的田？谁在享福？客家（汉人）的乾人（穷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得到好处的还不是那些做官的和那些地主”——“那些做官的和那些地主没有兵就霸占不了我们的田，他们养了兵来镇我们，杀我们，把我们赶走了，土地变成他们的了”——“是呀！我们开荒，开熟了，这些家伙又来了，说地是他们的，不上租就不许种，派了枪兵来吓我们”——“国民党就是这些做官的和这些地主们的，拉我们兵，派我们款。客家的乾人还不是和我们苗家一样苦”——敌友就这样逐步分出来了。

压迫和屠杀兄弟民族并不是为了他们语言说得不同，或是服装不同，而是为了封建帝王所代表的地主阶级要扩大他们的剥削对象，用武力去劫夺兄弟民族的土地，强迫他们劳动。屠杀压迫是为了具体的经济利益。汉族的农民在压迫和屠杀兄弟民族这一件事中是得不到利益的，不但没有利益而且还受到损害。封建帝王和地主阶级自己并没有上战线去和“蛮夷”拼命。上战线去

拼命的还是汉族的农民，拿钱出来养这些兵的又是汉族的农民。这些士兵，在这气候不同、疾病蔓延的“蛮荒”地区进军，死亡是很容易的。战争完了，兄弟民族被屠杀了，汉族出征的农民也死的死，伤的伤了，没有死伤的长期被派驻在堡屯（军事据点）上，有很多就同化在兄弟民族中，有很多就成了我在前面所提到的被各民族所遗弃的人物。农民还是农民。但是那些做官的却立了“功”，赏了土地，成了地主，剥削了兄弟民族的农民，拿出一部分去报酬代表他们利益的帝王。这些才是兄弟民族的敌人，也就是要向这血泪斑斑的历史负责的冤头债主。

汉族的人民在这里完全没有责任么？那也不然。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在过去不但不同情兄弟民族的灾难，不坚决反对自己的反动统治者去进行那种野蛮的行动，甚至还歧视兄弟民族，开口“苗子”，闭口“猺罗”地侮辱他们。这些都是因为阶级觉悟不够，受了反动统治的麻醉和欺骗的结果。我们要明白，“广大的中国疆域，”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的，“不是哪一个民族所能独立开发出来的，她是许多已经消失了的和现时正在发展的各民族合力开发，经数千年的艰苦斗争，才逐步建立起这个伟大的中国来。”“中华各族的劳动者既然是中国的创造者，中国当然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当然是中国历史真正的主人翁。”过去大汉族主义把共同创造祖国的兄弟民族排斥在同胞之外，加以歧视和侮辱，是完全错误的。凡是犯这个错误的就也应当负责的。

现在造成这部血泪斑斑的历史的主犯已经打倒，因而国内的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民族间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转变成了平等互助的关系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开始的新的民族史已经在我们眼前展开，幸福和光明已代替了过去的灾难和黑暗。让我们为它变得更美满而努力罢。

三、劳动的苗家

苗岭山脉的北面，流着一条清水江，是沅江的上游。清水江从它的水色得的名：碧绿的一股水，蜿蜒曲折，奔流在万山丛中。从黄平的重安江和麻江的下司场往西，都可以通航浅底尖头的小驳船。从这里离开公路进去，就可到苗族聚居的区域。贵州第一个成立自治区的凯里就在这清水江畔。在地图上，把炉山、台江、雷山、丹寨四个县城作为四点，用铅笔画成一个四方形，这个四方形就是贵州苗族的中心区，里面的山地大部住着苗家，虽则商业中心的市镇上，照例是住着汉人。从全区人口数量上说，苗族要占 80% 左右。在这中心区四周是苗、汉及其他民族的杂居区，所占百分比不等。此外零星的苗家寨子或少数居民，分散在其他民族的聚居区内，范围很广，不限于贵州。贵州苗族总人口在 200 万左右，在数量及历史上看，苗族是西南的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

我们在苗区访问了 40 天，从龙里起到镇远止，其中又在黄平和炉山离开公路线，深入苗族聚居的湾水、谷陇、凯里等地区。一路上看到：凡是山坳里，山水能灌溉得到的地方，一层层地筑着梯田；山坡上凡是土比较厚的地方，一片片种着包谷。山地有高低，山坡有阴阳，作物成熟得有迟早。我们经过时稻田有一部分已经收割，一部分正在收割，还有一部分没有熟。正在收割的田里，就可以看到成群的苗家男女忙着工作。苗家的男子，和汉人在表面上已不容易分辨，但是妇女在服装上却还充分保持她们的民族形式：头上扎着帕子，两袖和衣襟上绣着花边的上衣，下面是百裥长裙，赤着脚。从头帕到长裙都是深紫色——这是被称为“长裙黑苗”的装束。

这里必须插一段说明：贵州苗族内部又有很多名称，主要分：黑、白、红、青、花五种。这些名称是根据他们妇女服色来区别的。黑苗穿的是一种深紫色的衣服，远望去是黑黝黝的，所以称黑苗。他们分布在黔东一带。白苗妇女的裙子上有一圈是白色的，分布在黔中。红苗在黔东北松桃一带，我们没有去。青苗穿青布衣裙，在贵阳附近。花苗的男女都披着绣着花纹的衣肩，在黔西的赫章、威宁一带。各种苗中还有分别：比如凯里附近的舟溪也是黑苗，但穿短裙，裙子刚过膝，下腿另有绑腿，称作“短裙”。在龙里一带还有些苗家妇女背上挂着贝壳作装饰，称作“海贝巴苗”；有些头上梳个髻子，称作“纠纠苗”。此外又有以他们住处称呼的，如“高坡苗”。像这类名称很多，这是山岭阻隔，经济分割，互不往来，各地方的苗家住久了，发展了各自的特点，在风俗习惯和方言上有了若干区别。但是所有的区别并没有掩盖他们基本上共同的民族特点。

一般地说，苗家妇女的服装还很少受汉族的影响，我们只在贵阳和镇远遇到过穿汉装的苗家妇女。苗家妇女服装上最明显的特点是穿裙子，而汉人却穿裤子。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在场坝上（市集上）常常发生“挑裙子”的侮辱行为。杨森在贵州当政时又推行剪发改装的同化政策。派了兵在街上守着，看见苗家妇女就强迫把她们头发剪短，把裙子剪破，还要敲一笔“改装费”。这样把苗家妇女吓得不敢上街。妇女怕改装，男子怕拉兵。那一段黑暗时期，街上很少看到苗家，城乡就这样被隔离了。

苗家妇女对她们的服装特别宝贵，因为这是她们从小一针一线长期劳动的结果。普通都是自己种了棉花，纺了纱，织了布，染了色，绣了花，费了多少年的精力才完成的（不出棉花的地方就种麻。一丝丝地抽成线，织成麻布）——劳动的苗家妇女很少是穿不上衣服的，普通都有一套绣了花的衣服。她们从七八

岁起就学会绣花了。我们常看见这些女娃娃靠在母亲脚边，坐在矮凳上一针针地绣着花纹。她们“反面绣花正面看”，既不打样，又不画线，任手绣去，整齐美丽，真使我们不容易相信是“儿童手工”。她们这样努力，几年后有了漂亮的衣裙，就可以穿了自己的“作品”在“马郎坡”上和青年男子唱歌谈情。手工巧，花样新，是得到情人夸奖的主题。每逢节日有群众集会时，盛装起来，排着队“公开展览”她们的艺术品。哪一个村子里出了个手工巧的姑娘，名声远播，一村都觉得光荣。别村的青年男子慕名的都要来马郎坡上结识这“绣花英雄”，她们可以从此挑选她们最合意的郎君。

苗家妇女这样重视她们的服装，而蒋介石杨森这些反动魔王却偏偏不准各民族保存她们自己的风俗习惯，这是她们最痛恨的。我们宣传了“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而且根据共同纲领说明了保持或改革风俗习惯是各民族的自由后，苗家妇女特别高兴，纷纷向我们控诉杨森逼她们剪发改装的压迫。我们把丝线送给她们时说：“你们绣花绣得好，我们特地从北京带了丝线来送给你们，望你们绣出更美的花来。”她们感激得两手颤动地说：“毛主席真体贴我们，毛主席想得真周到。”我在施秉和贞丰时，曾到各村子里挨户访问，临走时把针线拿出来塞在苗家妇女的手里。她们总是急急忙忙到房里去，找出块花袖子或是花条条，一定要我带回去给毛主席，说：“毛主席喜欢我们的绣花。”在群众大会上，这类的礼物收到得真不少。有一次在凯里欢乐会上，苗家妇女围着我们女同志们的手风琴唱歌，唱得高兴，就把花条条结在女同志们身上，个个都挂满了一身。这是妇女们最亲密的礼物，往常是只送给情人的。

一到苗族区，最深的印象就是劳动。我常和同志们说：要学习劳动观点的，最好到这里来上一课。苗家妇女不但从劳动里自

己解决穿的问题，更提高到了艺术的水平，而且也参加耕种，和男子们一起，从劳动里来解决吃的问题。在苗族中，很少找得到吃闲饭的人，就是孩子也往往参加劳动。我有一天在施秉桥头散步，就遇着好几个还不满 10 岁的男孩子，各自挑着一挑柴，从山上下来，好正经，活像个成年人。我挡住了他们，说笑一会儿，自己试一试这挑柴，分量真是不轻。在凯里，也遇着过一个孩子背了一袋米上山，我们有一位同志向他说：“我来替你背吧！”上了山，拍拍肩头，呼了一口气，“看不出这孩子能背这样重”——他们从小就在锻炼。只要看他们的一双脚，在乱石山路上，在冰雪里，大踏步地前进，普通连草鞋都不穿。

苗家男女普遍的劳动，就是有土地的，甚至有多余土地出租的，也不脱离劳动，因之，除了个别的地主外，至多是半地主式富农。比如黄平的谷陇区 4100 户，占人口 95% 的苗族，没有地主，仅有半地主式富农 10 户和富农 50 户，中农占大多数并占土地的大部分。又如该县黄飘乡蒙加寨，中贫农占全部土地的 2/3。苗族农民大多数是自耕农兼少量土地租入者，所租入的土地大多属汉人地主。

苗族内部的租佃关系和汉苗之间的租佃关系在剥削程度上也有区别。苗族内部平常都是活租制，只有很少是定租制，一般没有押金。租额一般是平分，极少数有在分租前抽 10% 上粮。除了帮地主少量的无偿劳动外，并没有其他残酷的超经济剥削。因为普遍劳动，有土地的人，不出租自己也可以耕种，所以常有因照顾无地亲友而出租土地的情况。黄平县东坡乡吴姓地主，13 个佃户中就有 6 个是亲戚。

苗族内部地主阶级不多，是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怎样形成的呢？在这里我们得重复提一提他们的历史了。苗族所处的地位正在和汉族接触的边缘。历代封建帝王向西南少数民族侵略的根据地是四川和湖南，而苗族正首当其冲。封建帝王的侵略目的

是夺取土地，所谓开疆辟土。对于比较远的区域还可以羁縻一下，“以夷制夷”地间接加以统治，满足于“岁岁来朝，年年进贡”。但是对于靠近其中心区域的地带却不然，最彻底的是把少数民族杀完、赶完，占领其已经开辟了的土地，租给本族的农民，进行剥削。如果劳动力不够，就要利用少数民族农民的劳动力，并在政治上加以直接统治。苗族过去几千年碰着的就是这两种手段。他们在平原地区遭屠杀“征剿”，退入了贵州的山地。但是汉族封建势力还是跟着进来，占领军事根据地的堡和屯，更依着经济力的伸张，控制了点和线。凡是军事势力所达得到的地方，派了汉官，占有了原来是苗族开垦出来的土地，又把土地出租给苗族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租额高至四六分以上（地主得六，但户得四九又有送礼、送新及极苛刻的无偿劳动）。苗家男女不甘受这样剥削的就逃到山上去开垦。山地开熟了，汉族地主又出来硬说这山是他的，非认租不成。他们有势力，汉官就是这批人，一不对劲就捉进衙门里去，死了也没有人敢说话。于是不得不“投庄认主”。

汉族地主倚仗势力霸占田地，靠剥削过日子，不劳动，生活也必然逐渐腐化。而苗家农民克勤克俭，虽则在重重剥削和压迫之下，部分的还能劳动发家。日子久了，苗家的经济力逐渐上升。腐化了的汉族地主把土地卖给了上升的苗家，苗家势力也一步步下了山。在苗族聚居的边缘地区就可以看得出这现象来：黄平的东坡乡苗家现在已占有全乡土地的63%，清朝雍正年间，这里的土地全为汉族统治者所有。在《黄平州志》上记载着雍正五年“乱苗平”的结果：“苗田之上者，尽属军屯；余之田皆山头地角，水易温而旱易干。”该乡十里桥的老虎坳寨周围1000多挑田在20年前还是上下井湾汉人周家所有，现在除了20多挑外，全属苗家的了。据我们调查，该乡汉人地主在过去几十年中保有土地不出卖的只有黄姓一家。汉人地主的衰落和苗家农民的

上升是很显然的趋势。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劳动者上升，不劳动者没落。

但是民族压迫阻碍了这趋势的发展。当苗家农民经济势力上升到一定程度，有力量来反抗当地汉族封建势力的压迫时，提出了政治要求，也就发生了武装起义。当地的封建势力就用“平苗乱”的口实动用官兵来“征剿”。经过一度战争后，苗族又被屠杀，土地又被霸占。这样构成了苗族经济在封建中国历史上不断遭受破坏以至恢复成长的循环过程。贵州流行着一句话：“苗族三十年一次小反，六十年一次大反。”这周期性的民族战争是有其经济基础的。

苗家的生产工具和汉族并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在利用畜力这一点还超过当地汉族农民。普通的农家都养牛，而且有养好几头的。他们重视畜力的经济价值已反映到他们的文化和宗教生活里。在苗族中普遍通行“牛打架”（斗牛）的集体娱乐。为了欢迎我们访问团，他们曾在不同的地方举行过好几次大规模的“牛打架”。打胜的牛要挂红，也是一村的光荣。人死的时候，他们的风俗是一定要杀头牛，在死后的世界里好有牛来替死者背罪。这也是反映着在活人世界里利用畜力代替人力劳动的事实。在宗教仪式中用牛是很普通的。

但是为什么在苗族中地主这样少？这里我们看到了民族界线了。从经济结构的整体来看，这个区域已进入了封建主义的阶段，但是因为汉族封建势力罩住了苗族，汉人地主有着政治权力（就是军队、衙门和监狱）压迫着苗族，使苗族本身不易生长出地主阶级。这好像中国在强大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势力下资本主义不易生长是一样的。从民族的范围来说，苗族本身封建势力是薄弱的，但并不是说苗族的经济没有进入封建主义阶段。苗族经济是贵州经济的构成部分，只是这部分是封建社会中被压迫的一

部分。汉族的封建势力是这个经济的统治势力，所以民族关系在这方面说就是阶级关系。汉族封建统治者有两只手，一只手压在汉族农民身上，一只手压在兄弟民族身上。汉族农民和兄弟民族农民虽被同一个敌人压着，但是因为民族的隔阂和经济上的分离，在过去他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共同的利害，一直要到民族隔阂消灭之后，他们才容易觉悟，发生阶级友爱的关系，这种友爱关系是民族平等的基础。这也说明了过去民族的斗争本质上就是阶级斗争。很明显的，只有把压在兄弟民族身上的这个汉族封建统治消灭了，民族的仇恨才能消灭，民族的友爱团结才能实现。

由于汉族封建势力的侵入，阻遏了苗族本身封建势力的生长，苗族社会上层结构的文化方面也就不像汉族那样地到处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在封建社会中，劳动是被贱视的，但是苗家却热爱劳动。又由于热爱劳动，他们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得到了丰富的泉源。苗族的特点是爱唱歌，爱跳舞。这种健康的文艺活动只有在和劳动密切结合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一提到苗家，谁也不会不联想到他们美丽的服装，活跃的舞蹈，动人的歌唱。“到处是歌声”绝不是一句过分的话。我有一次被一位苗家妇女硬邀去吃饭。刚坐下，歌声就开始了。主人唱了一曲，客人就得喝一杯。客人唱了一曲，主人也得喝一杯。唱来唱去，一直唱到席散——这是酒歌。送客出门，又得唱别歌。在路上走，唱山歌。在马郎坡上，唱情歌。歌的种类说不完。他们并不像我们，学会了《东方红》就只会唱《东方红》。而是即景生情，即情生词。一个调子临时填词，用来代替谈话。因之，一唱可以唱上半天，一天，甚至几天，几晚。

他们的唱歌和社交是分不开的，一个不会唱歌的人在苗族里会失去他社会活动的能力，好比我们的哑巴。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几次“马郎坡”，这是青年男女公开自由社交的草坪。每个村

子有一片山坡作这个用处。青年男女公开自由社交的活动称作“摇马郎”。农闲时节，青年男子成群结队的，从一村到一村去“摇马郎”。他们到了一个村子就在马郎坡上嘘嘘作声，该村的少女（没有结婚的）盛装出迎。双方开始唱歌。在唱歌里谈起爱情来。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双方情意相投了，就可以谈婚事。双方的父母在原则上是不能干涉的。这种婚姻制度曾被“礼教熏心”的汉人视作“野蛮”的表示，实际正表示了他们文化中封建主义的薄弱，还保存着男女自由婚姻的制度。在这种婚姻制度中，一个不会唱歌的人也就很难找到如意的配偶。因之，人人会唱并不是件难于理解的事了。

每当在歌舞热闹的集会上，我面对着活泼可爱的苗家群众，发现了自己这一身封建气息。我要唱，不入调；要舞，又动不起来：像是一个嗓子被棉花塞住，手脚被绳子捆住的囚犯。我感觉到痛苦。一个曾贱视劳动的人，应得的惩罚。人是喜欢活的，我们团里的同志们在和苗家兄弟们接触中一致地感觉到自己不够“活”。感谢苗家兄弟启发了我们：“只有劳动，才有生命。”

苗家在几千年的民族压迫下奋斗以求生存。他们在求生存的斗争中获得了主要的经验，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劳动就是生命。如果不是靠这法宝，在荒山上开出良田来，在石山上长出粮食来，今天哪里边会有苗家？我们充分地相信，就凭这法宝，劳动的苗族，一旦得到了平等，有自由去发展他们已经有着很好基础的经济和文化时，他们必然会在我们这大家族中放出异彩，丰富我们全国人民的生活。

劳动是可贵的，苗家是可爱的。

四、仲家，团结起来

当我写下这题目，笔就停住了。“仲家”这个名称是不是妥当呢？让我先就这个问题说一说。关于兄弟民族的名称，我们一般是用过去汉族对各民族的称呼，可以说是各族的“汉名”。这些汉名并不很正确的，因为一个汉名中可能包括好几个民族，一个民族在各地又可能有几个不同的汉名。过去汉人忽视各族的分别，常用一个名字来指一切自己民族以外的人，好比“洋人”就是一例。贵州日常用语中的“苗”字有时就是这类的笼统称呼。《黔苗图说》里列举 82 种苗族，包括了贵州所有的兄弟民族。汉人和贵州的兄弟民族接触复杂了，有了区别的需要，于是又发生了一种两分法：“非苗即夷。”苗族以外的兄弟民族都称“夷”族。这样一分之后，苗族是划出来了，而其他各兄弟民族的汉名却依旧是一篇糊涂账，因为被包括在“夷”族之内的有着好几个自己认为是不同的民族。

“夷”这个汉名是历史上早就用了的旧字，如“东夷”、“西南夷”等等，原来也是一个笼统的名称。滇、康一带俗称“傜”的民族也用这个汉名。后来因为这个字在过去常和“狄”字相连，又在大民族主义下联系上了轻视的感情，所以他们改写为“彝”。贵州本来包括在“夷”族内的俗称“傜”的民族跟着得到了新的汉名。可是贵州被包括在“夷”族中的其他民族称什么好呢？

彝族划分出去后，剩下来的那些曾包括在“夷”族里的人在不同地区里，还有不同的地方性的汉名：贵阳一带称仲家，贵定一带称土家，兴仁一带称水户，荔波一带有两种，一种本地，一种水家；黎平称侗家，靠近广西边境的称僮家。这许多名称所

指的人所说的话却都属侗台语系。因之他们在历史上可能是出于同一民族的。但是现在侗家、水家和僳家各自认为是独立的民族了，而仲家、土家、水户、本地等却都自称 Pu - yi，认为是一个民族。这些自称 Pu - yi 的人在贵州一共约有 160 万左右，分布在盘江流域，是贵州的一个重要民族，但是却缺乏一个统称的汉名。我在这里称他们作“仲家”，显然是不太妥当的，因为原来这名称并不包括全部 Pu - yi，而且这字以往曾用犬旁，还留着一些兄弟民族不喜欢的感情，所以最好还是用他们自称的名字。如果汉字拉丁化了，问题也就简单了，用 Pu - yi 就成；但是现在我们还得找两个汉字来译音。我们又不敢轻易杜撰，只有希望将来他们自己能在代表会上通过决定。在还没有公认的汉名前，暂时依旧有的用法称作“仲家”，这是不得已。

仲家的中心区在靠近广西的边境，册亨、望谟，我们没有去，我们只访问了贵阳到贞丰这一条路线。在镇宁、郎岱、关岭交界处的仲家聚居区——扁担山，曾做了短期的重点了解。说起扁担山，传说就多了。在过去好像是“化外之区”，进去了就不太容易出来。军阀时代军队进去都会吃亏，杨森打进了扁担山引以为是一件大事，这是反动统治时代的情况。解放后情况也变了。我们访问团进去时曾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群众大会的人数超过了 1 万，歌舞了几天。

扁担山是仲家分布区域靠边的一个聚居区，虽则在各方面可能比较突出一些，但是也能代表仲家这个民族的特点。一般来说，仲家并不像苗家那样被打击得“老鸦无松桩，苗家无地方”。他们并没有四处逃亡，而在一处就站住一处，占有水田，不上高山。他们还守得住一个地方，脚头还是能立得定。这是由于仲家历史上的遭遇比苗家好一些。在地理分布上看，仲家是在贵州的西南部；他们的东北住着苗族，再过去才是湖南和四川。

如果汉族封建势力向贵州的扩张主要是从湖南和四川来的话，仲家还有着个缓冲，要等苗族挡了一阵之后才到仲家地区。咸丰年间苗族起义，有一支军队退入兴仁的仲家区，得以保存；到现在该区还有他们的后裔，除了头帕外，妇女的衣饰和黄平、炉山的苗族一模一样。他们在该区也种水田，和仲家经济地位相同。从此可以看到这地区过去所受汉族封建统治势力武装的压力是较轻的。

在这个较安定的环境和较肥沃的水田基础上，仲家不但大部保有其土地，而且他们的农业经济中也发生了封建主义。本族有了地主阶级，土地也比较地更为集中。据我们的调查，仲家聚居的镇宁星拱乡凹子寨人口中 13% 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 65%；阁老乡革佬坟人口 27% 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 70%。晴隆县是兄弟民族占 60% 的杂居区，全县仲家地主在 30 市石以上的约有 70 家，而彝族地主只有 1 或 2 家，苗族则全是中贫农。靠近仲家中心区的贞丰，兄弟民族人口占 70%，仲家地主有 86 户，富农 689 户；苗族地主只有 7 户，富农 122 户。在个别地区仲家地主数目甚至超过汉人，如镇宁五区本寨十一保汉人地主富农 30 户，仲家地主富农 108 户；马场乡第八保，汉人 60 户中，1 户地主，4 户富农，而仲家 70 户中就有 4 户地主，50 户富农。

仲家社会中阶级分化的程度很明显地比苗族为高。不但如此，苗家少数地主及半地主式富农对本族农民的剥削比较轻，而仲家却不然。本民族内部的租佃关系与其他民族间的租佃关系并无差异，甚至有人反映：“自己人更凶。”仲家租佃剥削一般是四六（地主得六成，佃户得四成）或平分，也有三七，甚至高到二八分的。名义上是平分的，实际上常要农民先代地主上粮，所以还是四六分。此外更有各种超经济剥削：如“佃牛讨猪”（替地主无偿喂牛和养猪），送礼也要规定在契约上，最为严重的是无偿劳动，“随传随到”。郎岱有人租种了两斗种子的田，

一年帮地主做工多至 100 天。因之，地主往往把土地零星出租，多几门佃户，使他们可以靠无偿劳动来耕种大片不出租的土地。农忙时佃户还得“先主后私”，把地主地上的工作做齐了再种自己租来的地——是劳役地租的性质。

仲家地主阶级的发生在过去民族关系上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个阶级为了自己的剥削利益，对于外来的压力是不愿反抗的。如果他们坚持民族立场，要进行反抗就必须发动他们所剥削的农民站起来。农民一旦站起来了，他们的剥削地位就站不稳了。而且如果反抗失败了，他们的土地也就会被汉族的封建统治者夺去。民族战争中胜败都对他们无利，对他们最有利的莫如妥协。妥协后，汉族封建统治者对他们的需索还可以转嫁到本族农民身上去。

仲家中有了这一种人物，汉族封建统治者在他武力不足彻底控制时，也就利用他们对仲家进行间接剥削和间接统治了。间接统治对于汉族封建统治者也比较方便，如果像在苗区一般直接统治，就会面对富有反抗性的农民，“小反大反”不断发生。间接统治的区域里这种反抗就不多。但同时封建统治者对于他们利用的工具并不是很放心的。他们之间虽则互相利用来各自保持其剥削利益，但是矛盾是存在的，你多了就是我少。所以封建统治者又得施展伎俩，分化仲家的内部，用甲制乙，用乙制甲。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仲家社会里发生了两种突出的现象：一是仲家上层和汉族封建统治者的联系，一是宗派斗争。

仲家的上层倚靠汉族封建统治者维持其阶级利益，他们压迫本族内部的权力是外来的。一个仲家地主如果不附着汉族封建集团中的当权派，不但地位站不稳，甚至财产都保不住。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仲家上层就有很多参加这个反动集团，伪国大的贵州少数民族代表也出在仲家。去年反动势力武装暴动，仲家的上层有一部分当了匪。正因为如此，我们发动了群众，清剿土匪之

后，那一部分仲家人民的公敌也大多已经肃清，使仲家社会本质上起了变化。

宗派斗争在仲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所访问的各县都有这种情况，不但上层，就是农民和孩子都分着派别。宗派斗争基本上是汉族封建统治者对兄弟民族“分而治之”的手段所造成的。形成的经过简单说来是如此：汉族封建统治者利用该族上层作统治的工具，凡是被利用的人在当地就有了权势，他可以包庇一部分人和欺压另一部分人。具体说，比如国民党要拉兵派款，命令仲家的乡保长去执行，乡保长可以决定拉谁和派谁。仲家的老百姓想免于被拉被派就得投靠乡保长求其庇护。乡保长得到了这些人的好处，把兵款拉派到另外那些人头上。另外那些人就得想法去找其他有势力的人来庇护，甚至出钱帮助他去活动，争夺乡保长。国民党受了贿赂，换了乡保长。新的乡保长一上任就向另外那一派拉兵派款。这样轮流报复，双方愈来愈仇恨，成了势不两立的宗派。

在这里很清楚可以看到：引起宗派斗争主要的原因是在汉族封建统治者所加予这民族的剥削和压迫。不团结起来反抗这压迫，灾难是脱不了的。但是他们却这样东推西推，分裂成了宗派，得到利益的是当乡保长的上层和国民党封建统治者；人民大众在宗派斗争中毫无好处，而且更多了一层剥削。不但如此，宗派斗争分裂了民族，团结受到阻碍，使封建统治者坐得更稳。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

我们在镇宁把这道理讲给了仲家同胞们听，他们很感动地说：“国民党就是要挑拨我们闹不团结，只有共产党才真是要我们好，我们不团结，就不能翻身。”

还有一个造成仲家内部不团结的原因是他们的婚姻制度。他们的婚姻制度一方面已出现了封建性的包办方式，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风俗里却仍保存着男女恋爱的自由。这两方面是矛盾的，

因之常常引起纠纷，加强了宗派分裂。

现在仲家男女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包办的。儿女还没有成年时，经过媒妁之言，履行订婚、纳八字那一套汉族在封建时代所熟悉的手续。但是结婚之后，女的却并不住到男家去，还是留在女家，叫做“坐家”。经过一个时期，男家请人设法乘女方不备，用一个“甲壳”戴在她的头上。戴上了“甲壳”，女的才住到男家去，夫妇才同居。女的一般总是想尽方法逃避和抵抗这个“甲壳”，所以多少要经过强制作用才戴得上去，有些不愿意的，甚至闹到自杀的程度。为什么她们不愿意就范呢？那是因为仲家的风俗中还保留着和苗家“摇马郎”相近的“赶表”。在赶场（如华北的赶集）时，青年男女（不论已否订婚，以及“坐家”中的新姑娘），排着一小队一小队地互相找对象。对象找定了，通过第三者的传达，双方同意后，就溜出场坝，到山坡田间去唱歌谈情。仲家的“赶表”没有苗家的“摇马郎”那样公开。“摇马郎”并不与婚姻制度相矛盾，而是进入婚姻关系的过程。“赶表”却不然，青年男女很早都是已订了婚的，而“赶表”的对象又不是未婚的夫妻，如果因“赶表”而发生了爱情就会引起婚姻的纠纷。所以女方的父兄丈夫不准妇女去“赶表”，但是青年人却不肯放弃这自由恋爱的机会。女的结了婚，千方百计设法延长“坐家”；男的有了心爱的对象，而对方又是已订了婚或结了婚的，只有进行“抢婚”。据镇宁仲家自己的估计，由抢婚造成婚姻事实的占婚姻总数 10% ~ 12%。访问团在扁担山的时期中，曾遇到过两次因“赶表”而发生冲突的事件。我们也知道有一个抢婚事件牵涉了五个村子，引起长期的纠纷。

仲家的同胞们对这种婚姻制度很多认为是必须改革的。现在封建主义的影响已经逐步在消灭中，怎样去改革这种引起民族内部不团结的制度的意见也容易取得一致了。

仲家是个勇敢、不甘屈服的民族。汉族的封建统治者对它硬干不成，却采取了分化的恶劣手段。仲家虽则在表面上还保持了一部分土地，还保持了一部分政权，而实际上人民大众受到重重剥削，生活和其他被压迫的兄弟民族一样痛苦，一样悲惨。现在汉族封建统治者已经打倒，挑拨离间和分裂兄弟民族的主犯已经消灭，仲家内部必然会团结起来了。

仲家同胞们，团结起来！让我们为你们光明的前途而欢呼！

五、乌撒的余留

长江上游的金沙江，直贯西康，滚滚南下，过了大雪山和玉龙山脉，转向东流，又曲向东北，形成一个大弯折；到四川的宜宾才汇合了岷江，奔流东去。这一段万马奔腾的巨川，划开了西康、云南、四川三省边界。这大弯折北岸的凉山里住着彝族。凉山腹地的彝族，一直没有被封建帝王所征服过；但是，汉族封建势力对他们的压力却也从来没有撤退过，而且曾像尖刀一样从中心插入这大弯折的地区，开出一条从西昌到会理的走廊。走廊以东是四川的雷马屏峨区（包括雷波、马边、屏山、峨边），走廊以西是云南的华永宁区（包括华坪、永胜、宁蒗）。雷马屏峨只是东区彝族的一个中心；从这中心一直向东南展开，经云南的永善、昭通，到贵州的威宁、赫章、毕节。这个地区里，彝族人口有150万左右，但是在贵州的彝族只有约10万人，所以这只是彝族区域的一个小角，已经不占重要地位。

但是在历史上，现在已成为彝族边区的这一个小角，过去是相当重要的。川南、云、贵、康南一带在宋代是乌蒙王的封地。明代分为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等部。明太祖进军这区地域时曾告诉部下说：这区的“诸夷种类皆出于罗维，

厥后子姓蕃衍，各立疆场，乃异其名。”经过战争，被征服的：“即用原官授之”，成为土司。在现在贵州毕节专区境内（当时属四川）的彝族土司主要有三：永宁（扯勒）土司，从四川叙永到毕节北部；水西土司，包括黔西、大定，以及乌撒土司，从毕节西部到威宁。这三个土司和川滇的乌蒙、沾益土司“境土相连，复以世戚亲厚”。“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救援”。他们形成了当时彝族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引语俱见《明史·四川土司列传》）。

贵州的这几个彝族土司实力比较雄厚，乌撒土司“富盛甲诸部”；永宁土司在明末曾占重庆，围成都；水西女土司奢香曾见过朱元璋，并修筑道路，沟通黔滇。但是因为他们太靠近四川，又是处在入滇要道上，所以从明末到清康熙，逐一地改土归流，彝族在这区的统治势力被打击或消灭了。永宁和水西区彝族所余人口已很稀少，到现在只有乌撒区还有一部分余留。

我们从贵阳，渡过鸭池河西进，正是顺着彝族后退的路线，一路上看到毕节以东和毕节以西这两个相当于原有水西和乌撒地区在社会经济上表现出很显著的区别。这个区别也表现了这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两个时期。水西区受汉族影响深，已经与内地汉人区相同，而乌撒区却还保留着初期封建的残余。我想分两篇来介绍彝族社会发展的过程。

贵州的彝族在历史上有一个相当长的土司时期。水西彝族据说在蜀汉时已经内附，其他各部分，除了凉山中心区外，陆续受汉族帝王的加封，到明代都立为土司，一直到明末和清代才一个个改土归流。土司制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是封建帝王在少数民族区域利用世袭的官员来统治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这些官员主要是少数民族原有的统治阶级，但亦有是征服该区的汉人。

在历史上有许多民族在不同时期曾向中国的封建帝王称臣纳贡；好大喜功的帝王也常常对这些藩邦加封一定的称号。这些却并不能都说是土司。严格地说，土司制度要到明代才有一定的章法，应用于西南各少数民族。土司制度主要是利用各民族原有的政治基础，进行统治和剥削。《明史》上说得很清楚：“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土司的名称很多，如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等。他们都直接隶属于帝王，这样把少数民族原有的政治体系分裂，使他们不能统一起来；再用种种手段，唆使其摩擦，使他们不能团结起来；更调用他们的兵，互相战争，使他们相互仇恨起来。各个土司对帝王都有称臣纳贡的义务。好像水西土司在一定时期要进贡多少马匹。至于各民族本身的社会形态，封建帝王是不管的，所以这个制度只是在政治上把少数民族降为附属的被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加一重剥削。因之，土司制度本身并不能说明它社会经济的内容。它只是在原有社会经济基础加上一层和封建帝王的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罢了。

但是土司制度对于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却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制度使少数民族中原有的统治阶级得到了一个靠山。一方面整个民族受到了压迫，而另一方面该族的统治者靠了帝王的加封，也就是支持、巩固了他们对其本民族人民的统治和剥削的地位。因之，被剥削的少数民族人民大众的枷锁不但更多一层，而且更牢固一度，使该民族社会发展多了一个阻碍，也就成为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停滞的原因之一。

土司制度是封建帝王剥削和压迫少数民族的第一步，这一步还承认各民族自己原有的政权，间接加以统治。当一个帝国的武力式微时，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少数民族还能保持其政治上的半独立性，但是封建帝王的民族压迫政策并不会停留在土司制

度的阶段。当其控制边区的武力足够时，间接统治变为直接统治，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改土归流”——土是指土官，流是指流官，就是随时可以调动的汉官。改土归流是从承认民族区别而变为否定民族区别，也就是消灭少数民族，进行同化政策的开始。民族压迫更深一层。

贵州彝族的三个大土司中的永宁土司在明末时为了被调兵出征，发生反抗，失败之后，官职被废；彝族人民被屠杀的屠杀，逃亡的逃亡，叙永一带的土地也就放弃了。奢氏后裔，改姓余、杨、禄，有一部分寄居在水西土司境内。

水西和乌撒两土司最初是被吴三桂奏请废除，后来吴三桂反抗清廷，他们就起来报复，有了“功”，清廷又恢复了他们的官职，但是解除了他们的实权。到康熙三十七年，借口无嗣承袭，再令废止。到现在已有 280 多年了。

土司制度的废止，改土归流，更进一步破坏了彝族原来比较完整的政治组织，封建帝王在名义上直接统治了这个地区的彝族。但是这个政治上的变动在社会经济上所引起一系列的变动却是逐渐的。过去近 300 年的历史，在这个地区，正是彝族原有社会形态交替给封建形态的过程，到解放之前还没有结束。

改土归流的前后贵州彝族社会形态是怎样的呢？现在我们还不能肯定地答复这问题。在威宁我们曾和若干黑彝的知识分子开过调查会，又和现存土目的后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从他们得到的了解可以简单说一说：

黑彝原是这地区的统治阶级，在他们的统治下有白彝以及其他民族，包括汉族的农民。彝族中的黑白彝，相互不通婚。土地都属黑彝，白彝和其他民族原来是没有土地的。黑彝中势力强大的被封为土司，他们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土司被废止后，土司的土地分属于土目（土司的属官），亦称“官家”。土目原来的

数目很多，以水西土司区来说就有 48 “则溪”，120 “衲衣”，1200 “掖所”。土目主要是黑彝，也有极少数当通译的汉人。

现在的黑彝并不全是“官家”。“官家”的数目已经不多。据说这是由于土目间斗争残杀、兼并和绝嗣的结果。最初土目间土地并不买卖的，但是如果把哪个土目的后人都杀绝了，胜利的一方就可以占领其土地。汉官不但不禁止这种行为，而且从中煽动。因之，在威宁一带，土目间的战争在解放前还不断发生。在这有类于“春秋”时代群雄割据的天下，每个土皇帝式的大土目自己有武装，有工事。在“衙门”，附近周围住着他亲信的“白彝”，这些属户有当兵出力的义务，儿女中有被土目看中的可以调到衙门里来服役，土目女儿出嫁还可以把她们陪嫁。此外是许多“佃户”，种他土地的各族农民，除了一定租额外，随时可以派款。甚至每年有种种一定的纳献。这些土目实际上是继承了土司的统治者，在偏僻山区里是生杀予夺的专制君王。这类官家解放前在威宁的边区上还有，但是解放后他们大都当了匪，现在死的死，逃的逃，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去实地调查了。

从现在保留着的官家经济，我们希望还可能看到土司时代的一般情况。所以我们派出了一个小组到毕节北部川滇黔交界处作了一次重点调查。这个被调查的典型村，大部分土地还是属于土目后人的官家。就是在一家所有的土地上还可以实行着多种不同的土地关系。分析起来，有些是有类于封建庄园制的性质，有些是已和汉人地区通行的封建租佃制一般。我们可以先说一说那种比较早期的形式。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那种早期的形式在当地称作“粮户地”，又称“大顶”、“安约”等。这是永佃性的：农民世代做官家的“粮户”，官家对他们有广泛的权利。粮户地的租额比较轻，只是产量的 $1/10$ 到 $1/5$ ，称作“官粮谷子”。主要剥削不在这“官粮”上，而是以加押为名义的献纳，称“大顶”或“顶

银”。凡官家有婚丧事故，承袭换主，或是粮户死绝了，家族上门管业，都要“加顶”。此外还有一种剥削名目叫“份租”，一定土地上附加的物租，如“鸡份”、“猪份”、“羊份”等，现在都折银交纳。交租外，粮户还要无偿劳动，叫“办官差”，如喂牲口、修房子、帮活路、抬滑竿。“随唤随到”，不到就要被打，甚至打死。

这些名目如“租”、“押”、“顶”等等都是后来安上去的，从它们的本质上看是土司时代的残余，它们实际是握有政治权力的“官家”对人民征收的田赋（所谓官粮）、摊派（所谓加押）、税款（所谓份租）及徭役（所谓办官差）。官家对粮户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关系。在封建政治下，地租和税收本质上是一个东西，这里是很明显的。官家对粮户最主要的剥削是无偿劳动，他们自己经营的土地是由粮户来劳动的（这种情形在该村已不多，因为官家自己经营的土地已很少）。粮户所得到的的一份土地其实并不是“出租”给他们，所以称“官粮”而不称“地租”；这只是利用土地把“粮户”们束缚起来，以保证官家有足够的劳动力。但是“粮户”并不是奴隶，因为已经不是官家买卖的对象。官家之间可以争夺土地，夺得了土地，也就夺得了粮户，人是从地不从主的。这是以劳役地租为主的封建初期庄园制的性质。

在威宁现在的黑彝地主（并非官家）也保留着类似的土地制度。我们曾和当地的若干地主家庭出身的黑彝知识分子讨论过这问题。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家里的情形：他们的父母部分劳动，主要劳动者是“帮工”。“帮工”是白彝，也有其他民族。帮工的全家，男女老少都住在他们家里，和他们父母在一起吃饭。另外给帮工一块土地叫“私房”，这块土地上的出产属于他们。“私房”地较小的，有些还给一定的衣服。有几家“帮工”已经帮了几代了，“帮工”的儿女长大了还是“帮工”。有几家黑彝

租土地的目的，也有把土地出租给别人。但是黑彝不做“帮工”，穷苦的可以住到亲戚家去，以客人的身份从事劳动——这种以“私房”来剥削劳动的情形在威宁还相当多。

我们又找白彝来谈，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有一家黑彝的“私房”逃了（他称“帮工”作“私房”），怪他的岳父出的主意，敲去了1斗5升包谷和300块小洋。我就问他：“‘私房’能不能辞退不干？”他的答复是：“全家跑几百里才捉不回来。捉回来就会打死。”

“私房”和“粮户”性质基本上是相同的。他们没有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利，地主可以任意打骂，甚至处死他们，但并不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财产。他们多少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生产工具和可以自己经营的小块土地，但是并没有完全的自己的经济，吃和穿都可以部分地由地主供给。这种初期封建主义可能是贵州彝族在入土司时代已经发展到的社会阶段。

说到这里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初期封建之前彝族的社会形态是怎样的？二是改土归流，彝族和汉族的封建主义接触后发生了些什么变化？这两个问题我想留到下一篇再讨论了。

六、一章活的社会发展史

我们在贵州彝族区的访问工作，在时间上说是最仓促了，只有20多天；但是路程最长，情况最复杂。这一路工作，对我个人来说，却是一次最大的学习。解放后，我曾在清华上大课，讲社会发展史，最苦是缺乏我们自己本国的材料。我们固然可以从历史上引用一些，但是讲来听来都觉得不够亲切，没有感性的知识。这次去访问彝族，我们才读了一部分活的社会发展史。当然，第一章“原始共产主义”已经没有了，第四章“资本主义”

也可以不必再写。在贵州彝族里读到的主要是“封建制度”那一章。再往西，进入大小凉山还可以读到“奴隶占有制度”的半章。可惜我们的访问工作是依省界分工的，所以我自己并没有进入大小凉山，关于这地区的情况是间接从一二分团同志们那里听来的。

当我们翻读这部分活的社会发展史时，心里是很痛苦的。我们常想：为什么在我们同胞中还有这部分兄弟到现在还停留在我们几千年前已经走过的阶段上呢？

回想当年，唐、宋时代，彝族在西南还是个统治民族（南诏大蒙国及后来的大理国的统治者据一部分史学家的意见是彝族，但亦有不同意的），川、康、滇、黔边境又有相当强盛的彝族部落。但是经过元、明、清三代封建帝王的压迫结果，现在只在封锁状态下的凉山里保留着唯一没有被征服的彝族部分。就在这被封锁的山里，我们见到了还在利用奴隶劳动的制度。凉山彝族一直到解放之前，山内外戒备森严，往来不易。如果过去他们不和山外尽可能的隔绝，他们也不可能不像其他地区的彝族一般逐渐衰亡了。在这荒凉的山区里，他们的社会又怎能发展起来呢？因之，我们必须认清，民族压迫和不断的冲突、劫掠和屠杀是彝族社会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民族压迫消灭了，彝族社会可以容易顺利地发展起来了，而且在民族平等和汉族的帮助下，发展的速度也一定能很快的。

凉山彝族现在是半奴隶半封建的社会。他们分为黑彝和白彝两种，也是两个阶级。黑彝是统治阶级，白彝是被统治阶级，在被统治阶级中还有娃子与非娃子之别。非娃子就直称白彝或百姓。娃子又分两种，一是普通娃子称百姓娃子，一是家娃子。家娃子才是完全的奴隶。

统治阶级的黑彝占有土地，不参加主要劳动，专搞政治和军

事。被统治的白彝是生产劳动者。非娃子的白彝有些地区可以向黑彝买少量土地。黑白彝的阶级起源有这样一种说法：彝族在晋代分东爨西爨两部分。隋唐时东爨称南诏（诏即部落），又称蒙舍诏，或乌蛮；西爨有五诏称白蛮。乌蛮从事游牧，白蛮从事农业。后来游牧的彝人征服了农业的彝人，把战争的俘虏作为奴隶。乌蛮现称黑彝，白蛮现称白彝。

这种说法认为彝族先有黑白彝之别，后来本族间发生战争，被俘的沦为奴隶。但当时这个区域原是多民族接触的地方，民族间的战争也有俘虏，这些俘虏也成了黑彝的奴隶，成为白彝。直到解放前，黑彝经常向其他民族抢人来当娃子。

初从别的民族里抢来的奴隶，心里是不服的，如果要剥削他们的劳动，就得加以强迫和监视。所以他们得住在主人家里，在监视下听着主人的命令做工，叫作“家娃子”。家娃子服役年代久了，表现忠实可靠，由主人为他们婚配，分出去住，给他一小片土地去自己经营，成了“百姓娃子”。百姓娃子积了银子可以向主人赎身，成为“百姓”，也就是非娃子的普通白彝。

凉山彝族社会中的奴隶占有部分就指利用娃子的劳动来生产的经济。家娃子的人身直接由主人占有，担负家庭及农业劳动，劳动果实完全归主人所有，他们的生活由主人供给，完全是奴隶的性质。百姓娃子和家娃子不同的是在他们向主人领有一块土地，一份牲畜和工具，成了家，有了自己的经济，通过劳役和实物地租的方式被主人剥削，从这一方面说，他们已进入了初期封建，但是他们并没有脱离奴隶身份。他们和家娃子一般可以被主人任意出卖，打死了并不赔偿银子，不算一回事，而且他们所生的子女仍须送给黑彝当家娃子，也可以出卖。这两种娃子都是主人的财产，随时可以变成银子来使用的。百姓娃子是娃子转成百姓的过渡身份，也代表奴隶占有制发展到封建制度的过渡阶段。百姓娃子有了自己的经济，在生产上比家娃子要积极些，而且主

人也不必加以监督，因之，在经济上说是提高了一步。事实上，黑彝进行剥削也主要采用这种较高的方式。据一分团同志在一个区域的典型调查，百姓娃子和家娃子的比例是 10: 1.5 左右。

再进一步就是非娃子的白彝了。一个娃子大约须出 300 两银子给主人才能赎身成为白彝。这个价格是相当高的，绝不是一个娃子一生所能累积起来的，所以常常要经过几代的努力才有希望。百姓和娃子的不同是在获得了人身的自由；劳役地租较轻，住得远的平时不常被地主叫来使唤；而且可以私有土地和买娃子来使用；如果被黑彝打死也可以要求赔款。他们对地主所交的实物地租及摊派献纳则和百姓娃子相同。他们和地主的生关系已是封建性质了。但是在凉山中，这封建性的土地关系在数量上，以我们已知道的地区说，比例较小，只占娃子的 1/4。这个区域中娃子较多的原因可能是靠近汉人区，抢娃子比较容易。在腹地，据未证实的材料，娃子较少。因之，我们可以见到民族间的冲突的确影响了彝族社会的发展，因为如果民族间冲突消灭了，娃子的来源断绝了，娃子逐渐成为百姓；奴隶占有制也就可以从减少到消灭了。

凉山彝族是以百姓娃子为主要生产者，所以他们的社会是从奴隶占有制进入初期封建制度的过渡形态。贵州乌撒区（威宁、赫章）的彝族，西部是以劳役地租方式为主，东部是以实物地租方式为主；水西区（大定、黔西）的彝族大多已成了汉人地主的佃户，缴纳实物地租，但是仍有较重无偿劳动的剥削。在发展过程上看，这几个地区的变化是很相衔接的；但是历史上，乌撒及水西土司区的彝族早年曾否有过类似于凉山彝族的奴隶占有制，据现有材料看还不能作断。

凉山在明代属建昌卫。建昌卫在隋唐时为嵩州，“至德初，没于土番。贞元中收复。懿宗时为蒙诏所据，改建昌府，以乌白

二蛮实之。元至元间置建昌路，又立啰啰斯宣慰司以统之。”（见《明史·四川土司列传》）因之，当彝族强盛时，这里还是边区，是从土番手上夺来之后才移民进去的。后来南诏灭亡，川、滇、黔的彝族土司区也式微了，凉山才成为彝族的中心。凉山彝族奴隶占有制是保存着原来社会形态，抑是因经常民族战争获得了俘虏之后才发生的制度，现在还很难作结论。以贵州彝族来说，我们还没有看到或听到“抢娃子”的遗迹。即使早年曾有过奴隶占有制，很久就已经进入封建初期的阶段。所以在贵州彝族中主要的发展过程是封建制度本身的变化。

贵州最西的威宁，西北边境靠着云南的彝良和昭通，有 10 多个乡，土地大部分在土目手上。这是贵州土目势力占优势的地区。在这个地区里还保存着初期封建的庄园制。威宁靠东的部分主要是黑彝地主的势力。除了少数回民外，其他民族很少有土地的。向东到赫章，土目势力已经式微，握有土地的主要是黑彝地主，但汉族地主已开始抬头，因之在解放前，这地区是彝汉两族地主斗争仇杀的场所。毕节除了北部边区还有土目势力外，大部分已是汉族地主的势力，大定和黔西土目已近于消灭，那里的彝族已不分黑白，大多已成汉族地主的佃户。从鸭池河向西，很清楚地看到汉族势力伸张的方向和深度。

初期封建的破坏主要是由于土地流到了市场上来。在官家手上的土地依传统是不出卖的。所以过去土司想兼并别家的土地只有谋害对方，绝嗣了去承继；或是出兵去抢。土司之间争产夺地的记载在史书上也很多的。几千官家，到解放前只余几十个，兼并之烈，可以想见。但是土地如果只在土司中夺来夺去，在社会形态上还是变不了什么的。土地离开官家的手主要是在改土归流，彝族失去了政权之后。彝族官家没有了政权的保障，汉官的手就伸进来了。

汉官利用政治势力强迫彝族官家出卖土地的典型例子是继续

了15年的“禄产案”。20多年前水西土司区还有一个大土目禄雅山。他家经过了长期的兼并，成了当地最大的地主。那时军阀周西成在贵州当政，看中了这个土目的财产，就利用当地汉人地主和禄氏的斗争，把他父子拘到贵阳。据说禄氏为了赎身，曾用了大帮驴马，背了银子上贵阳。后来禄雅山在狱内自杀，判决禄氏土地充公，以地价1/3变卖；仅汉人地主李氏一家，即买了三四个乡的土地，黔西一县，周西成收集地价大洋40万元。周死了，毛光翔执政，又强迫佃户出款买地，出了款，地还是拿不到。这样在不同的军阀手上敲诈了五六次。到吴匪鼎昌当政才全部变卖出去。经过这个“禄产案”，水西区的官家也被搞完了。

类似于禄产案的事情过去是常常发生的。因之有一位官家的后人曾向我们说：土官哪里当得，在汉官手下能保全性命已经不错了。边区的官家实际上是用武力把他们的土地保存下来的。汉族反动统治阶级和彝族官家间的争夺土地是民族间武装斗争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民族仇恨的来源。

另一种原因使官家出卖土地的是出于官家自身的腐化。土目间不断的仇杀，毁坏财产，破坏生产；又得经常警备，需要武器，甚至有设立小型兵工厂的，费用浩大。再加上商品输入，引诱骄纵惯的官家养成奢侈的生活。鸦片风行后，又多了一项嗜好。他们固然常用摊派来剥削农奴，但这是有限的；生产力这样低，又不出产大量商品作物的农民，哪里来银子和货币供给土目们的挥霍呢？结果官家只有出卖土地了。

土地流入市场，发生了非官家的地主。在乌撒区培养出了一批新兴的黑彝地主（在赫章也有少数白彝地主），有一部分还部分采用劳役地租方式。在水西区汉人势力大，土地也就流入了汉人地主手上。汉人地主得到了土地，用他们所熟悉的封建方式来剥削农民，就是以实物地租为主的方式。地租以平分为最低限度。这地区的汉人地主受到当地彝族通行劳役地租的影响，在分

租外常常增加额外的剥削和无偿劳动。这个影响一直要达到黔东南一带，无偿劳动成了农民惨重的负担。

实物地租的剥削比劳役地租提高了一步，对农民来说，租额比较地有了个规定，不致随时来要钱要东西，没有一点保障；无偿劳动也比较少了些，而且在必要时还可以退租，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经营自己的土地和手工业。对地主说，固定的租额加多了，自己可以完全脱离农业经营，甚至住到市镇里去；又因为可以自由拔佃，挑换更能被剥削的租户。由于这些缘故，官家的土地上也逐渐采用实物地租来代替劳役地租。我在前文所提到川、滇、黔边界那个村子里，同一官家土地上有着不同的土地制度。原来在土司时代传下来的农奴还是照旧交“官粮”和“办官差”，但是后来的农民却不再做“粮户”了。他们是“见种平分”，并在定租时交定额押金，称“小顶”。有些官家还要佃户替他交“皇粮”（粮赋），称“倒印”。大体上和汉人地区的封建地主的剥削是相同的，只是在无偿劳动上比较多，那是受了传统制度的影响。

威宁的黑彝地主，在前文已提到的，也是部分地保留着称“私房”的劳役地租。但同时，同一家也有把土地出租，收取实物地租。因之，乌撒区彝族土地制度到解放之前还是从初期封建的劳役地租形式提高到实物地租形式的过渡形态。在水西区劳役地租已经少见而以实物地租为主要形式了。但不论哪一区，我们还没有发现货币地租。这个地区农产品还是以粮食为主，而且因交通不发达，运输困难，所以农产商品化的程度很低，货币地租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易发生的，这也说明了这地区资本主义生产还不发达。

社会是向着幸福和光明发展的，一个社会停顿在较原始的社会阶段上就说明了这地区的人民是停留在困苦的境地。毕节专区是贵州最贫困的地区，其中尤以威宁、赫章为甚。我们去年

12月去访问时，正逢严寒，一路冰凌，真是“水晶世界玻璃路”。这个在贵州范围内地势最高，天气最冷的地区，却正是花纱布匹最缺的地区。在城市街头看到完全光身子的孩子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开会放电影，会场上还有光身披些菜衣的男女。冬天主要的粮食是洋芋。他们整天烤着火，饿了就烤几个洋芋当一顿饭吃。威宁七个来开会的苗族代表中没有一个有足够一年吃的粮食，人人要亏一两个月；有一半每年要淡食几个月。草海附近一区10个保中，因为遭了水淹，只有1/5的人家有粮食够吃到来春，2/5那时已经没有粮食了。生产低，剥削重，生活苦——是这地区人民大众（不论哪个民族）的一般现象。

过去反动统治者最初用土司制度对这地区各兄弟民族的人民进行双重剥削；改土归流之后，又煽动官家火拼兼并，连年战争，民无宁日。赫章彝汉地主的武装斗争继续了五六年，死亡在5000人以上，间接被害的还不在其内。彝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民有不少是在各族上层的斗争中被屠杀、被赶跑的。到现在，水西区彝族已接近消灭，乌撒区也日见式微。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统治者，更在解放后清剿了当地的土匪，贵州彝族的前途也只有继续走上消灭的道路。现在各民族都得到了解放，而这地区兄弟民族的翻身，成果最大。解放后，劳役地租和任意摊派，事实上已经大部分取消了。反动的土目当了匪的已经肃清，开明的正在自动进行减租。在民族压迫下，彝族社会停滞了几百年，现在这压迫已经消除，该是彝族奋发飞跃前进的时候了。

七、少数中的少数

这是我介绍贵州兄弟民族情况的最后一篇。在前面四篇中我

只讲了一些关于苗、仲、彝三族的情况。这三族人数比较多，余下的除了水家、侗家各有 20 万人，回族有 10 万左右（各种估计的数字相差极大）以外，其他一共不过十几万人；但是名称却有很多，据我们所知道的已超过 30 种。每一种人有的不过几千，有的不过一两万。说他们是民族，似乎很勉强，但不是民族，又是什么？他们不但自己觉得和其他集团不同，别人也不把他们看成同族。他们零零星星地分布在各地，即使是名称相同，还可能语言通。因之，一谈到这些小民族，情况也就复杂了。

这一幅复杂的民族画面并不是不能理解的。贵州这个山区在很早的时候，苗、仲等民族移入之前，就有人住着。他们的社会发展很可能处于比当时外来的民族还要低级些的阶段。汉族在中原向南扩张，把原在平原地区的苗、仲等民族向山里赶。他们进入贵州，把原在山区的人挤得乱跑。汉族跟着进来，再一挤。你推我，我推你，站得住的推开了别人，站不住的又得往更深的山里跑。于是不同的民族在分布上就夹杂了起来。同一民族分散了，很久不相往来，各自发展它的特点，话也不通了，名称也变了，也就不再相认了。不同民族混在一起，交流、通婚又可以合成一个集团。经过了分散、打乱、交杂等等过程，民族情况愈来愈复杂了。

这许多小民族大体上可以分出两大类：一类是早就居住在贵州的古老民族；一类是各民族（包括汉族）的混合民族，现在被他们父母民族所遗弃了的。

这些小民族有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如果不加以照顾和帮助，他们会走上由衰而亡的道路。他们人数少，又零星杂居在其他民族占多数的区域里，谁都可以欺侮他们，所受到的民族压迫是多重的。比如黄平的□兜就常受苗家的气。有一次座谈会上苗族同胞曾自己检讨大民族主义，因为苗族对□兜也加以歧视和压迫的。在多重压迫下，他们生活特别穷困，在安顺的座谈会上邀

来了一位□佬代表，披上一件不知哪里借来的长袍，裤子都没有，冷得直发抖。小民族的同胞们一般没有土地，给其他民族的地主当佃户，受着严重的剥削。没有土地又租不着土地的，只能出卖苦力；黄平、安顺等市镇上挑水的很多是这样的小民族的妇女。经济压迫下没有机会学文化，他们的文化程度也很低；尤其是那些跑到了高坡上偏僻地方居住的，怕被人欺侮，不敢外出，在贫瘠的山地上终年劳动，过着原始的生活。他们分散得很零星，又互不往来，因之语言也分歧。杂居在其他民族中的，因为经济上依赖其他民族，自己的语言也逐步丧失了，有些甚至已经不再能说原有的语言了。我们想了解□佬的语言，要找个能说这话的人已经很困难，很多人说祖上还会说，老年人还记得，现在年轻人不说这话了。

这些在衰亡中的小民族是民族压迫的牺牲者，我们必须照顾和帮助他们。至于那些被父母民族遗弃的小集团，比如南京人、里民子等等，原是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混合的结果，没有理由看成是许多新的民族的。他们大多说汉语，穿汉装，并没有民族的特点。他们现在被认为是“少数民族”的原因是在过去汉族不认他们是子孙，加以歧视和压迫。汉族同胞对他们应当及早负责认领还族。至于那些古老的民族，受苦最长最深，受了伤，要他们自力更生是有很大困难的。他们人数既少，有些躲在山顶上过着非人的生活，在民族友爱互助的原则下，我们不应当坐视不理。各民族应当联合起来具体地给他们帮助，恢复他们和各民族平等的生活机会。

我们在贵州知道了有这一类小民族之后，曾特别注意他们，在黄平时派出了一组专程下乡去访问□佬。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还是很有限的。那些零星杂居在其他民族区的小民族同胞，常常住在很偏僻的山地里，甚至被人遗忘了的。他们也不常

出来，因之我们和他们见面的机会不多；就是出来参加了我们召集的各种集会，交谈上也有很多困难。安顺座谈会上那位□佬代表，上了台，一句话也没有说，足足哭了几分钟。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了解得很不够。□兜在小民族中还算是比较人数多的，而且在黄平还有个小小的聚居区，我们可以先说说他们的情况。

黄平和炉山一带的□兜（旧用“𪛗”，后改“仡”，又改“□”）共约 5000 多人，分散在各地；但在黄平枫香寨有 100 多家聚居在一起，再加上附近黄飘乡的□兜，这个地区有 25 个寨子，分属两乡。四周是苗家，在每个乡里都是少数，受人欺侮。他们的经济情况比苗家更穷困。绝大多数是汉人或苗家的佃户。生活最好的一家，九口人也只有百多挑地。

□兜社会的特点是在他们还保留着氏族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并不是原始公社性质，因为他们不但已有私有财产，而且租地耕种，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只是他们本族的社会组织却还是依据血缘关系，由族长来统治。这个聚居区总的领袖是他们的总族长。在他之下有个副总族长。各寨有族长，再下还有房长。这是一个血缘组织。他们掌握家法，包括继承、婚姻和祭祀。

□兜的婚姻和周围的苗家不同，称作“背带亲”。小孩生下几个月或几年，父母就要替他们找对象，把婚订了。有的甚至指腹为婚，儿女没有下地，他们的终身大事已经被决定了。男的到 20 岁，女的到 16 岁左右才结婚。同时，□兜的青年男女也和苗家一般可以“摇马郎”自由社交和谈恋爱。这可能是受了苗家的影响，不是原有的风俗，因为这是和家长权力的制度不合的，事实上也时常因之引起婚姻纠纷。族长们用权力来维护家长决定的婚姻关系，如果要离婚，主动提出的那一方要赔偿对方 43 两银子。生活很穷困的□兜怎样拿得出这笔钱来呢？所以等于不准离婚。我们遇到□兜的青年，常常向我们提出改革这种父母包办婚姻的要求。

□兜的宗教是祖先崇拜，也就是用来支持家长权力的意识形态。在总族长的下面有一个宗教机构：教主、鼓主、鬼师和乐师。教主掌握家谱，鼓主供奉神鼓，鬼师占卜吉凶和治病，乐师管理六笙和舞蹈。神鼓是一个木鼓，保存在总族长家里。人死了，要请教主举行仪式，把死者的灵魂导入神鼓，所以神鼓是祖先的祠堂，也是祖先崇拜的象征。教主能背诵族里的家谱，肯定每一个人在血缘组织中的身份。人死了，他的名字记入这个口头传记的家谱里。

每年春冬两季他们要举行“跳鼓舞”的典礼，打牛大祭三天，对象是葬在鼓里的祖先。举行典礼时要跳舞作乐，所以称之为跳鼓葬（在贵州苗族中也通行一种盛大的集会，每过一定年数，要举行“吃牯脏”。届时要打牛，跳舞。“吃牯脏”的起源已经不知道，这个名称是只指集会中要打牛吃牛肉和内脏，显然不是这仪式的主题所在。我们在□兜中见到了“跳鼓葬”的仪式，不免联想起“吃牯脏”来，很可能原意是“鼓葬”，后来讹传成了“牯脏”。是否苗族在原来居住这地方的老民族中传得了这种风俗，我们在这里不敢作断语）。“跳鼓葬”是祖先崇拜的宗教仪式，是氏族制度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因为家长权力是要上层结构的意识形态去维护它的。

黄平的□兜现在说的话已经多和苗家相同，因之有人认为他们是属于苗瑶语系，并且认为是苗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数量太少、生活上要依赖于一个较大民族的弱小民族，他们的语言很容易受到较大民族的影响，所以从语言上来确定他们的民族来源是有困难的。另有一部分历史学家的看法：□兜是僚族的后代。僚族是早年在西南的一个重要民族。旧书用“獠”，这“獠”字的意义是打猎，可能因为这个民族是打猎而得义。广韵上“獠”字有两种读法：知卯切 tsau 和卢皓切 lao。从 tsau 音转成 tou，就是“兜”（同样的转音例如：缀——掇，者——都）。

族名发音时可能原来就联上𠵿（读作革），所以现称□兜。从lao音转成lou，写成“佬”。现在贵州和其他地方还有佬族，也联上𠵿，现称□佬。“□佬”一词在宋代书籍上已经见到（朱辅：《溪蛮丛笑》），明代的书上又有称“猺獠”（罗曰綱：《咸宾录》及田汝成：《行边记闻》）。清代的书上有把“猺”、“獠”通用（《大清一统志》）。其他史书上还有“猺猓”、“猺獠”、“猺猓”、“猺□”等写法。原来这些族名是先有音，后有字的，不同的人在不同时代写成不同的汉名是很可能的。这些可能就是一个民族，都是以革音开始，联上“獠”的不同读法。

□兜究竟是和苗族相近还是和𠵿佬相近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易得出结论来。他们自己是坚决不承认是苗族的，因为苗族常常欺侮□兜，他们之间也有着民族的隔阂。但是他们和□佬即使是同出于僚族，现在语言已不相通，很多风俗习惯也联不上了。要等将来研究更深入了，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兜这个名称除了炉山、黄平这一带外，别处很少听到，但□佬却分布得很广，湘西、贵州、广西和云南都有。以贵州说，据已经知道有□佬的地方，包括黔东的黄平、炉山，黔西南的普定、郎岱、安顺、镇宁、关岭；黔西的大定、织金。零星分布的区域还要广。这样广又这样散的分布情况就说明了这是个比较古老的民族。苗家和仲家大都承认□佬比他们早。有些地方，如镇宁扁担山，贵阳的花溪，还传说这些地方原来是□佬的，镇宁现在还实行“吃新”的风俗。关于这些我在第二篇里已经提过了。

□佬的情况一般比□兜更穷困。我们所见到的□佬大多已丧失了他们的民族特点。他们过去在重重压迫下日趋于消灭。在大定方家坪据说还有几个□佬的村子，在解放后曾发生过受骗称帝的事件。他们文化低落，地方闭塞，生活痛苦，所以很容易落后及被反动势力所利用。这说明了我们的对于这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

小兄弟们是必须特别注意而加以帮助的。

□佬的祖先是旧书上所称的僚族，这说法比较是可靠的。僚族在西南曾占有过重要地位。一说他们是起源于川陕边境，在纪元前5世纪时南迁，汉代已到贵州和广西，唐代在云南也有关于他们的记载。宋代西南各省，从湖南一直到海边都有他们的踪迹。宋以后川中僚族大减，但是元代马可波罗所记的秃喇蛮在黔西还有着很多的市镇，商业发达，很富足（秃喇蛮 Toloman 一说即仡佬。T和C通，C和K通，即Kolo，而且《元史》载“土僚”在昭通之东，叙府之南，就是马可·波罗见到秃喇蛮的地方）。元之后，史籍上有关僚族的记载就少了，大概已经走上了被打被逐的下坡路，逐渐消亡下去了。现在贵州□佬总数不过几千人，而且大多被其他民族同化了。我们想找几个□佬来学习他们的语言都已很困难。但是历史材料中还保留着一些有关□佬的特殊风俗：最突出的是披袍、凿牙、崖葬、铜鼓、坐月等。

披袍是指他们持有的服装，亦称桶裙或革佬裙：“裙幅两头运缝断，自足而入。”（《溪蛮丛笑》）“衣长仅尺余，上披以袍。袍方而阔，洞其中，从头笼下，前短后长，左右无袖。”（《贵州通志》）它的形式有些像我们的运动衣，从头上套下去的。但是他们现在已没有这种袍了。有人认为蜡花是他们创始的。蜡染是一种印花布，先用蜡在布上曲了花纹，然后染色，把蜡洗去，留下白花。现在兜中蜡花布是用得很普遍的。

凿牙是指他们把门牙打去，这是一种仪式，仪式的意义所传不同，有的说是成年礼，有的说是婚礼，也有的说是用来伴葬父母的。在□佬中还有一支称“打牙□佬”。但是我们所见到的□佬并不缺齿。

崖葬是人死了，“殓以棺而不葬，置岩穴间，或临大河，不施蔽盖”（《贵州通志》）。要经过一个时期才把尸骨捡起，埋在石砌的坟里。这种风俗已经丧失。有些老年人据说还记得听说过

有这风俗。很多尸骨葬在一起的情形，现在还有遗迹可见，称“□佬坟”。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铜鼓的风俗。铜鼓是现在贵州苗、仲等族很重视的一种乐器。在他们欢迎我们访问团大会上常打铜鼓跳舞。他们把铜鼓吊在三杈木上，一面用木槌打鼓，另一面不住地用木桶摇动，使鼓里的空气更复杂的流转，声音荡漾，更觉得洪亮。但是这些铜鼓却并不是苗家或仲家自己铸成的，都是挖地时在土里挖出来的。从四川一直到广西，各地出土的铜鼓为数很多，因之曾引起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的注意。一般的传说是诸葛亮南征时留下的，又有说是马援所铸。那是因为后人在土里发掘得了铜鼓，不知来历，不相信兄弟民族有铸造这富于艺术的铜器的能力，又要夸大汉族的武功，因之附会成这种说法。其实，这样笨重的铜鼓，直径有一二尺，高又近尺，重二三十斤，对于山地里行军是不适宜的。何况汉族并无此铜鼓，马援、诸葛亮没有理由创造这种不实用的“军用品”到山区里去打仗的。

《汉书·马援传》注引《广州记》有：“岭南二十余郡‘俚’‘僚’炼、铜为鼓……其俗尊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这段史料很有启发作用。着先是说铜鼓是‘俚’、‘僚’所创造的。但是为什么僚族要铸鼓呢？我们可以推测的是先有木鼓，木鼓在社会生活里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才结合铸铜的知识，制造铜鼓。铜鼓的规模以及它花纹的细致和考究，在生产力没有太高的时代，绝不是私人的玩具，也不太可能像现在苗、仲单是用做伴舞的乐器。最容易想象的，它是结合了当时权力的祭器。所以“尊有鼓者”和有鼓者又有特别的称号的记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在其他书上还读到：“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太平广记》）“黔南言溪桐夷僚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祈神鬼。”（《宋史》）汉族征服了僚族就要强迫他们缴出铜鼓：“南征夷僚……所获不可胜计，献大铜鼓。”（《陈书》）“克寨六十余……

得诸葛铜鼓九十三。阿大泣曰：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偕号称王。击鼓山岭，群蛮毕集，今已矣。”（《明史》）

读了这些史料，读者如果结合了上一节关于□兜氏族制度及神鼓的叙述，可能会和我们一样把铜鼓的起源联上现在还看得到的风俗了。算是一种推想和猜测也可以：“僚”族曾以神鼓的宗教信仰来支持他们族长（都老）的权力，神鼓因之成了宗族的象征。有了铸铜的知识时，造出铜鼓。在战争中，敌人要缴他们的铜鼓，表示屈服，所以他们在失败时，人走了，铜鼓就埋在地下。后来其他民族占了这地方，铜鼓被掘了出来，不知道有什么用，只成为普通的乐器了。我们这猜测如果能被今后的研究证实的话，可以从此了解到□佬族的祖先不但地域分布得很广，他们的社会形态很早已发展到氏族组织。再和我在前面所叙述的彝族社会形态联起来，那部社会发展史更为完整了一些。

在研究□佬早年的社会形态时，坐月的风俗也是值得注意的。坐月也称产公，在人类学里称 *couvade*。“广西太平府，僚妇生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其夫乃拥衾抱子，坐于寝榻。卧起饮食，皆须其妇扶持之。稍不卫护，生疾，一如孕妇。名曰产公而妻反无所苦。”（《子不语》）这一种风俗在世界各处已发现不少。据一部分人类学家的意见，这是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过渡期间发生的风俗。这风俗的意义是做父亲的用了这象征性分娩的行为来否定母亲和子女的系统，确立自己和子女的系统。这种风俗因之和氏族社会有密切关联的。将来史料更多，加上他们的传说和其他风俗，可能见到他们早期更原始的社会遗留。

关于□佬的历史现在还不免多属猜测性质。我把这些似乎很牵强的推想都写了下来，目的只在指出这里有很多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八、后 记

以上七篇对于贵州兄弟民族情况的介绍是我从贵州访问归来后写成的，3月中旬起，拉拉牵牵，断断续续地写到6月中旬止。如果没有《新观察》的编者按时的催稿，连这几篇也不一定能写成。在我著作生活中，这几篇是写得最仓促，也是最不畅达了，为的是经常被其他工作打断，没有一篇是一气写成的。这是件很苦的事。

但是另一方面，这几篇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却最多。首先，大部分材料是从访问团同志们那里得来的，写成了又经常得到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指正。在编辑这本小册时又有许多同志替我画图和整理照片。如果要分别举出姓名来道谢，就得把访问团第三分团全体的名单印出来了。这本小册其实是由我执笔的集体创作，只是因为其中有许多意见，尤其是有关历史部分，是我个人的，而且恐怕还是有问题的，所以应当由我个人来负责。

这七篇只是我原定计划中的前一部分，接着我本来打算再分开专题如政权建设、贸易、教育、文艺等来谈谈在贵州所见到的若干有关兄弟民族政治、经济、文教建设的问题。但是刚写完这七篇，又准备去中南继续访问工作，只能停笔，先把这一部分编出来，其他的留下等将来再说。

这七篇曾在《新观察》连续发表过，但是有不少错字，有些是原稿上就错的，也有些是排错的。还有一些地方，发表后我觉得应当修正的。在编辑时都曾校订了一遍。由于我实在没有足够时间充分考核材料和考虑问题，这七篇中难免会有错误。我诚恳地希望读者，特别是兄弟民族的读者，多多批评，使我们对贵州兄弟民族的情况能有更正确的了解。

我参加访问团八个月的工作是十分愉快的，不但和贵州兄弟民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贵州各地工作同志们间也树下了不会遗忘的亲密感情。至于访问团的同志们，我们已成了手足一般，只要一想起他们，就会使我奋发，使我对工作更有信心和勇气。让我把这本小册献给他们，作为半年多共同工作的纪念。

1951 年 6 月 16 日于中央民族学院

广西龙胜民族民主建政工作^{* 1}

龙胜在广西桂林之北，靠近湖南，住着侗（2.5万人）、壮（2万人）、瑶（1.5万人）、苗（1万人）及汉（2万人）等7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该地少数民族过去因受历代帝王及国民党统治的压迫，曾不断反抗。1933年大暴动失败，被屠杀摧残甚烈。解放前发展了游击队，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斗争，涌现出了一批民族干部。解放后，他们就成了主要的政权干部：县长、秘书和各区区长都是少数民族，而且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政权干部80%是少数民族。社会秩序安定，经过了清剿流匪、反霸和减租退押运动，群众觉悟已经提高，群众组织也比较健全。根据这些情况，广西领导上决定在龙胜进行民族民主建政工作的重点试验，我们访问团亦奉命协助，吸取经验。

民族民主建政工作要能顺利进行，首先须统一领导思想。这是一件新的工作，由于缺乏经验，干部思想上有顾虑。为此我们到桂林后，首先与该区地委开会研究这一问题，并结合该专区所遇到民族工作中的困难，介绍其他地区的具体经验，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建政工作就能更好地发动群众，解决困难。桂林地委遂决定派统战部长亲去掌握，对推动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把政策明白交代给群众，是做好建政工作的关键。我们趁群众来欢迎访问团的机会，在各种集会上把少数民族有权当家做主的话响亮地喊了出去。群众原本也有顾虑，不敢把急迫的政权要

* 本文系作者担任中央访问团副团长、广西分团团长时，所写的关于协助建立龙胜各族联合自治县的工作总结。

求明白地提出来，经此宣传就大胆了。我们又在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了详细的报告，告诉代表们各民族可以推选本民族人员做政府委员，在上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当家做主。代表们一听都兴奋地跳起来。瑶民代表说：“即使当不得干部，在县府当个伙夫也行。”他们在小组会上就热烈讨论什么样人才有资格做委员，纷纷提条件。会议经过5天，提高了代表们的政治认识，最后成立了筹备建政的机构。

为了发动群众参加建政，加强代表的群众基础，到会的代表和选出的筹备委员分别下乡去传达少数民族当家做主这回事。代表们都十分积极，翻山越岭，到处召集群众开会，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来宣传民族政策，影响就很广泛地扩大了，开会时领导上要求群众考虑一下他们的代表是否够条件，有没有更好的，“比一比”。这样把代表和群众的联系密切了起来。原来很多代表是邀请的，经这“比一比”，群众基础加强了。

和群众见过面的代表重回来，正式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听取政府工作报告，他们和以往不同了，讨论政府工作时提了意见，甚至大胆批评，到深夜还不肯休息，要求明天继续讨论。代表们说：“今天毛主席要我们当家了，什么都敢讲了。”

选举正、副县长和政府委员，更是紧张认真进行，各组分别打听候选人历史，比了再比；有个候选人10年前为生活所迫，偷了一只鸡，引起一场争论。另外一个候选人，代表对他不满意，主席团尊重代表意见把他撤换了，大家很高兴说：“我们的话算数了。”

群众和代表在建政中发扬了当家做主的精神；过去许多使干部发愁展不开的工作，豁然打开了。比如抗美援朝运动，代表们一听就通了：“美国鬼子来了，我们就当不了家。”大家认真商量怎么办，当场订立了爱国公约，内容：搞好农会，不要让坏分子钻空子；加强民族团结，大家要一条心，不闹意见；增加生

产，多多捐献，买了飞机大炮打敌人；搞好优抚，对军属烈属要帮助。踊跃参军，上前线去打鬼子。在开会期间就有 40 多人参加了军，代表们保证说：“要多少，有多少。”关于公粮负担，在我们初到时还有代表反映说太重了，建政后，他们说：“自己办事，没有钱怎成？”“我们不能专靠政府救济，应当加紧努力生产。”有人提议把我们带去的救济粮留下一半办合作社。政府成立后要挖河修沟，新当选的副县长首先带头下水，群众争着参加，不要工钱，只供给饭。他们说：“自家事，自己不干，谁干。”当家做主的思想变成了物质的力量，解决了问题，这一连串的事实教育了干部，“上了一次民主课”，群众一发动，力量是无限的。

民族民主建政加强了民族干部与群众的联系。起初有人以为龙胜已有很多民族干部，民族民主建政不过是“补块牌子”。其实有了少数民族干部并不就等于少数民族群众得到了政权。有的地方群众说得很爽直，“他们是大军带来的，替政府办事的。”事实确是如此，上级选拔的少数民族干部缺乏群众基础，容易脱离群众。经过群众推选就不同了，如果脱离群众，群众就会不再要他，因此处处得想到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和群众商量办事。所以这次龙胜虽则依旧推选原来的侗族县长当县长，但是大家说：“现在不同了，这回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龙胜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干部纷纷要求学习民族政策，自觉地要求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了。

原来，干部思想上对民族民主建政有顾虑，怕少数民族闹独立，不好领导。事实则相反，满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要求，他们就会更相信和更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们没有得到政权时，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虽则好，心里还是不放心，“现在毛主席对我们好，可是将来呢？”得到了政权，怀疑消除了，全心全意地跟共产党走了。跟共产党走，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为什么不

情情愿愿地跟呢？最明显的事实是他们对汉族干部态度的转变：过去多少存在着距离，“管我们的还是汉人。”但自己当了家，负了责，生恐事情搞不好，拉住汉族干部不肯放。汉族干部是帮助自己的，帮得越多越好，主动要团结汉族干部了。事事要请教共产党，共产党出的主意好。这样使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更有效。相反的，我们知道有个别地方，因为怕少数民族闹独立，不敢提区域自治，结果群众要求更激烈，自己去开会，怀疑政府，反而助长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

民族民主专政加强了民族团结。关于各族委员名额比例、县长和委员人选等问题，各族代表都相互协商，感情融洽。“弟兄间都不和，哪能当家做好主。”“自从盘古开天地，总是各顾各的，今天像一家人一样团结起来了。”会后白水村的汉族和瑶族把所得斗争果实分了一半——300元送给妙平村表示互助。各族代表都把自己的情况谈开了，隔阂也就消除了，因之他们说：“这次帮我们建立起了一个大家庭。”

龙胜建政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确是当前开展民族工作的关键。

1951年11月12日

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

广西有一种人自称为土人，或本地人，分布很广，除了东南角靠近广东的 10 多个县外，没有一个县没有土人。从桂林到南宁的铁路以西，土人在乡村中占主要地位，百色专区境内，土人占人口总数 80% 左右。以广西全省说约有 600 万土人，占全省人口 1/3。他们说土话，土话是广西通行的语言之一，在西部是民间的主要语言。会说土话的并不只土人，许多被称为客人的外来汉人也学会了这种话。土话又称壮语，依语言学的分类，和汉语同属汉藏语系，但是并不属于同一语族。壮语是黔台语族台语支中的一个分支。这是说壮语并不是汉语的一个方言，在文法结构及发音上都有相当重要的区别。说土话的土人中有部分承认是壮人，如桂北地区，特别是边地，如龙胜、三江一带和苗、瑶、侗杂居同被视作少数民族的地区。在土人占多数，社会地位较高，又有苗、瑶等人杂居地区，土人不承认自己和苗、瑶同属少数民族，而认为是“说壮语的汉人”。

广西的土人用他们的土话自称“布越伊”（Puyuei）或“布依”（Pu-yi）。“布”在壮语中是“人”的意思，布越伊即越伊人。他们又有若干支系：柳州一带自称“布壮”，龙胜一带自称“布叶伊”（亦称浑叶伊 hun-yiei），百色专区都安一带自称“布依”，田阳一带自称“布纳”，西隆一带自称“布友伊”。

这些自称“布越伊”的人虽则有一部分自己说是汉人，但是和外面去的汉人是承认有区别的；外面去的汉人称作客人或客家。因之，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布越伊是一个民族集团，至于最好用什么名称，还是问题。因为他们所说的话，一般常称作壮

话，所以我们在此姑称为壮族。

壮族是中国南方的一个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但关于这个民族的历史却知道得不多。我想提出一些材料和意见，希望对民族史有研究的同志们能多给我们些帮助，使我们对这个民族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壮族自称“越伊”人，使我们联想到古代东南沿海的“于越”人。广西的壮族可能就是这古代民族余留到现在的一部分。

自称“于越”的民族，在有历史记载之前已经定居于东南沿海一带；最北到达浙江。“越在蛮夷，少康之后，地远国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国。国史既微，略无世系，故纪年称为于粤子”。^①据当时的传说：“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得，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②“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③“无余都会稽山南故越城是也”。^④《竹书纪年》所称“于粤子”是指一种人，民族的名称。《吴越春秋》所称“于越”是指地名，传说中禹所葬的地方，茅山，据裴骃《集解》：“禹冢在山阴县会稽山上，会稽山本名苗山。”^⑤会稽在今浙江北部。《会稽记》所称“於越”是该民族的始祖名。合起来说明浙江北部在当时住着一种於越人。古书上，越和粤一直是通用的，因为都是用汉字来记音，当时为了要更近于该民族自己的发音，所以还带一“於”音。“於越”和“越伊”发音是很相近的。

①②③④⑤ 见《史记》。

到纪元前 5 世纪末，这个民族的势力渐长，和他们北面的汉族发生战争，纪元前 4 世纪初，在勾践的领导下战胜了吴国，自己称王，他们的势力一直达到淮河流域。“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① 大约有 200 年，被楚国所击败。“越以此散，诸族子孙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祖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

秦末汉初，纪元前二三世纪，越族分布在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和安南一带。在地理上，这地带是在南岭山脉之南和之东。南岭山脉西起四川、云南交界处，东经贵州，又沿湖南、江西南境，复东北延至绍兴、宁波一带，划分长江和粤江两大流域。川岳连绵，交通阻隔，汉族兵力是在纪元前 200 多年时才开始越过这山脉。秦始皇“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② 汉初，五岭山脉以北，今湖南、江西，当时长沙国境内还是“其半蛮夷”。^③ 这个山脉，在江西和广东交界处称大庾，最西称越岭，都可能是以当时居住的族名来称呼的。其中的都庞，据酈道元注，作“部龙”，^④ 与现今“布侬”音近，可能亦有联系。

五岭之东南几全系越地：福建一带是闽粤和东粤。“闽粤王无诸及粤东海王摇，其先皆粤王勾践之后也。秦并天下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纪元前 221 年），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粤归番阳令吴芮，所谓番君者也”——“番”音 Pu 指越族言，可能与今称“布”有关——“无诸、摇帅粤人佐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粤王，王闽中故地……孝惠三年……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号曰东瓯王”。后来闽粤和东瓯战，东瓯求救于

①② 见《史记》。

③ 《前汉书》，第 95 卷。

④ 《水经注》，第 39 卷。

汉，“汉兵未至，闽粤引兵去，东粤（粤与瓯通）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与众处江淮之间”（约在公元前143年）。闽粤又去打南粤，内部生变，汉立无诸孙繇君丑为粤繇王。公元前110年汉又发兵，把东粤和闽粤的人“徙处江淮之间，东粤地遂虚”。^①

广东的越族在秦末汉初，在汉人赵佗的领导下建立了南粤国，公元前195年汉朝承认了这一事实。那时南粤的都城称番禺（亦有以此普称该地区）。“颜师古注：番禺普安反，禺音隅。”^② Pu-yu 和壮族自称相同。其地称越。南粤之西是西瓯，“颜师古注：西瓯即骆越也。宋祁注：瓯於口反，骆越种也。”^③ 当在广西越南一带，和福建的东粤都称瓯，地隔几千里而自称相同。这许多同属越族的部落被总称为百粤。“百”可能亦系译音，是 Pu-yueh。百粤之地一直要包括现在广西百色专区的田阳。“田州古百粤地”。^④ 广西在汉代即置郁林郡，左江亦称郁江，也就是现在壮族聚居的中心区。现在的南宁旧称邕。郁和邕的音均与“越”、“伊”相近。

公元前1世纪汉灭南粤，广西越族的苍梧王跟着降了汉，越南的瓯骆40余万人也降了，到此，越族在政治上受到了汉族封建帝王的统治。但是越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汉族封建统治势力压迫下，反抗不断发生。后汉初年，交趾越族在征氏姊妹的领导下，占领了岭外60余城，公元43年汉光武遣马援远征，越族失败，“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寰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较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⑤ 可见该地人民还称越族。

汉以后，在中国境内，官方已经很少把越族看成“蛮夷”。

①②③ 《汉书》，第95卷。

④ 《明史》，第318卷。

⑤ 《后汉书》，第54卷。

《唐书》所载“南蛮”列传中川、黔、桂一带主要是“獠”。但在西南有一个称附国的是汉西南夷的后代，其东部有嘉良夷，其南有簿缘夷^①。簿缘夷与现在壮族自称相同。在桂西有一种被称为“西原蛮”的，他们分黄、韦、周、侬等姓。这几个姓到现在还是壮族的大姓。这几姓在8世纪中曾称王，合起来有20万人，占地数千里^②。到宋代，郁江上游的“广源州蛮”侬智高在11世纪建立南天国，曾从广西出击，一直到广州，宋派狄青出征，侬氏败，走大理国。现在广西西部靠近云南地区的壮人自称“布侬”，系“布伊”的一支。云南西部和广西龙川一带有侬人，自称侬智高之后。

壮人这个名称在正史上要到《元史》才见，但是宋代笔记中已有，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庆远南丹溪洞之人呼曰獠。”朱辅《溪蛮丛笑》：“五溪蛮皆槃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今有五：曰苗、曰瑶、曰獠、曰獠、曰迄獠，风声习气，大抵相似。”《元史》称“撞”。《兵志》：“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撞兵屯田。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黄圣许叛，逃之交趾，遗弃水田五百四十五顷七亩，部民有吕瑛者，言募牧、兰等处及融、庆溪洞徭撞民丁于上浪、忠州诸处，开屯耕种。”^③《林兴祖传》：“至正八年（1348年）特旨迁为道州路总管，行至城外，撞贼已迫其后，相去仅二十里。”^④这样看来，“撞人”是在湖广南部和广西北部。广西南部的土人不包括在“撞人”中，如势力较大的韦氏，即称韦番。推想当时自称“布越伊”的人还没有统一的汉名，而根据他们所接受的汉姓或支派的自称来分别称呼。我们现在调查柳州一带的土人自称“布壮”，当时的“撞”，

①② 《唐书》，第222卷下。

③ 《元史》，第100卷。

④ 《元史》，第192卷。

可能就是指这种人。但是到了明代，“獐”和“猺”并举为广西民族的总称了；如《明史·广西土司列传》一开始就说：“广西猺、獐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六十二山倚为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布於桂林、柳州、庆远、平乐诸郡县者，所在蔓衍；而田州、泗城之属尤称强悍，种类滋繁，莫可枚举。蛮势之众，与滇为埒。”^①在当时的记载中，“洞”和“獐”常常混同不分的，主要是黄、韦、覃、岑等姓。这些姓还是现在广西土人中的大姓。

我们在这里所抄录的史料并不是全面的，但是已足够说明现在广西自称“布越伊”的人，在这地区已有很长的历史，是当地的土著民族。这民族在2000年前分布地区比现在更广，主要在南岭山脉之南，沿海伸张到浙江北部。在2000多年中，沿海地区的越族没有退走的，已融合在汉民族里面。这个民族和汉民族的关系是很深的，而且是组成现在汉民族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中间还有一部分仍旧保持他们民族的语言，而且还用相当于早年自称的族名来称呼自己的民族，虽则也已经有一部分现在自认为是“说壮话的汉族”了。

二

这个民族自称为“布越伊”是什么意思呢？一般广西的壮人已不能答复这问题，我们在龙胜龙脊村工作时，王辅世同志搜集到该地壮族叙述民族来历的酒歌中有两句：

Kung Rin kung Pu Yiei（一公为壮公）

公 一 公 壮

^① 《明史·广西土司列传》，第317卷。

Yiei Na kau Pion Nguan(耙田到日中)

耙 田 到 半 日

第一句的 Pu Yiei 是指壮人，第二句的 Yiei 是指耙，一种耕田的农具。两字念起来前者是降调“叶伊”，后者是平调“耶伊”。现在壮人虽则不知道“叶伊”的意义，但“叶伊”和“耶伊”音同而调稍异，可能原是一字。歌中尚有 Pu 字在“叶伊”前，而现在该地壮人已自称“Hun Yiei”（可能系受自称 Gum 的侗族的影响）。Pu Yiei 可能是较古的称呼。所以 Pu Yiei 可以译耙人，即是用耙来耕地的人。

我们回到北京，把这个意义报告给很多同志们听。清华大学陈梦家教授根据他考古学的研究在他给我们的信上提出下面的意见：

“承告广西壮族自称为 Yiei，以为是‘于越’的对音；又据龙胜县龙脊村壮族叙史酒歌中，‘于越’是‘耙’地之‘耙’。查纪元前 3 世纪的《竹书纪年》称越王为‘於粤子’，纪元前 4 世纪的《左传》以及较早的《春秋经》称‘于越’或‘越’。越国所铸的剑（纪元前四五世纪）上的汉文作‘戉’。商代铜器中的戉作品等的形状是从石器的因发展而来的。铜器的戉是兵器，是从农具锄地用的石器变来的。吴越很古以铸剑名，这些民族之用青铜，至迟在春秋之世。”

以上所述，说明石制农器之戉如何变为青铜制兵器之戉，又说明越国之越本应作戉。这样也许可以助证壮族自称的“於越伊”与“于越”在古壮歌中的“耙”义相联系。我们还需寻找其他的例证来证明壮族与越族的关系。这种假定建立在一个尚不很确定的基础上，即是我国东南沿海（包括江、浙、闽、粤、桂一带）当新石器时代，曾经有一种土著民族。这种民族就其汉化了的一部而言，就是历史上的越族，就其在现在尚保持其民族特点者而言，或许即是今日的壮族。

龙胜壮族称耙为“耶伊”，从而推测壮族自称“布叶伊”是指用耙耕田的人。这种推测并不只是因为声音相同，而且是合于他们的经济特点，因为壮族一般都是以水稻为主要作物的。他们傍水而居，有些地方因之称他们作“水户”，原因是在他们种水稻。就是靠山很近的壮族，也并不上坡去发展杂粮，除非实在不得已才经营旱地。这个特点可以用来区别于苗、瑶。不但广西的壮族具此特点，和壮族属于同一语系的贵州仲家和云南傣（僈）族也是如此。更使我们觉得有意义的是云南傣族自称 Tai，而 Tai 的意义也是“犁”^①，和龙胜壮族自称“耶伊”相同。我们因此想到，“壮”、“仲”等音可能从“种”音得来的。

水稻起源地一般认为是东南亚，但是究系哪个民族的发明，还没有定论。我们且不说越族有可能是水稻发明者，但是在中国说，早年越族所居住的地区也正是我们很早就种植水稻的地区。《越绝书》：“摇城，稻田三百顷，在邑东南，肥饶水绝。”^②《史记》所引《地理志》：会稽山“上有禹井、禹祠，相传以为下有群鸟耘田者也。”^③所指耘田者是否系水稻固不敢断言，但是种植水稻的民族，对于水的需要一定特别大；历史上把越族称作禹之后，很可能是说禹是这个民族所崇拜的神话人物。会稽山上还有象征着这“水利之神”的坟和祠堂。

另一个可能发明或在中国传播水稻的民族是苗族。但是我们在贵州曾得到一些材料说明，进入贵州的一部分苗族早年并不知道种水田的。炉山的苗族还记得一种传说，当他们到这个地方时，这地方住着木佬（佬系僚，亦属台语系民族），苗族把木佬赶走后，不会种田，没有办法，不得不用了 70 个苗人去换 7 个木佬来教他们种田。直到现在种稻时一定要等木佬下了种，苗人

① 江应梁：《摆彝的生活文化》第 266 页。

②③ 见《史记》

才下种。另外有一个村子请来了两家木佬，每家苗人都要出谷子给他们，指导大家种水稻，解放之后还是这样。这些材料固然并不能概括一切苗族，但也是值得注意的事实。现在苗族在贵州和广西虽则也种水稻，但大都是以种杂粮为主，因为他们大都住在山地。

三

从语言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也有一些材料表示现在的壮族和曾经居住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古代居民是有渊源的（以下所引的主要根据罗常培先生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所做《关于国内各民族语言问题的报告》）。

壮语是汉藏语系黔台语族（以前称侗台语族）台族支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中包括广西的壮族，贵州的仲家以及仡佬、土佬、木佬等，云南南部的沙人，广东海南岛北部几县的黎族。这种语言的特征之一是有声调，而且四声各依声母的清浊分阴阳，成为八声。汉语的趋向是浊音的清音化，但吴语和湘语还保持着浊音。壮语的特征之二是元音的长短分做不同的音位。这在汉语中只有粤语有此现象。壮语的特征之三是韵尾辅音，汉语中只有粤语、闽语有此现象，瑶语亦同。这些事实表示吴、湘、粤、闽的几种汉语方言中还保留着壮语的影响。这影响可能说明在这些早年曾为越族所居住的地区，有一部分越人已和汉族融合，但仍部分保留了原来民族的语言特征，特别是发音的习惯。同时也助证了现在的壮族和古代曾居住在东南沿海诸省的越族在语言上是相同的。

四

语言系统相同的人并不一定属于一个民族，同一语系的人可以因历史条件形成不同的民族。但是从语言的同异上也可以追溯到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关系来。

和广西壮族同属一个语言分支的贵州仲家，自称“布伊” Pu-Yi，和壮族相同，而且壮和仲在发音上差别也很小。比较可靠的史料也说明，仲家是从广西进入贵州的。《贵州通志》：“狝家五代时楚王马殷（公元 930）自邕管迁来。”《明史》：“狝贼乃粤西猺獞，流入黔中，自贵阳抵滇，人以三万计，若以千四百七十计，分即为民，合即为盗。”^① 在地理分布上，黔仲和桂壮到现在还是连接的。仲家的中心是在贵州的罗甸、册亨、惕惶，即黔南盘江流域；隔江就是广西的西隆，我们曾去访问过。西隆的土人亦自称“布伊”，风俗习惯大体也相同。贵州仲家和广西壮族一般是傍水靠山而居，过去的地位是在汉族之下，苗、瑶之上，他们的社会经济形态也相同。只是因为交通不便，来往少了，有了不同的汉名，成了两个民族单位。将来交通方便之后，他们很可能会合在一起的。

仡佬、土佬、木佬现在人数都已经很少，散居在湘、黔、桂、滇一带。我在介绍贵州少数民族情况时曾称他们为“少数中的少数”。佬在古书上作“獠”。上面我们已提到，唐史关于“南蛮”的记载多称“獠”。当时僚族分布在川、黔、桂一带。我曾推测他们是铜鼓的制造者。这种铜鼓分布极广，南方一直到安南。据上面所提到的越国很早就有铸铜的知识，而且以铸剑得

^① 《明史·张鹤鸣传》，第 257 卷。

名。《后汉书·马援传》记着他远征交趾时：“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又引《广州记》：“援到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他搜集了越兵的武器来铸成铜柱。僚和越是有联系的。《新唐书·褚遂良传》：“帝大怒，命引去。武氏从幄后呼曰：‘何不扑杀此獠！’”^①遂良是杭州钱塘人，而称他为“獠”，可能当时是可以以“獠”来称“越”的。

台语支除壮语外，还有一个分支是台语。大部分在国境以外：阿含语曾流行于阿萨密，现在已消灭；坎地和掸语（傣语或摆彝语）流行于缅甸和云南西部；暹语和牢语流行于泰国和越南；吕语流行于云南南部；泰、侬、土等语流行于越南、广西南部 and 云南南部。这个系统的民族是中南亚的主要居民。我们在西南滇、桂国境上住着的也大多是这个语系的民族。广西龙州区的侬人、偏人，云南的傣人和僾人都自称 Tai。他们也都是种植水稻的民族。在地理分布上看得出是一个形势，就是他们环绕着云南的东、西、南三个方面，形成一个大的凹字。这凹字中间的缺口住着彝语系统民族，其分布从西康往南一直到达云南和越南的边境。这个系统的民族曾经在隋唐时建立过相当强大的南诏国。他西北面挡住了藏语系民族，东面挡住了壮语系民族。但在西部与南部却被台语系民族所挡住了。

和壮语同属黔台语族的黔水语支包括湘、桂、黔交界处的侗族和贵州南部的水家、莫家、惕惶等。水家自称“布水”，和壮族可能是很近的，因为在贵州、广西都有一部分侗、壮族被称为水户。侗族人数较多，三省合起来要在 50 万以上，这个民族就住在这三省交界处，并没有散居到其他地方去。在史书上称“洞”，常和僮相通用、或联用。侗自称 Gum，Gum 在壮语中是“洞”的意思。黔字古音就是 Gum，广东人还有这样读法。贵州

^① 《新唐书·褚遂良传》，第 105 卷。

称黔，广西的左江也称过黔江，现在还有黔江。他们可能是古代越族的一支，早先就住在黔南、桂北和湘西一带。但是为什么称“洞”呢？“洞”并不是普通的山洞，而是围在四面山峰中的一片较平的地，比一般所谓“盆地”要小一些，写作“峒”字比较恰当。这种地形在湘、桂、黔边区最普通，所以很可能是指住在这种山峒一带的人。这一带是森林地带，著名的榕江就在这地区里。侗族社会经济形态和壮族相似，也是傍水靠山而居，除种水稻外就以水运为生，特别是以放木排为专长。他们文化颇高，尤其是建筑很发达，有宫殿式的桥梁和鼓楼。

最后可以讲一讲史书上常和壮相并提的瑶。瑶在语言上是属苗瑶语族，同属汉藏语系。瑶族的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同称为瑶的许多部族，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可以有很多的差别。有些说着和汉族古语相似的语言，也有说着和壮语相似的语言。这是由于瑶族很分散，大多居住在高山上，四围都是其他民族，而且他们的传说中都记载着长期的流动、迁移，所以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很深。另一方面汉人对于很多住在粤、湘、桂一带山顶上的少数民族，不加辨别统称为瑶，于是被称为瑶族的人中间很可能有着原来不同的民族成分了。由于苗族与瑶族语言相近，一般可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苗族与瑶族在现在分布上表现不同的情况是：苗族还有比较大的聚居区，一在湘黔边境，一在贵州东南雷公山区。在这两个聚居区内，有着比较肥沃的水田，生活水平较高。瑶族分散在湘南、粤北和广西各地，一般都住高山，最大的聚居区不过两三万人，而且区内也常被高山分割，往来不便。他们以种杂粮为主，生活最苦。

苗、瑶的历史我们知道得很少。在上面叙述古代越族的历史时，有几处接触到了苗、瑶。古代传说中的会稽山原名苗山，又作茅山。这个传说可能是指越族曾和苗族在这一带冲突过，越族得胜了，改变苗山的名称来纪念这战功，而把这战功记在他们民

族传说中的英雄禹的身上。如果这个推测是事实，则当时苗族已在长江下游，被越族挡住了他们东向的路线。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闽越”这个名称。闽古音是门，man。苗族至今自称为 mon。粤东海王摇称东瓯，而现在的瑶族自称 Yiu，似乎又相近。汉立粤繇王，繇音摇。这些和瑶族是否有关是值得推考的。苗族与瑶族在早期可能是相同的。但是后来迁移路线不同，经过长期的分隔各自不同了。瑶族西移的路线大概是依南岭山脉，因为走的是山路，所以人口比较分散，力量单薄，不能把当地原有的民族赶走。只能在山上开荒，因此得到过山瑶的名称。而另一方面，苗族西走的路线是经过比较肥沃的地区，从湖南进入贵州，使他们还能保持比较大的集团，而且有足够力量把原在黔东南的僚族赶走，而占据其地。

瑶族和古代的越族及近代的壮族一直靠得很近。越族和壮族大体上在南岭山脉之南，南岭山脉正是瑶族的地区，所以他们常相接触，瑶壮因之常常并提。

1951 年 12 月 12 日

西南兄弟民族的歌舞

想起这一年多来我在各地访问过的兄弟民族，我首先想起了他们的歌和舞：

在炉山，一个满天星斗的夜里，我们被几个苗家的妇女紧紧地握着手，执着火把，一路送我们回去。我们话虽则说不太通，但是感觉到亲切体贴，因为她们的歌声把我们的感情扣得这样紧，语言已成为多余。她们从我们到她们家里喝酒时开始，你唱我唱，一直没有停；到了送行，歌声也更响亮了。我过去从没有参加过这样和洽舒畅的酒会，茅草屋里，围坐在一张矮桌四周，桌上热腾腾的大碗肉和菜，背后是一堆经常不熄的柴火，送来暖气；主人举着碗，唱起酒歌；唱完一首，把满碗的酒端到客人的嘴边，没有等客人说话，一倾手，酒就灌到嘴里了。接着是客人的歌声，客人碗里的酒也灌入了主人的嘴里。笑声夹杂在歌声里，一片热情，一场欢乐。送出门来，主人拉着客人，一面走，一面唱，一直送到你家里，站着还要唱。从月亮在东山头唱起唱到月亮到西山。

怎么会有这样多的歌，唱个不完呢？并不稀奇，我们遇见了亲切的朋友，话不是一样说不完么？他们以歌代话，也就是用歌唱来谈天。这一点我们起初还不很明白，后来才知道。他们只有现存的调子，没有现成的歌词。歌词是必须临时编的。想表达什么就唱什么，所以是等于说话，比如有一位苗家老太太到区政府看见了毛主席的相片，顺着她的感情就唱起来：

噢！你看哪！

毛主席，好福相，
红光满面多健康，
两眼有神看得远，
替我苗家作主张。

他们的歌是随口而来，尽兴而止。感情不来也就没有什么可唱。有时候，他们会很窘，比如我们要他们唱支情歌给我们听，他们没法唱，原因很简单，没有对象。又有时候，我们在会场上听到他们唱的歌太好了，会后约他们来录音，音是录下了，味儿却不同。对着机器唱歌可能是活受罪。

他们最普通的方式是“对歌”，就是互相对答式的歌唱。在龙胜的一个晚会上，我们邀一位侗族的妇女当众唱了一曲，她还没有唱完，观众里就有一个男子突然高声接下去。那位妇女侧耳听着，那歌声刚完，她又接上了。于是一个接一个，全场的精神都带动了起来。如果不是考虑到还有其他节目，这样可以一直对上一夜。有的地方两个村子对歌，轮班休息，一直对下去，对到哪一方对不下去才止。对不下去的就算输了，输了还要请酒。那天会上这位妇女是个有名的能手，对答得真快，聚精会神地越唱越有劲。

不论在苗家、仲家、或侗家，男男女女都得能唱一下；不像我们，不会唱歌，生活上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在他们，不会唱歌就吃不开。以贵州苗家说，青年男女得通过唱歌去结交异性。每年农忙完了，青年男子就结队到别的村子里去“摇马郎”。每到一村，就在村外的马郎坡上，噓噓地吹哨子。村里的姑娘们，盛装出迎，唱起歌来，男的对唱。唱得投机，各找对象谈情；谈情也是用唱歌的方式来谈的。嗓子好，词儿新鲜，感情热烈的也就容易找着对象。所以我常说：像我这类唱不上歌的人，如果是苗家的话，连老婆也会找不到的。

我们找他们做向导，一起在路上走，他们兴致来了，就一路唱山歌。有一次我们和一位县长在一起，向导就唱县长，唱他怎样替老百姓办事，又打趣他骑马骑不好，翻下鞍子啃黄土。唱得大家合不拢嘴。他们抬头看见山上有姑娘在耙地，就高声向她们唱起来，上面姑娘住了手，笑着和他们打招呼。他们的生活多轻松愉快。他们生长在旷野的山区，辛勤劳动，愉快生活，跳得起，唱得响。傍晚，火把从各条山路上向村子里集中回来，嘹亮的歌声，在山坳里震荡回复，使人感觉到安详健康，和大自然这样密切融洽，生命真可爱！

我又不能不想起他们的舞蹈：在贞丰，我被围在欢迎我们的群众里，几个男子吹着芦笙，两个妇女端起旁边两个小板凳，按着节拍，跳起舞来，“一起跳呀！”我也就卷入了这舞浪中。步伐似乎并不复杂，一、二、三、跳，是四拍。可是这劲儿可凶，一批一批的人被卷进去，不像我们的交际舞，听着音乐，默然的两个两个地跳；而是群众性的，热闹的，你跳，我跳，大家跳，像是有传染性似的。很多人都跳了起来。谁要停就停，人家还是在跳，停一息，还可以再跳。和他们唱歌一般，舞蹈是感情有节奏的流露。

这种群众性的舞蹈大多是在节日群众集会上举行的。虽则是群众性，随时可开始，随时可停止，但是一般说还是很有秩序的。在苗家，大多是男子吹乐器，边吹边舞，女子排成行，按着节奏跳。如果从步伐来看似乎是很简单，变化也不多，但是因为群众性的，所以参加的人，越跳越有劲，月夜可以跳上一夜都不停。

在爱好歌舞的兄弟民族中，歌舞是和群众接近的最好方式。这是我们的经验。比如在龙胜的一次宴会上，他们开始唱酒歌来歌颂毛主席时，我也接口对了一首，嗓子不用说是不太像个歌，词儿他们也不全懂；但是当我端着酒，这样一唱，大家欢腾起

来，一个接一个地唱开了。我想如果我也是个歌唱的能手，宣传的效果会多大呢？后来我常常鼓励我们文艺组的同志们，跟他们唱，对不上，唱唱也好。舞蹈也是如此，当我们访问团的同志和他们拉着手一起跳的时候，大家才真的感觉是一家人了。

访问团的文艺组对宣传民族政策和促进民族间友爱团结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语言不通或不太通的群众中要传达感情和思想，用讲话的方式是很别扭的。因之，我们不能不着重用形象、动作、音乐等文艺形式来帮助我们的宣传。最成功的是通过他们熟悉的文艺形式。最初，我们带去了一些节目，主要是汉族的歌舞。在兄弟民族中表演时，他们很喜欢。问为什么喜欢呢？说是新鲜，没有看见过，红红绿绿地穿得美。但是唱些什么却不明白，只是很好听。有些像《东方红》等一类歌曲在兄弟民族中已经有很多青年和儿童们会唱，唱得也很入调，可是有一次我在三江，问几个侗家姑娘，《东方红》是什么意思，她们笑了，就没有人对她们讲过，只是这声音好听。后来，我们文艺组学会了他们的歌，用他们自己唱的词，穿了他们的服装，上台一唱，群众的反应就不同了。比如我们在贵州龙里搜集到杨老太在农代会上唱的歌，加以整理编制，回到贵阳在省农代会上唱出时，每唱一句，下面就一阵像雷一般的掌声。唱完了，全场轰了起来。“好呀，这是我们的呀！一点不差呀！我们回去得办好农民协会呀！”

又像我们的《民族团结舞》，包含有各个民族的舞蹈。在贵州镇远表演时，苗族舞刚上场，坐在我身边的一位苗家妇女，一看台上的苗家没有戴银项圈，立刻把自己的项圈摘下来递给我，示意要我送上台去，她很急的样子。我明白她的意思：因为她觉得台上在表演的苗家就是她自己，一定要以最美的姿态出现在群众的面前。我就跳上台去当场把银圈加在演员的项上，她和其他的苗家，高兴得拼命鼓掌。当台上各民族联合在一起跳时，他们

也感觉到自己参加了这温暖的大家庭。舞完了他们拉着我的手不放；台上的感情流到了他们的手上，也热烈地传到了我的手上。

我们在广西大瑶山帮助瑶山里各个派系订立了团结公约，立下了新石牌。原来瑶山里有两种瑶族，一种先来的，自称长毛瑶，占有了山、地；一种后来的，称过山瑶，没有土地。受反动派挑拨，两派间意见很深，过山瑶开垦、吃水都没有自由。解放后，人民政府领导他们团结起来，宣传民族平等，开了代表会，两派协商，取得了大家的同意，过山瑶开垦种地得到了自由，立了团结公约，用他们民族原有的形式，刻在石牌上，称作新石牌。我们访问团参加了这“盘古开天地”以来没有过的团结大会。为了要扩大影响，巩固这公约，在几天里我们的文艺组编下了一个短的歌舞剧，在大瑶山里，一路表演。山内大多数的群众都见到了。“从此要团结了，瑶汉一家亲，瑶族兄弟要友爱。”这种教育胜过了几百遍的演讲。因为他们“看见了”新石牌是怎样订立的，领会了订立时的感情内容。

这些经验说明了：文艺是可以，也应当为人民服务。当文艺和群众真正结合时，也发生了力量，为人民带来了幸福。

1952年1月1日

学习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开国以来，在民族政策方面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近三年来，各少数民族实现了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事业逐渐地显著地发展了起来，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对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府，日益增长着无限的热爱。在历史上出了一个具有 5 亿以上人口、60 以上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这证明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而为包括各少数民族代表在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是伟大的，是完全能恰当地解决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学习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也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

共同纲领在总纲里首先确立了民族平等的原则，在第九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又在第六章民族政策的开始重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民族平等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新的事实。过去几千年是民族压迫民族的历史，各民族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为什么过去民族不平等，而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了，民族压迫时代会改变为民族平等时代的呢？

民族压迫是和封建主义及帝国主义分不开的。

在封建社会里，依靠土地来剥削劳动的地主阶级，为了要扩大他的剥削对象，既要兼并本族农民的土地，也要兼并其他民族所占有的土地。要说明这种过程，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在贵州黔东南苗区我们曾看到过一种历史事实：在不同的借口下，清代的官兵向苗区发动进攻，经过了或长或短的战争，人数少、武器差的苗族给打败了。苗族人民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农田被没收了。这些土地照例地“赏”给驻扎该地的官员们，他们成了官僚兼地主。他们经常利用权力，兼并苗族所保留的土地，强迫他们服役，纳税纳租，加上高利贷、敲诈、豪夺，进行残酷的剥削。过了一些时候，这些官僚地主，豪华腐化，萎靡堕落；而另一方面，勤劳勇敢的苗族人民，积聚了力量，逐步地恢复起来，到一定的程度，起来反抗了。这些腐化的官僚地主，被杀的被杀，跑的跑，躲到城镇里，向保障他们利益的政权告急：“苗子疯了。”于是，官军又来了，战争再起。一般说是“三十年一次小反，六十年一次大反”。经了长期反复的斗争，最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仍发生过这一种性质的反抗。所以，黔东南苗区，特别是靠近汉区的地方，苗族人民自己保留住的土地已经不多。

在广西北部森林区的三江有一家姓廖的汉人，据说到该地只有几代，倚靠官府势力，强抢豪夺，把县区南部一带山地的森林大部霸占了。他曾经自豪：“你要数得清牛身上的毛，才能知道我有多少杉木。”当这个汉族恶霸被枪决时，几千苗族的农民赶来开枪庆祝，因为和牛身上的毛一样多的杉木原来都是他们所种的。

封建统治者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的，他们用武力来掠夺其他民族的土地，利用这些土地来进行剥削，而且以武力来维持这种权力，因此造成了民族间的不平等。这也说明了民族压迫本质上就是阶级压迫。封建地主对待其他民族的人民，本质上和对待

本民族的人民是一样的。但是在他们要对其他民族进行剥削时，他们必须先击破民族性的抵抗。他们得征服其他民族原有的政权，然后才能统治其他民族的人民，成为其剥削对象。因此这种阶级压迫是以民族压迫为前提，被压迫的人民所首先感觉到的也是民族压迫。

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也必然会发生民族压迫制度的。资本主义初期，在单一民族的国家里，民族压迫的问题虽则暂时可以不发生，但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就出现了民族压迫制度。“这时，资本主义为了寻求销货的市场、原料、燃料及低廉劳动力，这时资本主义为了争取资本的出口与主要铁道和航线的保证，乃越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力谋侵略辽远的及附近的邻国，以扩充自己的领土。”^①“帝国主义如对不平等民族和殖民地没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奴役，那它是不能存在的。”^②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民族问题，更加扩大，归根结底，与关于殖民地的总的问题汇合而为一。而民族的压迫遂由国内的问题变为国与国间的问题，变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为征服弱小的不平等的民族而斗争（而进行战争）的问题了。”^③

我们中国近百年来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民族关系上多了一种压迫。帝国主义者曾不断地利用各种阴谋毒计，来挑拨我们国内各民族间的感情，制造和扩大我们国内的民族仇恨，这也是过去中国内部民族纠纷的主要根源。这种帝国主义的压迫是国内各民族人民所共同的，但这并没有改变原来国内各民族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封建统治者宁愿在帝国主义面前出卖国家和民族的

① 斯大林：《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迫切任务》，见《论民族问题》一书，东北书店版，第33页。

②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的提法》，同上书，第45页。

③ 斯大林：《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迫切任务》，同上书，第23页。

利益，而不肯在他所压迫的各民族人民面前作丝毫让步。所以，代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压迫却变本加厉。蒋匪根本否认国内各少数民族是民族，多方面进行同化政策。更利用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及经济上的弱点，进行惨无人道的敲诈、勒索和压迫，比如强迫种植鸦片，用极低的价钱垄断少数民族地区的土特产，以致很多地方的少数民族经常要靠掘草根充饥。有许多地方的少数民族起来反抗，又遭受了现代武器大规模的屠杀。我们亲耳听到许多少数民族人民诉苦说：“如果再不解放，我们快完了。”

民族不平等，并不是偶然的。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和近百年的帝国主义侵略，使我们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怎样才能取消这种民族压迫制度呢？斯大林说：“在资本统治、生产手段私有制及阶级存在之下，民族的平等是不能够有保证的，资本的权力存在一天，占有生产手段的斗争存在一天，则民族的任何平等是不能够有的，同样，各民族劳动群众间的合作也是不能够有的。历史告诉说，消灭民族不平等的唯一方法，建立被压迫与非被压迫人民劳苦群众亲密合作制度的唯一方法，便是消灭资本主义，建立苏维埃制度。”^①

我们中国的历史又一度证实了这个真理。民族平等能在中国出现，很显然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反动统治，消灭了封建主义，赶走了帝国主义，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本质的改变，才实现了民族关系上的根本改变。这样才有可能把民族平等原则变成了现实。

^① 斯大林：《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迫切任务》，见《论民族问题》一书，东北书店版，第35页。

二

我们已经说过，民族压迫本质上就是阶级压迫，某一民族的反动统治获得了支配各民族的统治权后，对各民族人民，包括他自己所属的民族在内，是同样进行压迫的。以国民党反动派来说，当它统治中国的时候，汉族人民和国内各少数民族是一样受到压迫的。所以各民族人民的敌人是相同的，命运是共同的。但是历史上却存在着民族仇恨，各少数民族人民常常认为压迫他们的是汉族，当他们反抗压迫的时候，也常常把汉族人民当作复仇的对象，爆发成民族间群众性的相互杀戮。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剥削阶级总是占少数的，以少数人来剥削多数人，他们必须自己武装起来，同时也必须设法使拥有多数的被剥削者分裂成为对立的集团，模糊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相互抵消力量，防止他们团结起来反对自己。民族的区别常成为这些反动统治者所利用来分裂被剥削者的借口。

反动统治，不论是封建主义或是帝国主义，没有不宣传各种企图分裂各民族人民团结的理论。从我们古代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直到德国法西斯的“民族优越论”，都是为这个目的而服务的。反动理论所要起的作用是在群众间制造支持其对弱小民族侵略的行为，使各民族人民间发生隔阂，甚至仇视，使同是被它剥削和压迫的各族人民不能团结。这是大民族主义的基本意义。在我们中国的文字中，很早就用犬字旁加在其他民族名称上；并且尽力地宣传各少数民族的野蛮，而加以侮辱；把自己的风俗习惯视作是文明人的标准，凡是有异于这标准的都看成是野蛮的表示。这些大民族主义的思想把少数民族的人民孤立了起来。当反动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人民进攻时，大民族的人

民受了这种思想的支配，视作当然，至少也会觉得事不关己，不加支援了。

少数民族受到侵略和压迫，由于侵略者利用了民族的旗帜，不易发现这种压迫的阶级本质，把压迫民族全体，包括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律视作敌人。对敌视的民族怀恨在心。但是在力量对比的悬殊下，他们只有尽力地避免和仇人见面。比如受到武力压迫最深的苗族和瑶族，很多就逃入深山。有一次有一位苗族同胞和我说：“除了盐，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你们汉族能不来搞我们，就成了。”在他们的心理上发生了愈隔绝愈安全的想法。这是惨痛经验中得来的教训，在强大侵略性的封建帝国内求生存，不得不如此。但是这种想法也引起了排斥一切外来的东西，安于闭塞，保守不求进步的狭隘性。少数民族本身的特权阶级也就利用这种排外、保守的狭隘性来保障他们自己的地位，阻碍民族的进步。这就是狭隘民族主义。

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是民族压迫制度下的孪生子。在民族压迫制度已被取消的今天，已不应当再存在了。但这种思想却还有它的残余的影响。就是在苏联，1930年斯大林还警告说党内存在着这种“跛脚的倾向”。他说：“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之下，大俄罗斯排外爱国主义倾向的实质是在什么地方呢？大俄罗斯排外爱国主义倾向的实质，就在于企图回避语言、文化、风俗的民族区别；就在于企图准备取消各民族共和国和区域；就在于企图破坏民族平等的原则，并轻视党对机关、出版物、学校，以及其他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民族化的政策。”“犯这一倾向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是：因为在社会主义胜利之下，各民族先要合并而为一，而他们的民族语言，定要变为一个统一的共同语言，所以消灭民族差别，放弃帮助从前各被压迫民族发展本民族文化政策的时候已经到了”——这种倾向斯大林称之为“大俄

罗斯民族主义最精巧因而也是最危险的一种形式”。^①

斯大林又说明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实质，“就在于力谋孤立起来而闭关在自己民族的外壳以内，就在于力谋抹杀本民族内部所有的阶级矛盾，就在于力谋用离开社会主义建设总流的方法保护自己，以反对大俄罗斯的排外爱国主义，就在于力谋不看见那使苏联各民族劳动群众接近并联合起来的東西，而只看见那可以使各民族彼此隔离的东西。”“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反映着从前被压迫民族中正在死亡的各阶级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不满意，反映着这些阶级要分立而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在这里确立自己阶级统治的企图。这一倾向的危险，就在于培植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削弱了苏联各民族劳动群众的一致，而作了国外武装干涉者的玩具。”^②

以上引语中的“大俄罗斯排外爱国主义”即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即狭隘民族主义。斯大林针对革命成功后苏联情况所作的结论是值得我们警惕的。这种“跛脚的倾向”是会阻碍民族团结的，那也就是有害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因此，共同纲领第五十条所规定：“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是完全正确和切合实际情况的要求的。

三

民族团结是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基本精神之一。除了反

①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方面的各种倾向》，见《论民族问题》一书，东北书店版，第172～173页。

②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方面的各种倾向》，见《论民族问题》一书，东北书店版，第178页。

对阻碍团结的思想行为外，积极方面怎样去促进和巩固民族团结呢？

中国各民族人民长期受到共同敌人的压迫，命运的一致，是民族团结的基础。但是我们却不应当低估了由于长期民族压迫和大民族主义的宣传所引起的民族之间的仇恨。这种感情时常是深刻，而不易于用讲理的方法来说服的。事情是很清楚的，如果有两个人，心里有仇，对方即使有老实话也不会轻易相信，总是会用各种坏心思来猜测一番。我们国内有一些少数民族人民对汉族就抱着这种怀疑。我们必须把这种怀疑看成是很自然的，而且是过去反动派造下的遗毒，不应当因此就批评少数民族狭隘。同时也必须时常警惕着这事实，而努力去消灭这民族团结的障碍物。

怎样去消灭这个障碍物呢？首先是要大家能见得。过去是见不得的，现在必须多见见。多见面，大家的印象才能改变过来。这是搞好民族团结的初步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就派遣访问团代表毛主席到各民族地区去；又请了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到北京和各大城市来参观。人来人往，不绝于途。

很多住在山里几十年不敢出来的少数民族，听说了毛主席关怀少数民族，不准人欺侮和瞧不起他们，还是将信将疑，只是一种传闻。听说毛主席派人来了，他们爬山越岭地要来看一看“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的一件大事。一看果真不错：他们和代表们握了手，甚至拥抱了，喝了酒，还带了毛主席所送的礼物和相片回去，这样才相信了。一旦相信了，感情完全不同了：像是见到了红太阳，心底里发生了温暖。老年人摸着孩子们的头，皱纹纵横的脸上，放开了笑容，从此有好日子了。他们感激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以汉族人民来说，过去受了大民族主义的蒙蔽，心里多少有一点觉得少数民族落后、野蛮。但是一看到他们的代表，一看到他们优美的歌舞，才真的感觉到是兄弟般的友谊。在北京的人

民，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路上见到少数民族，不再是用好奇的眼光来看了，而总是用亲密的关切来对待他们。少数民族学生们说，毛主席比亲生父母还关心他们，在中国任何地方都像是在家里一般。

民族间每个人感情的转变才使民族团结具体和亲切，共同纲领中所说的“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才有了丰富和亲切的内容。

少数民族热烈爱戴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已成了不可动摇的事实。但是少数民族心底里是否已经安了呢？我们在贵州苗区一次座谈会里就遇着过这一类的问题：“毛主席、解放军、人民政府都好，再不感激那是没有良心了，但是以后是不是一直这样好呢？有什么保障呢？”这种思想在贵州的一个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里也很普遍。在我们觉得这问题在理论上是不难解决的。我们一再说明，民族压迫是反动统治所干出来的罪恶，人民得到了政权就不会再发生这种违反人民利益的事了；但是这并不是说理的问题，少数民族要求的是具体的保障，就是要真的感觉到这个政权是自己的。我们说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里就有少数民族的委员，他们听了很高兴，但是不认得，不亲切。后来训练班里有一个学生接到自己家乡来了一封信，信封上有个凯里区苗族自治区筹备处的章子。这一下就传开了，我们反复讲理而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容易地解决了。“我们有了自己的政府，还怕什么呢？”这是很重要的。以往人民政府是好政府，现在人民政府是自己的政府了。少数民族不但在大家庭里感觉到温暖和安全，而且自己有了个家，在自己家里感觉到舒服，踏实；也因之对大家庭更热爱了，民族的团结也牢不可破了。

这就是共同纲领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条文是这样的：“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

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这“民族的区域自治”，李维汉同志说：“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已受到了各民族人民的热诚拥护。内蒙古自治区和其他民族自治区的经验证明，这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钥匙。”^①今年8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于这个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有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我在这里不拟多说，将另外作专题学习。

四

斯大林曾经指示我们，阻止以前被压迫民族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因素中，有一个就是历史上承继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他说：“我们虽已宣布了法律上的平等，并且正在实施着，但法律上的平等，本身虽在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史上有极大的意义，但从它到事实上的平等，仍相距很远。形式上我们联邦内一切其他先进的民族所有的一切权利，一切落后的民族与部落都应有尽有。缺点是在于有些民族没有自己的无产者，没有经过甚至还没有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文化上可怕地落后，完全没有力量去享受那革命给予他们的权利。”他又说“这是一切不满意和一切摩擦的基础。”^②

这是说要各民族真正地团结起来，单是在法律上规定民族平

① 《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见《人民日报》1952年8月14日。

② 斯大林：《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因素》，见《论民族问题》一书，第83~84页。

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由于长期民族压迫的结果，很多少数民族在文化及经济上还处在比较落后的状态，他们无法像先进民族的人民一样享受法律上所规定的权利，在事实上还存在着不平等。如果不在事实上帮助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起来一道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还是会发生困难的。这里我们遇到了共同纲领民族政策中的另一基本精神，就是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原则。共同纲领第五十三条中这样规定：“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国内的少数民族，大多到现在还没有他们自己的文字。过去大民族主义是反对各少数民族发展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的。反动统治最怕是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反抗它，而民族语言文字是巩固民族本身团结的重要工具。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进行过强迫同化的政策，禁止他们公开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说话，又强迫他们接受汉化。我们今天的政策和这是完全相反的。共同纲领规定了：“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那么，在事实上各少数民族是否有能力来享受这种自由呢？有许多少数民族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他们要发展他们的文化教育，如果没有文字这一种工具，显然是极困难的。创造文字又需要一定的科学知识，很多少数民族自身还没有具备这种条件。那怎么办呢？这里就需要人民政府的帮助了。我们必须动员具有语文科学知识的专家，深入各少数民族群众，去帮助他们创造文字。现在的人民政府已在这样做了。

再说经济建设：广西北部少数民族地区正是最适宜于植林的山区，过去这地区所出的木材是出名的。但是这一带山地出产粮食很少，他们只好把砍下木材的地方，开荒出来种粮食。山地上长粮食是很不经济的，但他们却不能不这样干。总的说来，对我

们国家的经济是一个损失。这里，人民政府的帮助也成为必要的了。比较长期的投资，不但解决了少数民族的灾荒的威胁，而且也开发了一个国家的很重要的富源。其他像贸易问题也是很显然的例子。少数民族的山区里有很多富于经济价值的土特产。过去由于垄断资本的压价收买，使很多地方的少数民族不愿去经营土特产的培植和搜集。现在通过等价交换和大力沟通少数民族供销的贸易政策，很快地提高了土特产的价格，改善了少数民族的生活。

卫生工作上也是如此，少数民族过去受到疾病的摧残是惊人的。有些民族由于传染病的猖狂蔓延，使他们人口逐渐下降。现代医学知识对于这些疾病都是有了医治和防止的可靠办法，但是要少数民族自身发展其卫生工作那是有困难的，所以需要人民政府有计划地帮助他们，而这种帮助的效果是已经很显著的了。

我们在这里只是随意地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是需要人民政府的帮助的。同时也说明了少数民族只有团结在民族大家庭之内，才能很快地发展起来。人民政府凭什么力量来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呢？实际是用先进的汉族的生产力来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在这大家庭里没有这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汉族，少数民族是不可能很快地发展起来的。

过去有很多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没有认识到压迫他们的是各统治民族的统治阶级，因此对于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汉族总存有一些戒心。我记得有一次在少数民族座谈会上曾经有一位代表说：“你们汉族老大哥得等我们一下，不然，我们总是落在后面，平等不上。”但是当他看到了人民政府怎样具体地帮助他们，才醒悟过来，汉族经济愈发展，各民族事实上平等的日子也愈接近。也因为看到了我们命运的相同，更感觉到各民族原是一家人，每个民族的进步都是各民族共同的利益。

人民政府以汉族的生产力来帮助各民族发展起来是不是一种

对各少数民族的偏爱或恩赐呢？完全不是的。斯大林曾明白告诉我们：“没有这种帮助，就不可能使各民族和人民的劳动者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之内实行和平共居和亲密合作，而这种和平共居和亲密合作，却为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所必要的。”^①

我们更要知道，我们国内各少数民族正分布在辽阔的国防线上，正居住在具有丰富工业原料的山区。少数民族离开大家庭，就容易成为帝国主义所玩弄的对象。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没有了少数民族的亲密团结，也会处于易为敌人侵略的危险境地。少数民族没有汉族人民生产力的帮助，他们的经济必然会长期滞留在落后的状态，汉族没有少数民族兄弟般的友爱合作，也就会在从变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发展道路上受到限制。

各民族经济文化上的发展是民族团结的保证，而民族团结也是各民族在新民主主义总轨道上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总轨道上发展下去，才能达到各民族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胜利地解决了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的中国民族问题，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它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它的内容是极端丰富的，而我们初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所得到的体会还是不免于肤浅和片面。我们只有更深入地在这伟大政策的实践中，不断地加强学习，才能更接近于这光辉的真理。

1952年10月1日

^①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的提法》，见《论民族问题》一书，第46页。

关于黔西民族识别工作的参考意见

—

民族压迫制度消灭后，获得了平等的少数民族纷纷公开他们民族身份，要求把他们的民族名称列入民族大家庭的行列。这次普选中自报的民族名称据称有 400 多。这 400 多个自报了民族名称的单位是否都能认为是单独的民族呢？其中有些是有问题的。

发生问题的有下列各种情况：

（一）有些汉人迁居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保留汉族的特点，但是不知道自己是汉人，以附近少数民族称他们的名称作为自己的民族名称，报上来之后，被列入少数民族行列中。例如云南和广西的“蔗园人”。

（二）迁居到少数民族地区去的汉人，前后有若干批，时代不同。早去的汉人，曾经长期和内地隔绝，受了少数民族的影响，和后去的汉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有一定的区别，并且受到后去的汉人的歧视，不把他们看作汉人，因而他们自认和汉人有区别，解放后，要求成为少数民族。“过去民族压迫时被当作少数民族，现在少数民族受到照顾时又不被当作少数民族了”，心里不服。例如广西的“六甲人”。他们是否可以认为少数民族？

（三）有些少数民族在民族压迫时代曾经不愿表明和汉人有区别，又有一部分上层受反动统治的利用统治过当地的其他少数民族，在这些被他们统治的少数民族看来他们是和汉人一起的。

解放后，有关的其他民族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例如湘西“土家”。他们是否要认为少数民族？

（四）历史上，有些民族曾经被打散，各自迁移。在迁移过程中，有些又和汉人发生结合，受到很深的影响，改变了语言，民族特点已不显著，经济上和汉人已分不开，但是受到歧视，居住上不和汉人相混，心理上和汉人有隔阂，自认为和汉人不同的少数民族。例如福建、浙江等省的“畲民”。他们是否可以认为是少数民族？

（五）原系一个少数民族，但是迁移到不同地区的各部分，基本上保留着相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历史传说，但是长期隔离，互不往来，经济上没有联系。他们被其他民族用了不同的名称相称（虽则他们的自称基本上是相同的），报了不同的民族名称。例如云南“阿细人”、“撒尼人”都是彝人的系统，是否要分别成为单独民族？

（六）有些不同民族成分的集团进入了同一的或相邻的地区，被别族用同一名称相称，也就认为是一个民族，但是语言、风俗习惯上还是有区别的。例如“瑶人”。他们是否可以承认是一个民族？

（七）有些民族不在一个地区的各部分，分别受到不同民族的影响，因此各部分对于自己系单独民族还是系另一民族的一部分这一问题意见不一致。例如东北的达呼尔人。他们是否可以承认是单独的民族？

上面所列举的各种情况归纳起来是两类的问题：

1. 他们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
2. 他们是单独民族还是其他民族的一部分？

研究这些问题就是民族识别工作。

二

我们是根据历史唯物论来研究民族识别问题的，只有深入领会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民族识别时首先要从理论上明白“民族”的意义。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给民族的定义是这样的：“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又说，“必须着重指出，把上述种种特征中任何一种特征单独拿出来，都不足以作出一个民族的定义，而且，只要这些特征中缺少一种特征，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了”。

在《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中，斯大林说：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在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的时候，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团结起来，这就是所谓“近代”民族。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民族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民族市场，还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也没有民族的文化中心，因而还没有那些消减某个民族经济的分散状态和把这个民族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因素。

当然，民族的要素——语言、地域、共同的文化等等——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地创造出来的。但这些要素当时是处在萌芽状态中，更多也不过是将来在某些有利条件下可以形成为民族的一种潜在

力，这种潜在力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并具备有民族市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时期才变成了现实。

斯大林又说：

但是世界上也还有另一种民族。这就是新式民族，即苏维埃民族，这些民族是在俄国资本主义被推翻之后，在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政党被消灭以后，在苏维埃制度确立以后，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基础上发展和形成的。

工人阶级及其国际主义的政党，是团结和领导这些新式民族的力量，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残余和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而在民族内部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为了各个民族及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由发展而消灭民族压迫的残余；为了确立各民族间的友谊和确立国际主义而消灭民族主义的残余；在反对侵略及侵略战争的政策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一切被压迫的和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这就是这些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政治面貌。

这种民族应该评定为社会主义民族。

三

学习了斯大林民族问题的理论，结合到我们当前的民族识别工作，我们首先应当注意不要简单地从任何一个民族要素——语言、地域、共同文化等等——来断定某一种人是汉人或不是汉人，断定他们应当成为一个民族或应当分成若干民族。

是不是讲同样话的人就是一个民族呢？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这样的，不是说讲同样话的人就都是一个民族。马

克思主义认为，讲同样语言的人，可能是各个不同的部族或民族。美国人和英国人讲的是一种语言，但不是一个民族；挪威人和丹麦人讲的是同样语言也是两个民族。我们国内汉人和回人讲同样的话但不是一个民族。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民族讲两样语言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告诉我们，共同语言这个民族特征是指一个民族的人必须是说一种语言，虽则他们在方言上，在一定时期内还可以是不同的。

仅仅有了共同区域也不能就说是一个民族。斯拉夫族在最初的时候就生活在同样的区域上，但那时并没有形成俄罗斯民族。把这些人们组成一个民族必须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才行。这种力量就只是经济力量。但并不是任何一种经济都能够起这样作用，只有资本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才能起这样作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最初能使人们成为民族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所以民族的形成首先是资产阶级民族。生活在各个不同地方的人们，通过各个地方的市场，组成全国统一的市场，把生活在一个土地上的人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就必须有统一的语言。因而不同的方言在一起慢慢发展，出现了一个比较普遍的语言，形成为统一的民族语言。

识别工作中也有强调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我们首先要说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并不是民族特征，但是和表现为自己特殊文化的心理素质有关。我们的体会是这样，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状态是表现在他们共同文化上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民族的文化有他们不同的风格，最显著的是他们的艺术。各民族的文学、歌舞、建筑都是具有民族风格的。我们可以一望而知这是维吾尔的舞蹈，不是苗族的舞蹈。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具体表现也受着民族风格的影响。但是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是常常在民族间传布的。如果我们挑选某些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上的相同或相异来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那就会出错误。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是应

该详细调查的。因为他们可以提供历史的线索，而且一般人常常强调某些和其他人不同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来表示自己一种人，和别种人不同，那是民族共同心理的表现。我们不能忽视的。

四

我们进行识别工作必须从民族要素出发来研究。但是应当注意斯大林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民族还没有形成，这些要素还处在萌芽状态中。我们现在要进行研究的对象，事实上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的，它们并不是“近代”民族。我们如果以“近代”民族的特征去要求它们，或是采用“近代”民族的特征去衡量它们，那就不切实际了，文不对题了。

资本主义时期之前的人们共同体并不具备民族的特征，所以在科学上也用不同的名词来称它们。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人们形成的共同体是氏族、部落；在原始公社制度向着奴隶社会，向着封建社会过渡时，各个不同部落联合成为一个部族。

一个部族已经具有萌芽状态中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表现为特殊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三个特点在封建社会时就已经存在了，所以部族已经具有形成民族的因素，资本主义经济把它们利用起来，形成了民族；社会主义经济也可以把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部族所具有形成民族的因素利用和发展起来，使它形成统一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形成民族的主要因素，共同经济的联系。

我们国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很多还没有发生资本主义，有些还是氏族和部落，有些还是部族，但不论它们现在是部落或是部族都不必经过形成资产阶级民族，直接发展成社会主义民族。现在

它们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民族，正在过渡时期，所以我们必须着重分析它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了解它们现在社会发展的特点。

人类是从氏族、部落，逐步发展成为部族，再发展成为民族的。它们的区别是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不同。

在人类的发展最古的时代，没有阶级社会以前，人们共同体是氏族、部落。当时是原始公社时期，人们的关系是血统的亲属关系，是很闭塞的、各不相通的关系，基层组织是氏族。部落是当时血统比较近的氏族所组成的，部落就是氏族的联合。

原始社会向前发展，产生了私有制，有了对抗的阶级，出现了国家，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暴力的统治，氏族发生混合，人们的联系不再限制在血统的亲属中了。部落的管理制度丧失了，部落各自孤立存在的状态也消失了。这时的社会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这时的人们共同体是部族。

我们国内的少数民族既然很多是属于部落或部族的性质，或是开始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解放出来，向社会主义民族过渡，所以我们必须从语言、地域和表现特殊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三个方面去研究它已经具备形成民族的因素，同时要从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肯定它现在的特点，注意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在形成社会主义民族的过程中发生作用。

附带地说明：我们说有些少数民族还是属于部落或部族的性质，只是从分析它们所形成的人们共同体的性质，分析它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特点而说的，绝不是否认它们成为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否认它们是一个“民族”的意思。任何少数民族不论他们的生产力怎样落后，在民族大家庭中，一样享有和任何其他民族相同的权利。在政治地位上大家是平等的。我们要分析的是它们发展的特点，使我们在帮助它们进一步发展时采取和它们的特点相适应的措施，这是我们的宪法所规定的。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我们对于各少数民族不必用部落或部族等名词来加以区别，这种区别对民族团结是并没有利益的。

1954 年

看了民族歌舞

最近中央民族学院文工团在首都表演民族歌舞，得到观众的欢迎。观众们欢迎这次表演，主要是因为从这些节目中亲切地看到了各兄弟民族解放后欢欣鼓舞的新生活，从而更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正确和伟大。

看了这些节目，谁也不会再相信，我们这许多兄弟民族是没有文化的了。能有这样绚丽的歌舞的民族，必然是有丰富的文化的。

当然我们不应当忘记，兄弟民族的人民过去所受的苦难比我们还要深，他们的经济受到破坏，他们的文化受到摧残；这一切都是反动统治的罪恶。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消灭他们对生活的爱好，对幸福的信心；他们反抗压迫，他们辛勤劳动，在不懈的劳动中，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是充沛地支持着他们民族的生存。

在西康山地里，豪放的藏族青年在唱着这样的山歌：

我的家乡一年收两季，
我为什么不喝酒呢？
我自己是一个打猎的，
我为什么不吃肉呢？

这是一首劳动者自信自骄的歌曲，爽快流利地说出了劳动者天赋的权利，也有力地嘲笑了不耕地，不打猎，不劳动而想喝酒吃肉的剥削者。

兄弟民族的人民一直是热爱劳动的，但是过去，他们劳动的

成果不属于他们自己。这使他们穷困，使他们痛苦。现在，压在身上的石头搬开了，他们开始了自由幸福的生活。他们永远不忘记谁给他们带来了幸福，他们唱：

毛主席带来了好主张，
比雪山上的泉水还明亮。
毛主席带来了丰收的雨水，
草原上是一片禾苗茁壮。

是的，兄弟民族的幸福是和毛主席的名字分不开的，他们歌子里没有了毛主席也就会感觉到不成曲调。他们不是这样唱么？“毛主席呀，没有你，我们的新歌没处唱，没有你，我们的锅庄跳起来也悲伤。”

就是这种朴实深厚的劳动人民的感情，产生了这丰富多彩的歌舞艺术。这样的艺术有力地戳穿了民族歧视的蒙蔽。

看了民族歌舞节目的观众，还有人带着一些怀疑地问：“当地兄弟民族的歌舞，真的有这样美么？”到过兄弟民族地区去的朋友们会回答说：这次中央民族学院文工团演出的民族歌舞，固然比过去在舞台看到的有了一些进步，多少带来了一点兄弟民族的生活气息，但是比起当地人民中间的歌舞，究竟还差得多。这个答复是很符合事实的。

以《阿细跳月》这个节目来说罢。阿细人民对反动压迫是具有顽强抵抗精神的，在解放前树起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在云南的西山和圭山地方建立了根据地。就是他们以跳月的舞蹈闻名四方。看过他们这种舞蹈的人，没有不被他们所表现的青春的活力所感动。过去这种舞蹈也曾经在各处舞台上介绍过，但是大多被另一种不够健康的情调所支配，所表演出来的形象离开现实太远，而且甚至歪曲了现实。使很多在西山圭山看过阿细

跳月的人看不下去。这次表演虽然还不够劲，还偏重在队形的变化，还没有像阿细男女在自己广场上那样豪放活跃，但是总算还有一点原来的气息，没有太走样。

说到这里，我们碰上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怎样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文艺的问题。比如有人说，苗家舞蹈时两个臂膀一摆一摆不好看；又有人说，藏族舞蹈为什么常常弯着腰；甚至有人说，这些都是被压迫出来的形象，现在解放了臂膀可以张得开些了，腰可以挺起来了。初听来，这种话似乎有一点道理，因为我们不愿意看“五斗米折腰”那一套形象。但是如果反问一下，就不然了。为什么弯腰一定是屈辱的表现呢？我们看一看藏族人民跳这样的舞蹈时是愁眉苦脸还是笑逐颜开的呢？他们在表现哪一种心情呢？为什么我们不去问问藏族人民自己呢？而硬要用我们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感情呢？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些批评是很不确当的了。

我们也听见过一种论调，说《阿细跳月》男女在台前台后高声呼喊，不太文明；又有说藏族妇女舞蹈时两腿扳动的方式是落后的。我们是很难同意这些看法的。最好还是进一步了解一下：阿细男女高声呼喊表示着哪一种男女关系？那种男女关系是不是健康的？在我们看来，他们这种公开的社交形式正表示了他们没有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男女在平等自由的关系中一起欢乐，实在没有什么不文明的地方。再说藏族的步伐，这是和她们善于骑马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是在劳动中形成的一种动作习惯，我们有什么理由说这是落后呢！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提到这些不正确的看法呢？那是因为确是还有一些人在企图从这些方面来“改良”、“提高”兄弟民族的文艺。有一些人为了要“提高”兄弟民族的音乐舞蹈，按他们主观的好恶，任意改编和糅杂，编出了一些脱离民族风格很远的节目。这是由于没有正确地对待兄弟民族的艺术所引起的。

这次中央民族学院文工团所表演的节目是否还受着那种不正确的态度的影响呢？我想还不能说没有，但是在若干节目中，这种影响似乎少了一些，而正是这些节目最受到观众的欢迎。撒尼歌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是一个例子。这个歌曲不但撒尼人自己喜欢，不同民族的听众都觉得它味道很好。为什么这个歌曲比较成功呢？我想并不是由于作者有什么特别的天才，而是他对待兄弟民族的艺术的态度比较端正。他很虚心地学习了各种撒尼民歌，把它们原有的曲子，提炼了一下，比较简洁了些。在这个创作过程中，他一直是和撒尼人民在一起，倾听他们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批准。他没有自作聪明地加入很多所谓“进步”的东西进去，而是老老实实在学习和整理。这样创作才不至于脱离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

同样的方法编排了苗族的《春天来到了》。到过黔东清水江一带苗家地区的人，只要一听这些曲子，立刻会很喜悦地想到了那在碧绿的水边、长满着各种作物的山坡上勤快劳动的苗家。有人觉得这些舞曲反复多，变化少。其实不然，苗家艺术的风格有它的特点。以他们的绣花来说，你远远望去似乎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如果你细细地看，一遍一遍地看，一针一线都有独到之处，而且每个人都在所绣的花中表现她独特的创造性。他们的音乐舞蹈也是如此。他们着重在轻微的动作中，深入细致地表现他们的感情，而且比较含蓄沉着，和维吾尔的风格可以作为明显的对比。《春天来到了》的曲子初步抓住了这个特点，使人一听就知道是苗家的艺术，而且不可能是其他民族的。

在这里让我们谈一谈兄弟民族艺术的加工问题。我们尽管承认兄弟民族原来的歌舞是优美的，但是如果直接搬到舞台上来大多是不合适的。不合适的原因我们以为主要的不是在它的艺术性，而是在表演的场合。兄弟民族歌舞的特点是极密切和生活相结合的，大多简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正如藏族民歌所说：

做不出一件勇敢的事，
就找不到一个理想的爱人；
唱不出一首美丽的山歌，
也找不到一个理想的爱人。

艺术和生活这样融合在一起，不但经常在自然的环境中进行，而且在真实的感情中进行，而舞台上却不是这样。舞台上的表演是演员表演给观众看的，演员要通过艺术的表演来激发观众的感情，所以表演的方式也必须是精练和紧凑。因此，兄弟民族的艺术要在舞台上表演必须经过一番加工。这种加工首先是要掌握原料，体会风格，才能有所取舍，有所安排；而且必须避免在取舍和安排过程中，主观地插入一些会破坏他们民族风格的东西。最好的加工方法是要密切地和本民族的人合作，有了剪裁就表演给本民族的群众听和看，诚诚恳恳地依靠群众。如果不相信群众，觉得兄弟民族人民大众欣赏不了“提高”了的艺术，这种思想支配下的作家也就永远不可能有好的创作了。阻碍我们虚心向兄弟民族学习，诚恳地依靠他们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属于大民族主义的残余。不坚决地扫除这种思想残余，要去学习和表演兄弟民族的艺术是不可能的。

有人也许会觉得这样的加工，只是整理而不是提高，要发展兄弟民族的艺术必须要把先进的成分加入进去。我们如果否认兄弟民族的艺术今后必然会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成分，或进而拒绝先进艺术对他们的影响，那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想。但是这是要兄弟民族人民大众自己来吸收的，而且必然在他们原有的民族风格中逐步地吸收，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绝不是少数人所能包办代替的。在目前，我们的工作应当首先在整理各民族已有的音乐舞蹈和其他艺术，同时有系统地把其他民族的优秀艺术介绍给他

们，发动各民族群众的创造性，来发展他们的艺术。

介绍兄弟民族的艺术，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反映我们祖国民族大家庭的亲密团结，反映各兄弟民族在毛主席的民族政策下欣欣向荣的新气象，都是值得倡导和鼓励的。正因为这是一项新事业的开端，发展的方向必须明确，必须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这项新事业。中央民族学院文工团在首都所表演的民族歌舞，虽则在各方面还具有很好的缺点，但是经过了一年半在兄弟民族地区向群众学习，在尊重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的条件下，各民族的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所得到的一些收获是可以供给广大文艺工作者作为参考的。

1954 年 6 月 16 日

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的大宪章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人民革命的成果之一，也是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的宪法草案正确地总结了我国在民族关系上所获得的胜利，巩固了这些成果，将使我国各民族的团结，继续加强，牢不可破。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我们国家的领土上居住着几十个民族的人民。各民族的人民在悠久的历史时代中，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更在协力同心抵抗共同敌人的事业里，密切联系成为不可分离的部分，在很长的时期里，构成了我们这个统一的国家。

也就在这个很长的历史时间中，封建帝王以及最后的国民党反动派，执行民族压迫政策；特别是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各少数民族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更是残酷。反动统治阶级又在各民族间进行挑拨离间，宣传大民族主义并助长地方民族主义，以致过去各民族的关系是恶劣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人民革命的胜利根本改变了民族关系，结束了民族压迫制度，进入了民族平等的时代。为什么民族关系会发生这种根本变化呢？那是因为人民民主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人阶级是根本反对一切奴役制而忠实于实现国际主义思想的；那是因为人民民主国家的一切权力是属于人民的，各民族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

消灭了民族压迫制度的国家里，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没有

优劣，不分高下，每个民族的地位都是一样的。这许多地位平等的民族是在友爱互助，反对共同敌人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真正兄弟般合作的关系，自愿地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种国家的坚固性，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是世界上任何一洲的任何一个单民族国家都比不上的。

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国家之内的许多民族，不但是平等的，而且是自由的。各民族都有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各民族都有他们的特点。在各民族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人民都有运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的自由，各民族人民也都有决定他们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具体步骤的自由。各民族人民对于建立繁荣幸福的社会愿望是一样的，在实现这个意愿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各民族人民间的友爱互助，另一方面也必须尊重各民族人民自己的意志，绝不能由其他民族加以强制或代替。这样，这个民族大家庭对于每一个民族都是温暖的、缺不得的、离不开的。自由平等的民族关系保证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民族区域自治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体现自由平等的民族关系的政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我们建国以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陆续实行区域自治，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受到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热烈拥护。现在宪法草案中，不但规定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原则，而且在国家机构一章中有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专节，把几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的经验肯定了下来。

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人民享受着一定的自治权，使他们能按照他们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来决定他们民族内部的事情。但同时，国家对于各少数民族还要帮助他们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事业。这样保证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不受侵犯，同时也保证了少数民族可以得到国家的帮助，迅速地发展起

来，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

不在民族自治地方之内生活的少数民族人民，不论是聚居的、杂居的、散居的，他们的平等权利将同样受到宪法的保障。宪法草案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有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的规定；在各民族公民进行诉讼时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的规定；在公民的选举权中有不分民族的规定。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民族平等权利的最基本的保障。

我们的宪法草案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过渡时期的宪法。它将保证我们各民族都要逐步地先后通过和平的道路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民族，也就是繁荣幸福的民族。各民族发展是不平衡的，现在他们的社会性质还有一定的区别，我们的宪法草案充分注意到各民族发展的特点，作出了最妥善的规定，保证了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使各民族人民都欢欣鼓舞地迎接我们共同的光明灿烂的前途。

我们的宪法草案，在伟大的苏联的榜样下，贯彻了民族平等互助的精神，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胜利。让我们为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牢不可破的团结而欢呼；让我们为保证贯彻宪法草案所指示的精神而努力。

1954 年 7 月 2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保障了各民族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里，各族都有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是民族平等的具体表现。当我们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就把这个原则规定在共同纲领里，现在又在宪法草案中加以肯定了。

各民族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才能实现。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被压迫的民族是享受不到这种自由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大民族主义者，为了便于他们的统治和剥削，他们不愿其他民族的人民说本民族的话，用本民族的文字，而要采取各种方法强制其他民族的人民使用统治阶级所习惯的民族语言文字。这就是他们所执行的同化政策。当然，这种违反人民利益和志愿的政策是很少能贯彻的。不但中国的历史上是如此，数千年大民族主义的同化政策并没有把被统治的民族的语言消灭掉，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曾在几百年中努力伤害、破坏和消灭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可是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还是坚持下来和活下来了。同化主义者这种民族压迫政策对各被压迫民族语言文字的损害却是很严重的。他们剥夺了这些民族发展语言文字的条件，比如禁止这些民族在公开场合下使用自己民族的文字。结果常常使没有文字的民族丧失了创造文字的条件，甚至可以使已经有了简单文字的民族，丧失原有的文字，或是只能在和实际生活较远的范围中，如符篆、经典等，保留原有简单的文字。语言文字发展的自由被剥夺了。

被剥夺了发展语言文字自由的民族，生活各方面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语言是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是为全社会服务的。斯大林这样清楚明确地指示我们说：“语言之替社会服务，乃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作为使人们相互了解并使人们在其一切活动范围中调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这一切活动范围包括生产的领域，也包括经济关系的领域，包括政治的领域，也包括文化的领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这样重要的交际工具一旦受到限制，必然影响到生活的各方面。因此剥夺一个民族发展他们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是一项极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

剥削阶级的统治被打倒，民族压迫制度被消灭，各民族人民在国际主义的工人阶级领导下，掌握了国家权力，无疑的，大民族主义的同化政策将永远被埋葬，被唾弃了。各民族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得到了保障。我们在共同纲领，在宪法草案中把这个人民革命的成果巩固了起来，确实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当我们为各民族人民获得自由平等而欢呼的时候，也不容我们忽视过去长期民族压迫所造下的事实，就是我们国内很多少数民族至今还没有文字或者还没有通用的文字。不但如此，许多少数民族由于长期缺乏本民族的政治经济的中心，统一的民族语言缺乏发展的条件，至今还有方言分歧。依不完全的估计，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约4000万人，而还没有文字或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人口约有1800万到2400万人。这些没有文字或没有通用文字的人又有很多不同的语言和方言。

对于现在还没有文字或是虽有文字而这些文字还不通用的民族，要享受发展语言文字的自由，最基本的条件还得创造，就是必须先创立文字，才能谈得到发展。

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绝不会满足于空谈民族平等的权利的，宪法中所规定的权利是要认真地创造物质条件，使

人民真正地能享受到这些权利。我们的宪法草案已充分表现了这种精神。宪法草案中既规定了各民族都有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必然要创造具体条件来使各民族人民能享受这种自由的权利；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首先是要创立文字。

我们的党和政府很早就提出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的问题，并且确定了向这方面进行工作的方针和任务。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中曾规定：“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同年11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指导并组织有关机关、团体及个人进行少数民族语文的调查、研究及文字的创制、改革和充实等工作。”同年12月李维汉主任委员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报告说，“有一个迫切的问题，即帮助尚无文字而有独立语言的民族创造文字的问题，希望同志们提出意见，供中央考虑此项问题的参考。”

在党和政府的号召和支持下，各方面对于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的工作，开始准备和尝试，而且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比如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对各少数民族语言情况已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又协助了西康彝族试行推广拼音文字；又比如中央民族学院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协助下，编出了用记音符号拼音的40多种少数民族语文课本，其中有30多种已经用来教学，有400多大学程度的学生在学习各种少数民族语文，培养他们将来可以参加各民族文化建设的的工作。各民族人士也有自动地研究自己的语言，提出了创立文字的方案的。这项工作，我们已有基础，可以向前更迈进一步了。今年5月20日政务院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并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

单位审慎研究，然后拟订计划和订出在一两个民族中创立文字的具体方案，先行试办，并继续了解情况，及时总结经验，在事实证明这些办法确实可行，而且其他条件也比较成熟时，逐渐地在别的民族中进行。这个决定的公布已经获得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热烈拥护。

帮助各民族发展语言文字的政策，没有疑问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过去大民族主义的残余影响，还有一部分人对这个政策，在思想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怀疑。他们认为现在还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不必再去创立和自己语言相适应的文字了，学会了汉文就解决了文字问题，而且通过汉文可以更方便地接受进步的知识。他们认为少数民族语言简单，如果根据他们的语言创立文字，反而阻碍他们接受进步的知识。这些主张的动机固然不是要压迫少数民族，和过去大民族主义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实际上还是在阻碍少数民族享受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

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所有的语言是和汉语不同的，而且语言是有巨大的稳固性和对强迫同化的极大的抵抗性。如果我们不帮助还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和他们语言相适应的文字，就等于要求这民族的人民必须学会别一个民族的语言才能得到使用文字的工具，这样使这个民族在发展他们文化和其他生活过程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且增加了事实上的困难。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个事实。我们不否认的确有一部分少数民族的人学会汉语汉文，而且能很纯熟地掌握这个工具，甚至通过汉文表现了他们艺术的才能。但是这是少数。这少数人在获得文字工具上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且他们用汉文所创造的文化成品并不能成为自己民族的人民的公共财富，因为他自己民族的大多数人是懂得他所写出的文字的。至于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人民大众，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就埋在文盲的汪洋大海中。解放后，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有了改善，文

化要求日益高涨，没有文字的民族的人民大众切身感受到没有文字的痛苦了。广西的壮族儿童，在学校里念书，只有汉文课本，老师要用壮语来教汉文，而壮语的文法结构和基本词汇和汉语是不同的。孩子们在小学中，不但要多费两年才能达到汉人的小学程度，而且很多用汉字写出来的句子，汉人很难领会。更痛苦的是这些地方的瑶族学生，他们在小学里是听老师用壮语教汉文。试问能有多少具有语言天才的儿童能在这种条件下掌握文字的工具？

那些主张少数民族人民大众普遍学会汉语再有权利掌握文字工具的人，不论他们用心如何，实际上是要用汉语的语言代替其他民族的语言，那是不合民族平等的原则的，也是做不到的。为了少数民族人民学习进步知识的方便，绝不是要求每个少数民族的人民学习汉文，而是创立和他们语言相适应的文字，通过他们的文字把进步的知识介绍给他们。

有些人把创立文字看成一件极困难的事，那是由于他们一想到文字就想到汉族的方块字。要像汉字一般创立各民族的方块字的确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的语言科学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可以把一种语言分析出若干基本的音和调，再用符号来表示这种音和调，这些记音的符号连串起来就可以拼出不同的字和词。新的拼音文字的创立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了。一个会说这种语言的人，学会了这些用符号拼写出来的文字就可以把口语写出来。一般说，这是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可以学会的本领。因此，把创立文字看作极困难的事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然，创立一个民族的拼音文字也不是很简单的。主要的困难还不是在分析音调，而是在一个还没有形成民族语言的民族中，方言分歧，选择哪一种方言来拼音作为这种民族的文字却需要深入的调查研究。比如在中央民族学院里 14 种民族的语言已经有了 30 多种课本。把创立文字看成极简单的事也是不符合事

实的。政务院作出审慎研究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有些人认为少数民族学会汉文对他们接受进步知识有方便，这对于一个一个人说是对的。少数民族创立自己的文字和学汉文这两件事并不是矛盾的。少数民族的人民自己愿意学习汉文，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要给他们帮助。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不必创立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字的理由。如果不创立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字，那就等于强制少数民族学习汉文了；也就是剥夺了少数民族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的文字再学习汉文，汉文不但不代替他们的文字，而且可以帮助他们自己文字的发展。

有些人认为最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会消灭的，所以不如早些接受汉族的语言文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斯大林已经做出科学的结论，他指示我们：“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的时代里，世界帝国主义将不复存在，剥削阶级将被推翻，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将被消灭，民族的孤立和互不信任将被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民族权利的平等将被实现，压制和同化语言的政策将被取消，各民族间的合作将建立，而各民族的语言将有在合作方式下互相丰富起来的可能。不用说，在这些条件下根本就谈不到一些语言的被压制和失败与另一些语言的胜利。在这里我们将遇到的不是两种语言——其中一种遭受失败而另一种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而是好几百种民族语言——这些语言由于各个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长期合作便首先分出最丰富的单一的区域性的语言，然后区域性的语言才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国际语言，这种语言当然既不会是德语，也不会是俄语，更不会是英语，而是吸收了各民族语言和各区域语言精华的新语言。”从这个科学的结论中得不出我国各少数民族语言会被汉语所代替的结论，相反的，只有各民族自由地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坚决地消灭压制和同化语言的政策，才会出现各民族共同的语言。

反对或怀疑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的政策是没有任何

站得住的理由的。

我们也必须承认，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情况是复杂的，因此，在实施创立文字的政策时，必须结合具体情况。有些民族比较聚居，而且已经有占据绝对优势的方言，他们可以按这种方言创立文字。也有些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地区，而且方言分歧，那就需要先试用一定的记音符号记录他们不同的方言，然后根据他们语言发展情况，创立一种或几种文字。有些不同的民族，语言上是基本相同的，他们可以先制定一种文字，如果其他语言相同的民族采用这种文字有方便，就可以不必另行制定文字；如果不方便，还是可以另制文字。有些民族大多数人已经熟悉另一个已经有文字的民族的语言，又没有另造文字的要求，就可以使用这一个民族的文字，不必另造文字。有些民族人口过少，虽则有自己的语言，自愿使用另一民族的语言文字，也可以不另造文字。这许多不同的具体情况，在各民族自愿的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文字问题是切合实际的办法。

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只是实现各民族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的一项基本措施。有语言文字的民族还要逐步发展起来，丰富他们的词汇，并使用他们的语言文字来进行文化教育工作。

在我们国家，各民族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是有保障的。1951年11月全国民族教育会议上，教育部马叙伦部长报告说：“关于少数民族教育中的语文问题，会议规定凡有现行通用文字的民族如蒙古、朝鲜、藏族、维吾尔、哈萨克等，小学和中学的各科课程必须用本民族语文教学。有独立语言而尚无文字或文字尚不完全的民族，一面着手创立文字和改革文字；一面得按自愿原则，采用汉族语文或本民族所习用的语文进行教学。”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更用立法手续肯定了这个原则。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

采用自治区内通行的民族文字为行使职权的主要工具，而且要采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来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1952年2月政务院《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规定了：各民族代表在人民代表会议及人民代表会议的协商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上，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行使职权时，应尽可能使用当地各民族的文字。同月，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又规定：凡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有其本民族语言文字者，得在法庭上以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辩。宪法草案第七十七条又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这些都是保障我们国内各民族有使用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

我们的党和政府一贯地执行着民族平等的政策，有步骤、有计划地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已有文字的民族发展他们的文字，贯彻各民族都有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各少数民族光明幸福的前途是有保障的，那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各民族人民必须珍惜这个革命的成果，尽我们一切力量，遵循宪法草案所规定的道路，来实现民族平等，为实现各民族都有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而努力。

1954年8月21日

对于宪法草案有关民族问题 基本规定的一些体会

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是宪法草案在总纲中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结构的一条基本规定。一方面指出我们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一方面又指出这多民族所构成的国家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

在我们国家的领土上居住着许多民族，不是几个民族，而是几十个民族。从我们现在已有的历史知识来说，最迟在 50 万年前我国的土地上已经住着原始人类；1 万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各地方所发现的古代器物，已表现出有不同的类型，同时也表现出这些不同类型的器物相互的交流和影响。在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已可以看到当时聚族而居的人们组成着不同的集团，而且有不同的名称。历史记载中不断出现关于这些集团的流动、交战和混合。我们现在对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他们在历史时期中相互的关系还没有足够的系统知识。但是我国的土地上历来就住着许多语言不同，文化有别，各有其心理特征的民族集团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这个多民族的历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国民党反动派曾经企图否认这个事实，把我们国内的许多民族说成是许多“宗族”或支派。他们这种违反历史的理论是想替他们的大民族主义作辩护，目的是在加深对少数民族的剥削

和压迫，进而想消灭各少数民族。这是反动的理论，和事实不符合的。

多民族国家里各民族相互关系是国家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我们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记载中也足够说明民族关系的复杂和严重。自从社会上产生了阶级，一直到阶级消灭，在这一段时期中，民族关系具有两个矛盾的方面：一方面是各民族人民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相互吸收先进的经验，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在经济上日渐形成相互依赖和贸迁有无的亲密关系。这是促成每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各族人民建立起兄弟般友谊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各民族的剥削阶级，除了对本民族人民进行剥削外，总是要向其他民族扩张他们剥削的范围，他们要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战争，去征服其他民族。这样引起了被侵略的民族人民的反抗，而且也发生了各民族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各民族的统治阶级利用这些矛盾，歪曲成民族矛盾，燃烧起民族主义的狂热，隐蔽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破坏各民族人民间的团结，更利用本民族人民的力量去进行各民族统治阶级间的斗争。当然，各民族统治阶级的策略，并不是一贯顺利的。各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的存在，被压迫的人民，在进行斗争中，同样是常常联合各民族的人民，向共同敌人进攻的，因而加强了各民族人民间的团结。但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存在一天，他们对于民族间的挑拨和离间也一直不会停止，民族间的隔阂和歧视也不会根本消灭。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变必须要到剥削阶级的统治被消灭后才能实现。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的形成，民族之间才不会再有压迫，民族平等的时代才能开始。斯大林说：“资本主义的存在，没有民族的压迫，是不可思议的；同样，社会主义的存在，没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没有民族的自由，也是不可思议的。”^①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139页。

我国的历史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在我们过去几千年中，各民族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发展了生产，创造了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缔造都有重要的贡献。各民族经济上的合作，文化上的交流，和多次共同抵抗外来的侵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已经长期地亲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这个包括着许多民族的国家获得统一的历史基础。

二、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

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的民族关系之上的，因此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我们各民族能团结成这样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是由于我们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工人阶级是以自己的劳动来创造自己的生活的，他们不对任何人进行剥削，而且反对剥削，要消灭剥削的。因此，他们是国际主义的实行者，对各民族的人民只有互助合作的关系，不会发生侵略压迫的关系。我们中国人民在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才有可能结束历史上曾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的制度。我们宪法草案总纲的第一条是保证民族平等的最基本的条文。

我们的宪法的特点之一，和苏联的宪法相同的，就是具有深刻的国际主义性质。民族一律平等是我们宪法所持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正如斯大林论苏联宪法草案所说的：“是认为一切民族和种族，不管它们过去和现在状况如何，不管它们强弱怎样，都应在社会所有一切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国家生活及文化生活

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①

民族平等关系在我们新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关系还是一种新建立的关系，在时间上说，还是比较短的。在这种平等关系建立之前有着长时期民族压迫的历史，历代的反动统治者进行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宣传，挑拨各民族人民间的感情，造成仇恨和隔阂。这些反动思想的残余，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完全肃清的。宪法草案在序言中着重提出了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原则，那是完全有必要的。

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是什么呢？1951年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李维汉主任委员曾经作了说明。他说：“大民族主义残余，首先是大汉族主义残余（此外还有在一个地区内占有多数民族地位的某些少数民族中的大民族主义残余）的特点为：歧视或轻视少数民族，忽视或蔑视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由此产生政策上的急性病，冒险主义；作风上的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地方民族主义就是狭隘民族主义。共同纲领曾经用狭隘民族主义这个名词，宪法草案采用了国际通用的名词，地方民族主义，二者的实质是相同的。地方民族主义的“特点是：保守与排外，看不见祖国的伟大和进步事物，看不见本民族的前途，安于现状，故步自封，阻碍自己民族的前进”。^②

克服这些反动思想的残余，主要是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教育。在过去几年中，许多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带头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思想，批判了独断专行、包办代替的作风，很快地感动了少数民族干部，他们也随着批判了保守排外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加强了民族团结。这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法事

① 《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中文版，第682页。

② 《民族政策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93页。

实证明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我们不应当忽视，帝国主义还存在，蒋介石匪帮还没有完全消灭，各民族内部也还可能有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爪牙。这些各民族人民的公敌处心积虑，要破坏我们民族间的团结。为了保卫我们这个自由平等的大家庭，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宪法草案规定了，“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这是保卫我们民族大家庭必要的措施。

三、发展语言文字的自由

在封建阶级或是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国家里，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不但被视为劣等民族，在政治上、社会上得不到平等的地位，而且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没有。被压迫的民族人民在公开场合下说自己民族的语言会遭到禁止和侮辱。他们如果有文字的话也不能得到公开的使用，更谈不到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来印刷出版和教育自己的人民。他们和统治民族交际的时候，必须用统治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学校里必须学习统治民族的语言文字；在法庭上更是必须用统治民族的语言文字。通过种种强制的手段，统治民族压迫被统治民族的人民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字，同化于统治民族，因为这样，统治民族的统治阶级才能更方便于对被统治者进行剥削。语言文字是人们交际的工具。一个民族丧失了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无疑地会阻碍他们社会的发展。所以剥夺了一个民族发展语言文字的自由是民族压迫制度中极为残酷的一项措施。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特征，它有巨大的稳固性和对强迫同化的极大的抵抗性。斯大林说：“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曾在几百年中努力伤害、破坏和消灭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可是巴

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还是坚持下来和活下来了。”^① 我国历史上各个被压迫民族的情况也大多如此。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我国的少数民族经过了长期的同化主义者的压迫，到现在还是都坚持了自己民族的语言。但是低估了同化主义者对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伤害和破坏也是不对的。少数民族不但在语言的发展上受到了限制，而且，更重要的，很多丧失了创立文字的条件。大体的估计，到现在为止，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通用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部少数民族人口的一半以上。这是阻碍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很严重的条件。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和帮助各民族发展起来，克服这种不利的条件也成了我们民族工作急迫的任务。

在我们的民族政策中，少数民族发展语言文字的自由，一直是占着重要地位的。共同纲领第五十三条有明文的规定。1951年2月5日政务院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中，更具体地规定：“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② 1951年12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李维汉主任委员，在《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中说：“有一个迫切的问题，即帮助尚无文字而有独立语言的民族创造文字的问题。希望同志们提出意见，供中央考虑此项问题的参考。”^③ 1954年3月政务院批准了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并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经过审慎研究，拟订计划和订出在一两个民族中创立文字的具体方案，开始先在一两个民族中逐步试行。帮助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立文字的工作已将进入试行的阶段了。

各民族都有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包括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这种权利在我们新中国是有充分保障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4页。

②③ 《民族政策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14、91页。

的。

1951年11月全国民族教育会议上教育部马叙伦部长报告说：“关于少数民族教育中的语文问题，会议规定凡有现行通用文字的民族如蒙古、朝鲜、藏族、维吾尔、哈萨克等，小学和中学的各科课程必须用本民族语文教学。有独立语言而尚无文字或文字不完全的民族，一面着手创立文字和改革文字；一面得按自愿原则，采用汉族语文或本民族所习用的语文进行教学。”^①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有更明确的规定：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可以采用一种在其自治区内通用的民族文字，为行使职权的主要工具；并且可以采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来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②不在民族自治区内居住的少数民族人民在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上同样受到保障。1952年2月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中，规定了“各民族代表在人民代表会议及人民代表会议的协商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上，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政务院通过的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中，规定了“凡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有其本民族语言、文字者，得在法庭上以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辩”。

宪法草案第七十一条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第七十七条规定了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这些都是保障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权的规定。

① 《民族政策文献汇编》，第73页。

② 《民族政策文献汇编》，第166~167页，第15条和第16条。

四、保持或者改革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反动阶级的同化主义者不但在语言文字上对少数民族采取伤害、破坏和消灭的政策，对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也是横加干涉的，常常要求被征服的民族人民放弃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同化于统治民族。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在贵州曾强制苗人剪发改装，派了军队在街子上撕去苗家妇女的裙子，加以侮辱。历史上也有很多统治阶级强制被征服的民族改变原有的宗教信仰，对异教徒进行迫害。这些都是民族压迫制度的具体表现，和我们民族平等政策不相容的。

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中有许多是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因此富于民族形式和民族感情。在受到其他民族的干涉的时候，被压迫民族常常起来坚决地反抗，因此而发生大规模屠杀的惨剧，在各国的历史上也是常见的。

当然，没有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是一成不变的。和生活不相适应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是不断地被改革的，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也是不断地在发生的。而且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一个民族时常会接受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但是改革和影响必须是出于本民族人民的自愿。如果这些改革和影响是由其他民族强制的，立刻会产生反抗，而且加强了对原有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民族感情，坚决地要保持了，即使这些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已经和本民族的生活不相适应。

为了民族的进步和民族间的团结，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保持或改革必须由本民族人民自己来决定，其他民族是不可以干涉的。宪法草案规定了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一方面体现了民族平等的原则，另一

方面也保障了民族间的团结。

五、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宪法草案反映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我们国家各民族共同的道路。总纲第四条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也是各民族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民族的保证。

同时，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我们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发展得比较快的，像内蒙古自治区已经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正在建立中，又像桂西壮族自治区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制度，正在进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也有些发展得比较慢的，现在还实行着封建制度或奴隶制度，甚至在偏僻地区可能还有原始公社的残余。这种不平衡的情况是不足为奇的。历代反动统治者对各少数民族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他们在发展上受到阻碍，以致停滞和落后了。但并不是说，今后一定赶不上其他民族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榜样，过去比较落后的蒙古族，现在已经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了。但是由于当前这种不平衡情况的存在，各民族在走上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总道路上，所采取的方法、步骤和速度都不应当强求一致。所以宪法草案序言中有这样的规定：“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

怎样去提高少数民族社会的生产力的问题，一定要照顾当地

人民的需要。有些少数民族居住在地，他们可以靠山吃山，发展土特产等经济作物或是培植森林。但是过去却有些这种地区因为缺乏粮食，提倡农业，烧山开荒，得不偿失。又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发展农业的，而现在缺乏耕种技术和农具，他们不知道积肥，甚至没有铁器。这些地区的经济建设，主要问题是供应比较进步的农具和介绍先进的农业知识。过去一两年来贵州和广西在这方面的工作上已取得成绩。这些例子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应当切实地根据当地条件来进行。

少数民族的建设事业中，文化建设在一定的意义上，是经济建设的先决条件。他们地方的经济建设事业主要是国家建设计划的一部分，在资金、设备等各方面可以由国家负担，但是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建设一定要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参加，而培养这些干部就是重要的文化建设事业。少数民族人民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识分子的培养，以及新闻出版事业的建立和开展，都是当前各少数民族急迫的要求，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能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宪法草案序言中特别提出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是切合于少数民族发展的需要的。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提出生产关系改造的问题。周总理1951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明确指出：“各民族内部的适当改革，是各民族发展进步、逐渐跻于先进民族水平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但这种改革必须适合其本民族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必须根据其本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并采取妥善步骤，依靠其本民族干部去进行。”195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用立法手续肯定了这个原则，第三十一条规定：“上级人民政府应足够地估计各民族自治区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具体情况，使自己的指示、命令既符合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总道路，又适合此种特点和具体情况。”各地经验证明，凡是依据上述规定的原则办事的，都获

得了应有的成绩，并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拥护。相反的，凡是忽视这个原则，错误地搬用汉族地区社会改革的一套办法，就会引起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甚至招致混乱和损失。宪法草案肯定了这个原则，总结了这个经验，是我们民族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我们国内各民族都是向着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前进的，但是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具体方法则将照顾到各民族的具体情况，这样才能保证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同时也保证我们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将继续加强。

六、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民族的区域自治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推行，使有一定聚居地方的各少数民族在中央和有关上级的国家机关的统一领导下，实现他们在管理本民族事务上当家做主的权利，各自从他们的当前发展阶段逐步地进入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轨道，从而为他们的发展和进步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截至 1953 年 3 月，在全国范围内已建立起来的相当于县级及县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地方 47 个。其中，包括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内蒙古自治区；规模较大的桂西壮族自治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湘西苗族自治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西康省凉山彝族自治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区，四川省藏族自治区等。全国各地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从 1953 年 3 月到现在又有许多新的自治区成立了。

全国各地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民族区域自治实行后，普遍而显著的效果是：增强了各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积极性和自动精神；加强了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密切自治机关同人民之间的联系，而且促进了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钥匙。宪法草案总结并提高了这项经验，在第三条中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我们中国国内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时代里一直是处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各民族在近百年共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各民族的命运更是密切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近3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更使各民族人民逐渐地结合起来。人民革命的胜利已使我们各民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今后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建设，必须结合各民族的需要，统一地计划，共同地努力。在保卫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上，各民族更需要团结一致。这种种历史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具体条件，使我们各民族都衷心情愿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都是统一的国家的一部分，有别于联邦制国家的各个单位，所以在宪法草案第三条的结尾加以明确的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七、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乡

宪法草案第三条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有人问：少数民族聚居地方是什么意思呢？区域自治又是什么意思呢？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是指这样一种地方，就是在这个区域范

围内，有一定数量的某一个民族的居民共同生活着。这些居民之间还要有一定的社会联系和或多或少的自己的社会构成。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这个概念是就同一民族人民居住关系来说的，并不是就不同民族人民之间的居住关系来说的。某一民族的聚居地方之内可以只有它这个民族的居民，而没有其他民族的居民。但是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某一民族的聚居的地方并不排斥有其他民族的居民在内。因此还有两种情况：一是甲民族的聚居地方之内有乙民族的人居住，这些乙民族的居民人数较少但也构成自己的聚居地方，就是甲民族的聚居地方包含着乙民族的聚居地方，也就是乙民族的聚居地方成为甲民族聚居地方的一部分。二是住在一个地方的甲乙两个民族，人数大致相当，并且交错聚居，不容易明确划出界线，所以这种地方既是甲民族的聚居地方，又是乙民族的聚居地方。以上两种情况，就甲或乙民族本身来说，他们是聚居的，就甲和乙两个民族的相互关系来说，他们是杂居的。因此，聚居和杂居的两个概念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由于民族聚居地方有上述的三种不同的情况，以聚居地方为基础所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大体上也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类型：一、由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为基础而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例如川北平武藏族自治区）；二、由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其中包含了小的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为基础而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例如内蒙古自治区）；三、由几个或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为基础联合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例如广西龙胜地方侗、壮、苗、瑶、伶各族的联合自治区）。

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大小不一，有的区域可以很大，有的区域可以很小。大的如蒙古族聚居的内蒙古地方，这些地方的区域可以大过一般的省区。有的区域比较小，最小的甚至只有几十或几百户人家构成的村落。

各民族聚居区大小不一致，因此所成立的民族自治地方也有

大有小。大小不等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地位也不能相等：有些相当于省，有些相当于县，但也有些比省小，而又包括几个相当于县的行政区域。还有些比县小的，相当于乡。在过去这许多不同行政地位的民族自治地方都一律称为民族自治区，在名称上并不标明它们不同的行政地位。

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宪法草案在这方面作了新的、也是更恰当的规定，就是在第五十三条中提出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种行政区域的名称。自治区是直接由中央领导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州是由自治区或省领导的民族自治地方而本身可以分为若干县、自治县或市；自治县是由自治区、自治州，或省领导的民族自治地方，也是规模最小的民族自治地方。较县为小的民族聚居地方不再设立民族自治机关，不称民族自治地方，而称民族乡。

民族自治地方和其他地方比较：自治区相当于省，但实际上自治区的区域可以比一般的省为大。自治州相当于一个或几个专区，包括几个县，但是专区是省的代行机关，并非行政系统上的一级，不设国家权力的地方机关，而自治州是一级行政区域，设立自治机关的。自治县相当于县。从县到省，一般是两级，而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是三级。

这许多大小不一、情况不同的民族聚居的地方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时，不但所采取的方式不同，在自治的程度上也不可能一致。苏联的经验提供了有力的榜样。斯大林说：“苏维埃自治并不是一种停滞不前、一成不变的东西，它允许自己的发展采取各式各样的形式与程度。”“苏维埃自治的这种伸缩性，是它的主要优点之一，因为这种伸缩性可以包括俄国处在文化经济发展各种不同阶段上的各式各样的边疆。”^①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124页。

我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在程度上差别虽没有苏联那样大，但是同样是有相当的伸缩性的。在《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二十四条规定：“以上列举的自治权利，原则上适用于一切民族自治区。其适用的规模，与各民族自治区的行政地位相适应。”宪法草案区别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乡，明确了不同程度的区域自治。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的国家机关在民族干部、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形式这些主要问题上表现他们的自治权利。当地国家机关是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人员为主要成分组成的，当地国家机关的具体形式，依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志愿。当地的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时候，采用当地通行的民族语文为主要工具。当地国家机关在工作中要注意运用民族形式。这些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是一切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都具有的自治权，不论聚居地方的大小都能行使的自治权。

较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时候，有条件在他们民族自治地方内进行适应于他们规模的地方性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可以按法律规定的权限在财政、保卫等方面享受一定的自治权利，以便他们能更充分地按民族特点发展起来。这些自治权利都必须有一定规模的民族自治地方才能行使，较小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事实上不可能享受这些自治权利。比如只有几百户人家的聚居地方，全部的税收有时也不够维持一个小学校，更不需要公安部队的组织，所以即使名义上有这些自治权利也是行使不了的。

宪法草案根据这种事实，总结了过去几年实行区域自治的经验，把民族乡和民族自治地方加以区别。由于区域小，人口少，不能行使那些必须要有一定规模才能享受的自治权利，所以没有设立自治机关的必要。但是这并不是说比较小的少数民族聚居地

方没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了。宪法草案第三条规定的基本原则是不加条件的。事实上民族乡也不同于一般的乡，因为按宪法草案第六十条的规定：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可以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这些具体措施就包括民族干部、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形式等各方面的民族化。民族乡和民族自治地方间的区别是区域自治的形式和程度上的区别；就是民族乡不称民族自治地方，不设立自治机关，没有财政、保卫、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自治权利罢了。

宪法草案第五十三条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并且以专节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宪法草案第六十七条关于自治机关的组织规定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关系。自治机关的组织的基本原则是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基本上相同的，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十一条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本原则。但是各民族自治地方可以采取各种适合于具体情况的民族形式。这些形式可以按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规定。宪法草案第六十八条和第七十一条规定了民族自治机关在民族干部和民族语言文字各方面所享有的自治权利；第七十条规定了在财政、保卫、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各方面所享有的自治权利，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地方的财政，按照国家军事制度组织本地方的公安部队，并且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这三种自治权利是民族乡所没有的。

八、多民族杂居地方和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

凡是在一个区域之内，居住着不同民族，这地方就是多民族

杂居的地方。以全国范围来说，我们是多民族国家，也就是有多个民族杂居在我们国家的领土之内。从一省、一县来说，情况也是这样的。杂居在一个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如果它本身是聚居在一个地方的，他们的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成立民族自治地方或民族乡。这些聚居地方只是整个区域的一部分，民族自治地方或民族乡也只是这个行政区域中的一级地方政权。在领导这些民族自治地方或民族乡的民族杂居区域的国家机关中少数民族的地位是怎样的呢？过去在 1952 年政务院曾通过在这些民族杂居地方实行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办法，就是依据共同纲领第五十一条规定“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建立各民族有代表参加的地方政权。当时因为民族区域自治还在开始推行，为了保障少数民族政治上的平等权利，规定民族杂居地方少数民族参加地方政权的权利是有必要的。但是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已经公布了，根据这个选举法在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所产生出来的权力机关必然是有适当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实质上必然是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所以这个专称已经可以不必特别提出来了。

按选举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名额是 150 人，并规定除了这个固定数目之外，如仍有少数民族选民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者，不计入 150 人名额之内。全国各少数民族人口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1/14$ ，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人数，预计实际上会接近代表总数的 $1/7$ 。这是对少数民族合理的照顾。同样的精神也适用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凡境内有少数民族聚居区者，每一聚居的少数民族均应有代表出席，而且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也应当在名额上受到照顾。这些规定基本上解决了民族杂居地方少数民族政治上平等权利的问题。

少数民族人民有些散居在汉族地区的。他们大多居住在城市和集镇。他们曾经在反动统治下长期地忍受着民族的压迫和歧视，有的过去曾经不得不隐瞒自己的民族出身，改变自己的民族成分，遮盖自己的民族特点，以求生存。政务院在 1952 年曾通过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这个决定受到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热烈的拥护。

民族压迫制度已经消灭的今天，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有时还发生被歧视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残余，忽视民族特点，对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尊重不够。宪法草案对于大民族主义在序言中即加以反对，并且在总纲第三条规定了“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第八十八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些条文都是在实质上保障了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的民族平等权利。宪法草案的第五十八条更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这个规定包括了对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平等权利的保障。

我们的宪法草案对少数民族享受民族平等的保障真是面面俱到、无微不至了。不论是聚居的、杂居的和散居的少数民族人民已经不可能再受到歧视和压迫，民族压迫制度永远不可能再在我们的国家中出现了。

九、为实现过渡时期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而奋斗

四年多以来，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执行了在过渡时期民族问题

方面的总任务。这就是：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来建设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建设祖国的共同事业中，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步地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民族得以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宪法草案已经肯定和明确了我们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道路。各民族人民必然将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以实现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决心来热烈欢迎我们宪法草案的公布。

1954 年 9 月 3 日

话说呼伦贝尔草原

一、初访草原

呼伦贝尔草原在蒙古高原的东北角，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

从北京坐火车，出山海关，过沈阳、哈尔滨，一直到黑龙江的边境，一路全是平地；但是一进内蒙古自治区，车子就向上爬，愈爬愈陡，到兴安站附近，车子得打着圈上坡。几个小时里，我们从海拔 200 多公尺的平原爬上了海拔 600 多公尺的高原。

这段路，像是登石阶，石阶尽头是个平台。这个平台有浙江省那么大。这石阶就是兴安岭，这平台就是呼伦贝尔草原。北京——莫斯科的国际列车要穿过这平台才出国境。

在这平台的西部，靠近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有两个湖泊：呼伦诺尔和贝尔诺尔。蒙古人称湖泊叫诺尔。呼伦贝尔草原的名称是从这两个湖泊得来的。

这个平台上遍地都长着草，除了草别的东西长得极少；除了河流旁边有些灌木外，树木是不很容易见到的。平平的一片草，一望无际地绿到天边。所以说这是个草原。

我以前没有到过草原，只念过这句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到了草原我就想起这句诗来了。

在我没有上草原前，这句诗给我的形象是这样的：一片广阔无涯的平地上，长满了高高的草。西北风一阵阵吹来，草在风中起伏地摆动，像是海面上的波浪。当草浪下伏的时候，露出了一

群群牛羊。风过处，牛羊又给遮住了。这风景想起来是相当荒凉的——但是我到了呼伦贝尔草原上一看，却并不如此。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草长得并不高。正确地说：不如用“浅草没蹄”来形容它似乎更恰当些。即使没有风，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远处成群的牛羊。我去旅行时，虽则已属初秋，但是一股盎然生气，却给我以丰满富饶的印象，引起了我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的联想。

自然，我们并不怀疑写这句诗的诗人的否忠于现实，因为有人朋友告诉我说，有很多地方的草原的确长着很高的草。我也并不是想比较草高好看，还是草矮好看，这是无关宏旨的。我在这里想到的倒是有关草原前途的问题。

就让我们谈谈草原上的草罢。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草，如我们所见到的，一般说，是长的肥而矮。当地的牧民一再和我们说，这地方的草好，羊也好。他们告诉了我们很多草名，但对于我们这些平时和草木鸟兽接触得极少的人，听了印象都不深。在这些谈话中，我们却很清楚地看到当地的牧民对他们的草原，尤其这草原上的草，真是有感情。我们也相信他们的感情是有根据的。呼伦贝尔的羊长得好，早就有名。我们亲自尝过这有名的羊肉：细、嫩、不膻，一点不虚传。草长得好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草好在哪里呢？我们请教老乡，老乡回答我们：草长得矮，就容易肥，油质足，养分多，牲畜吃了长肉。我们问他们草长得高好不好呢？他们听了我们的问题都笑了。用于比着半身高，说：我们这里的羊不会仰着头吃草的。听来他们不很相信草长高了还能养羊。呼伦贝尔草地上有半身来高的草的确很少。

另一个场合，我们和几位牧民朋友聊天，问起他们的牲畜好不好。他们说那年春天如果没有风暴，现在羊群可就更大了。原来在那次大风暴里冻死饿死的羊不少。我们就问他们，天有不测

风云，我们有没有办法把羊保护起来呢？这位牧民是个积极分子，抢着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响应政府的号召，组织了起来，一面凑了钱去拉木头来搭棚，又贷了一座打草机，储了草，以后即使再碰到风暴也不会再遭殃了。我们听了很高兴，但是从蒙古包里望出去，尽是一片矮矮肥肥的草，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要打草的话，草长得不高，不是有困难么？我们就问他们在哪里打草，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他们回答我们：可远着哩，一天还走不到。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追问下去。究竟草是长得高的好，还是矮的好？我们还是不很明白。

讲社会发展史的书本上告诉我们：草原上的人们最初是靠狩猎过日子，后来把野兽驯服了成家畜，开始畜牧。畜牧的方式最初是让牲畜自己去找草吃，人跟着牲畜移动，所以是游牧。后来才把牲畜固定起来，人出去打了草运回来喂它们，成为定牧——这样讲来，在游牧方式中所谓好草，在定牧方式中不一定也是好草的。呼伦贝尔过去一直是游牧地区。解放初期政府发动牧民打草，预防风暴，一般牧民还不太容易接受，因为过去并没有这种习惯。今后牧业发展了，是不是会遇到草长得不高，打起草来有困难的问题呢？

对于草，我们懂得太少了，但一到草原，没有法子不发生一连串有关草的问题。比如，有位朋友说，如果这些草不适宜于定牧，我们不是可以用拖拉机来把地翻了，重新种一批新草。老乡听了又笑起来。他们说，这里的草是靠草根长出来，并不是靠种子繁殖的。他们最讨厌的是地老鼠，因为地老鼠专门吃草根，草根一破坏，一片地就没有用了。

老乡们指着那些开着花的草说，这些都不是好草，牲畜不喜欢吃。有位朋友就说：牲畜都挑好的草吃，坏的不吃，结果不是好的愈吃愈少，坏的愈长愈多么？老乡听了又说不对，草不怕吃，愈吃愈旺。

究竟草原上的草怎样能长得更好，我们摸不出个道理来。不错，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我们不去总结老乡的经验，不用科学的理论来加以批判接受，不去做实验，不研究，这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我们不知道研究植物学的朋友是否已经注意了这些问题，是否想到我们中国有这样辽阔的草原，而在草原上有很多问题等待他们去研究解答。我们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可能都是外行话，但是如果能引起研究植物学的朋友们的注意，那么我们的话也不能算是白费的了。我很想在这里建议他们在假期中，多到草原上去旅行旅行。

再说说牛羊罢。

像我这样在太湖流域生长大的人，一到草原上，免不了会想：这样广阔的土地上不种庄稼多可惜呀！这种重农轻牧的思想，对于没有到过草原的人是很自然的，但是再想一想，就不难明白这是不对的了。

草原地高，寒冷的时期长。在北京还没有生炉子的时候，呼伦贝尔已经被白雪盖满。而且地气寒，很多地方就是在8月里，掘地2尺到3尺深，还会碰着冰层。在这种自然条件下种庄稼是有困难的。当然这些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困难，我们在海拉尔就知道有一种耐寒的麦种已经证明可以在这地方生长了。但这是最近的事，过去是没有的。

在这种地方，最适宜的是长草。有了草，人就有办法生活了。人不能吃草过日子，但是可以养吃草的牲畜，人再在牲畜身上打算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

草原的特点是恰好具备了牧业所必要的条件。不但有着遍地的草，而且有水泊和河流。草原基本上是平坦的。天下了雨，或是地上积雪融化了，水就流向低洼的地方，由少积多，汇成大小不等的水泊。这些水一般流到海里去，土地里所含的矿物质，特别是碱和盐，也就留在水泊里。草、水、碱和盐，正是牲畜所必

需的生活资料，所以草原是天然的最理想的牧场。

人类很早就利用了这些优良的自然条件来发展了狩猎和畜牧。

呼伦贝尔草原到如今还保留着近万年来人类劳动智慧所创造的纪录。我们在海拉尔第一中学里就看到了学生们从草原上搜集来的石器。这些是大约 1 万年前在这地方居住的人所用的工具。它们的特点是细小、灵巧，只有手指那样大小，在考古学里称作细石器。一般认为这是特别适宜于狩猎和畜牧的工具。从这些遗物上我们不但可以知道这个草原在 1 万年前已经有了人，而且也可以看出来，那时候，他们已经善于利用这地区的自然条件，发展了狩猎。

或者有人会说，草原很适宜于畜牧，而且草原上很早就已经有了畜牧，那自然是事实，但是现在假如有条件可以种麦子了，把草原开辟成农场不是更好么？

如果我们缺粮食，草原上种麦子，增产些粮食，那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不但需要吃面食，还需要吃肉、喝奶。像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很显然地必须有很大的牧场才能供给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现在全国的人每人都吃半斤羊肉，就要 300 万头羊，就是说要吃去六个呼伦贝尔那么大牧场里现在所有的羊。我们的羊还是太少了。

牲畜的用处可大哩。肉和奶之外，还有皮、毛、骨，样样值钱，都是工业原料。英国就是以羊毛兴起的。机器纺织业初起时，为了要羊毛，地主们把很多本来种庄稼的地圈了起来养羊，以致很多农民失了业。羊毛是历来帝国主义所垂涎的对象。印度克什米尔的羊毛固然著名，可是因此帝国主义在这地方作的恶也是有名的。澳洲那是更惨了。因为帝国主义要羊毛，要牧场，澳洲的许多土著民族活活地被他们屠杀干净。这些罪恶不能算在羊毛身上，应该算在帝国主义身上。但是却更可以说明了羊毛是多么重要的工业原料了。

我们现在的問題不是牧场太多太大，而是牧场里的牲畜还不够多。让我们多多关心我们的牧场，多多认识我们的草原，这是我们国家的宝库。我们的祖先已经在草原上辛勤劳动了近万年，留下这份宝贵的遗产，现在是我们用我们的劳动，用我们的智慧，用机器、用科学来开发这个宝库的时代了。

二、牛奶和羊肉

草原上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呢？

简单地说：草原上的人民的生活离不开牲畜。他们利用了牲畜所能供给的一切，几乎解决了他们生活上一切的需要。

先说说他们的吃。

他们吃的主要是牲畜的奶和肉。

到草原上去做客，在蒙古包里坐下，首先接触到的是他们的奶茶。草原上的人们是以好客著名的，不论是熟悉的朋友或是初来的生客，他们没有不殷勤招待的，客人一到，主妇就忙着为他们煮奶茶。

蒙古包中间都有一个炉子，经常生着火。现在比较考究的人家都有一个烟囱，这是一种近代设备。客人到了，主妇就在炉子里加些燃料，把火笼大了，放上个锅子煮水。草原上树木是十分稀少的，当然更谈不到煤和炭，草料要留着喂牲畜，所以燃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就是烧牛粪，牛粪晒干了并没有刺鼻的臭味，而且火力很大，的确是很好的燃料。

水在草原上是很宝贵的，时常要用牛车从很远的水泊里拉回来。草原上的水大多盐味太重，有些地方的水颜色发黑，我们这些外客喝来不很习惯，但是对于牲畜却特别好。

主妇等锅子里的水开了，打下一角茶砖揉碎了投入锅里。锅

里的茶熬了一些时间，接着把牛奶倒在锅里煮开，就是一般所谓奶茶。有的人家在奶茶里加一些栗子米和盐，很可口。

他们用桦木碗装了奶茶，一碗碗地端给客人喝。客人刚刚喝完，主人赶紧又把他的碗斟满了。我起初不懂得规矩，来一碗喝一碗，看看没有个完。同去的朋友指点我，如果不想再喝时，可以把碗还给主人，说一声“却挡”。主人也必然很爽快地把碗收起，不像内地一般你推我劝地讲客气。

一般在请客人喝奶茶时，总是要端出各种奶品，一盘盘地摆在一张小几上。这些奶品中很多是我们在内地没有吃过的。奶品中最普通的是奶干和奶皮。新鲜的牛奶分出了奶油，用火把留下的汁烤到半干，搓成一片片，在太阳下晒成奶干。奶干的味很浓，带酸，我们这些初上草原的人，不大习惯，但这是草原上的人们经常爱吃的东西。奶皮的制法不同，把新鲜牛奶在锅里轻火慢煮，逐渐凝结成一薄片，像黄蜡，又脆又香，着实好吃；但油质多，多吃了不好消化。奶干、奶皮之外还有奶酪，奶酪在北京也吃得到。牛奶发酸后，把水分压出，就成奶酪，像我们南方的豆腐花。

我们在蒙古包内做客的人所吃到的奶茶和奶品，也就是这草原上的人们经常吃的东西。他们每天要吃三餐，就是以这些为主，有时加吃些面条和肉。在夏天和秋天较少吃肉，主要是喝奶。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牛有好的草吃，牛奶出得多。

普通说来，母牛在3月里下小牛，就有奶。每天早晚可以挤两次。开始挤奶时，奶量少，后来愈挤愈多，而且愈甜，连续可以挤八个月。到10月以后，母牛怀了孕，奶就干了。因此到了冬天，虽则由于有些母牛生产得较迟，到那时还出奶，但一般说是比较少了。所以各家在母牛下奶多的时候，多做些奶干、奶皮，储存起来，到冬天吃。

草原上家家养牛，而且大多养一大群，牛奶多得很，一家人

吃不了。过去，牛奶多余了卖不出去，做奶品也很费人工，所以总是要吃多少，就挤多少，其余都留给小牛吃。

西新巴旗有一个牧主，家里有 190 头牛。我们去的时候，有 26 头可以挤奶，6 头只挤了一桶奶。挤奶的方法是这样：天还没有亮就开始了，先是牵小牛来吃一阵，然后把小牛牵开，挤了一阵奶，又放出小牛来吃，这样一头一头地挤，二十几头牛要挤三四个小时。一天挤两次。再加上煮奶，足足要一个人工。

这样的挤法，一头牛一天出不了二三斤奶。其实如果每头牛多挤一些，据他们说，八口之家，有四五头奶牛就够自给了。呼伦贝尔草原奶牛的奶量是比较低的，有人调查过，平均一头奶牛一天只出奶 10 斤左右。但是提高奶产量并不是当地草原上人们的问题，因为现在他们还觉得奶太多，吃不了哩。

牛奶一成为商品，情形就改变了。过去海拉尔市附近有许多俄罗斯人，专门喂奶牛，出卖牛奶。他们把牛养在家里，买了草来喂它们。一头奶牛每天可以出四五十斤奶，一家有两三头奶牛就能维持生活了。如果草原上都能养这样的牛，牛奶都能卖出去，牧民的生活不是能大大地改善了么？

现在海拉尔有了一个奶品工厂，天天派了汽车到草原上去收购牛奶。草原上已经开始发生了新的景象。远远看见汽车来了，老老小小，急急忙忙从蒙古包里提着各式各样的桶盆罐壶，端着牛奶出来迎接这送财富上门的汽车。有个地方只有一家牧民，汽车不到他们那里去。他们每天用牛拉了两大桶奶走四五里路，在半路上等汽车。一天卖出 30 公斤，每月就有八九十元的收入。

到草原去收购牛奶现在还不很普遍。首先是奶品工厂还少，而且规模也还小。假如草原上的奶牛都挤了奶，每头奶牛一天都出几十斤奶，那就要很大的工厂来加工，或是要有很多的冷藏仓库来储藏，和冷藏运输设备来运销。现在还没有这些条件。不但这样，就是要把现在草原上多余的牛奶收购一下，运输工具也还

是大大的不够。据海拉尔的奶品工厂的朋友说，由于汽车少，只能在海拉尔附近收购，又因为汽车没有冷藏设备，不能走远，更怕抛锚，一抛锚全车的奶可能一下都坏了。

草原上有的是草，可以喂养很多很多的牛。牛有的是奶，牛奶也正是我们到处感觉到不够的东西。内地很多缺奶的母亲不是经常在为孩子的营养发愁么？草原上的牛奶能运到内地来，会受到多少人的欢迎呀！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业还不发达，工厂里还不能大量制造冷藏火车、冷藏汽车，以致草原的牛奶运不出来，可见没有发达的工业，牧业也是发展不起来的。

牛奶如果能运出来，卖得起价钱，喂牛的牧民当然会挑奶出得多的牛来喂了。这样，草原上就会出现品种好的奶牛了。他们也不会再像现在一般，每头牛只挤一下就放过去，一定会好好地挤，尽可能地挤，如果草原上电气化了，还可以用机器来挤，牛奶产量也就会大大提高起来。这一切都必然会实现的，但是必须工业先发展起来。

关于牛奶，我们就说到这里。

草原上的人们除了吃奶品，主要是吃肉。牛肉当然也可以吃，但是他们是轻易不宰牛的，因为母牛可以产奶，公牛可以拉车。他们需要吃肉时是宰羊。

我上面说过，夏秋两季草原上的人们主要是喝牛奶和吃奶品，不很吃肉。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那时牛奶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舍不得在那些时候宰羊。一般人家都要到冬天才宰羊。秋天，天高气爽，草长得旺，羊长得肥。到冬天，草少了，羊会瘦下去。所以最好是在初冬，羊还是很肥的时候宰。冬天宰羊还有个好处，肉不会坏，可以慢慢地吃。

羊肉的吃法有煮的和烤的两种。把羊肉煮熟，切成大块，用手撕来吃。这种吃法，没有坚强的牙齿和肠胃，是不行的，而草原上的人们却都具有那种坚牢洁白的牙齿，使城市里长大的人望

而生爇。对于我们，烤羊肉还比较容易应付，因为烤的肉条比较细嫩，容易咀嚼。至于消化，那是另一问题了。

提起草原上的人们的食肉量，那是惊人的。据说年轻小伙子一顿可以吃上一只羊羔。这可能是有些夸大，但是一个人一顿能吃十几斤肉却不算稀奇。这样吃上一顿，好几天可以不再吃肉。这是在冰天雪地里放牧生活所必须锻炼的本领：能饱食，能耐饥。

在过去困难的日子里，贫苦的牧民哪里能有很多的肉吃！但是现在确实不同了。我们访问了一家牧民，八口人全年吃了100多只羊，另外还吃了4头牛。按他们好客的风俗，这些牛羊宰了并不会都是家里人吃掉的。但是平均算起来，家里人每天也要吃到2斤或3斤肉。实际上在冬天他们每天所吃的肉还要超过这数目，因为在夏天和秋天普通是很少吃肉的。一方面说这固然是一种合于这地方气候的习惯，但是另一方面说，假如面粉和其他食品能供应得更方便，更便宜，这种习惯也会改变得更经济和更合理一些的。据我们知道，已经有人感觉到这样大量宰牲畜来吃，对于牲畜的繁殖是很不利的。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家人一共只有1000多只羊，一年就吃掉了1/10。这数目不能算是小的了，普通羊群的自然增加率每年也不过是45%。宰得太多，羊群发展会受影响，这是很自然的。

草原上不种五谷、蔬菜，所以草原上的人们要吃面食和蔬菜就得依靠外地供应。过去，从遥远的地方把面粉运上草原是极困难的，运费太大，普通的牧民享受不到。现在可也不同了。大批的牛羊马匹从草原上运出来，相应的大批日用品向草地输送，大卡车接上火车，装着的很多是面粉。在计划供应以前，草原上的人们生活改善后，赶一次庙会常常把一年的面粉都买足了。一家人不是买一袋两袋，而是装上一车两车。反正有的是拉车的牛，拉着面粉，跟着人，在草原上转动。

面粉大量地到了草原，草原上的人们除了奶和肉之外有新东西吃了。我们到蒙古包里做客，和奶干一起端给我们的是各色的月饼、饼干、面包、冰糖，一盘盘地摆满了一矮几。陪我们一同去的朋友告诉我们说，蒙古人现在很喜欢吃甜食，和我们苏州人有相同之处。当然，草原上有甜食吃，而且甜食已成为草原上的人们待客的东西，实在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这说明了草原已经不再是塞外偏僻之地，而是整个经济交流的大网中的一个部分了。

他们也喜欢吃挂面。挂面是制成品，对于开始吃面食的牧民是比较方便的。他们把羊肉切成块，和挂面一起煮。这和奶茶一般也是普通飧客的东西。我们每到一家，一定是吃一顿羊肉挂面才放我们走。有一个下午，我们一连走了四家，吃了四顿。尽管这样，我到了最后一家，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还是一连吃了两碗。这种羊肉挂面确实是很好吃的。

在草原上做客的人，对于草原上不容易吃到蔬菜这一点，不免觉得美中不足。草原上并不是不能长蔬菜。我们坐在火车上，就注意到在草原上各个车站附近总是有个菜园，所长的洋白菜很肥大。那是车站上外地来的人自己种来吃的。海拉尔车站附近1亩菜地可以出3000多斤洋白菜，产量算是很高的了。

为什么草原上的人们不种蔬菜呢？我们想这并不是由于他们不要吃蔬菜，而是由于他们老是跟着牲畜移动，定居不下来。菜园移动不得，种了也吃不成。而且蔬菜容易霉烂，除非有现代的运输工具，不能像面粉一般，从外边运进去。草原上历代的人们都很难吃到蔬菜。他们从小不吃，就养成了不吃蔬菜的习惯了。

我们在海拉尔附近的南屯，看见那些已经定居的达斡尔人，家家有个菜园子。我们到了西新巴旗的大坝，合作社里就有大白菜和土豆。但是不敢放在外边出售，生怕一下就卖完了。这就说明草原上的人们是需要蔬菜的，也喜欢吃蔬菜。有人说草原上的人不会吃蔬菜，那是不足相信的。

三、蒙古包和游牧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人们大多住在蒙古包里。

蒙古高原上的牧民都住这种毡房，所以称蒙古包。这种毡房随时可以张搭，随时可以拆卸，便于迁移。里面是木架，分上下两个部分，下面是一个半身来高的圆形围屏，上面是一个像张开了的伞一般的盖。这个木架可以拆成几块，折叠起来，不占地方。木架外面盖上和围上了毡子。毡子是羊毛打成的，不透风。一个蒙古包最多时要用上 40 多块毡子，值几千元，用上 5 年到 10 年就坏了。蒙古包的价值比土房要贵得多。有些地方在夏天改用柳条、树皮、芦苇或雨布来代替毡子，可以节省些。

蒙古包有大有小，普通直径有三四公尺。包内可以放一个佛堂，两张矮床，两个橱，中间一个火炉。环炉坐上 20 多人并不觉得太挤。我们看见过一个最大的蒙古包，放 10 多张床，中间加上了木柱。这样大的蒙古包并不是普通的住所。

蒙古包里陈设大多很简单，不像农村土房里那样，各种各样的家具、箱柜、瓶瓮、罐壶堆满一屋，甚至是几代的累积。经常要流动的蒙古包累积不起这样的包袱，而且蒙古包不兼做仓库。食品、衣服甚至首饰并不保藏在蒙古包里，而放在专门制成可以贮藏的车里，这种车是有轮子的箱子，什么时候要搬家，套上头牛，拉了就走。我们称它作流动仓库。

蒙古包主要是厨房兼卧室，有客人来时是客厅。

一家有一个或两个蒙古包，但是车子却有一大排，10 多辆到 20 多辆。一辆接一辆，排列得很整齐。车轮很大，便于草地上转动。远远望去，一行圆轮，很惹人注意。我想起古代北方的高原上有个高车国，据说就是从大轮子上得的名，可能就是这类

车子。

蒙古包和大轮车，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草原上的人们随时都准备着移动的。

草原上的人们非这样老是移动不成么？那倒并不如此。当他们还没有把牲畜驯服时，生活也不一定像现在一样。他们可以在哪个湖畔住下，一面捕鱼，一面打猎。没有野兽过来，可以出去找，打着了野兽拉回来。他们不必老是搬家。但是自从有了牲畜，他们开始住不定了。牲畜一面走一面吃草，一个地方的草吃完了就得走到另一个地方去。牲畜走，人跟着走，住处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常要搬家，这叫游牧。

草原上的人们的居处老是定不下来了么？那也不见得如此。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只要我们有办法，不必牲畜自己去找草吃，能把饲料运回来喂牲畜，牲畜一旦住定在一个地方，人也就可以定居下来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只是游牧时期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会变的。

游牧并不是漫无限制地在草原上流动，也不是天天搬家。游牧是有规律的。首先是有一定的牧场，流动有了范围，其次牧场分季候交替着放牧，流动有了路线。而且有很多人在这草原上放牧，很多牲畜在这草原上吃草，大家流动着而不会引起混乱，没有规律怎成？

草原上的行政系统是盟、旗、索木、嘎查。盟相当于内地的省，旗相当于县，索木相当于区，嘎查相当于村。从盟到索木都有一定的境界。这个旗或这个索木的人要把他们的牲畜放到另一个旗或另一个索木的牧场上去，必须事先得到对方同意。所以一般说一个人只在自己索木的范围内流动。

同一索木的许多嘎查每年要共同商量好怎样分配牧场的方案。各个嘎查按照了议定的路线移动，所以不会发生争草地的

事。同一嘎查的人在附近地方放牧，他们的蒙古包也不一定要扎在一个地方。只是若干亲近的人家才在一起。同一嘎查的人也不必同时移动，只要在一个路线上移动就可以了。

一个索木的牧场分两个部分，一是夏营地，一是冬营地。气候不同，所需的牧场条件也不同。夏季天热，牧场要高爽些。草不宜高，草高了蚊蝇多。蚊蝇虽小，危害却大。牲畜很怕蚊蝇，马群有时因此走散，牛羊因此疲乏消瘦。夏营地必须靠近河流水泊，以便牲畜饮水和洗澡。在夏秋两季必须预先划定冬营地，不许牲畜入内，保护冬营地的草，留到冬天去吃。更要打了草，堆在冬营地，风雪太大，牲畜找不到草吃时，可以把这些草喂它们。冬营地最好是要有能避风的地方，如果能建筑些木棚、畜舍，当然更好。冬天水倒不成问题，到处有雪，牲畜会嚼雪解渴。

在夏营地放牧时，一般停留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可以比较长一些，半个月到20天搬动一次。在冬营地搬动得勤，三四天就要搬一次，那是因为雪底找草比较困难。

现在让我们说说放牧的情形罢。不同的牲畜，放牧也不同。

先说羊，羊是小牲畜，走得慢，走不远；软弱，保护不了自己，晚上要圈起来。放羊不能离蒙古包太远。如果蒙古包附近的草吃完了，又不想搬动蒙古包，放羊的人得另外搭个小帐篷，在羊圈附近过夜。

1000多只的羊群是很普通的。散在草地上，白绒绒一堆一堆像是天上的云。这样的羊群有一个人照管就够了。放羊的人带着狗做助手。狗是很能干和负责的，它会把羊轰在一起，不让它们走散，而且善于保卫羊群。当我们走近羊群时，总会碰着肥大长毛的狗，四面袭来，挡住我们的去路。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羊，主要是绵羊，山羊不多。但是一大群绵羊中常夹杂少数山羊。山羊矫健胆大，在羊群中起带头作用。有一次我们遇见一群羊要过桥，绵羊畏缩不前，乱哄哄地东躲西

窜，赶羊的把几头山羊轰在前面，山羊上了桥就向前走，其余的羊也都跟着走了。而且冬天冷，绵羊不爱动，伏在地上容易冻坏。山羊却喜欢动，不时在绵羊群内打搅，绵羊不得不动动，也可以有些运动。

平时，放羊并不很紧张，现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狼已经很少了，不容易出危险。所以千来只羊有一个人招呼就够了。但是到春天母羊下羔子时，情形可不同了。过去对于母羊受孕时期不加控制，有时天还很冷，母羊却下起羔子来了，而且可能在放牧时下羔。所以在那个时期，放羊的人经常背一个皮囊，收了羊羔，放在皮囊里，不致冻死。

接羔是草原上最紧张的事。两岁以上的母羊一般都要下羔，普通人家要接几百只羔子，全家人手都出动，有时还照顾不过来。所以劳动力少的人家有的把母羊托别人照顾，给人家一定的报酬。解放前羊羔死亡率很大，现在政府大力地号召保畜，羊羔的生存率已超过80%。

可惜我们去旅行时已是初秋，没有赶上接羔的季节。听说照顾羊羔是件很生动的工作。不但接羔时不分昼夜，看到新生的羔子那样的和善，谁也不会不感到它们的可爱。而且小羊和母羊间的关系也很有趣的。他们告诉我们说，有时母羊脾气不好不肯喂奶，就得好言好语地劝导它们，劝不听，得唱歌哄它们。听来似乎母羊懂人的语言一般。

放羊的人整天在羊群里生活。他不但认得每一只羊，知道它的特点，它的脾气，它的个性，甚至知道羊与羊之间的亲属关系。他爱好这羊群，羊群也喜欢他。原谅我不能更生动地写出他们之间的感情。和我们一同去旅行的朋友中有一个在解放前帮过人家放羊。他一谈起他羊群里那只“老家伙”，眉飞色舞，话没个完，像我们谈起了熟悉的老朋友差不多。

我又记得有一次在一家蒙古包里看见一个老太太在喂一只小

羊羔吃奶，她很亲热地抚摸着这小羊。她告诉我们，这小羊瞎了眼，不能跟母羊出去，真可怜。旁边有个小孩搂着小羊闹着玩，真像是一个家庭里的成员。

牛和羊类似，也是家家养的牲畜。母牛供奶，公牛拉车。一家人必须有几十头牛才能独立生活。普通人家养的牛都是为自家用的，但也有繁殖了牛出卖，这些人家的牛群也有很大的。

牛群和羊群并不混杂，但是都离蒙古包不远。牛更靠近些，因为每天母牛要拉回来挤两次奶。它们的动作是慢吞吞的，特别显得稳重。汽车当着它们的面驶去，它们一点也不慌张，也不让路。幸亏草地上汽车不必跟路走，可以小心地绕过它们。

关于马，留着在下篇再说。

呼伦贝尔草原上也有人家养骆驼，但是数量很少，比不得其他牲畜。马和骆驼都是养来骑的，是草原上的交通工具。一家有几匹马就够用，没有骆驼也没有关系。只有羊群牛群很大的人家，在冬天放羊放牛时用骆驼。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牧民基本上还是自给经济，羊和牛是生活资料的来源，马是交通工具，都不能没有。如果缺了哪一种就不能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只能到别家去帮工。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如果牲畜少，有多余的劳动力，可以接收别家的牲畜来代放，每年收取一定的报酬。

在这种自给的畜牧经济中，每个蒙古包之间没有什么分工。牧民之间也没有经常进行的贸易活动。你有的我也有，你没有的，我也没有。草原上没有的东西必须和草原之外的人去进行交流。

这种自给的游牧生活，在这草原上可能已经很久了。历史上开始记载草原生活时，已经记下了“适水草迁移”的基本情况，当时的毡房，可能没有现在所见到的蒙古包那样好，但是也有理由想象，基本上就是这种形式。很可能一直要到工业发达了，草

原上几千年来的传统生活方式才会发生基本改变；草原上人们的生活也才能飞跃地提高起来。以呼伦贝尔草原来说，这种改变已经开始了。

四、草原上的马

稀稀落落散布在辽阔无边的草原上的蒙古包，一隔就是几十里，甚至几百里，而且时常在移动，依我们想来，它们之间消息一定不会太灵通的，而事实上却不然。比如我们到西新巴旗的第二天晚上，决定下一天去访问一位劳模，第二天我们去访问时，一路就有骑了马的人等着我们，邀我们到他们的蒙古包里去坐坐。我觉得很奇怪，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会经过这些地方的呢？陪同我们去访问的干部同志笑着向我们说：“草原上有无线电，传得可快哩！”他所说的无线电就是草原上的马。消息一上马背，就飞一般地传开了。

马把辽阔的草原缩小了，把分散的、流动的蒙古包联系了起来。

草原上的人们离不了马，这是他们的腿。行动不能没有腿，他们人人有马骑。而且出门不论远近，总是跨在马背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是这样。

在那么大的草原上，绝不会看见一个徒步往来的人，如果一个人靠了自己的两条腿走路，草原太大了，走上一天不一定能碰着一个水源、遇到一家蒙古包。找不到吃的，找不到喝的，绿草无边，呼天无门，那就危险了。

我记得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成吉思汗有个祖父叫忽图刺。他有一次出去打猎，途遇敌人袭击，单骑被逐。他的马走入了一个泥淖，他从马蹬上跳跃到了对岸，而那匹马却陷入了土

里。这时敌人赶到了，看见他已经失了马，也就不再追赶了，说：“没有了马的蒙古人还能做什么呢？”他们料想这个人一定没有了命。忽图刺虽则侥幸没有死，但是这个故事也充分说明了草原上没有了马的人是不容易生存的。

草原上的人没有马是不可能想象的。但是这里不妨提出个历史问题来：岂是人先驯服了马才走上草原的？

那显然是不对的。即以呼伦贝尔草原来说，也是先有人，后有被驯服的马；也就是说，有一个很长的时间，草原上的人并没有马骑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在呼伦贝尔就看到了大约是一万年前这地方的人所用过的石器，而一万年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骑上了马背，把马当作了人的交通工具的。那时候的马都是野生的，人们把它们打死了吃它们的肉。

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马首先被驯服了呢？据现有的历史知识说：考古学家在苏联土耳其斯坦和伊朗西部的高原上发现过距今 5000 年前遗下的马骨，所以一般认为里海附近的草原大概是最早把马驯服的地方。但是马普遍地用来为人们服务可能是要到距今 4000 年前的事。那时，马还不是用来骑的，而是用来负重和拉车的。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传说用马来拉车是从夏代相土开始的。相土是殷人，时间在纪元前 1700 年以前。大约就在这时候亚洲的海克索斯人用马驾驶了轻快的战车袭击西方的埃及，而那时埃及还不知道有马。

从这些历史事实看来，我们北方草原上大约要到距今 4000 年到 3500 年前那一段时期中才驯服和使用了马。想来这也是草原上的人们生活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

对于草原上的历史，现在我们知道得还太少，比如说：在没有把马驯服之前，草原上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马的使用引起了哪些具体的变革？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答案。我们所知道的是由

于马的使用，高原和平原之间的关系就密切了起来。这种关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高原和平原之间贸易的开展。高原供给平原马匹，平原供给高原日用品，好像织物、粮食等。这种交换互相间都受到发展经济的利益。我们从古以来中原的马主要是从北方和西方高原上输入的。《左传》这部书上就说马是生长“冀之北”，指的是现在的蒙古高原。周穆王时代关于马的传说很多，出名的八骏是西方送来的。历代向北方、西方输入的马匹为数很多，历史上常常有记载。

另一方面是战争。草原上的人们骑上了马背，成了一股富于机动性和冲击力的武力。这股武力到春秋战国时代已是中原居民的重大威胁。平原上的农民除了学习骑射来抵抗外，主要还是用深沟高垒的防御工程来阻挡这些横行的铁骑。现在还兀立在蒙古高原南边的万里长城告诉了我们当时斗争的严重和尖锐。

在这里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了草原上的人们所创立的庞大无比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的兴起因素是很复杂的，不妨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讨论。只从他们使用骑兵所发挥出来的威力来说，实在是惊人的。顺便可以提到的，培养这帝国的摇篮也正是这呼伦贝尔草原。成吉思汗在占领呼伦贝尔之前，并不是所向无敌的英雄。这肥饶的草原却给了他雄飞宇内的物质基础。

马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和战争中的破坏力，在人类历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个作用我们还希望历史学家能正确地给予适当的估计。

我们在这次旅行中，马给我们的印象是很深的。它是草原上极好的交通工具。我们这次是坐了汽车上草原的。没有汽车，像我这种不会骑马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旅行。当然，汽车上了草原又开始了一个新的世纪，但是在现在的条件下，马还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汽车要汽油，费用贵，接济也困难，而且如果机械一发生阻碍，在辽阔的草原的哪个角里一抛锚，也是危险的。而

马却随处有草可吃，不用为它担心。

草原上的马跑得快，在没有汽车之前，什么也比不上它。跑短距离，它也敢和普通的汽车比赛一下，至少我们所坐的卡车，经常被快马丢在后面。如果要跑长距离，一个人带上几匹马，轮流着骑，据说七八百里的路程一天可以赶到。紧急时候，可以一连跑几天不休息。骑马的人吃一顿饱食，跑上几天再吃。他们什么也不带，轻骑疾驰，这种速度在现代交通工具发明之前是无可比拟的。

消息上了马背，飞一般传开去的说法也不能说是过分的夸大了。

马这种交通工具是很好的，但是要使用这工具却也不是简单的。像我，上了马背还是要摔下来的。草原上的人们从小就下工夫培养出惯于马上生活的本领。还不会走路的孩子已经靠着父母在马上颠簸。六七岁的孩子，不论男女，都已经是熟练的骑士了。这些孩子最大的困难是爬不上马背；只要有人把他们放上马鞍，他们就活跃得像条龙，父母尽管在背后吆喝，也不肯放慢马步。马腿真像是长在他们自己身上一般，喝醉了的酒鬼也不会摔下马来，老态龙钟的妇女一样骑着马飞奔。如果不是从小锻炼，恐怕不可能有这样的本领。

草原上的人们爱马也是不言而喻的。在他们最值得骄傲的事就是座下有匹名马。哪个人有了匹好马，草原上的人全会知道。如果他肯出让，任便他喊价，几十、几百匹马都有人愿意拿出来和他交换。

马的好坏是比赛出来的。草原上每年举行“那达慕”大会，主要固然是为了做买卖，而会上最热闹的却是赛马。打头的马受到群众的羡慕，编了歌到处唱，马的主人感到光荣。

好马不但要种好，而且要培养训练得好。有一匹名马并不是简单的事。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讲讲马是怎样放牧的了。放马的性质和放羊放牛有显著的区别。在我们初上草原的人一眼看来，用家畜二字来称马似乎是很有问题的。羊群和牛群尽管也是自然放牧，但是离不了人。而马，没有人一样能活下去，而且活得也可以很好。马群离开蒙古包常是很远的，晚上也不回来。一匹公马保护着一小群母马和小马。它们自己找草吃，冬天也不怕。马群有时会跑得很远，尤其是夏天，它们最怕蚊虫，常常迎着风飞跑。所以，有时一跑就是几百里，要费好久才找回来，甚至有跑出国界的，草原上发现别地方来的马并不足奇。他们传出个消息，马主人自会来认领。我们知道有一家的马群跑了有半年。这些情况使我们觉得马群不比羊群和牛群，多少还保留着不少自然生长时代的野性。

牧马的主要工作是在训练马匹，使它们驯服，使人能骑得上它们的背。马不是生下来就欢迎人骑的，所以必须一匹一匹地加以驯服、训练。没有训练过的叫生口马，生口马只能算是半家畜性质。

马比人跑得快，力量又大，人空手近不了马群，所以放马的人自己必须骑一匹好马，手里执一根套马杆。套马杆是根有几丈长的木杆，杆头有个皮带做的圈套。他要抓哪匹马，就得用套马杆去套住它的颈项，套住了把皮带扣紧，它就跑不得了。但是套马并不是容易的，没有套住时马会狂奔，如果追不上就完了。套住了还是在奔，挣扎得更猛，如果没有手劲，或是不善骑马，会被它拉下马来。套马是草原上男子必须有的本领。

套住了马，安上鞍子，翻身骑上去。如果是匹生口马，一有人骑上了背，就会百般颠簸，要把背上的人摔下来。训练马的人就要有本领制服这马，不被它摔下来。一匹生口马要经过一遍一遍地这样训练才能成为一匹坐马。

生口马不能出卖，必须经过了训练才能成为商品。所以训练

马是牧马的必要工作。

马的价钱有高下，最好的马是没有价的，如果肯出让，别人可以拿几十匹马来换。普通的上等马要几百元一匹，一般的马也要一二百元。一家人一年卖出几匹马就是一笔很大的收入，而马群却常有上千匹的。这是草原上人们重要的财富。

马的价值虽则比牛羊都高，但是养马群的人家却比较少。普通人家只养着为自己骑的马。我们并不知道一年从呼伦贝尔输出多少马，但听说过去军阀时期和日本统治时期，每年必须交纳大批军马，因为这是个有名的产马区。

现代化的军队中，马的作用虽则比过去已有所改变，但是农用役畜的需要却因新式农具的推广而日见增加。全国估计还缺少1000多万匹农用役畜。怎样在牧区增产马匹已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了。

呼伦贝尔草原在这方面也有责任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

五、组织起来，就有办法

草原上的风光，草原上牛奶和羊肉，草原上一朵朵白云般的羊群，以及像弓弦上飞出去的箭那样的快马，这些都使我们这些初访草原的旅客一见难忘，依依难舍。按这些印象来讲草原，总会流露着对草原生活的留恋。草原生活确是有许多值得流连忘返的地方。草原的富饶，谁也不能否认。草原的前途，更充满着光明。

但是如果我们只讲这些那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想到牧民怎样艰苦地克服种种困难，怎样和自然斗争，又怎样从残酷剥削和压迫人的封建势力下解放出来，我们对于现在草原人民的幸福是体会不深的。更重要的，草原并不只是个游览憩息的地方，而是

我们国家的生产基地。草原上的人们虽则已经得到了解放，但是生活是简单的，生产是低落的。这一大片牧场还可以几十倍、几百倍地繁荣起来，牧民的生活还要提高，还要改变。

我们不但要看见现在的草原，还要看到明天的草原。

现在的牧民比起过去那是天壤之别了。但是如果和明天比那却又寒碜了。

不论草原上的人民，以他们的勇敢和勤劳，克服了多少困难，战胜了多少敌人，创造了多少宝贵的经验，但是在生产上，总是超越不过个体经济，总是一家家各自经营自己的牧业，这样的方式，尽管怎样发展，还是有限度的，离开贫困还是远不了的。

一家人是一个生产单位，牲畜多了，又要看羊，又要放牛，放马；照顾了这里，那里落了空，一家的人手管不过来；好容易长大了的牲畜，来了狼群，活活拖走；尤其是牲畜生育的季节，小羊羔出生了，保护不周到，冻死、饿死，多心痛？如果牲畜少了，一家只有几头牛，几只羊，还得有人去管它们，放好了，还是吃不饱；出去打零工，搞副业，又惦记着家里的牲畜——真是牲畜多了不好办，少了更不成。

土地上能长的是草，牲畜自己会繁殖，年年生育，但是如果人管不好，牧业还是繁荣不起来。

毛主席的红太阳照到了草原上，人们的智慧又发挥了。“组织起来”，这个声音冲破了历久限制着牧业的桎梏。

呼伦贝尔和其他草原一样，开始了新的世纪。草原的面貌在改变。草原上的人们歌颂我们伟大的共产党，共产党带来了草原上人们富饶幸福的广阔前途。

我们从海拉尔坐火车到满洲里；从满洲里坐了将近一天的汽车，到了西新巴旗。西新巴旗的人民政府是在阿拉坦额莫勒，就在历史上有名的成吉思汗发祥地克鲁伦河的附近。这地名翻译出

来是金马鞍。还有个传说，成吉思汗在这个地方打过仗，曾经把金马鞍落在河里。这是片富饶的草原，在呼伦和贝尔两个湖泊之间，水草丰美。

第二天，我们就去拜访劳模代表忠对的常年互助组。忠对事先已经知道我们要去参观，在他们互助组附近的一个蒙古包里等我们，一看见我们到了，没有交谈，就骑上马带领我们的车，到他家里去。我们坐定了，陆陆续续地来了许多位互助组里的组员。忠对的蒙古包是比较简朴的，他说话也不多，但是很扼要和诚恳。

他谈起了互助组的情形，现在已经有 8 户 31 个人，17 个劳动力，羊有 3000 多只，牛马骆驼有 600 多头。他一再说，这些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如果不是旗、索木许多干部们经常帮助，哪里会有今天。

这完全是事实。内蒙古解放前忠对是个牧工。他年幼时在庙里当小喇嘛。父亲死了，经济困难，他从 18 岁起就帮人家讨生活。内蒙古解放时他还是个帮工。忠对是个爱劳动的人，他把历年的工资累积起来，有了 50 头牲畜，1949 年起就自己独立经营了。牲畜是他的生命，他无微不至地照顾它们。冬天冻坏了的羊羔用自己的被子包裹，救护它们。这样辛勤的劳作，在草原上赢得了群众公认的劳模。他参加了乌兰浩特的劳模代表大会，又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工农兵劳模代表大会。

他说，他在会上听人家说互助合作怎样好，但是听不懂汉语，翻译很费事，还搞不清楚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后来在报上看到了李顺达互助组的报道，他心里才亮了。1951 年互助组成立了，有 7 户参加了组。这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第一个牧业互助组。当初牲畜不到 2000 头，现在已快增加了一倍。他几次很惋惜地说，去年大风雪，他们没有很好预防，损失了一些，不然现在的畜群还要大。

我们问他，互助组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如果没有互助组，他家里的牲畜就照顾不了了。他有个老母亲，60多岁了，劳动不了；爱人又有病，孩子太小。自己放了马，谁去管牛和羊呢？有了互助组，各家的马在一起放，羊多的人家拨一部分给羊少的人家放，按规定算工资。这样牲畜多的人家不愁牲畜没人照顾，牲畜少的人家，劳动力不会浪费了。大家有好处。剪羊毛的时候，互助组全体动员，羊多的也按规定付工资。

互助组是这样从相互的实际利益基础上组织起来。组织了起来，互助的方式和内容也逐步发展了，那是因为大家很容易看到分工的好处。他们都知道冬天牲畜缺乏饲料容易死亡。但是过去一家人连照顾牲畜放牧还不够，怎能分出力量来打草呢？有了互助组，他们有了办法了。把羊群交给少数人去照顾，就可以抽出一部分人去打草了。第一年出了7个人，打了7天草，有1000普特（一普特重16.38公斤）。那年100多头牛过冬，只死了1头。

打草过冬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又是一件新事。而这件事意义却太重要了。草原上的人们如果老是要跟着畜群迁移，他们社会生活的发展总是有很大的限制的。为什么他们定居不下来呢？那是因为牲畜的饲料长在地上，牲畜走动去迁就饲料，这是自然放牧的办法。但是如果我们能搬动饲料，牲畜就不必漫游，人也可以定居了。

搬动饲料来喂牲畜不但能使人定居，对牲畜也大有好处。牲畜中也有年幼病弱的，自然放牧无法分别照顾。牧场的草有肥有瘦，甚至还有毒草，自然放牧无法加以选择。更严重的，自然放牧把牲畜放在自然斗争的前阵，野兽来袭击，风雪来侵害，过去牲畜的死亡率是很高的，特别是初生的小牲畜，受不了这些打击。如果饲料能送上门来，牲畜的生长条件不是可以大大改善了么？

但是要从牲畜自己去找饲料的游牧改变到运输饲料来喂牲畜

的定牧，那不是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实现的。忠对互助组打了草在冬天喂牲畜只是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开始。

过去自然放牧的原因并不是人们缺乏智慧，想不到草是可以割下来，搬运到牲畜住的地方去喂它们，而是太不经济。如果割草和运输都要用人工，试问饲养 1000 只羊需要多少人？1000 只羊所生出的小羊全给这些人吃了可能还不够养活他们哩。牧业的发展必须依赖机器。

忠对互助组第二年就有了割草机。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他们不可能有机器的。割草机是盟政府贷给他们的，又教他们怎样使用。牧民用钎镰已经是新事，用割草机那是更新了。新事物就不容易习惯。不习惯，机器也就会不听使唤。那辆马拉的割草机一上草原就出了毛病。假如不是党和政府耐心鼓励和帮助，割草机要上草原困难还不是容易克服的。

忠对互助组终于使上了机器。第一年打了 2000 普特的草。他们出卖了一部分草，还赚了 500 多元。买了豆饼在冬天喂老牛。从机器的使用又推动了饲料的改变。老牛在冬天不但有干草吃，而且有营养更丰富的豆饼了。第二年，他们打了 4000 普特，又出卖了一部分，用 600 元做了一个羊圈。羊在冬天有比较温暖的棚可以躲避风雪了。今年他们定了计划，打了草，赚来的钱，可以把贷款还清。互助组自己有了机器。

他们逐年地累积资金，充实了他们的生产资料。

忠对讲起机器，眼睛发亮，他看到了草原的前途，世代代牧民的幸福。他看见过拖拉机，他知道一定有一天拖拉机会上草原，比马拉的割草机一定能带来更大的好处。

我们上草原时，心里还想怎样向牧民宣传过渡时期总任务，但是一听忠对的谈话，我们觉得自己又听了一课总任务的报告。

忠对的互助组在呼伦贝尔起了带头作用。我们从他的蒙古包出来，顺便又拜访了几个蒙古包。到处听到了他们有人出去打草

了，大家很热烈地讨论怎样使用割草机；又听到他们派人去买木材。去年冬天的风雪给大家很大的教训，家家在下决心要搭羊棚。风雪在草原上是常有的，以往谁不是归之于命运，而现在却不同了。他们已经觉得风雪不是那样可怕了，有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命根子了。

组织起来，就有办法。

六、一面光辉的旗帜

我们在海拉尔就听说胡和勒泰牧业生产合作社是呼伦贝尔牧民的一面光辉的旗帜。他们住在海拉尔的北面，陈巴尔虎旗。我们打算先看了忠对的常年互助组再去看生产合作社，所以我们先去西新巴旗。到了西新巴旗不久，我有事要回北京了。但是到了呼伦贝尔草原不到胡和勒泰生产合作社，那是一件憾事。因此，我就要求一同去旅行的朋友，继续完成这个旅行计划，把看到的一切讲给我听。下面所记的，就是他们讲给我听的话。

胡和勒泰合作社是呼伦贝尔的新面貌，并不是虚话。当我们快到目的地时，远远就可以望见十几个蒙古包整整齐齐地列成两行，外面围上近百辆木轮大车。十几个蒙古包的烟囱同时冒着炊烟，草原上出现了村寨，那是别的地方所看不到的景象，历史上也没有过的罢。

我们急于想见一见不久前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胡和勒泰。但是来迎接我们的却不是他，而是一位壮健能干的妇女文化委员额布尔。她热烈地招呼我们进了蒙古包，告诉我们这是合作社的夏营地。夏营地没有几个男子。半个月前畜牧委员、牧羊组长和五个社员把 2000 多只羊带到西北 200 多里的地方“走

亘特儿”去了（“走亘特儿”就是抓秋膘）。那里是有名的阿鲁牧场，有着营养特别好的“绵格儿”（野葱）。他们要让羊群吃得肥肥壮壮，严冬来的时候好抵御得过寒冷。

他们主要的劳动力，有十几个人，由打草组长领导着，带了两台马拉割草机和两台搂草机、堆草机和 27 匹壮马，到冬营地附近去打草了，离这里也有 200 多里。

合作社的牛群和马群就在夏营地附近放牧。妇女们忙着招呼牛群，制造奶品，预备冬季的食用。小孩们从这个蒙古包串到那个蒙古包，过着热闹和愉快的生活。

胡和勒泰上旗政府去了，他不久就要上北京开会，忙着社务的布置。

这里的蒙古包和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见到的也不完全相同。他们用苇子和柳条编成帘子围起来，又凉爽又经济。我们已经说过用毛毡来盖蒙古包成本是很大的。过去羊毛运不出去，很多人根本就不剪羊毛，让羊自己一块毛一块毛的脱落，抛撒在草地上。因此，他们不去计较毛毡的价值。现在羊毛值钱了，用来盖蒙古包觉得不很经济了，特别是夏营地，用苇子和柳条的帘子来代替毛毡是一项很值得重视的发明。我们想如果用帆布来做顶篷，不是更能节约毛毡么？

额布尔的蒙古包更给我们整洁的印象，这也是其他地方不常见到的。两张矮脚的木床，铺着洁净的毡子，上面挂着蚊帐。上首红花小木柜上摆着毛主席的相片。下首两侧摆着碗架和大木桶，上面都盖着白布。锅子里正煮着一大锅牛奶，锅上蒙着纱罩。她看见我们注意她的陈饰，满脸笑容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是好得多了。以前哪里想得到有今天！”她说自从 1950 年成立了互助组，全组就有六个蒙古包换上了新毡子。每年每人平均都添了两件皮大衣、两套衬衣裤和一套新的皮被褥。1951 年冬天，一家人还只吃了两只羊，1952 年就吃到了 11 只羊了。茶砖

也增加了一倍半。她着重地说：“单干的话，哪里能这样好。”

我们被安置在苏米亚的蒙古包里。苏米亚和另外几个妇女穿着雪白的罩衫正在挤牛奶。她告诉我们全社的奶牛都由她们几个人负责，这样分了工，其他的妇女就可以去干别的活了。奶挤完了，额布尔背了红十字布袋，从她蒙古包里走来，和苏米亚等五个人一起到小羊圈里来替病羊换药。草地上有一种毒草长着针刺，刺破了羊的皮肤，就会腐烂。过去没有办法，现在有药可以治了。小羊圈等于是——是一个小小的兽医院。

合作社的景象毕竟不同。每个人都有工作，都忙着分配给自己的事。阿拉腾挂老婆婆也不例外。她的工作是给奶量不足的小羊羔喂奶。她手里执着一个装着奶的羊角，把羊羔抱在怀里，轻轻地抚摩着，把羊角端给它吮吸，小羊羔吸完了奶还是依傍着她不肯走。她真是小羊羔的妈妈。有40多只羊羔在她的照顾下，不但没有死，而且长胖了。正在和老婆婆谈话时，有两个姑娘赶着一长串的牛车来了，很熟练地把一车水拉到老婆婆的蒙古包旁边，和老婆婆一边笑一边说了几句话，又赶着牛车走了。老婆婆告诉我们，过去她们每家都要自己去湖边拉水，现在这两个姑娘把全社的水都拉来了。

每个人都在说：有了合作社，多省事。有了合作社，很多以前不能做的事都有人做了。还是这几个人，分散了，大家受苦，组织了，大家便利。

傍晚，胡和勒泰骑了马回来了。

胡和勒泰，中等身材，结实有力，40多岁，蓄着大撇胡子，两眼明亮，满脸笑容欢迎我们远来的客人。

胡和勒泰过去和许许多多草原上的牧民一般，在艰苦的条件下辛勤地劳动，而依旧过着贫困的生活。他在1945年解放时只有3头牛。3头牛是养不活他的，所以只能搞副业。拉木料，挖硝，捞盐，他什么都干过，干得比什么人都积极。比如，别人一

天挖 40 袋硝，他挖 70 袋。别人在湖边捞盐，他泡着碱水到盐泊子中间去捞，腿都泡肿了。他挣了钱就买牛买马买羊，指望有一天能繁殖成一大群。但是有一天狼来了，吃了他 3 匹马、3 头牛，他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牛马，损失了一大半。他深深体会到这样干下去是没有前途的。他听到了党的号召，“组织起来”，像是见到了太阳。1950 年起，他全心全意地在这条光明的道路上努力前进。现在不是当初几头牛几匹马那样计算了，1953 年订的计划，全社要发展到 4000 头牲畜。

胡和勒泰实现了每个牧民的梦想，这是一件活生生的事。草原上的人都知道胡和勒泰几年前是什么样的人，知道他有多少牲畜，狼吃掉了多少，现在也都看见他已变成了什么样的人，牲群怎么会长得这样快。大家也明白了胡和勒泰能做到的事，人人能做到。胡和勒泰就是这样成了草原上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胡和勒泰的旗帜是很容易就撑起来的么？不是的。

胡和勒泰的合作社是逐步地在实践里克服了一关一关的困难而成长起来的。1950 年秋天打羊草时，他组织了一个临时互助组，只有四户贫苦的牧民。他们把各家的牲畜赶在一起还只有 30 多头。当他们想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为常年互助组时，就出现了许多困难。不说别的，他们所有的牛，都是两岁的小牛，连大轮车都拖不动。于是组员中就有人说，穷人加穷人不还是穷人？胡和勒泰想办法，找到了一家军属。因缺乏劳动力，他就答应替他家放牧，不要其他代价，只要能用他家的牛拉车。

那年，盟政府贷羊给牧民放。胡和勒泰的互助组想去请求，但是互助组的人还是各有各的打算。胡和勒泰想如果贷了羊，大家不齐心，散了伙，怎样对得起政府。于是和大家讨论，订立了生产公约，决心长期互助下去，他们才每家贷了 100 只羊。

当他们把羊领回来时，他们高兴极了。但是有的人心里却出现了单干思想。100 只羊自己喂才靠得住，生下来的小羊都是自

己的，为什么要互助呢？胡和勒泰耐心地打通了全组的思想，才同意共同经营，一起分红。

互助组当时在草原上还是新的组织。许多牧民还带着怀疑的眼光看他们。有人说：胡和勒泰当了多年牧工，学会了牧主的狡猾，想出这些新花样来欺骗别人的牛羊了。当他们去打草时，有人在背后笑他们：没有见到山就撩起袍襟了，没有见到水就脱马靴了，忙什么呢？互助组里听到这些话，思想上又怎能没有波动？但是互相鼓励着，坚定起来。

事实说服了人，组织起来是有好处的，背后说话的人少了，而且又有人愿意加入了。1951年，互助组扩大了八户，劳动力更多了。但是怎样来扩大羊群呢？胡和勒泰找牧主毛拉玛，愿意接放他的“苏鲁克”。苏鲁克是草原上通行的代牧制度。这种制度对于牧区增产是有利的，所以是允许的。他和牧主义定，接养母羊，春季生下羔子，牧主得四成，互助组得六成。议定之后，胡和勒泰回来一讨论，这个比例对于互助组是有利的，但是除了毛拉玛之外还有哪些牧主愿意在四六分的比例下把母羊放给牧民呢？这样不是阻碍了苏鲁克制度的发展么？他们这样考虑是对的，为了使其他牧民容易得到母羊来放，他们愿意重新和毛拉玛订约，改为对半分羔。这样的做法得到了政府的批准和推广，也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胡和勒泰互助组能逐步发展起来，那是由于党的领导、教育和关怀。他们遇到困难时，有党指示他们方向，支持他们工作。而且经常指出他们的缺点。胡和勒泰曾告诉我们，他起初对于妇女的劳动是不重视的，没有很好地发动妇女来参加劳动。党及时地指出了这个缺点，他们才规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办法，妇女们劳动的积极性大大地提高了。蒙古族的妇女原来是主要的劳动力，一天到晚地劳动，但是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合作社里，她们真的获得了平等，夏营地的工作差不多都是由她们担负，而

且做得井井有条。

胡和勒泰说得对，互助合作，打草搭棚，在草原上都是新事情。怎样希望人人一下都能接受？要耐心，要坚持，等到事实做出来了，还怕说不服人么？只要相信毛主席，跟着共产党走，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当他说到要耐心，要坚持的时候，那样有力，使我们仿佛看见了他当年在盐泊子里，宁愿两腿都泡肿了也要把湖心里的盐捞回来的劲头。

胡和勒泰的眼睛是向着前面的。他带我们去看他的牛群。黑压压的一片，有一里来方圆，我们骑着马在牛堆里绕来绕去。他一边看，一边在和牧牛组长乌兰说话。他们在这头牛前停一下，那头牛前说一会儿，我们不懂得他们所说的话，但是看得出，他们对于每头牛都好像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密。一直到夜色茫茫，我们才回来，他很满意地和我们说，今年水草好，膘已有八成了。他关心着冬季来到时，怎样保证牲畜的饲料和安全。

胡和勒泰合作社比忠对互助组又提高了一步。他们不但能组织更多劳动力和使用更多的机器来打草，储备更多的饲料，而且开始建筑较大的圈棚。他们 1953 年所搭盖的大圈棚有 9000 多平方市尺。有了这样的圈棚，他们可以按牲畜的需要分群居住和分别饲养。那些幼弱病老的牲畜在抗寒力量上较差，它们可以在棚内饲养，而且给它们草和豆饼吃，这样，牲畜的繁殖更快了，牧业生产提高了。

他们开始改变了四季游牧的古老习惯。在冬季，妇女和孩子没有必要跟着畜群在风雪里奔波。他们可以定居在一个比较容易避风的地方，照顾那些幼弱病老的牲畜和经营副业。另外组织壮健的劳动力去照顾游牧的牲畜。这种冬季定居游牧的方式在畜牧业上是一大进步。

牧民开始部分地和定期地定居下来了。居住固定了，就能建

筑更适宜于生活的房屋，而且可以比蒙古包成本低，更为节约。孩子们聚居在一起，也有条件可以上学了，聚居的人多了，社会福利事业一样一样地可以创办了。

这是人畜两旺的第一步。

关于呼伦贝尔草原，我们就说到这里。

牧民的生活，草原的前途，可写的还多。但是我们的旅行时间短，观察又肤浅。我们是初次上草原，初次看到牧业的人，上面所说的不免有不对的地方，还希望牧区的朋友们指正。

最后我们想再说一句：祖国是可爱的，越是多熟悉一点祖国的情况，祖国也越是可爱。

希望更多的人上草原去旅行旅行。

1954 年

关于民族识别问题的意见

在《关于黔西民族识别工作的参考意见》一文中，我谈到在这次普选中自报的民族名称有 400 多个，其中有些是有问题的。我也列出了发生问题的各种情况。下面再就这些问题谈一些我的意见。



这 400 多个自报名称的民族单位，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有一部分是可以在自愿基础上归并的。他们和外界隔绝久了，历史不明白，听人家怎样称他们也就怎样称，自报了少数民族，这种民族名称不能视作是一种民族自觉性质的。比如云南有些养蜜蜂的汉人报称“蜜蜂族”，种甘蔗的汉人报称“蔗园族”。这些人的语言和附近汉人的方言有区别，以为是民族区别，但是知道了是广东话，从广东搬来的，他们也就自认是汉人了。

同样的，有些曾经隔断了一个时间的若干同一少数民族的单位，曾被别人用不同名称相称，他们本民族语的自称基本相同，但却用了他们习惯用的汉名报成了不同民族单位。他们一旦见了面，谈话大家懂，讲起历史来又相同，风俗习惯差不多，兄弟重逢，成为一家人，那是大家乐意的。比如云南红河一带的哈尼人，原本是有许多独立的单位，现在已经合在一起。

交通方便，接触多了，历史搞清楚了，这类情况是会发生的。但是不能从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凡是历史上来源相同、

语言相通、风俗习惯相近的民族单位都会融合起来，更不能说都应当融合起来。苏联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原是东斯拉夫的三个部落，语言也是一个系统，但是发展成了三个单独的民族。苏联也有若干民族集团，实际上的民族特点已经很少，但是依旧保持着它们的民族名称。

我们只能说在这些特征上具有的共同性或相似性的单位有可能在发展过程中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如果这样融合对于人民是有利的，那些可能性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加以利用的。

应当强调：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的，不能由别人代替来改变的，不能用行政命令根据任何客观标准来合并若干民族，或是拆散成若干民族。民族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在历史过程中变动的，离开了人民的自愿，强制加以改变是反人民的。

我们从客观分析中可以得出某种可能、某种倾向，或是某种改变对人民有利；但是要实现这些可能、这些改变，必须通过自愿的行动。我们可以为实现这些可能而工作，但是不能包办代替。

我们进行民族识别并不是代替各民族来决定应当不应当成为少数民族，或是应当不应当承认为单独民族。我们的工作是在从民族特征的各方面加以研究，提供材料和分析，帮助已经提出民族名称的单位自己来考虑是否要认为是少数民族或是否要单独成为一个民族。这些问题答案是要各族人民自己来做的，这是他们的权利。任何民族单位在自愿基础上任何时候都是可以合并或分开，只要不离开这大家庭。

民族识别工作对于各族人民自己作出这类决定时是有帮助的，因为各民族还没有完全脱离过去反动统治所制造的孤立和隔离的状态，它们没有机会充分知道自己的历史，没有机会和其他单位充分往来，因此，它们还没有充分的条件来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我们在这些方面具体地帮助它们是应当的和受欢迎的。

如果我们在这件工作上采取命令主义和包办代替的作风就会引起各族人民的反感，把好事做坏。

二

应当提出：少数民族一共不过 3500 万人，搞成 400 多个单位，对少数民族的发展是否有利呢？我想是不利的。其中有很多是人数很少地区很小的民族单位，它们能不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呢？我想是有很大困难的。比如一个几千人的小集团，如果要发展自己的文字，就得办报纸，翻译各种书籍，需要很多人，哪里来这样多人呢？再说发展经济，如果整个民族的人还不够办一个较大的集体农场或者较大的工厂，他们要成为一个单独的社会主义民族就很难想象了。如果他们在语言上原来和另一单位相同，地区又相连，风俗习惯又相近，为了发展，融合成为一体，当然是有利的。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在实行区域自治时，已经注意到民族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以有联合自治这种方式，即使民族不同的人在一个地区中也最好联合起来。如果在民族特征上基本没有很大区别的单位融合为一体也是应该鼓励的。

如果我们对于有可能融合成为一体的民族单位而这种融合又是对人民有利的，不做工作，不促成其自愿，不使他们明白有融合的条件和融合后的利益，那一样是不正确的。

怎样去做工作呢？我想首先是根据斯大林所提出的四个特征对各民族单位进行研究，研究时应当注意它们过去的历史，并且和其他民族比较，求出它们之间的异同。

我们现在自报的民族单位虽则很多，但是结合四个特征来研究，是能归纳出几个大的系统的，每一个系统中各个单位的差别可以通过具体分析加以确定。这种科学的研究和实际政治是相结

合的，因为它提供了可能融合成为一体的那些民族单位的范围，作为我们实际工作的参考。

这种调查研究工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必须有各少数民族自己人参加。调查研究的结果也应当交给少数民族自己去审查，作为他们自己决定是否系少数民族，或者是否要单独成为一个民族时的参考资料。

三

总结以上的意见：

（一）我们并不能依现在自报民族名称的单位一律认为可以成为单独的民族。

（二）已经自报了名称的单位中有些会合并或分开，但是必须是自愿的，不能用行政命令强制和包办代替。

（三）各民族人民都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系少数民族，是否要单独成为一个民族，他们也都有权利在任何时候改变他们的决定。别的民族和政府都不能加以干涉和强制。

（四）有条件合并的单位（从民族特征上研究可以得出是否有条件合并）如果自愿合并，对于他们的发展是有利，尤其是那些人数很少，地区很小，在发展上受到限制的单位利于和较大的单位合并，或合并成较大的单位。这一点也应当肯定的。

（五）现在那种分散的现象有一部分是由于过去民族压迫时代的分裂和同化政策所造成的。各单位的人民明白了他们的历史，接触了和他们在民族特征上相同的单位，在经济发展中看到了合并的利益，他们是会自愿合并的。我们应当做工作来促成其自愿合并。

（六）民族识别工作就是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方法来研究各

自报的民族单位，从民族四大特征上说明它们的特点和它们同其他单位异同的程度及异同的历史原因。这种科学知识可以帮助各单位的人们自己来决定是否系少数民族，和是否要单独成为一个民族，还是和其他单位合并成为一个民族。

1954 年 11 月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和与少数民族历史 有关的地区的考古工作^{* 1}

今天我在这里发言的目的是想向各位研究考古学的朋友们提出一些请求，请求各位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多多帮助。

首先应当声明，我对于考古学这门科学是个门外汉，在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的队伍里也还是一个小学生。下面讲到考古学的时候，必然有许多幼稚的话，讲到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时，也必然有许多外行话，请多原谅。

由于我对这两门科学都没有很好的研究，说不出多少理论来，所以只能从我自己这几年来遇到的许多具体问题来谈谈，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供各位参考。

总的说来，我体会到我们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工作上已经发生了很多问题，必须兄弟科学——考古学的帮助，才有解决的希望。同时我也想告诉各位，考古学上已有的成就，已经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因此，为了今后工作的开展，希望得到更多的帮助。我想，也许现在已经到了我们两门科学更密切合作的时候了。为了向科学进军，赶上国际学术水平，这种合作是必要的。

1951年，我参加了中央访问团到广西去访问各兄弟民族，遇到了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广西600多万的壮人是不是少数民族的问题。我参加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根据斯大林民族理论，从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等四个特征，肯定了壮人是一个少数民族。但是壮族这个稳定的人们

* 本文系作者在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共同体是怎样在历史上形成的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心上。

我在访问中知道，壮人被称为土人，他们的语言被称为土话，意思是他们比现在广西的其他的人更早在这个地区居住。他们在这地区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我查了一些历史书，这地区早期的居民被称为百越（百粤）；这地区也称西越，以别于沿海的东越；西越又作西瓯或骆越。越、瓯、骆是否是指这种人呢？从时间上及地域上看是很可能的。而被称为越的人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分布在长江以南整个沿海地区。如果这些人被同一名称所指称是由于他们具有相同的特点，则广西早期居民和沿海的居民由于他们同样地被称为越人，可以推测他们可能是属于同一系统的人。是不是那时从浙江到广西这一个地区居住着许多在语言和文化上相近的部落或部族？是不是这些部落或部族在不同时期大多已融合在汉族之中，而现在只有最西的一部分还保持着原来的特点？

我曾请教过语言学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壮语是属侗傣语族，侗傣语族的民族现在还有湖南、贵州边区的侗人，贵州的布依人，云南的沙人、佤人（均属壮族——编者注）和傣人。越南、泰国和缅甸都有说这个语系话的人。而且说：如果分析广东、福建的汉语方言，也有些特点是和壮语接近的。这些说同一系统的语言的人，在历史上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曾经住过一种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特点的人是可以设想的，这种人和现在的壮人可能是属于一个系统的。

由于想了解壮人的历史，提出了沿海地区民族沿革的问题。

研究这些历史问题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壮人自己的文字史料。汉文史籍中有关这地区早期居民的记载，数量并不多，而且所用的族名并不一定很严格。因此我们还是很难确定说汉文中所称的越人都是一种人，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语言和文化的特點。汉文史料中虽则有沿海越人在不同时期被汉人征服的

记载，但是这只指汉人统治了这些越人，至于这些越人后来怎样变化，却没有交代。语言的研究，特别是这些地方古代语言的分析，甚至包括古代地名的分析，固然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但是至多提出了一些历史关系的线索，并不能说明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因为这些缘故，我们很多的设想无法进一步肯定下来。在这里，我们需要考古学的帮助了。

但是，过去考古学者对于长江以南的地区似乎是不大注意的。解放后，华东的考古工作有了开展，不但在江苏、浙江、福建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而且已经有很多材料可以看出沿海地区古代文化的不同系统。我不必在这里多提关于这地区考古学上的成就，你们比我知道得更多。我想，你们一定能想象，当我读到这些考古报告时，怎样联系上老是在我心上的问题。当然，有些考古学的朋友对于这种联系是会觉得还过早，还不成熟，但是在我，只要能解决我心上的问题，什么材料都是宝贵的。

对我特别有启发的是印纹硬陶文化的分布区，正和汉文史料中所指的越人的活动地区相合。印纹硬陶可能是以福建为中心而向北发展到太湖周围。这种印纹硬陶据说曾在广东南海的南越文王的墓中发现过，而且可能由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汉代，甚至更晚。这样看来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是有一种具有共同文化特点的人居住的了，而这种人很可能就是越人。

可惜的是我们在广西时，并没有注意壮人是否有自己制造的陶器，他们用的陶器和印纹硬陶有没有关系。我们也不熟悉广西地区的考古材料。所以从陶器上我们还不能建立起壮人和古代越人的历史联系。据说最近在广西省来宾县罗梅乡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夹砂红色绳纹陶片，那是值得注意的线索。

但是在石器方面却已有一些不完整的线索。在浙江已发现一

种被称为戍器的石器，我在杭州博物馆看到过这种石器。这种石器似乎是有肩石斧的一种。有人曾提出这种器物的形式和越人的名称有关的意见。我觉得这种意见是值得注意的。不知道各位是否已注意到，中南民族学院在海南岛调查时，收集了一批石器，其中有很多是有肩石斧。我们去年去贵州调查时，在贵州博物馆筹备处看到一件在盘县找来的有肩石斧。盘县是在盘江流域，在地理上是和广西壮人地区衔接的。去年广西平果、上林等县已发现了有肩石斧。

我问过几位考古学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在中原地区还很少发现过有肩石斧。这种石斧主要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如果这种石斧属于印纹硬陶文化系统的一个特点，则这个文化系统有可能要包括广西在内。壮人和越人的关系也可以有更清楚的线索。现在我这样说还是太早一些。我这样说出不成熟的话，目的是在想请求考古学的朋友在这些地区早些开展工作。最近裴文中先生告诉我，他们在广西已经找到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以我想关于这个问题不久可以有更多的材料了。

当然，长江以南民族沿革问题还不是这样简单。那是因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从各方面进入了这个地区。原在这地区居住的人，有些和外来的人融合了，丧失了他们原来的特点；有些没有和外来的人融合，但是受到外来的人的影响，起了一定的变化；有些却还保留着原有的特点，或特点的一部分。他们在历史过程中都有变化，都有流动。因此，情况是复杂的。

现在在民族历史上比较困难的问题之一，就是苗人和瑶人的来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大体说来，有下面这几种：1. 苗人、瑶人原来是中原的居民，受到西方来的人的压力，逐步退到长江流域，又受到从中原南下的人的压力，苗人西走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山区。2. 中原早期被称为三苗的人和现在的苗人无关。中原早期的三苗去西北，并未南下。苗人、瑶人

原来就是长江南部的土著，甚至可能是从南方来的。3. 苗人、瑶人原是长江流域的土著，东到福建的沿海地区。他们曾经有一部分北上，但是受到阻力，又退回了，或有一部分迁去他处。4. 苗人和瑶人并不是一种人，来历不同，而是后来有了接触，在语言上起了变化，变得相近了。

这些说法都有可能。现在材料很难肯定谁是谁非。意见的分歧说明了我们对于苗人、瑶人的语言、文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特别是需要地下的发掘。而安徽南部、湖北、江西这个地区，似乎又是一个考古学的空白点，比华东沿海地区更不如。

提出了苗人、瑶人历史的问题，我们对考古学想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我们不但希望考古学者对古代的历史能提出材料，还希望他们能注意到每一个时期，特别是没有文字的民族的地区比较近代的文化遗物；不但希望他们对这些地区交通要道上汉人的坟墓进行发掘，更希望他们对交通点线以外的文化遗址做系统的研究。如果江南的考古工作局限于汉墓的发掘那是不全面的，也因此可以引起对这地区民族历史的不正确的看法，夸大了这个时代汉人在这些地区的地位。

以长江以南的历史来说，汉人进入这个地区固然很早，但是大规模的移民并不是太遥远的古代。秦汉时代汉人的势力已经越过长江，甚至到达海边，但主要还是在点和线上，广大的面，还是这地区的土著所占据的。南北朝和唐宋又是一个汉人的扩张和南移的重要时期，从点线扩张到面，但是比较偏僻的山区，汉人还是没有进去的。至于云南、贵州的山区，事实上要到元明时代汉人才有大批移入。因此，我们有理由可以设想考古学者在这些地区的偏僻之处，比较近代的遗址中，会发现和汉人不同的文化系统。而这些发现正是我们研究民族历史的人所要的材料。

提到了汉代的移民和其他民族的关系，不妨再在这问题上谈一谈。我去年曾到贵州去参加黔西地区的民族调查工作，主要的

问题是有一种说汉语的人报了少数民族。他们究竟属于哪一民族，要我们去研究。研究的初步结果认为他们是明初从长江迁移去的汉人，并且在语言、文化等特征上并没有发生重要的变化。但是同时我们又调查到这地区的另外一些人，现在称蔡家、龙家，他们很可能是更早从长江中游去的移民，而且很可能是和汉人或汉人的祖先有关的。我们指出这可能性是因为他们所保存的语言还有一些特点可能和古汉语相接近。这些材料现在正在研究中，还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

由于我们接触到了这些不同时期的中原移民，我们对于西南的民族沿革问题又多了一些启发。可以设想，从很早的时期开始，中原的汉人或汉人的祖先就已经进入西南的山区。这些移民有些离开了中原，和当地各种人接触，在语言、文化、心理上起了变化，现在已经有别于汉人了。

如果我们得到考古学者的帮助，能看到这些人在不同时期所有的遗物，这些人的来历和历史上的变化，应当是可以确定的。而这方面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开始。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来历和历史还不能说出比较肯定的话。

让我在这里再举一些例子。

云南是民族情况最复杂的地区。从语言的情况说，除了汉语之外，基本上主要是藏缅语和侗傣语两个系统，靠西边境还有猛吉蔑语系，零星还有苗瑶语系。现在一般的看法，汉人、苗人、瑶人可以说是后来进去的之外，其他三个语系的人究竟谁先谁后，还是意见不同的。

按现在比较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说法说，侗傣语系的人可能是这地区较早的土著，藏缅语系的人，主要是彝人和那些和彝人很接近的傈僳人和么些人^①等可能是从西北迁入的。从语言上看，

^① 现为纳西族——编者注

彝语和藏语接近，可能是很早在西北分开的两支。从体质上看，彝人也和南方许多土著不同，他们比较高大，近于藏人和北方的土著。但是他们究竟什么时候进入西南地区的？他们早期的文化和古代羌人有什么关系？他们在西南地区是怎样流动和发展的？这些问题现在还不清楚。再说，侗傣语系的人是不是这地区的土著？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由东或由南进入的人，而原来居住在这地方的人却是现在已经挤在西面边境上的那些猛吉蔑语系的如崩龙人^①、卡瓦人^②等的祖先呢？

抗日战争时期，大理一带曾发掘到一些汉代的陶片，据说这种陶片除甘肃省外，他处没有见过。这是值得注意的。

从汉文史籍的记载，汉代大理一带住着一些部落，称昆明人。三国时代，云南东部被大姓爨氏所统一，在他的统治之下有乌蛮、白蛮两种人。大理的西南还有一种哀牢人。唐时以大理的洱海地区为中心的许多部落合成南诏，宋时成立大理国，亡于元。昆明人、爨氏、乌蛮、白蛮、哀牢人、南诏、大理国——这些名称所指的人民和统治者，究竟和现在云南的许多民族有什么关系，还是没有搞清楚。我们认为单靠现有汉文史料，问题可能是会得不到结论的。只有系统地发掘地下的遗物配合了汉文史料，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推进一步。

以上我所讲的主要还是有关某些地区的民族沿革上的问题，也就是要研究某一地区在不同历史时代是哪种或哪几种人居住的问题。这种研究必然会发现一个地区的居民是常常有变化的。在一个时期是这种人，在另一个时期是那种人。于是我们又不能不追问，为什么有这些变化？这里要我们研究：这些人所形成的共同体怎样发展，怎样和其他的共同体合并和融合，或是怎样消

① 现称德昂族——编者注

② 现为佤族——编者注

灭？这里要我们研究：这些人在各个时期社会经济的性质，他们所形成的共同体的性质，是原始社会时期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还是奴隶社会时期的部族，还是封建时期的部族，还是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各种人的共同体都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在变化，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发展不平衡，发展较快的和发展较慢的，就是先进的和落后的，它们之间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发生接触，引起各个共同体具体发展过程上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正是民族问题研究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在进行这方面研究时，我们还是要依靠考古学的帮助。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考古学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的帮助。

我们知道，现在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的经济中还具有明显的奴隶制度的成分。在历史上彝族曾经有过奴隶制度这个阶段是可以确定的。但是现在大小凉山的彝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组织，而且在这个地区也并不像曾经有过一个统一的局面。从经济和政治的现有状况来看，使我觉得这个地区不像是彝族发展奴隶制度的中心，很可能是边缘上的残余形式。

我们去年在贵州西部调查时注意到这地区的历史，并且从彝文翻译出来的材料看，这地区却曾是彝族发展的一个中心。据彝文材料所保持这地区统治者的世系，一代一代地可以推到三国时代。简单地说，当时有一部分彝人和蜀国合作，从云南东部向贵州西部发展，逐步征服了原在这地区的“革僚”，到唐代在现在贵州织金地方消灭了“革僚”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封彝人的领袖做罗甸王。那时从曲靖以东到贵阳以西已经统一在彝人统治之下。

罗甸王国是什么社会性质呢？我们注意到当地传说这地区的早期居民，现称仡佬，大概就是史籍所写的“革僚”，很早就以铸铜著名，现在这地方的苗人造芦笙（一种乐器）时需要铜片，还要去挖掘仡佬坟。仡佬铸铜和一般传说西南铜鼓是“僚人”

所造是符合的，而且滇东、黔西是我们铜矿特别丰富的地区，所以这地区很早发展铜器也是有可能的。又据传说仡佬在苗人进入贵州前已知道耕种水稻。因此，我们推想，在彝人进入这个地区之前，仡佬人已经有相当高的文化，当时可能已经是奴隶社会的初期，而彝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统治这些人的奴隶国家。这个统治民族自己并没有掌握生产技术，包括铜器制造，后来丧失了统治权力，退守边缘山区后，生产力停顿，甚至倒退，是可以理解的。

上面所说的还只是一种设想。我们没有对仡佬的文化遗址进行发掘。究竟仡佬的文化发展到什么阶段，还不能肯定。但是在西南各民族的历史研究中，仡佬人的地位值得我们注意是可以肯定的了。

仡佬如果很早就发展了铜器文化，如果和西南几省以及印度支那半岛所发现的铜鼓有关，我们又不能不问他们和壮、傣这些侗傣语系民族的历史关系了。为此，我们去年初步研究了仡佬的语言。很多地方的仡佬已经丧失了他们自己原有的语言，说了和他们一起住的那些民族的语言了。但是在贵州西部却还有少数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初步分析，可以肯定是一种独立语言。究属哪个系统，还不容易得出结论，和侗傣语系的关系并不显著。因此，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也是更复杂的问题。

汉文史料中记载，曾经问过和“汉孰大”的夜郎究竟是哪一种人？是不是仡佬？那时这种人所居住的范围有多大？发展到了什么社会阶段？

更值得注意的是，西南地区的铜器文化是什么时代开始的？和中原铜器文化的关系怎样？考古学的朋友们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答复这些问题呢？

同志们，时间不允许我更多地提出在我们民族问题研究工作中存在着的许多问题。我在上面所提出的只限于我个人这几年所

参加的研究工作的范围，而且也是比较突出的一部分问题。

至于中原和北方的问题还没有提到，这些地区有关民族历史的问题自然更多。但是，就从我已经提到的问题来说，我想，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为了推进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我们实在是很急迫地要求考古学的帮助和合作了。

我是考古学的门外汉，所以不敢从考古学方面来设想，和民族学合作起来是不是对考古学上的许多问题的研究也有帮助。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想，这种帮助也不可能没有的。各位从地下发掘出许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器物。这些东西一定是当时人所创造的和使用的。这些东西本身不会行动，也一定是靠了人才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的。离开了人，这些东西的意义也不会清楚的。而人是在团体中生活的，文化是人的集体生活的产物。人们共同生活的团体又按着不同的社会生产力而构成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所以人们共同体的性质各个时期是不同的。它是从原始人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一直发展到现代民族。不同性质的人们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又是不同的。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这地区每一个时期所有的人们共同体之间的具体关系的影响。因此，如果不注意到这些关系，一个地区的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历史是不容易了解的。

民族历史研究就在说明一定地区内人们共同体的发展和变化的具体过程。因此，我想，这方面的研究结果，甚至提出的问题，对于历史科学的各个部门都是有密切关系的，都是有帮助的，甚至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是必要的。考古学应当不是例外。

比如，考古学在黄河流域地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从古代遗物中看到了几个文化系统的分布、交替和影响。如果这些材料有一天能和文字材料、传说、语言，甚至人类体型等材料结合起来，不是可以更好地说明这地区的历史么？

过去，我国的考古学者似乎不太注意地下发掘出来的东西是

古代的哪种人的遗物。有些考古学者甚至不很愿意和古代历史记载相联系起来。我是不很同意这种态度的，因为这样就限制了发挥考古学在解决历史问题上的作用。但是我想这种倾向如果过去的确存在的话，也得怪民族学者没有能提供可靠的材料。现在民族学虽则还没有发展，但今后应当可以在这方面成为考古学有力的助手。

不但如此，人类的文化不可能全部在地下保留下来的。不但使用这些东西的人的社会关系不容易直接从这些保留得下的东西上看起来，而且就是物质的东西也有一部分不容易在地下保留的。使用石器的木柄，装置陶器的竹篮等等都是例子。因此这部分保留下来的遗物的使用方法，有时从遗物本身不能得到说明。但是从民族学研究中却可以找到活生生的事例，或带有启发性的事例。比如台湾高山族所用的小口大陶罐和彩陶文化中的大陶罐形态极相似，这种陶罐的取携使用的方法，在高山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还可以看得到，对于研究彩陶文化提供了具有一定启发作用的资料。这一类的例子我相信考古学的朋友们是熟知的，所以不多说了。

考古学和民族学原来都是历史科学的构成部分，在许多不能单靠文字材料来解决的历史问题上都需要这些科学所提供的材料来研究的。我在上面所提出的关于我们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问题，大多属于这一类的问题，所以，必须我们这两门科学很好地结合起来。

苏联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就是根据考古工作所发掘出来的文化遗物中所得到的材料写成的。我们也应当这样做。

作为一个民族工作者，我有责任告诉各位，自从人民革命胜利，国内各民族得到了平等、自由，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飞跃地发展，现在已经纷纷提出要求编写各民族的历史，要求在中国通史

中包括各民族的历史，要求明确各民族在创造祖国文化中所做的贡献和所处的地位。而且在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如宪法所规定的，必须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而各民族发展的特点又必须从他们各自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去了解。因此，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已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这方面的工作和国家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加强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密切合作是不应当再拖延了。

在这次考古工作会议上，是不是允许我作出这样的建议：在今后定出研究工作规划时，希望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和与少数民族历史有关地区的工作，而且这项工作应当和民族学、语言学、人类学一起密切配合，最好能做出一定区域内综合性的历史研究规划。我也想建议以贵州或云南等地区为范围，甚至可以再小些，作一次综合性历史研究的试验。

我今天只是从我个人这几年在参加民族问题研究工作中得到的一些体会，提出向考古学请求帮助的愿望。如果能引起各位朋友们的考虑，我将是十分感激的。至于我在上面所说的许多话中，有错误和不妥当的地方，请各位朋友原谅和指正。

1956年2月

关于建立中央民族博物馆的意见

文化部通知我来参加这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并要我对发展民族博物馆的问题作一次发言，我是极愿意的。并不是因为我对于民族博物馆有什么经验，而是因为作为一个民族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我自觉有这个责任，向各位博物馆工作的同志们提出一些要求和意见。这次工作会议是一个最好机会，我不应当放弃这个机会。

我想提出的要求，各位早就可以预想得到的，就是大力发展我国的民族博物馆。在我国博物馆事业中，这一方面的工作不容讳言是很不够的。在我国，历史博物馆虽则也还不能适应当前人民的需要，但是不能说没有基础和没有成绩。至于民族博物馆，尽管解放后在若干地方有了开始，总的说来还是极薄弱，甚至还可以说是空白点。最明显的事实，在我们新中国的人民首都至今还没有一个民族博物馆。很多国际友人只能在中央民族学院极为简陋和狭小的几间民族文物陈列室里看到一些很不完整的各民族的文物。我每次招待他们参观时，心里总是很别扭，因为这一些简陋的东西，远远地不能表示出我国各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和生活。我每次都要委婉曲折地说明这一点，免得引起外宾们从这里得出不能符合事实的印象。同时，我自然也不可能不向自己说：为什么我们甘于简陋，难道我们的国家没有力量建立一个赶得上国际水平的民族博物馆么？绝不是的。那么，为什么呢？我想首先应当责备自己，看到了有此需要和有此可能的人，叫喊得还不够响，宣传得不够广；同时，博物馆工作者在这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认识上和方法上的问题，出的力量因此也不够。结果，我们

耽误了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我如果不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自己会觉得过不去的，请允许我花费这次大会的一些宝贵时间，对于发展民族博物馆的问题说几句话。

民族博物馆究竟具有什么任务？做些什么工作？怎样做？这些都是基本问题，我想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一些意见，供各位参考。

我在准备这次发言时，一上来在题目上就打住了。首先是名称问题。同一个内容的博物馆有的称民族博物馆，有的称民俗博物馆，有的称人类学博物馆，也许还可以称人文学博物馆。名称当然不应当看得很重要的，但是也因为名称不明确，引起了工作范围问题。因此，我还不能不先谈谈名称。

把名称搞得混乱的不是我们，而是 19 世纪以来的欧洲人。当资本主义在欧洲开始发展时，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民族自觉的一种表现就是人们开始意识到了自己民族在文化和生活上的特点。这种意识也促进了文化、生活的民族形式的发展。比如在发展民族文学时注意到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优良传统。民间艺术和风俗习惯等文化和生活上的特点都受到了同样的注意：他们开始研究这些特点，并且搜集了许多能表现这些特点的实物资料，保管、陈列，发生了这类性质的博物馆，他们称这些研究为民俗学。

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海外扩张。欧洲人接触到了海外的各种各样和他们的文化、生活不同的人。由于好奇或由于实际的目的，要和他们做生意，要征服他们，要剥削他们，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开始注意，研究各地人民的文化和生活。但

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否认民族平等的。这些人瞧不起种族上文化上和他們不同的人。民族歧视使他們觉得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不应该也称为民俗学。称什么呢？在英国大多称人类学。人类学原是以研究原始人类遗骸为对象的学科，他們觉得那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人，在文化上和原始人一样，所以研究这些人的文化、生活也不妨归到人类学的范围里去。欧洲大陆上，大多用民族学来区别于民俗学。这种科学上的传统正反映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偏见。

十月革命后苏联消灭了民族压迫，实现了民族平等，原有民俗学和民族学不合理的界限自然没有立足的余地了。这两门学科的内容有了变化。民族学是一门历史科学，主要是用直接观察方法来研究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和生活特点，考察这些特点的历史变化和发展，考察各族的起源、分布和各族的历史文化关系。民俗学主要是研究各族民间的口头文学。当然各族民间的口头文学也是各族文化特点的一部分，所以民俗学实际上是民族学的一个部门。人类学是一门生物科学，研究人类的各種体质类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

在我们中国过去这些学科的名称用得更混乱。因为各人分别从各国翻译这些名词过来，不但各有师承，而且翻译时又各从其便，并不一致。现在我们却不能不确定每一个学科的范围、研究对象，和其他学科的划分。我希望这次科学规划工作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我们绝不应走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把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生活称作民俗学，把研究其他民族的文化、生活称作民族学，因此，我也不同意以搜集、研究、展出汉族人民文化、生活的博物馆称民俗博物馆，而把搜集、研究、展出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博物馆称民族博物馆。我认为不如都称民族博物馆。当然，这是还应当讨论的问题。

名称毕竟并不是重要的，只要大家能同意一个名称也就可以

了。我也并不设想很多博物馆的牌子上写着民族二字。我想主要的还是在各地的地志博物馆里应当有反映这地方人民现代的和当前的文化和生活的部分。如果这地方是多民族的聚居区，就应当注意反映各族的文化和生活，如果是单一民族的地区那就反映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这里应当提出，我们不当把“民族”的概念局限于少数民族。汉族人民的文化和生活必须受到同样的重视。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博物馆工作者对少数民族文物已经有了一定的重视，但是却忽略了汉族，认为在汉族地区就没有必要去注意人民的文化和生活的材料了，那是不对的。

另外，我想在各大城市和省级以上的地志博物馆里是否应当考虑开辟一个介绍中国民族大家庭的部分，用来增进各族人民间的了解和团结。在民族自治州、区的博物馆里也应该注意这个工作，特别不当忽视汉族人民文化、生活的介绍。

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一个反映各族（包括汉族）人民文化、生活和他们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综合性博物馆是迫切需要的。这个博物馆挂上中央民族博物馆的牌子是相宜的。

二

对于各民族人民现代的文化和生活的文物搜集，我们博物馆工作者注意得是不够的，以致有人这样说，现在的文物一定要毁灭得差不多了，等后代的考古工作者去发现了，才有资格进博物馆。这种说法固然过分了些，但是重视古代而忽视现代的成见不能说不是相当普遍。博物馆和古董铺的区别还没有很明确。这种现象并不完全由于博物馆工作者思想上不重视现代的文物，主要还可能是由于有几个具体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

比如，有人说处理历史上的遗物比较容易，数量少，只要搞

清楚了年代、地点，就有地方可以安放。而反映现代人民的文化、生活那就困难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进博物馆里来。有人出题目，规定了范围，我们就好办，比如革命文物展览，或是年画展览，我们会搞，至于一般的文化、生活展览怎样搞法呢？又比如，少数民族文物的陈列，开始时倒也容易，有什么就陈列什么，后来东西多了，也发生了陈列什么的问题。批评也来了，为什么把这个摆出来，为什么没有把那个摆出来。开始时东西都是些各少数民族送来的礼品，登记登记就算了，后来要自己去搜集了，搜集些什么的问题经常解决不了。而且各人有各人的主意，搜集回来的什么都有。我有一次在贵州贞丰的街上买了两个陶罐，一双草鞋型皮鞋，送给了文物陈列室，别人问我为什么搜这些东西，我想了一下只能说，怪好看和别致的。好看和别致难道是搜集的标准么？当然不是。又比如，去年在都匀停了一晚，去逛街子，街子有一种翻挠，是当地还在应用的一种简单的农具。同去的朋友说，这种农具在中原古代也有，但早就不用了，很难得在这里看到。我就建议，买一个带回去。可是支持我的人不多，原因是太笨重了，运输很麻烦，而且看上去很简单。所以有人说，还不如回去要木匠做一个就得了。又比如，有人说云南河海里的船和昆明的不同，很可能从这个特点上了解民家人（即今白族——编者注）的来源。但是我们能不能考虑运一只船到北京来呢？

这些都是实际问题，也就是民族博物馆的对象和方法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并没有成熟的答案，只能提出一些意见。

我想民族博物馆搜集、研究和展出些什么应当决定于它的任务。总的说，它是一个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机关，当前的任务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文化。具体些说，它是通过系统的搜集、研究和展出，反映各民族文化、生活和社会性质的实物，或实物的复制模型、照片、影片等来表现一个民族在

社会发展中社会性质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规律和前进的方向，来鼓舞、推动各族人民向社会主义迈进。

让我说明一下社会性质和民族形式。社会性质是指一个社会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各民族在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上具体的生活形式是不一定相同的，各有各的特点，从语言、衣食住行，以至文学艺术等，各民族都有他们自己所熟悉和爱好的民族形式，所以可以是百花齐放的。民族形式也是变化的，也是适应着社会性质在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推陈出新的，在民族形式的特点上有着它继续性的发展。各民族间又不断交流，起着相互丰富的作用。

现在我们各民族都在迅速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在社会性质上正在起着空前的变化。我们应当及时地把反映这个变化过程的实物搜集起来，整理好，展览出来，教育我们这一代和以后的人。这个变化是多方面的，人民的文化、生活都在起变化。我们所搜集的实物也应当是多方面的。当然我们不可能把一切东西都搜集到博物馆里来，所以要在各方面选择那些表现力最强的、最典型的、最有代表性的实物。那就是要能在这些实物中看得很清楚我们展览出来的目的性，目的性明确也是为了教育效果强。

比如我们陈列服装，不应当等于一种古装或时装展览，单纯从好看或新鲜出发来挑选，而应当从服装上看出过去社会的阶级性，看出劳动人民的服装怎样和生产活动相结合，剥削阶级怎样把服装作为权威的象征作为炫耀社会地位的工具等等。更从这些服装上看出劳动人民从纺织剪裁刺绣等手工艺上所表现出各民族艺术的特点。不但如此，我们还应当结合着社会各阶段中各民族在服装上的变化。这样，我们不单是看到了一些不同的服装，而是看到了表现一定社会性质、民族形式的文化和生活与它们的变化了。

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我们做民族博物馆工作的人不能完全像做历史博物馆工作的人一样，他们在搜集材料时多少是被动的，因为他们不可能要什么实物就掘出什么实物来，而我们却可以主动地去搜集，因为我们所要的材料是大量存在的，可以由我们去挑选的。由于我们可以主动地去搜集，所以在搜集时必须有很明确的目的性，对于我们所要表现的文化、生活必须有充分的研究，才能做出正确的设计。没有计划的搜集也不可能有计划的展览，结果就成了一堆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乱东西，不可能成为一个博物馆。

让我再说一遍，民族博物馆的关键问题不是在缺乏材料，而是在选择材料。选择材料首先是明确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在反映一定民族的人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通过他们的民族形式所表现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文化和生活。只有深入研究具体的文化和生活才能做出正确的设计，根据计划去搜集材料和进行展览，收到所要求的教育效果，完成民族博物馆的任务。

三

我并不是一个民族博物馆的工作者，在具体的技术问题上，我没有经验，不可能对各位有多大帮助。但作为一个民族学的学生，我还有一些要求想提来说一说。

首先是希望各位能重视汉族人民文化和生活的变化。这个变化规律是极大的，速度是极高的。我们可以设想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全国人民的生活面貌将要大大的改变了。我们旧有的文化和生活中有些一定要抛弃的了，有些将是我们发展新文化和新生活的基础。我们作为民族博物馆工作者有责任要把那些将要被抛弃的东西作为历史性的文物有选择地保存下来，因为它们将是说

明我们社会大变革的证件，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

我记得我小时候还跟我祖母一起纺过纱织过布，我母亲的嫁妆里还有一部织布机。可是现在早已不在了，我的孩子连纺车和木机都没有见过。纺车和木织机作为生产工具那是一定会抛弃的，我们也不会对它们还有什么留恋，但是民族博物馆里却应当有着各个时期的纺车和织布机，主要很好地记下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一种人在用这种工具进行生产。这会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中宝贵的实物资料。

以农具来说吧。全国农业合作化了，农民会用形式差不多的马拉犁、双铧犁以及拖拉机来进行生产。我们在贵州都匀所看见的翻挠一类的简单工具很快就会失传了。如果我们不及时地搜集起来，将来的历史学家要研究农业技术发展史时就会批评我们了。

纺车也好，织布机也好，翻挠也好，它们的意义不只是给我们技术发展史提供实物例证，而是我们不久以前人民生活的一个构成部分，我们只有从这许多实物中才能了解当时的人是怎样生活和为什么这样生活的。

上次我参加考古工作会议，听到考古工作者在当前建设事业急速发展中忙着抢救地下的文物，我很有感触，因为我似乎到现在还没有听见有人提出抢救地面上的文物的叫喊。我想在座的各位博物馆工作者是值得考虑一下，最好不要等文物埋在地下之后才发现它们的价值。要抢救的话，在没有埋入地下之前抢救也比较少费些事。

第二，旧的东西却不全是纺车、翻挠那一类东西，还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大有发展前途的。那就是历代劳动人民所积累的知识和创造的艺术。忽视中医和地方剧种的批判，应当给我们足够的教训。在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里有些被埋没的宝贝。博物馆工作者是否有责任来发掘和宣扬这些优良的传统呢？我记得去年《新观察》上曾发表过一篇从一幅古画上发现

桥梁建筑的宝贵经验是一个例子。前几天我们学校的语文实习队寄给我两张侗族古代建筑的照片，又使我想起这几年来建筑学家多少次提到这个民族在建筑上的成就，而一直没有听到有人注意这件事。如果有一个民族博物馆有系统地展览一次各族的建筑，我想一定会对我们现在的建筑工程有很大的帮助。关于建筑上的民族形式问题，自从大屋顶被批判后，就没有听到过在这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来了。正确地对待建筑上的民族形式问题要求我们深入地研究我国各民族的建筑经验。无可怀疑，一定有适用于当前条件而形式上优美的形式可以从原有经验上推陈出新创造出来的。

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民族博物馆的前途实在是广阔的。

第三，也是最后，我想提一提关于少数民族的博物馆工作。我已经说过，在我们首都至今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民族博物馆，这件事是和当前我国民族工作的发展完全不相称的。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国内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亲密的民族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获得了民族平等，真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飞跃起来。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也是反殖民主义最好的武器。没有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不深刻地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动。我经常接待外宾，参观民族学院，因此体会也特别深。但是我们却还没有一个中央的民族博物馆，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

1956年2月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工作^{* 1}

最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科学研究工作人员，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要求在4年到7年内，基本弄清楚各主要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调查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所有制和阶级情况，尽可能收集历史发展资料和特殊的风俗习惯，进而对各民族历史做系统的研究。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我除了抢先报名参加外，想对这项工作的意义说几句话。

这项调查研究工作是符合于当前民族工作的要求的。这几年来，民族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都正在迅速地发展。不仅基本上已经贯彻了区域自治的政策，而且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胜利地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各少数民族在各方面的建设事业上突飞猛进，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他们过去的面貌。

走向社会主义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要求，但是如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什么是发展的特点呢？由于各少数民族所经历的发展过程不平衡，所以到现在它们的社会性质还有所不同，各有各的特点：有些还有相当的原始社会的残余，阶级分化还不显著；有些已经进入奴隶社会或是初期封建社会；有些已经是很发达的封建社会，而且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些是他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基础既不相同，过渡的方式、方法和步骤当然不可能是一

* 本文系作者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关于开展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样的。宪法序言中的规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民族政策能正确地解决我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就因为每一个措施都是从各民族的实际出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运用。在过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直是注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的，这是我们的民族政策能够胜利贯彻执行的保证之一。今后，民族工作更要深入，各民族的发展更要迅速；因此对于各民族发展特点的了解，也必须更深刻和更全面。发动科学工作者密切配合起来进行这项研究工作，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要分析研究一个民族的社会性质，首先是要调查清楚他们当前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情况；要进一步说明他们发展的特点，又必须了解他们是从什么历史道路上走过来的。现在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正在迅速发展；它们的社会性质、人民的文化和生活都在迅速改变中。这是一件极可喜的事。我们都欢迎这种改变。但是这样迅速的改变也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及时地把它们原来的社会面貌记录下来，过一个时期，我们就很可能不容易再正确了解它们所经过的那段悠久的历史；至少时过境迁，原来的社会面貌被人遗忘之后，再去追溯，就会发生许多困难了。这段历史弄不清楚，有很多发展的特点也就不容易理解了。领导上在这个时候号召科学工作者进行这项研究工作是及时的。过去，进行这样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还缺乏必需的条件，现在再不动手，就可能太迟了。

弄清楚各民族的历史、发展的道路和特点，不仅是民族工作深入一步所必需，而且已经成为各民族人民共同的要求。应当看到，我国的各少数民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摆脱了民族压迫的枷锁，正在大踏步地向社会主义前进。它们将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在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各民族人民的民族意识的发展。这里也必然会发生对自己民族历史的强烈的感情，他们要求明白本民族是怎样在历史上走过来的，他们不

再满足于神话似的传说，而要求科学的历史的证实。

不仅如此，我们的祖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共同缔造祖国的历史，正是我们民族大家庭血肉相关、不可分割的基础。各民族在大家庭中得到了平等地位以后，各族人民就会要求明确他们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这是我们国家的新形势向历史学者提出的要求，而当前历史学者都还没有能很好地满足这个要求。这种要求随着民族大家庭的发展而日益增加，也是无疑的，历史学者只有欢迎这种要求，因为这也正是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光荣机会。

历史学者要完成这个任务却并不简单。过去的历史学者习惯于从书本上去找资料，后来注意到了地下遗留的文物，和考古学者结合起来。但是在进行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时，不仅要充分利用书本上的资料，而这些书本却又必须包括各民族自己用本民族文字写成的文献，不仅要充分利用地下遗留的文物，而这些文物又是绝大部分还没有发掘出来。只有这些还不够，那是因为有不少民族现在还没有文字，即使有文字的也不一定很发达，而且不一定有许多历史的记载，古代文物的遗留也不一定很丰富。因此，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必须注意充分利用各民族人民的口头传说，保留在语言词汇、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中的许多历史残余。历史学者必须和语言学者、民族学者密切合作，从实地调查中才能获得这些材料。

这次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研究，采取了综合调查的方法，调查组将包括历史、民族、语言、考古、艺术等学科的研究工作人员，因而解决了历史学者在研究少数民族历史中的困难，很多历史学者踊跃参加这次调查研究，是可以理解的。

也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这项调查研究工作能做得好，可以丰富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为这门学科提供具体资料。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关于社会发展史的部分，基本上是利用外国的教材，关于原始社会多根据摩尔根在北

美调查的资料，关于奴隶社会不是举希腊、罗马的例子，就是罗列殷墟不完整的资料。这些固然是重要的教材，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我们还有丰富的、活生生的材料没有加以利用。我国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保留下来了许许多多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材料。这些活的材料不仅可以使我们听起来更熟悉、更易接受，而且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还可以进行现场的观察，在很多过去所不易解决的问题上，我们还有希望在实际调查中，搜集更完整和更全面的资料。

我们知道，在相同的发展阶段上的各民族社会，它们的性质虽则基本上具有共同特点，但是它们具体的面貌却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西藏藏族的封建社会和汉族的封建社会，在形式上就有显著的区别。如果我们只从外国的教材中去学习社会发展的过程，固然可以了解一般的规律，但是对于我国各民族具体发展过程和他们的特点，还是不容易理解的。因此我们还须对我国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和特点，进行研究，这项研究的结果，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

在这方面，有许多极有意义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研究，我国各少数民族都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由于它们原来的社会性质不同，所以过渡的方式不一样，它们当前发生的问题也有不同。比如还具有原始社会性质的鄂伦春族，他们原有的平均分配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的原则存在着矛盾，而这种矛盾并不存在于那些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民族里。我们如果能把各民族过渡时期的具体情况确实详尽地记录下来，就是极可宝贵的资料，也是人类历史稀有的资料。

再说，在我国各民族历史上，由于和汉族封建社会相接触，曾经发生过跨越若干阶段的发展过程。比如，有人认为傣族是从原始公社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这一个阶段。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还可能发生在别的民族的历史里，好像

维吾尔、蒙古等族都是这样的。这些固然还不是结论，但是足以提示我们应当进一步去研究汉族封建社会对各民族发展上的影响，这项研究无疑地可以丰富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

最后应当提到的是：这种和实际密切结合、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科学研究计划，正符合当前知识分子的要求。当前，知识分子迫切要求的是得到能用他们的专长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只有国家的需要和知识分子的专长恰当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充分地把他们的力量用在国家的事业中去。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这个计划中，可以吸收许多学科的分子，有组织地发挥他们的专长，来为国家的民族工作服务。

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事实上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要通过各自的专业去学习，运用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通过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锻炼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自然科学有他们的实验室，在实验室里理论和实际结合了起来，社会科学的实验室就是活生生的人类社会。社会调查是他们的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场所。为了提高我国社会科学的水平，为了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大规模地开展社会调查是有必要的。因此，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是一个值得我们鼓舞的开始。

1956年7月

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 1}

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国有几十个民族，人数最多的是汉族，约有 5.65 亿人，占总数 94%，其他各族共约有 3500 万人，这 3500 万人包括几十个少数民族。其中具有百万以上人口的有 10 个：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这些民族和其他 20 个民族都已经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另外还有许多人口较少的民族在各级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他们的代表。

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比较少，但是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却很广，估计要占全国土地的 60% 左右。汉族大体是住在平原上，住在黄河、长江、珠江等流域，而少数民族大多住在高原、山地和边疆地区。

国内各民族，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发展了生产，创造了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缔造都有重要的贡献。

各民族经过长期的接触，发展了经济上的合作和文化上的交流；并多次共同抵抗外来的侵略。近百年间，帝国主义

* 本文是作者和林耀华同志共同撰写。初载《人民日报》，后由民族出版社于 1957 年出版单行本。

势力的侵入中国，使各民族的命运密切不可分离地联系起来了，特别是近 3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更使各民族人民逐渐地结合起来了。

在我国各民族的长期发展中，汉族占全国人口 90% 以上，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走在其他兄弟民族的前面，在全国生活中起着领导的作用；对祖国的形成，尤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起着决定和先进的作用；对于今后各兄弟民族的发展，将有重大的帮助。

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因为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各民族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中国的统治阶级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同时残酷地压迫、剥削汉族人民和国内各少数民族的人民，成为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敌人。

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汉族人民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并有许多少数民族人民参加了的人民大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已在两年前打倒了这个共同的敌人，使大陆上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都获得解放。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成为我国各民族人民友好合作的大家庭。我国民族关系从此根本地改变了，从民族压迫时代改变为民族平等时代。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因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已不是要帮助各少数民族从民族压迫制度下争取解放，而是要帮助他们彻底实现民族平等……^①

因此，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是：

^① 李维汉：《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见《民族政策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81～82 页。

巩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共同来建设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建设祖国的共同事业中，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步地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民族得以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的民族工作，在实践中获得了重要的成就和丰富的经验，同时也从实践中提出了许多需要民族学者进行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是当前民族学的任务，其中重要的有下列四项：

- 一、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
- 二、关于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的研究；
- 三、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研究；
- 四、关于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研究。

我们将就这四方面的研究工作提出一些体会和意见。

一、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政策，故意抹杀少数民族的存在，认为他们只是汉族的支系或是一些“具有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但这种主观上的企图改变不了事实，只能加深了民族的仇视和隔阂。

解放后，国内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民族平等，永远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出现了一个亲密团结的民族大家庭。有许多过去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到这时才敢公开他们的民族成分，提出自己的族名，作为民族大家庭里光荣的一员。这是我们民族政策的胜利。只有在实行了民族平等的国家里，少数民族才

会有这种恢复本来面貌的要求。因此随着民族政策的贯彻，逐渐涌现出了很多过去一般人很少听到过的族名。1954年普选中，自报的民族名称据称有几百个。这几百个名称的提出是不是表示我们中国有几百个少数民族呢？这是应当提出来考虑的问题。

自报的族名并不一定能作为族别的根据，因为个人意识到所属的共同体并不一定和实际相符合。这种情形在近代民族中还是存在的。^①我国少数民族很多还是处在资本主义时期，当然更可能是这样。有些不同的部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成为一个部族，而在一定时间里各部落还保持着原有的名称。有些部族在一定条件下分裂成若干部族，但是在名称上可能还没有变化。而且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们还有地域观念、乡土观念和宗族观念，这些观念又可能掩盖了他们共同体的意识。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只以民族名称作为族别的根据。

人们共同体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长期历史所形成的产物，而且它们是在历史过程中变化的。在一定地域上，一定时期里，存在着哪些人们共同体，是一个必须就具体情况，按人们共同体的特征进行具体分析的问题。这就是族别问题的研究。

在这个问题上，解放以来我们已经发现了下列各种情况：

一、若干原来是不同的共同体、部落或部族，已经形成了或正在形成一个少数民族，但是还各自保留了原来的名称，因而发生了它们是一个民族还是几个民族的问题。

二、原是一个少数民族，分散迁移到各不同地区，长期隔离，互不往来，经济上没有联系，但基本上仍保留着共同的语言、习俗、历史传说。它们被其他民族用了不同的名称相称（但是有些自称仍基本相同），因而报了不同的民族名称。

^① 普·伊·库什涅尔：《民族自觉是确定民族成分的标志》，见《民族问题译丛》，1955年第1期，第117页。

三、历史上有些民族曾经被打散。在迁移过程中，有些又和汉人发生结合，受到很深的影响，改变了语言，民族特点已不显著，经济上和汉人已分不开，但是受到歧视，居住上和汉人还有不同程度的分离，所谓“大散小聚”，心理上和汉人有隔阂，自认为和汉人不同的少数民族。

四、有些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占统治地位，分散居住在中国各地，后来丧失了这个地位，受到歧视，改变了语言等民族特点，隐瞒了民族成分，但是依然保持了民族意识。

五、有些不同民族成分的集团进入了同一的或相邻的地区，被别族用同一名称相称，也就认为是一个民族，但语言、习俗却有区别。

六、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语言接近，历史上关系密切，但由于历史条件的改变，后来发展了自己的特点，以致本民族内部对于自己是单独成为一个民族还是另一民族的一部分，意见不一致。

七、有些少数民族在民族压迫时代曾经不愿表明和汉人有区别，又有一部分上层受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用统治过当地其他少数民族，在这些被他们统治过的少数民族看来，他们是和汉人一起的。解放后，他们要求公开民族身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但是有关的其他民族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

八、迁居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前后有若干批，时代不同。早去的汉人曾经长期和内地的汉人隔绝，有的甚至受了少数民族的影响，和后去的汉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有一定的区别，因而他们自认和汉人有区别，解放后要求成为少数民族。

九、有些汉人迁居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保留汉族的特点，但是不明确自己是不是汉人，以附近少数民族称他们的名称作为自己的民族名称，而被视为少数民族。

上面所列举的情况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类的问题：

一、它们是不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单位，还是若干不同的民族单位，或是其他民族的一部分？

二、它们是不是汉族的一部分？

我们曾经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对这些问题进行过一些研究。有些已经得出初步结论，提供有关民族和政府作参考。也有些经过反复调查，还没有得出结论的。我们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了。

对于上述各种情况进行族别问题研究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国少数民族（特别是发生族别问题的那些单位）的社会性质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有许多还是前资本主义形态，或是还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形态，它们还没有发展成为近代民族。我们因此不能简单地用近代民族的特征来作为族别的标志。但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们共同体、氏族、部落、部族等，具有什么特征呢？对于这个问题在苏联也正在研究。^① 我们在这方面的探讨还是一种尝试性质，在这里只能提出一些体会。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曾经发生过一些我们现在认为不正确的看法：

一、企图仅以一些特殊的风俗习惯作为族别的根据。不同的人们共同体是可以有不同的风俗习惯的，但是在同一的人们共同体中，即使是近代民族，也可以有不同的风俗习惯的存在，所以这种根据是靠不住的。

二、企图仅以语言作为区别人们共同体的唯一的标志。共同

^① 斯·斯·德米特里耶夫：《俄罗斯民族的形成》，见《论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第1辑，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6年版，第5页。斯·彼卡尔奇克：《论波兰部族的形成与发展》，见《民族问题译丛》，1955年第4期，第67~69页。阿·伊柯札钦科：《古罗斯部族是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的共同族源》，同上，第29页。

语言是近代民族的重要特征，但是并不是说不同的人们共同体必须有不同的语言。事实上有些不同的近代民族在语言上是相同的。因此把说同一语言的人都归在一个共同体中是没有根据的。

三、企图以族源来解决族别问题，认为如果能证明一个集团在历史上曾经是某族的一部分，就可以确定这个集团的民族成分了。这种看法忽视了人们共同体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事实上有不少近代民族是从同一个部族中分出来的。

这些不正确的看法都是由于没有掌握部落、部族等人们共同体的特征。部落、部族的特征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它们的特征就是近代民族特征的萌芽状态。斯大林说过：“民族（指近代民族——作者）的要素——语言、地域、共同的文化等等——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地创造出来的。但这些要素当时是处在萌芽状态中，至多也不过是将来在某些有利条件下可以形成为民族的一种潜在力。这种潜在力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并具备有民族市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时期才变成了现实。”这是说由于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促进了他们的语言、地域、心理素质等等的发展，使他们共同体的性质起了变化。因此，部落、部族等特征就是近代民族特征的萌芽状态，也就是语言、地域、经济联系、心理素质上所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共同性。离开了这些共同性去考察是不可能正确地进行前资本主义时期人们共同体的族别问题研究的。

必须指出，这四个民族特征的萌芽在不同阶段上发展程度不是平衡的，由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研究得还不够深入，现在还没有充分根据来指出他们发展的规律是怎样，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有如下一些体会和意见。

一、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见到一定程度的共同语言在部族中已经具备。但是这并不是指同一部族的人都听得懂大家的话，在部族中方言的分歧可以很显著。比如苗族方言的差别就很大。

这些差别可能是表示原来说同一语言的人由于缺乏经常的接触，长期隔离，各自发展了他们地方性的特点，或是表示原来说不同语言的部落形成了一个部族，发生了共同语言，但还保存一定的区别。

在这里应当提出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在云南景颇族中却存在着不同的语言：景颇语和载佤语。这两种话都属于藏缅语族，但前者属景颇语支，而后者属缅语支^①。据说在缅甸的景颇族还有说其他话的。这些语言上的差别已经超过了方言的差别。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现在的景颇族是不是一个共同体呢？有人提出否定的意见，因为如果说人们共同体必须有共同语言，他们怎能说是一个共同体呢？但是如果我们结合了对这些人的社会性质的研究来考察这个问题，我们感觉到这样的结论是过早了。我们已经知道景颇族现在还保留着相当程度的原始社会的形态。他们现在所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可能还没有达到部族的阶段，就是说还具有一定的部落联盟的性质。我们对于部落联盟是否必须已具备共同语言这一点还不十分清楚，所以我们不应当用部族的特征来衡量这种人们共同体。必须进一步从其他方面去考察它们是否已存在了一定的共同性，以及这种共同性的基础是什么？当然，关于景颇族的语言也是应当进一步加以分析：景颇语和载佤语的差别程度究竟怎样？是否能认为是方言的区别？它们之间是否正在形成部族共同语？这样的研究才能丰富我们对于人们共同体发展规律的知识。

二、共同地域是指历史上一个共同体的基本群众在这一地域上的稳定居留。一般说来，人们共同体稳定居留的地域在近代民族形成之前就存在的，虽则在这一地域内的居民中间还没有发达

^① 罗常培、傅懋勳：《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中华书局 1954 年版，第 30 页。

的经济联系，没有固定的和公认的民族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们共同体是否必须具有相连接的聚居区也成了值得考虑的问题。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有些曾因不同的历史原因，发生过迁徙和流亡，在地域上形成了不连接的部分，但是依旧保持一定的社会联系和显著的共同心理，因此不能认为地域上的分散即是人们共同体的分裂。回族、苗族就是这样的例子。又如贵州的仡佬，分散在广阔地区，和其他民族杂居已经有相当长的时期，但是他们内部却至今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远及百来里之外的同族。我们不能因为仡佬缺乏长期稳定的聚居区而否认他们是一个共同体。

三、近代民族的形成由于共同经济的出现，但是并不是说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们共同体没有经济联系，只是说这时期的经济联系没有近代民族那样密切。部族内部经济联系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汉族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在后期，并不像欧洲封建社会具有那样的分散和割据的特点。这已经引起历史学家对于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是什么时候形成的问题的争论。

同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前资本主义时期在一个地区内不同民族成分的经济联系和这种联系对共同体的稳定性的影响。在和汉族聚居区邻近的地区就有这一种情况，就是汉人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市镇上，掌握了这地区商品的集散，并占有了这地区大部分土地，这样把这地区不同民族成分的人联系在一个共同的经济结构中。这种情况虽则已有相当长的时期，但是不同民族成分的人在语言、心理上依旧保持着他们自己的特点，并没有形成一个共同体。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共同心理素质这个特征并不像其他特征那样容易捉摸。我们对于这个特征的体会也是不够的，以致有人认为特殊的风俗习惯就是表现共同心理状态的文化特点。我们觉得共同心理素质

既然可以称作“民族性格”，^①那就必须是贯穿在人们生活、文化各方面的一种共同的风格。虽则我们要明确地说出某一民族的风格是怎样还有困难，我们在和不同民族的人民接触中却不可能不感觉到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风格。比如，我们不会把维吾尔族的舞蹈误作苗族的舞蹈，或是觉得藏族音乐和朝鲜族音乐毫无区别。如果这些风格就是共同体的共同心理素质，这种特征在前资本主义的共同体就很显著的了。因此，我们在研究前资本主义时期人们共同体的族别问题时应当充分注意这个特征，不但要在文化和生活中去了解一个共同体所特具的风格，而且要考察这种风格是怎样形成，怎样变化，以及与其他共同体在这方面的关系和区别是怎样的。

我们在族别问题研究上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深入，但是已接触到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们共同体的特征问题。我们体会到不可能在语言、地域、经济联系和心理素质等方面之外去找到一个简单的标志来解决族别问题，同时也不应当用近代民族的标准来要求于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们共同体。我们只有就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就是就具体的人，按他们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的阶段，从语言、地域、经济联系和心理素质发展的情况，去看他们所形成的共同体和这个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变化。根据我们初步的认识，在人们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各个特征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由于复杂的历史条件，有时若干特征的萌芽被遏制而得不到发展的机会，因此任何一个或几个特征上表现了显著的共同性就值得我们的注意。

应当指出，我们进行的族别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代替各族人民来决定应不应当承认为少数民族或应不应当成为单独民族。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由别人来改变的，我们的工作只是在从共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8页。

同体的形成上来加以研究，提供材料和分析，以便帮助已经提出民族名称的单位，通过协商，自己来考虑是否要认为是少数民族或是否要单独成为一个民族。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要各族人民自己来做的，这是他们的权利。同时必须承认，族别问题研究对于各族人民自己作出这类决定是有帮助的，因为各民族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过去反动统治所制造而遗留下来的孤立、隔阂状态。他们还没有机会充分知道的历史，还没有机会和其他单位充分往来。因此，他们还缺乏充分的条件来作出对自己的族别问题的正确决定。各族人民是需要，而且也欢迎民族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为他们服务的。

二、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

关于各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是我国民族学当前的重点任务，也是今后一段时期的中心工作。目前各少数民族正在或即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各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明确它们发展上的特点，因此，这项研究是和当前民族工作密切相结合的。

这项研究也将丰富我们对于社会发展史的知识，充实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而且现在我们所有社会发展史的教材大多依靠翻译，如原始社会引用摩尔根的调查，奴隶社会举希腊、罗马为例等。这些材料固然极为重要，但是对于我国的一般读者是比较生疏的，因此限制了这门科学知识的传播。事实上我国在这方面却有着丰富的材料。我们少数民族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许多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所以还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前资本主义时期各种社会形态的面貌或残余。对于各少数民族社

会性质的调查就将为我们记录和搜集有关各种社会形态的材料，这些也正是社会发展史的生动教材。

必须指出，由于各少数民族正在迅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如果不及时把它们在改造之前的面貌记录下来，很快就会丧失直接观察的机会了。因此，这项研究也应该看成一项急迫的任务。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已经有的，但不够系统和深入的材料，举例说一下我国少数民族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存在着哪些不同的社会形态：

一、带有原始社会形态的类型。东北兴安岭森林中的鄂伦春人是这种形态的一个例子。他们主要依靠狩猎为生，生产工具很简单。很早以前，他们用自制的弓箭进行狩猎。约在 1920 年以后，大量使用了各种枪支。在季节性围猎的间隙，他们也进行捕鱼。生活游移不定。

他们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土地氏族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他们的渔场和猎场只许自己氏族的人使用。他们人人参加劳动。迄今仍保持着集体劳动的习惯，每次出猎都是三五人或七八人自愿组成临时小组。这种习惯还带着比较浓厚的原始性质。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与发展生产，而是由于人多了，深入密林后可以互相照顾，免被野兽伤害。他们男女之间也保持着自然的分工，男子专司狩猎，妇女从事家务劳动。

猎获物的分配基本上实行平均分配的制度。打猎完毕，参加的人每人都分得一份。那些鳏寡孤独和困难户，也都分得一些兽皮和肉类以维持生活。

他们的财产基本上都属于氏族公有，但是作为基本生产工具的枪支、马匹、猎犬以及房屋已归各家族私有；实际上，个人或家族的用具和储藏的东西，遇有需要亦可为其他家族使用。

随着枪支的应用，生产力提高了，生产品有了剩余；又与农

业社会相接触，产生商业，鄂伦春的原始氏族社会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在和外族进行交换中，兽皮成了重要的商品，于是也逐渐成了私有财产。现在他们猎得野兽以后，兽肉还是大家平均分食，但是兽皮却属于猎获者所私有。氏族内部发生了贫富之分。贫富的标志是占有马匹的多寡。应该指出，尽管鄂伦春人已经出现了贫富之分，但是阶级分化还不明显，他们并不利用私有的马匹、枪支、猎犬或兽皮来剥削别人。

在氏族或部落内部，他们一般都还保持着民主决定问题的习惯。每有重大问题，照例都由氏族或部落首领邀请老年人和有关人员共同研究解决。在婚姻上，他们实行氏族外婚制。

除了鄂伦春族以外，云南的佤族、海南岛的黎族和台湾的高山族也多少保留着一些原始社会的形态。如佤族的狩猎还保持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则。佤族地区土地还属全部落公有，有的还以部落为单位集体生产。同一部落的人共同在一块土地上耕种，在收获时按各家所出劳动力计算分配。又如黎族的“合亩制”和高山族的“蕃社”，组成内部的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制度，也都具有这样的性质。

二、带有奴隶制度的形态。大家熟知的是彝族具有较显著的奴隶制度的形态。但是，彝族的社会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不同地区就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云南、贵州的彝族地区早已进入封建社会的阶段，而四川大凉山中心地区的彝族社会迄今仍带有显著的奴隶制的特点。

大凉山中心地区的彝族人经营初期农业，部分耕种水田，还有以畜牧为副业；也有纺织、铁工、建筑等手工业。这些手工业还没有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分工与交换不发达，市场与商人阶级还没有形成。

这个地区的彝族有黑彝和白彝之别，大体说来，黑彝是奴隶主，白彝是奴隶，他们主要的区别是阶级的区分。在大凉山黑彝

占彝族人口的极其少数，但他们占有大部分可耕地和牛羊牲畜，以及生产工具和房屋；同时占有可以买卖的奴隶。他们有权杀戮奴隶。他们几乎完全不从事生产劳动，主要靠剥削奴隶的剩余劳动，收地租，放高利贷为生。他们轻视劳动，认为劳动是可耻的。

白彝占大凉山彝族人口的绝大多数。依据他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可以分为三个阶层：“噶示噶洛”——即“锅庄娃子”，单身的奴隶，完全属于主人所有，使用主人的生产工具和资料，被迫进行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他们得到主人的信任以后，可以结婚成家，这就成了“安家娃子”。“安家娃子”从主人处可以租到一小块土地，按期交纳地租。他们不能随意迁移，必须在主人家住处的一旁另筑小屋居住，以备主人的随时召唤。这些娃子给主人一定身价可以获得较大的人身自由，对自己的财产具有完全的所有权，对其子女也具有亲权，这就成了“曲诺”。

“曲诺”仍须依附原来的主人以求得保护，否则仍有被别人掳为奴隶的危险。所以严格说来，他们并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但是“曲诺”和“安家”却又都可以占有奴隶，奴隶的奴隶又可以占有奴隶，甚至有“七道娃子”之说。

尽管白彝阶层的分化很复杂，但是，黑彝和白彝的界限却是十分严格的。如严禁黑白彝通婚，黑彝可以出卖、转让、掠夺、屠杀、刑罚白彝。黑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白彝中的三个阶层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升降，但白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上升为黑彝。彝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是很明显的。奴隶们对奴隶主的反抗、毁坏生产工具、逃亡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由于白彝内部存在不同的阶层，利益有差别，而且因为地域阻隔，很难形成统一的力量。由于奴隶主轻视劳动，并强迫奴隶劳动，加以血族复仇的事连绵不绝，以及解放以前残酷的民族压迫，彝族的社会生产力是很低的。这些是彝族社会长期贫困、落

后的主要原因。

除了大凉山中心地区的彝族以外，云南西部江心坡及胡康河谷、迈里开江以西的萨纳山地的景颇族也有蓄奴制，但不像彝族奴隶制那样显著和普遍。蓄奴者多系山官，奴隶多系抢来或转卖的幼童。奴隶长大了，他们的主人为他们婚嫁，他们所生的子女仍是奴隶。但奴隶可以赎身，奴隶主与奴隶同样劳动，生活差异也不很大，这可能还是在奴隶社会初期的情形。

三、封建社会的各种形态。属于这一类型的少数民族为数较多，而且还各有各的特点，现分别举例如下：

（一）新疆维吾尔族

新疆的维吾尔族在土改以前就具备了封建时期的若干不同发展阶段。南部的墨玉县维吾尔族的统治阶级被称为“和加”（贵族之意），他们占有大量土地。他们把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有庄园，依靠农奴的无偿劳役来耕作，另一部分是给予农奴的份地。农奴需要承担一系列的无偿劳役，这是最主要的剥削方式，代表着封建初期的形态。“和加”可以夺取农奴财产，自立法庭和监狱，可以对农奴任意刑讯以至拷打致死；也可把他们变卖转让。农奴被剥夺了人身的自由。他们在人身的隶属性上具有程度上的不同，所以也可分出不同的阶层。

以上的那种封建初期的农奴制在维吾尔族的农村中还是比较少的，比较多的是无偿劳役和对分制同时并存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又有多种多样，地主阶级看哪样有利，就采取哪种方式。这些剥削方式都是属于封建社会中期的形态。

城区附近的一些农村，如喀什、阿克苏附近的农村，由于这些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剥削方式主要是高额的实物地租和雇佣劳动。地主阶级也经营一些城乡间的商业。这是封建后期的一种形态，在维吾尔族社会中还不很发达。

（二）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

据现在的调查，傣族过去的封建制度是在原始公社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封建领主经济中，依旧保存了原始公社的形式。他们的封建领主（土司）窃取了村社所有权。形式上存在着几种土地所有制——村公有、领主所有、农民私有，但占统治地位的只是一种所有制，就是封建领主所有制。村社平分土地的陈规，已变成平均分配对封建领主的负担——封建剥削的依据，村社变成领主剥削农奴劳役的劳动编组，村社变成了负担单位。农村公社已完全变质，原有的公社议事会也仅存形式，原始民主的内容已不存在了。这很显然是原始农村公社在发展过程中，被封建王朝加上了一套封建统治的制度——土司制度，从而使原始农村公社变成了封建领主统治下的农村公社了。他们的社会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还保存了原始的公社，但是实质上已是封建社会了。

（三）西藏地方的藏族

西藏藏族封建社会的特点就是政教合一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治和宗教密切结合起来，维护巩固它的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西藏全境的土地绝大部分都属于喇嘛寺院、贵族和地方政府。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贵族有自己的庄园，参加地方政府工作的官员都有一定的封建采邑。农民与牧民是被剥削的阶级，他们要为寺院、贵族和地方政府承担一系列的义务，包括租税和无偿劳役。

除了上述的三种类型的封建形态以外，还有多少少数民族地区是同过去汉族地区封建性质相差不多，他们也是受着封建官吏和地主们的压迫和剥削，如贵州及其以东的比较接近汉人或与汉人杂居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历史上虽然也有过土司的封建统治，但大多在清代即已改土归流，建立了流官的统治。他们的社会性质与附近汉族农村相差不多，不过少数民族的人民所受到的压迫

剥削更加多一层，因为除了地主的剥削外，还加上大民族主义封建王朝的压迫剥削。

从上面简略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少数民族在社会性质的问题上存在着下面这些特点：

一、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除了那些大体和汉族的社会性质相同的民族外，许多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还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或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其中有一些还保持相当浓厚的原始公社的残余，有不少基本上还是奴隶社会和初期封建社会。

二、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是复杂的。我们很难找到某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典型例子。常常在一个社会中存在着多种社会经济成分。比如以有人认为是奴隶社会的大凉山中心区的彝族来说，黑彝的身份并不是单纯的奴隶主，他们同时可能具有封建主的性质，因为他们在蓄奴以外，又出租土地，以赋役和实物地租的形式占有土地承租者的剩余劳动。白彝中的“安家娃子”的阶级地位也是值得深入分析的，因为有人说他们已经开始从奴隶身份向农奴过渡。“曲诺”的性质更是复杂，因为他们可以占有土地和蓄奴，进行剥削，但同时并没有摆脱奴隶的身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固然是复杂的，但在多种经济成分中，有些是旧的残余，有些是新的萌芽，有些是当时占主要地位的成分，这些都是可以也应当区别出来的。

三、同一少数民族中还可以发生显著的地域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程度有时可以很大，甚至属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彝族在大凉山中心地区，奴隶经济成分占着主要的地位，但是在边区封建经济成分已经很显著；贵州、云南的彝族已有相当长的时期发展了封建主义，有些甚至已超过了初期封建的形态。新疆维吾尔族在不同地区就有封建初期、中期、晚期三种形态。黎族的中心地区还实行着具有原始共耕经济的“合亩制”，但是外围靠近汉

族的地区已经是封建性的个体小农经济了。

四、在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各族，他们的社会性质虽则基本上具有共同特点，但是在形式上还是各有各的特点。以封建社会来说，上面所举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各民族所有的特点是很显著的。新疆维吾尔“和加”的庄园、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傣族的土司等所采取的剥削方式都不是一样的。各种形式的比较研究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于社会形态学说的知识。

五、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并不都是循序渐进的，就是说，不一定是经过原始到奴隶、到封建这些阶段的。跨越阶段的飞跃过渡的情形在历史上也发生过，比如傣族社会，以现有材料来看，就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中间越过了奴隶社会这个阶段。有人认为蒙古族、维吾尔族和满族也可能曾发生过类似情况。发生这种情况的历史条件是复杂的。但这种情况也提示了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和汉族的关系，因为这种情况常常是比较落后的共同体和比较先进的汉族相接触的结果。

六、在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还发生一种情况，就是不同民族成分虽则已经进入了同一的阶级结构中，但是各自还保存了不同社会性质的特点。比如贵州西部过去有些苗族受着彝族的统治和剥削，彝族当时已经是奴隶社会或初期封建社会，但是那些被统治的苗族却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原始公社的残余。在汉族封建势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进行统治和剥削的过程中也可能发生过这种情况。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少数民族，不论它原来的社会是什么性质，在先进民族的帮助下，跨越了若干社会发展的阶段，一致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因此引起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它们所经过的变化也是各有各的特点。比如上面所述的鄂伦春族正在从他们原始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狩猎

合作社。他们遇到的矛盾和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在改造中所遇到的矛盾是不同的。他们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时就和原有平均分配的原则相抵触，因此，在改造的措施上不能不采取特有的方式。这些也是我们研究社会性质时所应当注意的问题。

在对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性质的分析时，应当注意上述的这些特点。

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在民族工作的实践中不可能不经常注意各民族发展上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在老解放区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有了发展。过去民族学者也搜集过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但是过去占有的资料还不够全面和深入，研究工作也大多不够系统，我们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虽则有一些初步的认识，但是还很不充分。因此，我们应当重视这项研究，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民族学研究的中心工作。

在进行这项研究工作时，我们应当注意避免以下几种可能的偏向：

一、过去民族学者在少数民族中进行社会调查时，往往缺乏明确的要求，调查者单凭个人兴趣或是没有目的地记录一些零星见闻，忽略搜集有关社会性质的关键性的材料。即使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也很少深入调查和反复核对，以致在进一步分析时常常感到材料不够了。这是调查工作缺乏理论指导的结果。

二、也有些民族学者在没有充分占有事实材料以前，急于想对某些民族的社会性质作出结论。他们往往用一些经典著作上的引语来代替深入的观察，满足于挑选一些零星的例子来证明一般规律的正确性。这种教条主义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并无一点好处。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过逐步深入的系统调查研究，才能对各少数民族社会性质得到正确的认识。

三、由于各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复杂性，它们常常具有不同

性质的经济成分，它们又有很显著的地域上的差异等等，研究者如果主观上具有成见，很容易被片面的或局部的事实所迷惑，而作出不正确的结论。因此在进行这项研究工作时应当特别着重全面深入搜集有关材料，以反复调查的方法来校核从已有材料中得出的结论，草率和急躁的偏向是必须克服的。

三、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研究

我国的少数民族正处在巨大和迅速变革的时期，从不同社会性质的基础出发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的改变，从原始的或是分裂成敌对阶级的社会改变成没有剥削的社会，而且是极广泛和深刻的文化和生活各方面的改变。各少数民族的人民都将在这个伟大的过渡时期发展成具有高度文化和现代生活的人。各民族的新文化和新生活并不是离开了他们原有的文化和生活，凭空创造或全部向别民族输入的，而必然是从原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是一个一方面发展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和陈旧的和有害的旧文化旧生活进行斗争的生长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创造性的结合的过程。民族学者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个过程和帮助各民族人民促进这个过程。这就是关于各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研究。这项研究有三个方面：

一、民族学者对各民族人民的文化和生活的研究首先应当着重观察各民族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所创造的新事物；注意这些新文化和新生活是怎样发生的，怎样为群众所接受的，怎样满足群众的需要。这是这项研究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方面。

二、这些新文化和新生活既然是在原有的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和与衰亡的旧的文化、生活斗争中长成的，我们也必

须对各民族原有的文化、生活有充分的认识。必须指出，对于各族旧有文化和生活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各族人民当前文化和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更正确地估计新文化和新生活的意义，这和资产阶级学者的猎奇和搜集古董的观点毫无相同之处。

要正确地了解各民族人民原有的文化和生活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变化：我们必须区别哪些是应当发展的民族传统，哪些是发展新文化、新生活的障碍。这个要求就引导我们去分析文化、生活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在原有的文化和生活中，有些部分是直接服务于剥削阶级的，有些部分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服务于自己的，也有些部分是不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这些不同性质的部分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有些是应该消灭的，有些是可以利用的，有些是必须发展的。这是这项研究的第二个方面。

三、社会主义的文化是通过各民族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来发展的。这是和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根本不同之处。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是这个民族长期历史的产物，是这个民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积累；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各民族劳动人民创造了他们文化和生活上的特点。而且各民族的人民从小在这种具有特殊形式的生活中长成，养成了他们对自己民族形式的感情，同时也成了他们继续发展他们的文化和生活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各民族的文化和生活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当然民族形式也是不断变化的，但是这种变化的规律却不同于社会性质变化的规律。深刻地研究各民族文化和生活所具有的民族形式和它变化的规律，是这项研究的第三个方面。

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这几年才开始的，民族学者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注意还很不够。但是这个变化是很迅速的，所以如果不及时研究这个过程，将来必然会成为不可弥补的遗憾。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把这项研究提出来作为今后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对于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虽则还缺乏足够的注意和系统的研究，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也积累了一些零星的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原有的文化和生活是多种多样的，极为复杂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各民族人民都有他们独到的创造，使他们的文化和生活丰富多彩。我们在这里不能对国内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作综合的介绍，但是愿意对在进行这些方面的研究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提出一些初步意见。

一、我们不妨先从物质文化说起。物质文化包括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生产工具是劳动资料的主要部分，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使用不同的生产工具。我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他们所用的生产工具有的是很简单和原始的，也有比较发达的。又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地理条件多种多样，各地方人民所从事的生产也有不同，不但有农、牧、渔、猎之别，而且即使都从事农业，还有平原和山区的差异。因此增加了他们所用生产工具的多样性。对于生产工具的研究，首先应当注意它们的发展水平，从应用一定工具所收获的生产量来决定它是落后的还是先进的。落后的工具被先进的工具所代替是社会过程中的一般现象。民族学者不仅要注意这一般现象，还应当细致地观察新工具代替旧工具的速度和存在的问题等等，而且还要注意有些在主要生产活动中被代替了的旧工具却保留在工艺和园艺的活动里，或是在宗教和社会的仪式里，甚至成为竞技和游艺的用具。

联系着生产工具，我们还应当注意各民族的生产知识和技术，特别是长期在一定地域里所积累的特殊知识和技术。这些都是极可宝贵的，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将给各民族发展它们特别适宜于当地的生产事业的充分机会。比如西南山区的药材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而少数民族在搜集和培养这些药材上却具有专门的知识和技术。

生活用具是应当联系着衣、食、住、行、养生、送死等各方面生活内容来研究的。它们都具有民族的特点，且不提在这方面各民族人民所加工的艺术，只从原料和形式上来说也各有各的创造和习惯。各式各样的民族服装是我们所熟悉的，也成了普遍辨别民族的简单标志。各民族在饮食上也有差别，而且从小所养成的饮食习惯并不是很容易改变的。在城市发展中，民族食堂的设立已成了一个现实的需要。房屋建筑和交通工具的形式也是如此。在生活用具上所表现的民族特点，固然和各民族的生产情况有关，比如牧区民族穿皮革和毛织品，吃肉类、乳品，住蒙古包，骑马、拉大轮车，西南山区民族穿麻织品，吃糯米，住竹建的楼房，背运货品等，都是明显的例子。但是深入研究它们所有的形式，比如在同样地理条件下生活的各民族，有的好白，有的尚黑，有的又喜欢蓝色、红色，这种种形式上的特点却不是从生产情况简单地能加以说明的，我们必须结合这些民族的历史来进行研究。各民族在生活用具上所有的特点，并不都会因社会性质的改变而起根本的变化，他们很可以带着许多这类特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二、人们的社会生活，就是有关人与人关系的风俗习惯等。这方面的研究，首先应当注意那些和社会性质有密切联系的情况，就是说不论什么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比如在原始社会里，血缘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环绕着决定亲属关系的生活节日上常常有许多繁缛的仪式活动。这些都是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共同的特点。但是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共同特点又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以残余形式保留在其后的各阶段中，而且可以在旧的形式中发展了新的内容。这些情况不但可以迷惑社会性质的分析，也使社会生活的研究更为复杂。

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社会生活表现的共同特点就是阶级的区别。这种区别可以很大，甚至形成了“两种文化”。所以在研究

这种社会时，首先要注意这个特点。过去有人常常把某一民族的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作为这一民族的特点，那是错误的。

研究阶级社会各阶级的社会生活时还应当注意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影响。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在阶级社会里是处于统治地位，剥削阶级还要利用他们的权力来推行有利于他们的种种风俗习惯。比如歧视妇女，甚至如缠脚等一类的风俗显然是对劳动人民不利的，但是由于剥削阶级的提倡和推行，在劳动人民中也有通行的。因此社会生活的阶级性的分析并不是简单的。

在劳动人民中，他们的社会生活大多密切地和他们的生产活动相结合。比如节令的性质就常是生产活动的动员和收获的庆祝，庙会、跳场等群众性集会常和贸易活动和青年男女的择配活动结合在一起。这些社会活动固然在生产中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生产技术的改造过程中，那些联系于落后技术的风俗习惯也可以起阻碍改造的消极作用。在有关养生送死的许多风俗习惯中同样应当注意这种情况。劳动人民的许多生活经验常被固定在风俗习惯里，当这些风俗习惯形成的时候可以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生活条件改变了，这些风俗习惯却成了维护落后方式的力量，那就成了进步的阻碍。比如有许多禁忌虽则是有一定的卫生价值的，但是也可以成为传播科学知识的阻碍。更重要的是有些风俗习惯在当前对生产的发展很不利，甚至影响到民族的发展。因此，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风俗习惯也必须加以批判地接受，不应当一律称作民族特点而要求保存和发展。民族学者的调查研究就可以帮助各民族人民重新估计他们的风俗习惯。

三、艺术和文学是各民族文化和生活的重要部分。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没有一个民族不在这方面有它独特的创造。有些人认为生产落后的民族是没有艺术和文学的，那是和事实不符的。我国的少数民族中，有些在经济上还是落后的，但同样有可贵的艺术品。比如台湾的高山族经济上还相当原始，但是他们

浮雕的图腾版却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他们所编织的贝衣，已有很长的历史，同样是极美的工艺品。大凉山的彝族所用的餐具和马鞍上绘着精美的色彩和花纹；苗族和壮族的竹器，即使是很简单的鱼篓，在艺术上都有很高的评价。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各族人民都有丰富的口头创作。云南撒尼（彝族的支系——编者注）的长诗《阿诗玛》一经记录和翻译了出来，已经赢得全国文艺界的推崇。至于文字发达的民族，文学的遗产保留得更多了。蒙族的《格斯尔的故事》和藏族的《米拉日巴的一生》都是已经为大家所知道的例子。音乐舞蹈等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为劳动人民所爱好的历代保留下来的艺术和文学，不但是各民族宝贵的遗产，而且是我们民族大家庭值得骄傲的共同财富。

各民族艺术上的创造提供了美术、文学、音乐和舞蹈多方面丰富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对于民族学者同样是极可贵的。民族学者一方面应当以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来丰富自己对这些民族各时期社会生活的认识，比如《阿诗玛》的长诗就生动地反映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当时阶级社会的矛盾，使我们对撒尼的社会性质有了亲切的体会；另一方面民族学者还应当从这些民族的历史条件来了解它们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变化，比如黔东南苗族的音乐和舞蹈表现出沉重、抑制、内向和细致的风格，这种风格可能是和他们长期缺乏自己的政权、被压迫和被分散的历史分不开的。解放后，从他们歌颂毛主席等曲子上所流露出来的兴奋、感激和舒畅的声调也正反映了他们从生死关头获得新生的情绪。又比如蒙古族的音乐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长短调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提示了当时社会上可能发生的重大变革。各民族艺术和文学的作品也常常使我们看到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证据，比如藏族在唐代和汉族的密切关系还反映在他们现在的音乐、舞蹈上。我们在这里所举的例子由于缺乏研究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可以提示我

们民族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有着广阔园地的。

关于少数民族艺术文学的研究，对于各民族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我国的各少数民族都处于正在形成为社会主义民族的阶段。艺术和文学在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共同心理这个特征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也给了各民族人民发展民族艺术和文学创造了最好的条件。可以预见在他们形成社会主义民族的时期里必然会有伟大的作品出现。

四、关于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研究

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研究作为当前民族学的一项任务提出，是因为宗教信仰不但在历史上，而且在当前，在许多少数民族人们生活中和民族关系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宗教信仰是人类在一定时期中的历史产物，与人们的自然斗争和阶级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民族学者把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社会现实来分析，着重在了解它对人们生活所起的作用和它的变化。宗教不是民族的特征，那就是说宗教的变化和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和变化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历史上有着很多例子，一个民族从信仰一种宗教转变到信仰另一种宗教，或是同一民族中存在着不同的宗教，这些都不影响到共同体的稳定和完整。但是宗教信仰在文化和生活上所起的作用却可以是很严重的，有些民族的人从生到死在一切重要的社会节目上，都充满了宗教的仪式，有些民族的宗教和政治密切结合起来，成为统治机构中不可分的部分。藏族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而且有些民族之间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往往引起复杂的民族关系，成为民族问题的一部分。对于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的研究是特别重要的。

我国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多种多样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

下列几类：

一、图腾信仰：如高山族的派宛部崇拜神蛇，认为和他们的祖先有关。他们的雕刻、绘画以及生活用具上的装饰常用这种图腾作主题。瑶族中有龙犬的传说和崇拜仪式，也可能是这种信仰的残余。

二、萨满信仰：在东北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赫哲、鄂伦春、达斡尔以及通古斯和索伦等族中流行这种信仰，巫师称萨满，群众认为他们具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能知祸福和能驱鬼治病。

三、多神信仰：在西南、中南等地区许多少数民族中流行，内容并不是一样的，他们相信各种东西会成仙作怪，还有许多善神恶鬼。各族有自己的巫师，如彝族的“毕摩”、“苏臬”，纳西族的“多巴”，黎族的“道公”和“娘母”，苗、瑶等族的“鬼师”，佤族的“莫巴”等。

四、喇嘛教：是大乘佛教与西藏原有的宗教结合而发展成的。现在主要流行在藏、蒙古、土（青海）、裕固等族中。喇嘛教有各个教派，如苯派（黑教）、宁莫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教），目前以黄教最为盛行，寺院和信徒最多。黄教有名的六大寺：西藏的哲蚌、色拉、噶丹、扎什伦布，青海的塔尔，甘肃的拉卜楞。每寺喇嘛人数都超过1000人，有的达五六千人。

五、小乘佛教：主要流行在云南傣族和部分佤族中，寺院称缅寺，男子在少年时入寺学经，几年后还俗娶妻。

六、伊斯兰教：有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保安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总数有800万人以上。

七、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都是西方传入的，近百年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有密切关系。基督教的势力主要在西南地区，如苗、佤、傈僳、拉祜、景颇等族都有一部分信徒。

民族学者对于上列这些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可以说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但根据我们的初步认识，在进行这项研究时下列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结合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点。最显著的例子是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在回族人民意识上一般觉得伊斯兰教是他们这个共同体的共同信仰。这种共同信仰被认为和回族之成为一个共同体似乎是分不开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宗教已经成为人们共同体的特征，而是说，共同信仰已经成为反映共同心理素质的文化特点。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就是这样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在别的民族并不都是结合得这样密切的。比如苗族和他们的多神信仰就不是这样。苗族人民虽则大多具有这种信仰，但是并不意识到这是他们这个共同体的共同信仰。而且各地苗族也可以吸收其他民族传入的不同的神作为他们的供奉对象，甚至有部分信奉了基督教。这些信仰上的差异并不影响他们都相互承认是属于同一的共同体。这就是说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并没有结合在一起。各民族在这个问题上情况是不一致的，二者的结合程度也不同。

二、宗教和政治的结合是值得注意的第二点。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在这个问题上最突出的是西藏藏族的政教合一制。这个制度曾经维护和巩固了他们的封建社会经济基础。至于这个制度的具体内容，我们现在还研究得不够。比如寺院在政治和经济上有着什么地位和作用？通过广泛吸收各阶级的人成为喇嘛，寺院怎样和群众密切联系？这些都还是值得深入了解的问题。在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过去的民族运动和农民运动常常和宗教发生密切关系，不但少数民族过去反抗压迫的运动很多以卫教为口号，就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农民运动也很少不打出宗教的旗帜。宗教的口号和旗帜能在群众中发生动员的作用，这也说明了宗教和政治的关系绝不是很简单的。宗教固然常服务于统治阶

级，但有时对群众运动也有一定作用。特别是民族关系上，宗教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应当低估。这些都是必须结合具体历史条件进行研究的问题。

三、宗教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结合是应当提出来注意的第三点。派遣和利用传教士作为侵略先锋是帝国主义者惯用的策略。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在世界各殖民地也可以看到。事实告诉我们，在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南，从边疆到内地，从清代后期到解放前夕，帝国主义者所建立的教会拥有很大的势力，曾经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而且通过小恩小惠深入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的人心，在我们的领土内插入了侵略的据点。解放后这些帝国主义的特务是被驱逐了，但是这段历史所发生的影响还不可能在短期间完全消灭。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现实的意义。

五、几点说明

最后应当附带说明：

一、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是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四项任务。这些任务都是属于我国少数民族研究的范围。并不应当引起这样的误会，以为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开作为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根据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由于民族主义的偏见，歧视殖民地的各民族，曾经把所谓“文明人”的研究划在民族学或社会人类学范围之外，这是错误的。我们肯定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在中国的范围里，不但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

二、民族学的研究范围也并不限于我们在书中所提出的四个问题。比如族源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没有在这里特别提出来

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可以不必进行研究。我们的意思只是说上面所提出的问题比较重要，而且和当前民族工作有着比较更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应该作为重点来进行。但是凡有条件进行研究的其他问题当然都是可以研究的，而且对于民族学的贡献一样是很重要的。

三、民族学在中国还可以说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因此还有许多人对于这门学科的名称、内容和方法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在这里不想从定义、学科分类上进行讨论。为了避免各种讨论成为学究式的辩论，我们认为最好从这门科学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的本身来说明它的内容，而且只有在研究工作的发展中，一门学科的性质和范围才能逐步明确起来。一门学科的发展，我们认为，并不依靠开始时把范围划清，界碑树好，而是依靠密切结合实际生活所提出具体的问题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实际生活是丰富的、变化的，一门学科能从这个丰富和变化的泉源出发，它的工作也会是活泼的、常新的。我们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来为中国民族学提出它的任务的。

1956 年 8 月

关于对待民族民间文艺遗产的一些意见

我们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人，明确发掘与整理民族民间文艺的目的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目的首先是要帮助少数民族形成它们自己的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相结合的文化，帮助它们形成社会主义民族。我们现在帮助若干少数民族创造文字，还不过是一个先决条件，大家都知道文字是根据语言来创造的，这个工作当然很重要，但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通过文学艺术，一个民族的语言才能发展起来，趋于规范化，形成现代民族语言。所以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中将起很大的作用。培养少数民族的文艺工作者是我们当前很迫切的任务。其次，我们之所以必须发掘民族民间文学遗产和培养少数民族作家，也就是为了要表现出我们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特点。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条件来进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互相学习，以丰富各民族的文化。以上两点是今天我们做民族文学工作的主要目的。

如何来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呢？我认为，主要是以少数民族自己的东西为基础，否则，吸收和交流都将落空，所以必须注意各民族自己的特点和民族形式。一般说来，在经济上，在生产方式上，各民族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但在艺术上不尽如此，以民族的大小来衡量民族文化传统的先进与落后是不恰当的。在文学艺术上各民族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和所长，就是说有其各自的民族形式。这种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应该加以很好的发扬。在这方面，我希望我们的艺术家在介绍和设计少数民族用品的时候，要考虑到少数民族所喜爱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图案，并且希望更多地产生通过本民族的形式来表现歌颂党和毛主席的乐曲，不

如此，某些民族的艺术就有丧失民族形式的危险。

关于发展民族文学艺术工作中的主体和重点这个问题，我认为，主体应该放在少数民族身上，首先是让它们自己有伟大的作品出现。这就需要汉族文艺工作者各方面的帮助和做艰苦的努力。过去汉族的文艺工作者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成绩，但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个成绩。我们可以肯定，少数民族存在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既然存在，就要发展，事实上现在正在发展变化。有些民族虽然没有文字，但也有口头创作。这些东西要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起很大作用。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当前最迫切的重大问题——抢救民族民间文学遗产问题，不仅要抢救有文字记载的东西，还要抢救口头上流传下来的东西。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刚才听一个同志说近来又死了一个懂得很多的老艺人，我很着急，这是少数民族的损失，也是我们祖国的损失，因为民间文学艺术必然是人传人的，我们要珍惜少数民族的艺术人才。有一次，我们去听一个民间艺人弹扬琴，有的人欣赏扬琴的本身，有的人感到乐曲好听把谱记了下来，而我看最主要是这个弹琴者可贵，他们在那样的艰苦情况下保留并继承了民间的艺术作品，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关心和爱护他们，如果将来老艺人有个三长两短，以后怎么办呢？岂不会从此失传了吗？因此，抢救少数民族艺术人才是一项刻不容缓要做的事。

有些同志反映，有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东西存在着某种顾虑，这一点都不奇怪。少数民族有它们自己的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这一点必须首先肯定，但是也应该承认它们的文学艺术有精粹，也有糟粕，而且它们在历史上没有很好的条件发展，所以有些东西也不一定完全都是好的，但我们汉族文艺工作者和汉族干部都不能因此而加以轻视。今天有些少数民族老艺人不愿唱讲自己民族古老的传说，就是怕汉族干部不要听，怕被人说成落后，说成封建迷信，并不是他们自己真的不喜欢，而是忍痛不唱不讲

的。民族民间文艺中虽然存在着宗教和封建、迷信问题，但我们如果对宗教采取粗暴的态度，就要犯很大的错误。其实，有些传说作品中虽然有神有佛，但也把自己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放了进去，也有不少人民的东西是通过宗教故事表现出来的。我们今天建设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决不排斥这些东西，我们要真正支持它们，尊重它们多少年来所创造的文学艺术遗产，我们如果对人民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一时辨别不清，那么首先保存下来再说（必要时可以录音），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些东西，不鼓励它们，那么很难发掘宝贵的东西出来。首先要让“百花”放起来，我们应该有这种气魄，从各方面（首先是政治上、理论上）支持它们。这里，我顺便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某些汉族文艺干部对少数民族艺人的尊重是不够的，往往向他们伸手要了些东西以后，就把他们丢在一边了，盗了宝就丢了山，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其实所谓发掘工作并没有这么简单，并且很可能会引起反感。所以我们首先要将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遗产保留下来，继承下来，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后辈将来也会抱怨我们的。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如何具体地培养和帮助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不能错误地对他们抱着“使用”观点。这任务很重大，是继往开来的工作，希望作协昆明分会和《边疆文艺》编辑部早点搞出计划来，包括如何抢救民族文艺遗产问题。

我们汉族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同志们，除了抢救遗产和培养少数民族文艺干部以外，还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作品整理介绍出来与汉族文化作交流的任务。为了做好这一工作，汉族文艺干部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其中最主要是要学会一二种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懂少数民族的文字和语言，在做翻译工作时不免会闹笑话。搞少数民族工作的同志应该在一个或两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上下些苦工夫，使自己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同时对每一个民

族做全面的研究，所以这就需要大家分头去做。一个人钻进一个民族或两个民族中去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们有了这些专家，就可以在具体工作上解决不少问题。但就是在整理介绍的工作上，还要重视依靠其本民族的干部，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取得他们热情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做搜集整理工作时不要挑选，不要怕麻烦。翻译作品也要多种多样，不怕多，越全面越好。我们民族民间文学特点之一是口口相传，也是口头文学，它的变化很多，历代传述的人，加进他们自己这一代的东西进去，所以必定有所增减。但这种增减也是符合他们本民族的思想感情的，因而这是非常复杂而微妙的变化。我们要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实事求是地去体会一个民族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的思想感情。文学艺术离开思想感情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十分艰苦的斗争和锻炼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就要求我们对某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熟悉，决不能只靠记录下来完事，应该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要善于利用近代社会科学的成果，通晓一个民族的发展规律和特点，生动地反映出他们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的思想感情。这样，我们的工作会提得高，成绩也会更大些。

关于整理和介绍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问题，我想强调说：切忌把汉族的东西“走私夹带”进去。整理和介绍首先要忠实，但要达到这个标准事实上是不容易的。就是主观上要这样做，如果对一个少数民族的文艺没有深入的研究，体会不够，整理时必然会漏掉许多重要的东西，或是歪曲许多真实的感情，那也就谈不到忠实地介绍了。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在没有占有和掌握充分的材料之前，急于要进行整理和介绍的工作。有些音乐家连全部曲子都没有记完就走了，有些作家连一个故事的情节都没有弄清楚就离开了。回来之后，关了门，进行整理和介绍工作，不可避免地会碰到材料不完整的困难，那时候就会凭想象来杜撰一下了，

结果就把自己民族的东西，走私夹带了过去。这几年来，这种例子可以说是不少的，现在强调一下，整理和介绍少数民族文艺必须先进行全面搜集，深入研究，慎重处理的要求是有必要的。

我主张在收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原始材料时，必须是用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字记录下来，没有文字的民族，直接用记录符号记录下来。但是其他民族的读者看不懂这些东西，于是要翻译。在翻译时怎样保持各民族原有的风格是一件细致的工作。文学作品故事的内容，叙述的方法各民族都有它们的特点，这些方面如果擅自修改是极不妥当的。比如原是一个悲剧，翻译的人为了考虑到另一民族的读者不一定喜欢这种结局，而装上一个喜剧的尾巴，那是不当的。可以说是一种粗暴的行为；又比如有些少数民族喜欢用对问的体裁来发展一个故事的主题，而翻译的人却觉得不合自己的口味，硬把它改成叙事体，那就不容易传达出原来的那种风格了；又比如有些少数民族的作品中采用韵文体裁，它们通过强烈的节奏来表达丰富的感情内容，如果翻译的人把韵都取消了，也就抹杀了它一部分的风格了。

在翻译的时候，如果不能不改动，也应当做到不乱改或少改为是。老舍同志在有关兄弟民族文学的报告中提出不随便添补的问题是值得注意的。这当然不是说必须一字一字地对译。各民族语法不同，硬是一字一字对译，读者是看不懂的。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忠实于原有的民族风格。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特别是针对某些整理者擅自改动的坏现象而提出这个要求是及时的。今后我们对翻译工作的要求严格一些是有好处的。

最后我要说明一点，我是一个研究民族学的人，不是一个文学家，所以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外行，很多看法是不一定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学者，我要求介绍少数民族文艺的朋友们能忠实于原作品。因为民族学者要根据这些作品来研究各民族的生活文化，如果介绍得不忠实，那不是会上当么？我们历史上

有个孔子，据说他把古代民间的诗歌删去了很多，以致有些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汉代又有个刘歆，把一些伪造的东西掺入了古书里去，害得清代很多学者费了大劲去进行考证。我们不希望现在整理和介绍少数民族文艺的同志中有孔子和刘歆这类人。这类人是很对不住后代的。

1956年9月20日

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

去年8月我到云南来参加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正逢许多朋友在热烈讨论白族历史问题。我有机会参加了各种座谈会，并拜读了《云南日报》上所发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许多论文，这些都给我很大的教育和启发。11月在下关参加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成立大会，遇到了许多自治州的人民代表，他们要求早日开展这地区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他们的督促之下，我更深切地认识到了大理地区在云南各民族社会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

简单地说来，从南诏开国（公元738年，即唐开元二十六年，皮逻阁建南诏国）到大理国灭亡（公元1254年），大约有510多年的这个时期里，大理地区是祖国西南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这地区的人民不但在祖国历史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在发展云南的经济、文化上起了重要作用。对云南各族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因此，在研究云南的民族社会历史时，首先把大理地区各族的历史搞清楚是有必要的。

应当肯定，大理地区民族历史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史记》、《唐书》等对于这地区的民族情况都有系统的叙述。其他如樊绰的《蛮书》、杨慎的《南诏野史》等，以当时的史学水平来衡量都是优秀的著作。我们的前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知识，给了我们进一步研究这地区各族人民所创造的历史的良好基础。但是我们现在所要了解的历史问题却比过去提高了。比如最近半年来关于白族历史问题讨论中所提出的白族族源问题，白族作为一个部族共同体的形成问题，白族社会性质变革问题，以

及白族和汉族相互关系问题等等都是前人所没有论列过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不但如此，用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许多历史资料来研究这些问题时，常常会感觉到有涵义不明、材料不足之苦，结果会使得不同的人从相同的史料中引申出不同的论点来，最近《云南日报》所发表的许多论文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当然，我们并不应当因此低估已有史料的价值，但是为了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不应当满足于已有的资料。

为此，我们考虑要开展大理地区的民族社会历史研究，除了继续整理、考证已有的汉文资料外，最好能有计划地搜集凡是可能搜集到的各式各样能说明这地区历史的资料。充分掌握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

搜集什么资料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搜集些什么资料？大理地区有没有这些资料？如果有，在哪里？怎样去搜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云南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 11 月下旬派出了一个调查小组到大理一带地方进行历史资料的初步察访工作。参加这个小组的有李家端、李一夫、杨毓才和我四个人。

察访的意思是通过实地察看和访问去探索历史资料，为系统发掘和搜集作出计划。和开矿一样，先得勘查一番。我们这次工作时间很有限，所以只能说是初步察访，找些线索，并不要求这个小组立刻着手去系统地搜集文物。

察访之前必须有所准备，就是熟悉有关文献，把要察访的地区历史沿革搞清楚。比如根据文献所传，原来的白国是在白崖，蜀汉曾帮助张氏建立的建宁国也就以白崖为中心，后来就在这地方张乐进求让位于细奴逻。白崖现在是弥渡的红岩。南诏最初的

根据地是蒙舍川，在现在的巍山。洱海东南凤仪一带地区，一般认为是白族早期的聚居区，首先并入南诏。后来南诏的势力向洱海西部伸张，逐走了一部分原在的居民，占据苍洱之间的坝子和坝子里的人和村，并筑太和城，太和村就在今大理人和村附近。更北进兼并了当时所称“三浪”人的地区（就是现在邓川、洱源、剑川一带）统一了六诏。我们这次初步察访只能有重点地进行，照着上述的线索，到了大理、邓川、洱源、剑川、丽江、凤仪、巍山、弥渡等八个县。

每到一县我们首先查阅地方志，并向熟悉当地掌故和情况的父老和干部们请教。把那些有历史价值的古迹记下来。然后挑选重点分别去实地察看，对证一下书上所记的或口头所传的遗址是否可靠；发现了历史文物，轻便可惜的遗物，便搜集回来作为证据；笨重的，照下相带回来；如果是碑，把碑文拓下来；有传说的，把传说记下来。

从这次察访中，我们觉得下列五个方面都有很丰富的历史资料可以搜集。1. 地下的遗物。2. 地面上的碑碣、石刻、木雕、壁画、建筑等实物。3. 民间的文献，包括家谱、日记、书信、诗文、契约、经卷等，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字的记载。4. 口头的传说、神话、唱本、歌曲等。5. 语言。

让我用这次察访所得的资料，分别从上述的几方面说明一下。

地下遗物

大理地区的石器

地下遗物方面首先应当提到的是石器。大理地区最早发现的石器是1939年吴金鼎在马龙峰，俗称白王城的附近发现的石斧

和石凿等磨光石器即新石器。吴氏根据出土的陶器，认为这些东西可能是汉唐之际，南诏以前的遗物，这种古代人所用的石制工具在民间原是常有发现的，但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人们叫它作“雷楔子”，认为是“雷公”使用过的神物。农民挖地时得到了这种东西，有的送到庙里去，有的给巫师收去，有的给孩子们做玩具，也有的用来舂盐巴。我们所到各县，和老乡们一谈到“雷楔子”，很多是知道的。这是说这种石器是很普遍的。这次察访中见到实物的有剑川和巍山两县。

从南部进入剑川坝子的地方，甸尾村附近正在挖海尾河，在我们察访这地方前约一个月，挖得了 10 多件石器。工人们不认得这些是什么东西，觉得好玩，分别拿了回家。我们访问到了这件事，搜集到了四件新石器：三把磨光石斧和一把有孔的月牙石刀。我们又去察看了出土的地层，是在熟红土层底，估计当是两三千年前的遗物。巍山的石器是毕副县长到老乡家里去要来的，还知道出土的地点，在山达上村孔明洞附近。鹤庆中学的教师同志来下关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带来了他在鹤庆搜集到的新石器的相片。从这些已经得到的资料来看洱海周围在比较早的时期曾经有一种人居住过。这种人分布可能是相当广的。至于这种人和现在居住在这地区的各民族具有什么关系，我们还说不出来。但是如果进行有计划的系统发掘，看清楚各时期遗物的关系，历史线索是有可能建立起来的。

南诏前的古城

在察访过程中，我们曾特别注意有没有汉代文化的遗物。在传说中有不少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在这个地区能不能有些实物来证实当时和中原文化的关系呢？结果并没有找到什么可靠的证据。只是在邓川德源城废址的庙宇附近有许多刻有图案花纹的砖，有可能是比较古代的遗物，但老乡说是从对面山脚那边搬来

的。为什么老远地去搬运这些砖呢？也不清楚。这是一个疑案，我们没有时间去追查。砖存邓川县文化科。庙宇的附近还有。

我们到弥渡听说在红岩古城村有个白王城。我们想这可能是白崖国的古城。老乡还指得出古城遗址，现在是一片整齐的豆田。我们在田垄里反复察看，发现不出任何文化层。如果传说有据的话，埋得一定更深了些。也可能传说没有根据，或是地址传错了。

其次是建宁国的古城。据传诸葛亮南征封白子国王后代龙佑那做酋长，改姓张，在白崖筑建宁城。据当地传说建宁城就在今县城北门外螺山上，俗称紫金城，现在这片高地上有许多庙宇。又据说当时弥渡坝子低处都是水，这片高地地势正适宜建城。但是我们在这上面四处找碎砖破瓦，却看不出一点古代遗迹。总的说来南诏以前古城在这次察访中我们并没有找到实据。

南诏大理国的古城

其次说说有关南诏和大理国的古城。

细奴逻所建立的蒙舍诏都城在蒙舍川的□□山，即今巍山县。□□山是坝子边上的一个山冈，传说有细奴王金殿的遗址。我们到山上察看，果然在地面上还留着许多瓦片，这些瓦片上还有文字，但和汉字不同，而略似大理、姚安出土的有字瓦片，足以证明是南诏时代的遗物。因此这个古城遗址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了。

大理的太和城和羊苴□城等遗址是大家所熟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略去不谈。

大理以北大体上可以肯定的南诏古城有遣賧诏的德源，在邓川县东北两公里多公路旁的高地上。由于传说中把火把节和德源城联系了起来，所以这个古城的名字也是云南人民所熟悉的。传说是皮逻阁要统一六诏，把其他五诏的王骗到大理，在松明楼里

烧死。其中有个遼賧诏的王，临走时他的妻子慈善夫人知道有危险，所以用一个铁钏套在王的臂上。王被烧死了，慈善夫人找到戴有铁钏的尸体，迎回归葬。皮逻阁又要威逼慈善夫人嫁他，派兵围城，城在高地上，水源断绝。夫人自杀后，称这城作德源城，纪念慈善夫人的美德。我们去察看德源城的遗址，可巧当地部队操练挖了许多壕沟。在沟内很清楚地可以看出离地面约1公尺有一文化层，层内许多瓦片，有迹象可认为是南诏的遗物。沟内还有比较完整的陶器。我们因为怕掘坏了，没有动。陶器旁有炭灰炊烧遗迹。

更往北是剑川。剑川是南诏和吐蕃势力接触的前线，曾经一度被吐蕃占据。地方志上还载有吐蕃所据的罗鲁城，初唐所筑。我们多方打听，最后知道现在还有个罗鲁村，和记载合得上，附近白族称他们说的话为“蕃语”。但是限于时间，没有去察看。

剑川之北，是丽江的九河，是白族聚居区。我们听说有白王城，在九河甸头乡坝子四边山坡上。我们找到老乡带路，走近白王庙废址，在田沟里找到有字碎砖，一部分是梵文，一部分是汉字，记着高氏和段氏字样，还有一些不像是汉字，可能就是白文。高氏、段氏是大理国的统治者，所以可能是大理国的遗物。这个山坡上砖很多，而且字形和质料很有差别，不像是一个建筑物上的东西。

这些古城遗址无疑是考古的宝库。其中一定埋藏着许多可以表明当时人民生活的实物。但是发掘遗址是一项科学工作，没有专家现场指导，如果随意挖掘，反而会破坏这些遗址的历史价值。比如我们得到的新石器因为出土时没有把同时出土的砖瓦或其他东西保存起来，没有把这些新石器在地下的原来情况记录下来，使我们无法确定它们的年代，更无法正确地和其他地方发现的古代文化相比较，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这不是一种永远补偿不了的损失么？因此，我们这次探访并没有进行发掘。只把察

访得来的线索提供考古工作者考虑，是否有发掘价值；如果有发掘价值的，将来由他们有计划、有系统地去发掘。作为一个研究大理历史的工作者，当然盼望地下的历史资料能早日发掘出来。

应当指出，如果不早些作出发掘这些古城的科学工作计划，也就保不住不受到破坏。农民为了扩大耕地面积，过去弃废的土地正在陆续开垦。以往工具简单，土翻得浅，现在用了新式农具，更容易深入下层，破坏文化层的可能性也更大。我们在大理农村里就看到最近出土的全副明代火葬碑罐，罐内还有当时用作货币或装饰品的贝壳。这些都是垦荒得来的。这些东西因为不值钱，又好玩，所以农民们带了回来。如果是铜器，就很可能成为废铜买走了。早一些进行科学的发掘，对国家的历史遗物保障可以大一些。

地上的历史文物

现在谈谈地面上的历史文物。这些东西比起地下的文物更容易遭受损失。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党和政府执行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文物的政策，因而取得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宣传教育不够细致，损失是不少的。抢救这些文物还是当前的急务。

在这次察访中，我们发现了许多有意义的东西。

先说碑碣：由于过去的文人相当重视金石之学，和党的文物保护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大理古碑一般是保存下来了。比如大理太和村的德化碑（即南诏碑），西门外的元世祖记功碑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石碑现在都保存了。德化碑还造了房屋加以保护。但是由于有人迷信这碑的石末可以治病，所以过去没有盖屋保护前，碑面已经给求医的人剥蚀得很多。现在还可以认得出的碑文字数已不太多。幸亏早年的拓本现在还有，留下了极可宝贵

的史料。

墓葬和墓碑上的记述

这次探访中我们在这方面得到的资料有两点可以提出来一说：第一是关于墓葬的问题。明代白族已实行火葬是可以肯定的了，因为我们看到不少明代大理石的火葬墓碑。有“杨观音榜”等字样，说明是白族人的名字。我们在剑川去石宝山路上看到一块可能是元代的墓碑，已要求该县文化科掘出来保存。碑文还没有研究。在大理雨铜观音祠墙角里看到一个火葬墓顶子，刻有“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的年号，这墓系杨和胜的墓。杨可能是白族，因为杨是白族的大姓。如果这个墓是白族的，那么白族实行火葬的时期也就提早到元代了。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见到有古代棺葬的古墓。火葬和棺葬的问题是由于樊绰《蛮书》里提出的，他说这是乌蛮和白蛮的区别之一。因此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找到更多的实物资料，对樊绰所提白蛮和乌蛮区别的意义可以更明白些。

残砖断瓦上的白文

第二是关于白文问题，上面已提到在巍山细奴王金殿遗址得到的瓦片上有着一些字样，显然不是汉字，而和大理、大姚出土的相似，疑是早年的白文。在大理三塔寺里的两个副塔的砖上，还能看到烧砖时印在砖边的符号，其中有些像汉字如“仲”、“甫”，有些是汉字的反文如“氏”、“升”等（这是由于正文的戳印，打在砖坯上所致），还有些完全不像汉字的。这次探访中又在邓川西山拓得元代刻在岩石上段信苴宝舍田记碑文，和大家已熟知的大理明代的“山花碑”都是用汉字写的白语。下面还要提到在凤仪见到的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用汉字写成的白语注释经卷抄本，又是一个例子。用汉字写白语至今还流行，

白族喜唱的大本曲的手抄本都是这样的。这里提供了白族文字发展的线索。

价值很高的石刻

再说石刻。剑川石宝山的石刻是早已著名的。我们这次也去察看了。但限于时间，我们只到了石钟寺，钟山山下的石刻没有去看。就是以已经看到的来说，这些石刻的历史价值是很高的，特别是阁罗凤和异牟寻两窟把当时服式和仪式的形象遗留了下来，比如《蛮书》上所提到的“头囊”、“雉翼”，头盔上的“猫牛尾”、“吐蕃所赠伞”、“铎鞘”等等在石刻中都可以找到模型。其他许多有关婆罗门教、佛教的石像也提供了当时宗教信仰的材料。此外还有一个称“阿殃白”的石刻，可能是早期居民生殖器崇拜的遗物。



剑川石宝山石钟寺石刻像中的望苴子头上戴的“猫牛尾”（费孝通临摹）



剑川石宝山石钟寺石刻第二洞阁罗凤像（费孝通临摹）

我们初步印象，石宝山的石刻，就是以石钟寺所看到的来说，在题材和作风上都不像是同时期的作品。“阿姊白”的雕刻是很简单的，使我们推想在这一带曾有过一个早期文化。如果容许我们做一些不成熟的猜测，这个文化可能还包括我们已见到的新石器工具。甚至和许多地方看到的人石崇拜的遗迹（如大理的大石庵、支锅石和剑川的三颗石、巍山盟石等）有关。其次是有关南诏王的石刻。这些石刻都是在岩石上凿出约1公尺多长方形的石窟，采用浮雕的手法，以人物作题材，刻画出宫殿的场面。第三是那些佛像，有些并不是佛雕，而是完整的人体。佛像中还有不同教派，一部分是属于婆罗门教的。这些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石刻很可能是不同时期的作品。

我们还注意到山上有许多没有完成的石刻。没有完成的程度不尽相同，给我们一种印象，像是正在进行这些石刻的时候，发

生了某一种灾难或战争，迫使当时的人放弃了这个地方。我们又在石钟寺对面的山坡上，就是石刻“酒醉鬼”和“波斯人”之间的地方，发现许多古代瓦片，可能是唐宋时代的遗物。我们因此推想，在这个山坡上曾有过建筑。而且就在这些地方，又看到倾倒在地上的石刻“狮子”和“梵文经刻”。这些石刻很凌乱，也表示在历史上曾受到重大的破坏。

根据前人的记载，还有些石刻至今没有发现。所以我们觉得还应当在这个山上全面检查一下，很可能找到更多的石刻。

石钟寺的石刻已经建筑了房屋加以保护，但是在建筑时，添上了一些丑恶的，或是很不调和的石刻，如一个庸俗的弥勒佛等。我们认为修理古代文物时，这样随意添加艺术上极为拙劣的东西是不好的。

石刻艺术不限于石宝山，而且时代也不限于南诏大理。最近剑川丁卯城村出土了一块“卫国圣母建国梵僧”的浮雕石刻，是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遗物，在风格上虽则较石宝山南诏国王石刻简单些，但还保留了一定的继承性。因之，还有希望在别处发现类似的石刻。

艺术造诣极高的木雕和塑像

木雕和塑像也是重要的艺术品。我们在这个地区所见到的那些木雕和塑像有些在艺术造诣上是很高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凤仪白汤村董氏“金銮宝刹”和家祠里所保存的许多佛像，有些是木雕的，有些是泥塑的，在样式和风格上，有些和石宝山的石刻极相似。石宝山的石刻有很多已经遭受损坏，将来要修补时凤仪这些佛像正可以作为模型。

木雕和塑像原来是民间很普遍的文物，在白族地区很多村子有它的本主庙。本主庙里以前都有本主像。这些本主像中有些是雕得或塑得极美的，而且有民族的特殊风格。但是解放以来，群

众的观念有了改变，本主庙又有很多改作别用，有些干部同志单纯地把这些雕像看成迷信象征，没有重视它们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加以保护，很多已经找不到了。我们从保存下来的这些雕像来看，有些是有很高艺术价值的。比如邓川德源城庙里的慈善夫人像还保存了南诏衣冠（和石宝山阁罗凤的石刻相似）。剑川甸尾村本主庙里的护甸神，穿着清初白族服装，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雕刻，弥渡铁柱庙侧殿的两个塑像是生动的少数民族的形象。看到了这些少数民族的艺术品，不由得我们不想到被破坏的许多雕塑。在我们去大理前，有朋友要我们到大理喜洲去把中央皇帝庙内元世祖的雕像照个相，因为过去就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件极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但是我们到喜洲一看，庙宇正在改建成为合作干部训练班的教室，所有雕像已全部毁完了。有一个铜像还是最近背走的，我们曾设法追查，毫无结果。又如剑川龙门邑村的本主庙里的木雕，已经由政府通知保护，但是当我们去探访时，却已不知去向了。至于铜器可能损失更大。贸易部门没有重视保护文物的政策，特别需要注意。我们在巍山和邓川两地的收购站里都发现了元明的铜钟。如果迟些日子去，这两口钟就可能成废铜回炉了。这些说明，各地很多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很可能在无意中遭到破坏，希望文化部门注意这种情况。

民间文献

我们这次探访中在民间文献方面搜集得不多。主要是因为时间太短，接触的面不够广，其次可能是纸张的东西更容易遭到损失。土改时期在这方面注意得不够，应没收的地主们所收藏的书籍没有集中起来加以保管，很多流散和糟蹋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访求到一些极有价值的文献。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凤仪董

氏“金銮宝刹”大殿角里的两大柜经卷，我们没有时间去系统翻阅，但随手拾来，就有宋刻和元刻的经卷，其中还有一大卷手抄的经卷，卷末写明是保天八年（约相当于公元1136年），是大理国时代，也就是南宋时代的手抄本，此外还看到一个用汉字写成白语的经卷，是明代的遗物。这两大柜杂乱的经卷中是否还有更有价值的手卷，我们不敢说。董氏家祠正壁上刻有家谱，这个家谱本身当然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也告诉我们，这家人从南诏起到明代一直是这地方被封为国师的阿吒力教主。明代（永乐十年）曾去京师，当时的皇帝替他造了这个所谓“金銮宝刹”。后来又屡次进京，带回了中原的经卷。现在这两大柜经卷，就是他家藏经的一部分。上面所提到的许多雕塑的佛像也是这“国师”家的遗物。这些文物对于这地区宗教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丰富的口头文学

大理地区有着丰富的口头文学。我们知道传说、神话在历史研究上也有一定的价值，特别是在研究文字材料比较少的民族历史时，口头传说更值得重视。我们这次察访中，特别注意搜集有关各地本主的传说。大部分白族地区，特别是大理，几乎每村有一个本主。这些本主上有些是历史人物，有些是传说中的人物，既不同于拜物的巫教，又不同于拜神的佛教。比如传说中杀蛟牺牲的勇士段赤城，救缅回兵的段宗榜，杀身殉夫的慈善夫人（又称柏洁圣妃、白姐大人等），还有征南诏败死在大理的唐将李宓和他的部将们，明代征南的傅友德都是本主（以李宓、傅友德等作为本主可能表示这些村子是和当时被俘的或落籍的军队有关）。每个本主都有一段传说，有些编得很美，而且常反映出人

民的感情，甚至他们的来历。各本主间还有一定的关系，也反映出各村人民间历史上的关系。对于历史研究是有帮助的。

比较各地区的传说也提供许多值得研究的线索，比如观音和罗刹的斗争传说就以大理为最多，如果联系起传说中细奴逻和观音的关系，观音和水利的关系，可以提供佛教进入和当时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联系，而且这种斗争已达到苍洱之间的坝子里。白姐夫人的传说主要在洱海北部流行，到了大理却和吐蕃酋长、唐朝大将结合了起来。如果把这些传说的变化搞清楚，也可以反映出白族形成的复杂过程。

当然，利用传说、神话来进行历史研究需要很细致的分析，现在还缺乏足够的资料。上面所举的例子，只是想说明传说、神话可以成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罢了，至于所提出线索是否有考虑的价值还是成问题的。同时却也说明，研究各民族的口头文学绝不能离开历史，因为只有和具体历史相联系，才能看出这些传说和神话的意义。

语言的比较研究

语言的比较研究对于历史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在族别问题和在各族历史上的关系问题上，比较各族语言可以提供重要的线索。但是大理地区各族的语言到现在还没有全部研究清楚，特别是白族语言研究得不够，各家的意见出入很大。我们这次察访小组中没有语言学的专家，因此并不能深入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几点，愿意提出来希望今后在这地区进行语言调查时作参考。

1954年民族识别研究组基本上已把大理地区具有不同自称的民族成分划分成几个系统，主要是根据他们的语言，特别是词

汇相同程度和语言对应规律来加以划分的。现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去研究他们分化和融合的历史过程。在词汇方面不但要注意基本词汇所具的特点来研究他们的族源，而且要注意借词的来源和时期来研究他们和他族的接触。比如研究白族语言，如果能从基本词汇的特点确定它们和汉语前身的古语有没有关系固然对白族起源问题有极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应当注意不同时期白族受到他族影响所引起的在词汇上、语言上和文法上的变化。举个例子，白族有关粗粮的名词大体上和现代汉语不同，而有关细粮的名词却大多借用现代汉语，这就说明了白族在农业上接受汉族的影响的程度和时间。如果进一步比较白族各地区方言上存在的差别，也可以看到不同地点不同时期所受他族影响的区别以及白族本身发生变化的线索。

在这次察访中我们曾经注意到白语和汉语在不同地区的变化。在历史上曾是白族主要地区的弥渡和巍山，现在说白语的人已经很少（少数白族是近代迁入的），我们疑心有许多原来是白族的人现在已经改变成了汉人。相反的在大理到剑川一带有很多具体例子，说明有许多汉人改变成了白族。同时各地也还有一些汉人的村子，迁入已有几百年而语言上依旧不改变。在凤仪我们就遇到过已有好多代居住在当地而现在还不会白语的人。不同的情况启发我们要求对各族语言的变化做进一步的研究。这些情况也提示我们在对于人数较少的民族成分的识别工作中利用语言资料时必须十分审慎，如果不从历史中入手去进行研究很容易发生错误的结论。

以上是我们根据这次察访工作中的体会来说明，为了进一步为开展大理地区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应当从上述五个方面去搜集更多的资料，并且想说明在这个地区上述五个方面的资料是十分丰富的。

还须进一步察访研究

我们这次察访所得的资料是很有限的，以现有资料来说对于已经提出的若干有关白族历史问题还不能提出任何重要的意见，但是我们相信如果有系统、有计划地从这几个方面搜集更多的资料，对于这些问题是可能得到比较正确的论点的。

我们这次察访中也深切感觉到当地各族人民对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的热情支持。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个现代民族形成过程中，群众对自己民族历史的要求。他们已不能满足于神话式传说的历史，而要求科学的历史。现在需要具有专门科学知识的人和各族群众结合起来，共同来解决各族的历史问题。这样的结合不但可以保证科学研究进一步的开展，而且也应当是今后科学研究的一个方向。

但是怎样组织考古、历史、社会、艺术和语言学的各种专家更好地和各族群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工作，将是今后开展这项科学研究的具体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希望不久能得到解决。

1957年2月8日

民族研究向前看

政协大会在人大会堂开幕那天，我在主席台前走过，偶一抬头，迎面冲着我的是一张那么亲切、熟悉、爽朗、热情的笑脸。两人相对凝视了一刹，我刚刚把手伸向对方，他却顺手一拉，紧紧地把我抱住，一对白发老翁搂成一团。这种在这样的会场上不常见的场面，顿时引起了周围一阵会心的欢笑。紧搂着我的不是别人，是阔别多年而常常怀念在心的一位少数民族朋友，来自云南的彝族张冲同志，是这次大会上被选为政协副主席的 23 人中 5 个少数民族中的一个。30 年前我在昆明教书时，鼓励和支持我参加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民主运动的朋友中有他；20 年前我到云南去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鼓励和支持我的朋友中有他。林彪、“四人帮”这一伙猖獗的时候，我常惦记他而消息不通。久别重逢，百感交集，共同的经历把我们紧紧靠拢在一起。

过了两天，我列席了五届人大大会，听华主席的政治报告，放眼前程，在今后 23 年我们祖国的伟大航道终点涌现着我们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在这历史前进的号角声中，聚集在这辉煌壮丽的大会堂中，来自五湖四海，来自每一条战线，来自 55 个民族的超过半万的代表和委员们，每一人心底都在盘算着怎样在这伟大事业中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任务。继往开来，任重道远，前途一片光明，鼓舞着每个人奋勇前进。

会后，进会堂，刚坐下却发现我身旁正是从贵州来的我们中央民族学院早期的毕业生李仿尧，彝族；1955 年我到他家乡进行民族调查时，他担任毕节专区的副专员，伴同我一起到处奔走

工作。相别 20 多年了，他的头发也花白了，但当年那种果断沉着的神气迄今还活现在他眉宇之间。记忆力已大见衰退的我，一见他，握住双手，还能叫出他的名字。

“老师，乌云散了，毛主席的阳光又照到我们山区了。”善于兴比的少数民族，开口就急于把他听到华主席报告之后的心情，用诗歌般的语言倾吐给他认为一定具有同感的亲人。他还是像早年那样恨不得一下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似的，还没有等我接口，“老师，你身体还这样壮健，什么时候再到我们那里去，不同了，如果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捣乱，那就更会叫你不认识了。”

“我怎么不想去找你们呢，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和你一起翻山越岭的日子。多有意思呀！不是吗？可是现在我发胖了，爬山怕爬不动了。”

“不，不要紧，你坐车就可以到每个公社，现在怎能和过去相比呢？你记得我们从毕节去水城的那天，我们吉普车上带了干粮，为了找点开水，还走遍了好几个村子，找不到人，现在水城已经通了铁路，是个烟囱林立的中等工业城市了。

“你还记得我们后来找到了几个仡佬族的老乡。没得翻译通不了话，比手比脚了半天，才知道我们要煮点开水。现在他们的孩子们都上学了。”可是他面色突然沉着了下来，“这几年可把我们搞苦了，这‘四人帮’真不是人。我心里总是觉得他们不是毛主席的人，毛主席派来的人绝不会干出那种过去国民党干的事来的。我们少数民族心里都明白的。毛主席的人把我们看成兄弟姐妹，一家人；‘四人帮’那几年，呀，谁还敢提自己是少数民族……现在好了，乌云散了，太阳又出来了。”

当我们吃完饭，分手时，他一再地向我说：“你一定要来，我们都想念你。”他的热情激起了我一段段的回忆，一阵阵的感想。华主席在报告中提到：“我国是一个共有 50 多个民族的统

一国家。毛主席历来十分强调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号召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1950年，全国大陆解放不久，毛主席就派出访问团深入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我带了一个分团到贵州去，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就在李仿尧的家乡，晚上放映电影，山区晚寒，而从山上下来的许多少数民族的观众，大多衣不蔽体，我们当场给他们分送了衣裤，他们感激得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告诉他们，天亮了，好日子来了。我们原本是一家人，你们的祖祖辈辈在这山区里劳动，开发了这地方，还是这样穷，这是一些坏人害苦了你们。毛主席共产党把这些坏人打倒了。今后我们各族人民齐心协力一起来建设这地方，好日子等着我们来创造。少数民族的同胞们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各民族团结起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在贵州西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成立了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它是毕节专区的一部分，而这个专区里就有少数民族任副专员的职务。为了这地区，历史上曾长期是彝族土司统治的地区，民族成分比较复杂，所以为了识别，我在1955年又去深入调查了好几个月，李仿尧以毕节专区副专员的身份协助我的工作。正如他在食堂里同我说的，其后的10多年中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建设了起来，一个穷乡僻壤的山区，完全改变了面貌，已成了贵州西部的一个工矿业基地，用少数民族喜爱的兴比语言来说，山坳的电灯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快马哪里撵得上不要喘息的火车，天上的神仙有一天会羡慕我们工厂里的姑娘！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林彪、“四人帮”的妖风没有放过少数民族的兄弟们。他们抛出民族工作“黑线专政论”，攻击党的民族政策是“右倾”、“投降”，并到处散布“民族问题不存在了”，“社会主义了，还有什么民族不民族”，胡说什么“现在要团结，不要分裂，我们只有一个民族，哪有这个族，那个族。”

有的甚至明目张胆地攻击说：“民族政策早已过时，”“再提民族特点就要犯错误”等等。他们制造这些谬论，就是要一刀砍掉党的民族工作，搞乱民族关系，搞乱祖国边疆，乱中篡党夺权。

乌云乱翻的时节，许多少数民族地方的自治机关被取消了。甚至有些“四人帮”的爪牙，觉得少数民族地名听不惯，擅自下令改用汉名。谁要是提民族政策就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正如李仿尧所说的，国民党的那一套又来了，我们连自己是少数民族都不敢提了。

正如一些少数民族同志们所说的，是“皮绳拴不住太阳，手指戳不穿雪山。‘四人帮’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已经破产了。华主席在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反革命罪行，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的团结。要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着重克服大民族主义，同时注意克服和防止地方民族主义——正如上面所说的，乌云散了，毛主席的太阳又照到了少数民族的地方”——我们又走上了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要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一句话，我们祖国的55个民族要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现代化。少数民族地区是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就是为了要实现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为我们这些搞民族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严重的任务。华主席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传达党的决定，要开展包括民族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像其他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样，我把这个号召看成是自己的责任，为祖国效忠，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出力的时候到了。

在我们新中国，社会学者是以用他们的脑力劳动为人民服务为光荣的职责的。以我们的民族研究来说，自从新中国成立以

来，就一直配合着政府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工作而进行的。这是我在上面提到过的多次的研究工作的经验。由于我国历来封建王朝和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被压迫的民族不敢公开他们的民族成分，同时他们的统治者不仅用侮辱名称来称呼他们，而且由于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分散在各地的同一民族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名称，以致在解放之初，我国有多少民族的问题都弄不清楚。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各族人民都应当有他们自己的代表参与各级政权机关，在各民族聚居地方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解放初期中央及地方派出的访问团就负有调查民族情况的任务，对各地少数民族进行识别，凡是提出异议的地方就组织研究工作者进行深入调查提供作出决定时的参考资料和根据，在这类调查中都有历史、社会语言等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

1956年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对全国少数民族历史社会调查，对发展不平衡的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阶级结构及其发展上的特点进行了实地调查科学研究，为帮助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事实资料。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解放初期，大约有30个民族和汉族一样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大约3000万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85%。此外，大约400万人还在实行封建农奴制，大约100万人还在实行奴隶制，大约60万人还保有原始社会的残余。我们所有的民族都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起点不同，所应采取的方式、步骤等等都不能完全一样的。为了要使我们的政策适应各民族的具体情况，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做好我们工作的必要条件。1956年开始，经过几年才初步完成的这次社会历史调查，参与的科学工作者有几百人，这次大规模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从实际民族工作中培养长大的那一支为少数民族服务的科学研究队伍，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受到了迫害和打击，同

其他岗位上的革命干部一样，绝大多数在艰苦的条件下还坚持着默默无声的工作。“四人帮”一旦粉碎，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下，他们精神上的枷锁被解除了。

1976 年 11 月

关于继续开展民族识别调查研究的建议

解放初期，历史上长期被压迫的许多少数民族，在获得民族平等后，纷纷公开它们的民族成分，提出了它们习惯上使用的名称，作为自己的族名。1953 年汇总这样登记下来的族名达 400 多个。经过中央及地方的民族事务机关组织科研队伍，对除历来被公认的 35 个少数民族之外新提出的族名进行了识别。到 1957 年明确了 11 个民族的族别，后来又陆续明确了 8 个民族的族别，经国务院认定的少数民族总共已有 54 个。我国少数民族的族别问题实际上得到基本解决。还存在着疑难问题尚待继续识别的已为数不多。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该项工作陷于停顿，而且在报刊上出现过若干未经认定的族名，在族别问题上造下一定程度的混乱。现在“四人帮”业已粉碎，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民族工作正在恢复和发展，特此提出继续开展民族识别的建议，以供采择。

当前民族识别工作上的余留问题包括下列三个部分：一、台湾省及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印占区的少数民族尚未解放，它们的族别尚待今后进行实地调查；二、一些曾经调查过而尚未作出结论的族别问题，有待继续调查研究；三、一些民族的族别虽已有了结论但由于不同原因发生了疑问，有待重新审定。除第一部分外，所牵涉的少数民族人数不多，总共不过几万人，但是有些情况比较复杂。

现在已经提出要求识别的，据我们所知，有下列这些：一、四川省平武县的“白马藏族”；二、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察隅县的“僜人”；三、西藏自治区南部定结县及定日县的“夏尔巴人”；

四、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苦聪人”；五、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基诺人”；六、云南省南部及西部边区的“本人”、“空格人”、“三达人”、“阿克人”、“布夏人”、“布果人”、“岔满人”、“等角人”、“卡老人”、“巴加人”、“结多人”等。

目前尚未提出识别要求，而事实上存在着值得进行调查研究其族别的有下列这些：一、新疆和田县有自称“艾依努”的人，他们的语言和周围居民不同，可能是波斯语或古和田语；二、新疆阿尔泰地区有“乌梁海人”，说图瓦语；三、新疆阿克陶县有被柯尔克孜人称做“奥依塔克勒克”的人，过去曾被归入维吾尔族，后改属柯尔克孜族，自己称过土库曼人，而语言近维吾尔语，又不同于苏联的土库曼人；四、四川省阿坝和甘孜地区的“嘉戎藏族”，他们的语言在结构上和藏语不同而接近于羌语及景颇语；五、四川省木里地区的“藏族”和云南省宁蒗县一带“普米族”，它们原系一族，语言与藏族不同，而近于羌语、嘉戎语；六、跨居四川省盐原和云南省宁蒗两县泸沽湖附近自称“纳西”的人，现在四川的被称为蒙古族，在云南的被称为纳西族，成了不同的民族；七、广东省海南岛的苗族，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苗族，而相同于广西的一部分瑶族，西方学者有对他们的族别提出疑问。

根据以上情况特提出下列建议：

一、对已经提出的识别问题早日进行处理，争取在明年上半年解决一批问题，凡应予认定的民族，呈报中央作出决定，使这些获得认定的民族能参加庆祝国庆 30 周年纪念的行列；

二、建议在国家民委领导下制定有关省、区（主要是四川、云南、西藏）分工协作解决民族识别遗留问题的具体计划，并调集各有关民族科研机关及有关民族学院的科研人员组成调查研究工作组，到各省、区，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实地调查，于明年

第二季度提出报告，为有关民族事务机关提出具体解决方案的科学依据；

三、建议委托有关民族研究机关协作提出进行以川、滇、黔三省为中心的西南民族历史、考古、语言、社会综合调查的计划，在两年内对该地区民族情况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和深入的调查，对这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复查一遍，建议派出调查研究组去新疆及广东海南岛了解该地区有关民族识别的问题；

四、为将来解放台湾及西藏的印占区后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做好准备，建议委托有关民族研究机关早日收集有关台湾及西藏印占区少数民族的外文资料，加以翻译、整理，印出汇编，以备研究之用；

五、发扬党的实事求是及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责成地方民族事务机关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凡对过去族别的认定有疑问的都可以提出，交调查研究工作组进行调查研究，提供解答这些疑问的依据，同时应请宣传工作机关注意，凡未经认定的族名，不要在公开报刊任意发表，以免造成混乱，影响民族团结，为民族工作增加困难。

以上建议谨请审核。

1978 年

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1}

我们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究竟有哪些民族，一共有多少民族，却是个不容易答复的问题。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根本否认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连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族共和”都被抹杀，他们把那些历来公认的许多民族都说成是汉族的宗支，这是赤裸裸的大汉族主义，目的是在压迫和消灭国内的少数民族。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实现了民族平等。长期被压迫的许多少数民族纷纷要求承认他们的民族成分，提出自己的族名。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是少数民族自觉的表现。到1953年，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据称有400多个。这400多个自报的民族名称是否都是单一的民族呢？在这个民族名单上有许多是某些民族居住区的地名，有许多是某些民族内部分支的名称，有许多是同一民族的自称和他称，还有许多是不同的汉语译名。因此，要答复我国有哪些民族和有多少民族的问题，就得对这个民族名单进行一番甄别。我们称这项工作为民族识别，这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

* 本文系作者在全国政协民族组会议上的发言。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解放以来，我们的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识别工作。因为，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有必要搞清楚我国有哪些民族。比如，在各级权力机关里要体现民族平等，就得决定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哪些民族应出多少代表；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时，就得搞清楚这些地方是哪些民族的聚居区。从1953年起，为了进一步开展民族工作，民族识别被提到了日程上，由中央及地方的民族事务机关组织了科研队伍，对新提出民族名称的单位，通过调查研究，进行识别。

民族识别的初步调查研究，要求能基本上划清哪些要识别的单位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如果是少数民族，他们是单一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

当时需要进行识别的有下列这些情况：

一、有些汉人迁居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保留着汉族的特点，但是并不知道自己是汉人，而以当地其他人称他们的名称作为自己的民族名称，报了上来，被列入少数民族行列中。例如云南的蔗园、广东的疍民等。

二、迁居到少数民族地区去的汉人，前后有若干批。早去的汉人曾经长期和内地隔绝，和后去的汉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有一定的区别，并且受到后去的汉人的歧视，因而自认和当地汉人有区别，解放后，有人要求承认是少数民族。例如贵州的穿青、广西的六甲等。

三、有些少数民族在民族压迫时代曾经不愿表明和汉人有区别，其中又有一部分民族上层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用，统治过当地的其他少数民族。在被他们统治过的少数民族看来，他们是和

汉人一样的，解放后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例如湖南西部的土家等。

四、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曾经被分散，各自迁移。在迁移过程中，有些又和汉人接触，受到较深的影响，改变了语言，本民族的特点已不显著。经济上和汉人已分不开，但是受到歧视，居住上不和汉人相混，自认是少数民族。例如福建、浙江等省的畲民等。

五、原来同是一个民族的各部分，迁移到了不同地区，基本上保持相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历史传统，但长期隔离，又被其他民族用了不同的名称相称，报了不同的民族名称。例如广西的布壮、云南的布沙、布依等。

六、有些民族分布在不同地区，各部分分别接受了邻近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特点。但仍保持共同的语言，并被别族用同一名称相称。如四川、云南旧称的“西番”等。

七、有些民族集团分散在很广的地区，形成许多不相联结的聚居区，在语言、文化等方面都既有相似处又有较大的差别，长期以来被其他民族用同一名称相称，又自认是同一民族，如苗人等。

八、有些民族内部对于该族是单一民族还是另一民族的一部分的问题有不同意见。如东北的达斡尔等。

上述这种复杂情况表明了我国民族情况的特点：

首先是历史长，渊源久。远的且不说，自从秦代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以来，各民族在相互接触、交流中经历着兴衰、消长、流动、分合的复杂过程。满族的巨大变化是我们这几代人亲自看到的现实。故宫和颐和园匾额上的满文，现今满族的游客中已很少有人能认识了。尽管满族的民族特征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绝大多数依然很坚决地自认是满族。解放初期自报满族的人全国有 240 万，比起满族进关时人口增加了几十倍。翻开历史，

许多曾经盛极一时的民族，比如匈奴人、契丹人，很久以来连遗裔的着落都不清楚了。历史长，变化多，源流复杂，没有清理，许多疑难情况也就不易理解。

另一特点是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由于交流掺杂，你去我来，加上各区地形的特点，我国各民族分别形成了万花筒式的大大小的聚居区，相互交叉穿插地分布在千山万水间。内蒙古、新疆那一片大草原，西通中亚细亚，历来是骑马民族奔驰的广场。草原东端兴起过多少震动过世界的民族，其后裔至今还远布东欧。长江、黄河流域这片广阔平原上，原来众多的民族集团在几千年里逐渐融合成为一个称过华族、后来又称为汉族的民族，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已成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它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青藏高原上历史悠久的藏族，高据世界屋脊，习惯于高原气候，遍布这超过祖国 $1/4$ 的土地上。它也包罗了许多来源不同的民族成分，有些已经同化于藏族，也有些迄今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一些原有的特点，而在这个地区边缘居住的藏族也曾不断被融入其他民族之中。民族情况最复杂的是我国西南角的云贵高原，这里高山深谷，纵横地分隔成为一块块、一层层不同民族的聚居区。过去，有些偏僻之区颇像陶渊明所描写的桃花源，那里的居民可以世代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过着多少与世隔绝的生活。上面提到的解放初期 400 多个登记的名称中，云南省就占了 260 多个。单位众多，支系复杂，莫过于此。

第三个特点是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解放初期可以说是一部活着的社会发展史。我国各族人民长期在封建统治下，近百年又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社会发展受到阻碍。我国的少数民族中资本主义因素一般是很不发达的，绝大多数基本上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解放初期仍滞留在初期封建的农奴制社会的有 400 万人，还是奴隶社会的有 100 万人，大约还有 60 万人阶级分化

尚不明显，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原始公社所有制。我们的政策是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我们所用“民族”一词历来不仅适用于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集团，而且适用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集团，这是一个涵义广泛的名词。这一点和欧洲各国的传统是不同的。在欧洲各国，“民族”这个概念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是欧洲近代史的特点。在东欧多民族国家里也存在着民族集团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因而在接受西欧的“民族”这个概念时不得不用另外一些名词来指称前资本主义的民族集团，如称原始社会的民族集团为“氏族”、“部落”，称奴隶制及封建制社会的民族集团为“部族”等等。由于我国和欧洲各国历史不同，民族一词的传统涵义也有区别，我在这里提到这一点是要避免因中西文翻译而引起理论上不必要的混乱。我在这里所说的民族是按照我国自己的传统用法来说的。

面对中国民族情况的这些特点，用马列主义理论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从1953年起到1957年初，对需要识别的各民族单位进行了实地调查。经过本民族代表人物及群众的同意，明确了11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其后又陆续明确了9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其中有一个民族是1979年才予以确认的，就是基诺族。到目前为止，加上蒙、回、藏等历来被公认的民族，经中央公布的，包括汉族在内，一共有56个民族。但是民族识别工作并没有结束，因为（1）台湾及西藏东南部珞渝和察隅等一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尚有待将来实地调查后才能识别；（2）一些解放初期已经提出的民族名称，如云南的苦聪人等，至今还没有作出识别的结论；（3）对过去决定的族别还有需要重新审定的如四川的“平武藏人”等。而且，还应当看到，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是历史的产物。虽然有它的稳定性，但也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有些互相融合了，有些又发生了分化。所以民族这张名单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变，民族识别工作也将继续下去。

二

为了说明怎样进行民族识别，我在下面举两个具体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识别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第二个例子是识别是单一的民族还是其他民族的一部分。

先说第一个例子，贵州穿青人是不是汉族的识别经过。

1950 年中央派遣访问团到贵州，接触到的自报的民族单位有 30 多个，其中大约有 10 多个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和汉人基本相同，但受到当地汉人歧视，不愿和汉族合为一族，要求以少数民族待遇。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居住在贵州西北部的穿青人，约有 20 多万，其他大多在两三万人上下，也有只有几千人的。为了解决他们是不是汉人的问题，1955 年进行了实地调查。

穿青人要求被认为少数民族的理由是：他们过去有一种和当地汉人不同的语言，称“老辈子话”；他们基本上都住在乡间，形成一大片村子，有自己的聚居区；他们有不同于当地汉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特点；他们妇女穿大袖滚花上衣，梳三把头，不裹脚，出嫁不坐轿。这些都和当地汉人不同。当地汉人称他们叫“穿青”，他们称当地汉人叫“穿蓝”，解放前青蓝对立，青受歧视。解放后，穿蓝都登记是汉族，穿青就不愿意登记为汉族，怕吃亏。承认是少数民族可以受政府照顾，不会再受穿蓝的气。但是当地各少数民族并不称他们作“穿青”，而在称汉人的名称前加上形容词，翻译出来是“穷汉人”、“当里民的汉人”等。

初听来，穿青人在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这几方面似乎都有特点，可能有构成一个单一民族的条件。

我们的识别工作首先从语言入手。穿青人都说贵州通行的汉语，只有少数人会讲“老辈子话”。分析“老辈子话”的结果，

它完全是汉语，并没有其他民族语言的痕迹，但它和贵州通行的汉语确有区别，是一种方言。这种方言又不是从贵州通行的汉语演变来的，而和早期江西、湖北、湖南通行的汉语方言有渊源。看来，穿青人并不是在贵州学会这种方言，而可能是进入贵州时就说这种方言的，到了五六十年前才普遍学会现在贵州通行的汉语方言。

语言分析并不能得出穿青人是汉族一部分的结论，因为使用汉语并不一定是汉族。尽管如此，但语言分析毕竟提供了穿青人来历的线索，他们是早期从贵州以东诸邻省进入的移民，这是和地方志书、穿青人的家谱、墓地的碑记、文物上的记录、民间的传说相符合的。

要弄清穿青人是否已经形成单一民族，还必须研究他们在这地区的历史。

明初（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遣军队南征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经过贵州，随后即在贵州的许多据点屯田驻军。从那时起就有许多从内地迁入贵州的移民，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江西强迫随军服役而来的汉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地方性特点的移民集团，聚居在今贵州的清镇一带，正是当时彝族聚居的水西地区的边缘，也是汉人势力的前线。随军服役的人在明代称“民家”，有别于有军籍的“军家”。军家配给土地，而民家须向彝族讨地，当佃户，受剥削。他们的社会身份低。但是因为在汉人军队的附近，并没有淹没在彝族的势力之下；又因他们在经济文化上比当地彝族先进，也没有被彝族同化，保持了原有的民族特点。明末，彝族土司势力削弱后，他们向西深入水西腹地现织金、纳雍地方。清初改土归流，政治上汉族取得了这地方的统治权，移入的人更多，形成了汉族移民的聚居区。

和这批移民同时或以后，不断有许多外来的汉人。其中有做官的或经商的，在这地区落籍，大多住在城市 and 街场，因此，在

这地区有来路不同的两部分汉人，各有其不同的地方性特点。早期移民集团的人后被称为穿青，后来的其他汉人被称为穿蓝。后者住在城街，政治经济地位较优，看不起曾是彝族佃客、僻居乡间、从事农作的穿青人。

穿蓝、穿青在早期和彝族土司及改土归流后的残余土目势力作斗争时是联合的，青蓝矛盾不突出。在随后发展起来的封建经济中，蓝占优势。咸同年代农民运动中有穿青人的农民领袖，而地主阵营中却以穿蓝为主。清末民初，国内民族市场形成，破坏了这地区割据性经济，现代商业势力开始进入，而这新兴经济的领导势力几乎完全被穿蓝所独占，和外界缺乏联系的穿青人受到排斥。在地方经济中，人数较少、力量较弱的穿青地主不甘心在新兴的经济形势中被压倒和淘汰，青蓝上层之间发生了显著的矛盾。穿青上层利用移民集团内部传统的乡土感情，和穿青农民对日益加深的剥削和压迫的反抗情绪，以反对受歧视为口号，鼓动起青蓝斗争。从那时起到解放这一段时间中，穿青聚居区的各街场上曾不断发生过大小规模的局部械斗。青蓝伤了感情，产生了隔阂。

但是这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内民族市场的联系日趋密切，穿青人在生活各方面也密切和其他汉人发生联系。他们传统的地方性特点逐渐消失，近五六十年来，在语言、服饰、风俗上已和其他族人趋于一致。青蓝界限在交通发达地区，即聚居区的边缘，已经模糊，甚至消失。但在聚居区的腹地，尤其是偏僻山区，青蓝在政治、经济上差距显著，穿青人还是受到歧视。这时期的变化表明了包括青蓝双方在内的汉族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进一步的统一化，反过来也表明了穿青人原是汉族的一部分。

这次调查所了解的历史事实证明：穿青人原是汉人中的一部分，自从进入贵州之后并没有和汉族隔离，并没有独立发展为一个民族。他们所提出的特点是汉族内部早期地方性的特点，青蓝

矛盾是在汉族内部地方性差别的基础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矛盾。这些差别和矛盾在汉族向现代民族发展过程中已在逐步消失。

所以，我们认为穿青是汉人，是汉族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少数民族，但是为了加强地方上青蓝两部分汉人的团结，必须在政治、经济上对穿青人适当照顾，帮助他们更快地发展起来，逐步缩小青蓝的差距，从根本上消除青蓝在心理上的隔阂。

第二个例子是东北达斡尔族是不是单一民族的识别经过。

达斡尔族 1953 年约有 5 万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嫩江及其支流的两岸，少数分布在呼伦贝尔盟，还有 1000 多人在新疆塔城。

达斡尔人的族别问题很早就引起注意，而且有争论。争论的主题是：达斡尔人是不是蒙古人？早年一般多采用族源来决定族别，所以族别的争论也集中在族源问题上。

我们对有关达斡尔人族源的各家说法都进行了分析，但认为都没有可以作出定论的充分根据。从这场争论所提出的资料中，只能看到达斡尔人在历史上同黑龙江地区先后出现过的属于蒙古语族的和属于通古斯—满语族的许多古代民族都发生过关系。但从有可靠的记载以来的 450 年中，他们主要接触的民族是些属于通古斯—满语族的索伦人（今称鄂温克人）和满人等。

尽管如此，现在达斡尔人所使用的语言却是蒙古语族的一支，它和现今的蒙古语是有区别的，语言学者认为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从语言来推测，达斡尔人的祖先可能是古蒙古人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另一种人在某一时期接受了古蒙古语的，这个族源问题不妨留着继续研究。和我们当前民族识别有关的是这些曾经说蒙古语的达斡尔人是怎样走上发展独立语言的道路的。

大约在 16 世纪初，有一部分达斡尔人聚居在黑龙江东边的支流精奇里江畔。17 世纪初最集中的聚居区还是在精奇里江中

游以下，黑龙江自漠河县对岸以东的区域。明末清初，石勒克河向西南以至尼布楚一带还有达斡尔人，俄国对这地区的历史名称“达呼里亚”反映了这一史实。这时，达斡尔聚居区的东方是说通古斯—满语的各族，西方和布里雅特蒙古人为邻。帝俄势力从西伯利亚向东扩张。1643年到1646年探查黑龙江的侦察队在精奇里江流域遇到了达斡尔人。达斡尔人跟帝俄的侵略者进行了40多年的斗争，直到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才告一段落。在反抗帝俄侵略的斗争中，达斡尔人索伦人一起被迫放弃了在黑龙江以北的原聚居区——一方面也由于清军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南迁到嫩江西岸。300年前发生的这次迁移对达斡尔民族的形成是很重要的。嫩江聚居区的西南在明末清初是科尔沁部蒙古人的势力范围，他们同达斡尔人并不友好。达斡尔人南迁嫩江流域以后，清朝政府为了增加本区的兵力和军粮供应，把达斡尔人（和索伦人）编入八旗，强迫他们“披甲驻防”。他们和蒙古族分属不同的行政系统，关系更形疏远了。

这段历史说明，不论达斡尔人和蒙古人在族源上是否相同，至少在有史料可考的450年中达斡尔人是生活在和蒙古族分开的聚居区里，关系是疏远的。和他们密切相处的是说通古斯—满语的索伦人，在政治上控制他们的主要是说通古斯—满语的满族人。这种历史条件使他们一方面分离于蒙古族，在语言上已产生了独立的特点，而另一方面尽管处在讲通古斯—满语的各民族的包围之中，却并没有同化于周围的民族。

从达斡尔人的历史分析，可以认为他们经过这段历史已形成一个单一的民族。但是为什么在东北的达斡尔人中出现达斡尔是蒙古族一部分的论调呢？这也应当从历史过程中去理解。清代，达斡尔人被编入八旗后，部分上层紧密依附于满族统治集团，又由于他们在八旗中文化较高，不少人取得了显赫的地位。辛亥革命后，这些达斡尔人失去了政治支持，在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下自

己又找不到出路，于是在民国初年开始有达蒙结合运动，不少关于达斡尔人是蒙古族的论调就是这时出现的。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入侵蒙古做准备，拉拢这些达斡尔人上层，并在群众中散布种种论调，其影响一直到解放后还没有完全消失。这次民族识别工作对达斡尔人的历史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进行了一番分析研究，在统一达斡尔人对自己民族的正确认识上起了积极作用。达斡尔是一个单一民族的结论得到了达斡尔人广大人民的同意，它的族别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我举出上面两个具体例子来说明在我国复杂的民族情况里怎样进行民族识别的方法，也就是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三

在开始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我们曾反复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特别着重学习了斯大林著名的有关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 我们认为这是对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西方民族的科学总结，应当作为我们进行民族识别的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怎样运用这个理论来研究我国具体的民族情况是我们做好民族识别的关键。

我国曾经长期处在封建社会，直到解放前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除少数几个民族已经初步具有资本主义因素之外，有许多民族还是处在前资本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

主义阶段，所以它们不具备近代民族的四个要素。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近代民族是历史的产物，它的特征也是从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共同体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些要素的萌芽。正如斯大林所说的：“当然，民族的要素——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等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但是这些要素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至多也不过是将来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使民族有可能形成的一种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并有了民族市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时期才变成了现实。”^①因此，在我国民族识别工作中既不能搬用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民族特征来作为识别标准，又不应该不把这些特征作为研究的入门指导。

我们在上述的两个例子里从语言这个要素入手而取得了重要的线索。但是我们并没有把语言作为孤立的识别标准，单独根据语言系属来决定他们的族别。我们并没有因为穿青人说汉语就说他们是汉人，而进一步追问他们尽管在历史上是从邻省进入贵州的移民，在几百年里是否已与其他汉人隔离而形成了单独的民族。说同一语言的人分别形成不同民族的例子在世界上是很多的。我们并没有因达斡尔人曾经说蒙古语而认为他们是蒙古人的一部分，也不是仅仅根据他们所说的蒙古语族的语言是一种独立语言而得出他们是单一民族的结论。因为我们认为语言是变动的。说两种不同语言的人可以融合成一个民族，在融合过程中这一个民族可以存在着正在变动中的两种语言。所以我们既需要依靠语言分析但又不能单独依靠语言分析来识别民族。

我们在上述两个例子中都重视民族地区这个要素——民族聚居区的位置和他们同相邻民族的关系。中国民族情况的一个特点就是流动大、分布广；而且常常以大小聚居区交叉杂处。包括汉

^① 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89页。

族聚居区在内，全国县一级的行政单位有 70%，其居民包括两个及两个以上民族。因此，在民族识别中对于共同地域方面的研究不能单独从某一民族着眼，而应以某一民族所在地区为范围，进行各民族间关系的历史分析，正如我们在上面两个例子里所做的那样。这里也就牵连到共同经济生活这个要素。在这方面中国民族情况更为复杂。人口众多的汉族散布在全国各地，各少数民族聚居区里几乎都有汉族居民，在那些经济较不发达的民族地区，汉族居民又常是这地区经济的主要联系者。以汉族居民为主的城镇常是这地区的经济中心，这些地区又包括若干不同的民族聚居区在内。看来紧密联系的共同经济生活正是形成近代民族的一个重要动力；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这个因素是相对地不发达的。现在我国各民族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在民族平等的条件下相互合作，共同地区的经济联系这个要素在今后民族发展上会起什么样的作用，正是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课题。

“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个民族要素在民族识别工作上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个特征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和全面，因而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出现过追求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方式、宗教仪式上的所谓“特点”，脱离了该民族人民附着于这些“特点”上的民族意识和它们发展的历史条件，简单地把它们用来作为识别的标准，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

我们认为首先要认清这个要素的核心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用一句比较容易理解的话来说，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这种心理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我们每个人是可以用自己的经验体会到的。这个特征可能比其他的特征在形成和维持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上更见得重要。我们在上面已提到过满族的变化。就在我们这几代人中，

绝大多数的满人在语言、生活方式上都和汉人相同了，但是依旧认为自己不是汉人而是满人。还可以提到我们在贵州和广西访问时见到的仡佬族。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这个地方分布很广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民族，但是以贵州境内来说，现在他们是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大多几家几户地居住在一起，混杂在其他民族的聚居区里。他们一般都已分别接受当地民族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一眼很难看出他们的民族特点。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自己说是仡佬人，别人也说他们是仡佬人；不同地方的仡佬人见了面还是感觉是同一民族的自己人。类似的例子，程度上有所不同的，还有畲族。畲族长期与汉族杂居，通用汉语汉文，文化生活也深受汉族影响，但是共同的心理维系着他们成为不同于汉族的一个共同体。更值得提到的是分布在整个云贵高原，甚至到东南亚各国的苗族。各地苗族说着不同方言，住在不相联结，甚至相距千里的村里，但是自觉是一个民族的心理十分显著。解放前。特别在清末，苗族起义时，鹅毛信所到之处，千里赴义的苗民经常有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共同心理素质在构成民族共同体上的重要性是十分清楚的。

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可以有深浅强弱的不同。为了要加强团结，一个民族总是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它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民族的标志；还常常把从长期共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喜闻乐见的风格，加以渲染宣扬，提高成为民族形式，并且进行艺术加工，使人一望而知这是某某民族的东西，也就是所谓民族风格。这些其实都是民族共同心理的表现，并且起着维持和巩固其成为一体的作用。我们认为，这就是上面所引斯大林民族定义中关于这个要素上所说“表现于共同文化上”这几个字的意义。

我们的政策一贯强调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就是因为有许

多风俗习惯是被用来表现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的。不尊重这些风俗习惯就会被认为是对这些民族的不尊重，影响民族间的团结。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改革由本民族自己进行也就不会发生影响民族间的团结问题了。必须指出，一般的风俗习惯不仅不一定牵涉民族的共同心理，而且是常有变动的，我们汉族的妇女时兴过满族的旗袍，也时兴过俄式的布拉吉，这些显然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无关，这些绝不能用来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

总之，民族识别这项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对民族要素的各方面综合起来进行历史的分析，摆事实、讲道理，才能有助于各民族人民解决他们究竟属于哪个民族的问题。

四

由于这 20 多年在党的领导下，许多民族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在民族识别的科研工作上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除了下面要提出的一些遗留的问题外，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构成基本上是搞清楚了，各民族的广大人民对此是接受和满意的。

当前我国民族识别工作上的遗留问题，如上所述，包括三个部分：（1）台湾和西藏东南部尚没有条件进行实地调查的地区的少数民族。（2）一些尚未作出结论的识别问题。（3）一些已经识别过而需要重新审定的问题。除第一部分外，所牵涉的人数并不多，总数不过几万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百分比是很小的。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又照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这些至今民族成分不明的少数民族人民纷纷要求早日解决他们的问题。

现在已经提出要求识别的有：四川“平武藏人”；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察隅县的僜人及南部定结县及定日县的夏尔巴人；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苦聪人，以及还有这一带不大为外边人知道的本人、空格、三达、阿克、布夏、布果、岔满、等角、卡志、巴加、结多等人。

此外，在这 20 多年的民族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有关民族识别的问题。比如新疆有一些“语言孤岛”，即保持着与周围居民语言不同的民族集团。如和田自称“艾依努”的人，他们操两种语言，他们内部说的语言可能是东伊朗语支中的一种古代语言。还有，阿尔泰地区说图瓦语的“乌梁海人”以及阿克陶县被柯尔克孜人称为“奥依塔克勒克”的人，过去曾被归入维吾尔族，后改属柯尔克孜族，老年人自己称过土尔克曼人，而语言近维吾尔语，又不同于苏联的土库曼人。又比如四川阿坝和甘孜地区的嘉戎“藏族”，他们的语言在结构上和藏语不同而接近于羌语、普米语，有“藏缅语言桥梁”之称；四川木里地区的“藏族”和云南宁蒗一带的普米族原本是一族，语言与藏语不同，近于羌语、嘉戎语。跨居四川盐源和云南宁蒗两县之泸沽湖两岸自称“纳西”的少数民族，在四川的现被称为蒙古族，在云南的现被称为纳西族，比邻而居，鸡犬相闻，成了两个民族。又比如海南岛自称为“苗族”的人，语言、生活方式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苗族，而相同于广西自称“金门”的瑶族。由于我国幅员广大，民族众多，这类问题在我们对全国民族情况了解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必然会陆续发现的，也正是促进我们调查研究的有益课题。

下面我们简单地介绍几个遗留问题作为例子。

一、关于“平武藏人”。在川甘边境，大熊猫的故乡周围，四川平武及甘肃文县境内居住着一种称为“平武藏人”或“白马藏族”的少数民族有几千人。解放前受当地番官、土司、头

人的奴役。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该地；尔后，惨遭国民党的屠杀，仅存500余口，隐族埋名，依附于松潘藏族大部落，和附近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西番”。解放后，1951年原川北行署派民族工作队访问该地，听该地区上层说，这部分少数民族也是藏人，因此暂定名为藏族。1964年，国庆15周年该族的尼苏同志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问她是哪个民族，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别人代答：“是四川白马藏族。”大型彩色纪录片《光辉的节日》有她两个特写镜头。喜讯传遍了尼苏的故乡，欢欣鼓舞之余，对这个族名却发生了怀疑，因为从祖辈传下来的史实和现实情况都说明他们既不同于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藏族，又有别于茂汶的羌族。据最近调查，他们自称“贝”，语言和藏语之间的差别超过了藏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在语法范畴及表达语法范畴的手段上有类似于羌、普米等语的地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较原始，崇拜日月山川、土坡岩石，而无主神，虽部分地区有喇嘛教的渗透，但不成体系。

从这些事实上不难看到，“平武藏人”在历史上并非藏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原来究竟是什么民族呢？有些历史学者根据这地区的历史记载认为有可能是古代氏族的后裔。但是魏晋之后的史料缺乏有关这地区氏族的记载，几百年的空白还不易填补。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扩大研究面，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珞渝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陆续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氏、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现在这个走廊东部已是汉族的聚居区，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区。但是就是在这些藏族聚居区里发现了

许多“藏人”所说的语言和现代西藏藏语不完全相同的现象。四川西北部的嘉戎藏语和现代拉萨藏语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嘉戎地区向南，在这走廊中有迹象表明还存在着被某一通用语言所淹没而并没有完全消亡的基层语言。这类语言在家庭等亲密的群体里还在使用。中央民族学院曾有一位教授，贡嘎活佛，他的家乡在康定木雅乡，今属沙德区，藏语称该地为 mmyak。这地方的人对外一般使用藏语，但在家里还讲一种和藏语不同的土话。这种土话至今未经语言学者深入研究。从这地方的藏语地名上看，值得注意的是它和藏语称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羌的名称相同，也就是《新唐书·党项传》所说的“弭药”，古音 mjeiak，而党项羌的发祥地有人认为就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金沙江与大金川之间。《新唐书》上有：“地乃入吐蕃，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①那是说，原来住在这地方的党项人一部分北迁后，留下的一部分受到了吐蕃的统治。现在还保持在这地区的那种“土话”是否和党项羌古语有关系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康定向东，在岷江上游是有如孤岛般存在着的、现在已被承认是单一民族的羌族。再向东在涪江上游和嘉陵江上游就是有人要求重新审定族别的“平武藏人”。从康定向南往西，在雅砻江和金沙江之间还有一种过去和“平武藏人”一样被称作“西番”的少数民族。解放后，他们在四川境内的被称为藏族，而在云南境内的则被称为普米族。事实上，四川境内的这部分藏族所说的语言不同于藏语而同于云南的普米语，而普米语又接近于羌语和嘉戎语。从这里向西，越澜沧江到怒江，有现在已承认是单一民族的怒族，但是怒族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其中一部分和其西的独龙语相通，都接近于其南的景颇语。景颇语和羌语现在是被认为与彝语平行的藏缅语族中的两个语支。它们之间的历史关

^① 《新唐书》第221卷上。

系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从怒江西岸越过独龙河和其间的山脉就是居住着需要识别的察隅的僜人。

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连，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

二、关于察隅的“僜人”。从怒江往西，越过伯舒拉岭就是西藏自治区东南角的察隅地区。这里住着大约有一两万人的一种少数民族，解放以来被称为“僜人”，他们究竟属于哪个民族，一直是个悬案。

察隅地区正处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东端，所以僜人的聚居区只有一部分在 1950 年获得了解放。在察隅县范围之内，1976 年的统计共有僜人 977 人，组成七个生产队，分属四个人民公社。这些公社除了这七个生产队外，都是藏族生产队。

被称为僜人的人中又分两部分，各有自己的语言和名称，而且据说是从不同地区进入察隅的。一部分自称达让，另一部分自称格曼。印度阿萨姆人称前者为“迪加罗”（digaru），称后者为“米佐”（midzu）。英语统称他们（还包括丹巴江的义都人）作“米什米”（mishmi）。据他们的传说达让是从察隅之西丹巴江的义都人中分出来的，到这地方已有 7 至 11 代。格曼进入较迟，来自缅甸，约 9 代；在今察隅县内的格曼人少于达让人，成 1: 3。他们分别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但都与云南的独龙语、景颇语接近，达让人和格曼人则各有自己的语言，但是由于长期杂居，除大家都会说藏语外，格曼人已学会达让话，而且有些格曼儿童已不说格曼语。这两个集团在语言上正在统一起来。

还值得提到的就是据传说察隅地区原来还有一种称为“罔”的人，他们生产先进，所筑的梯田，遗迹尚在，大约在六代前被

藏族打败，部分迁走，部分已藏化。这种人究竟属于什么民族现在还不清楚。另外还有一种人，藏族称他们“扎”，他们的语言据说是格曼语加藏语，尚未经语言学者的鉴定，有可能是格曼语的底子杂有藏语。他们的语言现在被说成是土话，表示与藏语不同。他们不信喇嘛教，不和藏人通婚，有送鬼的习俗，但怕受歧视，自认是藏人，或是“讲土话的藏人”，一共有五个村子，约700多人。这种“讲土话的藏人”提示了在更早的时候已有能说和独龙语相近的语言的人，可能就是早期的格曼人，居住在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原本和怒江流域只有一山之隔，而且早在唐代，樊绰的《蛮书》里已提到过有条从云南向西的通道。现在正需要我们识别的居住在察隅和珞渝的许多民族，有可能就是早年从这条通道进入这些地区的说着和今独龙语相近语言的人的后裔。珞渝各民族集团的语言据初步了解不属藏语支而与景颇语支相近。如果联系到上述甘南、川西的一些近于羌语和独龙语的民族集团来看，这一条夹在藏彝之间的走廊，其南端可能一直绕到察隅和珞渝。上面提出族别问题的“平武藏人”和这里所说的“僜人”，可能就是在这一走廊中在历史上存在着某种联系，受到藏族、彝族等不同程度的影响的两个民族集团的余留。它们共同向我们民族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应当进一步搞清楚这整个走廊的民族演变过程。

三、关于云南红河的“苦聪人”。云南是我国民族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单位众多、支系复杂，自称、他称尤其混乱。据1972年《云南少数民族族别称谓简介》确定的21个少数民族的自称有138个，他称有157个。此外还有几十个名称没有经过族别调查，或暂时不能确定族别，共约3万余人，暂称为“人”而不称为“族”。已经在报纸上露面的有“苦聪人”等。

被称为“苦聪人”的少数民族分布在礼社江——元江及把

边江——墨江之间的哀牢山区。北从镇源之东、新平之西，南到绿春和靠近中越边境的金平，更向西南到西双版纳的勐腊。金平、绿春、勐腊的苦聪人聚居在深山丛林中，生产较为原始，1971年约有3600人。在北部新平、镇源一带的也有两三千人，生产水平与邻近的彝族、哈尼族相似，过去也被称为“苦聪罗罗”，所以大多已归入彝族之中，不再强调是苦聪人。现在提出族别要求的是金平、勐腊一带生活比较原始的苦聪人。

“苦聪”是汉人对这部分少数民族的称呼。他们之中一部分自称“拉祜”，又分拉祜西（汉称黄拉祜）及拉祜普（汉称白拉祜），另一部分自称“郭抽”（汉称黑拉祜）。

1954年云南民族识别研究总结在墨江哈尼族识别小结的附注中有这样一条：“苦聪有两种：（1）自称‘郭抽’，据说近哈尼；（2）自称‘拉父’，据说近‘拉祜’，因材料不足尚待进一步研究。”1955年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第二阶段工作报告中把“苦聪”列入了哈尼族系统，并说新平县的苦聪人“不能成为单一民族，他们都是哈尼族的支系”，主要根据是调查组向新平县需要识别的五个单位各收集了837个词，与当地哈尼语作了比较，在610个词中与“苦聪”话相同相近的有363个，占59.51%。

这个结论是不够全面的。第一没有答复1954年调查时提出的两种苦聪人的区别问题，第二没有说明为什么自称“拉祜”的人不归入拉祜族而并入哈尼族。1961年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调查了金平县的苦聪人，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据1977年的修改稿：“苦聪人分成黄、白、黑三种。黄、白苦聪人都自称拉祜。经过对其语言初步的调查，似属澜沧拉祜语的一个方言。黑苦聪人自称‘哥槎’，其语言亦与拉祜语近似，因此苦聪人似属尚停留在林中的拉祜族的较原始部落。但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有人主张苦聪人属于哈尼族的一个支系。”

最近云南民族学院语文系的研究报告中说：“黑苦聪与黄苦聪二者语言无大差异，彼此可以互相通话。在语音、语法、词汇方面有着明显的彝语支语言的基本特点……”又从苦聪语与澜沧县拉祜语的比较得出结论：“在基本词汇方面有 50% 完全相同，30% 相近似，完全不同的只有 20%；语法方面基本一致，语音方面略有差异。所以金平县苦聪语可以认为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拉祜语的一个方言。”

在苦聪人族别问题上意见的分歧，可能是由于苦聪人本身客观存在的复杂性。“苦聪”这个族名原是汉族对他们的称呼，他们的自称就不一致。最早说苦聪人中一部分近于哈尼，另一部分近于拉祜，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自称“郭抽”的那一部分和自称“拉祜”的那一部分存在着什么区别和有什么联系，把他们合并为“苦聪”有什么根据。还应当看到拉祜人本来存在着不同分支，各分支之间方言的区别相当大。据西方语言学者对靠近我国边界的泰国北部拉祜人的调查，这地区的黄拉祜和黑拉祜方言不同，不能互相通话。苦聪人中的“郭抽”汉称是黑拉祜。所以即使“郭抽”和黄拉祜语言有差别，这种差别也可能是方言的区别。于是引出了拉祜语和哈尼语的区别和联系的问题来了。有人反映云南同一语支的各民族之间语言上的差距可能小于各民族内部方言的差距。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首先是民族识别并不是单纯地以语言为依据，即以语言本身而言，也不能以其表面形态上的差距决定其亲属关系。语言的谱系分类主要还是要根据语言的历史分析。

拉祜语和哈尼语的分支问题，其实只是彝语支各语言的谱系分类中的一个问题。在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中最困难的莫过于彝语支各族的区别。从族名来说，据上引 1972 年的《简介》，彝语支各族的自称有 64 个，他称有 88 个，现在归并成彝、哈尼、傈僳、拉祜、纳西等族。至于他们怎样分离成各单一民族的历史

过程，以及包括在这些被认定是单一民族里的许多各有名称的集团之间，在语言上及历史上存在着什么关系——这些都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至于苦聪人是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问题，我们不能只根据语言这个特征来决定。这一点在上面所列举的两个识别例子中已经说明过。苦聪人中那些曾在不同民族的土司下被统治过，社会经济发展又不平衡的各部分间有可能发生分化，部分同化于其他民族，部分又与其他民族结合而形成新的共同体。这些问题只有对这地区作深入全面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才能解决。

民族识别是一项为具体民族工作服务的科研工作。它为决定某些民族集团能否认定为单一民族提供客观依据。但是具体的决定还必须尊重本民族的意愿和照顾到该民族发展上的利益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在族别问题上，民族的意愿就是指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究竟是不是汉族或少数民族，是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主观愿望的表现。我们在对民族识别作出决定时必须尊重本民族的意愿，主要是从政策方面考虑的。根据民族平等政策，族别问题的解决不能由其他人包办代替，更不能有任何强迫或是勉强，必须最后取决于本民族人民的意愿。但是，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长期的民族压迫、歧视造成的各民族的孤立和一个民族中各部分之间的隔阂，加上一些民族的广大群众还没有掌握对本民族历史及语言的科学知识，使得有些民族人民缺乏充分条件正确地表达民族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一方面必须耐心地帮助有关各民族人民及其有代表性人物正确认识他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便他们对自己的族别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根据我们的经验，在进行民族识别的科研工作时应当尽量吸收本民族的代表人物参加，密切联系本民族群众，充分和他们商量和研究，把科研工作和群众性的教育结合起来。

我们已经指出，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变化、消亡的，各民族一直处在分化融合的过程中。当前我们急需处理的一些民族识别上的遗留问题，大多是些“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必须着重于分析这个比较复杂的分化融合过程，在最后作出族别的决定时尤须考虑到这项决定对这些集团的发展前途是否有利，对于周围各民族的团结是否有利。同时还应当照顾到对类似情况的其他集团会引起的反应。所以，有关各族人民的族别问题，必须严肃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对待。

总的说来，自从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在民族方面的科学研究是有成绩的。它的特点是密切地与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民族识别的研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项目。我国在这方面的科学工作者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在处理前人所没有处理过的问题。尽管出现过许多错误和缺点，我们的方向是明确的，我们是在以科学工作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

1978年9月

作者附言：本文是根据1978年9月在全国政协民族组会议上的发言改写的。在准备这次发言时，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许多同志，提供了资料和意见。

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一些体会^{* 1}

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生长在亚洲的这一代人，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激烈和最巨大的社会文化变革。旧的在消逝，新的在成长。我们从幼到老，在这亲身经历的变革中，取得我们对人生的体验，对历史的理解。

以我自己来说，出生还不到周岁，中华帝国被中华民国所代替了。在小学里我最初从画报上看到欧战中初次出现的飞机和坦克的相片，其后不久我从兄长们在五四运动中上街游行的小纸旗上，学到了“民主”和“科学”这些新名词。从中学到大学，我的学生时代有哪几年没有以激动的心情，在街头游行，在队伍里高呼口号？又有哪几年没有因军阀的混战、列强的侵略而不能安心学习？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前40年的岁月中尽管社会这样地动荡，社会文化的变革只是当时广大人民所追求的目标，真正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还是近30年的事。我的前半生所经历的主要是在排除我们中国人民进行社会文化变革的种种内外的阻力，创造新中国诞生的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全中国社会文化根本性的变革的开始。我们祖国大陆，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走上了创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大道。在这道路上中国人民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到明年整整30年了。我自己也快进入我们老话中所说的“古稀”的年龄——70岁了。经过近30年的大变革，这个古老的形容词也失去了它

* 本文系作者在联合国大学日本京都东亚学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原载《民族与社会》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的意义。现在的中国，70岁的人不仅不“稀少”，而且正在和黑发的青年们比干劲，他们的精神面貌已用不上这“古”字了。但无论如何，近70年的经历是很宝贵的。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代的祖先曾经获得过像我们这样身历迅猛巨变的机会？

我们在这个急骤变革的世界里，生活上和思想上有时当然不免会感到难于适应，但是这些经历确使我们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个人能身历其境实在感到幸运。如果把中国近30年的经验加以科学地总结，我相信，不仅对今后中国本身的改革和建设，而且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改革和建设，都可能发生有益的作用，那是因为我们中国是这个激烈变革中的世界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我相信，今天来自亚洲各地的朋友们都曾经在自己的国土上经历过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变革，都关心和研究过这个过程，有丰富的经验，有深刻的体会。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在这个共同的时代里从实践中取得的某些经验，给了我们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感情。今天我们聚坐一堂，交流我们各自的体会，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确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珍惜的机会。我们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正在继续总结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历史经验。各位朋友的宝贵经验都是我们值得重视的“他山之石”。

这次讨论会所提出的主题是，在这个变革着的世界中，社会文化的发展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领域和方面是很广泛的。我今天只能就我个人所经历到的范围，谈谈其中很小的一个方面——我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一些体会。

我这样限制我今天所要谈的范围，首先是因为近30年来，即从新中国诞生以来，我主要的工作是在有关我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方面；其次是因为如果从社会变革的深度和速度来说，也许没有任何地方的社会能和近30年的中国少数民族相比的。中国少数民族在近30年走过了一条，也许会引起来自亚洲各民族的朋友们广泛注意的道路。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说，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统一的国家。我们中国现在一共有 50 多个民族，汉族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约占全国人口的 94%。其他 50 多个民族人口都比较少，其中最大的也只有 1000 万人，就是主要聚居在广西的壮族；最小的还不到 1000 人，就是居住在东北边境黑龙江一带的赫哲族。因为这些民族相对地说人数较少，所以一般统称为少数民族。

中国的许多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从古代时起，他们的祖先就在我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殖子子孙孙。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不仅各自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的各具特点的社会文化，而且通过交流、融合、分化、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共同缔造了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整体——中华民族。尽管四五千年中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民族有兴亡、有消长，有些民族消失了，被同化于其他民族中，有些民族融合了，又不断有些新的民族形成、壮大了，但各民族所凝聚成的这一个整体——中华民族，却绵延持续，保持了我国文明的连续性和推陈出新的创造性。它源远流长，在世界上实为仅有。这个由各兄弟民族所结合成的整体，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多少次严重的考验，外来的打击，内在的分裂，但由于各族人民之间的血肉相连，休戚相关，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与总趋势，每次分裂之后都形成更巩固的统一。这也是在人类历史上突出的事实。

我在谈到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革时，首先着重提出他们所共同形成的整体——中华民族，那是因为我深切体会到，中国各少数民族历史上一切重大的变革都是和这整体的变革不能分离的，他们的变革都是这整体变革中的一部分。局部的变革一方面是在整体变革的总流中进行，受着总流的促进和制约，而另一方面它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也总是保持着它特殊的个性。

就以近 30 年的变革来说，各少数民族各自的变革是以中国

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的中国的共同事业为出发点的。如果中国各族人民不是共同努力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革命，近 30 年来各民族这样巨大的社会文化改革是不可想象的。

不仅如此，中国各族人民得到解放以后，各民族的社会改革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而且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上的投资在比例上高于其他地区；在财政上又予以巨额补助以发展教育、卫生事业，并根据需要在人力物力上提供支援，如派遣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帮助发展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事业。没有国家的特殊照顾和支援，社会经济比较落后的民族能迅速地发展起来，改变他们原来的贫穷落后面貌，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在进一步分析中国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革之前，有必要指出他们都是中华民族整体的组成部分。在分析他们的社会改革的内因和外因时，必须注意到内外的相对性，就是说，就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来说，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但就中国对世界各国来说，由各民族共同组成的整体——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属于这整体的内因。

中华民族的整体是由汉族及 50 多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存在着它的个性，也就是对整体而言的局部性和特殊性。各民族的个性从各方面表示出来，它们可以有不同的语言，生活上不同的民族形式，艺术上不同的民族风格和心理上不同的民族素质——近来有些民族学者用“民族的性质”这个名词来概括这些现象。各民族的“民族的性质”是在它的历史中形成、发展和消亡的，它具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另一方面，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在生产力上有高低的差别，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先进和落后的不同。一般说来，人类社会在这发展方面是有普遍规律的，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存在着不同阶

级的社会，再发展到消灭了剥削和阶级的社会，今天我要谈的社会改革就是这一方面的变革，也就是各民族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社会上层建筑的变革。具体地说，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中国各少数民族是怎样进行社会改革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至于“民族的性质”方面的问题将不在这里讨论。

在这里，我还要进一步限制我提出讨论的重点，就是着重于我国社会改革中少数民族所存在的特殊性，和怎样由于他们在中华民族这个整体中的特殊性得到充分承认，发挥了各少数民族本身的内在因素的作用，而实现了少数民族的社会改革，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变革的过程在理论上充分体现了整体与局部、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又矛盾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在这里我们将看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为各少数民族提供了变革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条件只开辟了变革的道路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少数民族必须用自己的腿走上这条道路，向这个方向迈步前进。变革的动力发生于各民族自己的社会内部，变革过程所采取的步骤和方式要依据各民族的具体情况，由各民族人民自己来决定。这就是说，整体的共同事业是依靠各部分内在的创造性来完成的。

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不承认各民族的个性和特殊情况，千篇一律地使用在某些个民族中行之有效的办法作为公式，到处硬套，强加于其他各族人民，不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民族感情，尤其是他们的意愿，不是耐心地在他们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尽管社会改革确是符合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的，也会把本来可以做得好的事弄得很糟，这就是我们所反对的大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另一种情况，如果某些部分强调它的特殊性，不去利于整体已具备的共同条件而故步自封，消极等待，甚至拒绝变革，企图保持和整体根本不能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结果必然会损害整体和局部的共同利益，造成本民族的损失，这就是我们所

反对的地方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民族的社会改革。

我要在这里特别着重提出的是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不论文化水平高低，它的社会改革必须由本民族的人民自觉自愿地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而且是能够由本民族人民自己来实现的。我们坚信每个民族的人民，不论什么种族，都具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当然，人的知识不是头脑里固有的东西，而是从总结实践的、接触外在世界的经验中获得的。只要一个民族内在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能够得到发挥，这个民族就能利用所具备的条件扫除他们提高文化和改革社会的种种阻力。以当前发展中的世界来说，就是要扫除强权的控制、欺压和本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以及极端贫困落后的状态。各民族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是因为各民族的人民不仅具有内在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创造力，而且具有接受以人类世界整体来说，已经为人类所获得的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一旦觉醒，奋发图强，内在的创造力发挥了出来，并同实际正确地结合，那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长期阻挡他们达到，并列于世界先进民族行列的目的。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就是见证。

我们中国各民族都已经通过本民族人民的力量扫除了种种障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就是在解放前还处于相当原始状态的那些已濒于灭亡边缘的少数民族，也已经跨越若干历史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前提是扫除外来的内在的压迫，和扫除束缚生产力的种种枷锁，包括原有的那些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学习的能力是无限的，创造和掌握生产技术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也是无限的。人类总有一天能够建立足以满足每一个人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的社会。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能够看到的人类社会的前景，而且已经是人们能够相信其必然实

现的前景。我们今天聚集了关心世界，特别是亚洲，社会文化发展的学者们在一起讨论怎样来促进这个前景的早日实现。这次讨论会的召开，本身就是件令人鼓舞的事，我希望我们的讨论会将有有利于亚洲各族人民社会文化的向前迈进。

现在让我接着在下面谈一谈中国少数民族所具有的特殊性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性。概括地说来，在解放前，中国少数民族中大约有 30 多个民族，3000 万人，保持着封建地主经济，其中有些民族也在不同程度上有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些民族大多与汉族接近，而且很多与汉族杂居，受到汉族的影响较深，而汉族是个人类历史上保存着为时最久最发达的封建社会记录的民族。和汉族一起包括在中华民族的整体中的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发展了封建制度，正说明了整体与局部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尽管这些少数民族长期和汉族密切相处，它们即使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在发展上还是和汉族有一定的差别，而且在形式上也还保持他们和汉族不相一致的特点。不仅如此，解放前，还约有 400 万人口的少数民族保存着早期的封建社会制度，即封建农奴制，还有约 100 万人口的少数民族保存着奴隶制度，和大约 60 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还保存着原始公社的残余。

解放前长期历史所造成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方面表现出了构成中华民族这个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所具有的特殊性，而另一方面却也提供了它们要求改革的一致性。不论是封建社会或是奴隶社会，甚至还保存着原始公社残余的社会，在当前人类历史发展上都属于经济落后的社会。而这些落后的社会制度正是中国各族人民文化停滞、生活贫困的根本原因。要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受人欺侮、挨打，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要求，共同的目标。

为了具体地了解解放前中国少数民族的情况，在这里进一步简单地把上述各种社会形态举例作一说明，也许是有必要的。

如上所述，中国少数民族绝大多数，约有 3000 万人，在解放前停留在封建社会，他们是壮、回、维吾尔等民族。封建制度就是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分给农民耕种，通过地租形式剥削农民。以广西壮族地区的农村为例，占人口 3% ~ 4% 的地主占有耕地面积的 60%，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占有土地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这些少地和无地的农民为了生存向地主租地耕种，每年交纳全部产品的 1/3，以至 2/3 给地主作为地租。此外，地主还利用农民生活的贫困进行高利贷剥削，利息高至 200%、300%、400%。

中国有些少数民族，如藏族，还处于封建社会的早期阶段——封建农奴制。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农民被迫按照封建主的规定，以奴役性条件从封建主那里领得一块份地，世代使用，从此农民被终身束缚在土地上，对封建主处于人身依附的地位，成为农奴。封建主可任意惩罚、没收其财产，迫使农奴提供无偿劳役，缴纳高额实物或货币地租。

解放前西藏的封建农奴制极为黑暗。当时西藏的藏族基本上分为两大阶级，一小撮封建领主：僧侣、贵族和地方政府官员都是西藏的大农奴主，统称为“三大领主”，占人口的 2%，而掌握着西藏地区全部政权、土地和大部分牲畜，广大农牧民阶级连一寸土地也没有，大部分牧民都没有自己的牲畜。

西藏的农奴主要由差巴和堆穷两部分人组成。差巴是藏语“支差人”的意思，他们虽占有少量的牲畜和农具，领种一份差地，但要无偿地为官家、贵族和寺庙支应各种劳役。他们的社会地位较堆穷为高，但同样没有人身自由。堆穷是藏语“小户”的意思，他们没有差地，大多数几乎不占有农具和牲畜，许多来

源于破产、逃亡或分家的差巴，他们终日为领主支应极为繁重的劳役。另外还有被称作囊生的家奴，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人身完全为农奴主占有，农奴主完全有权将他们买卖、赠送或陪嫁，甚至任意鞭打和杀害，他们是西藏社会最低的阶层。他们的子女长大后还是农奴主的囊生，世代没有翻身的日子。

比西藏藏族的封建农奴制更为落后的，是解放前四川、云南两省交界处的凉山彝族的奴隶制。这地区大约有 100 万人口，奴隶制是以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奴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

解放前，凉山彝族有四个严格的等级：黑彝、曲诺、阿加（安家）、呷西（锅庄）。黑彝是世袭的奴隶主统治阶级，占人口的 7%，整个凉山地区的土地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可以任意买卖或处死奴隶，那时 1 匹马可以换 10 个奴隶。曲诺是被统治等级中的最高等级，他们的人身隶属于奴隶主，不能任意迁出主子的辖区，每年都要为奴隶主服一定日子的无偿劳役，但可以占有少量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少数曲诺也拥有少数奴隶。

阿加是已被主子婚配成家的奴隶，大部分时间为主子服劳役，一般居住在主子宅旁，以便随时使唤，没有迁徙的自由。但阿加中也有少数已占有极少量土地和工具，个别阿加还占有奴隶。

呷西是奴隶中最低的一个等级，他们是奴隶主锅庄旁边的家奴，他们是没有成家的单身男女，每天从早到晚为奴隶主劳动，和猪狗一样，为了防止他们逃跑，晚上临睡前还要被穿上几十斤重的木鞋，锁上铁链。年老丧失劳动力时，就被投入深谷，或在野外的深坑里用乱石活埋。

中国在解放前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保存着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他们主要是分布在云南边疆地区的独龙、怒、佤、傈僳、布朗、景颇、崩龙等族，此外还有居住在黑龙江一带的鄂伦春、鄂温克和赫哲族，以及聚居在广东省海南岛的部分黎族。基本上属

于这一类型的一共大约有 60 万人。

原始公社制是发生在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人们只能靠集体劳动才能获得有限的生活资料，除了维持生活外，没有剩余，也没有剥削。上述这些少数民族事实上已有一些刀耕火种的简单的农业，所以已进入了原始公社解体的末期，在不同程度上还保留着原始公社的残余。

例如在云南西北角上的独龙族，在解放前，以刀耕火种的农业为主，而采集和渔猎仍占一定比重。从事农业的生产工具，基本上还是用竹、木、石制成；铁质工具数量少、质量低。主要生产工具的“恰卡”是小木锄，尖端镶上一道长约 3 公分的铁边。砍刀和铁斧大多从外地传入，为数不多。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粮食产量极低。解放前，一年的收成最多够 4 至 8 个月的吃用，所以可以说一年中有大约一半的食物还是依靠采集、渔猎等原始方式得来的。

在生产力刚刚从原始水平提高起来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还保留着家族公有共耕的轮歇的“火山地”，约占耕地面积的 50% 到 70%；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由若干户结合在一起集体耕种的半固定的耕地，约占耕地面积 25% 到 45%，和在各户房前宅后那种为各户长期占用而独自经营的小块园地，约占耕地面积的 4% 到 7%。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贫富的分化，也就出现了剥削现象，在这里很清楚地可观察到社会的阶级分化和它的发展，为研究社会发展史的人提供了生动的资料。生活在这种原始状态中的人们是极度贫苦的。尽管在这里人吃人的剥削制度还不严重，这种落后状态并不是田园诗人所颂扬的理想生活，而是离开人类野蛮时代还不太远的生活。

看到了上面这一段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情况的叙述，人们很自然地会发生为什么这些少数民族发展会如此缓滞的问

题。除了各民族本身的特殊条件之外，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受到中华民族整体的共同条件的制约。解放前的中国各族人民在共同劳动中缔造的统一的国家，在很长的时期中，是被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统治阶级所统治的。历代统治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帝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对这些少数民族采取过严重地阻碍他们发展的反动措施。

单从生产工具这一项来说，就存在着很多统治者强加于一些少数民族的限制的例子。比如，1830年，清朝的统治者派军队镇压傈僳族人民起义时，曾把傈僳族人民日常生活、生产所用的铁质器具一律没收。1912年，北洋军阀又下令搜缴当地铁质农具，防止他们用来制作武器造反。这就大大破坏和阻碍了傈僳族的社会生产发展的可能性。再以上面所提到的凉山彝族来说，根据史书记载，早在宋代，这地区的边缘已出现封建经济的萌芽。到了清代，不仅这地区的边缘，甚至凉山腹地昭觉已出现定期的市集。但是历代王朝对凉山地区三令五申地实行封锁政策，扼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扶植奴隶主，进行军火买卖，搜刮彝族的财富。一次又一次地挑动彝族内部的械斗，互相残杀。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他们的社会怎能得到发展呢？

藏族的历史也是这样。曾经一度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强盛的民族，自从元代的统治集团大力扶持了喇嘛教，明清两代统治集团沿袭这同一方针，藏族的人口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在过去的几百年内，不仅没有增长，相反日益下降。至于历代皇朝有意识地支持当地各民族的上层，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巩固这些民族落后的社会制度，用各种残暴的手段镇压各族人民要求进步的革命行动，那是史不绝书的事实，在这里不必列举了。

正是因为阻碍各族人民发展的反动势力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这也就成了激发各族人民团结斗争争取解放的巨大能量。

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为各民族实行根本性的社会大变革创造了必要和有效的条件。“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经验的总结，这是说，中国的社会改革的总道路，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是各族人民一致的愿望和决心。但是怎样进行社会改革，由谁来实行社会改革，必须由各族人民自己来决定和自己来执行。少数民族必须进行社会改革、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各民族的社会改革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由各民族人民自己来进行，这两条原则正显示了整体和局部、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局部始终是受着整体的促进和制约，而整体的统一却始终建立在承认局部的特殊性上。

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过中国各民族各自具有他们的特点，在社会发展上是不平衡的。从不同的出发点大家要达到共同的目标，各民族所走的道路也就不能完全一致。社会改革是一项群众性的运动。各民族的广大人民切身感受到原有社会制度所给他们的痛苦是要求社会改革的根本动力，但是要使他们的这种要求能组织成一股实现改变社会制度的力量，还需要群众的觉悟，明确认识到他们痛苦的社会根源，有决心组织起来去克服和战胜阻碍社会改革的种种阻力——这是一切社会改革必需的开始步骤。这也就是说社会改革必须由各族人民自己决定和自己进行。而且社会改革本身是一场斗争，因为社会中存在着从旧制度中得到特殊利益的一部分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使 they 要维护那种对他们有利的社会制度。在我们上述的奴隶制和封建制里，奴隶主和封建地主离开了那种社会制度就不能剥削别人的劳动。他们必然要想尽一切办法阻碍社会改革，违反社会上众多成员的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双方的矛盾激化，这就是阶级斗争，只有旧制度里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觉悟后，团结和组织起来，通过斗争才能废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革命。任何民族的社会改革都不能由别人包办代替。外来的力量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强加

于别人的社会改革即使一时实现了，也不会在群众里生根，改革的结果也会得而复失。在人类历史上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得出一条原理：少数民族的社会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进行。

整体对局部创造条件的社会改革的条件是重要的，而且是积极的；但是条件毕竟是外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社会改革是要按具体情况由各族人民自己进行。各族社会改革的内在因素具体说来包括下列这些：群众要求改革的觉悟，群众具有战胜阻碍改革势力的实力，和群众中产生的有领导和组织能力的本民族干部。

在奴隶制下的奴隶和在封建制下的农奴和农民身受的痛苦是每个奴隶、农奴、农民都明白的，不愿承受的。但是每个实行这些制度的社会里那些既得利益的阶级也必然会制造出一套麻痹奴隶、农奴、农民思想意识的理论、学说，和一套镇压奴隶、农奴、农民反抗的法律和武力，使得奴隶、农奴、农民们不去反抗或不敢反抗，用以来维持这个制度，也就是维持他们的利益。我们所说的群众觉悟就是群众自行解除旧制度强加于被剥削人民的思想枷锁。我们指出群众起来斗争必须具有实力，就是要使阻碍改革的力量不能用强力来镇压群众行动。培养和教育本民族干部就是要使来自本民族劳动人民，和群众有血肉般联系，通晓本民族语言，熟悉本民族情况的优秀分子，能从各民族的实际出发，把道理讲给群众听，帮助群众组织起来，全心全意地为本民族人民大众服务。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改革就是通过这个群众路线而取得胜利的。

中国各少数民族社会改革过程取得的一条经验，就是如果这些内在的条件不具备就不能进行社会改革，有一条成熟了而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能进行社会改革。西藏是1951年和平解放的，但是到1959年才开始对它旧的封建农奴制进行改革；大小凉山

彝族奴隶制也是在 1956 年开始改革的，而这地区在 1950 年也已经解放了。这些都是出于改革条件不具备的原因。从解放到改革这一段时间里，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采取了种种措施促使内因的不断成熟。

我自己在 1950 年至 1951 年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派遣到少数民族地区去的访问团，到过贵州和广西。我们访问团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家访，告诉他们在新中国里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各民族自己的事要由自己来办。事实上我们确是这样做了。我们把粮食送到缺粮户，医生上门去为他们治病，我们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我们在生活实践上处处平等相处，交朋友，结感情。我们帮助他们建立区域自治，请他们的代表到北京来和到其他地方去参观访问。我们开办了民族学院。我自己从访问少数民族地区回来，就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参与培养各民族干部的工作。为了了解各民族的语言和社会历史，我们又组织了大规模的科学研究队伍，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去调查研究。我自己去过贵州和云南。上面所叙述的少数民族的各种社会形态就是经过很多人参加的科学调查研究的结果。这一切都促进了民族间友好团结、相互了解。少数民族中要求社会改革的因素迅速成熟。由于我亲身参加过这项工作，我深深感觉到科学研究是能为少数民族的进步贡献出力量的，我一直以此自慰。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并没有权利只作为历史的旁观者，而应当参与创造历史的事业。

经过深入的工作，各族人民在自觉的基础上，在不同时间，采取不同的具体方式、方法和步骤，进行了社会改革。总的说来，那些在解放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居于主导地位的少数民族地区，如壮族、朝鲜族、回族等的改革方法基本上和汉族地区大致相同。改革的时间也大致和汉族地区同时进行。

在一部分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和奴隶制经济的少数民族地

区，如藏族、傣族和部分彝族地区，则在不断提高群众觉悟，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对农奴主和奴隶主采取和平协商的方法实行民主改革，在改革的时间上都迟于汉族地区。

那些保留原始公社残余较多的少数民族地区，改变其贫穷落后的面貌所采取的大体步骤是培养先进分子，团结一切劳动人民和与群众有联系的民族领袖人物，大力发展生产，通过互助合作，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社会经济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也有相同的一面，就是主要采取和平协商的方法来改革旧的社会制度。这是一种比较缓和地进行社会改革的办法。这种方式的特点是在对少数民族旧制度中的剥削阶级采取赎买的方法，使他们在政治上得到妥善安排，生活上得到适当照顾，他们由此在新社会中可以不依赖剥削而过着和过去旧社会相当水平的生活；同时劳动人民是很通情达理的，只要上层愿意接受新制度，也就不再对他们作激烈的斗争，对他们过去对劳动人民所做过的恶事，会实行宽大处理。这种和平协商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整体对局部的促进和制约。中国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一般比较落后，人数也较少。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有力量对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剥削阶级实行赎买的政策。而且这样做也可以使本来不太发达的少数民族经济在改革时避免遭受可能的破坏和损失。这对少数民族劳动人民也是有利的。

当然，以较为缓和的方式，通过和平协商，是否能够实现社会改革，主要是决定于少数民族中的剥削阶级的态度。总的说来，接受这种方式而实现社会改革的地区是占绝对多数，但也有极少数顽固的农奴主和奴隶主拒绝这种方式，而且进行过局部的和短期的顽固抵抗。西藏的少数大农奴主和四川凉山彝族的部分奴隶主就是如此。西藏 1959 年的叛乱平息后，广大的农奴翻身当了主人。凡是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都得到政治上的安排和生活上的安置，他们中绝大部分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他们的生活也比过去更为富裕和愉快。

在废除旧社会的剥削制度的胜利基础上，各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和汉族人民一样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防止新的剥削制度的发生。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必然会导致贫富的分化，发生新的剥削，使广大的劳动者重新陷入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社会制度中去。

中国各少数民族没有例外地在废除了旧的社会制度后通过互助合作，逐步实现对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小生产者的个体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标志着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改革告一段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的实现，使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种伟大的社会改革，范围之广泛，变动之深刻、彻底，在我国各民族的历史上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所罕见的。它不仅消灭了千百年来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各种旧制度，使被压迫被剥削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真正成了社会的主人，而且使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超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大飞跃。

社会改革的胜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使中国各少数民族进入了共同发展和繁荣的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过去那种落后的耕作方法逐渐为先进的科学种田所代替，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以西藏为例，1974年已经实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粮食自给，在世界屋脊上的高寒地区播种了小麦，获得高产丰收；粮食总产量比社会改革前的1958年增长了一倍半。广大牧区逐步实现了定居放牧，改变逐水草而居的落后状态，畜牧业生产成倍增长。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1976年底牲畜总头数达2000多万头，比解放初

期增长了三倍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迅速发展起来，大中小型厂矿企业分布在祖国的万里边疆，有些少数民族地区正在逐步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过去连一根火柴都要输入的西藏地区，到 1975 年已有新建的大中工矿企业 250 多个。在原来渺无人烟、满目荒凉的地方，建立起许多新兴的城市，过去那种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少数民族的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四通八达的交通、邮电网的建立结束了过去交通闭塞、与世隔绝的历史，大大沟通了内地与边疆以及各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往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中、小学遍布城乡山寨，各民族自治区都办起了高等院校，即使那些偏僻的深山里的少数民族也有了本民族的第一代大学生。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社、队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普遍建立，为各民族人民防病治病，使他们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过去那种缺医少药、有病无处医的状况得到了基本改变。各少数民族的人口正在增长。以西藏自治区为例，目前人口已达到 163 万，比 1959 年增加了 44 万。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日益发展，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过去悲惨的情景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一去不复返了。总之，中国少数民族经过社会改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已为进一步实现四个现代化，进入世界上先进民族的行列奠定了基础。

中国少数民族在这近 30 年短短时期中的巨大变革是我亲身目击的历史。我最早作为一个人类学的学生到广西瑶族地区去进行实地调查是在 1935 年。那时就是像我这样一个常被说成是个善于想象的青年，也没有梦想到生活那样贫困，在社会上备受歧视，连下山都不敢的少数民族，会有今天这样扬眉吐气的日子。而这一切已经是人类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事实。这样巨大的变动，也许会像强烈的光线一样，使没有习惯于它的肉眼，对此会感到

眩晕。但是我们不妨闭目想一想，其中必然存在着许多值得怀着善意、渴望人类进步的人们反复推敲的经验。我也许因为身在其中，有如我们的古诗所说居住在庐山中的人不易认得庐山的真面目，对这个巨大变革的历史意义还不容易全部领会，对其中所包含的科学上的规律还不容易充分地阐明。今天我只能就我所见到的和所体会到的一些事实和想法提出来向在座的各位学者请教。

我也希望我这个发言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次讨论会的主题：在这个变动着的世界中，各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应该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我在这里简单地叙述了我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一些体会。这是我个人从自己亲自参加工作中得来的一点体会。当然，正由于是个人的体会，我所反映的情况和所得到的理解必然是有局限性的，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但是我确实体会到一个民族，不论人口多少，不论文化水平的高低，只要能摆脱了遏制他们发挥内在智力创造性的一切束缚，依靠本民族广大人民的觉悟和从而产生出来的巨大力量，完全可以由自己来利用已经存在的条件，和创造尚未具备的条件，用自己的力量来改革阻碍他们发展的社会制度，改变他们的社会性质，走上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由于我从实践中获得了这些体会，我对人类的前景充满着信心：觉醒了的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民有力量克服阻碍着人类前进的一切困难，创造一个各民族人民可以得到平等的、不受压迫的、不受剥削的世界。我经常感到有机会生在这个已经能看到这样一个世界即将实现的历史时刻是一件莫大的幸运。我愿意和在座的朋友们一样能以曾为创造这个世界大厦添过一块砖瓦而感到自慰。

最后，让我对邀请我到这里来参加讨论会的主人们表示我的感谢。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占人类总数 1/4 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是 29 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庄严宣告。就在这一刻，围绕他四周，来自祖国各民族的代表，用着各自的语言，发出一致的欢呼，震荡着祖国大地。

这是史无前例的。祖国 50 多个民族，平等团结，手携手，肩并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踏上了光芒万丈的社会主义大道，为我国 5000 多年的伟大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章。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开始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祖国山河，美丽富饶。我国各族人民的祖先，从远古的时代起，已经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上。他们在生活实践中有所创造发明，开发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他们在长期的相互往来中，互通有无，相互促进，发展了文化。历来出土的古代文物具体地保留着各族交流、相互影响的史迹。这充分说明了今天我们所继承的灿烂文化是我国各族世代勤劳勇敢的人民共同的成就。我国各民族人民对此都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不是任何哪一个民族单独的创造。

我们这些唇齿相依、休戚相关的各族人民一直患难与共，同仇敌忾地反抗压迫他们的敌人。有文字记载可稽的，早在公元

1000 多年前，推翻当时奴隶主统治的商王朝的武装斗争中，就有各族人民的参加，当时记载下来的族名，还有些和现有的民族名称相近。

在这个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基础上，在公元前 200 多年，秦始皇完成了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历史任务。我国各民族从此共同生活在统一的国家里，增强了团结，促进了发展，这是适应历史潮流，符合各族人民利益的伟大创业。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一直是我们祖国历史的主流。

我们应当看到：我们这个多民族统一的祖国，当初还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它是形成在我国主要地区进入封建社会的初期。当时建立的是一个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国家。当封建地主阶级在历史上转化为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时，它就利用这统一的国家作为压迫各民族人民的工具，出现了危害人民利益的一面。他们害怕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因而挑拨各族人民的关系，制造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破坏民族团结。

被统治的各民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先后产生本族的剥削阶级，他们和中央王朝存在着勾结、依附和对抗、争夺的关系。他们经常利用民族的名义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各族剥削阶级间的争权夺利引起民族间的对立和战争，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间断和暂时的分裂时期，破坏过国家的统一。这是我国历史上暂时的、间断的逆流。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不论哪一个民族的剥削阶级占有了统治全国或地方的政权，总是对异族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带来了各族人民痛苦的遭遇，人数较少的被压迫民族受难更深。许多受到武力的摧残，被迫迁移，流散四方；许多被孤立荒僻的边区；许多甚至被强制同化，亡种灭族。历史上民族的变化是很大的。

近百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又遭受到帝国主义侵略。万恶的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的领土，掠夺了许多兄弟民族的家园；他们挑拨

我国民族关系，勾结民族败类，搞分裂，闹独立。真是：“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缔造了统一祖国的各族人民是经得住历史的考验的。他们对国内外敌人的剥削压迫和分裂阴谋的答复就是加强团结，坚决反抗。即以近百年来说，每一次大小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总是各族人民共同进行的。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就是在多民族杂居地区发动，一直有各民族人民参加，并且得到西南、西北各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配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毛主席英明的民族政策为这些地区的广大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民族平等的光辉。他们全力支持过境的红军，纷纷派遣自己的子弟踊跃参军。革命的种子深深地播进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心上。

各族人民经过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获得了胜利。从此这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成了一个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毛主席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几千年来，反动统治阶级所制造的民族隔阂，在革命烈火前，像冰块一样地消融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我国的革命实践证明了这伟大的真理。只有推翻了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剥削阶级的统治，才能真正地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平等的实现使民族间的友爱和合作代替了隔阂和仇视。

令人难忘的是当解放之初民族平等的信息传到各民族地区时所激起的那种欢欣鼓舞的气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派遣了访问团深入各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各族人民奔走相告，越高岭、涉深溪，扶老携幼，争迎毛主席派来访问的人。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用热泪代替了语言。民族大家庭的深情厚

谊洋溢五湖四海。

二

我们祖国的兄弟民族终于团聚了，但是由于长期被反动统治阶级分隔离散，相见之下，竟有很多互不相识。当时有谁能说得清我们祖国有多少民族，他们叫什么名称？

我们祖国的许多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它们都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分别在语言、地域、经济和心理素质上表现出一定的共同性。它们都存在着发展上的特点。各民族的人民又各自具有他们的民族意识。

当然，由于迁移、流散和阻隔，有些民族被分割在不相连接的地区，在语言上发展了不同的方言和口音；又由于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受到不同的影响；在经济上又与不同民族在不同程度上结合在一起；这许多历史因素使得有些民族在其共同性上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所以在确定我们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时，有些要经过一个识别的过程。至今有个别人数较少的民族集团是单一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的问题，还没有结论。现在已经肯定了，除了汉族之外，共有 54 个民族^①。

我国各民族的人口，多少不等，相差很大。人口最多的民族是汉族，不仅比任何其他一族为多，而且比所有其他各族都加在一起还要多。他们占全国人口的 94%，其他 54 个民族一起只占 6%。因此，我们统称这 54 个民族为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在人口上还是相差很大的。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壮族，现在约有 1000 万人，其中人数很少的鄂伦春族，约有 2000 多人，又如赫

^① 其时，基诺族在少数民族中尚未被认定——编者。

哲族约有 1000 人。

54 个少数民族中人数超过 100 万的有 10 个，它们是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等族。其他都不到 100 万人，其中超过 10 万人的有 18 个，它们是侗、瑶、白、土家、哈萨克、哈尼、傣、黎、傈僳、佤、畲、高山、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珞巴等族。有 26 个民族人数不到 10 万人；其中在 1 万人以上的有 16 个，它们是柯尔克孜、土、达斡尔、仫佬、羌、布朗、撒拉、毛南、仡佬、锡伯、阿昌、塔吉克、怒、乌孜别克、普米、门巴等族。人数不到 1 万的是俄罗斯、鄂温克、崩龙、保安、裕固、京、塔塔尔、独龙、鄂伦春、赫哲。

少数民族人民解放前所遭受内外敌人的压迫和剥削极为残酷和严重，人口下降。远的不提，30 年代反动军阀在甘肃屠杀回族，在广西屠杀苗族和瑶族等；40 年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屠杀蒙族；在新疆镇压维、哈等少数民族，受害的都是成千上万。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在东北对赫哲族的屠杀，对鄂温克族搞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使得这些民族几乎绝灭。西藏的藏族人民在野蛮的农奴主统治下，100 年间人口减少了 1/5。其他少数民族的情况类似。解放后，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根本上扭转了少数民族人口下降的趋势。据估计，目前壮族人口已超过 1000 万。以人数最少的赫哲族说，已从解放时的三四百人增加到 1000 多人。

我国各民族有大有小，而且大小悬殊，但是不论大小，一律平等，都要团结。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例如鄂伦春族还不到 2000 人，我们也要和他们团结。”

三

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是它们的聚居区所占的面积很广，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50% 到 60%。汉族几乎全国各地都有，但主要集中居住在我国东半部的平原地区，少数民族则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半部，少数在沿海岛屿及内地。

我国亘长的边境，绝大部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东部的台湾有高山族，南部的海南岛有黎族和苗族。东北的图们江流域有朝鲜族，乌苏里江流域有赫哲族，黑龙江流域有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内蒙古有蒙古族。新疆边境有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等。西藏有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云南边境有傈僳族、独龙族、景颇族、佤族、傣族、彝族等。广西边境有壮族、京族等。这些都是住在国防冲要地区的民族，他们世代开发了我国的边疆，并捍卫了我们祖国的安全。

由于长期的人口流动，各民族人民相互渗透，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分布格局。一般说来是各民族以大小聚居区交错共处在一起，很难用明确的界线划出各族的地区。我们所说的“民族聚居区”并不是指只有某一个民族居住的地方，只是指某一个民族比较集中居住的地方。在任何民族聚居区都有其他民族杂居在内，甚至在人数上其他民族也不一定是少数。当前我国所有的省和民族自治区没有一个不是包括若干民族的居民，在县市一级大约有 70% 也是这样。因此一个较大的某一民族聚居区里可以包括若干较小的其他民族聚居区，而这些较小的民族聚居区里又常常住着许多其他民族的居民。

举个例子：维吾尔族有 390 万人比较集中居住在新疆地区，所以我们说新疆是维吾尔族聚居区。但是新疆一共有 653 万人，

包括了 13 个民族，其中维吾尔约占 61%。其他这些民族在新疆分别有它们比较集中居住的地方，如哈萨克族就有 43 万人住在伊犁地区形成了一个聚居区，另外在其东还有木垒和巴里坤两个较小的聚居区。而且在甘肃和青海还有一些哈萨克人。这个例子说明，由于历史上各民族的流动和互相渗透，一个民族可以分散在不同地区，互不连接，形成若干大小不同的聚居区。

在汉族聚居的地区同样星罗棋布地分散有许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而且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居民几家几户、几家几寨地散居在汉族居民中间；经过很长的时间，他们还是保持他们的民族特点。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以及其西的江西、安徽等省的山区的畲族就是一个例子。又如蒙古族和满族早年它们的统治阶级曾一度统治过全中国，因而有大量人口移居全国各地，至今分散杂居在这些地方。回族又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除了比较集中居住在西北宁夏地区外，分布极为广泛，全国各大城市，包括新疆、西藏在内几乎都有回族的居民。

西南横断山脉地区，民族杂居的情况更为复杂。在不同时期，由不同方向移入这高山深谷的地形中的不同民族，分别保持他们所居住的地域，甚至长期孤立，各自发展其特点。云南一省现在有 22 个民族。

也应当提到，汉族在很早的古代就大量迁移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早在战国时代汉人已移入东北地区，在云南汉人已建立了地方政权；秦汉时代已有大量汉人定居在今新疆、云南的边境地区。他们与当地各族人民共同发展了当地的经济、文化。经过 1000 多年的生息繁殖，以及不断有汉人的继续移入，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已在当地人口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这是我国各民族分布的概况，小聚居、大杂居是它的特点。各民族的大小聚居区犬牙交错，插花共处，交织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四

我国各民族在这样悠久的历史中，这样交叉杂居的共处下，相互间密切地往来接触，又共同生活在统一的国家里，他们之间的融合是必然发生的。历史上的许多古代民族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不能认为他们的后裔都已绝灭，大多是已和其他民族相融合，或以新的民族的名义出现在历史上了。

不论在历史上发生过多少变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经过这么多的变化，而至今我国还有这样多的民族，各自还保持着一定的民族特点。

最容易使人注意到的是在语言上所反映出来的民族特点。一般说来，同一个民族的人所操的语言基本上是相同的，当然相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方言，方言之间的差别在程度上也有不同。不同的民族大多具有不同的语言，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民族说相同的或相近的语言。

根据语言学的分析，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大多数属汉满藏语系，约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74%，主要分布在中南和西南；其次属阿尔泰语系，约占 21%，主要分布在西北和东北；个别属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有少数如回、满、畚等族现在都已用汉语作为自己民族的通用语言。

由于过去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和聚居区的分散，同一民族语言常有多种方言的区别，而且有些民族，如苗族，各方言之间的区别相当大，甚至不易通话。由于各民族杂居在一个地区，他们很多能使用邻近民族的语言。例如和汉族接触较多的民族，通常能使用汉语。在新疆，许多少数民族能使用维吾尔语。

解放前有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哈萨克等 10 个民族有

通行的文字。有些民族如彝族、纳西族、水族保有一些不为群众通用的古老文字。解放后党和国家先后帮助 13 个民族创造了或改革了文字。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民族压迫，对少数民族采取强迫同化政策，强迫少数民族说汉语，用汉文；不承认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文件具有法律效力，甚至在公开场合说少数民族语言，也要受到侮辱。

解放后，少数民族获得了民族平等。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政府机关使用当地通用的语文行使职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要学习少数民族语言。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还存在着多种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情况下，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字受到应有的尊重是实行民族平等的重要表现。在一个国家内各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必须在各民族语言文字受到尊重和各民族人民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充分自由的前提下，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取得的。至于少数民族人民为了生活上和学习上的需要自愿学习汉文汉语或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都应当给以积极支持和帮助。

由于历史原因，各少数民族中存在着不同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

流行在少数民族中的宗教信仰有：回、维吾尔、哈萨克等族的伊斯兰教；藏、蒙等族的喇嘛教；傣、布朗等族的小乘佛教。还有许多民族有种种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以及对鬼神的迷信。帝国主义在文化侵略中又在一些民族中传入了基督教和天主教。

这些宗教信仰在少数民族中具有一定的群众性，一般说来是思想认识问题。但是在解放前，这些宗教信仰总是为剥削阶级所利用成为他们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甚至成为他们政治权力的基础。有些民族的人民在反动统治下被强迫接受某种宗教，

没有不信仰宗教或信仰其他宗教的自由，例如藏族人民被强迫信仰喇嘛教，要遣送自己的子弟到寺庙当喇嘛，终身不得还俗。这种情况是不能允许其继续存在的。

我们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和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形式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制度区别开来。对于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少数民族人民和我国其他的公民一样，享有信仰和不信仰的自由，同时也都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存在着差异，而且在民族杂居地区，这种差异也容易引起隔阂。过去反动统治阶级一贯利用这些来挑拨民族关系。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在风俗习惯上，各族人民应当采取相互尊重的态度。

少数民族中间也存在着某些和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风俗习惯，阻碍社会的进步。有些民族由于过去缺医少药，发生了种种禁忌；有些民族把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凝化在风俗习惯里，甚至成为婚姻制度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应该改革的，但是主要是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由本民族人民自己来进行，不能强迫命令，所以宪法规定了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五

我国各民族是长期在统一的国家里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中发展起来的。人口较多，经济、文化比较先进的汉族，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曾经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我们历史的主流，也是我们民族大家庭里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由于各民族人民间的互助合作，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基本上相同于或接近于汉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少数民族中大约已有

30 多个民族，合计将近 3000 万人，约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85%，已经和汉族一样进入了封建地主经济的社会发展阶段，其中有些民族已有了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

另一方面，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在民族之间常采取民族压迫的形式，各被统治的少数民族的剥削阶级，又总是勾结和依附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及其后的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维持他们对本民族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并顽固地维护其落后的剥削方式，所以重重压迫下的少数民族人民，在解放前苦难深重，生活穷困，社会发展受到阻碍，经济一般比较落后。

因此，不仅已经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的那些少数民族在经济水平上一般落后于汉族，而且还有一些民族在不同程度上在解放前依然停留在比较落后的发展阶段。解放初期，大约有 400 万人口的地区，包括西藏的藏族、云南的傣族等，还保持封建农奴制度；大约有 100 万人口的地区，主要是四川凉山的彝族，还保持奴隶占有制度；此外还有约 60 万人口的地区，如以游猎为生的鄂温克、鄂伦春等族，和以农业为主的独龙、怒、佤等西南边区的民族，还保持一定程度的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但是完全处于阶级没有分化的原始社会的情况，至今还没有发现。这些还保持比较落后的社会制度的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不超过 600 万，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15%。所以把所有的中国少数民族都说成是原始和落后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是过去反动统治阶级为了推行大汉族主义而捏造的谬论。

应当承认的是我国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上存在着不平衡的事实。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各族人民一致的信念。各民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一样必须进行社会改革，包括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虽然不平衡，但是各民族内部都

存在着阶级对立。阶级问题不解决，剥削制度不消灭，民族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最后的解决。毛主席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曾指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问题上又必须注意到各民族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发生的特点。毛主席又说，要“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社会改革的过程必须照顾各民族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这是完全必要的。列宁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

周总理在 1951 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毛主席的教导，对少数民族内部社会改革问题曾作出了原则性的指示：“各民族内部的适当改革，是各民族发展进步，逐渐跻于先进民族水平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但这种改革必须适合其本民族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必须根据其本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并采取妥善步骤，依靠其本民族干部去进行。”

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除台湾省的高山族地区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道路，先后进行了社会改革，现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

六

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的胜利完成是在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取得的。深受阶级压迫痛苦的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是迫切要求社会改革的，但只有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管理国家和各民族本身事务的政治权利，他们的愿望才能实现。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保障了各民族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大事，决定民族内部事务的政治权利，实现了民族平等，促进了民族团结，充分发挥了少数民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积极性。

民族区域自治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之一。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国家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的，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并享有由法律规定的自治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它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民族聚居的地方按其区域的大小分别成立区、州、县等级的自治地方。各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各地方按宪法规定设立各级自治机关。在中央及各级政府领导下，按照该地方大多数人民的意志，管理本民族自己的事务，实现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的少数民族享有法律规定的自治权利，如决定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采取通用的民族文字为行使职权的主要工具，培养和使用民族干部，管理财政，发展经济、文教事业，及制定适合于本地方的单行法规等。

迄今，全国已建立了相当于省一级的自治区 5 个，它们是：内蒙古自治区（194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5），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西藏自治区（1956 开始筹备，1965 正式成立）；相当于专区一级的自治州 29 个，相当于县一级的自治县 69 个。我国所有相当于县一级以上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都已经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

有些较小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分散在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里，而这些地区较小不便于成立一级政府的，为保障这些少数民族人民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在包括这些少数民族人民的行政区域的地方政权机关，均有各民族的代表参加，对人口特别少的民族都有适当的照顾。这样就体现了各民族人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原则，并使各少数民族所具的特殊情况得到应有的重视。

七

祖祖辈辈受苦受难的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翻身做了我们各民族共同的祖国的主人之后，在短短的时间里，逐步改变了原有的面貌。深山老林，荒漠僻壤，现在已是层层梯田，牛羊遍野。不断地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奇迹。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优越的条件：有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的制度，有勤劳耐劳的人民，有比较先进的兄弟民族的帮助，有广阔富饶的资源。实践证明，蕴藏在群众之中的伟大的创造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里一次又一次地推动着我国少数民族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

举例来说：西藏过去在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统治下，不仅没有现代工业，手工业也很落后。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西藏地方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起来，几万名过去的农奴已成为西藏第一代掌握现代化机器的产业工人。现在全区已经建立电力、燃料、化工、机械等几百个中小型厂矿，其中70%是“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973年全区工业总产值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2.8倍；煤、电、水泥、农业机械等主要产品的产量，分别提高了一倍到几倍，许多如呢绒、毛毯、皮革等产品，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而且有些已可以支援兄弟省市。

内蒙古的钢铁工业，新疆的石油工业都已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地。已经建成的成昆铁路，穿过崇山峻岭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使千年险道成了经济动脉。这一切都生动地证明了毛主席的论断：“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

千百万少数民族人民在这短短的 29 年里，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做出了无数的英雄事迹，不是笔墨所能写得尽的。2000 年来各族人民所创建的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在焕发出美妙的青春。在我国历史上这仅仅是新的一章的开始。

1979 年

《非洲的种族》译后记

塞利格曼《非洲的种族》一书，我于1966年暑前译毕，已与商务印书馆约定出版，于最后校核时，突受冲击，原稿散失。1978年决定重译，年老事繁，时断时续，进展殊缓。承同事陈观胜及李培荣等同志关心此事，以业余时间，多方出力相助，终于1979年暑初译竣。“四人帮”所毁者得以夺回，亦一快事也。

回忆当年为出版一些有关非洲民族情况的书，商务印书馆同人就商于我。我建议翻译这本书，因为它是我自己入门的读物。早在1936年，我去英国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当时在老师马林诺斯基教授主持的讨论会上，常有从非洲调查回来的人类学者提出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讨论。我对非洲民族缺乏基本知识，未易得益，所以亟思补课，请示老师，他指定此书为引路。这本书当时已非新书，初版于1930年，至今行世已近半个世纪，还是英国“家备书库”中的一本为人们重视的书。这并不是偶然的。

塞利格曼是英国早期研究世界民族的学者，现代社会人类学的先驱者。1873年出生于伦敦。19世纪末年，英帝国主义横行世界，已拥有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当时英国的学者为考察这些殖民地各方面的情况，曾组织各种科学远征队。塞利格曼于1898年，时年仅二十有五，参加剑桥科学考察队远征大洋洲的托里斯海峡，开创了人类学实地调查的学风。1904年又去澳洲新几内亚南部考察。1907~1908年偕夫人到今斯里兰卡研究维达人(Vedda)。其后三次到非洲的苏丹进行实地调查。他一贯主张各地民族的社会研究必须以研究者亲自观察为基础；他以身作则，

做出成绩。他于1910年被聘为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大学讲师，1913年为该校兼任民族学教授。1934年退休，1940年逝世。其著作有《英属新几内亚的美拉尼西亚人》（1910年）、《非洲的种族》（1930年）、《维达人》（1911年）、《尼洛特苏丹的异教部落》（1932年）。

塞利格曼这本《非洲的种族》受到学术界及一般读者的重视，不仅在其出世较早，成了有关非洲民族的标准读物，而且在于它能以最少的篇幅，最浅显的语言，叙述清楚最复杂的非洲民族概况。作者们最感困难的不在材料少而在材料多，不在题目狭而在题目宽。材料多则需选择取舍，题目宽则需提纲挈领。这就要考验作家的真功夫。塞利格曼在这本小书中，能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头绪分明，章法井然，非有卓绝的造诣，不克臻此。

此书是社会人类学入门开路之作，适合于一门学科初创时的要求。当时人们对世界各地众多的民族集团需要概括性的全面鸟瞰，对这方面的复杂现象摸出个要领。塞利格曼这一代学者承担了为这门学科奠基的任务。从这本小书里，我们这些后学的人应当注意前人怎样根据他们从实地观察中得到的体会，充分掌握当时已有的资料，对十分复杂的现象，分析整理，使其条理清楚，门类分明。塞利格曼在处理非洲民族情况时，果断地撇开了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过程中按其势力范围所划的政治界线，按照各地居民的语言、体质、文化的特征，结合其历史，对非洲各族人民划分为闪米特、含米特、尼格罗、班图等几个大类。这是科学研究上的分类，每类可以包括许多具体的民族单位，所以用“种族”一词称之。这个名词后来一般用来专称体质上的类别，比塞利格曼的用法，意义较狭。换一句话说，这本书的“种族”一词涵义是较广的，大体上等同于“同一起来源的一种人”，即自认为在历史上有血缘关系的许多具有在语言、体质、文化上相近特征的人。一个“种族”可以包括许多各有其名称的民族单位。

这样有纲有目，从复杂的现象理出了条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突出，形成了醒目的系统，提高了人们的认识。这种民族研究的方法至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至于当前民族学及社会人类学中所用的概念和名词同 50 年前比当然已有所发展，但在基本方法上还存在着密切的源流关系。这是我们必须理解和重视的。

塞利格曼主张的实地观察的调查方法为现代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以其本人来说，由于当时着重概况的叙述，实地观察也是以面为主，在他的下一代才发展以点为主的深入典型调查。但从他开始，那种依靠非专家搜集的见闻为研究资料的风气，在社会人类学中已逐渐少见了。

塞利格曼的受人推崇还有他为社会人类学培养人才的功劳。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者马林诺斯基等是他亲手选拔和教育出来的后继者。塞利格曼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任讲师时，在他的班上发现一个比他年轻 11 岁的奥籍波兰青年马林诺斯基，好学不倦，堪予造就。1912 年向该校当局提出资助其去非洲苏丹调查的建议，此事虽未实现，但历来为人所乐道，因为它表明塞利格曼有识人之能。1914 年马氏终于取得去澳大利亚实地调查的机会，而好事多磨，世界大战爆发，马氏系奥籍，以敌国公民受羁。塞利格曼为其奔走说项，并代请得伦敦大学及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研究补助金，向澳大利亚政府保举在当地土著居民中进行社会人类学研究。其关怀后进之情深谊重，为后世所推崇。1926 年创立非洲语言及文化国际学会，非洲民族研究得到了组织上的保证，而且广开才路，许多青年学子纷纷投身该洲的实地调查，蔚然成风。这本《非洲的种族》就是当时指导调查的手册。1927 年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设立英国第一个社会人类学讲座，塞利格曼推举马林诺斯基为首任教授。良驹得聘，功在伯乐。在 1940 年塞利格曼逝世之前，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已被公认为当代社会人类学的中心，非洲民族研究又是该校社会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创业

维艰，后继有人，哲人其萎，当可瞑目矣。

《非洲的种族》的译事既竣，把这书在社会人类学这门学科中的历史地位略述如上，亦所以表明为什么我建议把这本书翻译出版的原因。当然，这本书究系半世纪前的旧著，其所叙述的内容限于当时的知识，与今日相比自较陈旧，但是其基本的梗概却历久未易，益见其苍老可爱。至于近世非洲政治变革所引起的地名上的变化则是极多的，为读者方便，译文后附有对照表，可以查对（从略）。

1979年8月20日

中国的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的发展^{* 1}

感谢麦吉尔大学邀请我到加拿大来作柯明斯演讲，使我有机会和久已思慕的加拿大朋友们会晤。我不仅认为这是我个人的荣幸，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加两国人民友谊的表现。加拿大是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友邦。白求恩大夫亲自以他的生命所树立的国际主义的光辉榜样，已把我们两国人民的感情深深地融合在一起。这是我们进一步为了加深相互了解而进行学术交流的可靠基础。我今天能向加拿大朋友们报告一些我们中国人民自从获得解放以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民族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提出一些我个人的体会，向朋友们请教，我实在感到衷心的愉快。

在座的朋友们一定都知道，我国人民已经下定决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要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方面努力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这是一项艰巨的伟大任务。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有责任把自己的力量投入这个事业，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开展对我国的现代化能有所贡献的研究。我是学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多年来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在我的一生中亲眼看到少数民族社会的巨大变化。今天我想就中国的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的发展这个问题，介绍一些基本情况和我个人的体会。

我们中国人民在这个时候能够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我们

* 本文系作者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所作的柯明斯演讲，原载《民族与社会》，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是因为我们不仅有此需要，而且已创造了可能实现的条件，这些条件过去是不具备的。

中国在人类历史上原是一个在经济、文化上先进的古国，但是近代几百年里，世界上有些国家的民族首先是在科学技术上，随着在工农业生产上，赶过了我们。接着利用我们在国防上的落后，把我们置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在重重压迫下，中国人民过着屈辱的生活，当然谈不上科学技术的发展。经过 100 多年和国内的封建统治者、国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在 30 年前取得了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我们这古老的国家获得了新生，以平等、独立的地位屹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过了广泛的和根本的社会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当我们刚刚具备了向现代化进军的条件时，又遭遇到种种阻力，集中表现在几年之前才被粉碎的“四人帮”的反动逆流。历史上出现了一度曲折。中国人民扭转了这次逆流，鼓足干劲，正在迈开大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我们万众一心，大家明白，如果不在较短时期内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中华民族已获得的独立和自主是难于保持的，更没有可能为人类的和平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贡献，已成为中国人民一致的愿望。

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项艰巨的、创造性的事业。100 多年前，封建王朝也曾想通过购买洋枪洋炮来武装自己，采办机器来开矿办厂，但是这些并没有使中国现代化。我们也看到当前世界上也有些国家把现代化误解为“西化”，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来发展生产的同时，丧失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或引起了社会的失调和腐化，以致广大人民面临的不是繁荣和幸福，而是痛苦和失望。历史的教训，当前的借鉴，使我们深切体会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从中国广大人民利益出发，根据中国当前的历史条件，

结合中国社会的特点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今天就是想从民族这个角度来讲述中国的特点，在现代化过程里存在着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我个人的分析和看法。

考虑到在座的朋友们不一定都熟悉我们中国的民族情况，我想，有必要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这个从公元前 200 多年就已经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国家，存在着许多具有包括语言在内的共同文化特点的、自认为是出于共同来源并且同属一个共同体的民族。这些民族的先人在远古时代早就生息在我们祖国的这一片大地上。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已能证实，我国境内存在着最早的原始人的残骸、以及各地区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址。这些都说明我国现在这些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我们对这些历史的知识很少，甚至对当前各民族的知识也还不多。这主要是由于在过去我国的统治阶级执行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研究是个禁区；认真地对我国各民族的历史和社会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是从新中国诞生之后才开始的。所以我们所积累的知识还不够丰富。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究竟有多少民族，至今还在继续研究之中，到目前为止，可以确认的民族一共有 56 个，其中有一个是今年 5 月才正式确定的。

我国的 50 多个民族在人口数量上差距很大。其中有一个民族人口特别多，它就是汉族，在当前全国 9 亿多人口中，约占 94%。其他 55 个民族的人数加在一起只占 6%。因此这 55 个民族被统称作少数民族，各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又是有多有少。其中人口最多的是壮族，现在已超过 1000 万人。人口最少的是赫哲族，现在还不到 1000 人。

55 个少数民族中，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有 13 个；在 10 万人以上，不到 100 万人的有 15 个；不到 1 万人的有 10 个。这些数

字可以说明中国的民族有大有小，而且大小悬殊，但是尽管如此，现在我们已做到：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比如说，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里，不到 1000 人的赫哲族也有代表，他们有权和其他民族一起管理我们统一的国家。

少数民族人口虽少，居住的地区却很广，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50% ~ 60%。人数多的汉族主要聚居在我国东部的广大平原上，沿着陆地边疆，特别是北部和西部的高原、山区、沙漠、草地几乎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这种民族分布有它的历史根源。汉族的先人很早兴起于黄河流域，他们以当时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了经济和文化，逐步向广大平原扩张，并深入到凡是适宜于农耕的地区，并不断和当地居民相融合，形成了当前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如从族源来说，它也可能是血统最杂的一个民族。

当然，这并不是说，凡是汉族所扩及的地区，原来在这些地方居住的民族都被吸收成为汉族了。事实并不如此。即在目前，汉族聚居的地区里还是有少数民族杂居在内。许多少数民族大大小小的聚居区，星罗棋布地分散在主要是汉族居住的地区里。另一方面就是在高原和边区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区里，还是有许多汉人杂居在内。所以，我们很不容易画出一张详细的中国民族分布地图。各族大小聚居区里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穿插地互相重叠和交错，我们只能大体上说某些民族人多住在哪些地方。总的说来，主要是汉族聚居的省、市行政区内有 70% 的县里住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这些地区一共有 1000 万居民是少数民族成分。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只有新疆和西藏两个自治区里汉族是占少数。以上可以说明中国各民族在居住上是怎样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

从地理上看，凡是适宜于发展农业的地区大部分已成为主要是汉族聚居的地方。那些在农业经济上被视为荒瘠贫乏的高原、

山坡、草地、森林，至今还主要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在以农业为主的年代，可以说是汉族把地方占了，以致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不了，但是现在情况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正是地下矿藏最丰富的地方，广阔的草原正是最优良的天然牧场，亚热带的山区是橡胶等重要经济作物的产区，甚至高寒山顶上也生长着名贵的药材和珍禽异兽；秀丽的风景正是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胜地。这几千年来被人们所轻视的半壁江山，正是为今后现代化大发展准备下的大好基地。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前半句是指少数民族说的，后半句是指汉族说的。这两个半句加在一起，互补长短才构成中国现代化的有利条件。

少数民族人口少、资源多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一般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较慢，因而在中国的民族间存在着社会发展上的差距。

解放后不久，我参加中央访问团到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当时我就注意到各民族社会发展的水平很不平衡。解放前，一般情况是少数民族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比较重，所居住的地区土地比较贫瘠，所以他们的生活比汉族的劳动人民更为穷困。不仅已经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的那些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一般都落后于汉族，而且还有一些民族当时在不同程度上还停留在比较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解放初期，大约有 400 万人口的地区，包括西藏的藏族、云南的傣族、新疆一部分维吾尔族还保持封建农奴制度。大约有 100 万人口的地区，主要是四川凉山的彝族，还保持奴隶占有制度。此外，还有大约 60 万人口的地区，如以游猎为生的鄂温克、鄂伦春等族，和以刀耕火种的农业为生的独龙、怒、佤等云南边区的民族，还保持一定程度的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这些还保持比较落后的社会制度的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约 60 万。

这个特点说明了不仅中国整个经济和科技落后于世界的先进

水平，而且国内的少数民族还落后于我国汉族已经达到的水平。因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要消灭或者缩短两个差距：一个是我国和其他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一个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差距。这两个差距是互相关联的，我们要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必须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要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又有赖于提高全国的经济、文化。用现在在我国国内流行的一句话说：“现代化需要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需要现代化。”

自从新中国诞生以来，为了实现民族平等，我们在消灭或缩小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差距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其中最根本的是各民族的社会改革。社会改革就是改革各自原有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当时，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虽则已经推翻，但是各民族内部原有的各种剥削制度并没有废除，这些还是各民族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所以各民族改革那些旧制度，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消灭或缩小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上的差距的一项根本措施。但是社会改革却必须由各民族人民自己按他们社会发展的特点来进行。适用于汉族的办法就不一定适合于存在着前封建社会特点的民族。中国各族人民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要各自用自己的腿走。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早在 1951 年就指出：“各民族内部的适当改革，是各民族发展进步、逐渐跻于先进民族水平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但这种改革必须适合其本民族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必须根据其本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并采取妥善步骤，依靠其本民族干部去进行。”我们各民族的社会改革就是根据这个原则进行的。

在不具备这些条件时，即在本民族人民还没有自觉地要求社会改革，本民族还没有自己来执行改革的干部的时候，别的民族不能去越俎代庖，包办代替。我们宁可等待，在等待的时候，努

力去创造条件。事实上，西藏在 1951 年已经和平解放，而当时该地的藏族还实行封建农奴制度，这种落后的社会制度一直等到 1959 年才由藏族人民自己废除。在实行奴隶占有制的凉山彝族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地区 1950 已经解放，到 1957 年才进行社会改革，废除奴隶制度。

这条历史经验是十分重要的，在有关各族人民内部的事务上，必须严格承认民族这一条界限。民族是个具有相当稳定性的人们共同体，它的产生和消亡有它自身的规律，不由人们随意兴废的。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这是说，从历史上看，阶级和国家消亡之后，还有民族和民族差别的存在。

在当前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牢记这条经验，应当清醒地区别民族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和民族特点上的差别。我们要消灭的是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而不是民族特点上的差别。民族特点的差别固然也会发生变化，但绝不应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混为一谈。在进行各民族的社会改革时，我们着重提出要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和由本民族干部来进行；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有当地各民族人民参加。我们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不允许由外国人来包办，也不应当由某一个民族来包办。这是有别于当前有一些国家所进行的“西化”，也有别于某一些国家在现代化口号下，在国内实行大民族主义的“一体化”。

现代化和“西化”曾经引起过混淆。现代化是指利用人类现代所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来促进生产，提高这个社会的生产力，从而促进其社会、文化的发展。从近代人类历史看来，这些现代先进科学技术主要是西方世界的人民所开始创造的。他们对人类做出的贡献是不应磨灭的。同时必须承认，知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实质就是要使人类的先进知识为全世界的

广大人民服务。但是，历史是曲折的，西方国家的人民的发明创造却被西方国家少数人所垄断，用来为少数人服务，甚至有些西方国家还用来称霸世界，威胁世界和平，把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上显示出来的人类的伟大创造力引入歧途，使人类面临毁灭的危险。

由于历史原因，在科学技术及经济文化上没有充分发展条件的大多数国家，就是所谓发展中的国家，正面对着一个现实的矛盾：他们需要现代化，而得到的却是被西方国家的控制和奴役；他们要拒绝西化，却又怎样摆脱其落后状态？我们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人民就是要用自己的实践，闯出一条我们称它作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充分利用先进科学技术来发展我们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实现一个人类知识为人民服务的世界。

我们充分估计到，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由于存在着上述的两个差距，有可能出现在企图缩小国与国之间的差距的过程中，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国内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距。当前就有这种国家，某些民族利用其在国内的先进地位，垄断科学技术知识，进入其他民族地区来发展其经济。这些地区的现代化工业和农业是建立起来了，但是原来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民族却被排斥于这些新兴的事业，或者被剥夺充分地和平等地参加这些新兴事业的权利。结果不但经济受益上出现民族差距，而且在不同民族间也出现了城乡、工农、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上的差别。这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的民族不平等，导致新的民族问题。这是我们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前车之鉴，绝不能重蹈这个覆辙。

以上是说明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在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充分注意到民族这个因素，力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缩小、消灭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差距。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充分注意民族的因素原是新中国的优良传统。新中国诞生后不久，我们贯彻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保障了各民族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大事，决定民族内部事务的政治权利。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按其区域的大小分别成立区、州、县等级的自治地方。各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是中央及各级政府领导下的地方政府。他们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自治权利，包括决定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采取通用的民族文字为行使职权的主要工具，培养和使用民族干部，管理财政，发展经济文教，及制定适合于本地方的单行法规等。迄今，全国相当于县一级以上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基本上已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已有 5 个相当省一级的自治区，29 个相当于地区一级的自治州和 70 多个相当县一级的自治县。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保证了各少数民族在他们聚居的地方，按照本民族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适合于本民族、本地区的特点的改革和建设。上面我讲到少数民族社会改革时，已指出各民族曾采取了不同方法和在不同时期进行他们自己的社会改革，这些决定大多是通过他们各自的自治机关做出的。在社会建设上也是如此，不仅由上级政府规划的建设要照顾到各民族地区人民的利益，而且各自治机关可以在总的规划下，提出适合本地区的建设项目。这些基本原则当然适用于今后现代化的建设事业。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上面所提到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它不仅是地区辽阔，而且资源丰富，必然是今后现代化的发展基地。怎样根据他们的特点来进行发展是一个现代化事业中的重要问题。

在“四人帮”破坏我国国民经济中有一条值得牢记的反面教训，那就是抹杀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强制推行不适合于当地情况的经济措施，结果招致生产下降、生活贫困。我在 1978 年 12 月重访广西的金秀瑶山，那是我 1935 年开始社会人类学调查的地方。在 40 多年里，这山区瑶族的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变化，

真是“换了人间”。我今天不在这里多加叙述，要想提到的是近年来所受到“四人帮”的破坏。这里是一个茂密的林区，不仅出产大量木材，而且依靠森林，积蓄水土，四季不断的水流，灌溉了邻近七县的水田。“四人帮”不顾这山区的特点，强制执行粮食自给的命令，迫使山区居民无计划地砍伐林木，在荒瘠的山坡上种粮食作物，消耗了大量劳力，而收获很少，甚至还吃不饱。结果森林遭到破坏，水土流失，附近平地涝旱成灾。解放后2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被这批害人虫所摧残，人民的损失是严重的。从这个教训里使我们更清醒地看到了按照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来进行建设的重要性。“四人帮”被粉碎后，金秀瑶山也回到了正确的路线。在我去访问之前，一个较大的水电站已经投产，它就是利用当地的地理特点，山缘水流的落差，开发能源，不仅使山里的居民有电灯照明，而且推动了邻近各县工厂里的机器。这固然是一个小地方的例子，但其他地方也发生这种情形，东北大兴安岭的森林的破坏，影响了呼伦贝尔草原牧区的生产。所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注意当地的生态条件，来进行建设是促进我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则。

考虑到怎样迅速开发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的问题，我们不能不看到当前我国民族间在经济、文化方面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就是说，许多少数民族在这些方面还处于落后状态。很明显的是，如果不迅速改变这种状态，不是少数民族拖了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后腿，就是容易发生由汉族来包办，造成扩大民族间差距的后果。这二者都是要不得的，所以只有迅速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才是正道。

回顾我在上面介绍中国民族概况时曾指出，在中国有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其他民族为先进的汉族。在建立起了友爱合作的民族大家庭的新中国，这个人口众多比较先进的汉族的存

在，正是各少数民族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对汉族来说，对少数民族的无私援助不仅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且也是自身发展所必须承担的任务。

在新中国，民族之间先进帮后进，手拉手地向前走，是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如果不是这样，许多少数民族不可能在短短十几年里，废除落后的封建地主经济制、封建农奴制、奴隶制和原始公社制的残余，跨越一个或几个历史发展阶段和汉族及那些社会经济结构与汉族大体相同的少数民族一道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过程中汉族对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帮助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我国的经济从整个说来并不是繁荣富裕的，但是对我国的少数民族在财政上一贯是采取多给少取的方针。为了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教育，国家给予种种物质上的补助和规定种种特殊的照顾，一般较优于汉族。更重要的是汉族的干部、工人、教员、医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去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我在金秀瑶山访问期间，曾亲自和那些长期在山区工作的汉族及壮族干部谈话，许多现在在自治机关里的瑶族领导干部就是这些汉族和壮族干部一手培养起来的。那些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服务的其他民族干部，都有培养当地民族干部的任务，有些甚至规定要有了当地民族干部的接班人才能回到本乡工作。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分别承担遣派工人、教员和医生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服务的任务，派出的工人、教员和医生有责任培养当地民族的接班人。大城市的工厂、学校和医院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对口机关，扶助他们能由本民族人员独立经营和活动。西藏的许多工厂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汉族把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一方面体现了受到社会主义教育的人们为人民服务的自觉的精神，在进行这种精神的教育中，白求恩大夫是中国人民敬爱的教师；另一方面

由于他们认识到少数民族的发展是和我们祖国的安全和繁荣密切相关的，帮助少数民族也就是帮助自己。这种事实在现代化的过程里更容易认识清楚。离开幅员广大、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众多的汉族挤在有限的耕地上是没有远大的经济前途的。少数民族也很容易明白没有汉族兄弟们的先进知识、技术和劳动力，要开发他们居住地区的资源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汉族需要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需要汉族。周恩来总理曾总结这个道理成一句话：“合则双利，分则两害。”中国的现代化在客观需要上把已经团结在一起的中华各民族更进一步地结合了起来。

在前进的道路上，困难是不会少的。我们把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称作新的长征。这说明我们对于这条道路上的困难是有充分估计的，同时也充分表现了我们具备克服这重重困难的决心。

最后让我谈一谈少数民族发展上存在的问题。

看来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最严重的困难是在怎样迅速提高他们科学文化水平的问题。不具备相当科学文化知识就学不会现代生产技能，也就谈不到参加现代工业和农业。要提高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先进的汉族固然要出力帮助，但主要还是要靠少数民族广大人民自己的努力，而他们原有的文化水平，对他们能否迅速提高也是重要的条件。

我国少数民族除了少数在文化水平上和汉族不相上下，如回族、满族、壮族、朝鲜族等之外，绝大多数是比较落后的。在解放前只有17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其中能作为一般交际工具的尤属少数。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只能通过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字来获取文化，所以他们本民族的分子是很少的。解放后，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宪法规定各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并由语言学者提出了一个供各民族采用的共同的拉丁化拼音字母方案。依据这个方案，任何民族的人都可以用这些字母

拼写自己的语言。但是由于各民族一般都有方言的差别，这样拼写出来的并不是一个民族通用的文字。经过语言学者的调查研究和本民族的努力，解放后有 10 个民族创造了新的文字，但是其中有些民族的新文字还未能为群众所通用。现在还有一半以上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这些大多是人数较少的民族，总的说来占少数民族中的少数，但是有语无文的问题不解决，这些民族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是极为困难的。

为了迅速提高少数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对少数民族语言问题必须加强研究工作，并且应当总结过去 30 年来的经验教训，找出一条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有效的道路，从当前的具体情况出发，在已经有文字的民族中，必须大力通过其本民族文字作为提高民族文化的工具，在使用中改革和提高民族文字，使其能承担促进现代化的工具，在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同时，还需要创造在自愿基础上学习其他先进民族语言的条件。至于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在创造本民族文字的同时，更有必要利用其他邻近民族的语言为提高水平的渠道。在现代世界里交通工具的现代化使得不同民族人民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语言的差异已成为一个社会生活的障碍，而目前比较普遍的解决办法，似乎不是向形成一个世界统一语言的道路发展，而是出现越来越多能说多种语言的人。这种情况对我们处理国内民族语言问题时是有启发的。我们能够一方面坚持宪法所规定的各民族人民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一方面加强各民族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以加速各族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提出了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上面所提到的语言问题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为了要更好更快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这些负有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社会责任的科学工作者深切感到自己的任务重大，而现有的知识远远落后于国

家和人民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在决心加倍努力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衷心希望能有机会向国外的先进的科研工作者学习，并得到他们的协助。我抱有这样的希望来到白求恩大夫的故乡，我相信我这个希望是一定会得到满足的。

1979 年 10 月

四十三年后重访大瑶山

—

不久前，我又来到了我国南部边疆广西的大瑶山。旧地重游，离开我作为学人类学的学生初访瑶山学习进行民族调查为时已有43年了。今昔对照，感慰万千。所见变化之大，我只能用四个字加以概括：换了人间！

世代居住在被蔑视为化外之区的大瑶山里受尽民族压迫的瑶族人民，在1952年已经建立起金秀瑶族自治县。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后，最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之一。今天这里出现的崭新面貌，无处不在证明，在人民中国，任何一个民族，不论大小，不论原来文化水平的高低，一旦摆脱了阻碍着它进步的一切剥削和压迫势力，在亲密团结的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都能飞跃前进，在几年、几十年里走完其他民族曾经走了几百年、几千年的路程。

瑶族在旧中国是一个被歧视的少数民族，在很早的年代里就被撵入了南岭山脉的高寒山区。据说，他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还定居在长江中游的洞庭湖一带的平原上。但是这个具有强烈反抗压迫传统的民族，拒绝反动统治者强加于他们的徭役，宁愿进入深山老林，靠双手开辟自己的家园，保卫自主的生活。有人引用最早见于汉文史书《梁书》里的用来称他们的族名“莫徭”（不受徭役的意思），来作这个说法的佐证——尽管史学家对此不尽同意，但是瑶族不断受到历代反动统治者所实行

民族压迫政策的摧残而被撵入高寒山区则确是事实。

打开地图一看，这段历史也就不言自明。桂东的大瑶山是处在柳江和桂江之间的一个大约 2300 多平方公里的高山区，海拔最高达 1900 多公尺，四围却是平原或丘陵地带。山区边缘尽是几百公尺的陡坡悬崖。我 1935 年初次进山全凭步行，连骑马都不便。老林密箐里的羊肠小径，野草蔓生，不辨道路。我自己就是由于迷路，误踏捕虎陷阱，受伤难行。前妻单身下山觅援，在急流中失足丧生。这固然是偶然的不幸事件，但是瑶族人民世代代就是依赖这种险阻才能孤立自保的事实却并非历史的偶然。整个南岭山脉，东起广东，经广西、贵州进入云南的横断山脉直到印支半岛，高山峻岭里，若断若续地可以见到绵延不断的瑶家村寨。桂东的大瑶山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桂东大瑶山这片幅员较广的山区，高峰插云，山岭起伏，有几条急流从中心向四方外泻。其中最大的是经象县流向柳江的金秀河，自治县即以此得名，称金秀瑶族自治县。沿河有些较平坦的小坝，可以筑田植稻。解放初全山区的水田不过 1300 公顷。大多数瑶民在高山上，刀耕火种经营广种薄收的旱地作物，面积约有 6600 公顷，而粮食生产却极有限。当时全山区的人口约 2.6 万人，其中瑶族约占 1.8 万人。这个较大的瑶族聚居区的人口实际上只占当时全广西瑶族人口近 50 万中的 3.6%，或是全国瑶族总人口的 2%。这就可以见到瑶族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了。广西瑶族分散在 60 多个县里，多的县有十几万人，少的只有几千或几百人。而瑶族的村寨一般都相隔几个山头。即在大瑶山这个聚居区里，当年我步行入山时，常常一天只能从一个村寨走到另一个村寨。

分布得这样广，又这样分散的瑶族，在语言、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甚至服装上都存在着显著的相互之间的区别。根据这些区别，人们用各种不同的名称来称他们，瑶族中不

同的名称全国多至几十种。以桂东大瑶山而言，就有被称为茶山瑶、坳瑶、花蓝瑶、盘瑶、山子瑶五种。

这许多瑶族集团之间的关系过去也是相当复杂的。在大瑶山里上述的五种瑶民中，前三种分别占有一部分山岭，包括土地、森林、飞鸟和河水，所以他们又统称为山主瑶，或又因为他们的男子过去都留着长发在头顶打一个髻，所以又被称为长毛瑶。他们住在沿河较平的坝子里，以耕种水稻为主。因此他们可以世代定居在一个地方，用土木结构建筑经久的房屋，聚居成比较密集的村寨。每个村寨大多有几十户人家。后两种不占有瑶山里的土地，他们只能向早已定居在这山区里的山主瑶讨山地经营以刀耕火种为主的原始农业。他们每年要向山主瑶交租和服劳役。他们过几年又得抛荒另开新地，不能定居，必须经常迁移，只能居住在简陋的竹棚里。他们被称为山子瑶或过山瑶，表示他们既没有土地又是居处不定的瑶民。过山瑶在严重的剥削下，生活贫困。我初访瑶山时曾住过他们的竹棚，晚上墙缝里寒风袭人。他们吃的是包米和野菜，全家很少有一床完整的棉被，成人连衣裤都不全。

同是被称为瑶族的不同集团间存在着这种不平等的情况，不免使人推想到这种现象是出于入山先后的原因。后来陆续入山的人们只能在荒山上进行原始的农业生产，受到已经占有较好土地、聚众成寨的集团的排挤和歧视。天上的飞鸟，水里的游鱼都属于山主瑶，过山瑶不准打捕。甚至在山主瑶的村寨的路上，过山瑶都不敢昂首阔步而过。

瑶族集团间的这种不平等，也促使山主瑶本身发生了阶级分化。山主瑶原本有一种传统的石碑制度。一个或几个村寨组织成一个集团，树立一块石碑。石碑上用汉字刻上一些要成员共同遵守的规定，其内容是保卫本集团的利益和特权，维持集团内部的社会秩序和风俗习惯，和对违背这些规定应受的处罚等等——看

来这是一种社会公约。每个石碑集团公推一个头人来执行公约上规定的纪律，最初也具有原始民主的性质。在这些小集团的基础上，一层层构成较大的集团，称大石碑和总石碑。总石碑包括了整个大瑶山的瑶族。总石碑集团的头人，过去就被称为“瑶王”。至于这些较大的集团怎样联合起来的问题，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从长期的历史上看去，这种组织在保卫瑶族的生存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石碑制度却也固定了瑶族的内部山主集团和山子集团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和许多落后的风俗习惯。而且，名义上由群众推选的头人，取得了征收山子瑶地租和徭役的权力，大多把特权据为私有，用以自肥，在山主瑶中间出现了少数剥削别人的人。这些人掌握了比其他瑶人更多的财富，使山主瑶中间也发生了贫富分化。在贫富分化的过程中，山主瑶集团本身发生了有一些贫穷的山主瑶向富有者租田耕种的情况，在瑶族中产生了封建制度。这些头人也成了本集团的封建地主阶级。

旧瑶山里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就是这样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山内外存在着瑶族和汉、壮的民族矛盾，山内存在着山主瑶和过山瑶之间的矛盾；虽然其实质都存在着阶级矛盾，而这里的阶级矛盾却都通过民族矛盾的形式起着作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却落实在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上，就是几万个瑶族人民被围困在这个高寒的大瑶山里过贫困落后的生活。这历史事实至少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上，最近在金秀县府附近林区里发现了唐代（公元618~907）钱币，此说如果得到证实可以说明很早的时代已经有人从山外入居此山了。这段漫长的历史进入尾声的最后几十年却经过一段激烈斗争才宣告结束。这段结尾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

在40年代以前，汉族的统治阶级对瑶族的民族压迫尽管怎样严重，统治势力始终没有直接进入瑶山，也就是说大瑶山里的瑶族尽管内部有种种矛盾，始终保持它作为一个共同体，抵住了

外来的直接统治。到了 40 年代，统治广西的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停留在这个界限上，而采取了所谓“开化政策”，对省内的少数民族实行直接统治，派汉族官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武力镇压。在桂东大瑶山先后成立“警备区署”和“设治局”，把全山区划成七个乡，分别隶属于七个县，以便“分而治之”；并且利用瑶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勾结瑶族本身的封建地主，加封为乡长，作为统治工具。这些措施，暴露了长期被民族矛盾所掩盖的阶级斗争。在大瑶山里初次发生了过山瑶的抗租斗争，一直持续到解放。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广西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妄图退守大瑶山，等待变天。1950 年大瑶山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武装占领下，受尽了折磨。这些反动军队无恶不作，到处打家劫舍，抓兵派粮，抢钱夺女，害得瑶族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真是一场浩劫。直到这年年底，解放大军上山进剿，和瑶族人民并肩合力，经过三个月的战斗，终于把国民党残余部队全部肃清，使瑶山人民重见天日。43 年前我在大瑶山所亲眼见到的这一章历史到此结束，一去不复返了。我这次重访瑶山，瑶山历史的新篇已经写了 27 年。我带着 43 年前的记忆入山，面对这 27 年瑶族人民所写下的新篇怎能不发生“换了人间”的深切感受呢？

43 年对个人的生命来说并不是一个短促的时间，由壮年进入了老年。这次我来广西提出重访瑶山的计划时，不但听者觉得有点意外，连我自己也为下这决心经过一番犹豫。年近七十的躯体还能爬山越岭干年青时代的事吗？

这种犹豫其实完全是多余的。瑶山已经发生了巨变。这个巨变也许就可以从此说起。这次进山，我乘坐舒适的国产上海牌小卧车，从广西的首府南宁直达 43 年前我始终没有达到的目的地：大瑶山的中心——金秀，一共只花了六个小时。这和我过去步行

爬山相比，真有隔世之感。

我们到达金秀已是傍晚，稍事休息，推窗一望，金秀河两岸，灯光点点，有如满天星斗。我有点惶惑，这是我到过的大瑶山吗？主人拉亮了我室内的电灯，并对我说：“我们水电厂发的电用不完，成了个有待亟须解决的问题。”原来，金秀的中心发电厂投产已有一年多，有两台机组，每台发电 1600 千瓦，由于县里用电量不大，现在只有一台在发电，一台还停着未用。而且实际上由于山岭起伏，山涧急流到处都有，许多生产队都可以用水发电，现在很多已有了自己的小发电机。后来，我们去参观了那个中心发电厂，仰首一望，压力管高高地从山顶上一线下垂，落差有 680 米。这样的发电条件是罕见的。大瑶山只凭这一个优越条件，就具备了实现现代化的大量潜力。

在这次重访瑶山的日子，我常常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所见的是实情还是梦境。43 年前，就是这个大瑶山，一到天黑，黑洞洞的屋子里，只有火塘里的火焰，给你一些照明，如果有必要就得点燃松明（松脂成分很高的松木片，用来点燃照明），这股香味固然好闻，但满屋的黑烟使人眼睛都酸得睁不开来。当时我们带着的手电筒竟成了聚集孩子们围跟的信号。而现在家家有电灯，队队有电影，社社有电视，甚至在计议推广电炉以节省用来当燃料的劈柴。

大瑶山得天独厚的何止发电潜力这一桩？这层峦叠翠的千峰万岭又是个育林取木的聚宝盆。第二天，我被汽车载到了海拔 1400 公尺的林场上。茫茫林海，一望无际。突然在我们的头顶上空，一大捆木材从天而降，落到公路边的木堆上，原来从金秀河里取来的电力正在为伐木工人服务呢！过去，一根成材的木料，要多少人扛着走几天才能运到山外，现在成捆的木材可以由这钢丝吊车从林场提到公路上，装上卡车，运出山外，每年为国家提供了大量木材。而且，瑶族人民也开始用这些木材作原料发

展了用机器生产的新工业。即以他们用废料生产的纱锭子来说，竟能供应广西许多纺纱厂的需要。这些工厂目前的规模固然还不小，但在“木材加电力”这个题目下有多少文章可以写得出来！我真难以设想再过10年，这个山区会变成什么样子。

二

当晚，我和金秀瑶族自治县的两个领导人，县委书记莫义明和副书记黎升平，一起围坐在融融的炭盆旁边闲谈瑶山的巨变。54岁的黎升平是邻县的壮族，1950年这里第一次建立人民政权时，他就是金秀领导人之一。他领导建设大瑶山已经28年了。40岁的莫义明是解放后培养起来的瑶族干部，毕业于中南民族学院。后者实际上是前者一手带出来的，然而今天后者羽毛已丰，被前者推到第一把手的位置上主持着全面工作。他们两人，莫爽直利落、幽默洒脱，黎则浑厚稳重、情深语简。他们相辅相成，亲如兄弟，真是一个搭配极好的班子。

其实，从这两个人的身上就可以看到引起瑶山巨变的民族政策怎样落实的具体过程。民族政策里主要的一条就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用少数民族都懂得的话来说，就是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管理民族内部的事。实行了这个政策，才能达到民族平等、团结和进步的目的。在大瑶山里的那样长期受到民族和阶级压迫、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的瑶族人民要自己当家做主，发展成为一个先进的民族，首先需要摆脱重重的民族和阶级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全凭本民族的力量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历史上不断发生过瑶族反抗压迫的运动，而这些英勇的斗争，总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且以失败告终。最后则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团结了各民族的人民，才有力量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具体到大

瑶山来说，就是这样才能把盘踞在山里的反动的残余势力彻底肃清的。瑶族人民从切身的经历里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这条真理。

少数民族要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同样要通过和其他民族团结一致的努力。在平等团结的民族大家庭里，先进民族有责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援后进民族。具体地说，在大瑶山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须有各先进民族干部的参加。事实上，当瑶山解放的时候，瑶族的党员只有少数几个人，要在民族关系、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大瑶山里建立起以瑶族为主的人民政权，必须有有经验的各族干部参加领导机构起辅导的作用。老黎是壮族，他是当时县委常委之一。当我们正在和老黎讨论瑶族干部成长过程的时候，真是巧合，推门进来了一位当时县委的另一常委。这位从外地来的客人是汉族，出生于东北，解放时作为南下工作团的成员来到广西，被派到瑶山来工作。他一听我们谈话，就插嘴说，他入山之初，领导上交给他的任务是要在三年里培养个瑶族的接班人，才能出山。而事实上，他在瑶山工作了20多年，在这期间他确是培养了不少瑶族干部。他指着莫义明说，他当时还是个小伙子，现在长成了，挑起我们的担子了。

他和老黎一起回忆成立瑶族自治县时，领导干部中只有1个瑶族，而现在9个领导人中有瑶族6人、壮族1人、汉族2人。当家做主的瑶族干部就是这样由汉族、壮族的干部亲手培养起来的。说到这里，这两人相视微笑，微笑中充满了胜利完成任务的愉快。

大瑶山物质上的发展，也是由外面支援所促进的。以上面提到的中心发电厂来说，机器是东南沿海福建省造的，经费是由中央规定对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中拨给的，设计是由广西自治区派人来搞成的，瑶族的技术人员也是在南宁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老黎说，如果这不是一个民族自治县，那就享受不到这样的照顾

和补贴。早年本县的财政收入还不及中央的各项补贴和实物配给，而财政收入的增加也来自由中央补贴而发展起来的企业收入。

这样说来，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发展既然可以依赖先进民族干部的支援和中央财政的补助，继续这样搞下去，不行么？老黎摇了摇头说：“不能这样。瑶山里既然以瑶族为主，那就必须有更多的瑶族干部来参与这地方政权的领导工作，这样才能实现各民族当家做主的基本政策。同样一句话，由本民族干部去讲，群众就信得过，落实得快。民族区域自治的好处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清楚。至于少数民族地区在物质上、文化上要先进民族的支援，那是必要的，但是也必须看到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参与和努力，这地区的建设也是办不好的。而且这地区的发展，对我们国家全面的经济发展也有重大的贡献。这个山区的电力和木材如果大力发展起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取之不竭的源泉，有益于全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番话出之于在瑶族地区工作了近30年的壮族老干部之口是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经验总结，值得我们珍惜。

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建立和发展很明显地标明了瑶族在政治上取得了和其他民族平等的地位，但是瑶族内部不平等的关系是怎样消除的呢？这个问题引出了一段大瑶山解放后动人的历史。

1951年，中央派遣的民族访问团抵达大瑶山，对大瑶山的民族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了解了山主瑶和过山瑶之间的矛盾。通过采取协商的方式，建议双方订立“团结公约”，并用原有石牌制度的形式，把公约条文刻在石牌上，各族代表以瑶族最隆重的仪式，在石牌面前喝了鸡血酒，表示坚决遵守。团结公约的内容主要是放弃特权，自由开荒，减租减息。当时瑶族一致说“汉族和瑶族都讲平等了，瑶族内部怎能不讲平等呢？”团结公约是团结瑶族的及时和有效的措施，通过这个公约之后的几年里顺利地处理了各项重大的民族纠纷案件有1600多件，大大加强了民族团结。

但是团结公约并没有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所以并没有根本上解决民族间的矛盾根源。1954 年开始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占有的土地，分给了近 2000 户无地少地农民，实际上解决了山主瑶和过山瑶矛盾的经济基础，因为瑶山里所有的地主都是山主瑶，而无地少地的农民大多是过山瑶。经过团结公约的订立消除了民族隔阂。经过几年的宣传教育，瑶族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山主瑶的群众明白了从歧视过山瑶中得到利益的只有山主瑶中的少数人，过山瑶的贫穷落后就是过去被这些少数地主们利用了传统的石牌制度进行民族歧视所造成的。废除封建特权是山主瑶中的佃农和过山瑶共同的要求。掩盖阶级矛盾的民族矛盾的盖子一旦揭开，不同支派的瑶族间的团结也就在阶级的基础上更加巩固了。

在大瑶山里，土改之后紧接着就实行合作化。生产所有制的变革又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团结。在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里，提出了“欢迎过山瑶下山”的口号。许多住在高山上的过山瑶搬到河边来，由原来的山主瑶划出一部分水田给他们耕作。历史上已经有千百年过着在山顶上不断迁移和散居的过山瑶，开始定居了下来，聚居在一个村寨。他们一方面感激让出水田给他们的原来的山主瑶的无私协助，加强了相互间的亲密情谊，另一方面在新的基础上鼓足干劲开辟水田和旱地，在短短的 20 多年中创立了和其他瑶民同样富裕的生活。

我们亲自去六拉大队访问了这样创立起来的奋战生产队，这个生产队有 20 多户人家，大多是过山瑶。他们是 1958 年从金秀河河源、海拔 900 多公尺的深山老林里搬下来的。当时该地的山主瑶划了 1.4 公顷水田给他们，住定之后每年开水田，现在已有水田 4 公顷。最初他们粮食不够自给，每年要购入近 3000 公斤，而现在不仅每人每年的 300 公斤口粮，都是自己生产的，而且还交售给国家粮食 5000 多公斤。在我们访问这个生产队时，大多

数的社员都在村外劳动，接待我们的是一个老年的退休干部，汉人。他在瑶山里工作了多年，自愿安家落户，继续帮助瑶族发展起来。他虽则已经年老不能经常参加劳动，但在这个新建的过山瑶的村寨里当参谋、出点子，为瑶族人民服务。他对这个村子里每一户、每一人都熟悉。讲起这村寨的生活时，有多少家有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甚至有多少人有手表，都能扳着指头计算给我们听。这些都是过山瑶过去看都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他乐呵呵地说：“过山瑶定居了，住上了瓦房土墙，不再过山了。”从原始的刀耕火种进入了定居农业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他们确是越过了人类经济发展上的一道门槛。

像我们所看到奋战生产队一样的由过山瑶定居而形成的新村寨，在金秀一共有几十个。当然占大瑶山瑶族人口一半以上的过山瑶还没有全部定居下来，但是已经向这个方向跨出了很大的一步。

为了了解大瑶山经济面貌的变化，我们访问了不少人家。过去种水田、生活比过山瑶较为富裕的山主瑶，现在的生活当然比上面所说的定居不久的过山瑶更好些，一般可以说和山外的汉、壮的农民的水平不相上下。

如果以全县来说，有一些基本数字足以说明这个山区经济面貌的变化。1958 年粮食总产量是 807 万公斤，1977 年达到 1274 万公斤，增长 58%。有一些种水田的大队，已连续几年亩产超过 500 公斤。工业方面，此地解放前是一个“只闻百鸟音，不知机器声”的深山僻野，解放初期才建成了一座小小的火力发电厂，就算是瑶山唯一的工厂。经过 20 多年，到 1977 年已有了农机、纺织、化工、印刷、汽车修理、造纸、粮食加工等 10 个厂，总产值比 1957 年增加了 13 倍多，发电量由 1957 年的 18500 度增长到 1977 年的 2195600 度。

工农业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商品零售额 1957 年为

98 万元，1977 年达 413 万元，增长了 321%。财政收入相应地增长了三倍多，民间的储蓄增加了五倍。

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1957 年全县只有 1 所中学，88 所小学，到 1977 年已有中小学 327 所。解放前瑶族人民根本没有见过电影，1951 年中央访问团初次在瑶山放映电影时，有些地方还发生过“影中枪炮响，观众全吓跑”的事情。而现在每个公社都有电影院，各大队有电影队，在农村巡回放映，每星期人人都有机会至少看到一次电影。金秀县的文工队，发展了瑶族传统的音乐舞蹈，他们所创作的节目，多次在全省和全国会演中获得优秀的奖评。在我们这次访问期间，我们有机会欣赏到他们动人的表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也参观了金秀的人民医院，那是 1956 年成立的，现在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都有了医疗卫生机构。1956 年全县医药卫生人员有 57 人，1977 年已增至 203 人，其中本县少数民族占 67 人；全县生产大队合作医疗站有赤脚医生 106 人；生产队有卫生员 448 人，另外还有 328 个接生员。我初访瑶山时曾经特别注意由于土法接生所引起的婴孩死亡率高得惊人，而现在这种不卫生的土法接生已经基本消除了。

以上这些数字应当足以证明我在这次重访瑶山中深切感到金秀瑶山“换了人间”的印象了。但是这只说明了今昔的对比。如果把当前大瑶山的面貌来同我同其他先进的地区相比，它还是落后的。如果再看一看这个山区所蕴藏着的经济上的潜力，那就更使我们感觉到当前的成就只是伟大前景的初步起点。

那位年轻的莫书记，不仅是个不知疲劳的人民勤务员，而且是个富有想象力的诗人。他一点也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他打开地图指给我们看，许多已经在图上画好的公路还没有完成。他一再向我们抱歉，由于公路还没有修通，以致我不能去访问我 43 年前住过的花蓝瑶的村寨。事实上，现在金秀全县七个公社的中

心都已可通汽车，但是许多还得绕道外县的公路才能到达。全县以金秀为中心的公路网还没有建成，这就给金秀作为一个民族区域的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限制。一旦交通建设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金秀自治县境内大部分的山区的林木和土特产也就能跟着大大地发展起来。

在这里，我也不能不提到，过去的一些年头，在金秀这个民族地方，由林彪、“四人帮”干扰所造成的危害。其中的一条就是抹杀民族山区的特点，强迫命令这个以森林为主的山区也必须粮食自给。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林木破坏，水土流失，附近七县农田所依靠的水渠干涸，农林两敝。就在我们所住的招待所对面的山坡上就可以看到，原来是郁郁葱葱茂盛的林场，现在已成了一片一年也收不到多少粮食的半荒芜的所谓旱田。

估计被毁的林区已达 3300 公顷，损失了大量木材。由于许多劳动力集中用在广种薄收的旱地耕作上，原来山区有名的经济作物茶油、桐油、香草、菌类就无力兼顾，农民收入受到很大的损失。林木的毁坏引起更深远的危害是水土流失，附近各县发生雨季闹涝、旱季河涸的严重灾难。

这些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国民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现在已经刹住，而且正在拨乱反正，要把已经受到的损失在今后的几年里夺回来。

今天，当全中国人民都已走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征道路上的时候，像瑶族这样起点较低的少数民族，不免会遇到比其他兄弟民族更艰巨的考验。但是从千百年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反动势力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瑶族人民，历来在困难面前没有低过头。这个勤劳、耐苦的民族一定不会辜负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个大好机会，紧密团结在有 50 多个兄弟民族的平等友爱、合作、互助的大家庭里，它的光明的前途是有可靠的保证的。

当我们在金秀边界、大瑶山麓、水力发电厂的门前和送我们

出境的黎升平同志握手告别时，他仰首看着从山间几乎垂直下降的压力水管，向我说，“你再来的时候，这里的发电量可以超过1万千瓦了，那时瑶山的面貌又会不同了。”

1980年1月

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1}

在这样一个时刻，千里迢迢，远涉重洋来到这北美胜地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学会给我今年的马林诺斯基纪念奖，我的心情已经超过了寻常的欣慰和感激。这一时刻把我带回到了42年前我和我的这位在我这一生的学术事业上打上了深刻烙印的老师分手时的情景。他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把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继续下去。他对我们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怀着深厚的同情和爱慕，具体地表现在他对我们这些中国学生的那种诲人不倦、关怀体贴的教育上。他期望他所创导的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能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园地里作出可能的贡献。可是时至今日，就我来说，岁月飞逝，成绩安在！在这一时刻，要我来接受以纪念他的名义授予我的荣誉，除了深深地感到惭愧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更使我不安的是在这位老师的巨星陨落之后不久，世的变化使我和海外同行长期阻隔。今天又能欢聚一堂实属喜出望外，但试问我能带来些什么来奉赠给久别重逢的老友呢？如果朋友们容许我冒昧地利用这个讲台来叙一叙我个人这多年从事社会人类学或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经历和体会，我将感激你们的宽容，这种私人间的恳谈其目的无非是在疏浚那一度被堵塞的思想渠道，为今后的切磋砥砺扫除一些障碍。但愿别久增情谊，枝异见新妍。

回想起来，我师事马林诺斯基教授为时不久，只有两年，从1936年到1938年。我就教于他的门下并非出于偶然，实有我内

* 本文系作者在美国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奖的大会上的讲话。
原载《民族与社会》，人民出版社1981年。

在的原因。这些原因中首先可以提到的是我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动机。我在《被土地束缚住的中国》（1944年）一书的导言中有过一段自白。当时作为一个30年代的中国青年，处于民族和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很容易意识到个人与社会集体的密切关系，而觉悟到不解决民族和国家的前途问题也就谈不到个人的出路。要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变动的时代里心安理得地做一个自认为是意义的人，当时像我一样的那些青年人，开始认识到必须对我们所生存在其中的中国社会有清楚的理解，因而要求摸索出一条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的道路。

今天我一上来就提到我这一生学术活动的出发点可能是恰当的。因为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是矢志于应用人类学这一项学术事业的人。我早年所追求的不就是用社会科学知识来改造人类社会这个目的么？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荣才需要科学，毋须隐瞒或掩盖我们这个实用的立场，问题只是在为谁实用？用来作什么？我们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科学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抱着这个目的，这些要学到一些能改造社会、为人民服务的有知识的青年人不能满足于当时学校里、课堂上所传授的有关中国社会的书本知识。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跑出了书斋，甚至抛开了书本，走入农村、城镇等社区去观察和体验现实的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本身归根到底是一切社会知识的来源，这一认识开动了当时的一些青年人的脑筋，开展了当时被称作“社区调查”的这项通过实地观察和体验社会生活来了解中国社会的学术活动。

这种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对当时的青年人是有吸引力的。我就是提倡和实行这个研究方法的积极参与者。但是通过实地观察体验得到的许多资料怎样去整理、分析、解释以达到认识中国社

会的目的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找到了马林诺斯基教授的门上。在这位老师的指导下，我把去英国前在我家乡一个农村里所记下的调查资料，整理和编写成《中国农民的生活》（1936年）这本书。这本书是实践上面这段话的一个试验。

我这位老师主张到活生生的人们社会里去研究人类社会，这是很早就闻名于世的。这正是我不远千里求教于他的吸引力。早在1926年，他在纪念他的老师弗雷泽的著名的文章《初民心理中的神话》里已经写下这样号召：“我将邀请读者们走出关闭着的理论家的书斋进入人类学开阔的园地里的新鲜空气”。这种人类学开阔的园地里的新鲜空气就来自他自己多年和当地居民生活在一起的大洋洲的一群名叫特罗布里恩德的小岛，一个和我们自己的社会一样充满着悲欢离合、动人心魄的戏剧般的人生的舞台。我并没有问过他，什么动机驱使他背叛了他前辈那种闭门冥索的经院派传统，去开创一个当时不免令人侧目的非正统的学派。对于像我这样从改造社会出发而追求科学的社会知识的人来说，他的这种主张似乎是不成问题的自明之理。也正是因为这样，长期以来使我对这位老师在人类认识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自觉上所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没有能予以充分的估计。最近，重读他早年的一些著作，才体会到他同当时统治着人类学领域的传统观点决裂是一个多么值得我们后辈敬佩和学习的榜样！这一个决裂，我觉得今天在这里提出来，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我认为这一突破在根本上为应用人类学破了土、奠了基，使他能够在1938年果断地宣告“人类学一定要成为一门应用的科学。”

他号召人类学者到过去一直被认为是非我族类的野蛮人的原始社会里去参与他们的生活，进行观察和体验。这不只是人类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为历来被侮辱为还不够人的标准的那些“野蛮”、“未开化”的化外之民恢复了人的尊严和地位。在他这枝文质并茂的笔下，又生动又令人信服地使读者理解到了

人类的集体生活尽管形式上多种多样，但是根本存在着一致的共性。当前地球上各地的居民，尽管由于地理与历史条件的差别，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有所不同，所采取的生活方式有所殊异，但是他们都是人，都具有人所共有的文明创造的才能，都具有发展进步的资质。他们都是通情达理、有思想、有感情的人。把人和人、民族和民族之间划下具有质的差异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完全出于一些人的偏见、臆度或别有用心，和客观事实绝不相符，所以是不科学的。不幸的是，过去的人类学的传统中充满了这一类不科学的偏见，而这些偏见一般又以道貌岸然的学者衣冠为掩饰。与这些不科学的传统相决裂，需要勇气和才能。我感到幸运的是我所师事的这位老师不仅具备了这些条件，而且及身看到，由于他不断的努力，这门曾经为那些屠杀、欺侮、剥削、压迫各殖民地人民的暴主们提供理论根据的人类学开始转变成为一门为建立一个民族平等的世界，为各族人民发展进步而服务的学科。在今天这个应用人类学者的集会上，回溯一下这个学科，也许并不是多余的，尽管新一代人类学者或者会认为人类社会文化的基本一致性已是自明之理，世界上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必然要实现的前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在这里只需要向他们提醒一下，这种基本认识的确立是得来匪易的。我们不仅要珍惜这些信念，而且要对前人留给我们的遗业作出充分的估价。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应当承担起当前历史给我们的任务。也许我们还需要有比前人更大的勇气和才能，才能真正地实现一个能使科学知识完全为人民服务的世界。

我们必须看到，科学本身是一定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它既对社会文化的其他部分发生着推动和限制的作用，而其本身也受到其他部分的推动和限制。研究人的科学，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和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结合得更为密切。所以我们对一位学者的评价绝不能忽视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在的社会

在这时代里所处的地位。我们既要从小他的具体处境里去理解他在推进时代前进中所起的作用，而同时又要看到他受到时代所给他的局限性。

我这位老师所处的时代和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崭露头角的人物，而现在离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已有 30 多年了，其间已超过半个世纪。当今虽然我们还依然生活在新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下，世界上还存在着各种称霸的强权，大多数民族的人民还在受贫穷和饥饿的折磨，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还作为胜利品来瓜分的殖民地现在在世界地图上并不能公然出现了。这个变化对我们这门学科不能不说是相当重要的。因此回想起我那位老师当时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情况，我们也就应当忘记那时的殖民地制度所给这门学科的烙印。

当时的人类学者总是把自己的研究领域限制在殖民地上的被统治的民族。现在看来这未免是人类学者的自我嘲弄——把自命是研究人的科学贬低为研究“野蛮人”的科学——而在当时，还不过是一代人之前，却是金科玉律。这种传统曾使我们这位号召走出书斋去研究人的青年也只能走到那些受着异族统治的殖民地上去。更不幸的是在殖民地上被统治的居民的眼中，前来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寻根问底地到处观察的外来者和统治他们的人是属同一族类。殖民制度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白种人和当地居民的关系，给了当时人类学实地调查者难于克服的科学观察上的局限性。调查者与被调查者，或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既不太可能有推心置腹的相互信任，那就限制了调查到的或观察到的社会事实的真实性和深入性。

尽管很多亲身体验这种局限性的人类学者能以无可奈何的心情来摆脱由此而产生的苦恼，但是这种客观上存在的调查者的环境总是会曲折地反映在调查者内心的感受上。就是以我们这位以

善于处理和当地土著居民关系著名的老师来说，在他的著作的字里行间还是不难找到当地居民对他的调查活动的反感。我固然没有向这位老师触及过调查者在调查过程中内心活动的问题，但是当我听到这位老师一再对我说，要珍惜以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社会这种优越的条件，他甚至采用了“引人嫉妒”这个字眼来表达他的心情时，我有一种直觉的感受——也许是我的过敏——他在科学工作中所遭受到的，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处的地位所难于克服的，存在于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之间的那一条鸿沟，一直是他内心的苦恼的来源。

我猜测我敬爱的老师的内心活动应当说是不适当和鲁莽的。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苦恼，这是我们共同的体会。我常常喜欢置身于前辈的处境来设想他们所苦恼的隐情。试问：尽管当时有些人类学者已经摆脱了那种高人一等的民族优越的偏见，满怀着对土著民族的同情和善意，他所做的这些民族调查对这些被调查的民族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究竟这些调查给当地居民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那些把被调查者当作实验室里被观察的对象的人固然可以把这些问题作为自寻烦恼而有意识地抛在脑后，但对一个重视人的尊严的学者来说，应当清楚这些问题所引起的烦恼并非出于自寻，而是来自客观存在的当时当地的社会制度。我有时在读完了我这位老师的著作后，突然会发生这些问题：这些可爱的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现在怎么样了呢？他们自己有没有读过这些关于他们社会生活的分析呢？他们读了之后对他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想法呢？他们对自己的社会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我这些遐想带给我的是一种怅惘和失望，因为许多人类学者所关心的似乎只是我们这位老师所写下的关于这些人的文章，而不是这些人的本身。这些活生生的人似乎早已被人类学者所遗忘了，记着的，甚至滔滔不绝地谈论着的，是不是可以说，只是他们留在我这位老师笔下的影子罢了？我有时也不免有一点为我的前辈抱屈。他们

辛辛苦苦从当地居民得来的知识却总是难于还到当地居民中去为改善他们的生活服务。我有时也这样想，这种在我看来令人惋惜的情况现在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呢？在人类学中那种把调查对象视作自然资源一样任意挖掘来为自己谋利的行为确已被现代的人类学者予以正义的抨击，但是产生这种行为的根源，时代的局限，是否已经消除，那却还是个值得我们正视的问题。

我在上面所说的这些话，固然是由于想起了我这位老师所引起的，其实也是反映了自从和他分别以后我自己从事这门学科中所遭遇到的种种矛盾。我尽管怀着改善农民生活的夙愿开始我调查农村的工作，而且正如我老师所羡慕的那样，我在本国进行这种调查，但是我在一段时间里还是受到了当时社会条件的局限。

以我最早的江村调查来说，我是这个县里长大的人，说着当地口音，我的姐姐又多年在村子里教农民育蚕制丝，我和当地农民的关系应当说是不该有什么隔阂的了。但是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简单。当时中国社会里存在着利益矛盾的阶级，而那一段时期也正是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刻。我自己是这个社会结构里的一个成员，在我自己的观点上以及在和当地居民的社会关系上，也就产生事实上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我对于所要观察的事实和我所接触的人物的优先选择上。尽管事先曾注意要避免主观的偏执，事后检查这种局限性还是存在的。从我亲身的体验中使我不能不猜测到，在殖民地上进行调查工作的白种人所遇到的局限性可能比我在家乡农民中所遇到的还要严重得多。

如果我的话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想我在朋友面前只重复了大家多少已经体验到的矛盾，一种沉重而无可奈何的心情不应当是我和久别的朋友重叙时的气氛。我敢于回忆我前面所讲的那个时代的人类学者遭受的苦恼，那是因为我在和各位分离的期间，还体验到另一种情况，其中有一些经验，我认为可能对解除我上述这些苦恼有所帮助。

接着我要讲的是我在 1949 年我们中国人民得到解放以后我在学术工作方面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人民中国的建立对我们中国人民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必然影响到我们中国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我这个人和社会人类学这门学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当然，过去 30 年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时期，我个人的遭遇和这门学科的遭遇都发生过很大的曲折和波动。我今天不是来叙述这一段历史，而是想讲一些我在这段经历中所身受的而认为对上面提到的问题有关的体会。这些体会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我们怎样决定我们调查研究的问题？二是我们这些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是怎样的？三是调查者对自己调查的后果采取什么态度？

在解放以前，如上所述，推动我去调查研究的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救亡问题，敌人已经踏上了我们的土地，我们怎么办？我们在寻求国家民族的出路。这也就决定了我们调查研究的题目。人民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彻底改变了过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彻底改变了过去严重地受着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阶级的控制的状态。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一个怎样迅速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科学知识。这就给解放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指引出了总的方向。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解放后我就投入有关我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工作。我们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曾经存在过民族压迫，解放后，各族人民一致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态，实现民族平等。我们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要有各民族的代表参加，我们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要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可以使用各自的语言文字，对于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也受到合理的尊重……这些是实现民族平等的根本措施。要落实这些措施，许多具体的民族情况必须要搞清楚。比如，中国究竟有哪些民族？各有多少人？分布在什么地方？——这些基本情况，由于

长期的民族压迫，在解放初期我们是不清楚的。通过调查搞清楚这些情况的任务就落到了民族研究者的头上。过去学过社会人类学的人参加到这项工作中去是理所当然的。我在进行这项调查工作时的心情确是和过去不同了。因为这项工作的目的性很明确，我明白这项工作的意义，只要我努力工作就有可能实现我一心愿意它实现的事情，所以我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要求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我必须说，对个人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我所参与的研究工作是跟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要求和政府在全国民族方面的工作的开展相适应的。各少数民族为了要改变他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面貌，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文化，要求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而这些改革却必须从他们本民族当时的发展阶段出发，由他们本民族人民自愿进行。这里就需要这样一种科学研究——如实地分析各民族的社会当时已达到了什么发展阶段，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属于哪一种社会形态，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等等。我们过去在社会人类学里学到的那些有关社会发展的知识在这项研究工作中是很有用处的。当然，我们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目的是在帮助各民族发展起来，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比较社会学的知识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作为我们分析具体社会的工具，这就是说，我们的理论是和实践相结合的。我们并不是为了解而了解，为提出一些理论而去研究，我们是为了实际的目的，为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提出科学的事实根据和符合少数民族利益的意见，所以这可以说是一种应用的人类学。

应当指出，我们这种科学研究工作虽则是为当时国家的政治工作服务，但是既不是从属于政治工作也不代替政治工作。我们的政治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政治，它必须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客观规律和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办事，所以需要科学调查作为依据。科学调查的任务就在于它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它不应当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依据。它服从于客观事实的要求而不服从于主观的

不符合实际的行政意向。它固然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它只是提供对客观事物的知识。对实际问题作出决定的则是政治工作者，科学工作者不应当也不可能代替政治工作者去为实际问题作出决定，科学工作者只为政治工作者提供实际情况和意见。

我们这样的调查研究在根本上改变了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关系。实现民族平等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起来，不仅是调查者的目的，也是被调查者的要求。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调查的目的公开地告诉被调查者，而且被调查者完全可以懂得和乐于接受这项调查工作。我自己常常想到解放前在农村里调查时遇到的苦恼，那就是被调查者并不真的理解我为什么要进去调查，这种调查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可以认为我并无恶意而容忍我向他们寻根问底，但是也不免引起一些人的怀疑和讨厌。由于有过这种经历，解放后，我在少数民族中做调查工作时也就特别感觉到温暖和亲切，像是在亲人中向他们学习一样。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窍门，只不过是因为被调查者明白并相信调查者是为他们服务的，要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实现他们自己的愿望。在这里用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来区别双方已经是不切合实际了，因为事实上是双方在共同工作，把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如实地反映出来，以充实和提高人们对这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认识。从这种切身体会中我似乎见到了社会科学的一种新的境界，就是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完全可以帮助人类摆脱改造社会的盲目性和被动性，进入科学性和主动性。

当然，在我们实际调查工作中，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有时也存在着需要耐心克服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可以克服的。调查工作中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水乳相融的关系是可以建立的，也就是说，我预见到的那种境界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这种调查研究也为调查者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

对调查后果的责任感。尽管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新的关系使调查者可以得到更能确切反映客观社会事实的条件，但是人类对自己社会生活的科学认识实在还是处在开始阶段。以人类对自然的知识来和他对社会的知识相比较，其间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在这种水平上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为改造社会的实践服务难免发生力不从心的情况。前辈的人类学家一般不关心他自己的调查对被调查者的影响，因而也不发生对被调查者负责的问题。即使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只是从个人的道德观点着眼的。至于谁运用他调查的材料来做什么事，这些事对被调查者产生什么后果，似乎已超过了学术界考虑的范围了。我们固然可以理解在那种理论和实践、学术和政治相互脱离的社会制度中，追究科学工作者对其工作所引起的社会影响和责任是不现实的。但是在我们这种社会制度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科学要为政治服务，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社会后果的估价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个人的道德问题，而且是人民的利害问题，也是社会研究怎样日臻于科学化的问题。只有不断在实践中检查理论的真实性能不断推进研究工作的科学化和使研究工作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

但是也必须说明，我们并不是已经在中国建立起了有系统的应用社会人类学，因为在向这个方向迈进的途中，出现过一些干扰和阻碍。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特别是在一段时间里，新中国曾出现了逆流，受到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惨痛的经历，给了我们很多值得牢记的反面教育。其中一条就是社会调查的目的一旦脱离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用来为那些反动的掌握了一部分权势的人服务时，调查可以蜕化成逼供，用来打击和株连反对他们的人。这种所谓调查实际上是捏造和虚构，不仅是不科学的，而是反科学的，结果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段历史证明了一个真理，就是科学的、对人民有用的社会调查研究必须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真正的应用人类

学必须是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类学。这就是我在题目中所说的人民的人类学的涵义。

我是为了纪念我的老师马林诺斯基教授而来到这里和同行们见面的。我们一起在这个时刻回忆了这近半个世纪人类学的发展，不由得我们不对这一位杰出的应用人类学的开路人表示敬爱和感激。他无愧于被推崇为现代人类学的缔造者，在他已经为后辈一致所公认的许多功业里，我个人作为一个曾经体验过半殖民地人民生活的人，特别感激他从科学的实践里确立各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自尊心和对其他民族文化平等相待的基本准则。对当前世界上各族人民来说，这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必要前提。

在我和海外的同行们分别的三四十年里，我从正面和反面的教育里，深刻地体会到当前世界上的各族人民，确实是需要真正反映客观事实的社会科学知识来为他们实现一个和平、平等、繁荣的社会而服务，以人类社会文化为其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者就有责任满足广大人民的这种迫切要求，建立起这样一门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目的——请允许我瞩望着不应当太遥远的将来——应当是使广大人民对自己的社会具有充分的知识，能按照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来安排他们的集体生活，去实现他们不断发展的主观愿望。这门学科目前还只是一部分学者的奋斗目标。我愿意和在座的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竭尽我的余生，向建立这一门人民的人类学而迈步前进。

1980 年 3 月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图册序^{* 1}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我们中国的文化一直是丰富多彩的。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致力于实现民族平等，在发展各民族经济的同时，特别重视发扬各民族文化上的特点，过去受尽压迫和摧残的许多少数民族，在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里，久旱逢雨，苏醒重生，欣欣向荣，百花竞放，真是一片春色。这本《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掀开了这幅鲜艳的图画的一角。

文化是在历史长河里日积月累、推陈出新所形成的深厚广博的复合体。但是古今中外各民族的文化，尽管千差万别，风殊俗异，苟究其本，还是有它们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要满足个体生存和社会持续的要求。任何民族不能不具备用以满足这些要求如衣、食、住、行那一套文化基本要素。这些文化基本要素，一方面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共同范畴，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各民族的独特风格。研究人类文化的学者无不从搜集有关这些基本要素的资料入手，进行比较分析，辨别异同，探索缘由，形成种种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图册当可为文化学者提供丰富的素材。

学术上的见仁见智是学者各自发挥其卓见的正道。同一素材，由此而引申的理论自可百花齐放。同一主题，论者各持一家之见，大可尽百家争鸣的能事。我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服饰并没有机会做过专门的研究，原不应对此有所论列。但多年来与中国少

* 此图册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合编，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及日本国美乃美出版社分别用中文、日文出版。

数民族颇多接触，他们的服饰确曾给过我许多启发。趁此图册的问世，不妨略抒所怀，以就教于高明。

衣食住行等文化基本要素中，衣列为首。这固然是中国传统的语言习惯，未必有特殊涵义。但也许并非出于我的附会，这种序列似乎也多少反映出衣这个要素在社会文化生活里的较高比重。从人的生物需要说，这四者也许应以食为先。在原始社会里，衣着在生活上可能还不如饮食的重要。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的基本生物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社会和精神的需要在生活中日益见重。衣着从御寒、蔽体之用，日益和饰物结合，成为与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密切相连的要素。衣在上述四者的序列中也就占了先。“衣食住行”这种习惯语就反映了这种序列。当然，社会还在发展，变化还在发生。在现代社会里，住的费用有些地方已超过其余的三项。甚至像有些国家，汽车的广泛使用，可以说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式，把行推到了这个序列之首。

我这样地突出衣和饰相结合的历史意义，倒不是故意为这本图册寻找生动的说辞，也无意于为它渲染夸张。我的用心无非是在表达我一直在思索而尚未成熟的一种见解。我在琢磨这个问题：那些为了满足人们基本生物需要的文化要素，怎么会和怎么样被附上象征的性能，为满足更高层的社会和精神的需要服务。衣和饰的结合，突破了衣着原有的单纯的基本功能而取得了复杂的象征作用，成为亲属、权力、宗教等社会制度的构成部分，更发展成了表现美感的艺术品，显示出民族精神活动的创造力。在研究这个文化功能的升华过程上，衣饰这个文化要素提供了富于吸引学者们想象的例证。我在这本图册的序文里提出我这个看法，也许并不是多余的。

如果联系我们的生活实际，不难看到，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男女、老小、社会地位、职业、宗教、民族等区别，一般

说来，都可以在衣饰上找到它们的反映。甚至可以说，人们常常用衣饰为手段来显示这些区别，勾画社会的结构，因而使衣饰具有丰富的社会涵义。只是由于这种要素跟我们的社会生活结合得如此之密切，以致我们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不再感觉到它是人为的设计了。苟其有机会看到风俗习惯不同的民族，它们为了划定两性的社会界线在男女衣饰上作出种种人为的区别，就容易觉察到自己的社会在这条界线上，也不能不说同样是在衣饰上费尽心机的。如果问一问：这是为了什么？我们的社会学和文化学者就有发挥他们理论的大好机会了。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这本图册确是具有这种启发人们思考的作用，至于它能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者提出多少问题，那就有待学者们自己去回答了。总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说，对不同文化的观察，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文化的面貌。我希望这本图册也能起到这个作用。

当然，如果我只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推荐这本图册，那就未免见得我过于局限于一己之所好了。从艺术、从历史，甚至从服饰设计的应用等方面出发，都可以从这本图册里得到启发。在这些方面，我苦于是个外行不宜在此评长说短。

最后，我必须提到：作为中日学者合作的成果，并且以介绍中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为目的的这本图册，在中日文化交流上是值得珍视的。它只是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以取得更大更多收获的开始。这种努力无疑会促进中日两国各民族之间更深的了解和友谊。我为能在卷前写这几句话而感到荣幸。

1980 年

《中国少数民族诗歌选译》前言

艾黎先生，40年前相识的老朋友，选择了一册中国少数民族诗歌集，要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想来这是因为他知道我曾经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做过社会调查，应当熟悉他们的诗歌，介绍一些有关的背景材料。他这种设想自然是有理由的。任何访问过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一般说来，都会接触到他们的诗歌，因为诗歌常是他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当然不是例外。但是他有所不知的是，我所亲自接触过的少数民族只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很少的一部分。西藏、新疆、台湾等地方我都没有到过。即是在我比较熟悉的西南地区，没有访问过的民族还是占这些地区民族的多数。曾遍访55个少数民族的人大概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因此，对中国少数民族，要用个人的观察，做出概括性的叙论，都不易全面。以我有限的见闻来综论中国少数民族的诗歌实在不能胜任。

特别使我感到惭愧的，倒还不是我见闻不广，而是我对诗歌一门缺乏修养。一提到少数民族诗歌，就会使我回想起30年前我到贵州访问苗、侗、布依等民族时经常遭遇的困境。我每到一地，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总是要邀我家访，杀鸡款待。按他们世代相传的习惯，每宴必饮，每饮又必须祝酒，即口陈词，自成韵律。主客唱和，对答如流。先是礼让颂祝，然后渐入于狎，互相揶揄，趣话横生，酒酣耳热，达于高潮。在这种场合下，不会诗不会歌的客人就不免坐立不安，自觉见外了。不擅音韵，缺乏诗情的人是进不了这种浓郁的社交的。那种见外之感还不是自招的？

自疚的心理促使我反复思考。在我自己这种诗人已成了少数

天才的社会里，一个不会诗不会歌的人竟可以心安理得地满足于“诗盲”的状态，而不感到这是人生中的缺陷。一旦在那生趣勃然的镜子里面照出了自己苍白无力的脸谱时，才有一点自知之明。诗歌原是从社会生活的源泉里流出的心声、人情的表现。人们也是通过它来陶冶和抒发对人对事的感情，并用它来建立对人、对团体的关系，作为社会凝聚、协调、团结的手段。一个诗盲的人，如果不是一个在人情上有缺陷的人，也难免是个感情上的侏儒。

我所接触到的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在文化的这一方面是健旺的。我亲自身临过他们群众欢聚的节日。他们载歌载舞，飞觞对唱，就在这种场合里，他们各逞诗才，竞雄争先，选出他们群望所归的人物，成为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骨干。诗歌内容的贬褒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有力手段；其中一针见血、动人五内的幽默讽刺，常能流远播广，起到移风易俗、社会革新的作用。这里我们见到的不仅是群众艺术的表现，而是这社会过程的艺术化。回想起我和少数民族同胞生活在一起的日子，使我越来越觉得应当肯定和发扬诗歌的社会作用而加强诗歌和群众生活的密切结合。也许这正是我们汉族应当向这些兄弟民族认真学习的发展文化的方向。

艾黎先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翻译和出版这本中国少数民族诗歌选集，充分表明了他不仅曾经通过提倡“工合”，关心我们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而且现在又通过宣扬少数民族的诗歌，关心我们的文化生活。在他对我们的双重关心里，我冒昧地推想，他大概会同意我的体会，就是他是在告诉我们，片面地发展经济是不相宜的。在我们追求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同时，占着人口多数的汉族人民必须向兄弟民族学习，怎样把艺术密切地和群众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把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培养成个百花齐放的园地。

如果我的生命能重新开始的话，我一定要像艾黎先生一样，做到既是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又是一个诗人。如果我早认识了艾黎先生，或早知道艾黎先生的诗才，在我的早年就有机会向他学习，也许在我和少数民族同胞们一起生活的时候，不至于因“诗盲”受窘，而能和他们建立更深厚的友谊，对他们有更深入的认识了。现在以年龄来说，也许为时已经迟了一些，但是我已开始领会到了他的启示，愿意把这点体会转告尚有条件这样做的青年人。祝愿他们以艾黎先生为榜样，养成一个更全面和健旺的精神面貌，使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更丰富多彩。

1980 年

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

去年秋末我去加拿大访问了一个半月，回来后有机会重新学习敬爱的周总理 1957 年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到我在国外看到的一些北美少数民族的情况，越来越觉得我国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确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如周总理所指出的：“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

我的这种体会是出于把北美印第安人保留地同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对比。我过去一直确认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基本政策，这是我从过去 30 年来民族工作实践里得到的正面教育。这次出国访问看到了和我国不同制度的国家怎样处理它们民族问题的情况，对比之下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更突出了。所以我想介绍一些北美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情况，也许对学习周总理的讲话可以有点帮助的。

当然，我先得声明，我这次访问加拿大的时间很短，并没有条件去研究他们的民族问题，只在讲学之余，抽空去参观了两个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一个在曼尼托巴省的温尼伯市附近，一个在萨斯喀彻温省的里贾纳市附近。走马看花，很难深入，这里所说的只是我初步的观感罢了。

印第安人是加拿大的少数民族，人数究竟有多少，并没有个确数。据 1975 年按法定条件登记为印第安人的一共有 28 万多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1.3%。他们大部分分散居住在全国各省

2200 多个保留地里。保留地大小不一，一般是相当小的，我去参观的两个都只有几十户人家。

“印第安”是欧洲人移入美洲时对早就居住在这地方的土著居民的统称，一直沿用至今。其实他们的民族成分相当复杂，即以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来说就有九种不同的语言。据说美洲的印第安人是早期从亚洲移去的，最早大概是 2 万 5 千到 3 万年前从西伯利亚，经过今白令海峡进入美洲的。从人种上说确实是和我们同属蒙古利亚种，他们的面貌体形、头发肤色都和我们中国人相近。有些加拿大华侨朋友告诉我，他们常被误作印第安人。

当 17 世纪初欧洲人开始移入加拿大时，印第安人是这片广阔土地的主人，人数和目前相差不远，也在 25 万人上下。但是近 400 年里却遭逢巨变，几至消亡，现在还不能说已经看到光明。我们要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不能不说一点过去的历史。

加拿大地处美洲北部，其南界主要是沿纬度 49° ，相当于我国东北内蒙古海拉尔一线。地理条件有相似之处，林海雪原里过去盛产皮毛丰美的野兽。印第安人千万年来一直到近几百年主要以狩猎为生。最初吸引白种人到今加拿大地区来的，就是这种在欧洲市场上能卖高价的皮毛。印第安人历来是不受奴役的硬汉，白人要这些打猎能手手上的皮毛，只能用商品同他们交换。商品中最受他们欢迎的是能扩大和提高他们狩猎的枪支弹药。但是这种“生产工具”一到了他们手上，他们赖以生存的野兽却很快就消减了。白人皮毛商为了开辟货源，越来越深入北美腹地，而这些地方的印第安人的传统经济却日益被破坏，以致无法维持。

欧洲移民源源不断地移入北美北部，最初占主要地位的皮毛贸易随着货源的消竭而衰落了。继之而兴的是淘金采矿、伐木取材，那就是开始由白种人自己动手来开发这地方的自然资源了。加上了白人比较先进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白人得到的主要已不是印第安人手上的皮毛而是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了。白人吞并印

第安人土地的主要方法是和印第安人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迫或诱骗那些经济沦入绝境发生了严重饥荒的印第安人，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当时白人的统治者英国国王，由英国国王保证给原来住在这土地上的印第安人有一定的居留地和定额的年金。这就是所说的“保留地”。这种保留地制度由东部开始随着白人移殖而逐步向西，一块一块土地在不同年份，分别用条约形式从印第安人手上抢夺过来；印第安人一批批被圈进保留地。

我去访问的两个保留地都是在加拿大中部，这些保留地是在大约 100 年前，东西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兴建时才建立的。现在这些保留地里的印第安人还记得他们的祖辈是从铁路南面被迫集中到离铁路线大约有几十公里的这片荒瘠的洼地里来的。他们说，那时白人怕我们袭击铁路所以不让我们住在老地方。

我见到的这两个保留地确是离市较远、土地贫瘠，什么庄稼都不长，连菜园都见不到。我坐在车里穿行过这个保留地，路旁稀稀落落，一座座小小的木板住宅，不相邻接，不成村落。这些房屋外边看去并不破烂，同车的朋友告诉我，这是政府造给印第安人住的，水电俱全。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几乎每家门前都停放着汽车甚至不止一辆。我的朋友解释说，这些汽车不少是废品。那些卖旧汽车的商人习惯于欺侮印第安人，把快要报废的旧车贱价卖给他们，用不了多久就坏了。他们又修理不起，就停在屋旁作摆设。

我到过一个退休的头人的家里做客，参观了他的住宅，固然不能和城里的中上人家相比，但是基本上是“现代化”了的，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电话、电视、电气冰箱也不缺少。他家的汽车并不是废品。我没有去看那些普通人家的情况，但据说从物质方面来说，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家的确并不是破烂的贫民窟，那是因为这些年来加拿大政府是按条约规定保证了他们的衣食住的基本生活，是可以达到不饥不寒的最低生活水平

的。我没有问出究竟他们一年按条约能收入多少，看来主要的问题似乎不是在这里。

我跟这位退休的头人谈话时，他总是唉声叹气。我说：你们的生活不是都能过得去么？有什么困难呢？他摇了摇头，自言自语似的说：这是个失去了希望的地方呀！经他解释之后我才有一点明白。原来整个保留地没有一项可以称得上生产的事业。既不种地，又没有工厂或作坊。据说还有一些印第安人懂得打猎和捕鱼，但也不是为了生产。我问他，为什么不办一些小工厂，即使发展一些手工业也好。他还是摇头，慢吞吞地说：“不行，一无资本，二无人懂得经营，三无市场。”看来还有一条，就是四无此种想法。

那么呆在保留地里干什么呢？陪同我去参观的朋友接口说，问题就在这里！他说：不劳动，不生产，靠救济过日子，日子是难过的。当前保留地里最突出的问题是酗酒。喝醉了就闹事，倒不是闹什么大事，就是些打架、凶杀之类的事，自杀的也不少。总之，保留地是块死气沉沉的绝地。

那位退休的头人似乎不愿意在像我这个远方来客面前说这些丧气的话，于是捧出了一幅不久前在他过生日那天照的相片给我看。这张相片上前后三排，老小男女济济一堂。他特别介绍相片上的三对中年夫妇，原来是他的三个女儿和女婿。这三个女婿全是东欧来的移民，在城里做工。按法定的条例，这些嫁给白人的姑奶奶和她的儿女都不再算是印第安人了。加拿大话里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指这种混血，叫“妹第”。他们不能再享受政府给的“条约年金”了，也就脱离了保留地，回不来了。

这老头的“合家欢”里的儿孙没有几个是在保留地里生活的。印第安人按“条约”有受教育的权利，所以可以免费上学。近年来，政府又把办学权下放给保留地。印第安人的儿童可以学自己的民族语文。但是在保留地里没有生产事业，那也就很少有

就业机会。学校里毕业出来只有在城市里找工作，他们也就进入了和白人“平等”竞争的世界，结果当然是不会“平等”的。在这激烈竞争的筛子里留下的印第安人为数不多。我见过当教授的印第安人，但究竟是凤毛麟角，在白人为主的社会里混得下去的印第安人，大多是一些非技术工和一些低等的服务员。混不下去的，如果还保留着法定条约权利的话，只有回保留地一条路。这样看来，保留地事实上成了个失业收容所，而且一进这收容所就很少有机会再回到外边的大社会里去了。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些保留地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保留地里的印第安人尽管在物质生活上还不能说是流离失所、穷困悲惨，而他们的精神面貌却是如此颓废忧郁、死气沉沉了。

我自从参观了这两个保留地之后，心里总是牵挂着一些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样下去，北美这地方的印第安人终究是会消亡的。加拿大很多开明的朋友也像我一样忧心忡忡。他们说：白人移居北美，把原来的居民最后赶到保留地里去之后，尽管每年拨款养他们但是这并不是个永久的办法，眼看印第安人在消亡下去。他们也说加拿大社会上种族歧视并不像美国这样厉害，特别是70年代加拿大的联邦政府和各省的地方政府很重视印第安人的民族问题。各级政府通过了种种立法扩大在保留地上的印第安人的自治权利，比如保留地里学校交给印第安人自己管理，其他的行政事业也有很多已由印第安人自己选出的头人来管理了。据说联邦政府拨给各保留地的行政费用1976年已超过1亿加元。此外还拨了1亿4千万加元作为印第安人经济发展基金，以贷款方式来改进保留地的经济状态。这些办法是不是能改变印第安人的命运呢？这却很难说。

我在里贾纳见到萨斯喀彻温省政府负责民族工作的人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他们很诚恳地表示要学习我国民族工作的经验。过去历史上的账可以不再去算，现在加拿大的人民和政府似乎都愿

意帮助印第安人能发展起来。而且有些人也已看到了现有的保留地制度必须要加以改造。但是关键问题是在哪里呢？

我对于加拿大现有的保留地制度并没有研究，如果以我所参观到的情况来说，至少过去建立这制度时这是一种“画地为牢”的办法，把印第安人集中到一个不具备经济发展条件的地区里，使他们过着无法从事生产的生活，尽管给他们生存的物质条件，结果还是难于生存下去的。在这种保留地制度之下，是谈不上“自治”的。现在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在法律上并没有不平等的规定，在社会上也并没有显著的歧视。在保留地内印第安人可以管理自己的行政事务。从表面上看，不能说他们没有相当多的“民族自治权利”。但是事实上，他们所居住的区域并不具备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物质条件；他们的历史又使他们在文化上比较落后，要他们在大社会里和白人“自由竞争”，他们必然处于劣势。所以尽管加拿大政府继续执行“条约义务”，每年花费大笔款子在“印第安人事务”上，尽管每年通过一些立法表示重视印第安人的问题，加拿大的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依然是他们的“绝地”，他们在加拿大的大社会里事实上并没有平等的地位。

说到这里，我们重新学习周总理为民族区域自治所指出的两个“正确结合”，就不难看到保留地制度的症结所在了。保留地之所以成为印第安人的“绝地”，首先就在于把他们按民族划区，只有法定的印第安人才能居住在保留地里。民族与区域这样的结合是不正确的；其次在于近年来尽管允许印第安人管理保留地上自己民族的事务，当家做主，但是这个家却是个不毛之地，除了讨乞别人的施舍之外是无法生活下去的。政治与经济这样的结合也是不正确的。要改变这种“绝地”成为“生路”，看来有必要纠正这两个“不正确的结合”。

我回想起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之初，我们革命前辈就一再强调，在划定自治地方的区域时必须首先着眼于自治民族的发

展前途。民族自治地方是自治民族现代化的物质基地。我们都记得1957年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时的大辩论。辩论的主题实际上就是怎样才能实现上面所提出的“两个正确结合”。周总理指出：如果壮族自治地方只限于壮族聚居的桂西地区，“壮族自治区就很孤立了，不利于发展经济。”后来决定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把原来属于广西省的区域全部划入壮族的自治地方，因此广西壮族自治区才成了一个民族合作的自治区，一个有发展前途的自治区了。

把正反两种具体例子对比起来，看清楚什么是正确的和什么是不正确的，我们才能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体会得更深入一些。民族区域自治确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但是要充分实现这种制度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有待我们不懈的努力。

1980 年

关于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的一些意见^{* 1}

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以下简称《概况》）有不少问题要讨论，我只提出其中的三个来说说：一是为什么要编写《概况》？二是写些什么？三是谁来写？

为什么要编写《概况》？这是个根本问题，首先应当有明确的认识。这个问题其实在决定编“五种丛书”时已经明确，但是经过这两年的实践，在新形势下我们应该再讨论一下，以便我们可以写得更好些。

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解放后我们在开展民族研究方面的经验教训。首先我认为必须肯定解放后 30 年里我们在民族研究上曾投入过不少人力和物力，是有收获的。我们积累了不少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各方面的知识。30 年前不知道的事情，现在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的常识。比如说，过去我们连中国有哪些民族都不清楚，现在我们至少已经知道 50 多个民族的大体情况了。这些知识是得来非易的，是包括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在内的许许多多科学工作者辛辛苦苦、跋山涉水去调查来的。过去我们在民族研究上组织这样大的队伍，有计划地进行了这样广泛的工作，许多外国朋友也承认是史无前例的。这表明我们的党是一贯重视民族研究的。

在过去这 30 年的后期民族研究工作也发生过一些曲折，十

* 1980 年 12 月在国家民委召开的“五种丛书”编写会议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年浩劫中当然更不用说了。这些曲折我认为应当好好总结，牢记教训，以便轻装前进。在座的同志们很多一定会记得，自从50年代后期起，对“三套丛书”翻来覆去地修改了多少次，把很多人的精力都消耗在“紧跟”上。当时就有许多人说，越改越没有人要看了。我也有这种感觉。改好了还是改坏了，书都在，将来自会有定论。但是明显的是，民族研究的重点不再放在实地调查研究上了。此风一开，我认为偏离了正道。

粉碎“四人帮”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在两年前提出了编印“五种丛书”的任务。我的理解是要把我们民族研究的成果清理一下。搞清旧账，好开步向前。我们不能再在老资料里翻腾了。在这两年里，“五种丛书”进展得很好，已在陆续出版。

昨天大家听了江平同志的报告，明白了当前的新形势提出新的要求，在民族工作上展开了新的前景。我们的问题是民族研究怎样赶上去，配合民族工作的新任务向前走。因之，我们要再讨论一下编写《概况》的目的。

密切配合民族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是我们过去民族研究的优良传统。回想起建国初年，中央派遣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宣传政策和了解情况，许多民族研究工作者参加了这个队伍，搜集了一批实地调查的资料，初步了解了各民族的基本情况，为各少数民族参与人民政权及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事实依据。全国各少数民族的语言调查为各少数民族改革和创造文字打下了基础。随后由人大常委会主持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着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也是配合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进行的。这一系列民族研究工作所以能取得可喜的成绩，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密切和民族工作相配合，坚持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为此，我们在编写《概况》时应当首先考虑当前民族工作

的新任务。过去的十年浩劫给了我们极沉痛的教训，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受到了抵制和破坏，以致损害民族大家庭的友爱团结，阻碍了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当务之急就在认真落实民族区域自治，要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人民当家做主，发扬各自治地方的优势，发展经济、文化，缩小和消灭历史所造成的差距，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完成这项民族工作上的迫切任务，需要民族研究工作者的参与。调查研究是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官，民族研究者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

两年前，开始考虑在“五种丛书”里列入《概况》这一种时，从我自己来说，还没有想到今天提出的任务。我记得那时主要是想到怎样把各自治地方解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绩写下来，作为建国30周年纪念的献礼。现在看来这个目标已经不够了。我们是否可以在新形势之下把原来的想法推进一步？如果说其他几种丛书主要是在“清理旧账”，《概况》这一种是否可以先走一步，用向前看的精神，对当前的主要情况，结合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进行一番调查？

也许在这里我得说明一下，民族研究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而且凡是对少数民族或是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科学研究都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对少数民族的发展都可能起积极作用的。我提出为当前民族工作密切配合的调查工作只是民族研究中的一部分，并不排斥其他方面的民族研究。特别是由于过去民族研究工作的领导上存在着机关作风，常用行政命令办事，在一定程度上挫伤过研究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目前还有点心有余悸，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了提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行政命令指定研究课题的方法是不相宜的。我今天是就编写《概况》这个范

国来讲的。在明确编写《概况》的目的性上我想提出与当前民族工作密切结合的建议。同时我也相信我所设想的结合方式和发挥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不矛盾。因此接下去，我想讲一讲调查些什么和怎样进行调查的问题。

前年秋末我曾到广西去参加自治区建立 20 周年纪念，顺道去访问了我在 40 多年前调查过的大瑶山。大瑶山现在已建成了金秀瑶族自治县。我在短短的几天访问中得到不少启发。我认识到要发展大瑶山的经济、文化，必须理解这个地区和这些民族的特点，才能发扬优势，赶上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

过去我们对民族特点的理解是很片面的，甚至用它来指一些独特的风俗习惯。民族特点是一个民族从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适应其具体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特点。广西的大瑶山是一大片高山所构成的区域。这个地区有它地理上的特点，峰峦层叠，山险水激，和被称为甲天下的桂林式的山水是不同的。这里的地势易守难攻，因而历来成为受到种种压迫不能在平原上谋生的人们逃避和求生之地。

大瑶山里的居民分成不少集团，各有名称。除了散居的汉人和壮人之外都称瑶人。瑶人中有茶山瑶、花蓝瑶、坳瑶、盘瑶、山子瑶等。在前年的访问期间我了解到这些集团的语言并不相同。初步了解，茶山瑶近侗语、花蓝瑶近苗语、坳瑶近山外的瑶语，但和盘瑶在语言上还是有区别。这种情况使人猜测，它们是来源不同的集团，都是由山外被迫进山的移民。而且很可能由于进山的时间和入移的方式不同，因而有山主瑶和山子瑶（或称过山瑶）的区别。山主瑶占有土地而山子瑶则租山而生。这些居民倚靠这险恶的地势，才能生存下来。明代王阳明镇压广西瑶族主要的战场就在这大瑶山的东南大藤峡。即以明代算起这山区的居民被包围孤立已经几百年。他们在山区，政治上形成了一套共同防御和维持秩序的组织。他们中那些经营小块水田谋生的山

主集团还实行计划生育，自动限制人口，与此相适应的有他们独特的婚丧礼俗和社会结构。至于经营刀耕火种的山子集团则分散在大山坡，常常迁徙流动，另有一套生活方式。这些是这山区的地理和历史等因素所形成的民族特点。

民族压迫制度的消灭根本上改变了这山区居民的处境。过去是凭险自守，需要隔绝，结果是长期处于低下的生产水平，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过了至少已有几百年。现在已经在民族大家庭里得到平等的地位，已经具备了经济、文化赶上其他民族的条件，过去的孤立状态必须改变，需要开放和山外交通。但是这个转变是要通过一系列联系到各方面的改造，而又必须从原有的特点出发，对这些特点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它们的来龙去脉，在转变中发生的问题，把实际的情况条理分明地摆出来，就能帮助领导上采取适当的措施，促进当地民族现代化建设。

比如我在前年访问中见到十年浩劫中，曾经不顾山区的具体情况，强制推行过以粮为纲、粮食自给的行政命令，以致大片森林遭到破坏，大量劳力消耗在山坡的瘠地上种庄稼，挤掉了山区的特产。不仅人民生活日益贫困，附近平地水源干涸，农业受灾，整个生态平衡被破坏，而且由于自治县划界时没有充分考虑新情况的需要，没有强调山区和平地的经济交流，把原来山区贸易所依靠的集散点划在界外，加上山区公路建设困难，自治地方得不到发展经济的具体条件，反而受到县界的束缚，有点像“画地为牢”。这些是没有从山区的民族特点出发考虑问题的结果，也是从反面说明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先行的道理。

前年我从大瑶山访问回来就有再去深入调查的愿望。今年得到民委的支持，中央民族学院已把广西大瑶山的社会历史调查列入计划，并且已经派出先遣工作人员前去开始工作。这样的调查如果取得结果不就可以编写出一本金秀瑶族自治县概况么？

怎样发扬少数民族的优势来促进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是当前的民族研究工作者的重要课题。这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课题。从大瑶山这个小天地放眼全国，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十分值得深思的特点。当前全国人口中汉族占 94%，少数民族一共只占 6%。汉族怎么会形成这样大的比例呢？许多原因之中有一条就是汉族掌握了种庄稼的先进农业技术。在几千年里东亚这片大陆上凡是适宜种植谷物的土地都被他们占有了。他们真不愧是神农氏的子孙，精耕细作，使这块土地能历久不竭，创造了人类文化的优先范例。而且在这几千年里，他们把凡是接受这种精耕细作的农业文化的人逐步同化在汉族里面。当然有些接受这种文化的人并没有同化成汉族，但是在数量上是并不多的。至于那些不适宜于发展庄稼的地区，汉族大多是视若不见的。这些地区至今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区面积尽管大，但是在简单的生产技术下，生产力很难提高。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和不是这种方式的生产形成了经济、文化的差距，也成了汉族和许多其他少数民族的差距之一。

工业的发展将改变这种传统特点。汉族过去所以发展成先进民族的这种小农经济和农业文化已经成了它在前进道路上的包袱。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把大量人口捆在土地上，至今有 80% 的人口在农村里向土地讨生活。每个人要消耗大量谷物作粮食，淀粉是汉族的主要营养来源，甚至蛋白质的来源还是依靠吃粮食的猪和鸡鸭提供。汉族要发展工业，提高他们的生活，必须从手脚胼胝的农业劳作中解放出来，其中一个渠道就是转过来向少数民族的牧业求援。

习惯于这种农业文化的汉族，大多目中无牧。他们把可以放牧的草原认为是荒地。他们不大懂得，牧草可以育接通过牲畜变成蛋白质，而蛋白质在营养价值上优于淀粉。许多汉人到了内蒙古，不去学习蒙古人进行牧业，而一心一意要开荒种地。在这种

土质和气候上开的“荒”是极不经济的，结果破坏了牧场，引进了风沙，损害了附近的农田。和大瑶山里砍伐森林来种庄稼一样，破坏生态平衡，得不偿失。

如果我们汉人要想从传统的小农经济中解放出来，就得承认许多少数民族在牧业上的先进和潜力。应当千方百计地发扬少数民族在这方面的优势，把占有全国土地面积一半以上的地区开发利用起来，我们国家的经济才有更雄厚的物质基础。即以牧业一项而论，如果能像澳大利亚和南美一些国家那样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大发展，我们就可以用牛羊肉食代替谷物粮食的一部分，重新安排汉族地区的农业，使它向经济作物发展，生产工业原料。放眼全局，少数民族的优势正是解决汉族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这个方向设想我们国家广阔的前景，处处都在指点我们必须开展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而这些也正是我们所要编写的《概况》的具体内容。

关于我心目中所设想的这种“概况”写些什么的问题，我就说到这里。接着再提一提谁来编写的问题。

在这个谁来编写《概况》的问题上我很同意谷苞同志的主张，就是要以本民族干部为主，并且要在编写的过程中培养出一批少数民族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

以本民族干部为主的方针也就是实现民族化的具体表现。为什么以本民族干部来编写为好呢？这里存在着一个民族感情的问题。民族感情是历史形成的客观存在。我常常说，我对少数民族很有感情。我对少数民族经济上、文化上所遇到的困难确是很同情，很愿意尽力帮助他们。但是我没有经历过少数民族所受过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我也没有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实际参与体验过他们各方面的生活。我对他们的友谊和同情并不等于感受到他们的感受。上面我提到汉族看到草原不感觉到这是生产的基

地，而看作是荒地的这一类情形，我自己也是不免的。那是因为汉族世世代代没有以放牧为生的经验。这是个民族感情问题。

有人提到许多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一些京剧有反感，因为他们看到京剧中有些少数民族的脸谱，联想到过去所受民族歧视的痛苦；而汉族的观众很少在看戏时会产生这种感觉的。也有人提到郭老所写的《蔡文姬》不受少数民族观众的欢迎。他们不会体会到郭老在这出戏里所表达他多年流浪在国外的爱国思乡的心情，而想到的却是曹操破坏了一个异族通婚的家庭。把这些触及民族感情的事说明了，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并不会像少数民族那样作出这类的反应，原因是在我是汉族。

应当指出，不能体会别人的民族感情，和大民族主义还是不同的，但有联系。如果我们不承认民族感情，而在其他民族对一件事作出不同于我们自己的反应时，就指责他们不好、落后，以至扣上“地方民族主义”等等帽子，这就是大民族主义了。我们并不否认民族之间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差别，但是以自己民族的方式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而且强加于其他民族，不论其用心如何都属于大民族主义的范畴。大民族主义必然会引起其他民族的反感和抗拒，阻碍民族间互相交流和促进。

探讨一个民族的特点，深入体悉这个民族的民族感情是必要的，所以编写《概况》必须以本民族干部为主。在这个前提下，其他民族干部的参加是有益的。由于目前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文化还不够发达，缺乏能独立进行科研的本民族干部，在编写《概况》时还需要其他民族干部的协助，甚至指导。而且，不同民族干部共同研究一个问题也可以避免民族偏见。所以以本民族干部为主结合其他民族干部一起编写，既贯彻了本民族当家做主的原则，又照顾到兄弟民族间友爱合作的精神。这样组织起来的编写队伍可能是比较好的。

按上面这种要求来编写《概况》，应当承认并不是件简单和

容易的事。这不是一项行政任务，而是一项科研项目。它要实事求是地说明一个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和它的特点，形成这些情况和特点的历史因素和地理条件，以及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这项调查工作需要一定的历史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如果目前某一个民族还没有能做这种科研工作的人，那就不妨先由汉族干部开始，在工作中培养出成为这项工作主体的本民族干部。这样也就因为开展这项工作而培养了人才。在培养过程中，中央民族学院可以考虑设立短期的专修班，帮助这些民族干部补习必要的课程。

编写《概况》这件事，各自治地方应当认为是自己的重要工作，自己负起责任，加强领导。这就和过去 50 年代的民族研究工作有所不同了。那时候的民族研究工作主要是由中央倡议和组织的，地方处于协助和参与的地位。经过了这几十年，各地的民族聚居区的自治地方已经建立了起来，许多民族的知识分子已经有了成长，由各自治地方主动地组织力量、培养干部，开展民族研究已经具备了条件。所以，实现以本民族干部为主的编写方针是符合目前的形势的。同时，现在国家民委抓这“五种丛书”，提供各地方所需要的经济上和人才上的协助，也是必要的。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这件事也就好办了。

当然我们还得看到当前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各自治地方大小也不一致，所以不能在规模和水平上强求一律。各自治地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在国家民委的推动下，早日开始编写《概况》的工作。不妨看得长远一些，不能在较短时期里写出初稿的，也可以多给些时间。在各地编写期间，国家民委可以组织各种经验交流、学术讨论，使各地可以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只要不脱离实地调查，多修改几次稿子是有好处的。修改的过程也就是深入和补充的过程，这和过去“三套丛书”的闭门

修改是不同的。

以上是我个人想到的有关编写《概况》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同志们参考、讨论。

1980 年 12 月

怎样开展民族研究工作^{* 1}

到广西来已经好几次了，30 年前我随中央访问团到广西，那时还刚开始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这一次，是为参加龙胜各族自治县成立 30 周年庆祝活动而来的。像是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样，感到很高兴。

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们中国民族问题的一把钥匙。解放前，已经在内蒙古成立了自治区，还在若干回族聚居的地方成立了小规模的区域自治。解放后，在全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政策，开始成立自治县的是广西的龙胜。龙胜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而且五个民族人口都相当，称什么民族的自治县呢？经过研究，结果成立了各族联合自治县，这是世界上没有过的创举。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怎样开展民族研究工作的問題。

回忆建国初期，我们对我国各民族的情况知道得很少，甚至有多少民族也不清楚。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大家也不大问。作为一个民族工作者，不应当只看见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民族当然应该知道，但只了解自己的民族还不够，还要了解其他民族。在民族学院里需要有一个空气，大家要努力了解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历史和关系。这样，我们进行民族工作就可以有比较好的基础。大家对民族工作的积极性也可以提高。我们应自觉地明白为什么要干民族工作。它对国家、对民族的发展有什么意

* 本文是作者在广西民族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 年第 1 期。

义？这些道理明白之后，劲头就来了。我已 71 岁了，可是还在拼命地干，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民族工作的意义，可以保证我们国家真正繁荣富强？民族工作要是搞不好，就会出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特别指出：“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这句话据说是在《决议》通过前几分钟，中央书记处加上去的。我们听了很高兴，在《决议》上定下这一条，意义就非常重大。

要加强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要加强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国情就包括我们各民族的情况，这是基本的也是很重要的国情。老实说要我一下子把 50 多个民族族名都背出来，是很困难的。年纪大的，记忆力差了，而年轻的也不一定能一下子都说出来。中国民族情况是很复杂的，全国这么大，几千年的文明史不是一下能搞清楚的。所以民族工作要做得好，必须要掌握民族的情况；要掌握民族情况，不下一番工夫是做不到的。如果情况不明，搞民族工作即使有一片好心也没有用。

我们问自己，搞了多年民族工作，能够讲出多少东西来？老实说，我能讲的确实不多。怎么办，要大大加强调查研究。《决议》里用“加强”这两个字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很多问题还搞不清楚，情况还不掌握，科学根据很少。这不能怪某个人，是历史造成的。我们中国历史上关于少数民族的情况记载不多，要一下子了解清楚各民族的历史当然不容易。但各民族当前的情况我们要去调查研究，还是比较容易了解的。

我们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历来主张办事要调查研究，毛主席说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民族方面，早在延安时期，延安民族学院就开始进行调查。曾写了好几本有科学价值、科学水平较高的西北回族情况和历史研究的书，做了榜样。当时条件很差，

到底还是写出了调查报告，充分表现了我们党有优良的传统。全国一解放，我们参加了中央访问团，1950年还有土匪的时候，我们就到西南去访问了。我带一个分团到贵州。1951年，又到了广西。那时西林、隆林还是土匪出入的地方，我们身边带着枪才感到安全。没有公路，骑马要走7天。才走了两天，我的马就死了。各个中央访问团，走遍了中南、西南、西北和东北，一面访问，一面调查，使我们初步了解各民族的基本情况。可是，在民族识别上问题很多，全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还是数不上来。到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很清楚，可是大致上差不多了。

我们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研究就是正确反映客观的情况，对自然的研究就是自然科学，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就是社会科学。反映民族过去的和现在的社会情况就是民族学的任务。

1950~1952年，中央访问团到各地访问，不仅调查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还调查了各民族的语言。开展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30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中央民族学院一开始就抓少数民族语言问题。那是因为，语言不通，民族工作是很难开展的。我那时参加访问团到各地去，不懂少数民族语言。有些少数民族没有文字，只有口语，要交谈只好找翻译。通过翻译做民族工作不是好办法。要做好民族工作必须学会少数民族语言。所以中央民族学院开办了语文系，培养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师和研究人員。我们先请会说本族语言的少数民族同志，又请懂得语言科学的人，要他们一起工作，把少数民族的语言，一个一个词，一句一句话，用注音符号写出来。然后研究各种语言的文法，编成课本。中央民族学院曾开设过二十几个民族语言班。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是主张民族平等的。民族平等不能空讲。每个民族都有权利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才能说得上民族平等，我们在宪法里就规定了这一条。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如果只用汉语，有些少数民族代表不懂，他们就不能行使人民代表的职权，所以

必须负责给他们翻译。我们中央民族学院就负责提供翻译，这样为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搞出了一个基础。

参加民族情况和民族语言的调查工作是非常辛苦的。这不是普通的工作，要靠两条腿跑。我在大瑶山调查时就出过事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访问团也有一些同志为民族工作牺牲了的。当时搞调查工作，心中是很清楚的，是为了使我们党能够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毛主席的伟大就在于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1949年，我刚到民委，领导同志对我说：我们不能搞苏联那套联邦制，要深入调查研究，这是毛主席的决定。我们必须面向事实，实事求是。后来有一段时期，正确的民族政策受到了破坏，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才得到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文件，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是我们几十年来没有过的。这次六中全会解决了不少实际重大问题，对我们的民族研究工作同样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今后民族研究工作怎么搞？我们不能关在房子里头写书。要解决我们国家的实际问题，通过工作的发展，推动我国科学的前进。我们的政策是依靠科学的认识，绝不能再像“四人帮”那样搞形而上学，搞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根据事实说话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科学就是反映客观存在的事实，认识客观事态的实际变化，必须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实际中去观察研究，从实事求是中得出理论。离开实地调查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知识。1956年、1957年人大常委会为了全面了解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的发展以便少数民族进行自己的社会改革，组织了一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比如，四川凉山的奴隶制和云南边境的那些比较更原始的社会制度，都是经过这次实地调查才搞清楚的。现在我们能对这些民族过去的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些，那是花了很大力量才得来的成果。这些调查材料，不论水平如何，是十分珍贵的，

保存了好多年，套数不多，动乱时期受到了严重损失。广西的情况我不清楚，据说贵州是一车一车地拉出去烧，差不多烧完了。大家辛辛苦苦下去调查来的结果，他们拿到手一下子哗啦哗啦地都烧了。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民委决定，没有烧的调查资料，我们赶紧要保存下来，用上它，物尽其能。这是编辑四种丛书的由来。我们要抢救这些材料。把过去的调查材料整理出来，要赶快把它印出来。将来让子孙看一看，我们那个时代是个什么水平。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子孙搞得比我们更好些。我们有什么就应该拿出什么来，不要放在抽屉里。现在《中国少数民族》这本书已经印出来了，民族语言也出了好几本。广西的瑶族、壮族简史出来了没有？大家要努力。我们要把过去的东西整理出来，拿出来给群众看。这些知识是大家的，谁也不能独占。这些材料中固然还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这不要紧，要说清楚，知识是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这些材料积累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能力和智慧。前几个月，我们开了一次会，决定这些原始材料，好的都要重印，不要再加工，内容绝对不要动，文字上尽可能保持它原来的风格，赶紧把它搞出来。关于“资料汇编”这一套，广西还没有搞出来，我们希望早一点动手，因为搞了出来，才能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精益求精。我们不能老是让人家、让子孙从头开始。每个想研究民族的人都要重新调查那怎么行？我们应该高兴地看到后来居上，一代比一代高明。

我们的党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但是近20年来，这个传统没有很好地发扬。我们研究的问题应该在民族工作中提出来，不应该由哪一个人凭空想象出来。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怕出毛病，怕人家抓辫子，所以越搞越古，越搞越原始，讨论问题越来越空，离开实际生活，离开民族工作越来越远了。有很多重要的问题现在没有人去研究。主要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精神没有贯彻好。我们研究工作的目的就是及时了解各个少

数民族的情况，把我们的聪明才智集中起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忠实于事实。切不要打听行情。有一位同志去搞民族识别工作时，找我说，你看这个问题领导上是怎样认识？我说，领导上知道了答案还要你去调查干什么？因为不知道才要你去调查。这个风气，实在坏得很，那是欺骗领导，蒙蔽领导。我们过去有些社会调查是不科学的。现在我们要提倡科学的调查研究，那就是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方法。作为一个科学家应该不怕戴帽子，假如我问心无愧，确实是实事求是，戴上的帽子不对头，将来还是会摘下来的。自己看不见不要紧，子孙会看见的。要有这个气魄，才是真正的科学工作者。

当前少数民族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呢？两年来，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民族在经济上、科技上落后了。这是几百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最近几十年差距更扩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对于自然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认识了客观世界，可以掌握它为我们所用，这是我们的力量。对于客观世界不认识，不能掌握它，这是很危险的。中国在科学和技术上现在是落后于先进国家了，我们一定要赶上去，这就是现代化。在国内，我们各个民族之间也有差距，这是历史造成的。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比较少。在向四化进军中，各民族之间差距到底有多少？差距在扩大呢还是在缩小？差距扩大了会有什么后果？这两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民族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目的也就是在缩小民族间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差距。我们大家要加倍努力，在目前这种状态下，不努力不行，我们一定要有志气。

我到澳大利亚去访问时，从澳大利亚的民族问题，想到了中国自己的情况。澳大利亚的民族问题就发生在当前土著民族和现代民族的差距太大。其实这不只是澳大利亚特有的问题，而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各民族间同样存在差距，只是

程度有所不同。假如没有共产党，不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我国少数民族的前途是十分危险的。这一点我们的少数民族是很清楚的。如果现在仍是国民党统治，不用几十年少数民族就不能活了。澳大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少数民族政策有了改变。他们认识到如果继续过去那种生活，他们的土著民族很快要死完了，所以采取了所谓“保护政策”。那就是从政府收入中拨一些钱来改善少数民族生活，帮助他们发展教育、文化。但是只靠别人的救济，土著民族还是发展不起来的。作为一个民族，要靠它自己的力量才能发展起来。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是要保证少数民族的发展。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同澳大利亚实行的民族救济政策出发点是不同的。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是由先进民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帮助少数民族创造一个发展的条件，由少数民族用自己的力量、智慧赶上先进的水平。少数民族在经济上要自主自立，政治上要自治自理，再加上先进民族的帮助，他们就可以很快发展起来了。而澳大利亚采取的方法，只是由先进民族出钱出力帮助那些少数民族的个人维持生存，免于灭亡，这是维持不了一个民族的生存的，更谈不上发展了。

要做好民族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我们固然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但是不能离开了实际去强加于人。我过去听说西藏高原种小麦长得很好，我真高兴，认为是一项很大的科学成就。后来经过调查清楚了。西藏人吃的是青稞，好像我们吃米面一样。他们拿青稞给汉人吃，汉人吃不下。我们说馒头和米饭好吃，可是他们说馒头米饭不好吃，比不上青稞。所以我们要人家种小麦，人家不高兴。这是生活习惯不同。要西藏的藏族积极地种小麦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他们推广小麦，怎能不产生反感呢？因此，我们党所制定的政策必须符合少数民族特点，从少数民族实际出发。他们喜欢吃什么就满足他们的要求。做少数民族工作

不能劈硬木头，不能搞大民族主义。你硬要搬我们这一套进去就得罪人家。各个民族有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予以尊重。要善于设身处地体会各民族的感情。

我们要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缩小各民族间的差距，既要积极，但不能急躁；既要帮助，但不能包办。要把民族工作做好，首先是要充分了解情况，那就是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过去我们调查研究不够，今后必须端正研究工作态度。对广西，我是很有感情的。我研究民族问题就是从广西开始的。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解放后在这片土地上各少数民族欣欣向荣的一片大好形势。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我来了，今年龙胜各族自治县成立 30 周年我又来了。我在广西逗留的时间太短，说不上调查研究。真正研究民族问题，必须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交谈，了解他们的感情，他们的问题。研究工作不能只靠书本，更不要以抄书代替研究。书是有用的，人家写出来的东西，学一学可以，但比不上你深入实际，亲自看见的东西你才能识别真假，光看人家写的怎么分辨真假呢？不要迷信书本。要读书，要理论，但更要实际，要用自己头脑分析问题。相信群众，同他们商量。我认为我们的同学当中并不缺乏能到实际生活中去进行研究的人，希望学院多呼吁一下，让年轻人多下去跑一跑。

最后讲一讲社会学、民族学、民族研究、人类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这些学科有什么异同？我认为任何一个学科的形成都有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不是由哪个人先想好一张蓝图，画出来的。上面所说的这些学科，也不是在中国开创的，而是从西方输入的，过程比较复杂。所以不了解一门学科在国内的发展同国外的发展，是很难把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的。让我先讲社会学。在我国的大学生里开设社会学课程大概是 20 年代开始的。内容主要是讲外国的，又主要是美国的社会。当时在大学里讲的社会学大多不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讲的，所以说并没有联系中国的社

会实际。1930 年我开始读社会学的课程，当时我很不满意。因为课堂上所学的并不能帮助我解决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比如我们所处的时代同父辈所处的时代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有这些差别；今后会怎样发展等等。学了社会学而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怎能使人满意呢？所以有些学生提出了社会学要研究中国国情的要求，社会学要本国化。现在回想起当时我们所提出的这种要求可以说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在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时代，学术界也是被他们所垄断的。在当时要求社会学中国化实际上也是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几年我到国外去访问，了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斯拉夫、法国、西德等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国家都提出了社会科学本国化的要求，要求用自己的社会科学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美国是个霸权主义国家，它给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很大压力，引起被压迫者的反抗。这点在美国不太容易看出来，但到加拿大的西部一看，就可以看到。那里有几个新发展起来的省，工业发展很快，农业基本上是现代化的，种小麦、收麦子都是用机械。他们有矿藏、油田，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它们和霸权主义的矛盾就明显了。就在这些地方有人提出要社会学加拿大化的要求，要把加拿大社会上的实际问题作为他们社会学的研究课题。

我到澳大利亚时说我们正在搞社会学，要办社会学系，请他们把社会学的教材给我看看。他们给了我一本《澳大利亚社会》。他们说，这是因为要通过澳大利亚社会的实际来讲，也就是我上面所说的社会学本国化的例子。我们在中国讲社会学，有一条总的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建立我们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中国社会学。

现在世界上科技事业大发展，电子计算机已经在各个领域广泛使用，中国人在科技的发展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在

国外的科技界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美国，各国移民中平均文化水平最高的是华人。中国的历史悠久，外国是比不上的。我们要有志气发展民族文化，闯入世界经济和文化领域。对于国外的先进的学术成就，我们要引进。国外先进的学术成就应该翻译过来。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很多是值得向他们学习的，有些是必须学会的，不学会我们会吃亏。解放初，中国曾经不要社会学了，理由也说不清，大学里原有的社会学系也撤销了。到1956年，中国的社会学家中有些人提出中国为什么不搞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当时党内也有不同意见。“文化大革命”的10年，社会学这门学科是个重灾区。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后，社会科学院才决定重新再搞社会学，现在已经有了社会学会，并且在一些大学里开始授课，还要成立社会学系。当然，现在我们所建立的社会学和解放前在各大大学里讲的社会学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

人类学的来历和社会学不同，它是在英国帝国主义统治世界各殖民地时产生的，当时英国的一些科学家接触到世界上各种不同民族，他们对人类的由来和文化的发展发生了兴趣。人类学就是这样从广泛的对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人类学的内容也逐步丰富起来，包括考古、语言、体质、民俗、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后来这些方面都独立自成为专门的学科，但是依旧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有些国家它们还是作为人类学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中国对人类学的研究是比较晚的。我们是从研究少数民族开始的。解放后，由于民族工作的需要，我们对少数民族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开展，主要是偏重于语言和社会历史。并没有对这些研究称作人类学，而称作民族学。但是也还有人认为民族学只能指对少数民族社会的研究，不能包括语言和历史。如果要包括这些方面在内，只能说是民族研究。由于对这些学科的名称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所以常常引起名称上的争论。我总是认为学科的名称

和内容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能有统一的认识当然是好些，一时不能统一也不必强求一致。但要明确自己用这些学科的名称时指的是什么内容。望文不能生义。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各有它们传统的领域，但都有交叉部分。我们只能就事论事，很难用是否“合理”来衡量。比如我们所通用的“民族学”却不包括汉族的研究在内，顾名思义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民族学一方面要包括考古、历史、语言、体质、民俗、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又要包括所有的民族，那就和“人类学”等同了。在中国，目前的民族学实际上是指对少数民族的研究，甚至只指对少数民族当前的社会情况的研究，如果是如此，那也就和“民族社会学”等同了。在学科的名称和内容上我看还是容许百家争鸣的好。我们的精力也是集中使用在研究实际的问题为好。耗费在名称上恐怕是得不偿失的。

1981年8月25日

龙胜猕猴桃

今年8月我去广西龙胜庆祝这个民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在一次宴会上尝到了酸甜的猕猴桃酒，至今犹觉余味在口。我原是不喝酒的。过去支气管炎严重，俗名气喘，不得不忌酒，没有养成喝酒的嗜好。所以，在席上当主人劝酒时，我还是掩杯婉谢。好客的主人却为我解释说：“这不是酒，酒精成分很低，应当说是一种饮料，一种有益的饮料，特别对老年人有益，经常喝它可以长寿。”我对这种说项反应还不够积极，对我这个人说来长寿的吸引力不大。主人看我没有行动，接着又说：“我们还在想法推广这种酒，它可以使我们山区的少数民族富裕起来。你尝尝，为我们出把力。”这一说，我不能再消极了。一上嘴，也就抗拒不了。酒下咽喉，话多了。

话是从孙猴子偷王母娘娘的寿桃说起的。自从幼年时节听到了这段故事之后，在我的意识里，猴子、桃子和长寿也就联上了。这个故事原是神话，那种联系也只能供研究儿童心理学的朋友们作研究题材罢了。后来我读了一些人类学和民俗学的书，了解到有些民间传说保留着不少宝贵的民族经验。有一次想到孙猴子偷桃子的故事时，突然发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桃子和人的寿命会联系起来的呢？早年我们乡下，亲戚们做寿，要送面条和寿桃，寿桃是做成桃形的包子，上面还染上一点淡红颜色。面条可以说象征长度，桃子为什么可以表示人的寿命呢？桃子和人寿的联系是先于《西游记》，还是《西游记》的作者采用了民间传说呢？于是我又进一步问：桃子和人寿会不会有科学的联系呢？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我的学术水平所能解决的，因之也只能作为一

个有趣的问题搁在心头。真想不到这杯猕猴桃酒竟然浇入了我的心头，又惹起了这个问题，使我醉蒙蒙地产生了种种联想，似乎见到了桃子和人寿之间的科学联系。我这样说，是想表明这些话并不能排斥这是我醉后之言，失实的可能是大大存在的。

要说明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就得先讲明白猕猴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并没有看到过猕猴桃，更没有吃到过猕猴桃，我只喝了用猕猴桃酿成的酒，吃了用猕猴桃制成的果酱。看到的只是在装猕猴桃酱的瓶袋上画着的猕猴桃，看来有点像个桃子或小梨子。加上那天席上的主人们给我的介绍，我多少能想象出，在没有酿成酒和制成果酱之前的猕猴桃是个什么样子。让我接着按我所知道的说下去，如果说得不如实或说得还不够，那就请予纠正和补充。

猕猴桃是我们中国的土产，原是野生的果实，一般大多称它作“桃”，所以科学名称是“中华猕猴桃”。俗名也有称作阳桃、平桃、鬼桃等，但也有称它作“梨”的，如藤梨、毛梨。近年来已经有些园艺场在做人工栽培的实验，而在新西兰，从我国引种之后，已经大规模推广，成为一种重要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园艺作物。

把猕猴桃归入桃类，除了传统名称之外，我不知道有什么科学根据。形状上像桃是事实，但是一般说桃子是长在树上的，而猕猴桃却是藤本植物。它攀附在其他树木上蔓生，高的可达10多米。结的果实产量很高，一株老藤可以达二三百斤。一般长在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坡上；也有较低的，听说现在北京都有了。由于它要依靠别的树才能生长，所以都蔓生在林区，也因此和山区的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山区各族人民喜爱的野果。

野果尽管好，尝到的人究竟不会多，猕猴桃在深山里和猴子们打交道大约已有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了。被称作猕猴桃很可能

是因为人们是向猕猴那里学会采集这野果来吃的，至少也表明在人们采集这野果之前，它早已成了猴子们的珍品。猴子和这桃子都生长在山区森林里，它们也就这样联系在一起。

我不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发现了这种果实具有高度的营养价值和医疗性能。我没有查阅本草是否已有记载，至于用科学方法检定它的化学成分必然是近年来的事，所以这从科学资料里应当可以查得出来。我认为这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来对待，发现的人应当留下姓名，受到荣誉。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猕猴桃营养价值之高是突出的。只以所含维生素 C 一项来说，它远远超过其他的果品、蔬菜。每 100 克猕猴桃含有 100 到 420 毫克维生素 C，同样重量的橘子只有 30 毫克，广柑 49 毫克。目前大家抢着要买来吃的山楂也只有 89 毫克，只抵猕猴桃的 1/5。如果用猕猴桃制成浓缩果汁，100 克果汁中可以含有 900 毫克维生素 C。我喝到的猕猴桃酒每 100 克含维生素 C 206 毫克以上。

我举维生素 C 的含量来表明猕猴桃所具有的高度营养价值，因为维生素 C 的营养价值及医疗性能是我们多少知道一些的。猕猴桃所含有营养的化学成分当然不限于维生素 C，我不在这里多说了。由于它具有这样富含营养的化学成分，它也就具备了相应的医疗性能。龙胜酒厂给我的《中华猕猴桃简介》上说：“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应用极为广阔，对高血压、心血管、肝炎等症均有疗效，尤其是有防癌作用，特别是对消化食道癌、直肠癌疗效更佳。”当然，我不能为这个简介作证，但是我相信这样说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没有这样突出的营养和医疗价值，最近新西兰和日本也就不会这样把它视如至宝地加以培植和推广了。据我在桂林遇见的一位朋友说，他访问新西兰时，想去参观他们培植猕猴桃的地方，却遭到了婉言拒绝。不要忘记，新西兰的猕猴桃是近年来从我国引去的。

我这次去龙胜原是为这个自治县祝寿的。按传统的规矩，祝寿得带点寿礼。秀才人情，我有什么送给龙胜的各族人民呢？他们在广西各少数民族中是最早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这30年里，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获得了民族平等。各族人民共同当家做主，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化外之区”的面貌。在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上，在贯彻计划生育等方面，成绩是突出的，多次受到表扬。但是还有一项，需要努力才能改变过来：龙胜靠河谷的壮族和侗族居民，这几年来，特别是今年，虽不能说已经繁荣富足，但仓廩充实已是普遍现象；而住在高寒山区的一些苗族和瑶族，至今生活还是很穷困，靠救济粮过日子，因此高山地区和河谷地区的差距也就特别突出了。如果我有能力向龙胜送个寿礼，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的话，那就得出点主意使高寒山区也富足起来。向我劝酒的主人所补充的那句话为我开了个窍门。如果靠我这支笔能促进猕猴桃的栽培，不是可以大大增加高山上的居民的收入么？

怎样改善高寒山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30年前我去西南访问少数民族地区时，看到住在高山上的人，背土上山在石头缝里种玉米，费那么多劳动而收获得那么少，使我发生一种想法，这些贫困的少数民族还是搬下山来的好。他们过去怕民族压迫和歧视，躲到山坳里去，实在太苦了。现在民族平等了，应当可以下山了。当时同我一样想法的人也不少，而且有些地方还真的让出平地欢迎山上的少数民族兄弟们下山来。但是后来又听说，有些搬下山的少数民族又回到山上去了。什么原因我没有去调查，这种传闻使我重新考虑这个问题。高寒山区是否也有它特殊的优势可以发扬出来，把“穷根”变成金饭碗呢？在大瑶山里和瑶族同胞接触中，我得到了启发。

大瑶山里有一部分瑶族叫茶山瑶，他们的妇女盛装时头上戴有两块银板，有1斤多重。我初见时，心里想，这未免太重了，

真难为这些姑娘们，顶着沉甸甸的东西还能跳舞。再一想，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的呢？我寻根问底才知道，在大瑶山里有一种很值钱的香草，在茶山瑶占有的老林里产量很高。解放前有客商进山来用银子换香草，茶山瑶把这些银子积蓄起来，打成装在妇女头上的饰物。这件事说明高山老林里不缺乏值钱的土产，可以大大发展经济作物。如果把那些多少世代已经习惯于山居的人搬下山来，这些财富不也就白白丢掉了么？我早年那种“下山”的主张，既不切实，又不经济，“靠山吃山”也许是山居民族更广阔的出路。“靠山吃山”就是要发展山区特有的经济作物。

猕猴桃是一种可以大大发展的山区经济作物。如果真的大大发展了，不仅可以给广大市场供应这种营养价值特高的果实及其加工品，而且可以使高山上居住的少数民族大大地提高他们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为物质和文化建设提供经济基础。

猕猴桃能培养成高产和高值的经济作物，龙胜的领导同志几年前已经知道，而且为此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龙胜的科技委员会已把调查及开发利用这项资源列入研究计划。70年代后期建立了酒厂收购猕猴桃酿酒，那就是我在宴会上喝到的美酒。后来又增加了果酱和饮料冲剂，但是离发展成一个食品工业还有些距离。首先是猕猴桃至今还是野果，在自然条件下自生自长。人们不过在这些果实成熟时去采集罢了——还处在采集经济的阶段。怎样使之成为人工栽培的经济作物，还得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实验推广的过程。现在全国各地固然已经有些科研机关在进行这项工作，但是还只能说是个开始。怎样加速这些研究和实验工作，尚有待高一级领导的重视。上面提到新西兰的情况是值得我们反省的。他们是近年来从我国引进这种藤苗的，在不长的时间里已经建立起人工栽培的猕猴桃园，规模多大，我不知道。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采集经济有它的落后性。深山野林里，这些果藤自生自长，

良莠不齐，无人管理。自从龙胜酒厂收购这种果实以后，任何人都可以去采集。有些人懒得攀登树木，索性把树木砍倒，把藤上的果实拾尽而去，完全是杀鸡取蛋。猕猴桃藤龄极长，至少有30多年寿命，个别可达百年。七八年的藤株年产桃30斤到200斤。现在采取了收购的办法，鼓励采集，结果就发生乱砍乱伐。龙胜酒厂在1977年收购达40万斤，到1979年下降到8万斤，去年只有2万斤。这种资源不仅在数量上正在迅速下降，质量也在下降。产量多的品种被砍的机会多，等到我们的科技人员入山访寻良种时，良种已所余不多了，所以要保护资源必须赶快进行人工栽培。

猕猴桃可以说是自然的浓缩营养品，把它看作美味鲜果是不够的，这贬低了它的价值。正确地、如实地核实它的营养和医疗价值是一项科研的课题。现在不是正在搞学位制么？在这个课题上有人能提出一篇高水平的论文，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博士。我们的博士必须是用科学知识为人民造福的学者。我们要自己创立“国际水平”，这个水平我认为应该着重以结合我国人民的需要为标准。

猕猴桃要能成为我国食品工业和药品工业的一个重要原料还得大大开辟制成品的种类。以食品一方面说，龙胜酒厂除一般用来酿酒以外，还制成了果汁作饮料，并且浓缩成颗粒，随时可以加水冲饮，称猕猴桃晶。在我看来，这是一条可以大大发展的路子。最近我看到美商在我国千方百计设法推销“可口可乐”，心里着实不那么舒服。“可口可乐”是一种会上瘾的饮料，并无营养价值，我们如果上了这种瘾，绝不是件好事。我看我们应该把“可口可乐”作为促进我们发展饮料的挑战。我们有饮茶的习惯，对茶的科学研究已经发现了它有许多对健康的益处。但是单单用茶来对抗“可口可乐”恐怕还不够，我们还得多试验一些有营养价值的饮料出来，用以抵住这些对健康没有多少好处的舶

来品。茶是一种，猕猴桃汁也可以成为爱国饮料之一。

从这远景来看龙胜的酒厂，确实只是一棵刚出土的嫩芽。它所出的猕猴桃酒到了桂林就不容易买到。我曾问过宴会的主人，为什么不扩大这种酒的产量呢？答复是：投资少，原料有限。针对这种情况，那就得赶快在山区建立人工栽培的猕猴桃园，变乱采集为有计划的种植。根据产量的逐年提高，扩大加工厂，踏踏实实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一个大有前途的以猕猴桃为原料的食品及药材工业。

我从广西回来，《八小时以外》的编辑同志向我征稿。我也就利用这个机会为龙胜各族人民补送一个寿礼。希望我这篇漫谈能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注意，更希望许多关心长寿的老同志和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朋友们一起出力，从各方面来推广这种“寿桃”，造福于人民。

1981年9月于北京

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 1}

今天我想同大家研究一下，我们的瑶族调查下一步怎么搞，想征求大家的意见，商量商量。这两年已有三个同志去瑶山调查了几个月，我也跑了两趟。我们有了点新的看法，对一些问题比较清楚了一些，可以提出来谈一谈。

首先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中央民族学院搞民族研究工作，到现在已经 30 多年了，在座的许多同志都是老兵了。以前都是年轻力壮的，现在是中年或老年了。一转眼，我们这一代人就要过去了。总的说来，我们这一代确是走了很大一步。首先应该肯定这点。我们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从很局部很局部，零零星星的，一直到全面的、全国性的调查。这在全世界是少有的，值得自豪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后的 30 年应该怎么走？我们要为后辈开点路子。昨天看了一下这本《中国少数民族》。外边很重视这本书，这么厚。有了这么一本，人家就能知道中国少数民族究竟怎么样，这是好的一面。在开始决定编写这本书时，我就说不管它好不好，我们要把我们已经达到的水平摆出来。好的大家肯定，不好的也不要紧，留着和今后的比较，今后更好了就是进步。一切事不能求全，不可能一步登天。实际上做了的工作摆出来看看有好处。

现在我们要再回头想一想，毛主席、周总理早年叫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实地调查。在座的同志们很多都参加了。那时要充分准备好了再下去，已经来不及了。

* 本文是作者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的讲话。

说老实话，我们在社会调查研究这门学问上训练是很不够的。回想当年抗战年代，兵荒马乱，怎能安心学习？我在西南联大时，学生们也整天搞运动，比较优秀的学生搞地下革命活动。那时要读书，书也很少。解放后，我们为新中国带来了多少遗产呢？我们对中国社会认识得太少了，我们没有多少调查资料，资产阶级没有做，所以还得我们自己来做。我们在50年代就是这样冒冒失失地上阵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搞调查的，到现在已有30年了。那时的精神的确不错，劲头很大，访问团到处跑。但是我们的理论的确不多。我们搞来了一大堆资料。《中国少数民族》这本书有点成就的话，归根到底是50年代很多同志一起打下的基础。我们必须从旧的好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不要脱离我们原来好的东西，就是要下乡，要接触少数民族，要实地调查。我们不能满足于《中国少数民族》这本书的水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当可以再进一步。大家想一想，怎么把它搞深一点。

我想大家不会反对：我们要恢复早年社会调查的这个传统。这是党的优良传统，是毛主席一向提倡的传统。毛主席伟大的贡献还不是在他把马列主义引进到中国来，结合中国实际创造了最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熟悉中国农民的力量，他从小在农民里边生活。他能提高到理论进行阶级分析，处理中国农民问题，动员中国农民的力量，把三座大山推倒，这是过去马克思没有想到，列宁也没有想到的。毛主席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中国情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学的不是学人家的结论，结论是历史范畴里边的东西，我们要学习处理事情的方法。要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我们要有点气魄。中国也要出马克思嘛。不能说人类历史上只能有一个马克思。我们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出毛泽东思想，我们却不能停止在毛泽东思想上。决议对这个问题就说清楚了，我们还要发展。怎么发展？不是靠空想，而是靠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地看中国的变化。当前的中国是人类历

史上的一个大实验，特别在民族范围里边，这个实验多大呀。这里有着多少宝贵的东西，看我们自己去拿不拿。如果我们不拿的话，人家要指责我们：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后代人会说，这么好的机会你们不记录下来，不分析出来，还要叫我们来考据。我总是要说，大家应当想到这一点，到60岁的人不能不想到这一点。我们到80岁也只有20年了，不要辜负这20年。我们必须自己动手进行调查。发号施令，那很容易，但是不行，这不是创立一个新局面的精神。我们必须自己动手去实验，自己下去调查。

我们下去调查什么呢？我们过去有个经验，我们的民族调查要适合具体的民族工作的要求。参加民族识别的同志们都知道。当时这个问题不能不搞，因为开人民代表大会要有各民族的代表出席。我们中国究竟有哪些民族，各个民族各有多少人？这些问题必须搞清楚。当时为了要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为了要培养翻译人员，所以在中央民族学院办了语文系，开了很多语文班，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当时我们是从具体工作需要出发来干的。这里面出了一些偏向，大家有很多意见。但并不是说在理论联系实际，知识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上出了问题。这些原则还是对的。后来做得不对的，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用行政方法来对待研究工作。做完了就完事，写完报告就不再去研究了，就放下了。我们跟着行政需要在那儿跑。跑得很急很忙，但就是没有法子提高。这是领导研究工作的人要负的责任，后来当然更厉害了。今天不去说它了。

我们应当看到，现在我们的民族工作更复杂了，需要更多的知识。要搞区域自治，光凭几条纲要已经不够。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草地怎么办？森林怎么办？其他资源怎么办？牵涉的问题很多。目前正在开会研究。研究这些问题就必须了解具体情况，这就要深入调查。

让我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大瑶山。解放以前它是长期不受汉族统治的地区。但是在经济上它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大瑶山的山势很险。我 1935 年进去时，一天只能走一个村子。由于险要，以前汉族统治势力进不去。在大瑶山的附近有个地方叫大藤峡，明朝的统治者和瑶族在这里打了 100 年的仗。在历史上，汉族进入广西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桂林下去，后来形成了一个桂林官话区；一条从广东进去，后来形成了一个白话区。这两条路线，就在大藤峡一带碰头。在明代之前，这一带可能都是瑶族聚居区，隔住了南下的汉族同西上的汉族。到明朝这时候汉族就开始要打通这地区，所以和当地的瑶族打了 100 年。这场战斗，瑶族失败了。很多不同的集团，在不同的时间退到这大瑶山里，依靠险要的地势，生存了下来。在大瑶山里，聚集了许多不同来路的人，至今还有五个名称不同的集团。

这些聚居在大瑶山的集团都称为瑶族。他们抗拒住汉族或壮族的统治，在政治上维持了自主的局面。直到这个世纪的 40 年代国民党的广西地方势力，利用现代武器和大瑶山里瑶族集团之间的矛盾打了进去，至少在名义上建立了对瑶族的统治机构。1949 年全国快要解放时，国民党想在里面搞据点，有一部分反动军队开进大瑶山。他们在山里无恶不作，引起了瑶族人民的反抗，造成了解放的条件。当地瑶族和我们解放军结合起来，把国民党军队消灭在山里面。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瑶山在行政上划分给六个县去统治。解放后，我们首先把这个瑶族聚居地区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行政单位。这在原则上是对的。山里边的居民都承认是瑶族，而且原来就有维持山内社会秩序和抵抗外族入侵的统一的政治组织叫大石牌。尽管他们的来源不同，语言有别，可是他们在共同命运中，结合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瑶族。

为了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52 年大瑶山的瑶族聚居区

成立了自治地方，即今金秀瑶族自治县。这个自治地方的区域怎么划呢？由于当时对民族区域自治还缺乏经验，所以只看到政治上的平等团结，而没有充分注意到享受自治权利的民族的发展前途。金秀瑶族自治县就以山为界，界线沿山脚划定。这种沿山脚划界的办法现在看来是很成问题的。这里牵涉到我们的认识问题。为什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呢？实现民族平等固然是这个政策的最终目的，但是要使各民族真正能达到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还必须要有事实上平等的基础。要使各民族在经济上达到平等的地位，就有待于帮助不发达的民族发展起来。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应当提供各民族发展的物质基础，一个自治的地方。

金秀瑶族自治县的问题就在于按山脚划界的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不相符合，因而发生种种经济发展上的困难。大瑶山是桂江和柳江之间的一个山区，山区周围是平地。山区的中心是海拔1900多公尺的圣堂山。从这中心有若干条河作放射形地流向平地，分别汇合在桂江和柳江。由于这种地形，山内交通很困难。人们只有沿着河流向外走，通到山外。山内原本没有市集，市集都在山脚之外的平原地方。金秀的土产要运到邻县的市集上去出卖，再从这些市集购买消费品，所以在金秀县内收不到多少商业上的税款。这就影响了这个县的财政。金秀自治县入不敷出，年年要靠上级津贴过日子。金秀是个宜林的山区，历来粮食不能自给。他们用木材和林区副产品到山外换取粮食。后来搞以粮为纲，自己出产粮食，但是依旧不够，还得靠上级补助统销粮，成了一个“三靠”县。这一切困难的基本原因是在它的行政区域不符合经济区域。

提到民族自治地方的区划问题，我们可以回想起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时的一段历史。广西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时，最早成立的是桂西壮族自治区。他们在广西西部穷山区，搞了一个壮族自治地方。周总理说：不行，这样搞下去，就是画地为牢，这个民族

是发展不起来的，必须以原来属于广西的这个地域为基础成立壮族自治区，尽管汉族人数超过了壮族。那时有许多人反对，经过说服，讲道理，大家才同意。从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知道，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不是民族分割，而是民族团结，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这对汉族、对每个民族都有好处。所以我们应当根据发展的条件来划定自治地方的区域。周总理总结了过去一段时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才作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划的决定。现在回想起来，在1952年成立金秀瑶族自治县时，我们的确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而现在呢？我们必须重新考虑金秀的县界了。

关于大瑶山的瑶族让我再讲一点。假使我们带着教条的脑筋去看，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大瑶山的瑶族中各个集团的语言不同，算不算一个瑶族。有人会用简单的办法来加以解释，说他们是方言不同。这是我们过去采取过的方法。什么叫语言不同？什么叫方言不同。从来没有好好讲明白过。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花蓝瑶讲的话近于苗语，茶山瑶讲的话近于侗语，盘瑶讲的话属于瑶语。往历史上看，这是能明白的。我上面已经讲过，这些集团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地方进入这个大瑶山的。他们保留着一些原来的语言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来研究这些问题。但是既然这些集团都说自己是瑶族，而且他们还有共同的维持山内社会秩序和抵抗山外侵入的社会组织，不能不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我们不当用条条框框去硬扣在活生生的事实上。但是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他们会形成一个瑶族，而这个共同体同时为什么还能容许各部分有不同的个性？这样一问，我们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也就深入了，大瑶山也就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些问题的一个实验室了。

大瑶山里的具体情况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想到过许多问题：什么叫瑶族？瑶族的分布怎样？为什么贵州很少瑶族？为什么一到广西，苗族就很少了，而且只在北部靠贵州那一条边上？这里

似乎可以划出一条界线，北面是苗，南面是瑶。可是一到东头却既不是苗，又不是瑶，而是畲了。其故何也？这里有个历史的解释么？我于是想到潘光旦先生的那一套设想来了。有一个时候我们常在一起讨论这套设想，后来我讲给郭沫若先生听，他也觉得很有意思，认为可以进一步研究。潘先生的设想是苗、瑶、畲这三个民族在历史上有过密切的关系，可能是早年从淮水流域向南迁徙的中原移民。在这里让我插一句，这种设想是要我们从历史上去找这三个民族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同源论”，更不是要把三个民族画等号。

潘先生从族名和地名的联系，从民间信仰和传说的研究构成一种设想。他曾说，我们可以从徐、舒、畲一系的地名和族名中推想出一条民族迁移的路线，很可能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夷中靠西南的一支的族名就是徐。他们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现在还留下徐州这个地名。这时期的文献中也看得到这地区的人称作舒。潘先生更从瑶、畲的盘瓠传说联系到徐偃王的记载，认为瑶族中的过山榜有它的历史背景，只是后来加以“神话化”罢了。这一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瑶；而从南岭山脉向东，向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

我现在只能凭记忆来讲潘先生的设想，这里有研究畲族的同志可能也听见潘先生讲过这个设想。我认为这个设想给了我们进一步研究这问题的线索。这种设想的重要性就是为我们提出一个宏观的整体观点。过去我们的民族研究很多是以现有的民族单位为范围的，《中国少数民族》这本书的体例就是如此。这当然有它的好处。但是在研究工作上已经遇到它的局限性。因此，这几年来有人提出要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如果再进一步就是要把中华民族看成一个整体，研究它怎样形成的过程和它的结构和

变化了。

潘先生的设想指出了我们中国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而这些流动有它总的趋势。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里，总的说来是北方民族的南下或西进，中原民族的向南移动，沿海民族的入海和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现在的国境。这一盘棋如果看清楚了，我们现在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就容易说明了。

宏观的研究还得和微型的研究相结合。中华民族又分又合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作具体的观察，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只能通过文字记录、遗留的文物，以及现有的风俗、习惯、传说、信仰等去推考，但是如果从微型的具体实况来观察各民族间又分又合的关系，就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变化过程的理解，充实我们对民族问题的理论认识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大瑶山提供了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园地。

苗、瑶、畲提供了山区民族的一种类型。壮族就和它们不同，它既是一个小民族，又是一个大民族。对于汉族来说，它是个小民族；对于苗、瑶来说，它是个大民族。这是它的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当前民族工作中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再说西边从甘肃南下到云南西陲的这个走廊，历史上彝族属系的不同集团曾在这里建立过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正处在汉藏之间。这几个大民族在这地区你来我去，我去你来地搞了几千年。来回的历史流动，都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冲积的沉砂。所以，我在前年曾经指出过，这是一个极值得研究的地区。但是我们对彝族至今还没有个全面的认识。一谈到彝族就是凉山奴隶制。要知道这只是彝族的一小部分，而且是历史的残余部分。实际上彝族的各部分发展很不平衡，许多部分早已超过奴隶制阶段了。现在已经认定的云南地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我想不少是和彝族极为密切的。为什么分成这些民族也是要进一步研究。

我这样说是为了要指出过去的民族研究是按民族的单位孤立

起来，分别地一个一个研究，在方法上固然有其长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今后似乎要进一步和宏观的研究配合起来。最近听说西南几省的民族研究工作者联合起来一起攻关，要把藏汉之间的走廊地区进行一次调查，那是很好的。我希望云贵高原也不妨作为一个单位来进行一次综合调查。我们现在广西大瑶山进行的调查，其实是另一个地区，即南岭山脉这个走廊的综合调查的起点。

关于宏观的民族研究让我再多说几句。我在清华研究院结业时写了两篇论文，其中之一是《朝鲜半岛人种类型的分析》，这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我发现这个地区有较多的圆头、身高平均在1.6米以下的B类型，B类型是现在我国南方沿海诸省的主要居民。从历史上看这种类型的人可能是早期的东亚沿海居民。现在华北居住主要的A类型，可能是后来从西部进入华北而把B类型挤开，一部分越海去朝鲜半岛、日本及其他岛屿；一部分就向南，迁到江、浙，甚至粤、桂。这是说，在那一股从淮河流域南下的移民之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和这种类型的人有关的。再说，晋时淝水之战，谢安故作镇静，听到胜利的消息，心情激动，倒穿木屐。这个故事我们都熟悉，试问，这种木屐文化现在哪里去了？日本人现在却还在穿木屐。

从宏观的研究来说，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

回到《中国少数民族》这本书，成绩我已肯定，如果说它不是的地方，就是缺乏宏观的总结，也不够微型的调查，两头都差。今后我们就得两头一起抓，既要有宏观的研究，还要进行切实的微型调查。

现在我想讲一讲“微型”的研究。微型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内，同当地人民结合起来，对这地方的居民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研究。这种微型研究是过去社会人类学常用的方法。我们也做过这种研究，比如我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都是例子。但是在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中还不多，而且也不够“微”，也没有能体现“型”的特点。“微”是指深入到生活的实际，而不是泛泛地一般化的叙述，要做到有地点、有时间、有人、有行为，这样才能说是“直接的观察”。“型”是指把一个麻雀作为一个类型的代表，解剖得清清楚楚，五脏六腑，如何搭配，如何活动，全面说明；而且要把这个麻雀的特点讲出来，它和别的麻雀有何不同，为何不同等等。这样的“微型”研究是民族研究的基础，通过比较不同的“型”，就能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观的认识。

微型研究主要是要研究者亲身到要研究的社会中去调查，不能满足于发几张表格去填写的方法。他要如毛主席所说的，和被研究者交朋友，体验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生活，听他们发表的意见，拜他们为师。真正的在社会生活中的人才知道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他们才是研究社会者所依靠的对象，才是研究资料的来源。在殖民地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利益的不同，所以研究工作存在着很严重的局限性。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矛盾才能解决，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利益是一致的。社会调查是用科学的方法帮助人自觉的过程，就是帮助别人自己能明白自己的社会生活的道理。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发展我们真正微型的实地调查。要进行实地调查，必须有一定的科学训练。我们要观察实际的活动，正确地把观察到的事物记录下来，要定性，又要定量，这些研究的资料必须提高到科学水平上。每一个数目字、每一件事情都要说明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

我自己看见的，自己要负责任。如果是用人家所说的，要说明是谁说的。一切数目字都要有出处。文章必须自己写才能写得好，这也是一个作者的道德问题。我认为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滋长了一种坏风气，就是做领导研究工作的人利用这个地位，指派别人代笔。我们这个研究所，当时还叫研究室，有个师傅当了领导，就这样干过，要几个笔杆子替他写文章。有时候也有人在别人写的文章前加一个自己的名字。这种风气我认为是不好的。

我们做导师，指导别人做研究工作，是叫我们帮助年轻人学会怎样做研究，怎样写文章。我们要求有助手，助手是帮助我们做具体的工作，不是请他们来代自己出成品。美国大学里有些教授就利用研究生和助理为他工作，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我们不应传染这种恶疾。做指导工作，既不当掠夺别人的成果，也不应当硬要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导师的责任是在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受指导者，至于受指导者是否接受这种想法，那是不能强制的。导师也不应当替受指导者去写论文，那是没有好处的，因为这样做并不能培养人，受指导者一旦离开导师就寸步难行了。跟导师做论文的人就得有自立的精神，自己要有创造性才行。

我为了要推进民族研究，有责任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今天把有关瑶族的一个宏观的设想提出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可是你们接受不接受，那是你们的事。谁听了得到启发，向这方面攻关，得到的成绩应当归功于他，他也可以在文章中实事求是地提到他这种研究是受到谁的影响。在这样的风气之下，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就出来了，责任性也出来了。也许可以说这是研究工作的责任制。我希望能逐步树立起这个风气。

现在让我讲一讲我们计划中的大瑶山调查的经过。

1978年夏天我去参加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时到大瑶山走了一趟，产生了再去瑶山调查的念头。既然我在1935

年去调查过，不妨利用这个基础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初步考察了一下，想到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一个是上面已说过的瑶族的形成问题。各个民族的形成可能有不同的过程。在这里很清楚，不同语言、不同来源的人，大家认为自己是瑶族，而且组织成了一个共同体，互相合作，有了共同意识，可是它里面还容许不同的个性存在。从这个实例里面可以看出一些规律来，不仅适用于金秀的瑶族，也可能适用于中华民族。

第二个值得研究的是少数民族从孤立到合作，从关闭到开放的过程。这是当前少数民族共同的经历。过去因为民族不平等，汉族压力太大，少数民族不得不以关闭为主；现在民族平等了，少数民族要发展，必须与先进的汉族合作。这个弯子怎么转？这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各民族在这个从关闭到开放、从对抗到合作的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也不可能一致。我们应当找出各种模式。我想，瑶族这个民族有它的特点，可以作为一个类型来进行研究。

过去我们从50多个少数民族的共同之处着眼，我们的工作也常常有一般化的倾向。这几年的具体工作里面已经发现“一刀切”是会犯错误的，所以现在已注意要区别不同的类型。有的是林区，有的是牧区，有的经济上相当发展，有的却还是很落后。不区别对待，就不容易做好工作。但是怎么样分类？这就需要我們深入研究了。

瑶族这个类型有它的特点：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很大的民族，后来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打散了，在山区里流动，进行游耕经济、依靠险要与外界阻断以自存，结果是闭塞和落后。这种民族自己没有文字，它的文化怎么发展？这就要具体分析。为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前途，不应安于被照顾，美洲的印第安人是前车之鉴：美国和加拿大现在确是花不少钱把印第安人养了起来，可是越养问题越大，精神状态都失常了。一个人要有自己的志气，民

族也要有个志气。我们要提倡并创造条件使各少数民族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但是他们底子薄，需要先进民族的帮助，既要帮助又要自力更生，这又是个要研究的问题。

民族工作要根据各民族的特点进行。我们做民族研究工作的人就有责任根据各民族的具体情况进行分类。分类就是要掌握个性和共性。我们要从各民族的历史形成的具体条件、发展的前途来区别不同的少数民族。这种研究才能适应今后的民族工作，使得民族工作改变一刀切或放任自流，而逐步地做到因族制宜，按实际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我在上面提到的瑶族可以代表一种山区民族的类型。这个类型可能包括苗、瑶、畲等民族。以这个类型来说，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又和其他民族有所不同。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它们可以说属于同一类型，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但是在它们之间还有它们各自的个性，相互不同。这种分析是我所说的宏观和微型相结合的研究。

我们这次调查研究，不准备大规模搞。过去一来就搞大规模的研究组织。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我们搞小的，小的可以搞得扎实一点。而且，这是个试验，就是搞不好，损失也不会大。所以我们先请中央民院出一位研究人员去开展这项工作，花两年时间，开个头，试一试。同时我想一定要和广西民院拉上关系，将来这个地区的民族研究主要是要广西去搞的，所以又请广西民族学院出一个人参加。我还希望有一个当地的瑶族同志，能帮助我们建立关系，为研究工作创造好的条件。这样组成一个三人的队伍。他们先是了解金秀自治县总的面貌，包括五个民族集团的情况。从全面一般的了解中，发现了上面讲到的金秀自治县的区划问题。1981年第二次去调查时，他们提出集中一点，搞微型研究。我很赞成。他们挑选了一个盘瑶的村寨。当时我并不明白盘瑶在瑶族里边的地位。后来看他们的调查，才想到盘瑶可能是瑶族的主干，就是说，在历史上这一股由淮河流域南下的移民，

开始时可能就是盘瑶的先民，他们在移动中，一路吸收其他的集团，形成现在的瑶族。

盘瑶在经济上也表现了瑶族过去的共同特点，就是经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他们不断流动，也可以称作“游耕”。他们没有长期固定的村寨，不能定居下来，不断迁移，前锋一直达到泰国。但是解放以后情况有了变化，游耕已逐步向定居转变，这对瑶族是个重要的历史性的转变。因之挑定盘瑶村寨进行微型研究，我觉得很好。同时我建议他们从这基点入手，能做多少做多少，不要希望一步登天。我们要承认水平不高，要下决心在实际工作里边锻炼，能有一点成就就肯定一点。他们在一个村子里住下，做了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

金秀自治县的瑶族一共有五个集团，盘瑶只是其中之一。盘瑶里边我只调查了一个村子。通过对这一个村子的调查，我们有了一个底子。这个底子至少比以前的调查要深一些了，可是他们不能代表整个盘瑶。我们还得以此为基础，去看看其他的盘瑶村寨，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盘瑶散居各地，从广东一直到云南。我们打算跟着这条线找几个点进行调查，看看他们有什么差别，这些差别是怎么形成的。我们也打算与此同时，对金秀瑶山的其他四个瑶族集团进行调查，其中有两个同盘瑶相近：一个是坳瑶，另一个是山子瑶。他们的经济条件基本相同，语言相近。可是为什么有不同的名称呢？是不是由于他们不同时间进山，来路不同？我们还要分别地进行了解。此外还有两个集团：一个是花蓝瑶，一个是茶山瑶。花蓝瑶是王同惠在1935年调查过的，现在再调查一下看看有什么变化。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是茶山瑶。茶山瑶在这个地区的瑶族中地位最高，势力最大，我们还要去人调查。我们将先从微型调查入手，然后综合五个集团的材料进行研究，看看他们是怎样形成一个共同体的。这样才能把金秀的调查初步搞个段落。以上是我的设想。我愿意从头到底帮助同志们完

成这个调查研究。我自己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要我自己去实地调查是做不到了。

总的说来，瑶族的研究，我们已走了一步。第二步要分两个方向前进。一是以盘瑶村寨的微型研究为基础，按盘瑶的分布，追踪前进，搞清瑶族的主流；一是在金秀研究其他四个瑶族集团，特别要以茶山瑶为重点，搞清楚他们之间是怎样合成一个共同体的。我的任务是为这个研究创造实现的条件，并尽我的能力指导这项研究。我希望已经投身到这个研究计划里去的同志们继续坚持下去，我还希望有其他同志参加。

1981 年 12 月 7 日

为什么要开展民族学研究

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大家对现实中国的国情，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不是已经懂得很多，而是懂得太少了。”这里说的中国是包括着我们国内所有 50 多个民族都在内的。在这许多民族中，我们懂得特别少的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对中国国情的研究，而其中对少数民族历史和情况的研究更是当务之急。

我们的国家很早就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是解放前，我们国家里的各民族并不是平等的。在封建王朝的民族压迫制度下，少数民族一般被视作“化外之民”，甚至得不到人的待遇。即使在承认“五族共和”的民国时期，少数民族还是低人一等。国民党反动派当权时，竟然公开否认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民族身份。因之，根本谈不到民族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一开始就提出民族平等团结的纲领。在北上抗日的长征中，在和少数民族的接触中，逐渐了解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相应的社会制度，制定和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受到了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尽管当时累积的知识还是零星的、不全面的，但是，应当说是民族研究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民族获得了平等的地位。我们党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同我国的国情相结合，制定了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这时，我们就感到对少数民族的知识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在解放初期，我们对少数

民族的情况确实懂得很少。即以我们这些做民族工作的干部来说，也说不出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究竟有多少成员，搞不清楚哪些地方聚居着哪些民族。至于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情况了解得更不深入了。总之，没有调查研究既无法制定、完善党的民族政策，也无法执行政策，进行民族工作。

解放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就派出中央访问团，除了到民族地区宣传民族政策外，还进行民族调查研究，了解各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汇集了访问团在各地的调查资料，我们才开始对我们民族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使我们在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全国各主要的少数民族都取得了应有的代表权，在我们的国家体制上正确反映了平等团结的民族大家庭的实质。

与此同时，为了促进各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改革和创制少数民族文字的工作提到了日程上。在各访问团的民族调查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指导机构，派出有语言训练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开始了有计划的民族研究工作，不仅为各民族文字的改革及创制打下了基础，也为后来其他方面的民族研究开辟了道路。

当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为了使各少数民族能按他们的具体情况，向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迈进，我们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必须有更深入的认识。为此，于195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进行一次比较普遍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的调查资料，并在实践中培养了大批民族研究工作的人才，为后来各级民族研究机关的设立创造了条件。

回顾我国民族研究工作的这段历史，至少可以答复为什么要开展民族学研究的问题了。我们之所以研究少数民族，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建立和巩固我们这个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我们的民族工作需要民族研究；我们开展民族研

究是为了要做好民族工作。也就是说，我们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知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

今后的民族研究工作我认为还是应当发扬这种精神。当前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民族研究工作必须从这些主要任务出发，进行实地的调查和理论的阐发。

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方面，就需要民族研究工作者正确地阐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并区别于当前民族关系已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的新情况，在新情况下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则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提供正确处理的依据，以达到加强民族团结的目的。当前特别重要的是要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在我国各族人民已经取得平等的权利，但是要实现这种权利还有待于在经济和文化上能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在经济和文化上我国各族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还是不平衡的，有些民族之间的差距也是相当大的。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逐步缩短以至消灭各民族之间的差距。因此，当前的民族研究工作必须密切配合这项任务，发动各项学科进行综合调查研究，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能有计划的发展起来。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中，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工作是决定性的关键所在。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地区是发展不起来的。怎样根据各民族的特点来培养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必需的民族干部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其中包括语言文字改革和创制，根据实际需要发展有关的科技教育，因地制宜地建立各族的教育体制等等。

我们的民族研究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这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必须密切结合我们的民族实际去推进关于

民族研究的理论工作。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我们革命者的行动指南，而绝不是要人们去生吞活剥的僵死教条。一切忠于马列主义的革命者，有责任不使它同社会生活隔绝，停滞不前、僵化枯萎，而必须以新鲜的革命经验丰富它，使它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民族学研究的园地里，我们有责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悠久的历史，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有这样众多的民族成员，拥有这样广大的土地和这样优秀的人民，在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必然有前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百折不挠地解决这些问题所取得的经验，必然会丰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世界上各族人民提供宝贵的借鉴，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开展民族学研究的远大目标。

1982年3月

谈民族调查工作的微型研究

社会调查，是党的优良传统。我们的民族调查，要适合具体的民族工作的要求，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地看中国的变化。宏观的研究和微型的研究，需要很好结合起来。中华民族又分又合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作具体的观察，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只能通过文字记录、遗留的文物，以及现有的风俗、习惯、传说和信仰等去推考，但是如果从微型的具体实况来观察各民族间又分又合的关系，那就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变化过程的理解，充实我们对民族问题的理论认识了。

过去的民族研究，是按民族的单位，孤立起来一个一个的研究，在方法上虽然有其长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今后需要和宏观的研究配合起来，既要有宏观的研究，还要进行切实的微型调查。

从宏观研究来说，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是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

微型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内，同当地人民结合起来，对该地区居民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研究。这种微型研究，是过去社会人类学常用的方法，但在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中还使用得不多，而且也不够“微”，也没有很好体现“型”的特点。“微”是指深入到生活的实际，而不是泛泛的一般化的叙述，要做到有地点、有时间、有人、有行为，这

样才能说是直接的观察。“型”是指把一个麻雀作为一个类型的代表，解剖得清清楚楚，五脏六腑，如何搭配，如何活动，全面加以说明，而且讲出特点，它和别的麻雀有何不同，为何不同等等。这样的微型研究，是民族研究的基础，通过比较不同的“型”，就能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观的认识。

微型研究主要是要研究者亲身到要研究的社会中去调查，不能满足于发几张表格去填写的方法，要和被研究者交朋友，体验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生活，听他们发表的意见，拜他们为师。在资本主义世界，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同，所以研究工作存在着很严重的局限性。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矛盾才能解决，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利益是一致的。社会调查是用科学的方法帮助人自觉的过程，就是帮助人自己能明白自己的社会生活的道理。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发展我们真正微型的实地调查，正确地把观察到的事物记下来，要定性，又要定量，每一个数目字，每一件事情，都要说明是从哪里来的，同时对这些研究的资料，必须提高到一定的科学水平上。

我们民族工作要根据各民族的特点进行。我们做民族研究工作的人，有责任根据各民族的具体情况进行分类。分类就是要掌握个性和共性。我们要从各民族的历史形成的具体条件、发展的前途，来区别不同的少数民族。这种研究才能适应今后的民族工作，使得民族工作改变一刀切或放任自流，而逐步做到因族制宜，按实际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1982年4月

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 1}

今天我很高兴和老朋友们见面，想把我个人对于民族研究的一些考虑和大家谈一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有一个打算，想回到民族研究工作岗位上，大家也知道，以前没有这个条件。后来我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提出了一个今后的工作计划。1978年在全国政协民族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讲了民族识别问题。1950年中央访问团到贵州，当时贵州有一些人，又像汉人又不像汉人，他们说自己是少数民族，而他们讲的语言还是汉语。这些人曾经被称作“汉裔民族”。汇报到中央，中央说这个名字不能成立，汉族就是汉族，少数民族就是少数民族，不能叫“汉裔民族”。比如贵州有些人叫“穿青人”，穿青衣服的人，有十几万人，要求承认是少数民族。能不能承认这些人是一个少数民族呢？承认一个民族必须要有一定的根据，我们不能随意说哪些人是少数民族就是少数民族。

1954年民委派我们到贵州研究民族识别问题，搞了半年，通过调查研究，我们从历史上搞清了这些人的经历。大体上说，最早大规模进入西南的汉人是在汉代从四川下来的。那时贵州汉人为数较少，而且政治上是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到了明朝，明太祖调兵进云南打梁王，有大批搞运输后勤的百姓随军同行，通过贵州进入云南，在贵州建立了一系列军站。自此大批汉人从江西、湖南等地进入贵州，住在彝族统治区的边缘。这一大批人

* 本文是作者在昆明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座谈会上的发言。

随着彝族统治势力的萎缩逐步向北移动，到了水城、黔西一带。这一批人曾经同彝族有不同程度的接触，有的接受彝族的统治和影响深一些，有的少一些，于是这个地区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名称，如“南京人”等等，其中人数最多的是“穿青”。看来，“穿青”是没有受到彝族统治的一批汉人。后来又有一批汉人进来。这两批汉人说话口音不一样，风俗习惯、妇女装饰也有不同。先后移入贵州的几批汉人之间，社会和经济地位不同。有些集团受到歧视，解放后，要求承认为少数民族。

我们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报告，认为他们是汉人的一部分，而不是少数民族。我们虽然搞清了他们的来历和变化，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没得到解决，这就是他们在历史上所受的歧视。这个歧视不是民族性质的，应该逐步采取措施，消灭这个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引起的地方性差距。大概到现在还存在这个差距，所以还有人提出“穿青”是不是少数民族的问题。

在这段工作过程中，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民族固然有它的稳定性，这也是相对而言的，但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因历史的条件有分化、有融合。民族是不断变动的，民族的形成有它的历史规律。在历史长河里，我们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曾经起过不断的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是汉族，它融合了很多不同的人进去，现在还没有人把汉族的形成过程搞清楚。我们要把中国民族史看成是一个发展的、不断变动的构成。我当时有研究这个问题的想法，但1957年后我不能出来搞实地调查了，只能看看书了。

解放以后，从中央访问团去各地收集资料，一直到1956年人大常委会组织调查组对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进行调查，在这一阶段，回想起来，我们是一个一个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因为民族调查要适应当时具体民族工作的需要，当时的需要首先是要弄清楚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多少民族？各个民族有多少人？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必须包括各民族在内。因此我们的研究是从

各个民族出发，按民族为单位进行调查的。搞的是一个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一个民族的调查。这种方法虽然出于当时的实际需要，有它的长处，但也产生了很多问题。

中央访问团是以大区为单位进行访问的，开始到西南，我自己到了贵州。贵州当时有一个民族叫“仲家”，他们不要“仲家”这个名称，改称布依。他们说的是壮语。中央先承认了布依是一个民族。后来中央访问团访问中南地区到了广西，又承认广西壮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布依族和壮族，承认有先后，成了两个民族。我并不是说壮族和布依族是一个民族，但是成为两个民族的理由还是应当研究的。

后来我到了云南，看了中央访问团的材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民族如哈尼族，各方面都很接近彝族，但却是和彝族分开成了两个民族？为什么很多划在彝族支系的撒尼、阿细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而哈尼是一个民族？这就提出了很多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我再说一遍，我的意思不是说划错了，而是说要进一步研究民族是怎么形成的。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把已划定的一个民族作为孤立的单位去研究，要把它放在大的范围里看它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云南的彝族是一个很值得细细研究的对象。一提到彝族，人家就讲凉山奴隶制，这是对的。凉山奴隶制很突出，需要研究，但用它来代表彝族是否恰当呢？要知道这只是彝族的一小部分，而且是历史的残余部分。彝族本身发展很不平衡，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我们要对彝族进行全面的研究，获得一个全面的认识。

我们过去搞的民族调查以及所达到的水平，已反映在《中国少数民族》一书中，成绩是很大的。一切知识在发展，我们有不足的地方，但不是错，而是不完备、不完善，这是我们初期摸索出来的成果。可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1978年那次讲话我提出民族研究要提高一步，怎样才能提高呢？我觉得今

后需要进行宏观的研究，用全面的整体的观点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研究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及其发展变化，研究我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几千年里各民族来来去去不断流动的状态和趋势，不要仅局限于现在的五十几个民族的分别研究。今后中国的民族还是要变的，不会永远是这样的，变化的方向是什么呢？社会主义民族之间关系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我们做民族工作要找共同点，历史上总的说来，少数民族绝大部分是处于被压迫地位，汉族人多，他们人少，这是共同点。但具体做民族工作一刀切就不行。如我们创造文字，就碰过钉子，赫哲族不到 1000 人，怎么创造？全部人去办小学、编课本、搞印刷还不够。创造文字要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对赫哲族发展语言文字的办法不能像藏族一样。少数民族有使用和发展他们语言文字的自由，使用这个权利要有一定的实际条件。有的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的文字有长期的历史，维吾尔族文字曾一度想改用拉丁字母，但是群众中有很大阻力，阿拉伯字母还是在通行。彝族也试用过拉丁字母，他们不愿意，没有通行。彝族文字方案为什么几次反复？这说明我们还没有摸出语言文字发展的规律。在汉族中要因地制宜，各个少数民族发展不一样，更要因地制宜、因族制宜。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过去的调查研究没有抓住一个民族的特点，根据特点来分类，根据历史条件来分类，这样才能看出特点，才能在一个总政策之下区别对待各个民族的不同情况。过去我们研究工作没有跟上去，因此在很多问题上，碰到了许多困难。

根据我们 30 年来的经验，需要重新考虑民族研究下一步怎么搞。现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织六个省、区的有关同志对岷江、大渡河、怒江、澜沧江、雅砻江、金沙江这六江流域的民族进行考察，这是很好的。好就好在，第一条它打破了行政上的界线，第二条它打破了学科的界线，进行综合研究。

大家知道，我国民族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相互掺杂得厉害，孤立地看一个民族历史不容易看得出它的特点。大家不是反映很多民族的简史很难写吗？主要是重复，就是那么几条材料，这个民族也写，那个民族也写；还有写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时，也是一般化的罗列一些情况，这些也是相同的。所以有人说看了一本就不要再看第二本了，没有写出各民族的特点。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只抓住了共同点，可是没有抓住各民族的特点，有共同才有区别，有区别才有共同，我们在研究工作上不能说没有缺点。

我再讲讲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学科也是历史形成的，是在近代发展中逐步分化出来的。自然界的现象错综复杂、浑然一体，各种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人们要去认识它，对各个因素需要采取特定的方法，所以有分门别类的各种学科。但是一个具体问题的发生，却包括着多种因素，一个学科的人只有研究其中一些因素。写论文，各科可以各自去写，但是解决具体问题却不是任何一个学科所能单独胜任的。如社会犯罪问题，单靠公安局抓人不行，要综合治理。人口问题也是这样，单靠人口学也不行，为什么中国人口这么多？以后人口发展趋势怎么样？人口老化怎么影响到一个家庭？这些就是要依靠各种学科一起研究了。所以具体的人口问题也要综合治理。1935年我在瑶族地区调查，他们这个地方控制生育搞得好，一对夫妻只生两个孩子。他们有很多土办法，可以避孕。这些土法我们不懂，没有调查出来，要有懂得医学知识的人去研究，那就很有用处了。

每个学科都有一套专门的技术、资料和方法，通过学习与训练才能掌握这套本领。经过学习，就掌握了这方面的学识，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可以写论文，把这个学科提高，在学术上做出贡献。但是要用科学知识来解决具体问题，还需要多学科配合进行综合研究。

1956年我曾经到洱海地区跑了一圈，带了三本书，一本是《白国因由》，一本是《南诏野史》，一本是《蛮书》，这三本书是我的指南，带到下面去实地对照，看当时六诏的形势，寻访它们的遗址，想摸出个考古的方案。在凤仪找到了一个“金銮宝刹”，里面有很多经书、雕刻。其中有用白族文字写的遗卷。但要对这地区进行实地研究还得把搞历史的、搞考古的人找来，一起进行。我从那次旅行回来，到北京在朋友中提出一个考古、历史、社会的联合调查计划，受到了他们的支持，但是后来由于反右斗争开始了，这个计划也吹了。

这次我听说你们要搞六江流域的综合调查，我真是十分高兴。民族研究一定要把考古、历史、语言、社会调查结合起来。搞综合研究要有一套合作的办法和合作的组织，这方面我们才开始，没经验，有很多困难，怎么办？不要怕，这是必须走的一条道路。我说你们计划很好，一是跨省，二是跨学科，打破了过去老框框。照这样做，看来民族研究就可以提高一步，我支持这个想法，我们年纪大的可能看不到成果了，但这不要紧。这条路必须要走，要促进它。为什么呢？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走这个道路的主要困难，是在于我们自己还缺乏专长，缺乏必要的训练，搞科学研究的队伍，不能有人在里面混，吃大锅饭，大家要有所贡献。由于过去的历史条件有些年轻人没有得到必要的训练，要有自知之明，不足的赶快补上。现在有条件了，以前我们出去做社会调查要自己掏腰包，现在领导支持，人民给你钱，要利用这个优越条件，推动我们的学科。要看到我们现在的力量还不足以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所以一定要认真补课，要知识更新。现代知识更新得很快，自然科学不到10年就要重新学过，我们老的要学，年轻人更要下苦功追上去。因此，我建议六江流域调查计划要把人的培养、队伍的建设放在首位。先不要求拿出很多的成果，首先要将年轻人培养起来。可以办一

些短期的训练班、研究班，系统地学一些基本知识，为以后工作打下基础。这是一个新的方向，我看是有前途的。目前我们的力量虽然还不够完成这么一个大的计划，可是我们要做，通过实践把人才培养出来。领导上要帮助他们，我们年老的愿意支持，凡是我们有力量帮助的，我们一定尽力。我们应当给年轻人指出方向，给他工作条件，我们还得做思想工作，提高他们做人的志气，这是我们的责任。叫我们上山下乡是不行了，只能坐着车子去看看年轻的工作者做得怎样。我们老的有老的经验，年老的有年老的贡献。可是主力是年轻人。把培养人、培养队伍作为我们今后这段工作的主要内容，那我们的工作就扎实了。我们不要求一个虚名，不要人家拍手，不要搞得热闹，要扎实地工作。现在的名声比我们实在做的已经超过得很多了。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去，慢一点不要紧，不要急躁，不要踏空。

1982年4月29日

切实提高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 1}

现在我国各民族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了。是不是在事实上都实现了平等呢？还不能这样说。现在我们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在经济上，一般说来，很多少数民族还比较落后。这不能怪少数民族自己，是历史上民族压迫所造成的结果。在文化上，很多少数民族过去没有机会受到现代教育，有的甚至还没有文字，掌握现代知识很困难。从社会经济发展上来讲，刚解放时，少数民族中有 60 万左右的人还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有 100 万人还处于奴隶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人口数量上差别也很大，最小的少数民族还不到 1000 人，最大的是壮族，当时约 800 万人。同是少数民族，相差甚大。但是这些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过去都没有享受到民族平等的权利。解放后我们就从这点入手做工作，首先使得各个少数民族在政治上享受平等权利。现在我国各民族不论大小，在法律上确实是一律平等的。

为了疏通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1950 年中央就派出了访问团，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我当时随中央访问团到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访问。那时，周恩来总理、李维汉同志特别关心民族工作。访问团出发之前，周总理亲自几次找我们谈话，说你们这次出去，要准备受到“冷遇”，要首先向少数民族赔礼。有人说，我们没有压迫少数民族，这是汉族统治阶级搞的。可是总理说，人家看见我们是汉

* 本文是作者在四川省民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族，还区分不开谁是统治阶级，如果你不赔礼怎么能解除隔阂！总理还说，假如和少数民族发生什么矛盾，要多问自己，不要怪少数民族，首先得自我批评。汉族人多，少数民族人少，经济不发达，在祖国大家庭里就得给予照顾。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贯彻民族平等的政策，多年来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奠定了基础，因而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土上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民族大团结、国家大统一的局面。

最近李维汉同志几次很激动地说：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从十年动乱中也可以看出来。虽然“四人帮”破坏了民族政策，做了很多对不起少数民族的事情，可是没有一个少数民族抱怨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没有一个民族地方要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西藏、新疆和内蒙古。大家明白破坏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是“四人帮”。在十年浩劫中，汉族人民与少数民族人民同样受到了灾难，大家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经受住了考验。如果没有早年的民族政策，没有早年各族干部的努力，就不可能经受住这样的严重考验，也就不会有今天。

为了建立民族平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很多先烈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包括各民族的先烈。所以民族平等得来不易，只有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才有可能。现在我们不仅要在法律上讲平等，而且要进一步做到各民族在事实上的平等。这工作很繁重，也很艰巨。如果在事实上各民族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就不能说我们已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强国，就不能说我们已是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国家，因为少数民族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国家要进行四化建设，必须各族人民共同合作。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清楚了。我到瑶山去过好几次。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高山上，住了很多瑶族同胞。人们常说“无山没有瑶”，为什么瑶族都跑到山区去

了呢？长期的历史上，汉族统治阶级压迫瑶族。汉人进入广西，瑶族被迫往山上跑。一到山里，由于山险，汉人的统治势力进不去。那时少数民族是靠躲开汉人的统治才生存下来的，苦得很。现在局面完全改变了，要发展则要合起来，而不是分开来。过去是分才能生活，因为合在一起就受欺侮、受压迫，活不好，甚至活不下去。这是民族不平等的结果。这段历史造成少数民族的一种心理：离开汉人越远越好。现在民族平等了，过去那种情况根本改变了，少数民族再保持这种心理状态就不行了，对少数民族不利，对汉族同样不利。

我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依靠各民族的大团结。我们国家的存在、强盛也要依靠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我们说“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不是一句空口号，是目前的形势所决定的。胡耀邦同志前年就亲自到西藏视察工作，中央领导同志一个个地区研究当地的民族情况，制定具体的措施，要把早年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民族政策落实下来。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总的一条是逐步实现各民族之间的事实上的平等。所以三中全会以后，提出党的民族工作的总方针是，坚定不移地关心、帮助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逐步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这就是民族工作的总方针。

去年我到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这是 50 年代中央访问团帮助成立的一个县一级的民族自治地方。去年是建立自治县的 30 周年。这个县的特点是各族人民联合自治，包括侗、壮、瑶、苗、汉等五个民族。我发现侗、壮族生活很不错，比以前好多了，可是高山上的苗族同侗、壮族差别却很显著。以前虽然苗族比侗、壮族差一点，但不明显，现在壮、侗族跑到前面去了，差距拉大了。苗区公路不通，很闭塞，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政府照顾少数民族，送化肥给他们，他们把化肥当作以前习惯用的

草木灰来使用，把庄稼烧死了。以后又送去了小发电机，里面有根保险丝老是断，他们嫌麻烦，用铁丝来代替，结果一下子把机器烧坏了，他们不知道保险丝的作用。我们听起来就会说他们缺少常识，但谁去教他们呢？我们绝不应当笑苗族落后，这只是说明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经济上的差距也难于缩小。我想这个道理也可以引用到其他方面。所以我们要现代化，就必须提高生产，提高文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现在要赶紧追上去，任务还很艰巨。这就要靠先进民族的帮助了，不但供应化肥、机器，还要教会怎样使用。在现代化过程中，要使得各民族之间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基本工作。

有人问，用汉族来代替少数民族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行不行呢？不行，因为这样会影响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有的地区开发资源，不让少数民族参加，少数民族意见很大。在广西龙胜就有这样一个厂，生产滑石粉，很细，可以出口，年产量也很高，可是我一打听这个厂里竟没有少数民族职工，当地少数民族意见就很大。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要教育汉族干部按政策办事，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办工厂企业，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工人、技术干部。这应当在法律上有明文的规定，而且比例要逐渐增大。资源开发所得到的收入，应当同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分成，以提高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促进他们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福利事业。这样做才有利于我们开发占一半以上的辽阔国土的资源。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技术水平。我讲个故事：我在龙胜吃饭时，喝到一种猕猴桃酒。据科学家考察，猕猴桃原产我国，营养价值很高。新西兰引去之后，就大加培植，加工成各种产品大量出口。龙胜县的高山上就出产猕猴桃，有很

多好品种，也建立了酿造猕猴桃酒的工厂，收购猕猴桃。当地居民上山去收猕猴桃，把树藤都砍掉了，许多好的品种受到损失。现在要抢救猕猴桃资源，同时要抓紧人工培植猕猴桃。关键是要使山上的苗族了解猕猴桃的好处，保护它，发展它，用它来发展山区的经济。而且要进行人工培植，这就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技术知识。

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利用当地的优势，发展经济，可以办的事很多。这次我到云南，碰到一位老朋友，以前中央访问团的秘书长陈可大同志。他看到了我在《新观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故乡养兔》，大为高兴，因为我们想到一处去了。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呢？我年初回到家乡——江苏太湖区，看到那里的农民养长毛兔，一只兔子身上的毛每月可收入1元钱，一年可收入十几元。一家养上10只兔子，农民的收入就可提高了。陈可大同志在云南就主张养兔子，搞活少数民族经济，而且做了不少工作。我们一致的想法是，提高少数民族经济，不要空谈，要想点具体办法，要符合少数民族的实际，能做的赶紧做，多出点主意。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有的是草，有的是人工，大搞养兔不是一条值得提倡的生财之道么？要经常想到怎样使少数民族富裕起来这个问题。

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这是应当的，可是少数民族自己，千万不能有依赖思想，认为伸手要东西就行了。这是有教训的。我去参观过美国的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美洲和澳洲本来都是他们的世界，后来白种人去了，把他们的土地占了，剩下的人也不多了。现在政府拿出钱来养活他们。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拿到钱就花，就喝酒，死亡率越来越高，这是个大问题。满族的历史也是个反面教材。满族曾统治过全国，清朝皇帝要优待满族八旗子弟，给他们钱，养活他们。八旗子弟后来很多成了懒汉，没用的人。满族所受的损失不小。所以一个民族自己

要有志气，才能自立于民族之林。要靠自己，在人家帮助之下，想尽一切办法自己站起来，逐步做到自力更生。

这次四川省民委开会，强调要把经济搞上去，这是抓住了最基本的问题。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我们不能离开汉族，汉族有经验，可以帮助，这个帮助不是给几个钱，是要教本领。要接受别人的先进技术经验，我们就必须提高文化，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这个就比较困难一些，有很多关要冲破。

第一个关是文字问题、语言问题。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有发展、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可是我国还有 30 多个民族没有文字。解放以来，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做了大量的工作。创造文字也有很多困难。一个 1000 多人的民族也要创造文字，这是不大可能的。有些民族分散很广，方言都不同，你要创造文字先得要有一个共同语言，要发展共同语言没有一个经济文化政治中心也是不行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30 年来少数民族的文字问题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可是少数民族不能等到有了共同语言再创造通用文字，有了文字再发展文化。所以实际上很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了汉语、汉文。

现在世界上整个情况来看是个多种语言的世界。一个人要学会好几种语言，靠一种语言已经不行。比如我可以讲一点英语，我一个人出国到处可以跑，不是方便得多么？所以不要把掌握共同的通用语言同发展自己的民族语言对立起来。我们必须尊重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而且要帮助他们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有共同的交流知识的工具。每一本汉文的书都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是不大可能的。《红楼梦》有几种民族文字翻译出来了？曹雪芹是满族，他用汉文写了《红楼梦》，但是要翻译成其他文字很不容易。如果不懂汉文，我们中国这个共同的文化财富就不能欣赏了。老舍是满族，他写的北京话是顶标准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一些通用文字，不但

懂汉字，还得懂一两种外文，才可以接触到世界先进的知识。我认为各个少数民族除了发展、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之外，还应当提倡学习中国通用的汉文。当然，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和其他民族干部，都应当努力学习和掌握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文，以便于工作，这是国家已有规定的。

如何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各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数量少，底子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通过了创办中央民族学院的条例，这是周总理亲自主持的。他说，假如在各个民族中不培养一批共产主义的干部，各民族的工作就很难做，因此，办了各级民族学院。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好，特别是后来，“四人帮”横行时几乎停办了。可是，尽管如此，各级民院为各民族培养干部还是起了很显著的作用的。现在的很多干部都曾经在各级民院学习过。根据我国情况，民族教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汉族教师、干部来帮助。这是历史造成的现实，必须承认。离开了比较先进的民族的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技术更困难。

现在民族地区的教育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我上个月到新疆去就遇到一个问题：怎么能叫汉族干部安心在边疆工作？怎么能使大学教师安心在新疆教书？据了解，新疆各大学的200多名教授里只有20多名是少数民族。这20多名中大部分还是最近提升的，早期只有两名。假如90%的汉族教授一离开，新疆各大学就会开不出课了。如果不许汉族教师走，关起门来，采取“口袋”政策，这一次虽然套住了，以后别人就不来了。所以我看还得从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入手。当然不光是待遇问题，还有个精神生活问题，要使得他们真正同少数民族有感情，有了感情就会愿意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就会觉得少数民族好，愿意同他们在一起。要使人们爱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本身也有许多工作要做，我想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在少数民族地区，扫除文盲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有自己民族文字的，要去普及它；没有自己民族文字的，一时又造不出来的，那就可以学汉语汉文。要实事求是。一个国家总不能有太多的文盲，文盲充斥的社会不能搞现代化，也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强国。

我感到如何帮助少数民族提高文化，这也是我们民族工作的一个基本问题。现在的条件很好，三中全会以来，各地一年比一年更加重视民族工作。我们做民族工作的同志责任很大，思想还要解放一点，要看到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帮助少数民族提高经济和文化。各民族要加强互相学习、交流，改变过去的落后面貌。我们的少数民族不仅要赶上现在汉族的水平，还得赶上世界水平。

1982年5月

深入进行民族调查^{* 1}

今天，在座的好多是少数民族同志，有西藏的藏族，新疆的维吾尔族，东北的朝鲜族，北方的蒙古族和南方的壮族、苗族、土家族等。大家希望我讲一讲。我就谈谈如何深入开展民族调查的问题。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 30 多年来所搞的民族调查工作。我是 1950 年到贵州的，从那年开始就搞民族调查。在这以前，什么叫少数民族，我们也不大清楚。通过中央访问团的几次调查，搜集到不少资料，了解了有些什么民族，但是还不全，不很清楚。后来，中央组织了几次调查。1956 年，全国人大常委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包括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在内），加上解放前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也调查了一些基本情况，所以，我们手头有了一大批资料。总之，过去 30 年的民族调查工作，我们国家是花了钱花了力的，各个民族都出过力。我们搞了不少资料，数量很大。可是，这一大批资料很多都不在了，在“四人帮”横行时损失了。据我所知，贵州烧得很厉害，一卡车一卡车的资料拉去烧掉了，别的地方也损失了不少。这样，现在剩下的材料就很宝贵了。正是因为这个教训，所以在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民委就提出来，要抓紧时间把过去的材料整理出来，要编五种丛书，供大家使用。现在已经印出来不少了。你们中南也有任务吧？赶紧把这个工作做完，因为我们还要再走一

* 本文是作者在武汉华中工学院社会学研究班及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少数民族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步。

下一步怎么走？我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最近，我到了昆明、成都，也同他们谈了这个问题，谈得很好。他们说，过去我们一个省一个省地搞，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而中国少数民族有它的特点，就是相互关系深得很，分都分不开。这话说得很好。以壮族来说，壮族同汉族就很难分嘛。我1951年到广西，壮族就说“我们是汉族”。这是为什么？因为长期以来，在大汉族主义之下，民族意识受到压制；另一方面，的确壮族同汉族分不大清楚，长期以来接受了相同的文化。至于其他民族也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譬如，广西龙胜的侗族与壮族就很相近，互相通婚，有血缘关系。因而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真正了解清楚。所以，我主张最好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

我们在前几年还提出一个民族识别问题，因为现在有好多人对他们的民族成分提出疑问，要求识别。如四川省西北部平武、松潘一带，有一支白马藏族，过去对外都称藏族。据说，这个称呼是这样来的：解放初，他们选派了一位代表上北京，是个老大娘。毛主席接见代表们，问她是什么族？毛主席一问，老大娘很紧张，话也说不上来，旁人就替她说，是藏族。毛主席又问：“是不是藏族？”她说：“是，是。”她自己什么族也不清楚，真的搞不清楚。后来，一部电影上有这个民族，称作藏族。他们就说，我们不是藏族，我们同他们不一样，语言不同，服饰不同，也不信喇嘛教，怎么说我们是藏族？过了这么30多年了，他们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现在提出民族识别的要求。这些人究竟是藏族的一部分，还是另外一个民族？如果是另外一个民族，又是什么族？这样的情况，有几十个，要求我们来识别。我们就把要求识别的民族排排队，看一下，发现他们大多是夹在几个大民族中间。譬如，上述的白马藏族就是夹在藏族、彝族、汉族这三者

中间的一个族。你说它是藏族，又不完全是；你说不是，它又很多地方像藏族。藏族说它是藏族，嘉戎也是藏族，它同嘉戎很近。我们应当从历史上来看这些人的所有经历。民族固然是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但也是在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民族有个形成过程，不断变化的过程。

我现在是汉族，这不成问题，但我的祖宗是谁？人家说我不像汉族，汗毛这么多，胡子这么多，体型也不对。我就去查书。我是吴江人，吴江在江苏太湖的东边，再往东就是大海，吴江就在太湖与大海之间。从前日本海盗——倭寇就是在这一带上岸的，一直打到了吴江。明朝大将戚继光在这里抵抗倭寇。兵不够怎么办？他从广西、湖广调来很多倭兵、土兵参战，在王江泾这个地方把倭寇打败了，是历史有名的一个战役。王江泾现在还在，就在我家乡附近，仗打完了，这批人呢？书上没有记载。这批人中很多人大概没有回去。以前打完仗就不管了，哪像现在这样，还有复员、转业啦！日本人也回不去了，逃不走了。我小的时候，常摇船到一个叫黄天荡的地方去玩，那是个湖区、水乡。那里很多人的风俗习惯同苏州城里不一样：鞋不同，穿绣花鞋；衣服也不同，男的穿裙子，叫“战裙”，打仗穿的裙子。这里的妇女，夏天可以不穿上衣。我没有去了解他们是不是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也没有去了解他们的传说，所以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人很可能是当时留下来的人。那么，我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就不清楚了，很可能原来是少数民族，后来变成汉人的。

像上面所谈的情况，到处都有，特别是在各民族交错的地方。以前不是藏族的，现在变成了藏族；现在是藏族的，若干年后也可能不是藏族。所以，我感到白马藏族所在的地区，正是一条民族接触的地带，这个地带是夹在汉族、藏族、彝族三者的中间。你们藏族曾经打到过长安，现在的西安，北面到新疆。我们不能只看到现在，只有历史才能说明问题。说明为什么有个白马

藏族，为什么它像藏族，又不像藏族。一会儿又说是羌族，现在在它的南面就有一个茂汶羌族自治县。那么，羌族同藏族是什么关系？同彝族又是什么关系？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复杂性了。

我们过去 30 年的调查研究没有讲到这个问题；你们可能也知道这种情况，但是不具体。因为那时就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研究，写它的历史，不是从一个整体、从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来看，各民族间的往来变动，怎样影响它们的形成、合并和分化。有时两个民族碰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了，但有些却合而未融，又好像融合了，又好像没有融合，融合的程序可以不同。这方面我们都没有研究，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动的、变化的观点来看问题，什么原因这样变，什么原因那样变，我们过去都没有很好的研究。在我们研究白马藏族的识别问题时，听说在贡嘎活佛的老家，甘孜北面的一个乡，那里的人，出来讲藏话，回家讲另一种话，别人听不懂。我们调查组去调查，说的确是藏语，但他们在家里却不讲藏语。这种情况据说并不少，出来讲一种话，回家讲另一种话。很可能他们以前都是讲现在在家里讲的那种话，后来同藏族接触，接受了藏族的语言，但保留了它过去的一部分东西。如果我们能调查清楚他们在家里讲的是哪一个民族的话，就知道他们原来是什么人了。这个研究方法有点像考古学里所用的地层定期法。过去的文化也可以一层一层地沉积在现在的生活中的。

上面所讲的那个地带就是我所说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我也曾称它作藏彝走廊，包括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洛瑜地区。洛瑜地区的民族构成，外国人搞不清楚。这里发现有水田技术很高的阿帕达尼人。他们从哪里来的呢？我从照片上看，他们头上也有一个髻，同彝族的“英雄髻”很相似。语言我们还不清楚，没有材料作比较研究。再下去到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的

那加地区。这一带都是这一相似类型的民族，看来都是这条走廊里的民族，都在藏族和彝族之间的地区里。

藏族是以拉萨为中心，慢慢扩大的。嘉戎话同拉萨话就不一样。这同汉族一样，汉族也是很多原来不同的成分聚起来的，有几个中心。力量小的时候也会被人拉过去，来来去去，特别是边上的，这里面就有好多很有意义的历史留下来的东西了。我们就是要把这些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历史上看下来，从他们现在的语言、体质、文物、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等等，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假如我们能把这条走廊都描写出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等。我是在1979年提出这个问题的。现在，四川、昆明的同志们准备开始研究这些问题了。西藏也参加了。调查的地区称作六江流域，就是长江上游的金沙江等六条江；从甘肃下来，一直到云南怒江、西藏的洛瑜地区。这就不是一个省，而是几个省几个自治地方联合调查。这个计划，领导上很支持，说很好。但是不是那么容易，还要做很多工作，今年开始做起。我这次到成都、昆明，他们第一批工作同志就要出发了，先下去看看，尝试一下。明年有点基础了，大家再来一起讨论。我有个设想，明年不妨办一次学习班，把民族调查的基本知识大家来学一下，包括考古、历史、语言、社会等基本知识都要知道一点。学习班里少数民族、汉族都要有，民族调查一定要有本民族同志参加。以上讲的，是西南的那一条走廊。

另外一条是中南的走廊。我们正在广西金秀研究瑶族，这个地方的瑶族很有意思，同在这个大瑶山里的瑶族说不同的话，有些说的是侗话、苗话，但他们都讲他们是瑶族，而且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大石牌。他们的语言不同，就说明他们曾经是不同的集团。历史上不知什么时候一批侗族跑到山里来了，不同时候又有一批苗族进来了，都在这个山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守卫这个

山区，以求生存，经过长期的合作形成一个民族，都叫瑶族。那么，瑶族中有没有一个主体瑶族？有没有原来就是瑶族的人呢？我看可能是有的。很久以前有一支瑶族，从什么地方跑到南岭山脉。他们同苗族一定有很深的关系，因为苗族同瑶族的语言基本上是一样的，属于一个语族。但是苗和瑶什么时候分开的呢？现在还搞不清楚。分开后，在地域分布上有一条界线很清楚，贵州没有瑶族，这话不知对不对？广西的苗族都分布在北部和贵州接壤的边上，往南就没有了，只有瑶族了。为什么明明是讲苗语的人却叫瑶族呢？南丹的白裤瑶究竟讲什么语言？同苗族有什么关系？我很想知道。苗族里面也很复杂。你们壮族一样，里边也很复杂。每个民族都是这样。怎么分开来？怎么合起来？分到什么程度，合到什么程度？再者什么叫民族？民族怎样形成的？汉族怎样形成的？过去我们脑筋很死，不够解放，好像民族死得很，就几条。几个条条一套，套不上就没有办法了。这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观点，实事求是的态度，就要看变化，从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里，看出民族将来会变得怎样。这样的研究现在还刚刚有点萌芽。有些人想到需要这样搞了，不能满足过去那一套了。不是过去做错了，而是现在要升级了，一年级升二年级了。二年级的功课怎么样，至少可以看出来，不要局限在一个民族一个民族，不要局限在一个省一个省，不要局限在一个学科，要联合起来。要从实际出发来看我们研究民族问题的地区应当包括哪些地方。要各个学科合作来解决一个问题。要求越来越高了。可是我们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要各个学科合作，考古、语言、历史、体质人类学以及我们的社会学，综合起来研究解决这些有关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这样，我们也许可以比过去认识得更清楚一点，可以更清楚我们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我这次到西南地区，同云南和四川的民族研究工作者谈了这

个问题。本来我想花点时间在中南也鼓吹一下，广西、湖南、广东这几个省区能不能把南岭山脉这一条走廊上的苗、瑶、畲、壮、侗、水、布依等民族，即苗瑶语族和壮傣语族这两大集团的关系都搞出来。这里各种民族有其特点。山区民族就同傣语系各族不一样，今后发展的前景也不同。他们是住在山里边的，所谓“无山没有瑶”，山上边都有瑶族。可是瑶族同瑶族又不一样，情况很复杂，必须深入调查研究。

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在这条走廊里，分布着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等，他们是夹在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中间。有的信喇嘛教，有的信伊斯兰教；有的讲藏语，有的讲蒙古语，有的讲突厥语，也是很复杂的，不容易处理。有些民族讲两种语言。上述几个复杂地区：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

今天，我同你们吹一吹风，以四川人的说法，叫摆摆龙门阵，希望你们把自己的眼光扩大一些。上面所讲的这些，也就是民族社会学。民族社会学就是对少数民族社会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以前是一般的，看见什么记什么，像写新闻报道一样，现在应该提高一步，有点计量的，有点比例的，有点数目的，准确一点。你们这次至少学到了这一点，处理资料不能没有数目，要有一个轻重、多少，要有一个比例。以前，我们喜欢把几个突出事例讲一讲，结果搞出了片面性和扩大化。但是，点面怎样结合？点面结合要说明局部在全体中的地位，最好用数量表示出来，这样就比较准确一点，更能反映实际。譬如，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的人属于 10 个民族，这样说还不够，还应该说汉族

有8个，藏族有3个，苗族有1个……还有一个蒙古族同志，她的父亲还是汉族。这就是有数量了，情况反映准确了。

去年，我到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去了一趟。我发现，壮族、侗族与苗族、瑶族的距离越来越大了，建设四化，怎样缩小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距，这是一个问题。现在，必须赶紧从文化教育上面去抓。以前，在民族压迫时代，少数民族与汉族疏远才能生存，例如瑶族住到山里去了。他们固然生存下来了，但是关在高山上的，经济文化就落后了。现在民族平等了，但原有的这种思想一下子还转不过来。民族之间还有隔阂，有距离，加上“四人帮”又捣乱一下，有些地方隔阂更深了。解放初期，50年代，我们的民族关系的确是好的。正因为有50年代的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四人帮”搞得这样，大家还没有离心，还是团结在一起，甘苦与共，我们中国的各民族是离不开的。我刚才讲了很多，说明历史上就是一个离不开的局面。可是，过去的历史很复杂，在民族压迫制度之下，少数民族很困难，又离不开，又不敢同汉族在一起。所以，距离很大，隔阂很深。现在不同了，要转过来，要进步必须同步前进；要现代化就得一起现代化。民族之间一定要加强联系。现在很清楚，离开汉族，离开这个比较先进的民族，少数民族就要落后，就没有出路。搞四化建设汉族也离不开少数民族。所以，我们要做民族团结工作。这次宪法上有一条很重要，提出各民族间要有一个通用语言。当然这一条有个前提，就是首先要保证少数民族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有一个通用语言，否则少数民族就不容易接受。有了个通用语言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大大有利。不妨想一想，每个少数民族都要把所有用汉文写的书都翻译过去，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现在我们汉族已感到，翻译是一个大问题，外国很多先进的东西翻译不过来。所以，我们各民族要有一个通用语言，从语言上讲，它是汉族语言；但在汉族语言中，

它又是普通话。搞现代化，要有知识，知识要有一个媒介，要通过文字，以汉语为通用语言有利于缩小差距，共同发展，少数民族和汉族就像十指一样离不开的。离不开并不是同化，各族还得有发展个性的自由，各个民族各有它的特点。这是个辩证关系。我们现在就要想办法，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扩大民族间经济文化上的差距，要缩小差距，这个问题很大。上次我到新疆去，新疆的同志大家都同意：汉人不能走，汉人离开了，马上出现问题，中学里教员不够了，数学没有人教了，孩子们怎么办？各民族就是离不开。这是双方面的，少数民族要欢迎汉族，汉族要为少数民族服务。也就是说，不能分开。

今天晚上，我有机会和少数民族同志们见面，十分高兴，但是时间不多，就讲到这里吧。

1982年5月27日

《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序言

“载歌载舞”已经是表达我国少数民族特点的通用语言。这也确是我最初和少数民族同胞接触时自愧不如的深刻印象。我常说：我国的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里缺不得歌舞，他们的歌舞也离不开生活。人人参加的群众性歌舞是社会的艺术活动，不仅能陶冶性情、提高境界，而且能协调人和人的关系，增强团结，鼓舞斗志，在精神生活中促进民主和文明。我们对这种活动应当提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上来予以重视，因而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在这方面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大家的先进榜样。

扎根于群众生活中的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歌舞，在悠久的历史中，经常是中华民族艺术生活的共同泉源。早在公元开始时，汉代的文献里已经记下了著名的“巴渝舞”，因其粗犷矫健、气势磅礴而流行一时，被当时的朝廷用来招待外来宾客，巴渝舞是当时巴族板楯蛮的民间舞蹈。同一时期，著名的“于阗乐”，从西域传入内地，不仅成了当时宫廷音乐的保留节目，也是民间热爱的音乐，传唱一时。其后隋朝的“七部乐”、“九部乐”，经唐代继承增删而成的“十部乐”中的“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都是今新疆一带当时少数民族的创作。这些曲调欢快、节奏鲜明、舞姿婀娜、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民族歌舞，深受中原人民的喜爱。竞相学习，流传极广。其中，左右回旋、疾舞如风的“康国乐”，也称“胡旋舞”，尤是风靡一时。曾居世界前列的我国唐代文明就以各民族的音乐舞蹈的绚丽多彩而呈现它的光芒。隋唐以后，封建礼教为虐日甚，不仅扼杀了社会上层的精神文明，民间歌舞也深

被压抑。但是我国处于边疆的少数民族，还能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保卫了他们优良的艺术传统，使我国民族大家庭歌舞得以保存。全国人民大解放之后，又开始重放光彩。

中国少数民族歌舞是各族劳动人民为自己生活的需要而创造的。他们以歌舞来传述本民族的历史，歌颂祖先，歌颂家乡，传授生产和战斗知识，倾诉爱慕，寄托愿望。它对民族的繁衍生息，团结自卫，教育后代，振奋精神，起着重大的作用。它与民族的盛衰兴亡密切相关，与人民的生活紧紧相连，因而过去我国的少数民族在穷乡僻壤受尽苦难的岁月里，各民族的歌舞艺术还是表现着顽强的生命力，绵延不替。

正因为各民族的歌舞这样紧密地与劳动人民的生活相结合，它总是深切地反映着各民族独特的精神面貌。早在春秋时代，吴国的季札访问中原时，就是通过观察当时各地歌舞的风格和它们的流变，来估计中原文化的盛衰的，他的艺术评论传诵至今。这说明歌舞在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中的作用和地位。

各民族人民生活方式是在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存在着不同的民族特点，表现在艺术上的是各自的风格和形式，如果比较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歌舞，就能看到各民族的独特之处。本民族的人对自己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都具有强烈的感受力。一听到自己民族的音乐，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而对别的民族的音乐就没有这种自然的反应。一般的观众也不难从风格、情调、曲音、舞姿上辨别出哪些歌舞是哪个民族的艺术。这就说明了歌舞艺术中深刻地呈现着民族的烙印。

形成这些艺术上的民族特点的因素是很复杂的，还需要我们一个一个民族的深入研究。总的说来和各民族的基本生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在歌舞上也常常表现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我国北方游牧民族舞蹈的那种雄健、洒脱、豪放、泼辣和南方农业民族舞蹈的那种稳健、含蓄、端庄、抒情

恰巧形成不容混同的对照。

歌舞的形式是不断发展的，如果比较研究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通行的鼓舞、跳乐和踏歌等歌舞形式，就能看到歌舞的流变的一些线索。鼓舞是以击鼓点伴奏，踏节而舞的形式，跳乐是边奏乐边舞蹈的形式，踏歌是边歌边舞，或歌舞相间的形式。

各类鼓舞在我国中南和西南的大部分民族中自古盛行。秦汉时代，骆越民族铸造出图案多彩、花纹细致的铜鼓之后，就逐渐形成了一种以铜鼓舞为代表的独特形式，流传在壮、苗、瑶、水、布依、黎等民族中间。以鼓伴舞又发展成带鼓舞蹈，就是携带各种鼓，如木鼓、象脚鼓和长鼓等各种打击乐器，边打边舞，以加强动作的节奏和姿态的变化。更进一步就是音乐伴奏和舞蹈结合在一起，如苗族、水族、侗族等民族的芦笙舞。芦笙是吹奏乐器，和其他乐器一样可以独立演奏，或集体演奏，又可以为舞蹈伴奏。而在上述民族中却把舞蹈和奏乐结合在一起，边吹边跳，自成一格，其他民族也有用其他乐器与舞蹈相结合的，如三弦、琵琶、口弦、月琴等等，统称之为“跳乐”。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特别是在壮、藏、回、维吾尔等较发达的民族中，更为普遍的是歌舞结合的踏歌。在文字不很普遍应用的民族中，民族历史、社会风尚以及生产技术等等依赖口头的流传和宣扬，为了加强效果，常常和歌舞相结合。在群众集会的场合，一人高歌，众人手舞足蹈，关键处同声附和，兴高采烈，即便同一主题多次反复也不感厌倦。这确是社会教育的有效方式。踏歌的形式实际上已经以歌为主，舞蹈为伴。更进一步，就是以更复杂的舞蹈动作来配合歌唱情节丰富的内容。歌唱内容一般又常与民间传说或宗教故事相结合并向歌舞剧发展。

另一方面模拟舞蹈的发展，也加强了舞蹈的戏剧化。模拟舞蹈的原始形式大多反映从事渔猎的生活，并受到早先图腾崇拜的影响。傣族的孔雀舞就是一个例子。孔雀舞以模拟孔雀动作为主

题。最初，舞蹈者还要头戴光盔，身披羽架，装成孔雀的模样，进而模拟不同性格的孔雀，编出不同的孔雀舞。后来又结合民间传说编成各种赋予情节的孔雀舞。现在，已能摆脱道具，完全以舞蹈的动作来刻画孔雀的形象。在这个基础上最近已发展成表演民间传说的大型民族舞剧《召树屯与喃木诺娜》。藏族的宗教舞中也有用面具和服饰来模拟鬼神的传说，同样，在藏戏中也留下模拟舞蹈的痕迹。

我国少数民族在过去的民族压迫制度下经济发展受到了限制，他们的文艺生活也得不到健全的发展，很多还滞留在比较简朴的阶段。但另一方面由于抵制了汉族封建礼教的拘束，保存了淳朴的群众气息，歌舞艺术没有脱离人民大众的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行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事业的政策。少数民族歌舞才得到了阳光雨露的滋润，很快的茁壮起来。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尽管其间受到过逆流的冲击，少数民族的歌舞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爱好的花朵。

在我们各民族文艺欣欣向荣的今天，怎样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的歌舞已经成了引起大家注意的问题。少数民族的歌舞所以能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是在它密切和群众生活相结合。歌舞是社会上每一个人参与的活动，也是为人们抒情养性，协调社会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服务的活动。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说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是缺不得歌舞的。这和以歌舞为职业，通过专业人员的表演供观众和听众欣赏和娱乐的歌舞是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群众性歌舞是不断发展的，它不仅要反映生活的变化，也要适应新的生活条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艺术提高的一面，这也就需要专业的艺术工作者的创造性的努力。但是艺术的真正泉源是群众生活，而且只有能为群众所接受的艺术的加工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艺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为发展民族艺术而努力的专业工作

者是绝不能脱离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的，这点，在发展少数民族歌舞时应特别牢记在心。当前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有了专业歌舞团体，而且这些专业团体所表演的少数民族歌舞节目深受国内外观众和听众的喜爱和欢迎。在这种形式下，专业歌舞团体的任务首先应当是促进本民族人民大众歌舞艺术生活的提高，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还要把本民族在歌舞艺术上的新成就和其他民族交流，吸收其他民族的艺术成果来丰富本民族的艺术生活。而这一切都必须以本民族人民大众的生活为主体。凡是脱离本民族的群众基础，艺术加工就会走上歧路。所以衡量民族歌舞发展的标准必须是群众艺术生活的丰富和提高。

在这个时候，编辑出版这本《中国少数民族舞蹈》画册有它现实的意义，它以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部分优秀节目的舞蹈图片为主，同时选择了一些与该民族舞蹈艺术活动相联系的民族风俗和生活的图片，汇编而成，并加以简要的文字说明，帮助读者理解少数民族歌舞和群众生活的结合所表现的民族特色。这必然有助于少数民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丰富和提高，并把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形势，如实地反映在广大国内外读者面前。我乐于在这书的前面写下自己的感想作为该书的序言。

1982年6月20日

关于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 发展上的几个问题^{* 1}

很早就想到内蒙古来看看，今天如愿以偿。借此机会，谈谈我 30 多年来从事民族工作的一点体会，主要是谈谈在四个现代化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上的几个问题。

先说 32 年。和几千年几万年比起来，32 年是很短的，可是在这 32 年里，我们中华民族却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年轻的同志也许不记得，有的根本没看到旧中国的情况。我们这些人是亲身经历过的，那时的民族关系是很糟的。大家知道，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人类已有 100 万年以上的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也有 5000 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由于自然的和社会的各种原因，形成了各个民族和向心力很强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长期以来各族人民和平共事，共同创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使我们长期以来处于人类发展的中心地带。这是很值得我们骄傲，很值得我们自豪，也很值得我们珍惜的。可是，由于我们在这几千年中长期处于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之下，各个兄弟民族之间却一直没有得到过民族平等。近 100 多年来，随着我国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民族又尝受了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加没有民族平等可言。只是在 32 年前，各民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才第一次真正享受到民族平等的权利。在中国这么辽阔的土地上和占世界 1/4 的人口，实现了民族平等，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 本文是作者在呼和浩特的讲话。

这个成就震惊了世界，使我们在解决民族问题上走到了世界的前面，因而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所瞩目。

民族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民族压迫制度是同人剥削人的制度联结在一起的。只要有人剥削人的制度存在，民族压迫就消灭不了。这是一切存在剥削制度的国家不能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因。就科学技术来说，一些西方国家称得上是很进步了，但由于社会制度所使然，在他们那里还是一些民族压迫另一些民族。例如在美国，很古以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息发展的印第安人，现在却被安置在“保护地”里，被当作“展览馆”里的人而排斥在现代社会之外。他们到中国来访问，很有感触，说天下人能得到民族平等的，在他们想来简直不可能，可是在中国却实现了。民族之间从不平等到平等的变化，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已经享受到民族平等权利的年轻人，也许不觉得这个权利的可贵，可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却深知这些权利来之不易。

新《宪法修正草案》提出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是我们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点。我们实现它是碰到过很多困难，走过曲折道路的。我对北方民族不熟悉，对南方的民族熟悉一些。拿我调查过的第一个地区——广西大瑶山来说吧，那里一共有两万多瑶族人民，他们走向民族平等就很不容易。在历史上，他们曾广泛地分布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湖南南部这一大片地方，但由于长期的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他们逐渐被赶到山里去了。特别是在明朝，经过了100年的征战，死了很多人之后，他们都退到了瑶山里。几百年来，依靠险要的山势，防止了外人的进入，避开了封建统治势力；但由于长期同外界隔绝，十分闭塞，他们的经济文化也就发展不起来。这样，就使他们造成了一个很强的心理状态：对外面所不熟悉的一切人都有怀疑。解放以后，这种历史形成的心理状态同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平等的社会条件完全不能适应了，但他们还是怕。

1950年我们中央访问团第一次去访问时，周总理多次对我讲，你们下去要准备人家冷待，坐冷板凳，先不要想人家会热烈欢迎。如果遇到什么矛盾或什么不对的地方，不管怎样，要先做自我批评后再说。这是同一个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隔阂作面对面的斗争，情况很复杂，不能光说我们不对就完了，还要以心换心，要以真正的诚恳的态度和亲切的感情对待少数民族，平等待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家改变这么长期以来形成的疑惧心理。当时有些年轻的同志想不通，说我们没有压迫过少数民族，那是统治阶级干的啊！总理说，对呀，你没有，可人家不这么看哪。人家没学马列主义，怎么知道阶级呢？

周总理的话的确是金玉之言。我们去了以后，开始的确有些人不敢见我们，我们就学习解放军的办法，不得到他们的同意不进房子。过了一段以后，他们看到这批汉人不同了，就说这是毛主席派来的新汉人，新汉人是好的。又经过许多深入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以后，学习内蒙古自治区的经验，才到了搞区域自治阶段。所以说，在这32年里，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为真正的民族平等，为实现新的民族关系，做了大量工作的。正是通过这些工作，奠定了我们民族大团结的基础。

可是不幸，中间出了林彪、“四人帮”这股逆流，他们搞反革命活动，猖狂地破坏民族团结，给各族人民造成灾难，也伤害了很多少数民族同胞。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是重灾区，蒙古族同胞受的伤害很重。但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各民族人民仍然心向祖国，心向北京，没有要脱离祖国大家庭的。有些外国人希望我们在民族问题上出问题，可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李维汉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讲得很生动，他说回头看一看，没有我们解放后这一段深入的民族工作，不可能有今天。事实的确是这样。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社会主义平等的民族关系，已深入人心。大家都知道，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能真正享受到民族平等的权

利，在存在着剥削制度的外国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平等，只达到了法律上的民族平等，只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第一步。实现了这个平等后，在很多地方还存在着差距，存在着经济、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第二步就应解决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刚解放时，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情况很不相同，在客观上构成了一部活动的社会发展史，每一个社会阶段的发展形态都有。当时，同汉族接近的人数也有较多的少数民族已进入了封建社会（但只讲封建制度一项，也有世界各国所没有的多种形式）。处在奴隶社会的（主要在四川凉山一带）还有 100 来万人。阶级还没有清楚的划分，保留了很多原始社会痕迹的（主要在西南西北和东北的边区）有 60 万人。这对于我们搞科学研究，当然很有意义，可是对于我们的实际工作，却造成了很大困难。我们不可能用一个办法，解决这么多社会性质不同的民族问题，最初主要是抓各民族的共同问题。那就是各少数民族过去都是被压迫的，一般讲生产都是落后的。所以第一步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让各少数民族首先都取得平等的权利。有了这个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就规定了一切压迫其他民族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国家就要干预、惩罚。法律上的平等，很重要，没有这一条做基础，其他的都谈不到。可是光有这一条还不够，还要接着搞第二步，解决事实上的不平等。假如我们做不到事实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也不能真正体现出来。因此，把历史上造成的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状态改变过来，缩小各民族在这些方面的差距，是我们当前民族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和方针。

和四个现代化联系起来，更可进一步看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我们讲四个现代化，是要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进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靠什么呢？靠党的领导和各族人民的努力。可是回头一看，我们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还很大，这个

不解决怎么行呢？这里我讲一些我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所看到的事。这个自治县成立已 30 年了，那里有数量相互差不多的四个民族。苗族住在山上，壮族、侗族靠水。从全县的经济数字看，30 年发展得很不错，可是山下的壮族、侗族发展快，山上的苗族没有跟上去。过去大家一起穷，现在距离拉开了。苗族觉得山下面是一个不熟悉的世界，但他们又不肯出来。公路不通，仍然很闭塞。我们要帮助苗族，送去了化肥，但他们不懂得如何使用，一下子放很多，结果把苗烧死了。送上小水利发电机（因那里的流水落差很大），他们嫌保险丝老是要断，用铁丝代替，结果机器也弄坏了。这不能怪苗族，因为文化跟不上嘛。这就充分说明，发展经济和发展文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知识上不去，要掌握新技术也十分困难。发展文化，发展经济，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最基本的一点是要培养人，开发人的智力资源。这是比搞物质建设更困难、更费力的工作，但又必须切实地帮助少数民族兄弟抓好。

帮助少数民族缩小经济、文化上的差距，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一项极重要的工作。如果不能在四个现代化过程中逐步缩小各民族经济文化上的差距，有的民族走得很快，有的民族落在后面，那落在后面的就会对走在前面的“看不惯”，甚至产生“怕吃亏”的心理，引起感情上的疏远和不满。这类问题，当然一般不要把它引到民族问题上去，但必须看到，如果弄得不好，它也会引起新的民族隔阂和矛盾，甚至影响到民族团结。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边境线很长，在边疆一带，居住的都是少数民族。在民族地区做好民族工作，发展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巩固边防，这些任务都是联在一起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不起来，对于巩固边防也很不利。汉族同志一定要看到，我们这个统一的国家，要靠兄弟民族首当其冲来保卫；生产的飞跃，要靠各兄弟民族一起来努力；国家的富强，要靠各兄

弟民族共同做贡献。不要只看到现在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同时也要看到，少数民族也在许多方面帮助了汉族。就拿要改变汉族目前的食物构成这一点来说吧，光靠汉族地区就不行。汉族多数居住在平原地区，搞的主要是农业，而且农业里边主要是粮食。我们靠这个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础，可是搞现代化光靠这个就不行了。食品结构以粮为主，占用的地和人很多。10亿人口，8亿人搞粮食，很不利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靠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这就要少数民族帮助汉族了。内蒙古自治区有10多亿亩草地，发展畜牧业的条件很不错，可以带头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如果内蒙古的10多亿亩草地能达到像澳大利亚那样的精牧，那国家的经济面貌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汉族就可以松一口气了。全国可牧草原的总亩数比农业地区的总亩数还多，如果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不是走汉族地区的道路，而是走适合自己地区特点的路子，发展是大有前途的。汉族同志不应光看到少数民族落后，还要看到他们有可能发展，同时要满腔热情地帮助促进这个发展。

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出发，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事业，还必须看到，在这些特点方面，各民族地区是不一样的，各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大瑶山就出产一种很值钱的香草，过去瑶族妇女头上戴的银器饰品，主要是靠它换来的。龙胜出产一种猕猴桃，是水果里边营养价值最高的一种，新西兰引了去之后，现已大量出口。对于这些好东西，现在我们培植利用得很不够。如果能把这些珍贵的资源保护好，学会人工培植，那就可以出产很多东西，各少数民族群众的经济也可以很快地发展起来了。喜马拉雅山有一种香菇，很好吃。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一位中国人拿去后，研究出了一种人工培育的方法，立体长，产量增加了十倍，而且方法简单，家家户户都能搞。我们如果一家人一年搞100斤，就可收入170元。还有一种长毛兔，也很值钱。家

里养 10 只兔子，就能收入 120 块钱。这种兔子肉可以吃，毛可以纺织，皮可以出卖，屎是养鱼最好的饲料，全身都有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可以饲养。所以，少数民族需要的不是我们说大话，而是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地、一件一件地帮助他们把事情办好。真正能帮助他们找到发展生产的门路，并且教会他们怎样做。当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搞好多种经营，一定要从这些地区的特点出发，并且要进行计划指导，不要有盲目性。否则，产多了销不出去，反过来也会挫伤积极性的。

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了，跟着而来的问题是有钱怎么花。最近《人民日报》有几篇文章说，不能光讲怎样指导生产，还要讲怎样指导消费。消费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少数民族，同样也有一个指导他们花钱的问题。不然，有的人就可能走邪路。因为他们过去闭塞，安排生活的经验不丰富，光教生财之道不行，还要教会用财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工作开始时不难做，只要有一片好心，满腔热情和同情，平等待人，就会取得信任。可是接下去第二步的工作就更具体，更要硬功夫了。需要我们更耐心，更细致，要扎实地做工作，找出每一个少数民族在每一种不同情况下都能够得到发展的条件和办法。这样的事前人还没有做过，也确实存在着许多具体问题。我们应该不怕困难，以积极的态度研究解决。

至于少数民族自己，则应该有这样一种思想，要自力更生，不能老是靠照顾过日子。民族之间的差距，是历史造成的，作为汉族，要努力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少数民族；作为少数民族，则不要依赖人家。依赖对自己民族的发展并不利。在这方面，我们的满族兄弟是有教训的。满族进关之前是强盛的，人口有几百万。但进关之后靠别人养活过上了优裕的生活，民族反而衰弱了，所以，一个民族不能怕艰苦，要能自己站起来，只有懂得自力更生，才能更好地体会到人家帮助的好处，才能更好地接受和运用

这种帮助。

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都是靠我们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互助，才能有今天。所以，说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这绝不是空话，而是实际。没有汉族的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不起来；没有少数民族支持，祖国的边疆就难以巩固，汉族地区也难以更好地发展。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也难免有点小矛盾，但这是兄弟之间的矛盾，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大家互谅互让，都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个共同目标努力，小的矛盾是好解决的。

要为共同的目标一致努力，就有一个语言文字问题。语言文字不同怎么办？这也不能用狭隘的眼光去看，而要把眼光放远。我们要发展各民族的语言文字，这在宪法里有明确的规定，一点不能含糊。可是，也要看到语言、文字是交流思想、掌握知识的工具，还应该从更有利于掌握知识的角度来对待它，不要让民族感情来干扰。各民族都有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这没有问题，但是一些人数很少过去就没文字的民族，再从头造文字就不见得对发展有利。有的少数民族只有一千几百人，怎么搞文字啊？大家都去搞文字就没有饭吃了，反而不如从兄弟民族那里借用文字更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为了掌握现代化知识，现在我们还要学外文，谁也不会说你学外文是背弃了祖国的文化。各民族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少数民族比汉族还多了一个义务，一个负担，就是要掌握现代化知识光靠自己的文字还不够，还需要学会掌握汉语文这个工具。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同志，要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搞好，就要密切联系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学习少数民族的语文。这件事似乎难，其实不难。新疆的锡伯族，掌握语言的本领就很大，许多民族的语言他们都会讲。大瑶山里的瑶族，也是汉语、壮语、侗语都会讲。各民族的语言很多都属于汉藏语系，差别不是太大，学

汉语要比学外语容易得多。这样说，不是不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权利，而是说在尊重的前提下，还需要掌握一个大家都能够通用的共同工具，以利于互相交流，共同发展。就一个地区讲，也有地方性的共同的语言工具，也需要掌握。如新疆的各民族一般都会讲维吾尔语，这就是大家都掌握了共同通用的工具。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应冷静地实事求是地为各民族的发展着想，不要牵涉尊重不尊重民族情绪在里边。

总之，经过 30 多年来与各民族的接触，我深感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各不相同的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从解决他们共同性的问题进入到解决具体的特殊性的问题，任务是更艰巨了。在这方面有许多问题尚待研究，解决的方法也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只要我们大家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可以相信，不管哪个民族的具体性、特殊性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1982 年 7 月

确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我们的国家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赖于各族人民在平等、团结的基础上发挥互助合作的精神，这一条建国30多年来的基本经验，已经写进了《宪法修改草案》，受到了各族人民的欢呼。

过去30多年的经验证明：要实现民族平等，首先当然要在法律上否定一切民族压迫制度的残余，保障民族平等的权利，同时对各民族人民进行反对民族压迫、歧视的思想教育。但是根本措施还是在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逐步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如果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事实上的民族平等也就难于实现。已经获得法律上民族平等的我国少数民族对这个客观规律体会最深。所以三中全会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出现了要求技术、要求文化的热情，《宪法修改草案》表达了他们的心愿。由于历史原因，在我国各民族中，汉族不仅人数最多，而且在文化和经济上一般说是比较先进。先进的民族要多出力量帮助后进是完全合理和应当的。《宪法修改草案》里规定了国家要坚持不懈地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国家用来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力物力实际上是取自人数多、文化和经济比较先进的汉族。汉族应当把帮助少数民族作为自己的义务，少数民族必须积极地接受国家的帮助，争取早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宪法修改草案》把平等、团结、互助列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这里的互助一词强调了民族间帮助的相互性，这

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仅有汉族帮助少数民族的一面，还有少数民族帮助汉族的一面。忽略任何一面都是片面的。但是有些汉族同胞对于少数民族帮助汉族的一面还看得不够，因此对“互助”中的“互”字体会不深。

我国民族情况的一个特点就是汉族人多，少数民族地广。这个特点是社会经济的历史条件形成的。笼统地说，汉族的经济历来以农为主，而且农业又是以培植粮食作物为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在我们国家的这一片土地上，凡是适宜于种植五谷的地区，几乎都已成了汉族聚居的地方；而对那些山岭和草地，汉族却没有太大的兴趣，成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汉族确实不愧是神农氏的子孙，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卓越的五谷文化。但是这段光辉的历史和这种卓越的文化，在进入现代工业化的时代，它的消极面也就暴露了。在汉族聚居区里以体力劳动来进行的农业，吸住了大量人口；他们以五谷为主食，粮食生产占住了大量的可耕地，加上这些宜农地区一般矿产不多，这些情况对工业化都是不利的。汉族地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得改变这种传统的经济结构、人口分布、土地利用以及食品结构。要做到这些方面的改变，汉族就需要少数民族的帮助了。

少数民族地区有在面积上超过汉族聚居区可耕地的广大草地和山区，可以发展畜牧业。如果少数民族生产的牛羊肉能大量进入汉族的食品结构，不仅能够提高汉族的体质，而且可以减轻他们粮食生产在土地利用上的压力，发展生产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这听来是个远景，但从美国人和日本人食品结构的变化速度来看，只要我们努力，这前景并不是太远的。我们要用发展牧业来改变农业的面貌。在牧业上有丰富经验，又居住在广大宜牧地区的少数民族，必然是发展牧业的主要力量，而且他们一定能在在这方面做出重大的贡献。

在少数民族地区，能作为工业原料和动力的资源是极其丰富

的，称得上地大物博。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单靠提高粮食生产是不够的，而必须迅速开发这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来发展我国的工业。这就需要各民族的合作，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合作了。具备了这样的合作，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才能得到开发。少数民族地区资源的开发，必然会带来少数民族的经济繁荣，加速他们文化的发展。只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才能改变当前我国人口分布极端不平衡的状态，减轻汉族地区的人口压力，解放汉族农村里拖住在农业里的劳动力，使我国的农业能顺利地实现现代化。

在目前，这些固然还是设想，但是这些设想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就是要从我国民族情况的特点出发，把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看成一盘棋，各民族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争取早日实现共同繁荣的目的。充分认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确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信念，是巩固民族团结，克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这是《宪法修改草案》有关民族部分的基本精神。

为了保证这种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宪法修改草案》作出了新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仅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具有管理地方性经济建设的自主权，而且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这样才能使各少数民族人民看到国家的繁荣就是自己民族的繁荣，而积极投入加速四化的洪流，按照《宪法修改草案》所规定的道路前进。

1982年8月

四 上 瑶 山

还不到一年，我又到广西金秀瑶山去走了一趟。这次是应老乡之约去参加庆祝他们的自治县成立 30 周年的。三十而立，应当说是件大事，我怎能不去祝贺一番？

如果安排得好，从北京当天可以到金秀。可是主人怕我经不住 4 小时飞行后再加上 5 小时面包车里的颠簸，坚持要我在桂林住一夜，往返多花了两天的。比起 47 年前我初上瑶山时，从上海到瑶山足足花了两个多月，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了。

这是我第四次上瑶山了，四次中要算这次时间最短促。我本来打算多住几天，还想去初上瑶山时调查的地区探望一下和我前妻一起照过相的那位老大娘。她现在还健在，盼望我能去见她一面。可是因事打消我这个愿望，匆匆而去，又匆匆而返，在山里只住了三个整天。

今年天气有点反常，入秋以来从北到南气温都比往年同时为高。山中三日意外地尝到了避暑的滋味。金秀县府处在海拔 800 多米的山谷里。每到午后，气温刚要上升时，经常会降一阵凉爽的雨，让人们能享受一个舒适的午觉。雨过醒来，举目四望，周围山色备觉妩媚。空气是甜滋滋的，轻纱似的浮云往来游荡，峰峦隐现，逗人遐想。

在这短短的三天里，听到的新事确实不少。这一年里金秀瑶山显得更秀丽了。记得去年这时候，老乡们向我申诉过许多情况，归纳起来大多是林粮矛盾引起的。今年没有人再提这些事了。当前的话头离不开“两热”：致富热和科学热。瑶族作家莫以明，就是我前年相识的，当时的县委书记，在他写的《八角

姻缘》那篇小说里生动地道出了这一年瑶山的气氛。

金秀瑶山位于以柳、桂、邕三江所划出的三角地带中心，面积 2000 多平方公里，高峰林立，一般在海拔 1000 米以上，最高的近 2000 米，是广西中部偏东的一片高山区。山区四周地势低平，海拔仅 100 米以下。这里的高山和桂林的石山不同，土层较厚，植被广袤，是广西最大的天然林海，从东北到西南绵延百余里，每年蕴藏着 24 亿立方米的水量，是个名副其实的绿色水库。经 25 条呈放射状的河流，分别供应周围百万亩良田，养活了百万人口。

什么时候起这个山区有人居住，至今还说不清。500 年前明朝的封建统治者因镇压瑶族而引起的长期武装斗争的中心就在这山区南部的大藤峡。其后这一带平地上就很少见得到瑶族了。瑶族几乎都进入了闭塞的山区，真是“无山不成瑶”。金秀这片险恶的高山峻岭保卫了瑶族的生存。瑶族一向依林为生，培植和保卫了这绿色水库，繁荣了周围的农业，形成了一个生态体系。解放后我们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瑶族人民享受到了当家做主的民族平等的权利。瑶山内外从隔绝转向交流，原本可以指望山内山外更可以林粮相济，共享繁荣，没有料到 20 年来却闹了一场林粮矛盾。

林粮矛盾是从大跃进的“放卫星”大献木材起，到十年动乱的“不吃亏心粮”，要求山区粮食自给为止，这一系列“左”的干扰产生的结果。在这种地无三尺平的山区里搞“以粮为纲”，人们只有砍树开地。在贫瘠的山坡上长粮食，几年就连种子都收不回，不得不丢荒另辟，把郁郁葱葱的山岭，刮成一片片的秃顶。山内的人劳动终日不得一饱。山外却因山上林少蓄不住水，多雨发山洪，少雨河成溪，涝旱相间，粮食产量年年下降。这就是说，这地区的生态体系被破坏了。

瑶山偏僻，“以林为主”的政策去年才落实下来，刹住了林

粮矛盾。这个政策说来很简单：要求住在宜林地区的居民全力发展林、副业，粮食不够自给就由外地供应他们。以粮养林，以林蓄水，以水供田，以田植粮。从林粮矛盾变成了林粮相济。在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生态体系，将为这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优越条件。

金秀瑶山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即便不能说面貌大变，至少可以说气氛不同了。这一年里发生了许多事，初听来有些似乎不大容易相信。比如说，罗香公社罗运大队，人均年收入从 1975 年的 72 元上升到 1981 年的 380 元。在绝对数字和增长速度上都比我在江苏调查的江村为高。上面提到的那篇小说《八角姻缘》就是取材于这个生产大队的。

事实是这样：金秀瑶山很早就以生产八角著名。八角是一种香料植物，又叫大料或茴香。在“文革”期间很多公社奉命“割尾巴”，把多年的八角林砍了。可是，罗运大队顶住了这阵歪风，保住了八角林。拨乱反正后，国家收购这项香料价格较高，所以这个大队就走运了。去年落实了生产责任制，干劲更旺，这个生产队在这一项收入上就得到了 40 万元。有个单身汉一人净得 1380 元。这个 265 户的生产大队的信用社中，个人存款已近 11 万元。全大队有收音机 105 台，收录机 4 台，手表 255 块。去冬今春，不少人结伴到柳州和桂林旅游，这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事。

这个生产大队的好运道像长了翅膀，一下在大瑶山里传开了。已经把八角林砍了的地方又种了起来，没有种过的也千方百计地学习怎样种八角。自治县适应新的需要，今年在原来的中药繁殖场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八角研究所，引进现代科技来繁殖良种，防治病虫害。全县今年已有八角林近 3 万亩，这些树长成后人均收入至少可以翻一番。

听来更是喜人的还不是八角，而是灵香草。这是瑶山的特

产，闻名山外已有很长的历史。早在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里，已提到它，称零陵香，产于当时瑶族聚居的零陵郡的静江等地，在今桂北。它是多年生草本，高 65 公分左右，叶互生，椭圆形，长 3 公分许，长在森林覆盖的潮润的地面上，自然生长期大约 15 年。培种的方法相当简单。农历五月到七月间，从老本上摘取 3 公分左右长的草茎，带一片叶子，插入土中或石缝里，次年二月除一次草，三月开花，到冬天就可以连根拔起，烤干出售。

去年访问金秀时就听说，香港的商行派人到平南高价收购，据说要 10 多元一斤，而传说在香港要值几十元。我问老乡，这种香草为什么这样值钱，他们也不清楚。有人告诉我，北京图书馆派人来购买，说是放在书库里，线装书就不会遭虫蛀了。后来又听人说，灵香草的这种用处是清代宁波“天一阁”的主人在广西做官时发现的，他带回到那个著名的藏书楼里试用，果然生效，于是就在当时的文人中传开，视作珍品。港商拿去作什么用，传说却不少。除了用来提炼香精外，据说还能用来治病。我在一个调查报告中查到，瑶族人民用此草生茎叶煎服，可以避孕或堕胎。如果经过试验确有此效，对我们推广计划生育大有帮助。我带了标本回来，请人去打听学名，得到的答复是属报春花科。

灵香草对我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建国不久，我参加中央访问团到广西去做少数民族工作，那时曾注意到大瑶山的茶山瑶妇女头上佩带的银板，高耸突出，光亮夺目，十分惹眼。当时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在这偏僻山区里哪里来这么多银子让妇女顶在头上？老乡告诉我说，茶山瑶会种灵香草，外边的人出大价钱用银子来换。山里风气好，没有盗窃，所以这些银子成了妇女们常用的装饰品。这道理我能懂得。山里这种自给经济，加上运输困难，除了白银还有什么能用来和瑶族交换这种珍品呢？这种瑶语

称作“银钗”的大银板，插在头顶上，左右两边各三块，轻的有500克，重的有2斤多。在民族的头饰上确是具有特色的。

灵香草是价值较高的土特产。据老人们记忆在他们的幼年，每斤可换来银币2至4角（当时白米50公斤值2块银元）。我去金秀市街上的土特产商店里参观，看到2两重的一袋灵香草要价2元人民币。种植这种香草并不费工，据说100公斤灵香草，约费30个劳动日。当我在叹赏这样值钱的特产时，陪同我一起进山的一位本地同志在我耳边笑着说：请你准许我迟两天回北京，我去种一些灵香草，托家里人照顾一下，明年接老母亲上北京的路费就有着落了。我计算一下，确实够买北京、桂林间来回的飞机票了。我顺口说，索性住上一星期，你一年可以不必支工资了。

灵香草固然值钱，又容易栽植，但是却十分娇气，多病易萎。瘟疫一起，整片遭殃。最凶恶的瘟病叫做“点蜡烛”。犯了这种病，开始是枝头的嫩叶枯黄萎落，然后向下蔓延，其快如蜡烛燃烧一样，不久就全部报销了。而且一株犯病，一片受灾，传染很快。过去每年因“点蜡烛”而损失的产量经常要达30%~40%。不瘟则白银进门，一瘟则两手空空。过去这对瑶族来说，只能是事归天命了。他们称之为灵香，多少带有点靠神保佑的味道。

过去这一年里，却出现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科学克服了神佑，保证了灵香草长灵永香。原来去年我离山不久，自治区派来一个自然资源综合考察队。其中有一位广西农学院的教师何有乾同志，他决心要为灵香草“灭蜡烛”，用了半年时间，为这种摇钱草找到了防治病害的措施。他经过观察和试验，诊断出“点蜡烛”是一种由寄生真菌的侵染所引起的“斑枯病”。找到病源，就可用隔离和药剂来防治。首先要保证种苗不带病菌，其次禁止病菌散播，及时清除病草，必要时喷射药剂。今年4月自治县科协办了一期“培训班”，由何老师向各地老农传授防治措

施。他吹灭了灵香草的“点蜡烛”，却点燃了一支科学热的蜡烛。老百姓里就传开了：“科学能保产，保产能致富。”致富热引起了科学热。科学和生产一结合，它就成了人民的宝贝，连知识分子都香了。

深山密林里遍地是财宝。但是如果这些财宝需要看守，那就成了个难题。哪里有这样多人去看守那么大的一片森林呢？如果在森林里培育的作物不能保证收获，那又有谁去经营呢？去年听说由于山外有人进来购买灵香草，就发生了偷盗事件。一皮包灵香草就值几十块钱。致富热走了火，就会进入邪道。要靠公安人员去搜查处罚，那就不胜其烦了。这时瑶族想起了他们传统的石牌制度来了。石牌制度用现在通用的话来说就是“乡规民约”。当大瑶山被历代封建势力围困的时代，山里的瑶族人民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山内的社会秩序，制裁一切破坏安定团结的行为。他们本身并没有强大的政治机构，只有通过社会自觉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共同订定一些规则，主动遵守纪律。凡是违背公约的，人人起来加以制裁。他们把这些公约刻在石牌上，所以称作石牌制度。

石牌制度在大瑶山里发挥作用已有几百年。30年代我初上瑶山时，对山内的社会风气就有极好的印象。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完全是事实。把东西随意放在路旁，上面插一个草结，就不会有人去动它了。哪一个人违背了这个社会习惯，就难在山内容身。这种优良传统在近10年来，也许是由于山外的人进山的多了，也许是由于山外传入了“左”的歪风，瑶山也发生了偷盗案件。

今年6月，以培育灵香草而致富的香拉大队，为了实际的需要，又想起传统石牌的社会公约来了。这是瑶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全大队的群众开了个大会，定下了个“乡规民约”。这个民约有20条款，其中最重要的是严禁“五大犯”，盗窃灵香草

是其中之一。这个公约于今年7月1日起执行。我是8月底到瑶山的。在这两个月里据说还没有发现过要动用公约来惩处的事件。这是一件值得推广的好事。提到高度来说，这是个民主和法制统一的典型。同时它也提示我们，物质文明的发展必须与精神文明相配合。如果只看到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不发挥自觉的社会纪律，那就有滑入邪道上去的危险了。

我从大瑶山赶回来听到了十二大的报告，使我想起在瑶山里看到的种种情况。拨乱反正以后的党正在领导广大劳动人民，发挥他们伟大的创造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偏僻山区的瑶族没有辜负党的关怀，不愧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像过去这一年的速度发展下去，本世纪内翻两番看来是大有把握的。

1982年9月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民族问题^{* 1}



新宪法序言一开头就交代了一句重要的话：“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句话里，“各族”，即“多民族”；“共同创造”，就是说，各民族一起创造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化。一是“多”，一是“一”，我们的国家是在多民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统一国家。民族问题就是发生在“多”和“一”的矛盾中。

我们的祖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所谓夷华之分只是文化和风俗之别，可以交流转换，用现代的概念说是族别而非国别。其后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行政制度，就是以原有的一致性为基础的。历代统治阶级争夺政权，目标总是在“得天下”，也就是统一的局面。所以，地方割据固然常见，而分裂出去自立永久性的独立王国的则很少有。我们东亚这一块大陆和西欧相比，在这方面大不相同。西欧至今统一的局面还没有形成，甚至所谓“共同体”也不牢固，而我国统一的主流是没有断过的。所以，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一”和“多”的矛盾，一直是个内部矛盾，是在统一局面里怎样正确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

回顾一下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国各民族之

* 本文是作者在民盟中央学习新宪法讲座上的讲话。

间存在着一些民族压迫另一些民族的现象。这种民族压迫制度在历史上已有几千年之久，哪个民族一当权，就要对外族不容分说地压一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个制度才被消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一个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国家。

在中国历史上当权的时间最长的是汉族，汉族人数也最多，所以说到民族压迫主要是汉族的统治阶级压迫其他民族。但是，其他民族的统治阶级也当过权，元朝的皇帝是蒙古族，清朝的皇帝是满族，他们也压迫过汉族。从科学的立场来看，不能说哪一个民族压迫哪一个民族，因为各民族人民之间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民族压迫制度的根源是阶级压迫，是一个民族的统治阶级以民族的名义来压迫另一民族，而且主要是压迫另一民族的人民，因为各民族的统治阶级间虽有矛盾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互相利用的一面，而各民族的统治阶级和人民间的阶级矛盾是不能调和的。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了一个时期，通过各种方式的社会改革，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剥削阶级，民族压迫制度才从根本上予以摧毁，新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才得以建立。

民族压迫制度的摧毁，并不意味着过去民族压迫所遗下的民族隔阂会立即烟消云散。各族人民不可能不受过去统治阶级离间民族关系的影响，大民族的人欺侮小民族的人，小民族的人不信任大民族的人等等。所以，民族压迫的根源固然是阶级矛盾，但在民族压迫制度下，压迫其他民族人民的也不只是统治阶级，而且统治阶级总是利用他自己民族的人去执行民族压迫政策。因此，在民族压迫时代，各民族人民间也产生过隔阂甚至仇恨。

记得建国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访问团，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去宣传民族政策。要我们去时首先向少数民族人民道个歉，赔个不是。当时，我们还都很年轻，认为自己没有压迫过少数民族，这是统治阶级搞的坏事，不用我们去赔礼。当时周总理讲：

你们学习过马列主义，懂得这个道理，但少数民族没学过马列主义呀！他们看到汉人，也弄不清是什么阶级。而且压迫别族的民族统治者，在自己民族中散播大民族主义的思想，有大民族主义思想的人也会欺侮、压迫少数民族的。于是，我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向少数民族人民道了歉。我们对他们说：“过去汉人对不起你们，从现在起我们平等了。”这样一说，少数民族人民对我们的感情确实改变了。他们说我们是新汉人，压迫他们的是老汉人，新汉人和他们平等。

在解放前，存在着消灭民族压迫制度的问题，现在进入了民族平等时期，大民族压迫小民族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我国从制定共同纲领开始，历次宪法都清清楚楚地规定了各民族一律平等。我们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各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共同管理国家大事，这就是在政治上体现了平等的原则。“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中第一个概念就是“平等”，民族压迫制度已经消灭了，但各民族之间事实上是否真正平等？是否有相等的条件来行使平等权利？这还是一个题。

我们的民族政策首先是抓少数民族共同的一面，就是废除民族压迫制度。接着“多”的问题就出现了。各民族之间存在多种多样的差别。我们的国家虽说解放了，但各民族在社会经济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不是一天就能全部解决的。解放前，汉族的社会制度是封建主义加少量的资本主义，而西藏实行的是农奴制度，四川凉山的彝族是奴隶制度，云南边境到海南岛还有部分原始社会的痕迹。总的说来，约在 60 万少数民族人口中还保留有原始社会的残余，有 100 万人还实行奴隶制度，生活在封建初期的农奴制中的人有 200 ~ 300 万。真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所以，毛泽东同志、彭真同志都讲过，我们完全有条件用自己中国现实的资料来讲社会发展史。直到现在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十分原

始的，各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的差距问题。我们不仅有个国内外的差距，还有一个国内各民族间的差距。这两个差距又是密切地相联结的。怎样缩短、消灭民族间的差距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问题。

二

我们要实现四化，就是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现在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所以必须迎头赶上。我们的国民收入明显的比发达国家少得多，到本世纪末也不过达到小康水平，还低于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要使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就要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政策方面我们还正在调整、摸索。靠科学就是利用知识，利用智力资源，不能“关门称王”。这次搞人口普查，查出我国共有文盲、半文盲 2.3 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5 多。我们的智力资源很贫乏，要承认这个差距。要搞四化，先是缩短差距，然后才能消灭差距，进一步超过人家。我们讲“德、智、体”全面发展。现在，关于“德”，我们正在抓政治思想教育；“体”，很多项目已经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有些还得了金牌；“智”，和发达国家比，却有很大差距，特别近 20 年来，这个差距更拉大了。

聂荣臻同志曾讲过：50 年代初，我们向科学进军，差距虽然已经有了，但还不很显著，后来我们走了弯路，后退了。人家 60 年代到 70 年代里搞了个科学技术革命，进入原子时代，可是中国在这些年里却搞了个“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都成了“臭老九”，智力资源遭到破坏。国内外的差距拉得更大了。缩短和消灭差距，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努力做到的事情。

再看看我们国内的差距也很大，各民族之间都有差距，这个

差距甚至大于我们同发达国家水平的差距。如果国内的差距不缩短和消灭，就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后腿，而且还可能产生新的民族矛盾。讲一点我所知道的具体事例，我国第一个成立县一级区域自治的是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它是由侗、壮、苗、瑶四个民族组成。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申了党的民族政策，侗、壮族发展较快，但是苗、瑶族在山上，不肯下山，还过着早期闭塞的生活。他们缺乏文化知识，不能接受先进的技术和工具，结果，他们和侗、壮族的差距拉开了，发生了新的民族问题。所以要讲真正的民族平等，就不能光靠一条法律，要做很多的工作，要缩短和消灭差距。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个问题也就更进一步提出来了，否则就会给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造成内部矛盾。这个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是一个不可轻视的问题。

在民族团结的问题上，我们的确比以前团结了。我曾四次去广西瑶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去过三次，看到很多问题，使我很受启发。从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也可以推想到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这个地区发生一个新的大转变，这个转变是：从同汉族隔离才能生存变成了同汉族结合才能发展。广西瑶山是广西中部靠东的一片山区，最高海拔 1900 米，居民分布在海拔 600 ~ 800 米上下。从历史上看，广西东部原来可能是瑶族聚集的地方。自从秦朝开始，汉人分别从桂林向南和从广东向西，逆江而上，两路进入瑶族地区，到明朝两批汉人差不多碰上了，瑶族夹在中间。于是，就打了 100 年的仗。后来，王守仁就在太平天国起义的金田附近的大藤峡把瑶族打败，瑶族被迫进山，靠着险要的山势维持生存，进行生产。这里的山势确是十分险要，山外的人不容易进去，瑶族就是靠同汉族隔离才能生存下来的。

解放后，贯彻了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他们同汉人有了接触，进行了交流、合作，才使他们繁荣起来。这个变化十分不易，少

数民族对汉族心理状态是从历史上形成的，要使少数民族精神文明，从封闭模式转变成开放模式，不是那么容易的。要让他们感到同汉人结合了才能发展，就要做很多工作。

我国民族大团结局面的形成，也是出于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各民族合作才能共同求得生存。我们各族人民如不团结起来，就不能抵抗帝国主义。现在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只有大家团结一致，才能得到共同繁荣。所以，我们各族人民必须在心理上来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在思想方面真正认识到，少数民族不能离开汉人，汉人也不能离开少数民族。这就需要改变在长期的民族压迫制度下，造成了少数民族的那种封闭心理状态。

上面我已说过，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长期统一的国家，就是说，我们这个统一的国家历史悠久。总的来讲，就是我们这个统一体是有保障的，是经过考验的。最近的考验是在这十年内乱时期。李维汉同志曾讲过，在十年内乱中少数民族受到很大委屈，可是没有一个少数民族在这段时期要求脱离我们的大家庭。“四人帮”迫害少数民族，有的地方甚至比国民党还厉害。内蒙古有几十万人被打成“内人党”，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许多民族干部遭到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但却没有一个少数民族脱离我们的大家庭。这是因为早期正确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有不少汉族同志艰苦工作，有的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到少数民族地区沟通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少数民族认为这些人是新汉人。汉人中虽然出了坏人，欺负了少数民族，但少数民族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的民族团结又经过了一次重大的考验。

但是，少数民族和汉人之间真正感到是一家人了吗？还不能这样说。因为，以前有一段民族压迫的历史。说老实话，我们汉人还不大理解少数民族遭受民族压迫的痛苦。在少数民族中，有

很多人是在民族压迫中长大的，他们对汉人的心理状态并不那么容易改变。要使他们从一个关闭的心理状态转变到开放的心理状态，那要有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受到“四人帮”的干扰，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说，现在民族之间已经很团结了，而应当还要做很多工作。谁来做这些工作呢？主要是我们汉族。

汉族是个大民族，文化、经济都比较发达，所以比较容易发生大汉族主义。要加强民族团结，首先要克服大汉族主义。新宪法序言里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从理论上讲已经很清楚了，可是实际上往往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党中央几次三番要大家加强学习民族政策，但是，一般却以为民族政策只是少数民族应该学，汉族可学可不学，而且大多不去学，似乎汉族和民族问题无关似的，不必了解民族政策。事实上，民族间的矛盾大多就出在汉族不注意民族政策。

我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参观了一个滑石粉厂，这个厂很赚钱，可是一个少数民族职工都没有。不少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厂，宁可到外地去招汉人，也不要本地的少数民族，认为少数民族笨，讲话别人不懂。这些情形使我想起了江青就讲过：少数民族的语言和外国话一样，多讨厌！“乌鲁木齐”这个地名用四个字多麻烦，应改两个字。这些是最露骨的大汉族主义，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是极端错误的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还有它的影响。

我们汉人不大容易体会少数民族的感情。比如说，京剧里扮演少数民族的角色，面谱被画得乌七八糟，少数民族当然感到不舒服。这种民族感情，我们汉人毫不在乎。再如《蔡文姬》一剧，郭老写这个剧本，本来是表达了文姬归汉的感情，但少数民族看了很有意见，他们认为这是破坏了他们同汉族的婚姻。当然

不能说郭老有大汉族主义，但是就没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效果。我在民族研究所曾担任过副所长，我也有责任。这个研究所专门研究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形成和发展根本无人过问，好像汉族不需要研究了。要研究民族关系，却只研究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不研究汉族，甚至说汉族研究不属于民族研究的范围。

毛主席讲过：汉族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以我自己来说，不知道我的祖宗究竟是哪一族，很可能不是汉族。明朝时，日本人侵略我的家乡吴江县，戚继光大战倭寇，用的兵是苗族和壮族。后来这批人中免不了有很多留在这个地区变成了汉人。我说不定就是这些人的后代。所以，汉族是怎样形成的，也要好好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形成，也都是有合有分，分分合合逐渐变化来的。它们是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个集团。中国的民族是在中国经济的发展里出现的，所以具有中国的特色。为什么我们的研究要跟在人家后面跑呢？为什么一讲民族研究就只讲少数民族，不讲汉族呢？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开创新局面，就更要讲团结。谁团结谁呀？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多于少数民族，只研究少数民族，怎么能搞清楚当前的民族问题呢？

我最近到内蒙古去了10天。人家告诉我，在十年内乱的年代里，有600多万汉人流入内蒙古，占内蒙古人口的1/3。这些汉人进去时没有组织，没有纪律，三三两两地独立行动，到处挖掘发菜、香菇等土特产，破坏了牧场。大批汉人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有好处还是有坏处？怎样让他们成为建设力量？这些问题都没人去研究。还有些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认为：这不是他们要研究的问题，因为这些人都是汉人。这能不能说也是大民族主义的表现呢？

事实上，引起民族矛盾的主要是大民族。大民族主义不大容易改变，彭真同志讲得很好：“汉族同志在警惕和克服大汉族主

义方面，应当高度自觉和经常注意。”这句话给我们做民族工作的同志敲起了警钟，我们汉族对自己这个民族怎样形成的，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在国内处于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漫不经心。少数民族有多少？知道的人不多。我们同少数民族接触不多，就是同少数民族接触的同志，到边区去，还是有看不起少数民族的。我做民族工作已经30年了，常说对少数民族有感情，愿意为他们服务，可是在某些方面还表现出大民族主义。为什么要团结少数民族？没有他们也不要紧嘛！我们汉人也照样可以活得很好。这种态度非常不好。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靠少数民族一起来做才行的道理。

从大处着眼，汉族主要居住在农业发达的地方，知道种粮食，搞多种经营。最近我到内地去旅行，发现他们副食很少。这样的食品结构把我国有限的可耕地大部分被粮食作物占住了，这是很不经济的。这种状况看来非改不可。要讲求营养，提高副食，降低主食。讲高蛋白，就要有大量的牛、羊肉，利用草地生产，少数民族的牧区就可以大大发挥经济效用，变成一个“澳大利亚”。现在也不能埋头专搞农业，要发展工业了。要发展工矿，汉族地区找矿难，少数民族地区矿藏很多。以新疆地区来说，丰富的资源一旦开发，吸收几千万人不成问题。可是，现在还不能大批地去，去了的还有再闹要回内地的，因为存在民族隔阂，汉人不能很好地同少数民族相处。汉族在中国占多数，经济比较发达，但是只占半个中国的土地。少数民族地区辽阔，而且有丰富的资源。我们到本世纪末，经济上要翻两番，必须利用这一半的土地。少数民族和我们的差距很大，要缩短和消灭这个差距，必须做到政策和科学这两条：

一是汉族要懂民族政策，不要乱搞，得罪人。得罪了少数民族会闹事。天下不安。要和他们搞好团结，培养和教育他们和我们一道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是要发展经济，缩短差距，关键在智力支边，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起来。

怎样才能提高呢？现在问题还不少。在开国第二年，周总理就提出成立中央民族学院，目的是要培养大量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干部，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使少数民族改变面貌。这就是智力支边，是通过培养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来提高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用来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在 50 年代，到新疆去了许多支边的同志，当时条件很艰苦，后来大家忘记了他们，没人接济他们了，陆续回来的人不少，形成“一江春水向东流”，“孔雀东南飞”。汉人去支边的先锋队，没人支援，孤军作战是不成的。我们这次组织学者到新疆去讲学影响很好，首先是 50 年代支边的老同志们感到，关内的同志们没有忘记他们，这对他们是个鼓舞。

少数民族也的确需要文化，要使他们的经济发展起来并不难。我 1981 年上瑶山，他们的生活还不太好；1982 年去就不同了，春节时他们放一个通宵的鞭炮，说明有钱了。他们是怎样富起来的呢？举一个事例来说明，瑶山是出大料（八角）的地方，“文化大革命”时“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搞副业，要把八角树都砍了。有一个生产队偷偷保存了他们的八角林，这几年他们出产的大料使他们发了财。瑶山还有一种灵香草，比较贵重，但是容易受虫害，一死就是一大片。广西农学院一位教师进山去考察，用科学方法治好了这种病害，去年这种草获得大丰收。这说明自然科学一进去，什么都能变黄金。只要稍微用些脑筋，制定出计划，经济就能发展起来。科学变“财神”的话并不是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智力支边，可以巩固边防，促进四化，进一步团结少数民族。

缩短和消灭民族间的差距，是当前最主要的民族问题。这项工作搞起来并不那么容易，50 多个少数民族，一个民族有一个

民族的特点，我们的研究工作没能跟上去。要知道各民族都有其特点、优势和困难。有的民族连文字都没有，人数也很少，如果等着他们创造了文字再搞知识，要拖到哪一年？怎么办？我们怎样帮他们把教育搞上去？这些都是具体问题，都需要研究。采取什么方法支援他们？这是我们知识分子要考虑的问题。现在不要光讲空话，要做些实际的工作。我们民盟提出了带头智力支援边疆，这是件好事。我们在新疆又了解到，汉族同志安不下心的最大问题是孩子教育不好，中、小学教育很差。如果要使汉族同志安定下来，首先要把中、小学办好。汉人安心边疆工作就会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文化事业带动起来。所以，我们准备动员一批民盟的中、小学教师，其中有些是十分有经验的退休老教师去新疆支援，做一些真正对祖国有贡献的事情。

发展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是四化建设的关键，要发展我们“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就要很好发挥我们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民盟是知识分子的政党，优势就是人才较多，应该发挥这种优势为四化服务。今后，我们要把它用到农村和边疆去。

我们计划搞学术座谈，给一切自己有研究成就的学者提供讲台。我相信中国人并不比别人差，要创造条件，新的局面要有新的气氛，在知识分子中要搞出这种气氛，使大家一起向科学进军。

我们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把文化普遍提高起来，缩短和消灭少数民族和汉族在科学、教育方面的差距，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方面都不难办，民族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1983年1月

发挥智力优势，为民族地区四化服务

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要缩小以至消灭两个差距，一个是同科技上先进国家的差距；一个是国内各民族间、内地和边疆间经济文化的差距。如果忽视了后一个差距的存在，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就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要真正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就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帮助少数民族，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才能真正做到“共同繁荣”。

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起来，重要的是要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所以我们应当“智力支边”。民革、民盟、民进、农工、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都是由有政治觉悟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所以都是“智力集团”。我们要用智力上的优势为四化服务，目前急迫的任务是要落实到支援边疆，支援山乡。民盟中央最近将开展几项工作：

一是筹办多学科的学术讲座，共 10 个专题。请一批年近古稀的老专家、学者讲自己专业方面最精华的部分。讲课的对象是大专院校讲师以上的教师和各研究机关的研究人员。

二是面向边疆，面向农村，协助培训中小学师资。目前农村和边疆地区最大的问题是初等学校师资水平很低，而人才培养是一个民族繁荣强大的根本大计。民盟已同新疆地区约定，先派一个小组做重点调查，摸经验，然后再派出配套的师资培训队伍。

三是继续开展讲学活动。主要目的是促进各个地区干部放开眼界，重视科学文化，培养学术空气。

四是举办“幼儿教育十四讲”，拟先在北京讲，同时可以给需要的地方送录音带。

除此以外，还准备组织人力在资源的开发利用、城市建设规划等方面，根据各地方的需要，进行实地考察，提供咨询。

民盟一定精心选派优秀的教师，做好“智力支边”的工作。同时希望各民主党派协同动作，为支援兄弟民族地区做出贡献。

1983 年 4 月

《盘村瑶族》序

胡起望、范宏贵两位同志所写的《盘村瑶族》即将出版，因为这个研究是出于我的倡议，所以我要我在书前写几句话，说明这项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实际上我想说的话已经在1981年12月7日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讲过。这篇讲话的记录曾以《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为题发表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后来收入《从事社会学50年》这本集子里（198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范宏贵同志也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发表过一篇《在大瑶山进行微型研究的体会》，叙述了大瑶山的基本情况和这项研究的主题。这篇序言实际上不过是这两篇文章的重复和引申。

先说一说我为什么倡议在广西大瑶山，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社会调查。1935年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接受导师史禄国教授的意见，在出国留学之前，先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一次实地调查。当年秋季我偕同前妻王同惠一同进入广西大瑶山。我们的分工是：我主要测量瑶山居民的体质，前妻做社会调查。该年12月16日，我们在从花蓝瑶地区转移到坳瑶地区的旅途上迷失道路。我不慎误踏猎人设下的陷阱，腿背受伤。前妻下山呼援，天黑路险，溺水丧生。后来我虽获救出山，这次调查却并未完成。我在养伤期间把前妻所遗材料略作整理，编成《花蓝瑶社会组织》，而我的体质测量资料后来全部遗失在昆明。因此，我一直遗憾在心，觉得是一件此生没有还清的欠账。1978年我应邀去参加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

年，返途上我去访问了一别43年的大瑶山。当地的瑶族同胞还记得我，而且听说当年接待过我们的老朋友还有不少在世。他们的热情，鼓励了我想继续在瑶山进行上次没有完成的调查。这是我做出大瑶山社会调查倡议的来由。

我这次访问为时虽短却得到不少新的启发，提出不少问题：首先是瑶族是怎样形成的，其次是瑶族这一类山区民族有什么特点，第三是它们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第四是我们怎样下手去研究这许多方面的问题。在这里不妨把我个人的想法说一说。

瑶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汉文的记载中南北朝时期就有“莫徭”之称，这个民族称谓亦见于唐代大诗人杜甫和刘禹锡的诗中。瑶族更早的先人在汉文记载中一般认为是被包括在蛮人一类里。按已有的文字记载看来，从秦汉时起长江中游南部山区从湖南到广东都是他们聚居的地方。过去研究瑶族历史的学者对他们的来源和迁移路线都有过值得称道的研究。但是以我自己来说，过去心目中总是把瑶族看成是一个具有某些民族特点的集团，子子孙孙一代代地传下来的；他们在某一个时代聚居在某些地方，有时分散，有时聚合；他们的社会经济发生过某些变化。这样构成了一部瑶族的历史。由于这种看法，我总是想从史料中去追寻瑶族的来源，多少是认为有一条线贯彻始终，不论这条线的某一段中这种人曾被人称过什么名称。这种看法并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人总是一代代传下来的，现在还存在的民族总是有个源流可查考的。但是我从广西大瑶山的瑶族形成的具体过程中却看了上述观点未免过于简单了些，因而也会妨碍我们对民族历史的研究深入下去。

大瑶山里的情况是这样：自己认为是瑶族的人有五种不同的自称。汉人也用了五个名称分别称呼他们作：茶山瑶、花蓝瑶、坳瑶、盘瑶和山子瑶。他们的汉名除了坳瑶外都不是自称的音

译，比如茶山瑶自称是“拉加”，花蓝瑶自称是“炯奈”，盘瑶自称是“勉”，山子瑶自称是“金迪门”，坳瑶则自称“坳标”。如果问他们是不是瑶人，他们没有否认的。可是在他们的自称中都不加上个瑶字，不说“拉加瑶”或“炯奈瑶”等，而承认拉加和炯奈等都是瑶。瑶这个族名很可能是汉人称他们的名字，他们也用它来指这五个不同自称的人所形成的共同体。

我30年代初到大瑶山时，由于缺乏语言学的训练，没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五种不同自称的人的关系，而简单地把他们看成是大瑶山瑶族的五个支系。所谓支系意思是一个根本上分出来的枝条。这次我和学过语言学的同志们一起去调查，他们熟悉过去这几年语言学者对于这五种不同自称的人所说的语言所作的研究。根据这些研究我才知道居住在大瑶山里的瑶族在语言上并不是统一的，而可以分为勉语、布努语、拉加语三种。它们虽然都属汉藏语系，但不能说是一个语言的不同方言。勉语属苗瑶语族瑶语支；布努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接近苗语；拉加语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接近侗语和壮语。换一句话说，茶山瑶的话近侗水语，盘瑶、山子瑶和坳瑶近瑶语，花蓝瑶语近苗语。

从语言上暴露出了这五种不同自称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来源，或者说，他们很可能原来不是一个民族的人，进入了这个山区之后才形成现在大瑶山的瑶族。他们不是出于一个根本的枝条，而是不同支流汇合而成的一条河。如果称他们是“支系”，只是支流的意思。我觉得不如避开支系这种说法，而称他们作不同的集团。大瑶山的瑶族就是由这些集团凝聚而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

据这五个集团自己的传说，他们迁入大瑶山的路线也不相同。茶山瑶是从广东经广西梧州取道藤县、平南进山的，但也有说是从湖南取道浔州、贵县象州入山的。花蓝瑶是从贵州经柳州、象州入山的。盘瑶是在湖南被打散后进广西入山。山子瑶从广东进广西由平南入山。坳瑶从贵州进广西经百色、南宁，然后

入山。这些传说表明现在居住在大瑶山里的瑶族来自四面八方。入山的时间上也有先后。至于谁先谁后他们还有不同意见。从盘瑶、山子瑶没有土地的事实来说，可以设想是出于他们入山时山里的可耕地已经有人占据的原因，占有土地的茶山瑶、花蓝瑶和坳瑶应当比没有土地的盘瑶和山子瑶早入山区。但是盘瑶却认为他们先进山，但由于游耕所以没有占有土地权。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于历史事实，在入山先后问题上各集团是各持己见的。

这些集团是不相混同的，比如，茶山瑶不能变为花蓝瑶。但是从各集团的姓氏来看既有不同于别的集团的姓，也有相同于别的集团的姓。都有槃瓠传说和说瑶语的盘瑶和山子瑶，有六个大姓：盘、黄、赵、冯、李、邓是相同的，但是还有许多姓是相互间不相同的。比如盘瑶的包、周、胡、唐、雷，在山子瑶中就没有；山子瑶的蒋、卢、陈、谭、覃、郑、莫、冼、刘在盘瑶中就没有。说瑶语的坳瑶中有盘、越两姓但没有其他四姓。说侗语的茶山瑶里却有姓莫、刘的人。花蓝瑶中有姓冯的。各个集团都有别的集团所没有的姓，比如茶山瑶的陶、金、龚、田、龙，盘瑶的唐、雷，山子瑶的卢、陈、谭、覃、郑、冼，坳瑶的罗、苏，花蓝瑶的侯、相。如果假定同姓之间有相同来源的话，各集团间在历史上可能也是有互相渗透的部分。

本书有关盘村瑶族世系关系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们一方面极重视姓的世代延续，而另一方面却又实行双系并行，兄弟姊妹间可以分别从父姓或母姓。形成特有的复杂体系。从具体例子里还可以看到他们吸收汉人归族，至于是否也有吸收其他集团的成分，我还不清楚。总之，不仅在血统上看，就是在族系上看，大瑶山的瑶族这个共同体并不是一成不变、单系纯种的血缘团体。其他民族共同体也有类似的情形，因此，我们必须从具体历史过程中去认识每个民族形成的过程。

就大瑶山瑶族的形成来看，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语言一致的标

准来进行民族识别。我们不能说大瑶山的瑶族不是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尽管它是由五个来源不同集团所组成，而且还说着分属三种语支的五种语言。于是这里产生了一个值得在理论上探讨的问题：什么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共同体中能承担多大在语言、风俗习惯、经济方式等方面的差别？民族共同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它又怎样起变化的？为什么一个原本聚居在一起的民族能长期被分隔在不同地区而仍然保持其民族共同意识？依然保持其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一个民族又怎样能在不同条件下吸收其他民族成分，不断壮大自己的共同体？又怎样会使原有的民族成分被吸收到其他民族中去？这些问题将为我们今后的民族研究开辟出广阔的园地。

放眼我国境内的民族，从上述这些问题看去，在这几千年里的确呈现着一幅规模宏大、成分复杂、有来有去、有分有合的历史长卷。我们对这个历史过程的知识实在太少，以致我们对这样一个有长期文字记录，又是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族怎样形成的过程都说不清楚，至于对当前 50 多个民族怎样结合成为不可分离的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我们也只见到它的结果，而还没有理解它凝聚的过程。这不能不使我想到我们这些肩负着研究中国民族的责任的人面对着怎样艰巨的任务了。我从广西大瑶山里的瑶族——他们只是分布在国内外各地的瑶族的一小部分——的历史经过，从而想到中华民族的形成，因为我意识到从这微型的研究里确是接触到了贯穿在各民族历史中具有一般性的规律。怎样把实际的观察和分析，提炼出我们各民族形成的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理论，也许是我们这一代研究民族的学者必须认真对待的任务。

那么我们在广西大瑶山的瑶族中看到了怎样一个历史过程呢？从现有不充分的资料来说，在明代以前，即 14 世纪以前，瑶族在南岭山脉一带，跨湖南、广东、广西三省的聚居区和现在

相比幅员较广，人口较众。他们对当时采取民族压迫政策的封建王朝的反抗在汉文史书中的记载可以远溯到宋代，斗争的中心地区却一代代由北向南，由较开阔的丘陵地带向险恶的山岭移动，表明了瑶族在 1000 多年里逐步被分散在高寒山区的过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斗争是在明代发生于广西大瑶山附近的大藤峡，当时的统治者发动了几十万军队，在近 100 年中先后三次对瑶民进行大屠杀。瑶族人民受到极大的摧残。经过了这场斗争大约从 15 世纪后叶起，瑶族放弃平地，分散聚居在高山区，形成“无山不成瑶”的局面。

有人认为瑶族这个族名出于“莫徭”，而“莫徭”就是免于徭役的意思。瑶族自己的传说和现在还有保存的“过山榜”都说他们祖先有开垦山地的特权，而没有向王朝纳税服役的义务。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是不受历代王朝的统治的人。有人根据“过山榜”和其他传说猜测：在春秋战国时代瑶族的祖先有可能曾聚居在淮水流域。到了秦汉之后，已退居南岭山脉的一带，即今湖南、广东、广西地区。到明代之后凡是要坚持不受封建统治、不纳赋税传统的瑶族就只有以险峻的山岭为屏障，聚居在高山区，靠山吃山地自力谋生了。从整个瑶族说，由于分散在具体条件不同的地区，他们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有一大部分居住在自然条件较优地区的瑶族占有的可耕地较多，可以进行定居农耕，早期就在土司制度下，接受了王朝的统治。其中有一部分瑶族有可能已逐渐被吸收到汉族里去了。像广西大瑶山那样的瑶族是属于坚持不受统治的那一部分瑶族。

另一方面，受到封建王朝压迫的少数民族在华南地区不仅是瑶族。和瑶族相近的苗族看来也遭到过和瑶族相似的命运。此外还有侗族、水族等历来都是聚居在南岭山脉附近的侗壮语系的民族。他们定居在湘、黔、桂边区的时期可能还早于苗瑶。他们也同样和统治势力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其中也有一部分溃散、流动

到不同的山区以求自保的。广西大瑶山的地势和位置正是容纳附近各族流散成分的安全场所。这个山区处于柳江、桂江和浔江形成的三角地区的中心，在海拔较低的平原中突起的一个山区，方圆几百里，最高山岭海拔 1900 多公尺。山势陡峻，落差极大，易守难攻。实际上，这座山给了入山的瑶族近 500 年的安全，山外压迫他们的势力直到这个世纪的 40 年代才武装侵入，但最后还是被解放军消灭在山里。

这段历史说明了不同来源的民族集团在共同敌人的威胁下，为了生存必须团结一致，形成一股自卫的力量。这种凝聚力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接受共同的名称。他们在语言上、风俗习惯上的区别并不成为离异的因素，因而得以长期共同生存下来。尽管在婚姻上还是各自实行族内婚制，他们共守石碑的法规维持山内的安定，结成密切的联盟，有难共当，确保团结。30 年代我初上瑶山时，对他们路不拾遗的社会秩序印象极深，曾说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非虚构。但是当我们再进一步了解各集团间的关系，也就看到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性质上是集团间的剥削关系，就是这五个集团又可以分为山主和山子两类。当地语言中也做出这种区别，前者称长毛瑶，包括茶山瑶、花蓝瑶和坳瑶，后者称过山瑶包括山子瑶和盘瑶。山区的土地包括水流和飞鸟走兽的所有权都属于长毛瑶，过山瑶得向长毛瑶租种土地，而且要服役。但是这种集团间剥削关系在长期间里并没有引起瑶山内部的分裂，可以说那是由于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山内外的民族矛盾，而不是山内的集团间的阶级矛盾。最后国民党反动武装势力侵入山内，多少还是利用了山内集团间的矛盾而得逞的。

由于山内集团间的矛盾，各集团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占有瑶山土地所有权的长毛瑶，利用山沟里的平地种植水稻。他们的农作技术和山外的汉族和壮族并无高低之别，所产的稻谷质量

很高。没有土地所有权的山子瑶和盘瑶，只能租用山坡上的土地，进行简单的刀耕火种的农业。他们在一块山坡上种了几年，由于地力衰退，就得迁移到另一块山坡上去。他们不可能长期定居在一地，而且山坡上种的玉米和旱稻产量低，一大片山坡只能养活一两家人，所以他们又不能很多人家聚居在一起构成村落。大瑶山里还实行一种种树还租的剥削制度，就是过山瑶租了山坡后要替山主种树。在树苗的间隙处种粮食自给。四五年后，树苗长大了，不能烧草作肥。只能搬走，把成活的树当实物地租交给山主。这样就加速了他们的移动。所以本书作者把盘瑶的耕作制度称作“游耕”，暗示有一点类似牧业中的“游牧”。这个概念是否恰当还可以研究，至少应理解为耕地常常流动的农业。

由于历代封建王朝实行民族压迫制度，使得许多少数民族迁移到深山中去，凭险自保，远离汉族才是安全。这种处境使他们在经济上停滞落后，在文化上闭塞保守。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压迫制度被消灭了，民族间的不平等关系改变成为平等的关系。新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人剥削人的制度宣告结束。在大瑶山里不仅瑶族和其他民族得到了平等地位，瑶族内部集团间的剥削关系也被废除，从此不再存在山主和山子的区别了。这些社会性质上和民族关系上的根本变化为各少数民族开辟了一条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成为现代化民族的道路。他们怎样走上这条道路，在发展中发生了些什么问题，正是我们当前民族研究的主要课题。

要研究上述这些课题，我们必须从具体出发，就是按各民族的具体情况来观察、分析他们怎样走上和怎样走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由于我们的许多民族一方面具有他们的共性，另一方面也各有其个性；所以我们认为必须从“解剖麻雀”入手，树立类型，进行比较，明确特点，发现共性。以大瑶山的瑶族来说，它在宏观世界里的地位只是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个组成部

分的瑶族中的一部分。瑶族一共大约有 120 多万人，分布在六个省（区）的 130 多个县里，其中居住在广西的占总数的 67%，约 80 万人。居住在广西大瑶山的瑶族只有 3 万多人，在全部瑶族中只占 2.5%。但是有 3 万人形成一个聚居区，在瑶族中是不多见的。有瑶族居住的县瑶族人口平均不到一万，而且一般是分散居住在各山，并不能形成一个较大的连接在一起的聚居区。我们要解剖一个瑶族聚居区，广西大瑶山是个比较好的对象。但是这只是一个“麻雀”，固然具有瑶族的共性，但也有它不同于其他瑶族聚居区的特点。从研究方法上讲，它只能作为瑶族研究的开始。至于这个聚居区在瑶族中有多少代表性，或是说哪些是瑶族的共性，还得在其他瑶族聚居区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才能做出答案。

就大瑶山这个范围来看，还存在着五个不同的集团。这些集团固然都承认自己是瑶族，而且有共同的一方面，但是他们还是各自有特点的，不但语言有别，经济发展不同，社会习惯也有差别。因此，我们要解剖麻雀，还得一个集团一个集团的进行。1935 年前妻王同惠调查过花蓝瑶，原本就想一个一个集团地继续调查下去，后来因为发生了事故没有完成。这次我有机会再上瑶山，还是想采取这个办法。但是先调查哪个集团呢？

这次从盘瑶入手进行具体的微型调查是本书的作者决定的。除了考虑到具体的条件外，他们认为在这五个集团中有三个是说瑶语的，其中又以盘瑶人数最多。如果着眼于整个瑶族联系到广西大瑶山之外的瑶族来看，在这山里的盘瑶可能作为研究整个瑶族的一个突破口。我自己在 30 年代访问过盘瑶。那时他们还没有形成村落的聚居点，只有两三家人住在一起。我在盘瑶家里住过几天，测量过他们的人体，在《花蓝瑶社会组织》里有一张当时所摄的相片，但印象不深，听了本书作者的意见，我认为这样设想是可取的。盘村的瑶族可能和其他地方的瑶族具有更多的共同点。所以从大瑶山的盘瑶调查可以引导我们向山外发展，去

研究其他地方的瑶族。换一句话说，盘瑶可能是瑶族的基本成分，就是很早从淮水流域，逐步南徙，后来退入山区，进行刀耕火种的游耕的所谓“过山瑶”。说他们是基本成分是因为在他们游动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游散的成分，构成各地瑶族共同体。这种设想是否符合事实，还得在今后各地瑶族进行比较的调查才能作答。作为开展研究的一种设想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种设想并不是凭主观的想象，而是综合了对大瑶山的初步了解和其他地区的概况而形成的。但是设想还只是设想，不是经过客观事实充分证明的定论。

广西大瑶山的盘瑶据 1979 年的人口统计有 1.7 万多人，占大瑶山全部瑶族人口的 $\frac{1}{3}$ 弱，他们居住得很分散。解放后他们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而且已有部分水田，开始定居，在较高的经济水平上，较多的人家能聚集在一起居住而形成了村落。“盘村”是指盘瑶的村落，在他们的历史上是一种新生事物，是发展过程上的里程碑。我同意本书作者把“从游耕到定居”作为他们研究的第一根线索。

游耕不只是指“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也不只是指几年一迁移的不定居的生活。它是一个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综合性的概念，一种社会经济模式。我认为通过微型调查，对这种模式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可以得到可取的科学成果。当然，现在大瑶山的盘瑶已经定居了下来，我们已不能直接观察到实在的游耕模式，对于这种模式的直接观察还得谋求其他研究的机会。但是在大瑶山的盘瑶的现实生活中还可以观察到从游耕到定居的过程。这个过程我相信不只发生在大瑶山的盘瑶中，也发生在山子瑶中，而且还在大瑶山之外的瑶族及其他民族中发生。解剖这个“麻雀”，可以增加我们对于经历着或经历过同一过程的那些民族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也将使我们明白怎样可以帮助这些民族更好更快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向前迈进。

本书作者提出的另一个主题是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而且更广泛地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虽则程度上可以有所不同。这个过程发生于民族压迫制度被消灭后，中国国内各民族间的关系从不平等改变成为平等的重要历史事实。过去在民族不平等，少数民族受压迫和歧视的时代，凡是封建统治势力进不去的少数民族地区一概是被封锁的。甚至少数民族日用必需的盐、茶都有时列为禁运品，更不用说生产工具和武器了。这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极端不利，造成了至今还不能很快克服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统治阶级的封锁政策在少数民族中也产生了封闭心理。他们的历史经验使他们认识到离开压迫他们的民族越远越安全，因而，对族外的人和事都抱着疏远和怀疑的态度。民族隔阂是长期历史的产物。现在民族平等了，封锁政策已经彻底摧毁，为民族互助政策所代替了。民族互助在现阶段主要是先进的汉族对后进的少数民族在物质上和智力上的支援。这就需要汉族克服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改变故步自封的思想。过去被民族压迫制度所封锁的大门要大大地打开。这就是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关键。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中，越来越明白地显示出少数民族离不得汉族，汉族离不得少数民族。具体分析这个历史过程，取得应有的经验教训，对今后各民族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我原本打算自己亲自参加大瑶山的社会调查。曾在 1979、1981、1982 年三次访问金秀。但是在实践中发现自己已不是 40 多年前的青年人了。在这样的山区里做实地调查需要一定的体质条件，而我已经在蹉跎岁月里丧失了这些条件。出门就要爬山的地形和我的体力和体重发生了难于克服的矛盾。有一次我到离开我所住的招待所不远的一位朋友家里去吃饭，不到 100 公尺的山

坡，我在路上歇三次才爬上去。不料在吃饭时一阵大雨，返途上石路滑得我无法下脚，只能由两个大汉挟着提下坡来，看来不服老是不行了。当然，我心中一直放不下的这一笔欠账，今生很难有亲自偿还的希望了，假如我投身到这项调查工作中去，我又不能满足于听汇报和座谈的。社会调查关键是在有丰富的感性知识，在有行为有感情的实际生活中去观察、去发现问题、去分析研究。我现在已缺乏在瑶山里参与当地居民生活实践的条件，这也就丧失了我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调查者的资格。这对我本人来说不能不是件憾事。但是使我高兴的是具备在瑶山里进行实地调查的本书两位作者响应我的倡议，在1980年至1982年的三年里三上瑶山，不仅对大瑶山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全面了解，而且选择了盘村进行了“解剖麻雀”的微型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科学研究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它必然是一个由粗及细、由浅入深的过程，也是个由局部、片面到全面、完整的过程。我们不能对一个初学者做出过高的要求，我认为只要树立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备了锲而不舍、绝不自满的精神，做一分工作，就是在学术大路上前进一步。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多一分符合实际的知识，也增加一分控制客观世界的力量。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是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更新，是人的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不断的认识和控制。本书的两位作者为了增加我们对瑶族的认识，这三年里付出了大量劳动，不仅是脑力劳动，也包含着艰苦的体力劳动。不说别的，从金秀去盘村就得翻过一座高山，一般人要花几个小时，对我来说已是不可逾越的自然阻碍。我相信他们的劳动是有收获的，这本书就是他们收获的证明。

也许应当在这篇序文里说明一下我对这项研究除了倡议之外，并没有出过多大的力量。我不愿意脱离实际地妄作主张，影响实地观察者的思路，甚至挫伤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学术工

作是复杂细致的脑力劳动，我们作为老一辈的先驱者对下一代的长成固然具有辅导的责任，但是必须认识到这种脑力劳动贵在自觉和创造。拔苗助长、包办代替都是犯忌的。当然，我在和大瑶山居民有限的接触中和在听本书作者向我叙述他们所见所闻所想的过程中，我也有我的思想活动。我受到启发，发现问题，做出设想。这些我都毫无保留地告诉本书的作者以及对这问题有兴趣的人。如果我的思想活动对他们发生过影响，那是出于他们主动的吸收，而且是经过他们的消化和改造的。应当老实说，我也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很大的收益。他们在做我想做而已做不到的事。我通过他们的工作学习到很多知识。比如我在上边已说过，30年代我根本没有想到过大瑶山里瑶族的五个集团有不同的语言。这一点新知识的确使我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而且使我对中国各民族形成过程有了新的探索。这三年，我确是紧紧跟着本书两位作者的工作在学习。同时，我还得说，正因为我一直很注意尊重调查者的主动性，所以这本书里所表达的看法，有些和我的看法不完全相同的。换一句话说，假如我自己做这项调查，我所得到的结果，也不会完全和这本书一样的。我尽管不断地向他们提供意见，但是并没有自己动笔去修改过他们的原稿，我希望能看到中年的研究工作者能自己站立起来向科学进军。

这本《盘村瑶族》只是我倡议的瑶族研究的一个开始。我希望这项研究能继续进行下去。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是继续在大瑶山里一个集团一个集团地进行“解剖麻雀”的微型调查。已经调查过的花蓝瑶和盘瑶还应当深入下去，没有这样调查过的茶山瑶、坳瑶和山子瑶更需要有人去调查。为了全面了解大瑶山的社会，决不能忘记，这座山里除了瑶族还有其他的民族，如壮族和汉族。我最近越来越感觉到在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不应当只调查少数民族，因为在民族地区的汉族常常对这地区的发展起着重

要的作用。少数民族的社会不能离开他们和汉族的关系而存在的。要研究民族地区的社会也不能不注意研究当地的民族关系，特别与汉族的关系，希望今后做民族研究的人能考虑我的这种体会。

瑶族研究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如我上面已提到的，是走出去研究大瑶山之外的盘瑶。只有从比较研究中才能检验我们从研究大瑶山盘瑶所得到的一些设想是否正确。比如我曾设想，盘瑶可能是从中原南移进入南岭山脉，然后又有部分更向西南移动，甚至移出国界的这些瑶族的主干。在他们的移动中不断吸收着从其他民族分散出来的游离成分，而形成今天的瑶族。这个设想还没得到证实。要证实或否定这个设想只有扩大研究的范围到各地去观察和分析。

如果再进一步，那就可以提出瑶族和跟它相当接近的苗族和畲族有什么关系的问题。这并不只是个历史上的渊源问题，而是对相类似的山居民族进行比较研究。他们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有相互学习的必要。

在研究工作的方法上说从按民族的单位分别地一个一个研究已经出现了它的局限性，因而我曾主张今后这类研究应当和宏观的研究结合起来，就是以地区为研究对象进行综合调查。我在支持西南六江流域的民族调查时曾说过广西大瑶山的调查可能是另一个地区的综合调查的开始。这个地区就是南岭山脉的民族走廊。

向前看，我们有着丰富的研究园地，有着急迫的研究任务，现在需要的是赶快培养出新一代民族研究工作者。在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方法上尽可能百花齐放，不拘一格。在研究成果上也应当是百家争鸣，相互促进。在研究队伍里老、中、青三代人各有其用武之地。一切努力都向着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祖国民族大家庭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共同繁荣富强。

让我借《盘村瑶族》书前的篇幅，表达我对民族研究工作

的深切期待。

1983 年 6 月 30 日

《瑶族风情歌》序

如果有人问我，我对西南少数民族最忘不掉的印象是什么？我不假思索的答案将是：我好像进入了诗歌之乡。我常常对熟悉的瑶、苗、侗、壮等西南少数民族青年们说，你们都是些天生的诗人。我见到本书的著者之一莫义明总是要半正经半开玩笑地称他作天才歌手。中央民族学院里许多老朋友，如刘保元等，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出口成诗，不需苦吟的歌手。

我到过贵州、广西的少数民族家里去做客，记忆中也是到处是诗歌，我刚上门，主人拉住我的手，就唱起迎客诗来了。坐下进餐时，端起大碗的酒，一面唱着歌，一面向你嘴里灌，说这是酒歌。我印象这样深也许是出于我既不会饮酒，又不会唱歌，是个干巴巴的汉族书生。我和这些少数民族朋友在这方面差距太大了，以致我的印象也未免会有点夸大。一个丧失了声韵细胞的人对这种似乎有点炙手的风情，产生一种又惊又羡的反应而失去冷静的衡量是不足为怪的，正像一个没有喝酒习惯的人初次尝到了佳酿一般，难免醉醺醺地进入超现实的幻境。

把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称作诗歌之乡，即使夸大一些也无妨，也许这样反而可突出他们的特点，反衬出我们这些汉族书生苍白、干瘪的面貌。诗歌本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感情交流的信息系统。深邃的情谊要求细腻深切的传达，一般的语言显得不够了，发生了艺术。语言不足，调以声韵而为诗词；吟诵不足加以音乐而为歌曲。从平凡的水平提高到了美的境界。艺术使人情深处的感觉得以交流，密切了人与人的契合，加强了社会的团结。这是健全的精神文明所不会缺少的内容。在这一点上说，我一向认为

像我这样没有音乐修养的汉族书生是个精神上的残缺者。我希望我在汉族中是个例外，不然，我们就得老实承认汉族不如其他少数民族了。无论在汉族中像我这种人是不是普遍，我想在提倡美育的号召下，汉族应当多向少数民族学习，学习他们怎样把艺术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诗歌舞蹈成为人人皆能的普通生活习惯。

从向西南少数民族学习生活与艺术相结合的角度看去，《瑶族风情歌》就有它特殊的意义了。过去汉文文献中也有介绍瑶族民间诗歌的著作，但大多是出于汉族文人之笔，如清代李调元所辑的《粤风》，近人陈志良所辑的《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等。他们都用七言体裁来翻译瑶族的诗歌。我们不知道这些是瑶族原有的诗体，还是用汉体来翻译的结果。瑶族诗歌中无疑也有七言诗体，但也不易断言，这是他们原有的体裁，还是受汉诗的影响。看来其中至少有一大部分是用汉诗形式来改写瑶族的诗歌的。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出于这些译者都不是瑶族本族的人。要用汉语来翻译瑶族诗歌，而不失去瑶族诗歌的本色，看来还是由瑶族人自己来做这项作为宜。《瑶族风情歌》证明了我这种设想。

这本书的编者都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瑶族知识分子。他们从小在瑶族中生活，是诗歌之乡中滋长出来的花朵。他们在解放后开办的民族院校里学习了汉文，都能直接用汉文进行文艺创作。他们为了发掘本民族的民间文艺，深入群众，直接向瑶族歌手搜集，录音笔记，加以整理。这些歌词都是用瑶语口头传授的，对本书编者来说原是乡音，所以对歌词所表达的感情，他们能深切洞彻，体会共鸣。他们用已掌握和熟练的汉语翻译出来给懂得汉语文的读者欣赏。我虽不懂瑶语，但只从汉文翻译来说，不仅字字珠玉般地闪烁着心灵的光彩，同时也闻得到浓郁的瑶族特点的乡土气息。我认为他们把翻译作为再创造的文艺工作是颇为成功的。作为一个关切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教育工作者，我感到安慰的是从这本书里看到了少数民族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瑶族

里拥有本书编者那样的文艺人才，不仅应当为瑶族庆贺，更应当为这 30 多年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而欢呼。

从《瑶族风情歌》里收集的瑶族民间诗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怎样和生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集子里的每一首诗歌都和瑶族人民从诞生、成长、恋爱、婚姻、养儿育女，到终没的生活息息相关，如实地反映了有关的习俗。因此，我们除了欣赏他们在这些生活关节上的感情怎样用文艺来表达的优美技巧，还可以从而看到他们许多特有的习俗，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瑶族社会和文化的丰富资料。

举例来说：婚礼歌里的《说亲词》和《娶亲词》，反映了自称“布努”的瑶族在婚姻上的习俗。“布努”瑶族的男女青年恋爱成熟后，男方托人做媒，征得女方父母同意之后，请本宗族一位有名望的男歌手称作“布商”的做代表，到女家说亲。女方也请本宗族的一名歌手称作“耶把”的为代表出面接待，商讨婚约、聘礼和婚期等事。“市商”与“耶把”在协商过程中，互相对诵的歌词就是《说亲词》。这些歌词主要内容是男方向女方表示求婚，女方表示同意，但是在对歌时，“耶把”往往故意为难对方，试考对方的智力、知识和艺术水平，而使得平凡的事务性的谈判变成一场艺术的表演，邀取亲友的赞赏，使社会生活更为优美和丰富。

《娶亲词》是举行婚礼时所唱的歌，在表面上是一种仪式性的祝词，加强婚礼的活跃气氛。但是还应该看到，代表男方唱《娶亲词》的布商，正通过这个演唱的节目，承担了巩固新婚夫妇婚姻关系的责任。婚后如果男女两家之间发生争执，他就有调解的责任。比如女方受到虐待，就可以找布商责问，布商有权主持公道，干涉夫妇间不正当的关系。所以《娶亲词》是一篇训嘱，表达了新婚夫妇应当遵守的社会规范。它也就成为婚约的社会认可。

《送女歌》和《迎孙歌》反映了布努瑶族特有的生育制度。按他们的习俗，男女婚后，女方不就住到男家去，叫做不落夫家。逢年逢节，男家的婆婆要来女家接媳妇回男家，过了节女方又返回娘家居住。农忙时节，男方到女家帮工，夫妻同居，到快生孩子时，女方家长请一位歌手，在后门设席供祭家神，这位歌手唱的就是《送女歌》。歌后，由女婿闭着眼睛剪断拦门的红、白、青三根彩索，带着妻子跨过一碗清水和一盏灯火，从后门出去，并随身携带简单工具和生活必需品，到野外山洞里暂住。一般要住120天，他们就在山洞里生下孩子。到期男方家长到山洞把他们接回男家。回家那天要请一位歌手在门前祭神唱《迎孙歌》。唱完歌，歌手把一个蒸笼搁在大门中央，由歌手把孩子从一端递过去，男方的家长从另一端接进家堂。

布努瑶族也称背篓瑶，居住在广西都安一带。我没有到过这地方，上面所说的习俗是听本书编者讲给我的。据说解放后这种习俗已经改革了，但是这些歌却还有人会唱，本书编者记录下来，得以保存。我听到了这些说明，回头看歌词，见到《送女歌》里充满了父母怎样期望成了家的儿子能独立生活的深厚感情。独立生活必须有一个实践的阶段，在布努瑶里，在新婚夫妇快要有孩子时，就得离开父母去山洞里过一段靠自己过活的日子。《送女歌》一开始就把这风俗的主题讲明白：“龙送鱼下海，凤送鹰上天，离爹牵手去，别娘牵手返。”为父母的人鼓励下一代要“是鹰就飞千里远，是龙就闯千重浪”。生活的能力要在锻炼里成长，所以“亲手种的米最香，亲手种的蔗最甜。呃——去吧！是鹏展翅飞万里，是蜂把花枝攀”。通过劳动，“大地送来粮，高山献出棉”。结论是“人靠勤劳人才富，鸟靠翅膀飞上天”。这是一首富于教育意义的诗篇，道出了他们这种习俗的真实意义。

诵读这首诗歌时，我也体会到研究民俗的人，如果不从实际

生活中去体会民俗的意义，就很容易满足于书斋里的推想，把活生生的富有教育意义的习俗，归入原始社会遗留的“痕迹”。住山洞确是带着一点原始味道，但是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条件下，还能有其他的办法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歌词中所表达的那种对下一代严格训练的要求，这是维持一个社会常青不衰所必要的精神。它不是“痕迹”，而是我们现代社会还应当学习和发扬的模范。我感谢本书的编者为我们保留了这些耐人深思的瑶族风情。我相信民族研究工作者一定会珍惜这些宝贵的资料。

本书编者指望我为读者补充一些有关瑶族的民族历史和情况，以便对本书所收集的诗歌提出一些背景的资料。很惭愧，我有限的知识实在使我感到力不从心。我在这里所能做的不过是对本书中所提到的一些有不同自称的瑶族加一些注释。

瑶族和其他一些民族一样内部有自称不同的集团。本书里所提到的布努瑶、瑯格劳瑶、拉加瑶就是瑶族中自称不同的集团，他们分布在哪些地区，我现在还说不清。据我所知道的，广西南丹有自称“布努”的瑶族，汉人称他们作背篓瑶。广西南丹有自称“瑯格劳”的瑶族，汉人称他们作白裤瑶。广西金秀有自称“拉加”的瑶族，汉人称他们作茶山瑶。此外，在金秀还有自称“勉”的盘瑶、自称“金迪门”的山子瑶和自称“坳标”的坳瑶。尽管总的说来这些自称不同的集团所说的语言都属同一语系，即汉藏语系，他们的语言并不是一致的。简单地说，自称“勉”和“金迪门”的瑶族说的话属苗瑶语族的瑶语支；自称“瑯格劳”和“布努”的瑶族说的话属苗瑶语族的苗语支；自称“拉加”的瑶族说的话属壮侗语族的侗水语支。从语言上看来，瑶族可能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各自有其来源。至于他们怎样形成一个民族的历史过程，我还不清楚。

本书所收集的诗歌都是来自广西的瑶族。瑶族在我国境内大约拥有124万人口，其中67%住在广西。以全国的瑶族说，包

括自称“勉”和“金迪门”在内的说瑶语的人约占1/2，包括自称“布努”和“瑙格劳”在内的说苗语的人约占2/5，有少数是包括自称“拉加”在内说侗水语的人，还有一些瑶族已只会说汉语。在海南岛还有许多说瑶语的人自认是苗族。其他地方的苗族是否有类似的情形，我们还不清楚。看来，苗瑶之间的历史关系是很复杂的。

从社会经济水平来看瑶族内部也很不平衡。大部分靠近汉区居住在自然条件较好的湘、粤、桂边区，都以农业为主，兼营林业；耕种方法、生产关系和生活水平基本上与当地汉、壮族相近。但是在湖南江华、广西龙胜和金秀、广东连南等高山区的瑶族则以林业为主，兼营农副业。他们过去长期被孤立交通不便的地区，文化比较闭塞，生活水平一般较低。最穷困的是居住在广西都安、南丹一带和十万大山中心区及云南边疆的石山区的瑶族。石山是指土层极薄的山，石头暴露在地面上，土地贫瘠，耕作困难，所以至今还有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生产力低使他们还保留不少原始的生产关系。本书所搜集的诗歌大部分是来自最穷苦的瑶族中，即背篓瑶和白裤瑶。金秀的茶山瑶是属于上述的第二类中种水田的集团，在大瑶山里他们的处境比较优裕。

至于这些瑶族中的各种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我知道得不多，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开始。我不能多说了。如上所述，瑶族的民间文学正是为我们研究他们的社会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我更希望瑶族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也能参与社会历史调查的科学工作，对他们所搜集的民间诗歌能进一步分析。他们一定能像在文艺工作上做出的成绩一样，推动民族社会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1983年7月3日

民主党派智力支边^{* 1}

民主党派“智力支边”是1982年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来、并经中共中央通过的。为什么提出“智力支边”呢？因为我们感到我国搞现代化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个很紧迫的任务。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能赶上去，留给子孙的任务就更艰巨了，那时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就更大了。这一点，大家都容易看得到。二是目前我国各省之间在发展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边疆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差距就很大。而我国的安全却要依靠居住在边境线上的同胞。边疆地区的土地面积要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如果加上东北地区在内，要占全国总面积的2/3还多。边疆地区的生产，过去是很不发达的。特别是那些不适于农业、粮食生产的山区和沙漠地带，人口又少，很多是少数民族，经济上更为落后。但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却很丰富。从今天我国迈向四个现代化的道路上来看，边疆地区的发展前途比现在比较发达的地区还要广阔，将后来居上。

现在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几年，我在江苏做调查，江苏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我调查的几个县，1982年的工业产值已超过了工农业总产值的60%多，常熟、无锡等地有的已超过80%。用在工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也超过了农业。农民从工业和副业得到的收入也超过了农业的收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工业所需要的原料，除了从农业生产出来的

* 本文是作者在贵州民盟座谈会上的发言。

以外，矿产、能源等大多来自边疆。所以，边疆各省（自治区）的潜力超过了现在国内所谓发达的地区。这是我国的潜力，也是我国要成为世界强国的一个主要条件。所以，必须开发边疆地区。

但是，边疆地区缺乏智力，也不大懂得如何利用这块宝地，不大重视怎样利用自然资源。知识不够，看不到知识的重要。所以，必须提高边疆地区的文化水平，使边疆地区人民有发展、利用自然资源的智力。总之，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应看到全国这 2/3 土地上的资源在今后国家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要努力开发边疆地区的智力资源。

开发边疆地区智力资源的前提，就是要提高这个地区的文化水平。我们这一代人，要在较短时间内来缩小和消灭国内各地区间的差距和我国与国外的差距，任务很艰巨。而且人家的智力也还在发展，不是在等着我们。他们的基础好，发展也更快，所以我们要加倍努力才行。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觉得智力比较发达的地区，应该把智力扩散出来。北京、上海等地集中着许多知识分子，许多人是窝着，不能发挥作用，应该扩散出去。当然，这有许多困难，特别是面临人事制度、人才“单位所有制”等等困难。但是总得找出一些办法来。民主党派作为智力集团，要出奇兵，打开一个新局面来。

怎样发挥民主党派作为智力集团的力量，开辟一条渠道，让智力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能够把智力扩散到有待发展的地方？这两年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两年前，我们去新疆参加民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几次和王恩茂同志讨论如何发展新疆地区的问题。新疆的知识分子外流的情况相当严重。50 年代是知识分子向边疆地区流动。“文化大革命”以后，已在边疆地区工作的知识分子年纪大了，考虑孩子怎么办等实际问题，想回来，甚至边疆地区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也想离开。这就叫

“一江春水向东流”、“孔雀东南飞”。这对于整个现代化建设是极不利的。我们的总目标是向边疆地区发展，可是现在不是在增加边疆地区的智力资源，反而从那里抠回来。这个状况必须扭转。我们要认真分析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情况，要采取措施，再造成一个50年代知识分子支边那样的气氛。过去，知识分子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前一段时间里，边疆地区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没有很好落实。另外，边疆地区与内地的经济差距也很明显，而且差距还在增大。譬如我刚才讲的长江三角洲，这几年繁荣起来，很吸引人。常州市已没有待业青年了。他们需要人才嘛！越发达越需要人，越有人才就越发达。越不发达，人就越想走，人走了，更加发达不起来了。但是知识分子外流的原因很多，不只是一个物质待遇问题。他们要求有一定的工作条件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和贡献要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在边疆地区必须认真对待知识分子，要改善条件，使那里的知识分子能够待下去。当然，这要花很大力量，但不是白费力气。要从长远看，从发展上看，不能轻视这个问题。我听说遵义医学院的一部分教师回大连去了，原因是在那里工作很困难，学生实习也没有好的医院。从他们自己来讲，回去能发挥作用，还是不错的。可是从贵州来讲，从外面搬来一个医学院，又让它回去了，岂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于外来的科研机构、工矿企业等等，没有认真看作本地区文化力量，保证他们在这里发挥作用，使之安心成为这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同我们智力支边的总精神不相符合了。

所以，我们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开发边疆地区已有的智力资源，坚决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使已经在那里工作的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作用，保护边疆地区的智力资源。另一方面要发动发达地区的知识分子来支援。做好头一方面的工作是得到外来智力支援的一个前提。我们要为整个

国家打算。希望更多的人来把边区建设好，就得创造一切条件让人家乐意来，来了又能安心长期住下去。

抗战时期我们从内地去昆明，住的是草棚，条件比这里还苦，许多国际朋友看到了也很感动。我们那时在西南联大为国家培养的人才很多，其效益到今天还可以看得到。现在在四化建设中的许多主要骨干，就是当时大后方的大学在艰苦条件下培养山来的。可是，我在昆明发现联大搬走后，很多人就跟着走了。可见，能不能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各方面领导必须重视的一个大问题。

开发边疆地区智力资源，必须动员沿海各省的同志从国家的需要出发，到边疆地区去支援。去年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后，表示愿意支边的人很踊跃。当然，现在的条件还达不到有大批的人到边疆地区安家落户，但确有不少同志愿用余力前去支援。1983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联合主持召开了民主党派智力支边“挂钩”会议，我们和边疆地区各省统战部的负责人一起坐下来商讨。各省提出哪些方面需要支援，我们看一看有没有力量承担某些任务。一方要求，一方提供，双方挂钩，就像开广交会。这样，在“挂钩”会议上，一个星期内就“成交”了100多项。杨静仁同志当时在会上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是边疆地区开发时期的开始，这件事很有发展前途。看得远一点，我们希望把“一江春水向东流”扭转过来。

50年代，我们有许多熟悉的同志去了新疆，后来他们同内地的联系减少了，甚至断绝了。他们确实也需要知识更新。我有个在贵州工作的学生对我说：“我来这里多少年，接触不到新东西，知识都陈旧了，很着急。”他们跟外边的联系很少，知识没有更新的机会，这不行，我们应当重视这个要求，帮他们建立联系，没有人来此讲学，可以送需要听的人出去听。智力资源不能关起门来搞，要接受新东西，要交流。一关门，不几年就老化

了，没有用了。

“智力支边”现在刚刚开始，但它很有发展前途，因为它符合四化的要求，本身具有生长的力量。现在有不少人愿意参加智力支边，问题是当地怎样利用这批力量。譬如张毕来同志来讲学，不是说只让大家认识认识他这位“红学”专家，而是要利用他讲的知识变为自己的东西，让这些知识在此地生根、开花。这样做还能促进本地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促进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我们应当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今后使智力支边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边疆地区本身也不平衡，譬如贵阳和外县就有差距。听说贵州有个县的教育局长，不愿意让他的孩子在本地读书，要送到外地去受教育。这是个讽刺。他本人是管教育的，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愿意放到自己所管的学校读书，那么，别人的孩子怎么办？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学校办好一点呢？我们民主党派可以组织力量去帮助他把学校办好。他有困难，没有师资，或没有好的师资，我们可以出人，去帮助他们的教师怎么教好孩子。这件事，天津、福建等地的民盟组织已在做，付出了很大的力量。福建民盟组织了一个帮助外县中小学教师提高水平的巡回队伍。开始时，大家还不敢相信有无效果。组织去的人都是有经验的中、小学教师，到边区去很受欢迎。民盟办这样的事，对下面简直是“雪中送炭”！中小学教师中合格的据估计大约占 $1/3$ ，大多集中在大、中城市的重点学校里。一般农村、市镇的小中小学有许多教师不合格。中学毕业的教中学，小学毕业的教小学，还有小学毕业的也教中学。这是“四人帮”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他们搞什么“戴帽子”，把小学变成初中，中学变成专科，专科变成大学，一层层拔上去。本来一个很好的小学教师，却要他去做不合格的中学教师，其结果是学生倒霉了。师资队伍的质量降低了，又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质量。小学没学好就升中学，中学没学好就

升大学，基础就差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再也不应当继续发展下去了。这方面，民盟是可以做些工作的。

1983年夏天，民盟中央在北京举办了“多学科学术讲座”，把盟内一些老同志一生中研究的精华留在人间。这对老知识分子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我们将来也准备为盟外的知识分子举办这类讲座，还想尽量放到边区去，这样做，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很有意义。我们不光为老先生们办讲座，第二步也要为中年知识分子提供讲台。我们要支持新一代，培养新一代。只要东西是好的，我们的党是一定会支持的。我们希望各地都这样做，不要只让几个老先生到全国去跑。各地有好的学者就给他机会讲，只要是好的，我们也聘他到北京去讲，让他有全国性的讲台，国际的讲台。这样，我们的人才就出来了。人才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总是支持出来的。

我们知识分子都懂得，凡是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有人识货心里就舒服，觉得遇到了知己。知己难得，真的碰到了，心里就会很高兴。不少人已花了许多时间和心血，积累了一些知识，需要人家理解，需要起作用，有益于人民，这是知识分子最重视的东西，比什么都可贵。所以，我想，知识分子都是乐于为智力支边尽一份力量的。

民盟作为一个智力集团，有责任智力支边；也是一个新的工作方向。智力支边为我们的工作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现在还只是开始。今后，我们有必要投入更大力量，在开发智力，包括智力支边上，真正发挥民盟作为一个智力集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1983年7月10日

谈谈民俗学

今天我想先讲讲民俗学是什么？英语中民俗学称 Folklore。这门学科的定义有二十几种不同的说法。我们不必费时间去讨论学科不同的定义，不妨从具体研究对象着手来说明它的内容。

民俗这两个字在中国什么时候开始结合在一起，我不知道。我只记得当学生的时候，钟敬文先生已写了许多文章讲民俗学。钟先生是我的老前辈。没有去查考有谁比钟先生更早用过这个名词。

英文里 Folklore 一词是 folk 和 lore 二字拼起来的。Folk 在普通的《英华字典》里是作“人民”讲，但是没把它的涵义说清楚。我所了解的它不是一般的“人民”，而是具有亲切乡土关系的人们。中文里，近于“老乡”、“乡下土里土气的人们”，作为一个形容词近于“民间”、“土风”的意思。Lore 字典上作“学问”讲，其实也不那么确切。我觉得这字近于《天方夜谭》中“谭”字，夏天乘凉时，孩子们喜听的“逸闻、传说”。所以如果直译 Folklore，用“民间传说”四字比较接近。如果咬文嚼字地推考，译成“民俗”似乎广了一些。因为俗不限于“说说话话”，而还包括行为、仪式等等在内。当然，我们不必跟西方传统走，我们不妨有一门研究“民间风俗之学”，而称之为民俗学。

西方研究 Folklore，其实是研究口传的故事和传奇。这种“民间传说”在人类没有文字之前就有，有了文字后还在民间产生和流传。

人类历史中，文字的产生是一大变化。没有文字，人和人之

间要通信息，只能口口相传。有了文字就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了。在没有文字以前，我们知道人家的意思必须通过直接的接触，所以受时空的限制。因此主要是在熟人间往来，这就是乡土社会的特点。人们的生活方式，声色气味，都只有浓厚的地方性，所以叫“土”。有了文字我们写个信件可以传到远处，克服了空间的限制。我们现在还是可以读 2000 多年前司马迁写的《史记》，可以朗诵 1200 多年前李白的诗，信息的传递超越了时间的限制。

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有文字的民族中也不是人人识字的。所以即使在今天的世界上，任何社会上都还有大量的口头传递的民间文学。在有文字的民族中，民间文学仍然保留着它的特点。这特点可以用中国的老话来表明，就是“下里巴人”有别于“阳春白雪”的地方，就是富于群众性和地方色彩的乡土情调。所以，以研究“民间文学”为主要对象的民俗学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前途。

上面说过的 Folklore 中 lore 在《英华字典》里作“学问”讲，其实是普通的传说，它并不是“民俗学”中的“学”。民俗学是一门学科，研究 Folklore 的学科，也就是研究“民俗”的学科。按西方的学术传统来说，是研究“不用文字来表达的口头文学”的学科。我们中国是否把民俗学限制在这个范围内，那是可以自己决定的。

如果把“民俗”理解为包括一个民族里流行于民间的全部风俗习惯，那么范围就宽广了。在没有文字的民族中，几乎包括了全部生活方式。如果民俗学以此为研究对象，也就等于是现在西方所谓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了。在有文字的社会里，它的范围就不易划定了，因为一般所说的风俗习惯，如婚姻仪式等，也有不少是用文字规定的，而且用文字传下来的。因之，如果以民间的风俗习惯来作为民俗的研究对象，就不能以是否用文

字作为界限来划分，民俗学和社会人类学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学科了。

其实研究民间口头文学的人，大多并不是先规定了学科的范围后再从事研究的。一般是倒过来的，一个学者对于民间口头文学发生兴趣进行了研究，别人称他作 Folklore 学者。他如果同时研究口头文学里所表达的风俗习惯，他也就同时被称为社会人类学者。人们并不是要做什么学的学者而去研究什么对象的，而往往是对某些事物发生了兴趣，进行了研究，才被人称为某一学科的学者。而且一个人也不限定是某一学科的学者，他可以同时是诗人又是生物学者，德国歌德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上面所说的话是想要讲明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首先要选择自己研究的对象，从实际出发，进行科学研究，不必过分重视自己研究的工作应当划入哪个学科的范围里去。如果以西方传统的学科分类来说，Folklore 的范围是以口头民间文学为界的。如果我们把它译作“民俗学”，而把民间的风俗习惯也包罗进去，当然也可以这样做，但这和西方所谓 Folklore 的范围是不相等的。我个人的看法，为了避免把民俗学和社会人类学发生难解难分的重叠，还不如划出口头民间文学为民俗学的对象比较好些。

我自己没有专门研究过民俗学，同时，我这个人很不喜欢同人争地盘。我喜欢实事求是研究客观存在的事物。研究出了结果，人家说我是什么学者，我都没有意见。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我要讲的第二点是怎样通过民俗学的研究去认识社会生活。这是我本人的兴趣所在。在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里，他们的语言艺术都是靠口头创造和传递的。即使在一个有文字的民族，口头文学不仅总是大量存在，并且不断创新，而且常常是书面文学的基础。像《水浒传》一样的文学巨著，也是先有口头创作，然后形成文字。形成文字之后，它还是不脱离口头传说，经过如“快书”、“说书”、“评弹”等民间艺人在口头上发展的。口头

的民间文学不仅是文学的源泉，而且是不会贫瘠的沃土。

我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做客，感到最不好意思的是自己不能像主人一样出口成诗。记得一次我刚进苗家的门口，主人就开始向我唱起歌来，喝茶、饮酒直到他们送我出门，节节有歌。他们所唱的并不是现存的歌词，而是即景生情，顺情得句，放声歌唱，自成韵律。不像我自己被人逼着要答酬时，先得找一些同韵的词，然后按韵脚凑词成句，作弄半晌才哼出个调子来。这不是艺术而是像握手一样的社交仪式。诗为心声，心里有感情要表达才能出口成诗。感情是在生活中发生的，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感受，所以唱的歌也不同。庆丰收和跳月找对象，婚事和丧事各自有不同的音调和歌词。这些民族的社会生活也因为有这样的传统，而显得节奏分明，内容优美，正像一个穿了盛装的少女更显得妩媚可爱。我们不仅可以欣赏这些民族的民间文学的艺术，而且从中还可以体会到他们在生活中浓厚的感情，因而对他们的风俗习惯能有比较深入的理解。

我们已经长期在城市里生活，我们习惯于用文字作为交际工具，作为信息交流的手段，但是我们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不在这个信息系统里的生活，而这又常常是最能动人灵魂的那一部分生活。每到感情深处，我们就会感到语言不够用了，意在言外。能用文字写出来的语言表达感情的作用上说，那就更次一层了。哪一对情侣能单靠通信建立得起爱情来的呢？我们对人和人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现在还很少能进入这一部分语言文字所不能表达的生活内容。我们研究少数民族的人却不能不接触这部分生活，因为许多少数民族还没有文字，即便有文字，使用的范围还比较狭小。他们的大量社会生活是在“文字之外”的，他们的历史也是在口头传唱的。如果说民间文学或是口头传说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那么它的园地实在是十分广阔的了。没有文字的民族的生活中存在着丰富的民间传说、歌谣、谜语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研

究没有文字的民族的历史和当前情况的宝贵资料。这些资料你们可以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对于像我这样对文学艺术修养不深的人也可以用来研究这些民族的社会和历史。

最近，民院有几位同志写了一本《瑶族风情歌》。他们把这本书的清样给我看，并且要我写篇序言。我看了以后觉得这本书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以前，也有人把瑶族唱的歌译成汉文，但大多是用汉族的诗歌形式翻译的。这当然是可以的。要让汉人看到这是诗歌，就得迁就汉人头脑里原有的诗歌形式。不这样做，汉人看起来就会觉得这不是诗歌了。可是这样做也有很严重的缺点。各民族有它自己表达感情的语言规律，汉族有古风、律诗之别，有七言、五言之分。音韵字数都有一定限制，称之为格律。瑶族虽则没有文字，他们口头的歌唱，同样有格律，他们的格律可能已受汉族的影响，但基本上还保持他们自己的特色。所以要把瑶族诗歌翻译成汉文，而还要保存原有的格律，那就不能拘泥于汉族旧诗的格律了。这本《瑶族风情歌》做到了这一点，比之过去瑶歌译本高出了一步。

我对这本《瑶族风情歌》特别感到兴趣的倒并不在诗歌的格律上，而是在这些诗歌都结合了瑶族的社会生活，从结婚、生孩子到死亡的各个重要人生关节。所以从这些诗歌里就可以看到他们一生的生活历程，和在这些重要的人生关节上所有的思想感情。这些正是我们研究瑶族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

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怎样去研究各民族的口头传说和诗歌呢？我想以我读这本《瑶族风情歌》作个例子来说一说。

首先要了解这些风情歌是在什么场合下唱？瑶族唱这些歌并不像我们北京电视台的音乐节目，歌唱家登台表演，让电视观众欣赏。看电视已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工作和劳动了一天，晚上听听歌曲是一种娱乐，消除疲劳，为下一天的劳动作准备。可是《瑶族风情歌》不是为娱乐而演唱的。他们是在进行

缔结婚姻契约，教育儿女婚后独立生活，以及亲人死亡进行丧葬等重要社会活动中不能缺少的节目。汉族和瑶族在这个方面就不一样。在今天的汉族中，歌唱是少数人，听唱是多数人，但在瑶族至今还是人人歌唱，人人听唱。在汉族里不会唱歌的人照样可以找得到对象，在瑶族里不上歌台的青年娶到老婆的机会不说没有也是不多的。瑶族里出名的歌手，他们的社会地位特别高，受到群众的爱戴。壮族里的刘三姐名垂后世。我在广西三江就听说有个侗族歌手，所到之处，姑娘们成群地追随他。只有在这种普及基础上拔出来的尖子，才是群众心中的人物，他唱的是群众心里的歌，心心相印，脉脉相通，这样的艺术不仅扎根在生活里，而且扎根在群众里。我认为这是最高级的艺术。

这本书里有一段叫《送女歌》和《迎孙歌》，对我很有启发。按布努瑶的风俗，女子结了婚并不立刻到男家去和丈夫同住，她还是住在自己父母的家里。男的依照一定的规矩在农忙时节住到女家去帮助劳动，过了农忙又回家去住。一直要到快生孩子前几个月，他们才一起到山洞里去共同生活，靠自己劳动过日子。孩子生下来后才回到丈夫家里。在离家去山洞过独立生活时，女家的父母要唱《送女歌》。夫妇和孩子到男家那天，进门时，男家的父母要唱《迎孙歌》。《瑶族风情歌》的作者说，这是母系社会的遗留，是血缘婚配的痕迹。他们从这些风俗中看出了现在已不存在的一套古代的社会制度，所以说这些是历史的痕迹。过去的社会制度消灭了，可是配合这个制度的风俗和歌唱却没有完全消灭，保留到了今天。在我们汉族的社会里，也有一些可以说是历史痕迹的风俗习惯。比如，我小时候，舅舅的权力很大，分家时舅舅要做主；家里出了事，舅舅就出来说话。他确有不同于其他亲属的社会地位、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有人就说这表示在我国历史早期曾有一段时间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中，家里执权的人不是父亲，而是母亲的兄弟。用现行的风俗习惯去推测

过去的社会制度，在一定条件下是一种符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但不能用过头，过了头也就成为荒谬。

我本人是不喜欢这种用“历史痕迹”来以今测古的研究方法的。我从这些风俗习惯里想看出的是它们对这些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这些活动究竟对这些人的社会生活起什么作用。我喜欢问几个“为什么”：为什么女子结婚后还要住在自己的父母家里？为什么要等到生了孩子才和丈夫一起住到山洞里去？为什么他们要在山洞里过一段靠自己劳动的独立生活？又为什么要把有了孩子的夫妇一起接回男家去住？今天我没有时间在这里把我对这些问题的初步设想详细讲给大家听。但是我想指出，如果头脑里有这些问题再去念这本书里的《送女歌》和《迎孙歌》就另有一些体会了。

我在给这本书写的序言里就说，我在《送女歌》中看到了做父母的人怎样期望成了家的子女能独立生活的深厚感情。而且这种感情不仅瑶族所独有，所有人类社会里做父母的人都存在这种感情，都要碰到这个第二代怎样要同第一代在生活上独立出来的问题。在不同社会里的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千变万化，但是所具的感情却有共同之处。我们读了瑶族的这个歌，不仅看到了瑶族父母的深情，也看到天下的父母心。这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各民族民间的诗歌的一个例子。

我并不主张所有研究“民俗”的人都要采取相同的观点和一致的方法。我也不认为哪一种方法高，哪一种方法低。每一个学者都可以按自己的训练和自己的爱好，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民俗”不论所包括的范围界限划在哪里，它总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它。从不同角度取得知识，只要确是反映客观的事实，而不是主观的臆度，对于我们了解各民族人民的实际生活都是有用的。

1983 年 8 月

抓紧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出版^{* 1}

同志们在编写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过去李维汉同志讲过，我们 50 年代、60 年代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所得到的这批材料很重要，要抢救这批材料。现在看，越来越感到这批材料重要。回想起来，我们同志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批材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仅我们中国人需要知道，外国人也需要知道。我们同志们经过调查得到了这批材料，是对国家做出了贡献。让我们后代也能利用。对这批材料，我们先把它整理出来再说，要快一点。我们是刚刚起步，水平不高，这也不要紧，不怕起步低，就怕进步慢。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就可以往下走了。我们得赶紧把这五套丛书写好。首先是一本概括的总论《中国少数民族》，现在已经出版了，我认为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都概括到里面去了。书里边可能有很多缺点，不少不正确的地方也不要紧，将来让人家去批评、修改嘛！这是个不容易的事情，在国内国外起了很大的影响。我到日本去，他们提出要翻译，马寅同志同他们谈了。他们还同我商量，愿意把五套丛书全部包下来翻译。我想到我们的水平还不那么高，感到还需要再研究一下。先把这一本翻出来再说，这本书不过代表我们现在已有的水平，今后还得提高。可是至少从这本书里，对我国的少数民族可以看到一个全面的轮廓。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一些各少数民族的情况，比 30 年前一笔糊涂账好多了。

第二是语言方面。我们在这方面的基础比较好，抓民族语言

* 本文是作者在国家民委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是有成绩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从无到有，是不容易的。过去，周总理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要民族学院在短期内开办少数民族语文系。50年代初期，民族学院所开的少数民族语文课有十几种。30年来，已经培养了不少人才。所以有条件把各民族语言简志比较快的编写出来。

第三是民族史。解放初期，民族学院要开民族史的课，没有人讲，我去讲了一年，那时水平是很低的。现在比当时提高了，已经可以为各民族写专史。知识必须要积累、要传播、要交流，不能停顿。先把已有的知识整理出来，把这一笔账弄清楚。关于各民族的历史到现在为止，已完成了原定计划的一半了，再加把劲就差不多了。当然问题还不少。但只要我们准备采取修改的态度，经过大家商量，如果还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写上。我们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时所用的资料，还是以汉文为主，加一点传说。考古方面发掘的出土文物资料利用得还不多。许多少数民族文字资料还没有整理，许多文物还放在仓库里，可能要坏了，这些事情我们必须想办法。不然，很多人花的心血、花的功夫，国家花的钱，会白白浪费的。研究少数民族历史，不能只靠汉文资料，民族文字的资料十分重要，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

关于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我还有一个意见，想提出来请大家讨论。过去我们搞民族史大多是一个一个民族地整理，我看不如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搞。因为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一向不是孤立的。如果把一个一个民族的历史分开来讲，就不免要重复。事实上要写50多本民族专史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好多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是密切结合的，互相离不开的。现在我们讲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从前各民族就大家离不开。当然相互离不开不是说没有矛盾。有矛盾这个不成问题，甚至还打过仗，可是大家却离不开。所以一个一个民族来写很难写。如果要分几部分来写，还是以地区为单位比较好。

所以我一听六江流域调查的建议，就表示支持。这是一个新的方向。在研究一个个民族历史的基础上，我们要完成几个大区的民族史。民族地区是历史上形成的，不是我们自己划的。我国境内几个地区可以分得出来，大体上有西藏、西北、东北同西南等地区。云贵高原就是一片，各民族交叉杂处，你没有办法分。你硬要分，就越分越乱。我们不妨从六江流域作为一个地区开始作综合研究。南岭走廊也是一个地区。按地区去研究民族历史的方法，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很多人在工作里面感到困难，才找到这条路子的。西北是一条走廊，其中有许多民族，有些民族有两种语言。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民族来来去去，分分合合，在一定条件之下，不同来源的人融合成一个民族，但还各自保留着原有的语言。我们不要把民族看死了，在中国这样长的历史里，民族变化多端，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且有些合而未化，还保留了很多原来的东西。相见时说一种话，回到家里又讲另一套话，一个人可以说几种语言。以西方的现代民族的特征，来套中国民族，就要出毛病。我记得我们一开始做民族工作的时候，周总理同李维汉同志都叮嘱我们，不要硬套苏联的模式。他们搞联邦，我们搞区域自治。我们不能搞联邦制，不能套苏联模式。这不是说他们不对，他们是对的，那是由于他们的情况和我们不同。他们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我们早，所以我们机械地向人家抄袭的话，困难得很，不好办。

民族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要根据各国情况来说。在中国，我们对发展水平不同的少数民族都称作民族，不去分民族、部族、部落，那样分可不得了！这个很清楚，如果我们说这个部落，那个是民族，有什么反映啊！所以我们要站得高一点，要看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变化，要看这许多民族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变化。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这个整体又是许多相互不能分离的民族组成。组成部分之间关系密切，有分有合，有

分而未断，合而未化，情况复杂。这个变化过程正是我们要研究的民族历史。我们第一步是把每个民族搞清楚，然后再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把这地区各民族的关系搞清楚，最后要把整个中华民族形成过程搞清楚。目前有些民族讲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是不承认是同一的民族。如把他们说成是同一个民族，他们不同意。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有感情，这不完全是由于各民族有自己的特点，而是某种历史条件形成而遗留下来的。我们要把历史搞清楚，为什么有这种心理状态，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客观存在。把历史原因搞清楚了，这种心理状态也就会改变了。这样的研究，对我们民族团结会发生重要的作用。许多民族没有文字，人们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历史，只有一些传说，而传说又常是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形成和传播的。我们的少数民族有许多是由于过去民族压迫所打乱打散的，长期分开后成了不同的集体。如果能重新团结起来，不是对今后的发展更有利么？

五种丛书里还有一种是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听说有人觉得《概况》不好写，所以比其他几种进度较慢。在我看来，这一种比起其他几种更重要，因为这是直接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服务的。要写好《概况》，我认为主要是要抓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也就是经济和文化。可以先从经济入手。我们要开发民族地区，要让少数民族富起来，首先要摸清楚他们的资源。少数民族地区到处都是宝，少数民族人民有许多经验。我们应帮助他们把经验科学地总结出来，为他们创造发展的条件。让我举个例子，我这几年去广西大瑶山访问过好几次，1982年我去庆祝金秀瑶族自治县成立20周年纪念，纪念会上他们大放爆竹，使我惊异。一问才知道他们这几年收入大增，有了钱，过节时就买爆竹放，甚至通宵不停。钱哪里来的呢？他们说现在八角、灵香草很值钱。这些都是瑶山原来就有的土特产，这几年引进了科学培植的方法，大丰收，所以有些村发了财。从这件事上

我就想到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是十分丰富的。只要和科学知识结合起来，经济就可以大发展。可是现在很多宝大家不知道，需要我们调查，写《概况》不就是很好的开始么？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需要科学知识。许多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文化不发达。所以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发展经济，要有文化，要请老师，这就需要比较先进的民族去支援。写《概况》，我看更不能一个一个民族分开来说，必须从地区入手，而且要着重当地的民族关系。过去有人把民族工作看作是少数民族的工作，这个我看是不对的。民族矛盾的主导方面是汉族，汉族人多。汉族如果不讲民族政策，不理解民族问题，要搞好民族关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就不太可能。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不要把一个民族孤立起来看待，而要把民族关系，特别是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列到我们研究的范围里去。这个话，我已说了两年，这是我的想法，不一定对，希望大家多想一想。

开发民族地区的资源，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光靠少数民族自己来搞，在时间上太慢，所以必须各族共同合作。可是这里碰到很多难题，民族关系是其中之一。做得不好，会出很多矛盾；做得好，会大大促进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在这方面，我们既有好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目前来说，许多少数民族由于受到过去盲目移民带来的损失，对外面进去的汉人不大欢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凡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人，是一定会受欢迎的。1983年，我到黑龙江去研究人口流动问题。东北是个好地方，现在是1亿人，其中是三三开，解放时是3000万，自然增加3000多万，30年中移入3000多万。移入的多是强劳动力，对开发东北出了很大的力量。但是失败的教训也不少。有一些被称为“盲流”的，到处乱窜，扰乱治安。可是很多地方，特别是森林地区，这种人已成为一批不可缺少的劳动力，如果能安置得妥当，也可以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们要开发少数民族地

区，必须研究这一类的问题，就是怎样取得先进民族的智力、劳力、财力的支援，要使少数民族发展成现代民族。少数民族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在智力资源上相对地说是比较薄弱的。我们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自己的智力资源。通过实践，采用多种方法，使得汉族已有的知识，比较高的技术，能引进到少数民族中去。要做到这些，就要调查。我们的调查，不能离开两条红线：一条是民族团结，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第二条是要发展、要现代化。少数民族怎么现代化？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要引进最新的技术知识来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可我们的基础较差，因此任务更大。我们必须团结进步，必须有知识的基础。认清这个目标，那就大有可为了。

1984 年 3 月

开发边区及智力资源的使用和培养^{* 1}

我这次到内蒙古来，是想为开展一项社会学研究进行探索。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要开发边区。这是我们国家的，也是我们人民的共同愿望，也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必须全面开发我们的国土，边区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重要部分。今天我只想和许多老朋友谈谈心，讲错了，请大家纠正。

我这次来之前，全国政协开了一个常委会。这次常委会除了几项必须表决的决议外，还有了一个项目印象很深，那就是请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同志，讲了讲当前全世界出现的技术革命高潮。紫阳同志特别提醒我们，要正视这个新的局面，要积极地迎接挑战。“挑战”二字是他说的，我们还看了一个美国电影的录像。电影是按照一个美国作家写的书《第三次浪潮》改编的。这本书里确有很多是资本主义的观点。可是不管怎样，我们要正视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个新的事实，就是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人类知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技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人类利用自然的手段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对我们前途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实。我刚才说到的那个电影，它把这个事实简要地反映了出来。我们可以不去计较它的各种观点，它所反映的事实是存在的。

最近这段时期里出现了哪些新的科学技术呢？老实说，我自己也不懂。这些的确是我过去在大学里没有学过的东西。我是1933年大学毕业，后来我到外国去念书，但是当时没有听说过

* 本文系作者在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在第二次大战之后，特别是在 60 年代，就是我们这儿大闹天宫的时候，西方国家发生了一个技术革命，突破原有的知识限度，甚至直到今天，还是方兴未艾。这样在科学技术上就把我们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大了。50 年代，我们的科技和经济在世界上还不算太落后。在革命刚成功的时候，跟日本差不多，一般的工业力量相差不远。可是经过 60 年代和 70 年代这段时期，人家跑到前面去了，我们却后退了不少。现在我们就碰到了许多困难，“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在大学里边还很大。

先讲一讲这次技术革命究竟是些什么内容。当然这不是很短时间能讲清楚的，我们不完全懂。我只能把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和现在书本里讲的东西比较一下，哪些是我过去没有学到的东西。让我来举些例子讲讲。他们所说的“第三次浪潮”或叫“第四次产业革命”这些提法都有问题，已经有人写文章讲到，我不重复了，我们不用这些词。我们最简单地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这块大陆上出现了。很长时间只会用石头做工具，生产力很低，而就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我们看到在发展过程中用来生产的能源和用来创造工具的材料都起着一系列的变化。以能源来说，开始时只会用自己的体力，后来会用畜力，用马拉车、用牛犁田等等。到了 18 世纪西方懂得了用蒸汽机来推动机械，人们有了火车和轮船，这是一个大变化，突破了长期以来人和牲畜用肌肉来操作的技术，可以说是一次革命。清朝末年西洋人的轮船开到我们的长江里来了。我听说过一个故事，据说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和几个人在南京采石矶喝酒赏风景，迎面看见长江里有一艘外国的火轮船正在逆流而上，张之洞当场就晕倒了，他说这个东西来了可不得了，我们的门户被打开了。看来这个人倒很有远见。他看到了技术落后的危险。人家说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我们的祖先有许多重大的发明。以运输工具来说，

诸葛孔明发明了木牛流马，有人说就是独轮车。四川这个地方要和外界交通是不容易的，他要六出祁山去进攻中原，必须解决山区的运粮问题。他发明了这个工具，可以在狭小的栈道上运输军需了。这种独轮车在我小时候还是很普遍，农村里一家老小都可以坐在这个独轮车上。更早一些蒙古人的祖先发明了骑马奔走，后来他们用马这个工具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可是不论独轮车用了机械原理，骑术用了畜力，在能源上都赶不上蒸汽的膨胀力，西洋人发明了用水蒸气推动机械，在能源上起了一次革命。现在用蒸汽做动力已经是旧皇历了。有些外国人说到中国去旅游，一定要坐一次火车。一路冒烟的火车在他们那里只能在博物馆才看得到了。那是因为他们发明了内燃机，用汽油的膨胀力来推动机械了。有了内燃机才有汽车和飞机。我们用内燃机推动火车还没有多少年，现在用蒸汽的火车头还是不少。我记得小时候所见到的火车都是“嘣、嘣、嘣”冒烟的嘛。很长的时间，在中国现代化是用烟囱林立来代表的，而现在把烟囱里冒的烟称作污染了。用蒸汽发动机械，一个个轮子都得有皮带连上，所以一个工厂的机器都得挤在一起，蒸汽发动机才能把它推动。后来利用了新的能源——电力，机器就不必挤在一起，用根电线就可以通了。利用了内燃机、喷气机、石油提供的动力，我们可以有汽车和飞机了。

目前石油还是重要的能源，是工业的血液，也是战争的命根子。第二次大战主要是靠汽油作战的。日本本土找不到汽油，他们不能不提心吊胆，一旦石油供给断了怎么办？有一个人写了一本小说叫《油断》，描写假如石油供给断了，日本将出现一个什么局面？真是不堪设想，可怕极了。以上讲的都是所谓“第三次浪潮”之前的情形。现在只说能源这一项又出现了新的突破，那就是原子能应用来作为一种生产力了，至于这种新能源会带来多大的变化，现在谁也说不清。现在主要还是用在武器上，成为

两霸斗争的主要武器，这种新能源所发生的作用已经非同小可了。

再说一点关于材料的变化。蒙古包用的材料是羊毛、木头。蒙古民族很早发展了牧业。他们饲养牛羊马驼，生活资料主要就靠这些牲畜。羊的肉可以吃，毛可以打成毡，盖成蒙古包。木材也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北京漂亮的王宫就是用木材和砖石筑成，叫砖木结构，根本不用铁器。钢铁五金作为工具和建筑的材料是一大发明。第二次大战以后，出现了从前没有听见过的塑料等等化学合成的材料。我们现在也穿化纤织物，种庄稼都用薄膜来盖土，这些是 10 年前想不到的事。我一次到日本去，有个同学的妈妈住不惯用钢铁水泥建筑的高层公寓，女儿要孝顺老母亲，特地用木料改造了一间卧室，代价很大。她说日本旧式的房屋已经在淘汰中了，因为钢铁水泥比木结构便宜得多。这是现在材料革命的实例。

过去我们总是说人是土地的儿子。这是说我们的生活资料主要取自土地。人也总是生息在大陆上，海洋除了航行之外，没有太大的用处。现在人们却不甘心困住在陆地上了。海水、海底都成了物资的来源。在地球上，海洋的面积大于陆地，海洋里的宝贝为什么不去利用呢？现在的人们正在大打海洋的主意，我们也在沿海开掘石油。海洋的利用近 30 年里有了大发展，英国的财政就是靠北海油田救活的。

这样看来，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已经不是我们父亲的世界，更不是我们祖母的世界了。对原子的知识我大学里没有学到多少，只知道物质是原子构成，一个原子核周围有几个电子在转动等等。这些还是书本知识。现在原子的知识已经能为我们服务了。这里的录音机不就是利用电子把我的声音录下了吗？

我到美国去，我的老伴身体不好，我怕她担心，每到一地，就打个电话给她。在美国打个电话回家，容易极了，比在北京打

电话还要容易。北京打电话可以半天接不通，而在美国往北京打电话，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叫通。美国往英国打电话不用叫，直接拨，信息灵通极了。这又是一个极重要的新发明。信息这样灵通使人和人行为上的配合变得又迅速又灵活了。这又会改变人们整个社会活动的方式和内容。有人说今后将是个信息社会。

信息是个新词，我自己这两年来才开始使用，而这个概念我还不能说已经搞清楚。那么信息是什么意思呢？我怕说不明白，所以不妨举个例子。去年我到江苏沙洲县去，有一个工厂做贝贝小皮球，贝贝是英文 baby 的译音，意即孩子。这个工厂一年生产几百万个贝贝球，一个有名的乡镇企业。他们讲起这厂子的历史说，前年这个厂的厂长听人传说有人问小平同志我国的足球为什么老是赶不上外国，小平同志说这是因为我们从小不训练。这个厂长一听，行，信息来啦，这个厂可以翻番了。立刻设法生产小足球。他想全国有多少要求训练的孩子？他们需要小足球。这个厂不是可以大发展了吗？他做了 1000 个贝贝球送到北京给荣高棠，要他转送给北京市，让小学生去练足球。这样生意就做开了。现在据说一年要生产几百万个。他们也送了我两个。小平同志这句话大家都听到的，但是很少人接受这个信息，没有把它联系到自己的工作上去。对不对？信息不是新闻，更不是闲话。它是一个行动信号，它会引起接受信号的人一连串活动。信息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东西。同一句话，有人听了成为信息，有人听了就没有成为信息。成不成为信息是在于两人的主观条件不同，有点像一个人有收音机，一个人没有，前者可以听得到广播，后者听不到。贝贝球厂的厂长的头脑是接受信息的机器，别人没有这种头脑就不会去做贝贝球，生产翻不了番。

现在江南农村里的人也在讲要信息了。他们要打听城里的菜价钱多少。知道了价钱，就可以决定种什么菜运到城里去出卖。上海人要吃鸡，市场供应不足价钱高，苏北的农民得到了这信息

就养鸡。鸡农养了很多鸡，我们的商业渠道不够用，于是出现了“百万雄鸡下江南”的动人场面。农民骑了自行车自己运，一辆装上一百来斤活鸡，车后车旁都是鸡笼，从苏北渡长江，到上海，大约一星期一个来回。路上一个子儿都不花，自带干粮和鸡食，跑一趟可以挣几十元，我在沙洲公路上就看到这样的自行车一辆接一辆地在我们的车旁驶过，其中有不少是苏北的姑娘。他们是接受市场信息的人。在收到了上海人要买鸡的信息，想出各种办法，把百万雄鸡运过大江。这是新事物，意义很丰富，我不多说了。我只用此来说明什么是“信息”和什么是信息社会。

举一个例子说明现代世界离不开信息，我们坐飞机，很舒服，却不大知道一架飞机能安全起落必须及时接受正确的信息，差一点就会出事。它每一刻都要掌握多方面的情况，需要接受多方面的信息。靠一个人动脑筋是不行的。它需要一个复杂的后勤组织，用综合多方面的情报给飞行员必要的信息，这种活动不在电子时代是做不到的。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使这种迅速复杂的信息系统成为可能。

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念书时，搞体质人类学，想把中国人从体质上分为几类，写一篇论文。一共测量了几百个人，三十多个项目，要算出各项的相关系数和综合差距，一个星期算出一个数据已经算得很快的了。现在用计算机几秒钟就可以算出来了，所以可以处理数目很大的资料。这是为什么前年人口普查，10亿人口的统计能比较快地算出，得出比较正确的结果来，赢得了全世界的好评。说我们组织力量强，能进行10亿人口的普查。这是靠计算机，没有计算机，这堆材料不知什么时候算得清。用了计算机，那就快了。

以前的学者主要的本领是博闻强记。知道得多，记得住。我们那时，学历史学的同志都知道，陈寅恪先生是了不起的学者。他老来眼睛瞎了，但是凭记忆照样能工作，他可以闭上眼睛说哪

一条资料在哪本书、哪一卷、哪一页上，很少差错。大家都佩服他这个本领。现在这就不稀奇了，因为有了计算机把我们所知道资料都可以贮存起来，你要用时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显示在眼前。你可以出个问题，比如说你要知道内蒙古有多大的面积，它马上可以把数目显示出来。凡是储存在计算机里的，就不会忘记。在博闻强记这一项本领上，计算机可比老先生更强了。

最近天津市做了一件事情，值得介绍一下。天津市委去年年底想了解究竟天津市民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问题？这个很重要，作为一个市的书记就要知道所在地方的居民究竟有什么要求，最迫切的是什么。怎样得到这问题的答案呢？凭主观猜想，不是好办法，开个座谈会，这个人这样说，那个人那样说，多数人怎么说你不知道。天津想了个办法。根据市民的结构，选出了1000户，发给他们印好的问卷，问卷上开列了初步搜集来的市民要求解决的问题，要每户对这些要求的迫切性列出了先后的次序。然后通过计算机，把这1000户的答案统计出来。其中有一项多数人感到困难而要求解决的是买菜。因为自己上班时卖菜的也上班，自己下班时卖菜的也下班，买卖碰不上头。市政府了解了这个情况就好办了。把商店开门的时间和一般工人上班时间错开一下不就解决了吗？这问题一解决，市民很高兴，说我们的话起作用了。你看这一下政治效益多大呀！我们天天说人民城市人民管，怎么体现这一点？这个问卷出了力。可是你动作要快，很短时间里要把1000户人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得出答案。这里电子计算机的用处就显示出来了，有了它信息就灵通了。

说一件事，尼克松访华谈判时，我听说我方提出了一个问题他答不出。他说给我一点儿时间答复。他的秘书出去了20分钟就把所需的资料全部放在尼克松的面前。他的秘书打了电话回国，接通电子计算机，全部资料马上传到他手上。我到美国去访问时发现我所到的地方都知道我是什么人，连我写过的检讨都知

道。这些资料已经都储存在计算机里边，我已经忘记的东西，他们还替我记着。这就是说他们有了计算机掌握的信息多、快。传递信息一定要快，才起作用。如果天津的问卷过半年再算出结果来，还有什么用呢？

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是技术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它使人们的信息来源起了质变。在美国这几年微型电子计算机已普及，有些家庭的电话装上留话的配件，人不在家，别处打来的电话可以留下等主人回来收听，这当然方便多了。一个做研究工作的朋友跟我说，他有个助手住在我楼下，有事要接头，下楼去不如打电话快，而实际用的线路却可以转半个美国。因为有这样一个迅速正确的信息系统，很多飞机场可以每分钟降落几架飞机，不会互碰。我去飞机场订座，向服务员说要和先已订座的朋友坐在一起，她向计算机一问连一分钟都不到，就把两张连坐票给我们。这个不容易，飞机上有很多人，哪个位子上已有了人，哪里还有两个相连的座位，一下不容易知道的，有了计算机这就很简单了。

许多过去做不到的事，或是要费很长时间、很复杂的手续才能做到的事，现在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是技术革命的结果。我们现在就生存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边。可是我们自己的信息却一点不灵通，甚至还觉得不要紧。当然说实话我自己也觉得在草原上坐着马车悠悠地跑很舒服；坐飞机快是快了，但来去匆匆，生活搞得太紧张。最好是坐在我们家乡的小船上，在太湖上漂漂荡荡，可是由不得你享清福了。世界变了，我们这个慢吞吞的世界关不住门的了，不紧张起来要吃大亏了。

情况确实很严重，因为我们国内绝大多数人还不能接收到技术革命的信息。这几年我在农村里调查，乡下的农民到城里去走动的还不多，妇女们简直经常不离村的，一年到镇上去一两趟，已经算是大事。外面世界变得这样快，我们的世界还很古老，这

就叫差距。我们提出的现代化就是要缩短这个差距。可是他们并不是停着等我们，我们前进，他们也在前进，所以要缩短差距，我们必须走得更快，还得找捷径走。捷径也不容易找，基础不行，飞跃不起来。这个矛盾必须解决。这个课题必须研究。困难不少，所以称之为“迎接挑战”。

去年我在智力支边的会议上提出要看到我们面临两个差距，一个是我国同先进国家的差距，一个是国内的差距。前面讲的是第一个差距，现在讲一讲第二个差距，也就是民族间的差距。我解放后就搞民族工作了，跑西南多，西北不多，到现在甘肃还没有去过。由于我和少数民族的同胞常有接触，我脑子里常常想到少数民族，杨静仁同志说：你这个人比少数民族还要少数民族。我对少数民族有感情，因此对少数民族问题特别敏感。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看一看我们的地图，一半土地是少数民族地区，占人口 94% 的汉族都集中居住在东南半壁。这种分布有它的历史原因。过去农业时代以农立国，农业的生产率最高。汉族在农业上最有一手，我叫它是神农氏的子孙，种庄稼的能手，也可以说是专家。他们懂得怎样种地长粮食。我在清华念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在西伯利亚搞过许多调查。他对我说，你们汉人真厉害，到了西伯利亚还去开荒种地，搞粮食。这句话启发了我，我回头一看，我们汉族确是以种粮食为主要生产活动的。种粮食搞饭吃是最重要的事，见面就得问吃饭了没有。我们在江苏调查过一个村子问起他们过去的生活情况，我发现他们总是用吃饭来衡量日子好过不好过的。说到困难时期，他们记住的是天天连稀饭都吃不到。1962 年经济恢复了，他们说日子好了，一天可以吃三顿干饭了，一天要吃一斤半。这么大的饭量所消耗的粮食之多在世界上可能是数一数二的。这次我到印度去听他们说印度现在粮食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吃的粮食比我们差得多。查一查他们粮食产量只有 1 亿 3000 多万吨。以 7 亿人口计算，每人只

有370斤，能用来吃的一天不过半斤多。日本人在第二次大战后每人每年吃的粮食从几百斤降到几十斤，美国也是这样。我们吃的粮食多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主食，其他食品是副食，副食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也确实吃得很少。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到湖北沙洋，在村子里和农民实行三同，每天吃两顿比较厚的稀饭，其他什么东西也没有。我很奇怪，问真的没有吗？他们说确实没有，可见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很少吃副食品。以粮为纲，是我们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汉人（蒙古族不包括在里面）脑子里尽是以粮为纲。把这个经验作为政策，得到了什么样的后果，这里不用我多说了。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思想在人们脑子里还是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以粮为纲都是我们长期形成的，至于如何形成的，我今天不多说了，这种思想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现在还在起作用。比如我们现在的流通领域为什么老是疏通不畅，我认为一般存在的重农轻商的思想是个重要的原因。记得我小的时候对做生意的人是很瞧不起的，农民还不错，最好的还是念书人。士、农、工、商，商人当时是老四，被认为不是好东西，说他们浑身散发着铜臭。要转变这个认识真不容易，也就是说疏通渠道这一关不是那么容易过的，这里有一个成见，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表现在经济基础方面的成见，叫做轻商。在汉代有过一次大辩论，重农主义还是胜利了。太史公在《史记》里写了一篇《货殖列传》，有人还说他不正派。所以说有些事不是那么简单的，实际上我们是在同几千年的传统习惯在进行斗争，而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年重农轻商，以粮为纲，结果吃了不少苦头，而且这个苦头是在现代化社会里出现的。

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汉族而说的，凡是能种五谷的地方，基本上都已成为汉族地区。汉族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而成的。简单地说，只要一种地几乎都变成是汉族，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汉族

是一个大杂种，这是毛主席说的。这是说我们汉族里边吸收了多少少数民族的成分，这些少数民族之所以变成汉人，根本的变化就是种地。这个话我讲得大胆一点，但是有些道理在里边。我们内蒙古也吃过这个亏，汉人来了把很多草地搞坏了，因为他们只懂得在这里开荒种地。他们的本领可真大，几千年来，中国人能用这块土地养活这么多人，特别到现在的粮食还可以增产，在外国人看来真是奇迹。

记得我在美国碰到一个朋友，他同我年纪差不多，也是一个教授，他夫人送我一本书，说是他的丈人写的。这本书是1911年出版的。书名叫《五十个世纪的农民》，就是5000年的农民。他这本书的一开头说，如果像美国人这种办法来对待土地，不用两代人土地就完蛋了。因为他们不懂得土地是个活东西，只把它看成一个空间用完一块放弃一块，结果是不施肥出不了庄稼。他说如果你到中国看看，直到那时（即1911年时）已经5000年了，那些土地还在养活这么多的中国人，那是因为中国人和土地维持着正常的生态关系。这是真话。我的老家江苏吴江县在农业生产上总是打头的，现在亩产量达到2000多斤，而且这片土地已经生产了不知多少年了。中国农业技术之高是了不起的。有一次法国总统来访说，如果让我做中国总统我做不了，因为我没有本领让10亿中国人吃饱。可是这个总统我们共产党当下来了。我们搞粮食真不错，这一点我们不能批评。

一切事物总是有正反两面，好事的背后存在着坏事。汉族大搞粮食的结果出现了我刚才说的人口分布不平衡的局面。这种分布是过去农业时代的历史产物。以农立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工业时代。在工业时代，这个人口分布的局面是很不利的。以前汉人看不起的地方，不要的地方现在成了宝地，因为它正是工业原料的丰富产地。这个宝地就是少数民族地区。昨天我听内蒙古几位同志汇报，他们讲得很好，我一听就

觉得这里非常富。在我们江苏作为工业能源的燃料很缺，买1吨煤要用80元，还得求天叩地。你们这里20元1吨。昨天一位计委的同志讲，内蒙古煤的储藏量可以比得过山西，这很了不起。山西的煤是早已闻名天下的。记得我小的时候，人们就传说山西的煤可以供应世界用多少多少年。你们内蒙古有这么多的宝贝在地下，我称它为地下优势。当然这个优势不光是煤，还有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等。人们都奇怪，为什么这些东西都贮藏在这些地区。这些东西本来很稀有，可是这里并不稀有。地下的宝贝不仅是内蒙古有，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少，只是还没有被发现。像石油埋在地下多少年了，过去我们不知道。后来李四光先生经过科学研究，肯定说有，果然越打越多。这些都是我们记忆犹新的事情。在我们小的时候，人们一直说我们中国没有石油，那时用的是美孚灯，烧的是洋油。现在我们多了，这些石油不是现在产生的，早已有了的，只是没有被发现，也就不能为我们所用。为什么那时没有被发现？那时因为我们缺乏知识。以内蒙古来说，你们的祖先在这里放牧，有几百年几千年了，可是谁也不知道下面有煤，他们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客观存在的东西，要通过我们主观的认识，才能为我们所用。没有知识，存在的东西对我们等于不存在，有等于无。刚才我讲了许多有关技术革命的内容，听来有点儿像山海经或是海外奇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这些知识，听起来就莫名其妙了。我所说我们面临着两个差距，差距的实质就是知识。别人知道而我们不知道，别人能得到的信息，我们收不到。两个差距都在这儿。我这个说法对不对，可以讨论。

我说内蒙古这么富，这话也对也不对。在我们现有的知识看来，它是可以很富，但还得加上很多东西才能富起来，才能实现这个可能性。以前我们不知道，认为这里是个穷地方，荒山、沙漠，风吹草低见牛羊，天是苍苍，地是茫茫，有什么好呢？现在

知道不完全是这样，地底下有宝贝，这片草地加以经营，可以用出产的肉类、乳品改变中国人的食物结构。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我们还不太清楚。以我自己来说，这方面的知识太少。我前年到新疆去，第一次才知道什么是戈壁，而且知道戈壁下边有水可以利用。我讲了这一大篇话，归结到一句话，中国不是穷，而是现有智力资源不够用，或相对地贫乏。我们要开发自然资源，必须通过开发智力资源来实现。

我还得先讲一讲智力资源的特点。这很关键，很重要，它跟自然存在的物质资源不一样。物质资源存在于自然界，人们不知道它的存在时，它埋藏到地下，受自然规律支配发生变化，但总是存在的。智力资源贮藏在人们的脑袋里。人总是要死的，所以，一个人死了，这个人所贮存的智力资源也就没有了。要保存智力资源一定要从这个脑袋传到另一个脑袋；一个脑袋不中用了另一个脑袋还活着，智力资源还存在。智力资源不传不行，一代传一代。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还有一点不同。物质资源使用过后就消耗了。比如喝茶，我喝一口，杯子里就少了一口，我把杯子里的茶给你喝了，我就没有喝的了。可是我们脑子里的知识讲了出来，我们并不会丧失这些知识，反而因为交流而变得更丰富了，越传越多。知识必须流通，如果停止了流通，停留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它就会销蚀，甚至丧失，所以说知识是越用越多。如果把一个人孤立起来，像我自己被打成右派，不准我当教师，不准我看书，我的知识就忘了，也就是说以前知道的东西，经过几年不去用它，变得不知道了。所以智力资源这个东西不能保守的。有人劝我，你休息休息吧，70多岁了。我说我不能停，假如我一停，脑筋就僵化了。我常同我的学生们讲，今天我讲的如果和去年讲的一样，那就是说我的脑筋僵化了。我原来从英国学来一套，就是教授不允许照本宣读地讲第二遍。如果你今年讲这一套，明年还是讲这一套，人家就会瞧不起你。这叫知识更新。

知识不能停，脑筋不能不用，越用越灵。人的身体也是这样，我现在胖得不行是因为动得太少，越不动越胖，越胖越不想动，最后胖死。这就是恶性循环。脑筋也一样，我发现有很多朋友，一退休，脑筋一松劲，就有的呆了，变了一个人。可见智力资源有它自身的规律，但规律究竟怎样，现在我还不能把它有条理地讲出来，只说它跟物质资源不同。

从上边所讲的看来，知识是社会性的，每个人都是从社会生活中学来的，而且是一代传一代，越积越多。现在我们所有的知识很多是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创造的，仔细想想很有意思。像我面前这个茶杯制造它的技术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不知经过多少年人们智慧的积累，并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很早很早以前的样子，一直可以联系到石器时代。制造这个茶杯的知识是很多代人传下来的，而且代代有所更新，有所创造。这个经过这样多的人，这样长的时期，积成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呢？我叫它智力资源。

智力资源这个概念对我来说还是近几年里得到的认识。以前我对知识分子问题讲得很多，我眼睛里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人——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受冤了，那个知识分子有力无处用，我帮他们说话，这可以说是出于一种正义感。从两年前开始，我的认识有了转变，感到比一个一个知识分子遭遇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的知识水平，是全国人民知识库在容量和质量上比不过先进国家。我们现在比先进国家差的，不是哪一个人不如他们，而是我国所有的知识总量和水平落后了。这样我就发现智力资源这个概念。从智力资源着眼，我们就容易明白十年动乱的损失，最严重的不是在有些人受了冤枉，甚至丧失了生命，而是我们国家的智力资源受到摧残。这是具有长期后果的损失。现在越来越明显，我们的中小学生由于缺乏足够的合格师资，很多孩子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学业水平下降的趋势看来还待扭转。如果我们下一代的教育不够好，知识基础打不结实，高等教育也就搞不好。我们

怎样在科学技术上赶上正在飞跃中的世界水平呢？中小学师资的合格率不高是十年动乱的后果。现在的中小学教师，二十几岁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批小学生。他们哪有机会学习，现在当了老师，我们把孩子交给他们去教育了。我有几个外孙，我没有功夫去教他们，可是看他们那样的学习方法很成问题，算术要背，要硬记。考试的答案也要按书本上的默记下来，错一字要扣几分。念英文念出来的东西我不懂，我说应该这么念，他说你念出来的不对，我们老师不是这样教我们的。我只能说，你就照老师教的念吧，不然就会考不及格，毕不了业，怎么办？不是这些年轻老师不愿意教好书，他们当时学到的就是这些。他们又在把我们的孩子教成他们的样子。小学搞不好，就会影响到中学和大学，现在这股暗潮已经到了大学。我的女儿就在大学里教书，她向我反映，学生越教越难教了。77届的学生能主动学习，老师讲愿意听，可是这几年招来的学生，老师讲课学生有些就不那样了。一进大学，就认为解决问题了，反正得给他毕业，给分配工作，当然这不是多数，但还是有一定数量。进一步分析，这不完全是他们不好，主要是因为底子差，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吃大锅饭的制度，他们就不求上进了。这些都是十年动乱的受害者，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的智力资源受到的损失是长期的、严重的。

我们应当怎样去恢复我们的智力资源呢？除了党和政府大力整顿教育以外，我们得大家拿出力量来进行抢救。这几年我们动员民主党派力量，首先要帮助中小学教员学会教书，我们请了一批年纪大的，懂得教书的同志下乡去进行示范教育。我说你们不要讲大道理，要具体教给他们这一堂课是怎么教法。这样做受到当地干部、教师和学生家长的欢迎，这也是去年智力支边的一种方式。我们对师范学校一直不重视，是很不好的。我小的时候，师范就不大吃香。现在师范大学还要向北大看齐。他们自己不重视自己的任务，不是说我们怎样努力培养出一批合格的教师，而

是想同北大比科研成绩。教师待遇低也是一般人不愿当教师的原因。最差的是民办教师，在我们江苏也是这样。近几年，农村繁荣了，情况有了转变，农民要搞副业，要搞工业，开始明白知识的用处，愿意拿钱出来请老师了。知识分子在农村里的地位也提高了。从这里我也得出一个概念，知识分子问题不仅是一个一个知识分子所感觉到的问题，还有一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智力资源壮大和削弱的问题。拿“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来说，一个一个的问题落实了，政策已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它对整个智力资源的影响到现在还没有煞住。

现在让我简单地分析一下我国智力资源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智力资源有个年龄结构：像我这样年纪的一批人，是抗战之前毕业的大学生，多数 70 多岁，为数已经不多。抗战期间仅有后方的几所大学，如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等，学习的条件很差，但是一般是能吃苦用功的，爱国心强。解放后，我们开头向苏联学习，改变了教育制度，搞专业化，理工分校。现在看来与我国的国情不那么符合。我们这 30 年的建设并不像当时所计划的那样发展，所以按当时计划培养的人才，有一部分对不上口，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搞专业定向教育本来就难办，一下很难知道国家 10 年以后到底需要什么专业人才。所以我认为，还不如让学生在大学里把基本课程学好，出去以后再在岗位上学习专业的东西。这也就是过去被批判过的“通才教育”。对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研究，这里提出了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过去我们花了很多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因为不对口，造成的浪费是很大的。我们国家在这些问题上赔的钱不知有多少。我们还不富，用钱要打算打算。这几十年里由于投下的资金产生不了应有的效益，成为生产上的浪费不知有多少。教育是智力投资，培养一个人就得从这个人身上海回收成本。使用不当不但浪费了人才，也浪费了我国的财力。

我国的智力资源的结构里，目前存在着一个严重问题，十年

动乱所造成的“青黄不接”。以我自己这一门学科来说遭遇很惨。社会学停了30年，没有培养什么人，现在又要搞起来等于重新开头，真是创业艰难。不仅社会学如此，其他学科也有这种苦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毛主席说过，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中国社会我们懂得多少？不调查、不研究是不知道的。我这几年真是着急，马不停蹄地到处跑，为的是能培养出一批人来，接下去。我这几年就是搞这一件事，培养社会学的接班人。我们要在大学里恢复社会学系，那就要师资，有了教员又要教材和学习资料。这些从哪里来呢？而我们这一辈的人，又快要死完了，这不是夸大，每一年有多少朋友过去了。有时我想快轮到我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抗战之前培养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大概在10年之内都要报销完了，就是没有死的，也不能再做多少事情了。所以我们现在说要赶快抢救贮存在他们头脑里的知识，不要让他们把他们已有的知识带到火葬场去一起烧掉。因此我们民主同盟从去年暑假起搞了一套多学科讲座。把老同志请出来，把他们的专长讲出来，用录音机录下，印成书，把这一部分的智力资源传下去。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财富呀！

我们要抓紧搞好中小学，这个问题连大学里的一些同志也认识到了，中小学不搞好，要搞好大学是很难的。去年党号召智力支边，很多地方就要求各民主党派出人去帮助他们的中小学教员进修，请会教书的老师出来带出一批合格的教师来，这个办法很受欢迎。

关于技术人才方面，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屯集了许多知识分子在三线，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三线是一个很大的人才仓库。当时为了国防的需要把很多知识分子都包下来了。后来形势有了改变，又因为计划得不够好，这些工厂没有能发挥预计的作用。但是这些工厂里的科技人员却出不来了。今年听说四川要搞一些军民合作的项目，准备改变科技窝工的情况，这对发挥智力资源的作用是个重要的措施。

讲到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关于智力支边的问题。不妨先讲一个事例。去年提出要我们派中小学教师去支边。为了了解对方的需要先去了一个小分队，摸摸情况。他们回来后说，新疆有的是人才，他们并不比我们差，可是大都集中在几个重点学校里，一般的学校师资较差。如果我们去搞智力支边，就要考虑一下对以前去的这一批知识分子有何影响。他们会讲外来和尚好念经。我去年到云南，云南也有这种情况。他们提出需要林业方面的人才去支边。这时我们碰巧遇到一件林业技术人员自杀的事件，原来有同志在政协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下边不处理，顶了回来。有人就说云南本来有很好的林业技术人员，结果把他搞死了，现在又伸手要林业人才去支边，人家还愿意去吗？这句话说得尖刻一些，但是有道理的。那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同行之间信息灵通。你那里政策都没有落实还伸手要人，谁愿意去呢？上面所讲的这些例子，说明了一点，边区地方上不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智力支边是会遇到困难的。

昨天我听内蒙古科委的一位同志汇报。他讲得也很好。内蒙古现在还有知识分子外流。他曾经和这些外调的知识分子联系，发现这些从内蒙古出去的知识分子仍然很怀念内蒙古，说明出去的同志心还在内蒙古。他们都是怀着一肚子的苦衷才走的。所以我们讲知识分子是“孔雀东南飞”还不完全，这句古诗下面还有一句“五里一徘徊”，这一句才把知识分子的心情表达了出来。那些写得很动人的复信，我是从一份《决策参考》上读到的。我希望把这个材料多印一些，给领导同志们看看。

据我所知，内蒙古拥有的知识分子即智力资源，并不低于其他省区。有人说内蒙古所有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1万人中有70人，高过全国50人的数字。为什么？这里有个历史原因。在50年代，周总理号召知识分子支援边疆。那时我是清华大学的副教务长。我记得李继侗先生当时已经很老

了，身体也不好，可他坚持要到内蒙古来。这种精神了不起啊。他认为这是爱国的行为，很多青年也是这样，主动到边疆去。那时你们这里来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在智力资源上发了财。这是我们的政策。昨天我还问了这里的高等院校情况，虽不全配套，可是相当整齐。主要因为内蒙古是第一个民族自治区，是边疆，另外还有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北边，我们要争一口气嘛。这里既然有这样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希望各级领导、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要拧成一股绳，好好发挥这个优势，把边疆建设好。

我没有去过包钢。听说包钢这几年也有不少科技人员外流，但与武钢、首钢等大钢厂比，科技人员的比例仍比他们高。所以对智力资源要摸清楚，好好算一笔账。我认为内蒙古下有地下优势，上有智力优势，问题只是怎样发挥好这上下优势。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内蒙古曾经遇到过一场灾难就是“四人帮”搞的挖“内人党”。我认得许多受害的朋友，那场灾难确实很惨，差不多蒙族的同志都被触及了。这场灾难必然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一些外来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也和其他地方一样，是臭老九，损失严重。尽管这样，你们的本钱还在，关键是怎样把它用出来。

上面我已讲过智力资源不能放着不用的，不用就会销蚀。所以智力资源的丰富和贫乏不完全决定于知识分子的人数，还要看他们的作用发挥得怎样。比如一个人我们见他天天上班，表面上遵纪守法，可是他工作不积极，磨洋工，效果不佳。人的积极性，即主观能动性，在智力资源的发挥上，能起很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没有知识光有积极性不行，可是有了本领，再加主观能动性，就可以发挥创造性的作用。中国人在外国出了许多有本领的人，如杨振宁在联大时是个普通的学生，同他住一个宿舍的一位同学，他俩睡一个高低床，一个在上，一个在下，结果一个成了世界名人，一个还可能是一个无名的教师。这样的例子很不

少。一出去成了龙，而在这里是条虫，这句话不单是指中国人到外国，在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只要换个地方就成了龙。这方面你们的调查材料里有不少例子。本来有些人确是愿意在内蒙古贡献力量，把内蒙古比作第二家乡，但因各种原因又不得不离开，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我认为还是那场灾难造成的，使得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仍有许多困难。在座的同志有许多是老朋友了，我有啥说啥。在 50 年代，人们来内蒙古感觉不到你是蒙族，我是汉族，心里觉得是一家人，大家一心想把内蒙古搞好。可是现在就要首先看看你是什么族的人了，这是搞“内人党”搞出来的。既然我们知道它是“四人帮”制造的，认识了，就应该尽快恢复 50 年代的那种风气。我和许多朋友谈话，大家都很怀念 50 年代的情况，这也就是说，只要大家努力，我们是完全可能恢复到 50 年代那种民族团结无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友好合作关系上去的。这本来是我们已经做到的，只是被坏人破坏了一下，现在敌人被打倒了，为什么恢复不起来。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创造一个更加团结、共同繁荣的新局面。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我们看到周惠同志和自治区党委制定的十四条确实很好。可是怎么落实，使它变成事实，这还有一段距离。距离在哪里，我以前也想过，昨天又听说了一些，有一点觉得很深刻。据调查的同志说，他们下去调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下边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说：“我们发了”，发了什么？“8 块钱”。意思是我们的政策落实了。可是，是不是发了 8 块钱以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就转变过来了呢？实质问题他没有看到。我昨天在座谈会讲过一段话，电影《牧马人》里边有一个镜头，我认为很值得注意。电影主人公的右派问题改正时，组织上给他一叠钞票，接受钞票的人感情很真挚，我可以理解。可是给钱的那个干部的态度很一般，意思是我给你就完了。他不知道这个钱是包含着什么内容，一个活生生的人二十几年最

好的青春被糟蹋了，作为一个干部不应当有点痛心吗？不是说把钞票一给，责任就没有了。我们要重新建立起肝胆相照的关系，自己就应该首先把肝胆拿出来照照，给钱的这一个动作有没有表示出这种感情呢？至于心里怎样想的，这个也只有发钱的干部知道了。简单说一句，“我发了”，当然不错，他照上级的指示办了。可是你要想到给知识分子的不仅仅是8块钱，更要懂得知识分子要的是什么！我是过来人，花过代价，所以这样的话能讲得出来。可是我不管这些。我觉得我还是个教授。我感觉到研究中国社会是我的任务。我受到党的支持和鼓励，使我认识到我的工作是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我的积极性就出来了。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要求他们的工作要得到承认。“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还是对的。这是总结了几千年来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不像西方的知识分子，看到哪里工资高就到哪里去。英国好些知识分子，因为美国的工资比英国高一倍，就到美国去了。后来英国不能不向美国提出抗议，说挖他们的墙脚了。培养一个知识分子花了多少钱，你们怎么能这样容易就拿去使用。资本主义打算得精细，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不讲这个。老实说读书人讲清高，还有点书生气，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他们要求的也不是当官，不是要他当一个什么长、代表，他就满意了。他要在自己的工作上面证明自己有用，而且得到承认。他研究成果不正确，可以批评，他认识了会接受。可是你不去赏识他的工作，同情他的甘苦，那你给他多少钱都没有用，他不会掏出心来，肝胆相照，拼命工作的，甚至会引起一些很不好的心理状态。要充分认识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以心换心，态度是根本。

中国人的脑筋是不错的，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有人说，美国的钱是掌握在犹太人手里，科技知识现在已经逐步由中国人掌握了。教育水平华人平均最高。这里的道理、原因，我今天不讲了。至少可以说，我们在智力领域里本钱绝不低于任何一个国

家。一句话，我完全有理由这样讲，我们有很大的潜力。问题是在把潜力使用出来。开发边区要从开发智力资源入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第一步，把已经有的本钱使用出来，这一步一定要做好。在边区的知识分子的潜力使用出来了，人家一看吸引力很强，愿意到这里来了。当然，生活条件太苦了不行，一家一间房子三代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归根到底我要讲的是，不要认为只靠物质刺激就能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是精神。知识分子懂得，别人对他怎么样，是真心还是假心，人是有感情的。我说我对少数民族有感情不是假话，我脑子里老是想他们。所以一提到包钢，我就问：包钢有多少蒙族。在蒙古族的自治区，这样大的企业里，至少要有一定比例的蒙族工人和干部。可是他们有困难，两个差距又来了。我们要同情他们的困难，尽力帮助他们。光是学习语言，也要加一倍时间，蒙族同志只懂蒙语，不懂汉语，困难得很。我们当然要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这个政策不能动摇，但是少数民族，一定要掌握汉语。因为要进入这么一个变化很大的信息世界，光靠蒙语不行。不但要懂得汉语，还要懂得几种外文。所以他的学习任务比较重。少数民族获得智力要比汉族付出更大的代价。我在民族学院工作时曾提出过要让少数民族学生能更快学会汉语。为什么外国人学汉语比我们少数民族学汉语快呢？他们有一套科学的教学语言的办法。现在会讲汉语的外国人北京话讲得比我好得多。我的江苏口音太重，许多同志听不懂我的话。他们都学标准北京话。听说台湾有一些教外国人学汉语的学校比较成功，我们为什么不能搞？我们可以用这套教法来帮助少数民族学汉语，减少他们学习上的负担。现在的世界，是个多语言的世界。一个人不掌握几种语言，信息就不灵。语言是接受信息的工具。现在的外国人学语言的本领似乎在增强，我到日本去，在知识分子中间，用英语作工具，不发生困难，当然，他们的英语一般说得没有我们中国人

好，可是他们能看书，国外的科技和学术信息接收得比我们快得多。多语言是人类世界发展的趋势。少数民族中的锡伯族，原来是满族，到新疆落户。他们学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因为处于多民族中间，它成为中间媒介。他们保留了满族的语言文字，还会说新疆各民族的语言。智力活动越多越好，懒不得，在学汉语的同时要发展蒙语，这是民族权利。蒙族之间可以用蒙语蒙文交往，容易表达感情，还要用蒙语发展文学艺术。汉族在蒙族地区工作的要懂蒙语，这是我们的政策，因为不懂蒙语，不能接触群众，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语言是传达知识和感情的工具。智力必须传播，靠什么，靠语言。

为内蒙古着想，我看必须千方百计地引进新知识、新技术。昨天我看到一份材料，内蒙古科委搞了一个和调出内蒙古的知识分子联系的通信渠道，他们把这些外流的知识分子不看做“逃兵”而看成“亲人”。这样把他们的心收回来了，扩大了和区内各大学、各机关的联系，通过他们取得了内蒙古需要的有关科技的信息。这件事做得好。我在江苏的太仓县访问时，县委书记告诉我，他们曾经发动居民把他们熟悉的上海有技术的工程师和老工人登记下来，他发请帖，把他们请到太仓来，同他们一起商量怎样把太仓的工业搞起来。中国人讲交情，这样一请，大家出力出主意，太仓这几年经济大发展。我一回到家乡吴江，就鼓励松陵镇成立一个松陵镇建设研究会，把在外的同乡请回来开一次会，回来的人真不少，很多人表示愿意为家乡服务。你要什么，我愿给你去跑，自己做不到的找认识的熟人帮忙。当场两个专家为松陵镇解决了城市规划里的两个重要难题，这叫“智力回乡”。这些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不可能长期回乡服务，可是请他们来吃顿饭，出出主意，还是可行的。内蒙古既然有这么多人出去了，好嘛，你出去了，我欢送你。可是你得给我们做些事情，把你们认为有用的意见送回来，外面有什么新的信息迅速送回来。

智力要流通，要有渠道，这些外流的人正是内蒙古派出去的联络员。你尊敬他们，相信他们，他们就会为你服务。我自己在家乡就是这样，回去一次总得出一两个主意，有些他们已经照办了，取得了成绩，对我也是很大的鼓舞，更积极了。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家乡的凤尾菇》，在《新观察》上发表了。我去澳大利亚，和一位华人教授一起吃饭，吃到一种味道很好的平菇。这个品种产生于喜马拉雅山的南麓，传到澳大利亚，经过这位华人教授的培养，比普通平菇产量要高十倍。我说，这既是来自祖国，为什么不让它回到祖国去呢？我回国时，他送了我一些原种，我带到家乡，现在已经试种成功，而且在农村里还取了个好名称叫“凤尾菇”。他们要推销这种新鲜的平菇到附近的城市去，但是没有汽车，所以我上次回家乡时要我帮他们买汽车。我哪里去买汽车呢？我只会写文章。我在文章里说，现在农村经济商品生产化了，有了产品，可没有运输工具，农民要汽车了。我的文章一发表，南京汽车制造厂写一封信给我，表示愿意卖两辆汽车给松陵镇，以支援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我一想，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农业一发展，要流通；要流通，就得要运输工具，这也就形成了对中国的汽车工业的一种压力，一定会推动汽车工业的发展，汽车工业的发展又会推动钢铁工业的发展。有了汽车，还必须有公路，又会推动建筑材料，特别是水泥工业的发展。一浪冲一浪，这浪潮很快会冲到你们的包钢。美国为什么愿意和我们打交道，就是看出了这一市场，10亿人民的市场。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打这个算盘呢？所以我说，南京汽车制造厂的来信是一个“不寻常的信息”。

因此，我衷心希望内蒙古能把现有智力资源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进一步落实你们制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不要让它只停留在纸面上，让各级干部都充分认识到智力的可贵，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方面也必须不辜负人家的尊重，把力量全部贡献出来。知识要联系实际，才能发生实效，不能再

好高骛远了，搞些不切实际的“学问”。在当前这个科技飞跃的世界上，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中一定得赶上去，所以紧迫得很。实际上已经没有退路，不上去，不得了，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在物质生活上没有外国水平那样高，我们可以安于小康水平。可是我们的智力、科技却不能满足于二流三流，必须赶上世界水平。我们的条件比他们好。我们有社会主义优越性，我们的社会调查条件就比他们好，我们不怕他们。他们有的我们可以学到手，比如电子计算机，我们可以学会来用。可是我们有的，他们却不好学，比如我们可以在天津实行千户问卷调查，政府和人民融为一体，他们就做不到。我们几千年没有中断过的文化传统，他们没有。我们近年来发掘出来的那么辉煌的文化遗产，他们望尘莫及。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不再折腾，一条心地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一定能走到世界的前面去。

今天我是同老朋友们谈谈心，今后我还常来，我们有研究项目，不能不来，要工作嘛。怎么发展边远地区，这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课题，因此，要团结起来，好好研究一下。开始时可能要走许多弯路，这不要紧，不要怕。我们有党的领导，有群众，逐步前进，找试点做实验，总能找出一条路。林牧、农牧、农林怎样结合，怎样使我们的智力资源在现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出来，并加以培养，不断壮大起来，来迎接新的挑战。不要看不起我们少数民族，应该有后来居上的信心。汉族搞五谷文化，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在工业时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这个多民族大家庭，必然会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总的讲，内蒙古有丰富的地下资源、宝藏，已经掌握了比人家更多的智力资源，问题是在怎样发挥这个力量。这是你们要回答的问题了。

赤 峰 篇

内蒙古自治区地形宛如展翼飞翔的大雕，赤峰市地处其腹后部，所辖区域旧称昭乌达盟，包括 3 个区、7 个旗、两个县，面积 8.4 万多平方公里，略小于江苏。距蒙古边境 180 公里。在自治区里赤峰市是人口较密和经济发达的地区。现有人口 375.9 万，占内蒙古总人口的 19%，人口密度自治区是 16，赤峰是 45，而江苏是 590。赤峰市 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 17.45 亿元，居全区第二位，仅次于包头市；工业总产值 8.29 亿元，占总产值 47.5%，居全区第三位，在包头、呼和浩特两市之后；农业（包括副业）总产值 5.5 亿元，占总产值的 31.5%，居全区第二位，仅次于哲里木盟，而林牧总产值 3.6 亿元，占总产值的 20.6%，居全区首位。

我们挑选赤峰市为研究内蒙古开发问题的入门口，是因为在它的境内，具备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三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而且在民族结构上则和内蒙古总体一致，系蒙族和汉族等多民族杂居。汉族居多数（占总人口的 86.1%，1982 年）。从地理分布上看，西拉木伦河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约占 90% 以上。但喀喇沁旗与宁城县的蒙族人口略多，喀旗蒙族达 24.7%，宁城占 9.6%。这地区的蒙族现已务农，并通用汉语，部分蒙族生活上已习惯用汉语。据说这种情况是在解放时土改之后才显得普遍。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之间的翁牛特旗是半农半牧区。蒙族多务牧，汉族多务农，他们一般聚族而居，插花杂处，蒙汉间往来密切，并已通婚。蒙族一般通汉语，但在蒙族间都用蒙语通话。西拉木伦河以北，除林西县外，基本上是

牧区，蒙族在当地人口比例中百分比较高，巴林右旗 41.4%，阿鲁科尔沁旗 30.6%，巴林左旗略低 14.3%，但林西县汉族占绝对多数，高达 98.4%，而且主要务农。据说是近百年汉人移民占地开垦的结果。

我们这次是为了制定今后边区开发的研究计划而进行的初步考察，从 1984 年 8 月 15 日起到 9 月 2 日止共 18 天。参观访问了赤峰郊区的农区、翁牛特旗的半农半牧区和基本上是牧区的巴林右旗南部，不同类型的考察点共 34 处，行程 1000 公里。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能对这些不同社会经济类型的地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取得初步的概念，主要是由于自治区和赤峰市的党政领导及各地干部的细密安排和热情支持。根据我们亲身的见闻和当地各级领导提供的资料，现将我们得到的一些认识和体会，简述如后。



赤峰，蒙语称乌兰哈达，位于长城之北的塞外。对一般没有到过这地区的人来说，塞外两字往往带来荒凉之感，想象中不免是一片草原，平野无垠，人烟稀少，生活简陋。这种想象其实只表明了我们自己缺乏实地的知识，或是局限于片面的印象。事实上，不仅是今天，更不用说不久的将来，甚至远古时代，这西辽河平原都是我国的富饶园地，只是在历史上的一段时期中由于生态平衡的破坏，局部出现过荒凉的景象。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个地区的面貌，绝不能脱离历史上的兴衰起伏。

我们在赤峰所上的第一课就是这地区的历史。在赤峰的文物展览馆里，我们看到了在这地区出土的早于公元前 16 世纪的铜器，属于考古学者所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说明在夏商时期这里已出现青铜文明，和中原的青铜文明几乎是同时并存，甚至有

人认为为时更早。我们又看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器，有铲、锄等农耕工具，而且石锄厚重，刃端多崩落的疤痕，正是适应当地地表碎石块较多的松土工具。这些事实纠正了我们过去认为长城以外的农业是近世才传入的错误看法。根据随后看到有关地区的考古学论文，可以肯定，早在中原的夏商时期，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汉语黄河）一带曾经有过在技术上并不低于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当时的居民不仅懂得用石器耕种而且发明了含锡的青铜冶炼技术。他们还聚居形成村落，具有农业社区的特点。据一些考古学者的意见，这些居民应与中原的夏商有联系，这联系可能不仅是文化的传播，还可能有种族的联系，即殷人的一部分。

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地层之上还有一种和下层文化不相衔接的上层文化，这两层文化的交替正当我国的春秋时代。这是说，上层文化也就是后起的文化，曾于春秋年代在这个地区取代了早先的下层文化。上层文化之区别于下层文化恰恰在陶器的退化和金属武器的突出增多，并发现了前期没有的马的遗骸和青铜马具。结合中原文字的记载，使人觉得有理由认为后来进入这地区的是东胡民族，在经济上带来了牧业。

对于考古学我不是内行，上面所引的这些见解在学术上是否能确立，我无法判断。但是使我深受启发的是，我自己过去总是以为牧业落后，农业进步，牧业在发展上后于农业，而实际上这两种生产活动都是采集经济中发展出来的，一是在动物范围内驯养了牲畜，一是在植物范围内培植了粮食作物，同步并进的进程。由于各地条件不同而发生农牧的区别。

如果再进一层去看，农牧这两种生产活动，在早期的社会里存在着既依存又矛盾的关系。从满足人的生活需要来说，农业和牧业都不能单独形成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农民需要肉食和畜力，牧民需要粮食和日用品。但是农牧在靠天经营的水平上对土

地利用存在矛盾。靠天养畜的游牧时期，人跟着牲畜移动，不能定居，需要大片草场以便放牧。而农业却需要长期在固定的田间劳动，即使在刀耕火种阶段，要等几年以后，土力耗尽后才移动，所以一般也要定居一个时期，在这片土地上，就不能同时经营牧业。因此靠天种地的粗放农业对牧场草地来说是一种破坏力量。而且凡是丢荒之地，在干旱地区，植被破坏后，很快就会沙化，农耕所及，草场荒废。加上农业社区人口增殖，一定要扩大耕田面积，即使在较高的轮作和施肥的农业水平上，也是会和牧民争夺土地。所以在这种技术条件下，农区和牧区既互相依存，需要互通有无，而又互相排斥，难于长期和平共处。这种关系在传统生产技术没有突破以前决定了过去我国边区农牧接触界线上长期发生的你去我来，我来你去的拉锯局面。上面所说赤峰地区考古学的考证，只是这地区历史上早期由农而牧之变化的第一回合。

如果赤峰地区在殷商时代确曾存在过和中原水平不相上下的农业文明，这种文明在春秋时代被由北而南的牧业文明所代替了。在历史的记载上，我们又看到战国时代燕国的秦开挡住了东胡的南下，把他们赶回北方，“辟地千里”。这时所建的“燕秦长城”正穿过赤峰而向东延伸。它的遗迹还可以在赤峰市区附近的红山和水地后山上看得到。可见赤峰南部正处在燕秦长城和至今尚存的元明所修长城之间，胡汉交叉之地，也正是农牧交替之区。秦开之后，这个地区历经突厥、契丹、女真、蒙、满等不同的北方民族先后占有，农牧之间的来回往复，当可想见。

如果容许我冒失地总括秦汉以后直到清代这个地区的总形势，也许可以说，骑马的牧民总是于武力上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他们尽管可以一时受到中原武力的回击，如早期的秦开以后的刘彻（汉武帝）等等，挥鞭塞外，但是以农业为主的居民，总是处于守势，对飘忽不定的骑马民族，主要只有采取筑城防御

的战略。但每一次防线被突破，就必然有大批牧民进入塞内，其中固然有许多人满足于得到了一些粮食衣帛，回去继续他们的游牧生活，但是如果要在农业区站住脚跟，建立统治地位，就无法在农业区继续原来那种游牧生活，只有弃牧为农。正如我们这次所看到的赤峰南部蒙族的情况，在几十年里基本上放弃了放牧生活而成了农民。当前华北的居民中一定有很多人可以从家谱上追溯到经过这种转变的“根”。

还可以注意的是，汉代以后以长城为界，出现了南北两个大统一的局面，北是匈奴的游牧区，南是中原的农业区。游牧区的东端包括西辽河平原，现在的赤峰市就在这个统一体的边缘。其后在这地区或这地区附近兴起了势力扩及华北的鲜卑、契丹等以牧区为基础包括广大塞内农区在内的政权。我对北魏和辽金的社会史实知识不足，不能作出概括的描述，但可以看出，当时这些北方政权，军事上尽管依靠牧区的武力，经济上华北农业区一直是他们的基础。而且在统一的政权下，农牧区之间的依存关系一定受到保护和发展。契丹所建的辽国上京在今巴林左旗的林东镇，中京在宁城县的大明，均在今赤峰市境内，而其西京则在大同，南京在今北京城附近，表现出了农牧并重之势。同时也可以推知当年这地区的繁荣景象。原林东和大明的大塔保留至今，雄伟屹立，本色犹存。因此，我们不能想象今赤峰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是单纯的牧区。

至少我们可以指出，公元后 1500 年的历史中，还难找到赤峰地区曾经是一片沙砾，荒无人烟的记录。相反的，远在唐代，这里就有“平地松林”之称。宋代文人欧阳修（1007～1072 年）的“春使契丹道中五言长韵”中有“山深闻唤鹿，林黑自生风”的描写。到辽代，翁牛特旗据称是“平地松林八百里”，至今这地方还有三四百年的油松大树。不说远的，就在解放前夕，在这地区和敌伪斗争的同志亲口同我说，至今还明确地记得

当时清晨在这片草原上驰马出行时，露湿两腿及腰部，当时草长有一米多高。这样的草原至少有一部分还保持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优良水平。换一句话说，那时这地区的生态平衡还没有严重破坏。

二

在这个地区人口由北向南的移动逆转为由南向北的移动，可能是从清代开始的。满族是女真之后，兴起在东北，入关统一中国之前，先并吞了蒙古的牧区，并和蒙族建立了联盟，实行对蒙族的和亲政策。在今赤峰地区康熙、乾隆两代就有七八个公主下嫁给昭乌达盟蒙古贵族，其中三个是在巴林右旗。我们参观了至今还作为文物重点保护的巴林右旗大板镇的庙宇，据传说，就是当时下嫁公主时，陪嫁的七十二行匠人所建。这些人的后代现在已作为蒙族繁衍在这一地带。和亲政策的内容显然包括了文化流传和人口移动。这种移动不仅促进了当时牧区的社会发展，而且一直受到群众的欢迎，作为美好的传说，流传至今。又据说，当时的蒙族王公为了自己的享受和蒙民的粮食供应，曾主动招收关内的汉人来归，给予土地，让他们开荒耕种。但是在清代初年，依法汉人是不准出关的，所以由南向北的流动总属少数。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出现了新形势。一是中原经过几十年的安定和引进了新的粮食品种，人口大增；二是北方的帝俄已侵入西伯利亚，到达我国边境。一方面人口压力使华北的一部分贫苦农民为了寻求出路，大批出关。另一方面康熙、乾隆看到边区增加人口的重要，不得不开放边禁，采取“借地养民”和“移民充边”的政策。这样大批汉人在政治力量支持下移向东北，其中一部分进入了当时蒙族的游牧地区，首当其冲的是今赤峰地

区。

我们还没有掌握近百年来，这地区人口流动的具体数据，但在这次访问中注意到在西拉木伦河以北，以牧业为主的地区，有一个务农汉族占 90% 以上的林西县。询问之下，才知道清末已开始有汉人入境，民国初期军阀割据移入的汉人更多。据说当时在热河称霸的军阀，强占牧场，分封部下，招募农民，高利盘剥，硬是把林西这片牧场开垦成农田。这只是一种强力移民的方式，更多的恐怕是通过早到的移民的同乡和亲戚，一个牵一个，一家拉一家地进入这在农民眼中看来是一片大可开垦的“荒地”。实际上这都是改牧为农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在无计划、无领导、落后的农业技术水平上进行的。其中固然有开垦成功的耕地，但直到 1952 年，平均单位粮食产量才开始超过 100 斤，以前一般只有几十斤，实质上是一种广种薄收的对土地的掠夺。人们占有了一块草地，挖草开垦，靠天种地，几年后地力耗尽，就丢荒另开。这片被丢的土地不久就沙化，最严重的寸草不生，成为流沙，或称移动沙丘，进一步侵蚀草场，形成难于抗拒的破坏力量。

人口增加，不仅当地所需粮食增加，必须扩大开垦，而且建筑房屋，生火取暖，起炊造饭，这一切都需要木材和燃料。只砍不植，日久天长，使原来森林茂密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到了近几十年已成了一片树木稀少的平旷大地。树木日稀，水土流失，加速了沙化。以牧区来说，由于牧场缩小，单位面积载畜数相应增加，超过了自然恢复饲草的限度，引起草原退化。这一系列破坏生态平衡的因素，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引起了一般所说的“农牧矛盾”，在民族杂居地区又表现为民族矛盾。

解放后的 30 多年，尽管在植树造林和草原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从林草的植被状况看，沙化的程度还是十分严重的。以赤峰地区中部的翁牛特旗来说，基本是“五沙、四山、

一分田”。已经沙化的一半土地中，流动、半流动沙丘占全旗总面积的41%，水土流失的面积占总面积的一半，全旗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仅为0.5%。因此我们可以说赤峰地区生态平衡至今还没有恢复。而且这几十年里一定程度上还加速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据当地工作同志的总结，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四滥”造成的，即滥砍、滥牧、滥垦、滥采。

滥砍，解放以来林木砍伐量远远大于林木生长量。30年中两次大的破坏：一次是修建红山水库，1960年水库水坝合龙时，使用大量木材，砍伐达4个月，附近地区几乎都剃了光头，至今这一带森林植被没有得到恢复。第二次是十年动乱，仅翁牛特一旗就被砍伐了700多万棵。

滥牧，多年来，牧业的最大弊端是过度放牧，靠天养畜，不注意草场建设。造成草畜矛盾，牧草减少，牲畜羸弱，大量死亡。原因之一是，领导部门误以牲畜存栏头数增加来衡量牧业是否发展的结果。解放初期，翁牛特旗牲畜仅15.6万头（只），而现在已有80万头（只），折合170万羊单位。载畜量过重，草场和牲畜质量都大大下降，形成夏秋抓膘不足，羸弱牲口不易过冬，到春天大量死亡，每年都在5%上下，灾害年份高达10%，今年干旱，死亡率达10.8%。

滥垦，开地垦荒，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为害最烈。翁牛特旗粮食单产一般仅为百余斤。解放初期该旗耕地面积150万亩，现在实际已达240万亩，30年开荒面积达90万亩。人们所说“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还在发展。

滥采，主要是由于农村燃料供给不足，翁牛特旗7.3万农户中缺烧柴5个月以上的就有2.9万户，估计全旗缺柴1.5亿斤，先是砍树，树完割灌木，进而刨树根、挖草根，草原沙化。草原又生长着许多贵重土产和药材，去年夏季兴起一阵挖黄芩之风，由历年10万斤猛涨到400万斤，破坏了大片草原。

经此“四滥”破坏所及，林草俱尽，农牧双衰。总结这段长期没有扭转的恶性循环，人们往往总是归咎到流入的人口过多所引起的农牧矛盾。所以人们一听到我们谈到要研究人口流动问题，犹如惊弓之鸟。他们的感情是完全可以从此段历史遭受中理解和同情的。

人本来是自然界生态环境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而这一个因素却是主观能动的因素，它可以成为消极因素，也可以成为积极因素。这地区的游牧经济原是当地居民早年创造的一种生态体系。人们帮助牲畜找草吃，保护他们不受其他动物的袭击，引导它们避开寒冷的气候，使牲畜得到繁殖，然后人又靠牲畜提供生活资料。农业原本也是一种生态系统，有人说在东亚这片大陆上，中国人能从土地上耕作5000年，而地力不竭，明显地掌握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所以人成为生态环境中的积极因素是常态。

但是当靠天放牧和粗放农业碰在一起，农民开垦土地，把原来的牧场变为耕地，人口多了，耕地面积扩大，更缩小了牧场。粗放农业不能经久地在一块土地上耕种，必须不断更新耕地，也就要不断丢荒，被丢荒的土地不久就沙化，沙丘会因风移动，吞没草地，又是对牧场的一种重大威胁。这样的农业在这个过程中确是破坏牧业的消极因素。它之成为消极因素也由于被破坏的牧业是靠天放牧的低级牧业。这种放牧是让牲畜在草地上自己去找自然生长的草，并不是人种了饲料去喂牲畜。如果我们把“农”理解为人工种植，那么靠天牧业中包括不了“农”的成分，因而同农对立了起来。如果牧业提高一步，人用自己种植的草和其他精饲料去喂牲畜，种草和种精饲料的活动应当可以包括在“农业”之中，农牧不仅不对立，而是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农业为牧业服务了。我对牧业固然没有专业的研究，但在访问英国和澳大利亚时确实看到过这种比我们靠天放牧高一级的饲育牧业。

看来，只有提高牧业发展生产力才能根本扭转农牧矛盾的恶性循环，恢复这个地区已经破坏了的生态环境。要发展生产力，关键还是在人这个能动因素。因为只有通过人的智力，才能实现这个转变。在这一层次上，我们一定会看到成为积极因素的人受到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地区的欢迎。有如早日公主下嫁，七十二行技工进入内蒙古一样。我想，争取这一天早日到来，也正是我们所提出的开发边区的主题。

三

我对草原和牧业很不熟悉。过去只去过内蒙古四次，两次到呼伦贝尔，50年代和60年代各一次。两次到呼和浩特，都是短访，不是调查研究。1954年我在《话说呼伦贝尔草原》里说过，当时我看到的草原上的草，长得矮矮的，够不上“风吹草低”，不如用“浅草没蹄”来形容似乎更恰当些。我还提到老乡们认为草矮好养羊的话。1961年又去呼伦贝尔，所见的没有多大改变，只听说，草场在退化，牛羊喜吃的草越来越少了。去年访问呼市，到草原去转了一下，那是个为旅游开辟的参观点，草长得和50年代所见的差不多。矮草是不是好，暂时不论。但这四次都没有看见沙化了的草场，更不明白沙丘怎样会移动的。关于这些情况还是我这次到赤峰地区得到的新见识。沙化有害于牧业，即便是外行人也会一看就明白。现在翁牛特旗这个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所形成的三角地带，沙化面积已超过草场的40%，赤峰市的其他地方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如果今后内蒙古的发展方向是以林牧为主，那么也很清楚，治沙自应当是要着重的要着了。这一点多年来明白人是都早已明白的。

我在上面说过，解放以来的30年，从草场的情况来看，不

能不承认赤峰地区生态环境中的恶性循环没有根本扭转。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说没有注意治沙工作。当我们车子刚出赤峰市区，同行的朋友就指着路前的一个小丘说，在这上面还有块石碑刻着朱老总和董老的题诗，纪念当年治沙的成绩。解放初期沙化的威胁已经达到赤峰市区的北郊，经过种草种树挡住了风沙，30年后，这里已成为一片郁郁葱葱的密林了。这说明在这个地区，沙化和反沙化的两种势力长期以来一直在较量。人这个因素，扮演着相反的两个角色：一方面是自发的破坏，一方面是理智的建设。上面所说的情况只表明到现在为止，后者还没有压倒前者。要把生态环境扭转过来，看来还得做一番努力。

我们在这次考察中已看到了这方面一系列的科研成绩，可以肯定，经过长期地坚持工作，确已为扭转生态的恶性循环找到了因地制宜的有效办法。现在的问题已不是在这地区能不能恢复生态平衡，而是怎样把各个环节上找到的治理方案成龙配套，付诸实施，推广到全境。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参观赤峰市郊区太平地乡的农田防护林。这是赤峰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在1966年开始的一项科研课题。这个乡1959年有4个村、54户人家，当时是一片沙化土地。经过山、水、田、林、路、机、电的统一规划和综合治理，1965年成功地营造了大面积的农田防护林，造林7500亩，形成400多条林带。把整片土地划成370多个网眼，每个网眼有200亩农田，共保护了6.6万亩农田。林带是由几层树木构成，定期分行栽植，分期成材，老树砍伐，新树接班。如果把这些树木双行排列，有1000华里之长。在防护林带保护下，改善了农田的小气候，风速降低37%~75%，温度提高7%，土壤含水提高3%~5%，这就控制住了沙化。粮食产量逐年增加，1965年单产218斤，防护林发挥作用的1975年单产达到450斤，1983年达到600斤。他们津津乐道的是1982年5月里赤峰市遭到十一级暴

风，全市灾情严重，唯独太平地林网内 98.5% 的农田太平无事。最近几年第一批种的树已经成材，一年可采伐 500 立方米。出售收入超过 100 万元，而且建立了一个胶合板工厂把残余木片胶合成木板，制造家具。只是林业一项吸收了劳动力 1400 多人，每人每年收入 600 元。太平地以林护农，林农并茂，而且开始发展了乡镇工业，走出了一条沙治民富的道路。我屈指一算大约是 20 年。到老乡家里访问时，看到这个家里已有一个电磨机，在碾玉米。小型机械已进入农家。

四

在太平地看到的是治沙的成就，怎样治理沙化的过程我们还是没有感性知识。当天又到离太平地北大约 85 公里的乌兰敖都，参观治沙基地。在路上我开始看到“沙丘”，很远就反射着强烈的光线，像是在绿草和蓝天中划出了一条条白色界线。车驶近时，但见高低起伏一片白沙，寸草不生。有一处我看见有几个人躺在沙上沉沉熟睡。一问，原来草地上蚊蝇扰人，不易休息，而在沙丘上则完全可以安卧了。这里已成为不长生命的空白点。沙丘凭借风力还会移动。大风把沙刮起，大量地吹向一方，不太长的时间里，一个沙丘可以移动好几米。积年累月，良田沃野甚至房舍道路都可以被它吞没。其力之大，难于挡避。不加治理的沙丘不仅移动，而且在移动过程中越长越大，越大越狂。

怎样治沙呢？沙化出于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治沙之道也就只有重盖植被，防风固沙。困难是怎样能在沙丘上长植物。科学工作者和当地生产者捉摸沙生植物的规律，找到适宜在这地区生长的包括沙打旺、沙蒿、沙柳、锦鸡儿在内的各种草本、木本植物。这些植物只要在发芽期得到一定雨量，就能把根深深插入沙

里，吸取水分，继续生存，这样也就把沙固定了。风吹来，不致把沙刮走。沙固定后就可种灌木，灌木是较厚的植被，改变土质，造下可以种植乔木的条件。这个公式称作草灌乔，和过去习惯的乔灌草公式刚刚颠倒过来，反弹琵琶。

乌兰敖都的治沙站，是1974年开始建立的，由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与赤峰市、翁牛特旗合作的科研项目，主攻方向是流动沙丘的治理。他们采取林业、土壤、气象、植物、微生物等多学科综合治理，通过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在流沙治理试验区内，用草灌乔结合、针阔叶相结合，封育恢复和人工措施并举的方法，建立了沙生植物园，形成固沙林、饲料林、公路林、草场防护林综合配置，治沙面积达3.3万亩，覆盖率已达40%左右。10年内把原来一片沙丘，变成绿阴如盖的林园，给我们初识沙丘的人极大的鼓舞。我们在参观时，还吃到了在原来的沙丘上建成的葡萄园的果实。味道虽则还比较酸，但是为牧区葡萄栽培开辟了道路。沙丘出葡萄应当是值得赞扬的“奇闻”。

退化到像乌兰敖都那样的沙丘，在总的沙化面积中还是少数。更多的是正在退化中的草场，场上草长得又小又稀，如果继续放牧，让牲畜把少量的草连根啃掉，加上畜群的践踏，就会很快退化到沙丘的状态。治理的办法就是把它围封起来，防止牲畜闯入；或把草场分成几块，分别围住，轮流放牧，使草有生长的间歇。这种围封的草地，蒙语称草库伦。这是保育牧场的有效办法，我们这次在翁牛特旗旅行中几乎一路都看到围封的铁丝网。

封育的办法是恢复草场的有效办法，但是所需时间较长，要提高草场利用的效率，还可以加上人工措施，建设基本草牧场。其中最简单的是不破坏原有草根而在地面上开沟播种苜蓿等有根瘤菌的豆科作物。这些植物不仅是优良牧草，而且可以改良土壤，使草场较快地兴旺起来。

为了逆转已经恶化的生态系统，恢复和巩固新的生态平衡，

人不断地在和沙化作斗争，使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科学的威力。

五

这次访问中见到的有关牧业的科研成果，我将按参观的路线倒过来讲，按路线我们是从乌兰敖都到格日僧的受联合国援助所办的示范牧场，海金山牧场，巴林右旗的短角牛场，然后穿过巴林右旗的大草原到巴彦他拉的改良草场。现在我倒过来先讲改良草场，然后讲改良畜种，最后讲饲料基地。因为我觉得这样讲顺口些。牧业的基础在草，有了草养活了牲畜，才谈得到改良品种，有了好品种，要抓膘育肥就需要精饲料。用了精饲料，牧业就进一步由靠天放牧向人工饲育转化了。这也就是我在上面说过的发展牧业的道路。在这几个发展牧业的环节上，科研工作者已在赤峰地区找到了有效的改良办法，这是十分可喜而应当记下来的事情。

巴彦他拉处在西拉木伦河以西大草原的西端，再向北是巴林左旗的林东镇，早年辽国的上京。“他拉”系蒙语，草甸之义，“巴彦”是富饶。得名之时，这里是个林木茂盛的富饶草甸。据当地同志介绍，解放初这里还是柳树成片、野鸡成群的好地方。现在柳树没了，野鸡飞了，一片黄沙。草场退化严重的原因如前所述，而这里更直接的原因是开荒造成的。1966年到1976年垦地增加了三倍，达7万多亩。1970年到1975年部队开荒3万亩，后来全部丢荒，日益沙化。其结果是1966年前10年，牲畜增加了四倍；后10年，反而减少了1万头（只）。

1976年春苏木草原站开始治理这块沙化地，主攻方向是半干旱沙地草场改良建设，他们建设了水、草、林、机器配套的3万亩基本草场，种树50万株，形成40个网眼的林网，控制2.4

万亩草场，种植了优质牧草 2800 亩，青贮 100 亩，树木、牧草长势很好。我初次看见长到我胸前肩旁的青草，草势长得这样好，据说是由于他们还采取了引洪淤灌的措施。这块地靠近一条河，每年春水涨，他们就开好沟渠、按网眼轮流把水引进漫灌地面。这种水里含着上游冲下来的沙和有机物，漫灌地面留下厚厚的一层土，相当肥沃，改变了沙化的土质。治理前亩产牧草只有 60 斤，经过治理提高到 300 多斤。过去这个苏木每年买草需 10 万元，现在单以支援别处牧草就可收入 10 万元以上。他们又围封了近 5 万亩沙化土地，现在已可以轮流放牧。

以巴彦他拉为例，我们看到从过去因开垦而被破坏的草场，可以改造成为牧草生产的基地。如果再加上围封治理，已经退化的草场在 10 年里可以转变成为优质牧场。这个经验在边区重振牧业中具有重大意义。这个以牧为主的巴林右旗，各类沙丘面积估计有 400 万亩，占全旗面积的 26%，而且现有沙土面积比 1964 年增加了近一倍，沙化速度每年平均以 11 万亩的速度向前发展。要扭转这个严重形势，每年得添加五个像巴彦他拉这样的乡才能在 10 年内把巴林右旗真的变成富饶的草甸。事在人为，已经有了榜样，这个目标是可以做得到的，当然在方法上还得因地制宜，但是林网和围封的基本方法是到处适用的。

发展牧业，首先在草场建设。草场的恶性循环主要表现在草畜矛盾。传统的牧业不讲经济核算，不计经济效界，接羔和出栏不加计划，造成死亡率高和畜群老化。这种习惯至今没有彻底改革，以致现在牛群里尚有 13 岁的高龄犏牛还在饲养。据估计，1982 年右旗尚有 7000 头 6 岁以上的犏牛没有适时出栏，3 岁以上的羯羊达 2.5 万只。这些老牲畜拉长了畜群生产周期，使有限的草场在冬春受到过重的压力，反过来增加了畜群的死亡率。同样一片草场，定量的草料，如果多养适龄母畜，繁殖率就能上升；再加上及时提高出栏率，加快畜群周转，使用草料喂给能多

出肉乳毛皮的适龄牲畜吃，牧业效益就能大大增加。

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以牲畜存栏头数来作为牧业指标，头数增长认为是牧业的发展。片面强调牲畜存栏头数势必导致降低出栏率，赤峰情况就是这样。在草场沙化的发展并没有扭转的30年中，牲畜总头数由1949年的100万头发展到1983年的676万头，单位牧场载畜量增加了六倍。在表面的繁荣中包含阴暗的一面，那就是由于草地超载，畜群不够结实，难于抵御自然的灾情，去冬今春就出现过高死亡的现象。所以当务之急，不仅要从事草场建设上稳定和提高草料的供应，而且急需实行科学畜牧，就是分析畜群结构，加速周转，提高草场效益，解决畜草矛盾。农业要提倡科学种田，牧业同样要提倡科学养畜。

六

从提高经济效益的观点出发，一项根本措施就是改良畜种。用同量牧草养育一头牛或一只羊，因品种不同，所得到的畜产品，价值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原来的本地品种一只绵羊只产羊毛2至3斤，自从敖汉细毛羊的改良品种试验成功后，一只绵羊平均可剪羊毛6斤。这几年羊毛总产量提高了11%，1983年总产量达2000多万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我们参观了海金山牧场，当时他们正准备自治区派人来验收定名为草原红牛的改良品种。我们遇到该场最早引进英国短角牛的负责同志，听他讲述了引进和试验的经过。还是在50年代初期，在东北，某农科所处理英国短角牛，当时昭乌达盟分得了18头。这18头原种和当地蒙古牛配种，获得成功，肉乳兼用，产量都超过母种，而且适宜于这个地区的生长。

接着进行了人工授精，冷冻精液使得草原红牛的繁殖得以大

面积推广，现在全市已有 12 万多头，海金山准备验收的牛群就有 2000 头。我们见到了负责这项改良品种工作的一位土专家。他是中专毕业生，学过一些有关牧业的基本知识。从实践中摸索，坚持了 30 年，最后见到良种的评定。科学事业，贵在坚持。这位土专家没有用文字写出什么论文，但是他的论文就写在畜群日益增长的草原红牛身上。

我们在短角牛场停留时间不长，但得到很大启发。这是一个以牧为主、繁育短角牛的种畜场，也就是培养草原红牛的种畜。这里沙丘面积达 40%，他们坚持围封淤灌，造林治沙，根治了流沙。在改良并合理利用天然草场的同时，注意了野牧草驯化、优良草种繁殖和人工草场的建设。几年来，先后引进 150 多个牧草品种进行对比试验。同时驯化当地野生优良牧草 12 个品种，选出适合本场栽培的优良牧草品种。1980 年开始繁育牧草良种，其中有制作青贮较理想的品种，有适合晒制干草的品种。与此同时，建成了人工饲草饲料基地，以农促牧，不但自产羊草、优良牧草、青贮饲料，还生产多汁饲料和精饲料，粮料自给有余。场内建立了乳粉厂、酒厂、木工厂、面粉加工厂和饲料加工厂，饲料加工将从草粉加工向颗粒饲料和配合饲料深度发展，现工业产值达 40 多万元。

20 年来，前 10 年该场赔了 118 万元，而后 10 年盈利达 140 万元。在这里我不想强调品种的改良，治沙的效果，而想从农林结合，促进牧业发展，走上发展工业的道路去看，这里不是提供了许多从靠天养畜向建设养畜转变的具体启示？

我们接着访问了接受联合国援助的翁牛特旗示范牧场。建这个场的目的是为了在集体经济基础上搞一个草场、饲料、牲畜集约化生产的试点，使其成为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一个现代化的生产、科研、教学相结合的示范中心。联合国提供了全套机械设备，我国提供了 5 万亩饲草饲料地，修建所需的建筑，包括青贮

设备、机械仓库、人员办公住宿用房。为了引水入场，还修筑了一个水渠体系。从1981年开始，今年已完成了第一期计划，尽管这个牧场是否有推广的条件还成问题，但在这里至少可以看到现代牧场的一个梗概。他们初步摸索到了草原畜牧业如何向现代化畜牧业过渡的途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饲养业一定要和种植业并举，放牧和半舍饲相结合。简单地说就是靠天放牧和人工饲养的结合。如果能利用现有条件，总结和分析这个示范中心所遇到的种种具体问题，正给我们理解在牧业现代化道路上必须通过实践来克服的一系列困难。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点的道路来。从这个角度看去，这个示范牧场是一个有价值的试验。

七

我们从巴林右旗沿西线折回翁牛特旗。翁牛特旗从整体说来是个半农半牧区。它正处在以牧为主的巴林右旗之南，以农为主的赤峰郊区之北。夹在北牧南农的中间，也可以说赤峰市农牧两区的交接地带。在这个旗里我们曾沿东线参观了上述几个治沙和改良畜种的典型，但并没有接触到半农半牧的特点。在回程上才访问了有半农半牧代表性的巴汉他拉苏木。苏木是蒙语“乡”的意思，巴汉他拉是“小草甸”的意思。这个苏木，一共有1100户，分成四个嘎查，嘎查是蒙语“村”的意思。我们听到黑塔子嘎查的情形之后，认为这里具体而微地集中表现了赤峰这地区的一般经历并有力地指出了退农回牧的前途。让我在这里简单地把这个嘎查的情况介绍一下。

黑塔子嘎查是1947年解放的，当时共有64户人家，347人，其中蒙族49户，230人，占总数70%以上，不仅是主体民

族，而且还是多数民族。蒙族以牧为主，全嘎查共有大小牲畜 1235 头（只），耕地只有 436 亩，主要属于汉人所有。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牧业和农业都处于自给状态。上等好耕牛市价一般不超过百元。务农的汉人技术上同样很落后，称作“漫撒子”的粗放农业，种的主要是糜子和谷子，产量很低。务农的家里也养少数牲畜，务牧的在村子边头也撒些谷子。当时黑塔子不像现今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荒凉，草甸子平均每亩青干草在 500 斤以上，草甸子上长着碱草、野苜蓿、德日苏等草，牧草称得上很丰美，而且还有麻黄、黄芩等名贵药材。

解放后这 30 多年来几乎每年有 30 个汉人流入草原。1966 年已有 242 户，1029 人。牧畜增至 3104 头（只），耕地增至 3871 亩。1983 年又有增加，达到 345 户，1705 人，比解放时增加了六倍，其中蒙族 88 户，448 人，仅占总数 1/4。蒙族在该地成了少数民族。嘎查土地总面积 4 万亩中，草牧场 3 万多亩，牧畜 5390 头（只），比解放时增加十倍半。耕地 4000 多亩，比解放时增加近十倍。土地总面积是增加不了的，耕地增加则草牧场缩小，牲畜头数增加则每头牲畜草料供应相应降低，这样就引起严重的草畜矛盾，降低了牧业效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多年强调“以粮为纲”，大量种植粮食作物，亩产量不到百斤。1972 年劳动日值下降到 5 分。所以从 1963 年起，一直到 1980 年，连续吃返销粮，到后来连返销粮也买不起，只能靠国家救济过日子。这种情况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大包干的责任制才得到扭转。特别是这几年种植了向日葵，全嘎查 1983 年交售商品油料 31 万斤，加上牛羊肉 1.6 万斤，群众的生活才喘过气来，人均收入达到 240 元，解决了温饱问题。

黑塔子嘎查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个地区的所谓半农半牧，并不是农牧结合，而是农牧并存。从民族上看是蒙牧汉农，杂居共

处。这个草甸子原来是优良的牧场。六七十年前开始有务农的汉人移入，但是到解放时该地人口汉蒙还是三七开，所以保持了以牧为主的经济。30 多年来才发生了变化，成为半农半牧，这变化在经济上说是走了下坡路。移入的汉人越多，农田越多，日子越难过。这是该地居民每个人的切身教训，也是引起民族矛盾的经济基础。我们要加强民族团结，就是要切切实实地改变这种经济状态，而只有走上农牧结合、民族共同繁荣的道路才能扭转这局面。

我们倾听了黑塔子的干部们根据他们实践的经验所提出发展这地区的方案，真是为我们上了一堂富有启发的课程。如果总结这堂课的主题，可以说是“退农回牧”四字，看来这也是整个半农半牧区应走的道路。像黑塔子嘎查那样的地方，首先要解决的是土地的沙化问题。治沙的办法正如我们上面所说过的，是现成的。黑塔子嘎查准备用 3 年到 5 年的时间，采取“引洪淤灌”的方法开沟挖渠，引进附近少郎河的水淤灌 2.5 万亩盐碱地。同时对现在草牧场实行封育，轮流放牧，并着手营造防护林，使这里草料在两年里每亩增产 100 斤，这是走巴彦他拉所走过的路子。

他们还计划“卖羊买牛”，在几年里使这个嘎查建成一个奶牛基地，做到每头母牛有“一亩青贮、一亩草料”。青贮是指种植玉米一类的作物，成熟后趁青贮窖，在草料缺乏时，喂饲牲畜或用以加强牲畜营养。种植青贮作物是一种为牧业服务的农业，这才真的做到了农牧结合。这种结合不仅是以农促牧，而且通过“过腹回田”，牲畜又为农田提供了有机肥料，以牧促农，彻底地改变农牧矛盾的恶性循环为农牧结合的良性循环。这是走上牧业现代化的路子。

“卖羊买牛”是牧业专业化。过去传统的牧业是自给的牧业，一家牧民要在牧畜身上取得日用所需的种种原料，所以必须

是肉奶皮毛样样俱全的综合供应。从自给经济提高到商品经济，那就要根据商品的需要而择选品种，一头既能长膘，又能出奶的牛是不多的。黑塔子嘎查想把现在喂羊的草料转过来喂牛，把现有 4300 余只羊全部处理掉，换成几百头奶牛，然后用精饲料饲养奶牛，并且计划开办奶粉厂，走上工业化的路子。这是一种先进的设想。以农促牧，以牧促工，整个经济就搞活了，也就提高了。他们估计完成“卖羊买牛”的计划后人均收入可以达到 450 元，比现在翻一番。路是人走出来的。但是采取这种措施的具体条件是否具备，那是还应具体研究的。

八

从巴汉他拉更往南行，就进入了翁牛特旗的农业区。这里有一条足以利用来引洪灌溉农田的少郎河，可以得到灌溉之利的土地称作平川地，但只占可耕地的小部分，大部分是丘陵地带的坡地，只适宜种植旱地作物。在一定程度上这里可以代表赤峰市中、南部的农业区的一般情况。我们从半农半牧的巴汉他拉出来，就去访问乌丹镇附近的山嘴子乡农业科技村驿马吐大队。这个大队现在是赤峰市商品粮基地之一。自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推广普及农业科学技术，这个大队的粮食产量从 1978 年开始大幅度上升，从该年的 270 万斤，已经提高到 1982 年的 435 万斤。5 年里每年递增产量 40 多万斤。1982 年实行了“双包”生产责任制，1983 年试办农业科技村，效果非常显著，粮食总产达到 537 万斤。1983 年向国家售粮 55 万斤，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品粮基地。

我们在访问该村之前就存在着一个科学成果怎样推广的问题。上面我们已经介绍了赤峰市在治沙、造林、改良草场和牲畜

品种等方面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但是这些都是局限于较小范围内的成绩，还没有大面积的推广来改变赤峰市经济的整个面貌。在我们看来，当前的问题是怎样使这些已经找到的发展手段能大力地运用起来发挥效力，其中主要的关键是在怎样使这些已经行之有效的科学知识能传递到广大群众手上，变成千家万户的生产力。这里包括着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形成一个扩散知识的社会组织，一是怎样建立起一个扩散知识的队伍。我们听到驿马吐大队的初步介绍，觉得这个科技村的实验可能对上述这些问题提供一些答案。这次访问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

这个科技村为科技知识的传播建立起一个五层结构的塔形梯队组织。最高一层是负责全村的科学普及推广工作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其次是受过农民业余技术学校培训的有文化知识的农民技术员，第四层是示范户，它们是些能在群众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农户。其中选出若干重点示范户作为第三层，基层称科技户，包括所有愿意接受科技知识的农户。凡是一时还不愿接受科技指导的为一般农户，是这个组织的预备队。

全大队5个自然村有630户。1983年落实了420个科技户，占全大队总户数的67%，其中示范户有70户，占总户数的11%，一个示范户指导6个科技户。其中再选择14户为重点示范户，占示范户的20%。全村共有农民技术员十儿人，他们都是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经过农民业余技术学校里的培训，工作热情高，干劲大，接受事物快，在科学种田方面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农民。经过考试合格，发给证书。他们是青壮年科技骨干，通过他们抓对示范户的指导咨询工作。负责全村科技普及推广工作的科技委员会是全部工作的领导小组，有成员7人，其中村干部5人，农民技术员、科技示范户代表各1人。通过这个塔形梯队，达到了上通下达，抓骨干带一片的信息流动运转的系统。

自从包产到户后，改变了过去出工听哨子，操作听指挥的劳

动方式，各家各户都得自己决定田地上种什么作物，串换哪些种子，购买哪些农药、化肥等等农业经营上的问题。解决得好，收成就高，解决得不好，产量就低。农民开始要求自己掌握农业科技知识。当然农民对现代科技知识不是一下就容易接受的，认识有先后早迟。有些自以为能靠老技术种田的人，并不急于采用不熟悉的新办法，一直到他们在实践中发现自己田地上的产量赶不上科技户时，才改变主意。

接受科技知识需要一定文化条件，驿马吐这个村子，据说已普及了小学；但只有少数达到初中程度。实践中他们感到文盲和小学程度的农民，必须通过具体的直观示范才能跟着做。这是在愿意接受指导的农民中，还得通过多层媒介，才能跟上的原因。在科技知识传递的塔形梯队中，能起带动作用的范围还不到 10 户，文化水平是局限性的主要因素。所以这个科技村的领导小组已经下决心要采取措施普及初中，为进一步推广科学种田创造条件。

科技知识能得到推广是因为它在实践中确能提高生产力。驿马吐有许多生动的例子：其中之一是烧锅地科技示范户许桂东，1983 年承包 25.4 亩土地，单产平均达 950 斤，水地单产达 1150 斤。平均每人达 2100 斤，人均收入达 565 元。比过去多了好几倍。他在种好自己承包地的同时，带领 11 个科技户，帮助他们安排种植计划，购买农药化肥，搞好种子处理，组织引洪防虫等，使他们都获得了好收成，人均持有粮达 3700 斤，比上年增加 800 斤，人均收入 400 元，比上年增加 80 元。这个小组比其他农户每人多得粮食 600 斤。

驿马吐在重点示范户、示范户、科技户的层层带动下，在田间管理上，只要科技示范户一动手，其他户也一齐动手，比如去年追肥正赶上天旱，示范户根据技术员指导推迟四五天，全大队都看着示范户一样行动，缩短了追肥时期，获得良好效果。

有了这个能带动群众的塔形梯队组织，是否能产生良好效果还得依赖带头的技术员和示范户有没有结合当地具体情况的科学技术。这种合格的技术员和示范户在一般农村里，需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地自行培训。驿马吐大队在赤峰市和翁牛特旗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从1980年开始就举办了农民技术学校。1983年扩大培训范围，开门办学，凡是有一定文化水平并能坚持学习的农民都可以参加。一年来一共开班5次，每次都结合当时农事的实际需要授课，如玉米、谷子、高粱三大作物的高产栽培，春季播种、夏季田间管理、秋季选种的知识。每次21天，参加一共690人次。这样培养出了一批掌握基本农业科学技术的骨干，他们不仅自己能种好田，帮助科技户种好田，而且其中还有一些人承包了6项有关新品种、肥料、高产栽培、新农药、生长刺激素等科研试验项目，积累了年度数据，提出试验报告，1984年作出了示范应用，扩大了科研效益。

我们参观了驿马吐科技村，看到他们在智力扩散、科技传播问题上取得了很可宝贵的实践经验。通过实验他们结合当前中国边区的实际智力水平，建立起多层的塔形梯队，让先进的科技知识一层一层地传达到生产者手上。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能把这个成功的经验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不仅包括农区，也应当包括牧区在内，推广这个多层塔形梯队组织。首先是需要有科技知识的人。从驿马吐的经验看，每6家科技户需要一个示范户，5家示范户需要一家重点户，这些基层科技人员用二三年时间可以从一般农民中培训出来。驿马吐这样的600多户3000多人的大队，至少要两个中专程度、一个大专程度的技术指导员。全市75万户，376万人就需要中专以上指导员2500人，大专以上指导员1250人，而现在全市农牧系统大中专程度的科技干部约2200人，显然在数量上相差很大。所以从点上的成就要推广成面上的事业，还需要在短期内培养出大批大中专程度的基层工作人员。这些人

员不可能从外地调用，只有在本市培训，那就需要立刻着手在本市开办大中程度的专业学校。

我们在上面所叙述的还只是大队一级的基层机构。这个梯队并不是自足的，它还必须接上更高的层次，至少还要有市旗（县）两级的科技指导机构。如果与农牧研究机构配套，所需的人才为数就更多了。我们在这次访问中，只能提出这个问题，所得到的有关材料还不够作出初步的智力规划。但是为了实现赤峰市农牧的现代化，这个规划是不能缺少的。

九

“有工则富，无商不活”这句话在赤峰市是同样适用的。赤峰市 1983 年工农业产值 17.45 亿元，其中农牧业 9.16 亿元，工业 8.29 亿元。农牧和工业在产值上相差不大，但是这里的工业主要是集中在赤峰市区和若干国营厂矿，在广大农牧地区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农牧副业 1983 年产值约 2.7 亿元，只占农牧产值的 30%。所以农牧区人均收入还不到 300 元。

我们所访问的那些牧区和农区，以及一路上所见到的情况，确是很少见到工厂，甚至较大的作坊也不多。只在太平地听到过，由于 20 年来种的树已经陆续成材，有一部分木材可以加工制造胶合板。除在黑塔子谈过打算发展奶牛开办奶粉厂外，各地很少谈到农牧产品的加工和兴办其他工业的话。这使我们产生一种印象，赤峰的农牧地区似乎还没有到发展工业的阶段。但是我们又同时常听到关于赤峰地下资源的谈论，而且知道在赤峰市东南角的元宝山已经建立起大型的火力发电厂。我们在返京的夜车上，还看到沿铁路线的山坡上灯光闪烁，说是来自采金的矿区。这些又告诉我们赤峰实际上已具备工业大发

展的若干条件。

从潜力上说，赤峰市确是极为雄厚的，在地质上，它处于华北地区与大兴安岭的褶皱地带，是各种矿藏较多的地区。北部背靠大小山脉，峰峦起伏，由东向西连绵延伸，形成了境内长达300公里的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带。目前又发现有色和稀有金属30多种，还有石灰石、大理石、萤石等非金属矿，大小几十处。南部以煤炭、黄金为主。元宝山的发电厂就是利用附近开采的煤作燃料的。现在已经发电30万千瓦，主要用来支持辽宁的工业。如果充分利用当地提供的电力来发展采掘工业，前途是极有希望的。

正在访问期间，我们接触到建设集通铁路的计划。集通铁路是拟议中从集宁经多伦和赤峰北部，到通辽市的铁路。主要是为了使西煤得以东运，而同时也给包括赤峰在内的内蒙古东部开发提供了重要动脉。可以预测，这将使赤峰经济发生重大的变化。

如果有关部门决定了要建筑这条铁路，据说，诸事齐备，只欠资金，这关一通在今后五六年内就可以通车。我们想到的是怎样使这条铁路成为导致广大赤峰的农牧民现代化的动力，而不是一条单纯用来为采掘的物资外运的工具，这就有赖于在铁路建成之时，赤峰市农牧区的经济是否能全面地发展起来，更具体些说，能否从自给经济转变成商品经济，因为只有进入了商品经济，才能利用像铁路一样的运输工具为本地经济服务。

赤峰市内农牧区的商品经济原来是很不发达的，还停留在定期的集市水平，市镇为数很少而且规模也很小。我们访问过巴林右旗的大板和翁牛特旗的乌丹这两个相当于内地的县镇，以及居于北部进入赤峰市区要道上的桥头镇。

大板镇现有1.6万多人口，解放时只有2000多人，因为清代下嫁到昭盟的几个公主都居住在这个镇的附近，又在这镇上建

造了几座庙宇，也就形成了集市，每年农历六月有一个月庙会，成为昭盟北部的主要商业中心。蒙族地区的庙会相当于内地的集市，届赶集那个时间，买卖双方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这个地方进行交易，集期过后，各自分散。牧区庙会的特点是集期间隔较长，早时一般一年一次。而每次庙会可以拖长相当多的日子，有的长至一个月。据说那时牧民以游牧为主，并不定居。生活基本自给，日常生活中依赖于外地供给的如粮食、茶叶、盐、布帛等都是耐久的物品，可以贮存，跟着畜群流动。牧民一年就赶几匹马、几头牛、几只羊到庙会上来，换取一年所需的这些东西。实际情况当然比所说的复杂些，但这也表达了基本生活形式。在赶庙会时，平时分散放牧的牧民聚会到一起，在热闹的场所下赛马比畜，歌舞娱乐，盛极一时。会期届满，人又星散。所以在大板一样的所谓镇上，平时只有几家杂货铺和饭馆，庙里当时却有七八十个喇嘛。解放后喇嘛也散了，我们去参观时只见到四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老喇嘛。

这次我们到大板，若和上面所说的早日情况相比，已大有发展，有百货商店、招待所和两所有相当规模的中学，原来的庙宇只剩了一座，正在修复，并改建成了文物展览馆，但是如果和内地的县镇相比，也就显得冷清多了。

作为翁牛特旗政治中心的乌丹镇和大板镇相比，确是高出一筹。人口约4000户，1.7万人。市容很有规划，穿市而过的是绿化了的现代街道，两旁有高层建筑的百货商店、电影院和一些行政机关。它是赤峰市南北两部分的交通枢纽，所以商品流通和运输等方面较其他地点为优越。据说在1948年解放时，人口已有1.4万人，“在帝、官、封三座大山和烟、匪、疫三毒的蹂躏下，一般人民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工农业产值据估计只有50万元。经济上翻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文革”时期虽说有一些社办企业，但时兴时衰，曲线发展，动荡不定。从

1978 年以来，5 年中社办企业由 17 个增加到 27 个，从业人员由 560 人增加到 1785 人，固定资产从 55 万元增长到 161 万元，工业总产值由 65 万元增加到 113 万元。在边区，可以说是已经开始走上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人均收入也从 1977 年的 115 元增加到 210 元。镇上已有电视机 255 台，自行车 10024 辆，成年人 80% 都戴上手表。人民生活确实有了显著改变。

如果分析一下乌丹镇的企业还是以建筑业为主，配上一些建材、加工、商业、饮食和修理、劳务等初级服务业，还没有提高到制造业的阶段。全镇总产值 729 万元中工农比例是 15: 85，差距还是很大。

乌丹镇南面的桥头镇，相当于内地的乡镇，1978 年被列为翁牛特旗的商品粮基地。粮食已比 70 年代初翻了一番，商品率达到 35%，人均收入从 1978 年前的几十元增加到了 256 元。生活上的改变和乌丹镇相似。

从上面几个镇的情况看来，单纯依靠农业，尽管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产，人均收入还是不容易超过 300 元，到 2000 年达到小康水平还是有困难的。农牧地区要较快地走上富裕的道路，看来还必须发展乡镇工业。事实上，目前来说，赤峰市已有一定的条件，那就是上面我们已指出的：牧业从靠天放牧改变为人工饲养，改变粗放的农业为饲料基地，为牧业服务，提供饲草和饲料。一旦畜牧业有了大发展，走上专业化的道路，牲畜浑身是宝，就可以成为工业原料，发展肉类、奶类加工的食品工业和毛绒加工的纺织工业，以及畜皮加工的制革工业。总之，加一道工就增加一项收入，以牧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轻工业是不胜枚举的。

我们对赤峰市的远景是十分乐观的。如果能贯彻林牧为主的方针，首先改变生态环境，农牧结合，发展饲料种植，加速牧业改造。在林牧的基础上建立多种多样的小型轻工业，使千家万户

都能得到收益，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同时，由于线路交通的发达，矿产的采掘，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能源为基础，建立起 21 世纪的新赤峰。这个前景不是太远，主要在于要能及时解决当前所缺乏的智力和财力两项关键性的问题。关于这些方面，也正是我们今后开发边区的研究应当注意的课题。

1984 年 9 月

定西地区区域发展刍议

1983 年胡耀邦同志在视察西北地区时提出了该地区的任务是“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根据这一指示，甘肃省委定出了三年停止破坏，五年解决温饱的近期目标。

上述指示是一个旨在缩短以至消除我国东部和西部之间人口、资源分布不平衡、经济水平悬殊状态，达到东西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战略方针。对此，我们应当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具体落实这一指示。这里我们依据在定西地区观察的一些情况以及干部群众提供的资料，对该地区在 2000 年以前的发展规划作一探讨性的分析。

定西地区处于河套的上游，除黄河外，流经该区的还有西面边界的洮河、南面的渭河。全区总面积为 29100 平方公里，现有总人口为 270 万。地区下辖 7 个县（县城均为建制镇），180 个乡。

定西是一个经济水平落后的地区，7 个县都属省内的困难县。自 60 年代开始，无论是丰年或是歉年，都是靠返销粮和救济款过日子，30 年来共吃了 26 亿斤返销粮。遇到严重旱情的 1981、1982 两年，全区的返销粮就达 6 亿多斤。1979 至 1983 年的 5 年中，定西农民的人均收入在 200 元左右，其中现金收入低于 50 元。半饥饿，缺钱花是定西人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两个

现实表现。最近两年，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基础上，由于老天帮忙，下了较多的雨水，缺粮状态有好转。

二

定西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当地干部着重介绍了两点。一是政策上的失误。缺乏连续性以及十年动乱等等的政治因素；二是该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

三中全会后，政策对路了，干部对建设连续性的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但是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却不能立时扭转，它使定西地区在正确政策下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的障碍。

定西地区的平均海拔近 2000 米，属于干旱地带，区内遍布黄土丘，年降雨量一般在 400 毫米以下。

在这个高寒干旱地区生态平衡被打破的历史由来已久。从全国解放后 35 年的近期来看，由于“左”倾政策的干扰和人口的失控；由于旱灾的连续不断，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最突出的表现是土丘上的植被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据说在 1981、1982 两个旱年，人们获取 1 市斤的干草柴，就得铲出 4 至 5 平方米的草根。由此留下了一片荒山秃岭，天晴时黄土飞扬，天雨时水土严重流失。

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人们的劳动热情有用武之地，真正解放劳动生产力，要开发和建设大西北，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种草种树，逐步做到水土不再流失，变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

现在有不少专家学者到西北，考察与指导种草种树，体现了科学先行。广大群众也意识到生态环境对于自己生存的意义，做出了尝试与努力，现在种草种树（定西地区主要表现为种草）已有初步的成果。

三

恢复生态平衡对于自然条件恶劣的定西来说不是一件短期内能奏效的工作，它需要较长的周期。据一些同志估计，在定西要做到植被的全覆盖约需 10 年左右的时间。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在相对缓慢的自然生态恢复过程中，定西人民怎样走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生存和富裕的道路。第二是在这 10 年时间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速度，如果我们消极地等待自然生态有良性循环之后再来着手建设西北，速度显然太慢，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会越拉越大。不解决前一个问题，“三年制止破坏，五年解决温饱”就实现不了。不解决后一个问题，我国在 21 世纪的建设重点转移到大西北就会遇到由发展极不平衡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因此，我们在做好种草种树这第一步工作的同时，必须处理好它与现有人口生存、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自然生态的平衡问题只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系统的另一部分则可称为“人文生态”的平衡问题，要解决定西地区的人文生态平衡，我们还必须从定西的现状出发，找出一个突破口来。

四

定西的现状，主要应从全区的人口与社会生产两大要素来分析。

定西地区 1949 年的人口为 126 万，现有人口总数 270 万；

35 年来自然增长了 1.1 倍，据介绍，在 1962 年至 1974 年的 13 年间，该地区出现了持续性的高出生率，每年平均为 34.70，最高的年份接近 400。这一情况与 1982 年人口普查时所获的年龄中位数为 19 岁，35 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60% 以上的数据相符。这一情况意味着定西的人口在此后的十几年中将还会出现前一个高峰的余潮，仍将持续上升。虽然目前正在实行计划生育，采取各种措施力求一胎化。但工作甚为艰巨，事实上也难以达到一胎化，我们访问的几对青年夫妇均有二个或两个以上的子女。所以据地区计划生育办公室预测：到本世纪末，定西的人口将达到 330 万，比现在还要高出 60 万人左右。

从绝对的眼光看，全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23 人，人均占有耕地为 4 亩，与沿海地区相比，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可是从相对于定西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来看，人口仍有相当的压力。在定西 1100 万亩总耕地中，能做到干旱保收的水田只有 1/9，为 112 万亩，其余均为旱地，旱地中收成在 200 斤左右的梯田 260 万亩，沙田和沟坝田 29 万亩，其他都是无法积留雨水的坡田。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景，定西的粮食依然很紧张。如 1983 年是个好年成，全区的粮食总产量为 12.7 亿斤，人均也只有 500 斤以下的毛粮。虽然勉强糊口，但还没有完全摆脱半饥饿状态。

荒山要养草植树，不适宜耕作的田地要退耕养草，干旱、灾年仍是一个现实的威胁。而在近期内，种草种树不可能使畜牧业有突破性的飞跃，但人口现在就有压力，而且还要增长 60 万，这是定西面临的最大矛盾，也正是这一矛盾启发我们提出一个初步设想：定西人口在现有的经济活动方式上能否做合理的转移和调整，从而走出一条新的生存、发展的路子来。

五

我们根据这次访问所听到的介绍和所见到的情况，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及早采取一些措施。除了首先要考虑自然的生态平衡外，还得注意改变当前的农业产值占 78% 的单一性经济结构和农业人口占 89% 的人口结构。改变经济结构首先要加重工业在生产中的比重，做到农转非农（主要是农转工）的转移。

定西地区的工业大部分是在 1958 年与 1980 年以来办起来的，现共有 333 个企业（包括全民、大集体与乡镇办集体），职工人数仅 2.4 万人，总产值为 1.2 亿元。在如此薄弱的工业基础上实现较大规模的农转工，有没有可能性？需要哪些条件？

从可能性上看，定西办工业有三大优势。第一是当地有较丰富的矿产与农副产品的潜力。已发现的自然资源有煤矿、铜矿、大理石矿等，其中大理石与煤均有相当的蕴藏量。除矿产外，还有陶土和大量的石灰岩。从农副产品来看，虽然定西的麦类粮食不足以自给，但土豆、黄豆等豆类却有余，可以成为大宗的商品，还有桃、梨、苹果、白兰瓜、西瓜等各种瓜果，以及稀贵的药材党参、工业原料黄麻和很有名气的发菜等。第二，定西是离甘肃省会兰州市最近的一个地区，定西县城与兰州相距仅 120 公里。第三是有煤、有电，能源充足；而且铁路、公路运输相对便利。

鉴于这三个优势，有可能在定西地区兴办以矿产资源采掘为主，并辅以冶炼加工的一条龙工业；兴办以兰州市大中企业为依托的小型配件生产工业；兴办农副产品加工的食品工业。以这三类工业为主，可以在定西、靖远、陇西形成三个具有 10 万生产工人，规模约 15 万人的小城市，使约 30 万的农民转入工业生产。一旦这三个小工业城市形成，它又可带动相当数额的农民（约 10

万人)进入为工业服务的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生产领域。

要使这一设想成为现实,需要满足兴办工业的各种必要条件,如资金、原材料、技术、劳力等等。创造这些条件需要有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逐步消除我国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走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道路。具体说来,就是在一方面以东支西,即东部沿海要以财力、技术与智力支援西部边区的开发与建设。在另一方面则以西资东,即西部边区要以自然资源提供、充实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

六

要真正做到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还得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条原则。如从定西的发展设想来看,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是值得考虑的。

一、采掘资源截留分成原则

在边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投资包括吸收与利用外资的采掘和冶炼工业,除某些特殊产品外,其产品应定出一个适度的比例(如10%~20%之间)留给当地。这种恰当的资源分成可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使国营企业起到帮助与扶持地方兴办工业企业的作用。如地处定西境内陇西镇的西北铝厂若能给当地留成一部分铝材,就能使陇西镇成为以铝材加工业为重点的专业性小城镇,资源截留分成既使国营企业取材于地方,又使它植根于地方,真正成为我国工业化的骨干力量。在民族地区,这样做还可以促进民族团结,而且符合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

二、当地劳力就业优先原则

国家投资的采掘工业，除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外，其职工来源应采取当地劳力就业优先原则。即优先择用，吸收当地的劳动力使当地居民在自然资源开采过程中获得充分的就业机会，也减少人口压力。如靖远煤矿可更多地吸收定西地区的劳力，在民族地区更是培养少数民族社会中无产阶级的重要措施。

三、近距扩散与超距辐射相结合的原则

西北地区的大、中城市要真正起到附近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作用，应当采取近距扩散的方法，有步骤地带动周围地区的小城市和城镇，发展地方工业，使它们成为大、中城市工业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大、中城市既依靠周围地区的滋养，又反哺、提高周围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要求如兰州等城市做出大中企业扶持地区、县中小企业的规定。如定西可在现在为兰州电子器件厂生产高频头、录音机芯等部件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加工部件的任务，成为兰州电子工业的“龙尾巴”。这是已实行这原则的具体例子，可予以推广、扩大。

由于西部地区严重缺乏财力、技术和智力等兴办工业的条件，我们应当订出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企业直接进行超距辐射的各种具体规定，即东部地区的财力、智力、技术不必经过向西逐级连续的蔓延过程，而进行跨越空间的超距辐射。例如最近定西地区与上海挂钩，引进豆制品加工生产线，同时提供对方一定数额的黄豆。现在这种挂钩已扩展到与江苏、浙江、广州等地，共有18个项目。这种挂钩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如运输紧张等等，对此应做出运输部门优先照顾东西部挂钩的货物运输，增加西北地区汽车分配比例等等的规定，使这种超距辐射得以顺利实现。

七

随着种草种树成果的不断扩大，定西地区将由原先的单打一的粮食生产转向以农牧结合为主导，林、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生产。这种大农业生产的必然结果是农牧等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也必然引起生产性的服务需求。这就是说，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要有一个为其服务的商业流转中心和产前服务，产后加工的中心。这种小中心就是现在定西地区正在规划中的小城镇。这种小城镇要贴近农牧地区，规模不宜过大，收购、运输加工、服务方便灵活。在 10 年左右的时间内，定西地区 180 个乡政府所在地中，以 3 个乡建起一个小中心来计算，就有 60 个小城镇，它们将在那些交通便利、地点适中的乡政府所在地出现，从这些小城镇所承担的农牧产品流通、产前服务、食品粗加工、饲料工业的职能以及随之而起的生活服务、文化服务等职能来分析，其从业人口将在 2000 ~ 3000 人上下。这意味着，定西的小城镇建设将会吸收 12 万至 18 万的劳动力。这一项与小城市相加，到本世纪末，定西地区有可能蓄起 50 万左右的城镇人口，这些小城市与小城镇将对定西地区的发展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八

从定西的情况来看，人口压力还发生于地区内部分布的不平衡。某些县由于未能充分利用黄、洮、渭三河的水源或水利失修而蓄留不住人口。如靖远县的北部平原地区就是一例，要改变该区的面貌，就要进行旱转水的工程，即引黄河之水灌溉靖远的平

原，使原先的旱地成为有保障的水田。洮河和渭河也可根据各自的特点加以充分利用，这样定西地区的水田将从现有的 112 万亩扩展为 250 万亩左右。水田面积扩大一倍，一方面对于定西这个周期性易灾区的农民来说，具有温饱有保障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新水田的出现，定西内部的人口分布要进行短途迁移。根据该地区以往的经验，这种甲、乙地之间的内部迁移，由于能够获得稳定的生存条件，人们都争着要去，容易成功，也能长久安居。定西在以后的 15 年内按水利工程的先后将有 30 万左右的人口要作内部移动。这就从区内分布上减轻了人口的压力。

九

要使定西地区的种草种树成果得到巩固，要使定西农民由半饥饿转为温饱，我们就应当牢牢记取不顾客观条件，搞“以粮为纲”和片面强调粮食自给自足的教训。在恢复生态平衡的养息期间，要继续固定国家给予定西的返销粮的数额（地区要求每年达到 2 亿斤），给定西人民喘一口气的机会。事实上，定西的优势并不在发展粮食生产，而是由农牧结合转向以牧为主。即使定西的旱转水工程全部实现，定西的粮食总产也不可能突破高寒、干旱区的限度，所以前面所述的农转工、农转牧等人口不可能再依附于该区的土地供粮，只能做到剩留在农业人口的口粮基本自足。从农业转移出去的人口则由返销粮供给。当然定西地区既可通过返销粮的途径保证粮食供应，还可以采取与东部有余粮省份或地区直接进行产品的交流协作，如在牧业发展基础上逐步做到以畜产品换取所需的粮食。这样既能进一步扩展东西部之间的互惠范围，又在一定意义上调适我国的大农业布局，改变人民的食品结构。

十

定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培养的广度和智力开发的深度。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定西干部们的注意，他们把“三学兴办”（三学即正规教育、职业教育和干部学校）列为10年规划的第一条，这样重视知识与智力开发是有远见的。

目前，地委、行署以及各县的领导机构中，都充实了不少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例如7个县长中就有5名具有大专文化程度。工、农、牧、商等各业的管理部門也都有一批学有所长的人才。此外，定西这个地区虽然贫穷，但每年考取大专院校的人数却不少，1983、1984两年都超过1000人，据说在省内处于较高的水平。由此可见，在智力开发方面，定西已有一定的基础，而且潜力还很大。可是我们应当看到，定西地区总人口中，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仅占0.2%，有中专（包括高中）学历的仅占5.3%，而12岁以上人口中的文盲比例高达48%接近一半。显然现有的智力基础还十分薄弱，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因此，智力开发、人才培养是定西的基本建设，是一项十分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

近年来，每年由国家分配到定西地区工作的大专毕业生约百余人，这个数字只占离开定西进入大学的新生数的1/10，也就是说出去多，进来少。同时，几乎没有专业技术人员调入到该地区工作的。这种现象表明，吸收外来智力的途径在现阶段还走不通。这是因为这一地区生产力的水平与先进科技知识的运用之间还有相当的差距，一时结合不上；贫困的生活条件也很难留蓄高级的专业人才。因此定西地区的智力开发要走切合实际的道路，即借助、利用外力，诱发内因，逐步提高那些正刻苦自学、学以致用用的初级技术人才。

这次我们走访的定西城郊的五家专业户，分别从事电焊、磨面、农机修理、种花、养鸡等专业劳动。他们大都是初中毕业了业的年轻人，是劳动致富促使他们刻苦自学，他们一面钻研科技书籍，一面就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文化技术与勤奋劳动相结合，既使他们的家庭年收入都超过 5000 元（有的已逾万元），又使他们自己成为懂技术、会经营、不满足于现状和有着强烈求知欲的初等技术人员。据说在定西地区的 3.2 万个重点户、专业户中，不乏这样的“能人”。这批土生土长的、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能人”是定西智力开发的最宝贵的资源。

开发这批资源须要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根据定西地区还缺乏财力，近期还不可能将他们分批送出去培养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可以采取各种灵活的方式把知识“请”进来，使他们得到一定的训练。

第一是要充分利用定西邻近兰州市的有利条件，选择聘请所需的专业人员去定西讲学，举办灵活多样、针对性强的短期专业技术培训班。第二，是通过电台、电视、通信、报纸等多种通讯媒介接收科技信息，组织办电大、函大、刊大及中等科技班。从知识发射这一面来说，除全国性的业余教育课程外，甘肃省内应视本地区的特点尽可能地多开设这类无形学校，扩大成人教育面，并力求学用结合，使学到的知识在实际中发挥作用。

定西地区如何由种草种树，进而农牧结合再到以牧为主的过程将由各位专家去描述并提出规划设想，我们这里不再涉及。

这次到定西只有三天的工作时间，只能说是访问调查。我们受到了定西干部群众的热情欢迎，得到了许多启发，学到了许多新东西。但限于时间，资料是间接和有限的，调查是局部的。所以这里提出的只是一个刍议，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引子。

1984 年 10 月 4 日